

深度

惊心动魄三十多年
国运家事纪实

任志刚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深度

惊心动魄三十多年
国运家事纪实

任志刚著

为什么是中国

任志刚著

注定不一样的
中国思路——原初

台海出版社

总 目 录

[深度：惊心动魄三十多年国运家事纪实](#)

[为什么是中国](#)

[注定不一样的中国思路：原初](#)



李 锦◎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惊心动魄三十多年国运家事纪实

深度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饥饿：个人与时代的记忆从未远去\(1960—1977\)](#)

[第一节 灾难从吃食堂开始](#)

[一、五斗米道的“福音”](#)

[二、大锅饭不够吃的无尽凄凉](#)

[抢麦穗](#)

[挖野菜](#)

[难熬的夜晚](#)

[三、我在新华社整理过的关于饥荒的照片](#)

[第二节 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上\)](#)

[一、兰考火车站外出逃荒的灾民](#)

[二、夜不闭户无可偷](#)

[第三节 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下\)](#)

[一、被遗弃的108个男人](#)

[二、祖宗啊，保佑儿孙吃饱饭！](#)

[第二章 行者：在希望的田野上千里走单骑\(1978—1985\)](#)

[第一节 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一、不能刊登的真实画面](#)

[二、马坊：更早的“小岗村”](#)

[三、棉花姑娘的喜悦](#)

[第二节 蹲在鲁西北平原](#)

[一、第二次翻身 第二次解放](#)

[二、媒体突破坚冰](#)

[三、那个时代的亲民](#)

[四、比中央文件早一步](#)

[第三节 第一个报道万元户](#)

[一、算账算出来的“万元户”](#)

[二、农民朋友“王三万”](#)

[第四节 市场经济在基层萌芽](#)

[一、千里单骑入农家](#)

[二、农民抢了政府的“饭碗”](#)

[三、胡耀邦认为问题值得思考](#)

[第五节 邓小平说，你有发言权](#)

[一、庄户人家的好记者](#)

[二、让人民来评判](#)

[三、邓小平说，你有发言权](#)

[第三章 蹲点：身入基层接地气\(1986—1991\)](#)

[第一节 在大别山发现“初级阶段”](#)

[一、贫困落后，令人不安](#)

[二、与十三大的主题不谋而合](#)

[第二节 九柱擎天](#)

[一、潜入深山](#)

[二、惊心动魄的风波](#)

第三节 九十年代最耀眼的农村典型

一、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

二、历史转折关头的新典型

三、胡锦涛说，“你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

四、相信人民相信历史

第四章 觉醒：报道？还是发现？(1992—1995)

第一节 探索双星道路

一、“李锦是来潜水的”

二、总结出市场经济的模型

三、比十四大提前七十天

四、调研者的“三重境界”

第二节 发现“兴福现象”

一、被跟踪的神秘人

二、与市委书记密室长谈

三、十五大报告的新修改

第三节 提出资本经营理论

一、国有企业的困境

二、钻入《资本论》

三、“资本”一词写入十五大报告

第四节 中央领导的调研随行记者

一、乔石的《倾听》

二、感受领导的思维

第五章 亢奋：与达赖分裂势力较量的日日夜夜(1996—2000)

第一节 感受分裂势力的阴影

一、拉萨的另一面

二、到帕拉庄园认识达赖

第二节 甲日道路

一、发现甲日乡的斗争

二、来自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祝贺

三、在高原掀起红色风暴

第三节 与美国议员沃尔夫的遭遇战

一、沃尔夫潜入拉萨

二、陈奎元说，这一仗打得漂亮

第四节 零下四十一度的严寒

一、杨传堂口中的“大手笔”

二、吸着氧气到藏北重灾区

第五节 提出治藏方略

一、喇嘛叛逃事件

二、凌晨的一个电话

三、再三要求回西藏

第六章 漩涡：苟利国家，生死以之(2001—2005)

第一节 提出“新阶层入党论”

一、百万富翁当支书

二、中央派来调查组

第二节 天下焦点

一、躲进卫生间里写作

[二、准备坐牢](#)

[三、党章修改了两处](#)

[第三节 调研花埠圈事件](#)

[一、干部被包围在村里](#)

[二、坏事变成好事](#)

[第四节 寻找农民走向市场的对策](#)

[一、为了总书记的指示](#)

[二、莒南经验](#)

[第七章 活着：大丈夫当有为于世\(2006—2014\)](#)

[第一节 社会稳定善治论](#)

[一、从“瓮安事件”确定平安协会方略](#)

[二、把群众路线引入社会稳定](#)

[三、一年38篇稿件被批示](#)

[第二节 上疏温总理 报告信贷风险](#)

[一、倾泻而出的四万亿](#)

[二、平信直寄温总理](#)

[三、中南海的电话](#)

[四、监管风暴](#)

[第三节 探寻一条道路：混合经济论](#)

[一、“企业报所做的工作很好！”](#)

[二、六小时写出“央企市营六论”](#)

[三、“李老师相当于一个军”](#)

[四、树起“大企业时代”的理论大旗](#)

[第四节 打好一个基础：实体经济基础论](#)

[一、快速推出“银行暴利论”](#)

[二、实体经济99评](#)

[第八章 恩·长·敬：三人行必有我师](#)

[第一节 我所知道的农村改革元勋胡耀邦](#)

[一、掀起农村改革风暴](#)

[二、利用新华社内参指导农村改革](#)

[三、主持制定五个农村“一号文件”](#)

[四、新闻工作者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

[五、你为农民讲话，农民就会说你好](#)

[第二节 长者穆青](#)

[一、谁是李锦？站起来！](#)

[二、庄户人家的好记者](#)

[三、到穆青家串门](#)

[四、抬头望见北斗星](#)

[五、为什么不找我](#)

[六、拍好照片，也要写出好文章](#)

[七、我在家里点上香](#)

[第三节 亦师亦友范敬宜](#)

[一、至慈至善](#)

[二、求新求变](#)

[三、忧国忧民](#)

[四、夙愿未偿](#)

[第四节 家是永远的](#)

[一、我的母亲](#)

[二、我的父亲](#)

[三、我的妻子](#)

[附录 李锦调研年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度:惊心动魄三十多年国运家事纪实 / 李锦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171-0743-9

I. ①深... II. ①李...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0398号

责任编辑: 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2.25印张

字 数 276千字

定 价 38.00元 ISBN 978-7-5171-0743-9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部关于以调查研究推动改革进程的书，是以我的蹲点经历为基础写出来的，全书用讲故事的形式，从头说到尾。

中国地大人多，历史悠久而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或侃侃而谈的观点都有可能陷入“瞎子摸象”的陷阱，我多年的调查实践经验就是看见的基本上都是表面现象，只有深度调研才可能发现真相，从而求得真理。

作为一个身在基层做调查研究近40年的人，我深知调查研究是一件苦差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做好了更难；受罪不说，调研观点还有招致社会蜚议的巨大压力；最难的，是一辈子坚持调查研究，不动摇，不懈怠。

我从20多岁就投身农村改革，经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五代领导集体，我写的调查报告得到过数十位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这本书中所讲述的事件是过来人的那种亲身体验。我有责任，给年轻人讲些调查研究的酸甜苦辣，苦乐忧患。做好调查研究既要有基本功，更重要的是要有独立自主、奉献报国的精神。

我属于老三届，下过乡，当过兵，也有混文凭的经历，但大半辈子做的是调查研究的事。我坚信自学重要，最重要的是会调查研究，尤其是学会在工人农民中调查研究，我是靠深入群众立身、靠调查研究起家、靠提出新思想吃饭的，所以至今仍然在一线冲锋陷阵，每天都在报纸、微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我对调查研究的意义是深信不疑的，以至认定这就是自己的生命形态。

我的调查研究经历，是从1976年当新华社记者开始的。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总是在转型，在突围。转型的起因、焦点、性质、动力是什么？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围困、在抵销这场变革的能量？我的思考一直围绕所有变化的中心，几乎没有偏差于焦点。因此我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到老百姓中蹲点，常在一个村庄或者企业一住就是50天，乃至改革开放后23个春节都是在农村调研中度过的。我总是想逼近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本质，号准脉搏，为国家提出对策，从而去推动那些突围的实现。就这样，做完一个再做下一个。当然，这些是以一个人的视角来说事的。

这本书依时间顺序，有两条线在交织。主线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人追寻现代化的转折过程，包括我们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我相信，细心的读者应会看到，我确实研究了中国改革进程中很多重大的问题。我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长河中一条微小的细流，为人们提供了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事实依据。副线是我自己有关调查研究的实践与主张，一步步摸索其源、其流，是怎样形成的。譬如，最初属于战术层次的“第一个浪头新闻观”“三级朋友网”，属于战略设计层次的“新闻信息雷达网”“新闻调查过程论”；操作层次的“新闻典型全息胚论”“五位一体工程”；后来调查人才的三个层次、六条标准；到了新世纪提出的调查报告“十八字写作法”“发现思想、引领社会”的座右铭等等。直到我给中央关于金融危机的近万言建议获得采纳，我认定新闻传媒人追求的是“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社会进步的引领力”，为了这个价值观，我跌跌撞撞了大半生。尽管现在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但是对我来说调查研究仍然是不可弃之的法定，我有许多故事可以印证。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思想者的历史。思想者的跋涉过程，是这个民族艰难前行的佐证。

这本书对于那些对中国有深入了解以及有幸见证并了解改革过程的人，可能会引起对往事的记忆。万元户是怎样发现的，九间棚与沂蒙精神是怎样提出来的，“资本”这个最重要的经济学名词是怎样被解放的，治理西藏方略是怎样产生的，金融危机中抑制泡沫经济的建议是怎样为中央采纳的？在这些具体而细腻的第一手材料背后，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激烈碰撞甚至可以称为波涛汹涌的状态。

亲身经历是笔宝贵财富。年少时饥饿岁月的折磨，是我坚持长期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基础。用心的编辑从网上搜索了我的这段经历，按时间与逻辑顺序排列，放在前面，变成全书的背景，把历史又向前拉了10多年。

我的调查研究形成重大影响是在胡耀邦领导改革的初期，成长中受到穆青、范敬宜等师长的莫大影响，我的父母亲与妻子为我做出的奉献，这些都是我终生感激的。这些内容成为此书的组成部分，附于最后。

这本书最初是给新闻理论界包括给大学的讲课材料。感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宁，他是沂蒙山区费县人，我在调研中所竭力宣扬的九间棚与沂蒙精神就是他家乡的事，他用两年时间来整理了这本书。我说，他记，一起琢磨，几经修改。这本书，实际上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感谢北京新业文化黎雨女士的策划与言实出版社的支持。

我长期调研的地方是个圣贤辈出的地方，孟子关于大丈夫的标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对照当今好的和不好的社会环境，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在很多岗位，假以时日，谁都可以熟能生巧，但能做出多大成绩却和志向、气节相关，我走了大半辈子的路印证了前贤的格言，也用这句话来勉励后来人，特别是有志于报效社会的年轻人，愿你们比我走得更好、更远！

李 锦

2015.3.5

第一章 饥饿：个人与时代的记忆从未远去(1960—1977)



1960年春天，我8岁，那是我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怎会走到那一步？

诚民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多少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

第一节 灾难从吃食堂开始

我是1952年出生的，农历5月13。我的家乡苏北淮河南岸的射阳县，据说名字由来源于“后羿射日”的典故。上学刚刚两年，赶上大跃进后的大饥荒。中午放学回来，太阳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上学路上有条河，桥很窄，每次走到中间便两腿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就发慌，趴在桥上不敢走，只有与同学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这种对饥饿的切身体验，是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浩然的《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这句话，这样的描绘，只有过来人才能够写出来。

一、五斗米道的“福音”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左倾冒进思想在党内占上风后，一场接一场灾难接踵而至，中国农民饱受打击，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吃食堂风刮起后，农民生活陷入困苦之中，极为悲惨。

人民公社成立后和吃食堂的开始，也正是我开始记事不久的时候，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家乡苏北射阳县兴桥人民公社成立，就在我家东边五十来米的盐场上，有一万多农民参加了这场盛况空前的大会，每个人手里都举着纸做的小旗，高喊“人民公社万岁”，很多人嗓子都喊哑了。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几天的一个中午，父亲对放学回来的我说：“快，去黄奎德家，吃饭不要钱了。”我抱着铝锅飞跑到村中间开旅社的黄奎德家。吃的是大米饭、红烧肉，厚厚的一层油浮在碗面上，人们直吃得肚子打饱嗝。路过街上的外村农民也被拉来吃肉吃饭，他们不好意思，大人们就劝“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

接着大队也吃了一顿，大组吃了一顿。吃食堂的风很快地兴了起来，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有些人家把锅灶拆了，把自家的锅交给公家炼钢铁去了。

事情发展得特别快。第一顿吃的是红烧肉，第二顿是炒肉丝，第三顿是炒鸡蛋，往后便是蔬菜，一个炒韭菜，一个青菜汤。接着干饭吃不成了，顿顿是稀粥，粥里米越来越少，稀粥成了清水汤，食堂做粥的人就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还是稠稠的。我们常对着粥汤看着自己瘦削的脸在汤中倒映着，往往喝到碗脚才见到几粒米，也舍不得咽下，在舌头尖上舔来舔去。

开始办食堂时，是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也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

1960年，中央派出许多调查组调查食堂问题，周恩来总理率领的河北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与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胡耀邦赴东北调查的结果是：青壮年、妇女、老年人，甚至基层干部，没有一个说食堂好话的。河南省对一个模范食堂的调查结果是：全村32户，只有4户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吃食堂，其余28户都要求回家吃。

吃食堂这种做法，最早出于1700年前东汉末年张鲁之手，他实行“五斗米道”，在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说明人民公社吃食堂是有来源的，这寄托着古人曾有的梦想。但是条件不具备，往往带来的是灾害而不是福音。

二、大锅饭不够吃的无尽凄凉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齿苋、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曲曲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我们家不远的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熬过最艰苦的日子。

抢麦穗

1960年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出干部带队到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现在开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那一年，到了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饥荒的突然到来，射阳县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国家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老百姓只得自救了。我们到乡下拾麦子吃，当时乡下人有土地，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的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刷了。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老天不让人活，大劫来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麦收季节，拾麦子其实后来就是“抢麦穗”。那年我只有8岁，已经能干活了，三个弟妹都小，只有我能跟妈妈下乡拾麦子，挖野菜。

每天半夜里，天还黑黑的，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

天黑得像锅盖倒扣下来，我被母亲拖着出门，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篮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人被砍，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野菜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野菜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顶一闪一闪的，出来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吓得哭了起来，黑天旷野里只有自己哭喊的声音。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领着我回来。到家时已是深夜，母亲领着弟妹们瘫坐在门坎，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下来。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怎会走到那一步？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像，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当然，也没有见中国的画家画过那种场面。

那些场面，年长的人都记得，可是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有抢和偷的意思，显得不文明。偶而闲谈起来，触及已经板结的伤疤，心总要有一阵痛被牵

动。诚民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多少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

挖野菜

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出了一身汗，脚步便拖不动了。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爷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要死就死在家里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曲曲菜、马齿苋……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上太阳在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

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一点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拉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哭着，喊着。见了野菜不敢吃，可是不吃就要饿死，边咽野菜，泪珠了边往下掉，母亲看了也掉泪。四弟才一岁多一点，没有奶水，每天给他喂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汁。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

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得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的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过了清明，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很多人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父亲的舅父王广如在家饿了十天，没吃一点东西，临到咽气时大声喊饿，总不瞑目。直到人们找来一小匙稀粥喂到口中，他才闭上眼睛，这样，他转世便不是“饿死鬼”了。有些青壮年也饿死了，有些人家老少都死绝了。

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手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三弟哭喊得一口气转不过来，憋死过去，久久醒不过来，邻居们说没用了，劝说扔了吧。母亲一手捂着三弟的肛门，一手狠命抓着头发，弟弟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面积大，野菜多，死亡现象比其它地方还好些。而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

难熬的夜晚

回到老家狭长的院子，见到晾晒的衣服，又猛然间想起母亲。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每天劳动量最大的便是拆洗被子，晒被子，缝被子。这些辛苦，都是弟妹们溺床为母亲带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害怕夜晚的到来。因为没有粮食吃，我们喝的稀汤水，尿就特别多，喝的水在夜里都尿完了，常常一尿半床被子都湿了。睡觉前，母亲总要提醒我们解手。可是睡到半夜，梦里总想到解手的事，有人追我，打架时自己便使劲地解手，解了一半才发现尿在床上，身子下面湿湿的，赶快起来。人越长越大，尿也越多，一尿就湿半床被子。我与三弟在两头睡，常两边发水，那就不能提了。我知道弟妹都溺床，没有被子换了，自己便忍受着，用自己身子把潮湿的垫被暖干，常常睡不着，到天快亮时才睡着。等母亲喊醒我时，都该上学了。一起床，我赶紧把这满是骚味的被子、褥子挂到洋条(铁丝)上晒。

天气渐渐冷了，母亲便忙着为我们做棉衣。晚上躺在床上，把弟弟们哄睡以后，母亲再起来做活，每个人棉衣的里子、面子要缀缀补补，再套棉花引线。孩子小的时候，自己不能系皮带，都是缝的布带子，挂在肩上，大的该钉扣子的钉扣子，都要做好，等天亮起来能穿上。忙活了这些，母亲再做衣裳，既是裁缝，又是针线工，一家七八口，过年都要有一件新衣裳，等母亲把这些活干完了，便是深夜一两点了。我们睡一觉也醒了，母亲再把小二子、小三子、小四子一个挨一个叫醒，嘴里“徐徐”地吹着哨子，哄着孩子解手。孩子们都是半夜里被叫醒，心愿意不愿的，迷迷糊糊地解完手躺下去，母亲再帮助一个个掖好被子。有的睡得很香被叫醒了，不愿意，还哭呀，闹呀。可是不叫醒也不行，否则这一夜又“水漫泗洲”了。就是这样，差不多每夜总有一个或两个尿床的。母亲预先把干被子准备好，等孩子们尿床了再换。

天亮了，母亲把尿湿的被子拆洗了，晾在外面晒。每天离开家，总见到堂屋里一大桶衣裳，一个搓板。为赶太阳，母亲一早便起来搓衣服，为了节省肥皂，总是使劲地搓，常搓得满头是汗。有时冬天要脱掉一个膀子的棉袄，才能使上力气。洗不完的一件又一件，母亲的手成天在水里泡着。我们看到母亲双手每个关节都裂开血口子，甚至连指尖上也裂开口子。母亲手上常贴着一块块胶布，有时血能渗出来。等到我们放晚学的时候，母亲总是在缝被子，三弟、四弟总喜欢在被子下面钻来钻去的，像小狗似的捉迷藏。这时候，母亲总催着我们去抬水、看粥锅。有时候，阴天没有太阳，母亲便在锅房里烘，一边烧火，一边烘被子，灶边总是放着鞋垫、袜子。每天晚上，把我们的鞋垫子放在锅灶旁，排成一队，第二天一早崩干，再替我们换上。冬天更麻烦了，潮湿的被子、褥子容易上冻，有时等我们晚上快要上床了，母亲还在锅屋里烤被子哩。

母亲总是这样，起早摸黑地忙着。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间睡的，有时都听见鸡叫了，或者黄沙河里轮船汽笛响了，她才打个瞌睡，母亲这时也不敢睡，一睡着了便醒不来，第二天一大家子的早饭，一大堆被子还都等着她呢。母亲常常是不脱衣服，就倚在床头上迷糊一会就起床了。

有时候，我也想插手做点家务，母亲总是不让，说男子汉念书就行了，不要婆婆妈妈的，那样没有出息。虽然母亲有时也与邻居说我“油瓶倒了也不扶”，但总是人家夸奖我学习用功的时候，母亲才这么说，母亲是在夸奖我哩。因为她总认为男的就应该读书求功名，不在乎做多少生活。后来，两个妹妹都很能干活，是受母亲的影响。

看到母亲这么累，我们有时说等大了就好了，这时母亲脸上很难得的露出点笑容，说“早点带个女人回来，就像秀风大姐那样的，你妈妈一辈子便是福份了”。秀风大姐是对门高大哥的女人，很勤快，也很孝顺，每天早上看到她为病重的婆婆梳头，洗衣服做菜很麻利，而且嘴也甜，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没见到她发过一次火。我想，要找女人就要找秀风大姐这样的，将来能帮妈妈干活。我是老大，这是我的责任。嘴里没有这么说，可心里这么想，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母亲。

在那些含辛茹苦的夜晚，看着妈妈和衣坐在床头在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这是我永远记着的一幅画。我是看着妈妈怎么服伺我们，是怎样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的。

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后来，父亲回来了，我们的日子才见好转。

三、我在新华社整理过的关于饥荒的照片

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据后来了解，1960年6月6日，中国三大城市存粮维持销售时间：首都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几乎无大米库存！

1960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今年已经有几个省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1958年、19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完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了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疲劳了，相当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

后来，我当新华社记者30多年，跑了很多地方，了解到三年大饥荒是全国性的。整理过与大饥荒有关的照片，心情总难平静下来。

山东平邑县九间棚。在“瞎指挥”风兴起的年头，上面搞一平二调，搞大并村，很多村被逼赶到其它村。九间棚村在互助组后已盖起不少民房，在大并庄时全部被赶到山下的赵庄，两村合并。因生产、生活矛盾重重，无法相处，这个村的农民又全部搬回山上。可是，原来房子已被拆掉，木料被拆卸去大炼钢铁去了，全村几十口人只好搬回山顶石洞里居住，过着穴居山洞的生活。



山东平邑县九间棚村，在1958年大并庄时全部被赶到山下的赵庄。搬回山上时，房子

木料被拆卸去大炼钢铁了，全村几十口人只好搬回山顶九间石洞里居住。

湖北红安县七里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使得无数中国人变得浮躁而轻狂。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是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干部们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到处砍伐森林，大炼钢铁，使生存环境受到毁灭性破坏，为农村留下一片荒芜。七里坪是红四方面根据地的中心。在红军初创时，红安县有三万好儿女随红四方面军转移参加长征，有一万人把生命抛在战场上，这个县曾出过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100多名将军，是著名的将军县。1959年，这里的人民响应号召，为大炼钢铁把成片成片的树林砍光，运走木材，留下的是荒瘠的山地。兰桂珍，是当年闹红的积极分子，一家牺牲三个人。在大跃进时是砍伐森林的妇女营营长。党指向那里，就冲向那里，从来没有畏缩过。可是，晚年生活凄凉，面对当年砍伐森林后留下的荒山，这位老人心中涌起的是失望与悲哀。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后来闻名全国的十八人秘密会议是在严立华家那破草屋里开的。严立华告诉笔者，在1959年吃食堂时，他家六口人，饿死了五口，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成了孤儿，是已经出嫁了的姐姐把他接走，才活了下来。他们公社从1958年6月开始办食堂，村里劳力被调走到哪干活，就吃住到哪，一点报酬也没有。数月间，夫妻分居，家人不能见面，工作生活都是军事化。秋后，食堂吃光了就吃“小秋收”和供应的豆饼了，口粮被公社调去做种子。1960年春天，小岗食堂三个月没有开过饭。从1959年到1962年春天的三年中，小岗村有60人饿死，死绝6户，有71人逃荒要饭，逃离家乡。当时，村里活着的人连埋死人的劲都没有，只得将死尸扔到枯井或水塘里。到1962年夏天，小岗只剩下10户、39口人，一犏牛和100多亩可耕地。

云南省盈江县的中缅边境。在这里，我曾遇到一位从缅甸逃回的中国妇女。她是云南腾冲人，原籍四川，家乡吃食堂后，出现饿死人的状况，她就是那一年出生的。父母怕她饿死，带着她要饭要到云南又逃到缅甸，得以生存下来。在缅甸发生战乱后，她又逃回云南，这时，新生的女儿正好一岁，还没有落地，便走上逃避战乱的路。她抚着孩子的脚说，我们吃尽了动乱的苦，孩子还不会走路，就没有立脚的地方，命太苦了。

四川省江津县。在1959年后，很多地方农民形成卖血养家糊口的习惯，出现一个个卖血村。卖血时，那些青壮劳力消削面庞与无神的眼光，使人不忍直面。在一个血站，遇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显得旁若无事似的，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说父母就是这样把他们养大的。



四川省江津县。在1959年后，很多农民形成卖血养家糊口的习惯，出现一个个卖血村。在重庆一个血站，遇上一群买血的江津人。

山东省高唐县王庄。“五风”席卷全国后，造成了多少人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庄都在饥荒中消失了。有的村庄，只剩下断墙残壁和从生的杂草，就像沙漠中的高昌古城，使人觉得有人烟只是非常遥远的过去。高唐王庄村北的这户王姓人家，把六间房子都拆了，再拆，便什么也没有了。这门楼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几代了，不能再拆了。一狠心，闯关东去了。1978年前，中国农民逃荒的每年达数千万人。秋收以后或春天播种后，逃荒的高潮一次次兴起，成千上万的人拖儿带女，逃离家乡。有的流落到东北与西北的荒凉地带开荒与打工。有的则沿着津浦、京广、陇海等铁路线流入大城市，沿街流浪，挨门乞讨。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是鲁西北农民的三条出路。鲁西南济宁有趟列车，由济宁直达黑龙江的三棵树。房子木头早被人拆走，唯有门楼没有倒，这座纪念碑式的建筑，是被“借地度荒”挽救下来的。它就像圆明园遗址一样，记录着沧桑变化，诉说着造孽者的罪恶。我向县委翟瑞华书记建议，一定不要拆掉这个门楼，留着它作为批判极左思想横行的教材。



山东省高唐县王庄。“五风”席卷全国后，只剩下断墙残壁，就像沙漠中的高昌古城。这户王姓人家，把六间房子都拆了。这门楼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几代了，不能再拆了。一狠心，闯关东去了。

山东省茌平县城关公社的年集，我看到一个服饰高度统一的场面，清一色的农民，男人们几乎是统一穿着黄色的军服，带着黄色的军帽，四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有少数戴着“雷锋帽”的，也有头上扎着白毛巾的，那是标准的老农。大多数青年人都戴着黄帽子，就像新兵似的。这种服饰的高度一致性，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领导人穿着黄色的军装，连县委书记也喜欢穿着黄色的大衣上主席台，因为县委书记兼着县武装部第一政委。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这种高度统一的服饰仍在流行着。

.....



山东省茌平县城关公社年集的农民，人们身着黄军服、军帽。服饰的高度一致性，是那个年代的特征。

当我整理这些照片时，心中一直难以平静。虽然这多是以后遇到的人和事，更多的是对那场浩劫的追述，然而这些也告诉我们，当时的历史是怎样的。恐怕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记录，每一个六十岁以上的农民都能够讲述一大堆类似的事。那是以多少人的生命为代价留下的悲惨历史！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从中汲取多少教训？

第二节 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上)

黄、淮、海平原是黄河、淮河与海河冲积平原，北至燕山，南抵长江，西牵太行、伏牛山，东达大海，这是一片坦坦荡荡的大平原。晋、冀、鲁、豫、苏、皖六省近二亿人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气候温和，有着良好的发展农业的条件，是我国最大的粮食、棉花与油料生产基地。

但是，由于河流为患，特别是黄河肆虐，灾害频繁。近千年间，黄河多次泛滥，北夺海河，南夺淮河，留下大片黄泛区，历史上屡发生饥荒，是中国流民最多的地域。其中凤阳、阜南、兰考、东明、高唐、大名等县，都是有名的灾区。人民政权成立后，党和国家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治黄。但除了少数社队外，这一广大地区贫困落后面貌并未彻底改变，加以政策、工作上的失误，不少地方种地不养地，越种越薄，沙化碱化，加上人口大量增加，打的粮食比过去还少，农民不得不靠国家的供应、贷款、救济过日子。这是我国有名的“花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

一、兰考火车站外出逃荒的灾民

陇海线北、津浦线西的菏泽地区处在这片大平原中间地区。导致唐王朝复灭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便是在这里起兵诏告天下的，宋江等梁山起义将领108人就有40多名出自菏泽。这在历史上一直是贫穷的地方，也是后来大包干发展最早最快的地方之一。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是一个有见解的干部，他为很多学者、记者提供了所需的事实与观点。他在1978年曾向我介绍菏泽的困难情况：从1955年到1977年，购销相抵，净吃国家供应粮达25.638亿斤。同一期间，花国家救济款20636万元，国家无偿投资1.17亿元，免征农业税9688万元，发放农贷7.12亿万元，积欠1.3亿元。搞了20年的集体化，给国家背上沉重包袱，而农民的生活更苦。1977年全地区社员从集体分配的口粮平均每人只有301斤，集体分配总值人均只有34元，无现金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占70%！这一年这里农村统销粮1.43亿斤。广大农民辛劳终年不得温饱。

从菏泽北上到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河北的衡水、沧州，南下到安徽的宿县、阜阳、六安、滁县，江苏的徐州、淮阴、盐城，东去到山东的济宁、临沂、泰安、江苏的连云港，西行到河南的开封、驻马店、周口，情况与菏泽差不多。

1973年7、8月间，黄河泛滥，河南兰考、山东东明一带河水上涨，淹没河滩，也冲决一些河堤，黄河河南岸很多社队沦为一片泽国。济南军区舟桥团奔赴灾区抗洪，我取道徐州往兰考、东明采访。沿着津浦线、陇海线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埋伏在铁道线两边，遇到货车停下，便蝗虫一般涌上去，爬上车皮，把头埋下，随火车出外逃荒。

到了兰考是深夜二点，火车站上灾民把车站内外盖满了，使人没法挪步。有几个干部拿着喇叭大声劝着群众回家生产，在讲着道理，可是群众没有听的。这使人想起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焦书记夜访火车站的场景，已经过去七八年了，怎么比那时更贫穷，农民处境更为凄惨？在兰考、东明一带黄河大堤上，灾民排成队等着领救济粮，人们多光着上身，裸露着瘦骨嶙峋的身体。十二、三岁的男孩都光着屁股，有的六七岁的女孩也是这样。躺在一个芦苇棚里，我看到两个女孩见人来了，躲到芦席里，仅露着头。一个老汉竟是光着身子，用一片麻袋用绳子围着下身。场景凄惨，这给我留下难忘印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国农村更被推到极其困难的境地。中国农业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农民走到困苦不堪的境地。

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1978年，每一个农民，一年中可以得到约105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一天中可以吃到六两粮食和一把麸糠。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加上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六分钱。（引自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103页）

每天一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油料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在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一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都是门前屋后的树也入了公，农民没有其它

任何收入，只那一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夜不闭户无可偷

一个春节，已经当上新华社记者的我从阴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三在沂蒙山区一个村庄住了整整十天。亲眼看到农民是怎样过春节的，生活是怎样的艰苦。在这十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历史。

大年三十，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一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屋角支着一张锅，四壁空空，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一张木床，一家三口人挤在这张床上。床对面拴着两只山羊。因为实在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可以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感到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家里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因为实在太穷，这户姓鲍的人家只能与羊挤在一间屋里，烟熏得屋子黑得发亮。可以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正月初一上午十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锹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硬梆梆的，油光发亮。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命硬，今年九十岁，就是不肯走。”

就在87岁的王大爷扶老伴起床时，我随手拍下这张照片。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

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就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老人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光着身子。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老人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替我掸，可又不敢，把抬起的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老人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为上面作掩饰。

老人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班长。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照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老人的诉说，刹那间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我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共产党打下江山后，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下山的路边，是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长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长病倒了，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了下去，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三点才做饭。老妇救会长不到六十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光摇头。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三个碗，妇救会长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还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二十一年干部了。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村处在山半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100斤，人均口粮78斤，老百姓靠借帐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家产在30元以下的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三十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最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的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订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有贼，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

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出了他家，乡里干部在路上向我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倌，刚拜堂才3个月。他也当了二十多年干部，可他也当了二十多年的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乡干部还介绍，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这女人也有点意思。后来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了。没想到三十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也有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着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这女人，日子过得还是蛮和顺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又折回身子，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好走”。

一个当了二十多年干部的人到五十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多少年，这个村子就不会自生自灭了么。

路边上，这是一个老光棍汉，看着我进村又出村。干部说，他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抄着手站在石墙前张望，等待政府救济粮食的到来。蹲着墙根，操着手，这是山里人的习惯动作。而穿着黄色的军大衣，头上的旧军帽，是上级发下来的救济物品。在沂蒙山区，无数次看到这样的镜头：空着黄色军大衣的光棍汉，在冬日懒洋洋的阳光下操着手，在石墙前张望着，像是等着谁。其实他谁也不等，就是在晒太阳。到了春节了，便是说等救济粮。地瓜干子倒是能填饱，就是没有白面，包不了水饺，过不去年了。



路边上，一个老光棍汉抄着手站在石墙前张望，等待政府救济粮食的到来。穿着黄色的军大衣，头上的旧军帽，是上级发下来的救济品。

其实，不单是光棍汉。在1978年，所有农户生活都很困难。这一年全国受灾，在农村，这样的老光棍汉已经无法找到媳妇了，连自己也养不活，谁跟他呀。不过，像这样操着手晒太阳的懒汉，银行是不会贷款给他的。在1978年，每一个农民，一年中可以得到约105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一天中可以吃到六两粮食和一把麸糠。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加上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

朝前说几年，整个70年代的年终分配，真是可怜得很啊。秋季口粮，主要是地瓜。大豆基本上都被生产队留做饲料，给牛吃。花生也没有多少，不够零打牙的。剩下的就是鲜

地瓜，地瓜是社员惟一可以分到的基本口粮。当时农民都愿意多种地瓜，其中很大一条原因是，政府在计算口粮时，鲜地瓜是按五斤折一斤粮食，实际上，五斤鲜地瓜可以晒一斤半地瓜干，等于赚了半斤的便宜。在整个70年代里，农民人人都生活在食物短缺的阴影里，大约三分之二的家庭要忍受饥饿。所以那时面黄肌瘦的人很多，营养不良而生病的人很多，出去逃荒要饭的人很多。

为什么那么多人外出讨饭？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家乡的土地养不活他们。很多社队农民年均口粮不到200斤，不出来乞讨只有饿死。而这个老光棍汉已经50多岁了，他说就怕得病，一病了就完了，只能等死。

这是我在沂蒙山区一个普通村庄的春节见闻。在近代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沂蒙山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它是革命的代词。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徐向前、罗荣桓带领119师过津浦线，被敌人追得无处立脚，最后是沂蒙山区接纳了他们。因为这里穷，八路军是为穷人打江山的，沂蒙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与支持自己的军队，沂蒙山养育了八路军，也养育了中国革命事业。解放战争年代，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被蒋介石部队从苏北追逼到沂蒙山区，也是这里的大山与人民掩护了子弟兵。红嫂用乳汁救伤病员的故事便是一例。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是在沂蒙山区揭开大反攻序幕的，从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开始，以至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沂蒙山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上战场。仅在淮海战役中，山东省就出动数百万人的支前队伍，出动小车100万辆，运送粮食，其中60%来自沂蒙山区，沂蒙山区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战士4万多人，民工数万人。沂蒙山区人民在最困难的时期，勒紧裤带，自己吃糠咽菜，把粮食送上前线，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的牺牲。陈毅元帅建国后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一次次告诫进城的干部与军队“不忘人民养育恩”。

可是，共产党打下江山已经几十年了，沂蒙山区农民群众的日子还过得这么困难。沂水沂源一带的群众对我说过，现在的日子不如陈老总在这里的时候，制订政策的领导们多是在铁路线上跑，在官员们安排的现场参观，很少到过这些最为贫穷的地方看过，丢弃了他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背离了帮助他们成功的农民群众。

第三节 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下)

民以食为天。接着灾荒与饥饿的是死亡的威胁。“穷是吵，饿是斗”，矛盾由此而生。农民在精神上也屡受打击而至失望与麻木，社会丑恶现象也接连出现，使得农村处在动荡不安与败落的状态。从1971年到1978年，我们一边报道农村“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一边目睹农村的贫穷与愚昧，心灵在截然对立的两种现实的巨大冲突中常常难以自安。

一、被遗弃的108个男人

我到过鲁西北41个县中的39个，几乎在每个县都遇到讨饭的。特别是在津浦线上的县城火车站附近，常常是讨饭的人聚集的地方。有次在禹城车站旁的饭店，仅仅20分钟就有13个人进来要饭。往往是服务员刚刚端饭上来，要饭的人便蜂拥而上，一起把手伸到你面前，那脏黑的手，使人恶心，有的背部裂开口子，血都渗出来。一个来自刘长子村的两姐妹，大的11岁，小的仅5岁，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其中大的女孩一下子跪在地上，说母亲病了，弟弟饿，悲哀的眼神使人可怜，我只好把新端上的水饺全部留给她。

为什么那么多人外出讨饭？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家乡的土地养不活他们。很多社队农民年均口粮不到200斤，不出来乞讨只有饿死。

在临清县康庄公社医院，我遇上医院抢救一位喝药水自尽的教师。当时，因为缺口粮，农村出现很多怪现象。胆大的有的砍公家树卖，有的到水利工地偷木材钢材卖，也有的到棉花收购站偷棉花。老实一点的就外出打零工，不要面子的便劝老婆孩子出去讨饭。这个教师本来是代课的，因为学生大多退学了，便在家中务劳。可他又是爱面子的人，不让妻儿出去要饭，眼看着家中口粮没了，到亲戚家借粮时又被羞辱一顿。一气之下，他喝了农药。亏得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被救醒后，他还口口声声说“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个没本事，不该养这么多孩子”，使听的人要掉泪。

因为贫穷，很多地方出现妇女成批外嫁的现象，使光棍汉迅速增多。在平县王老公社民政干部统计人口时，发现在大王楼大队23岁至60岁的单身男人有108人，也就是说这个大队有108个光棍汉。历史上天灾战乱往往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那些漂泊在外，或死在他乡的多是男人，留下一群孤儿寡妇；而贫困造成的离散却是男人被遗弃的景象！

“108个光棍汉，这个村庄有多大？”当我听到在平人介绍大王楼村有108条光棍汉时，极感诧异。

“这个村有200多户，600多人。”县委宣传部张宝海肯定地回答。

“是因为水质不好，残废人多，还是其它原因？”“水质也好，就是因为穷，逃荒到东北去的多。从1966年到1979年，只有闺女出门，极少有新媳妇进村的。”

我们知道，历代政权统治者总是想办法把农民稳定在自己的家园，以“安”字为要。安居乐业是政府、也是农民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意图之一便是依靠户籍制度把亿万农民固定在特定地盘上。然而，当物质财富到了极大贫乏以至生存无法维持的地步，户籍制度并不能阻碍农民外出的步伐。农民要么是揭竿而起，要么是逃荒要饭，舍此，别无它路。

在沂源县东里公社唐山山腰，我见到一个完全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家庭，他们一家有五条光棍。老汉鲍延吉72岁，四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当我第一天来到他家时，老汉坐在门口，一个医生到他门上要债。三个月前老伴病死了，欠下210元药费和30元的棺材钱，四个儿子拿不出钱，债主就逼老汉。老汉也怪犟的，说“你跟他们要，娘死了，归儿子出钱”，儿子们说“老的还在，钱由他出”，弄得医生急得直嚷“不像个人家”。我进老汉家一看，屋里的床是土块堆起来的，靠门口有一缸咸菜。他一边喝着自已熬的地瓜干酒，一边用舌头舔着大块咸盐，喝一口酒，舔一次盐。医生生气地说“你不还钱还喝酒”？老汉说“不喝酒，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第二天又路过他们家时已是中午十一点。没有一个下地干活的，都在老汉门前下棋。这个光棍堂很有意思，清一色的黑棉袄黑棉裤，没有一个穿罩衣裳的。老汉摆擂台，儿子们都赢不过他。问他们为什么不下地干活，老大说“没啥干的。干也是白干，没有水浇地，全靠老天。修了十多年水库，都是替外村干的”。老汉补充说：“也不让开山砍树，不让养鸡，口粮买不回，只有国家救济，饿不死，就行。”



春节中午11点。在沂源县东里公社唐山山腰，我见到一个完全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家庭，他们一家有五条光棍。

在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能吃上饭，还有一件是能娶上媳妇。很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最焦心的便是这两件事。为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我到陵县一个学大寨先进单位北小高大队书记家住下。他家也很穷，炕上只有席子，没有垫的，只有一床被子。他从一家刚结婚的人家借来一床新被，让我盖着。我们在炕上啦了半夜，他尽介绍怎样用转亲的方法为光棍汉找媳妇的事。

到了深夜一点，听到敲门声，进来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直磕头。原来她儿媳喝药水还没死，请大队派拖拉机送到公社去抢救；她女儿要朝回跑，被邻村的婆家绑起来了，也请老支书找公社干部说话。老支书连忙起来忙活，等到他回来时天已亮了。原来是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快四十岁上还没说上对象，有个小妹妹才十六岁。正好邻村也有一户这样的人家，老支书出面介绍，让这个村的16岁女孩退了中学，嫁给那户人家，把那户人家的女儿换过来与她哥哥成亲。硬扭的瓜不甜，这两家常闹别扭。老支书一夜未睡便是处理这件事的。

第二天，老支书还领着我到小学校去看，介绍哪家有女孩，他哥哥将来就能换回一个

媳妇。正因为老支书有这个本事，在村里威信很高，上级也对他满意得很。我问她，这样不符合婚姻法。老支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二十年农村被折腾坏了，路歪了，只能用歪法子治，农村才能太平。

沂源县三岔乡有一户人家，哥哥残废在家，妹妹为了服伺哥哥，总不肯出嫁。想为哥哥换个对象，哪怕是聋子瞎子，她也情愿跟人家走。可是没有姑娘肯嫁给她哥哥，一拖再拖，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村里是把她作为优秀女青年推荐给我拍照片的，说全村人都夸奖她是好闺女。了解清楚情况后，我哭笑不得，这怎么能报道呢？但是，为了给村干部面子，我还是把闪光灯亮了一次，为兄妹俩留下了照片。



远处走来一位抱着两只鸡的老大娘，后面跟着她约有五十岁的光棍儿子。老太太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走近了，我才听到老太太说的是“养儿不如养鸡”。

在一次山区采访中，正是老百姓忙年的时候。见到远处走来一个抱着两只鸡的老大

娘，后面跟着他的约有五十岁的光棍汉儿子。老太太也不与儿子搭话，只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走近了，才听老太太说的是“养儿不如养鸡”，反反复复就是这么一句话。虽然儿子每年也干活，可从来没从队里拿过一分钱回来，穷得媳妇也娶不上。过年了，连拜祖宗烧的纸也买不回来。老太太养着两只鸡，山上有狼和狐狸，鸡活不了；把鸡放在山脚下的闺女家，平时，打油买盐都靠卖鸡蛋换。过年了，老大娘把两只鸡接回来，一起过年。

二、祖宗啊，保佑儿孙吃饱饭！

在农村越是贫困的地方，精神也越是贫乏，农村生活无着，只有乞灵于虚幻的祖宗魂灵与神仙，以祈盼来世转胎，脱离贫穷的苦海。很多地方农民情愿忍饥挨饿，哪怕把上级发的扶贫款花掉，把口粮卖掉也要把神仙敬起来。

在沂蒙山，我目睹一个村祭祖的热闹场面。也是一个春节的上午，在荒凉的山腰聚集着全村祭祖的人。当太阳有一竿子高的时候，近百号男人来到祖辈坟前。先是在各家近支先人墓前烧纸，在坟前摆着菜、肉与豆腐，插上香。然后在最老的祖宗墓前进行祭拜，由辈分高的村会计走上前去，默默地跪在地上，有人喊：“祖宗，给您拜年了！保佑儿孙吃饱饭，说上媳妇。”接着是磕头，再磕头，三磕头。几个男孩目睹祖辈的架式，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头碰地，似乎觉得很好玩，怎么也不肯起来，直到父兄把他们从地上拉了起来。

磕完头便放鞭炮。硝烟弥漫在整个山腰，很有城里开业的景象，鞭炮炸碎的纸屑铺满一地。在鞭炮炸响的时候，女人一哄而上，等到他们到祖宗坟前，鞭炮也点燃完了。大家散乱地站在石坎前，由会计宣读着这次祭祖的开支，共计275元。群众们听着，神情漠然，没有议论的，这也许是农村中唯一的一次没有争吵的摊派。读完后，人们便散了。这便是山村过节唯一的精神文化生活。

支撑农民人生的精神支柱，通常就是这样被一些有形的仪式巩固和强化着。当然，古老的迷信活动也是通过这些方式继承着。在最为贫穷的地方，也是迷信活动最为兴盛的地方。正是从这里使人看到，农民不仅面临物质上饥饿，精神也已陷入饥荒。面临的是双重贫困。

我讲这么多见闻，展示了这么多让人心碎的场景，并不是想暴露什么内幕，揭露黑暗，而是想说中国农村再这样下去是不行了，中国农民已走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了。经过二十多年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贫困与饥饿直接威胁农民的生存，农民精神上也已走到绝望的边缘，农村再也不能瞎折腾了，最好的办法是让农民休养生息。

对于1979年的农村形势应当怎么看？也许有人会提出，你是不是把农村说得有些过于困难了，是不是有个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里，让我们看一看邓小平是怎样论述的。邓小平在1982年对金日成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指出，要迅速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元月我去《人民日报》社送稿，发现编辑季音手中有一张表。全国60个年人均分配在50元以下的县，山东省26个，其中有19个集中在鲁西北平原上。因此在中国变化最大的是这一区域。在这期间，我每年都出发300天，先后去过鲁西北的800多个村庄，常骑自行车走村串户，报道的多是乡吞兕的事，拍摄的大批照片便可能成为这次大转折的原始记录，了解的情况也多成为第一手材料。以致后来领导这场大转折的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认为我是“有发言权”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赶往黄河岸边一个工地采访，遇到上河工的队伍。农民们打着红旗，推着独轮车，队伍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突然前面传来吵闹声，队伍停下不走了。工地总指挥向县革委会主任报告说“有抗拒出工的，三个人”，主任不容置疑地说“先抓起来，押走”。一会儿，公安局的警车鸣鸣地开过来，人绑走了，队伍

又前进了。他对同车的我解释说，对农民只有这个办法，逮起来再放。现在胆大的多了，不然就压不住台。

看到这种情况，我为矛盾激化而担忧。猛然想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发生在农民施工队伍中，心底不由得打个寒颤。

为什么农民情绪这样激烈，敢于抗上？这位县革委会主任介绍，从刮“五风”后，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少了。特别是1970年的北方农村工作会议以后，每年都要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国家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最后是公社的。上面的工程还拨些款，到下面就纯是义务工。干一个冬天也没有报酬，虽然队里记工分，但没有现金分配，群众怨言日见增多。这两三年，农民生活更加困难，有些胆大的敢冒头反抗了。县里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先压下去再说。

在农村改革兴起时，我经常思考：在战争年代，亿万农民在极为贫困的条件下，能够跟随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闹革命，为解放全中国，有数千万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却越来越不听话了，出现与政权消极对立的情绪。最后，他们敢于违背政府规定而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以至势不可挡。到底应当怎样认识农村改革发生的深层原因呢？

贫穷与饥饿对中国农村改革作了最广泛的动员。

第二章 行者：在希望的田野上千里走单骑(1978—1985)



1979年9月30日下午，我正在章丘县绣惠公社路边饭店吃饭，有一个从平陵城公社来的司机说，今年黄桑院大队植棉的13个姑娘每个人分到70多元钱。

——几番波折后，这13个“包产到户”的姑娘当场领到现金，多的80多元，最少的也有67元。李山珍高兴得傻了似的跑到台上，问书记“这钱真是给俺的吧”。她活了15年，第一次手里拿到这么多钞票，竟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三中全会前后，我在农村整整跑了10年，常睡在农家土炕上。

第一节 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一、不能刊登的真实画面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6年是一个十分微妙而又关键的年代。

从1976年1月到1976年9月的短短9个月内，中国有三位高层领导人相继离开了人世。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月去世，然后是朱德委员长7月去世，到9月，毛主席也撒手人寰。随着这些领导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文革后期，毛主席亲自圈阅了一份报告，同意新招收一批新华社记者。已经数年没有吸纳新人的新华社从各省、各军区优秀通讯员中层层推荐选拔，我名列其中。这一批相继被招收的还有刘云山、徐光春、田聪明、蔡名照等人。

也是在这一年，我开始了自己新华社记者的职业生涯，落脚点是这场农村变革的核心地带。这一年我刚好24岁。

1976年10月3日，我从济南军区转业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分社位于济南市中区大观园南边，只有两幢楼，地方很旧很挤，我住在洗照片的暗室外间，在烤片机旁放一张床，满屋的潮气与烤照片的糊味。虽然条件很差，但能在城里有个安身之所，还有了城市户口，我已很知足。

一到新华社，我便立即投入到农业学大寨的报道中。当时，大寨是被树为全国农业集体化样板的村子，投入大量人力兴建了大型引水渠等农业工程项目。华国锋提出要在4年内大干快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历史证明这显然是一种乐观主义。

在新华社山东分社，我担任专门跑农村的摄影记者。可能是因为当过兵的原因吧，我这人行事风风火火，待人也比较谦和热诚，农民们都叫我为“小李记者”。几年间，一边报道农村“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一边目睹农村的贫穷与愚昧，巨大的冲突让我常常难以自安。

一个春节，我在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子住了整整十天。十天里，亲眼目睹了一个个凄惨的场面。尽管报纸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拍下了那些令人心酸的画面。

1978年，中国历史不可思议地拐了一个大弯。

从农村到城市，一场名为“改革开放”的变革浪潮崛地而起，如河出伏流般跌宕起伏、声势浩然，浓缩了天下的雄壮与奇谲，形成20世纪人类发展史的奇丽篇章。

追溯这场农村改革的起源，还要从中原腹地一个偏僻小乡村的寒冷冬夜说起。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18位面带饥色、衣衫陈旧的农民，冒着巨大风险，在一张土地承包契约书上按下手印，打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历史的巨变往往出乎意料地肇始于这样一些偶然的小事件。当18位穷则思变的农民私结盟誓时，他们自然不会意识到，自己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抗争，却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

幕。然而，这又是生活的必然，是几十年农村畸形发展到达极点的现实必然。当求生的闸门以秘不外宣的方式悄然打开时，一条条弱小却生机盎然的细流慢慢地渗入土地，肆意蔓延，集涓成流，最终轰然成势，浩荡前行，以毁灭一切又重建一切的巨大力量，冲破旧秩序的堤岸，涤荡出新的天地。

我搞新闻调研几十年，觉得天生的悟性与后天的勤奋都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在这种机遇到来时，你想躲也躲不了。在1978年后发生在黄淮海平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地带。我此时分工搞农村报道，当时也没成家，整年在这一带跑，就像掉在新闻窝里。当时一批新华社记者因为接地气，了解下情，在这种机遇到来时，搞出不少成名之作。

二、马坊：更早的“小岗村”

在1978年，鲁西北平原的茌平县马坊村，有一群村民以与小岗村近乎同样悲壮的方式举起了“包产到户”的大旗。然而与后来载诸史册、殆为定论的小岗村相比，他们却早已被湮没在历史中。

1978年腊月，我无意间发现了山东茌平县马坊村“包产到户”的事情。

春节前，我在茌平县一个集市上采访，无意中听到两位老人在悄声议论“包产到户”的事情。我租来一辆自行车，一路尾随着老人来到了马坊村，发现了这里的惊人秘密。

鲁西平原上的茌平县，是黄河以北的一个贫困县，沙碱地多，以盛产圆铃大枣出名。马坊村便坐落在这片灾荒与饥馑频出的贫瘠土地上。1958年以来，这个只有15户人家、110亩地的村子已经连续21年靠国家统销粮生活。1978年，生产队棉花亩产只有7两，粮食亩产71斤。从60年代初开始，村里先后饿死过11个人，土地无人种，生活没着落，只能逃荒要饭。“马坊马坊，十年九荒；腰里没钱，屋里少粮；女的外嫁，男的逃荒”是马坊村村民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同小岗村一样，马坊村的转折也发生在一个寒夜。那年秋播拖了一个多月，迟迟没有落实，队里尚有不到二十斤种子，却没有人带领大家播种。全村中年人都轮流当过队长了，谁也不愿再为这出力不讨好的职位出头。管区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坐镇，催促马坊村选出队长来，可直至深夜，仍毫无进展。

几乎绝望之时，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从人群中摸到台前，扑通一声跪在了工作组长面前：“分开过吧，过不好，俺要饭也不登你干部的门。”组长训斥：“你把公社的脸往哪撂？”老太太说：“俺饿死也不说是马坊的人。”组长气得脸扭到一边，可倔强的老太太就是跪着不起来。正是这沉重的一跪，让整个会场骚动起来。在场的管区书记闷声抽烟，不敢发火，然后猛地站起来，推门而出。有人喊道“怎么办”？工作组长无计可施，甩下一句“看着办”，跟着管区书记出了门。

就在当夜，马坊村15户人家自动分成了6个组，各管各家，队里不再统一分配。仅用三天，麦子便全部种下地。

从茌平回到济南后，我很多天都沉浸在发现马坊农民新创造的喜悦中，见到熟人便滔滔不绝地讲述起马坊村老太太的悲壮之举。当时安徽提出“省委六条”时，全国的政策仍然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万里于1978年初在安徽允许各地继续缩小生产单位的规模。不久后，在四川，赵紫阳也提出了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分散承包的“十二条”。但无论安徽还是四川，都只是将劳动单位缩至生产小组。我对马坊村的报道虽然写的也是生产小组，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

没有料到的是，3月16日，茌平县委报道组长张宝海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说是在平县委副书记管春梅派他来的，一进屋，他便关起门来紧张兮兮地说：“不好了，中央批‘包产到户’了，管书记说马坊的稿子不能发，是掉脑袋的事情。”

原来《人民日报》3月15日发表了一封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来信”。这封信明确反对包产到组，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则明确表态：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张浩来

信”如一盆凉水，浇在了刚刚燃起的“包产到户”星火上。我到新华社后所写的第一篇文字报道便这样无疾而终。如果当时稿件顺利刊发，或许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起源地的便是马坊村了吧？

如果回到大转折时期的历史景深中加以测量，这一篇被毙掉的稿件，则是整个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矛盾斗争激烈、莫衷一是的缩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有些干部已经主张进一步缩小劳动单位的规模，但高层的气氛仍然是坚决支持继续实行集体农业，当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话题仍然属于大忌。一些党的领导人甚至担心，如果允许土地私有，贫苦农民最终会沦为佃户，剥削佃户的地主会重新出现，1949年以前的农村问题会卷土重来。直到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支持万里倡导的“包产到户”，整个形势才逐渐明朗。

1979年秋，形势发生转机。这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公布实行。有两处修改特别引人注目：一处是重申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原则；另一处是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两个不许”变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对“包产到户”口气有所缓和，而且允许某些例外。

十一届四中全会一闭幕，我就来到了章丘县农村。新闻界传达的声音也在农村弥漫。在此前的半年内，“张浩来信”确如一盆凉水泼在刚刚点燃的“联产承包”的星火上，很多作业组都作鸟兽散。一开始，章丘县已经分开的数百个作业组又全部合并到了队里。可以说，从“张浩来信”到十一届四中全会这段时间正是农民最难受的时期，也是农村改革的低潮期。

马坊村农民的自发改革湮没无闻，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棉花姑娘的喜悦

十一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使得按劳分配的思潮得到抬头，为农村干部壮了胆，基层开始出现干部鼓励农民联产承包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三中全会后第一个秋收时节刚出现，就被我碰上了。按照行内人说，我是抓到一条鲜活的“大鱼”。

1979年9月30日下午，我正在章丘县绣惠公社路边饭店吃饭，有一个从平陵城公社来的司机说，今年黄桑院大队植棉的13个姑娘每个人分到70多元钱。我大为吃惊，要知道，从人民公社成立后，大队社员几乎都没有从队里得到过一分钱现金，一年竟然能分到70多元钱，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很难得到的新闻。

平陵城公社距离绣惠公社只有30里路。我与县委报道员陈玉先搭乘一辆过路运粮的拖拉机赶往平陵城。到时太阳已下山。我又从公社找了辆自行车，赶往姑娘们干活的地里采访。那是一块棉花长势旺盛的田野，人在里面看不到，大队长师振奎一声喊：都出来吧，天黑了，收工了。只见一群姑娘嘻嘻哈哈地从棉地里钻出来，扛着棉花包顺着狭窄的小道往回走，我倒退着走，抓拍了五六张照片。

路上，有个姑娘讲：“说不定还有场生死搏斗呢。”我听到后意识到后面还有料，就将众人聚集到队长家谈话，一探究竟。

原来黄桑院大队的13个姑娘与大队签订合同，承包70亩棉花，联产到组。一开始她们干劲十足，春天“五定一奖”作业组解散后，公社又恢复大寨评工记分法，这些姑娘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按过去计工方法，妇女劳力再强，一天也只能记8.5分。这时队长只好发话，说兑现的话还算数，姑娘们又生龙活虎起来。坐桃时棉铃虫猖獗，打药要天不亮带着露水下地。一个名叫李山珍的姑娘顶着繁星下地，天亮时已打了3遍药。喝过一碗稀饭又接着打，中午也不休息，最后累晕在地里。眼看棉花要摘花了，寻思着姑娘们要拿钱，村里人眼红，开始出现反对意见，说13个姑娘能分百十块钱，岂不是造反！反对最激烈的是两种人：村里壮劳力与干部家属。干部家属平时不下地，还记着9分。大队会计说每个人扯件的确良小褂哄哄她们就中了，分钱的事儿哪能当真。姑娘们哭开了，可没有人理睬。

赶巧，公社分管棉花生产的书记正为明年种植万亩棉花任务落实不下去而着急，一听说黄桑院大队棉花种得好，像遇到救兵似的，马上跑到队里看，要求大队算出账来，第二天要把全公社的生产队长召集起来开现场会。在干部家属们撑腰下，大队会计顶着不办。公社书记急了，深夜11点赶到队里，逼着会计算，会计磨磨蹭蹭，副队长、保管员也尽打岔，说不能这样算，不能那样算。书记看出他们是串起伙来成心糊弄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拍桌子，说，你们糊弄老百姓，还想糊弄我。今天算不出，天亮就撤你们的职。不换思想就换人，能当干部的不只你们几个。队长出来打圆场，说你们不要“弯弯绕”了，直算了吧。不到一泡烟的功夫，数字就出来了，每人奖励现金140元，为减小阻力，先发73元，余下的到秋后决分时再补。

第二天上午，全公社的生产队长聚到了一起，村里的老百姓也扶老携幼地来看分钱。书记的大嗓门响开了：“不是我抬举这十来个妮子，是国家需要棉花。都干活不下力气，磨洋工不出产量，城里人吃啥穿啥，你们靠什么养活家小？经过了春，经过夏，大家看清了吧，还是靠责任制，要包干到劳，联产计酬，没有这法不中。”书记句句话讲得掷地有声，听得整个会场一片肃静。

这13个姑娘当场领到现金，多的80多元，最少的也有67元。李山珍高兴得傻了似的跑到台上，问书记“这钱真是给俺的吧”。她活了15年，第一次手里拿到这么多钞票，竟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探明究竟，我立马赶回到分社汇报了此事，采编主任孙修纯认为这是带方向性的大问题，立即签发照片。1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并列头条位置刊登了题为《棉花姑娘的喜悦》的照片，用了醒目的标题与全部文字说明。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落实分配政策的照片，引起社会各界的议论。章丘县委书记举着这张报纸在全县大会上说，《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支持我们了，我们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今后没有实现联产到劳的一律照这样办，解散的要一律恢复起来。



1980年秋，鲁西北地区41个县1300多万亩棉花获得大丰收，遍地是银山棉海。这是在平县博平公社的棉田。

后来我听说，这13个棉花姑娘一直把报纸藏在家中，一个叫李淑荣的姑娘还把报纸放在口袋里好几年。遇到有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她就把报纸拿出来示威。20年后，我重访时见她们仍然保留着这份报纸，说关键时候能镇邪，乡里人不敢找她们事。

《棉花姑娘的喜悦》是中国农村分配政策兑现最早的图片报道，后又为《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及其他国内27家大报采用，被评为1979年新华社获奖新闻作品。这则图片报道所揭示的黄桑村的一幕，是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基层斗争的生动写照，从中可以看到早期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

这个报道在我个人新闻生涯中，可以说是一次突破，多年以后回望，我都把这个报道

视为自己新闻生涯的转折点。从部队到新华社工作，我还保留着紧跟政策、按图索骥的采访习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新《六十条》（《人民公社管理条例》），是整个中国农村工作的纲领，也是新闻界宣传农村工作的纲领。我把《六十条》单行本带在采访包里，随时翻看，一条一条对照着搞报道。乍暖还寒的中国现实，虽然混乱依然，但是新的变革已经显现。我所写的“大寨县”报道稿却被成批退回，退稿单上的一行字十分显眼：“政策不是图解，而是实际生活反映。”《棉花姑娘的喜悦》终于让我意识到，最富有生命力的新闻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来自文件精神或者是衙门的介绍。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蜕变，由眼睛朝上转为眼睛朝下，坚定地走上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道路。

第二节 蹲在鲁西北平原

一、第二次翻身 第二次解放

我投入到农村改革采访要感谢一个人，此人便是后来成为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我刚到山东分社时，南振中也是跑农村的记者，年长我10岁。1977年到1981年的5年间，我们两人常一起下乡调研。南振中爱读书，采访作风深入而细腻，每一篇稿件都写得一丝不苟，特别是以小见大的表现方法，令其文章颇具说服力。他常常得到穆青的表扬，新华社也常抽调他到总社开农村报道座谈会。因此他对中央许多新精神知道得快，对上层关于农村改革的动向了解得早。每次从北京回来，南振中常把记录本拿给我看，传达的基本上多是胡耀邦、穆青与杜润生这三个人的讲话。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引导了我调研的方向。我下的农村多，看的现场多，便经常把从农村带回来的故事讲给南振中听，与南振中一起分析。我们这种交流是“上得天光，下接地气”，搞起报道来，心里特别有底，几乎是“百发百中”。

1980年的秋收时节，是检验“包产到户”责任制实际效果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农村形势。

这一年10月17日，我取道德州来到夏津。出德州不远，便见到公路两边棉花竞相开放。到了夏津汽车站门口，映入眼帘的是望不到边的卖棉车，车挤着车，人挨着人。我抱着相机包从人群中朝前挪，常常要从棉花车上爬过去，粘得满身都是雪白的棉花。从汽车站到县委仅仅三里路，爬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上午，为了拍摄棉花丰收场面，我爬到收棉站30多米高的水塔顶上。棉叶枯黄，落了，留在杆上的都是雪白的棉花。展目四望，眼前简直是雪铺的大平原，土地被棉花盖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到黄土。横贯东西的马路和伸向南北的六条大路，都被卖棉的车队排满，像六条银色的河流汇向县城。眼下的银山都是几天内拔地而起的，去年40天才收购50万斤，而前一天在一天之内竟达到70万斤。远处农民拉着地板车，用竹竿撑起一块白布，让风推着棉花车，像一只只小船在棉海里缓缓行驶。蓝天之下，尽是银白，场面极为壮观。



“没见过”、“没有过”、“没想到”，人们以这些话对形势进行描述。一年之间，荒地变棉海，农民多年愁容变笑脸。

我望着这秋收图激动不已，忽然听见下面有喊声。我低头一看，是个戴白毛巾的老汉：“你多照几张，告诉党中央，俺农民翻身啦！”我招招手，表示听见了，内心也为农民这兴奋的情绪和飞扬的神采而高兴。

下了塔，一下被群众团团围住。有人问：“你是中央派来看俺大丰收的吧？你告诉党中央，俺日子好过了，不吃救济粮了，不给政府添麻烦了。”有个40岁左右的妇女手里拿着刚卖棉得的1419元钱的收据直擦眼泪。她指着身上缝有十几处补丁的衣服说：“这还是俺结婚时做的，二十多年没做新衣裳了。结婚时是一间房子，现在还是。打入社起，哪见过队里分过一个钱呢。俺没能耐，使孩子们受罪了，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说着抬起缀满补丁的衣袖擦着泪，竟像孩子似的抽泣着。在场的群众很久没有说话。过了许久，一位老大爷才擦擦眼眶说：“政策早来两年就好了。”

当时，在鲁西北棉区到处传播着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没见过”、“没有过”、“没想到”，干部也以这些话对形势进行描述。一年之间，荒地变棉海，农民多年愁容变笑颜，是什么力量带来这人间奇迹？入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干脆起身，在夏津县招待所铺着青砖的院子里，来回踱步，想着白天的所见所闻，心想应该把乡下的情况如何向编辑部汇报，让编辑与他一起分享这欢乐。于是，我深夜在灯下给编辑部写了封长信：“不管城里人怎么说这件事，乡下人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推行农业责任制已经为农村带来巨大的变化，这是一场激变。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不能不为农村的情况而兴奋。任何一个人，如果到农民中来走一走，看一看，一定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子是走对了。农村大有希望，中国的发展前途也大有希望。”

后来，编辑部把我的信读了，还讨论过。我知道了，心里很高兴。编辑掌握着我们稿件的“生杀大权”，他们思想通了，我们在前方打仗的记者就更有勇气了，就更加有劲头了。

二、媒体突破坚冰

那时候，在鲁西北农村调查，每天都有一些新东西在撞击着自己胸膛，而这些东西总是以生动的故事进入自己视线的。在平县杜郎口公社李寨村的一个小插曲让我心情久难平静。

当时丰收后的李寨村村民聚在一起舞龙灯，场面很热闹。新闻科张宝海、杜长之带着我到李寨村时，群众们已在场上舞开了，我拍了几张照片后便爬到房顶上，想拍张大场面。拍了几张，舞龙人步伐越来越慢，后来干脆坐在了地上。我站在屋顶上，风朝我这边来，凉得直打哆嗦。这时张宝海跑过来说，这帮人都是老头，村里30年没舞龙灯了，还是土改那年舞过，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舞，这些老人就是土改那年舞龙灯的一帮人。土改时舞一次，“包产到户”又舞一次，整整30年，是个好素材，一下子唤起了我的兴奋点。我马上下了房顶，与瘫坐在队场上休息的老人们聊起天来。

一个叫李庆华的老汉讲起土改时那一次舞龙灯的情景。当时每家都分到十几亩到四十亩地不等，工作队把土地证发给他们，这12个贫苦农民都掉了泪。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的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大伙都想乐一乐，于是舞起了龙灯。自从互助组后，硬要大伙牵牛入社，日子一年过得不如一年，想乐也乐不起来。后来“包产到户”，23年没有分过一分钱的李寨人从队里人均分到现金120元。粮也有了，钱也有了，老百姓又过上解放初的好日子。李庆华激动地说，这是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啊！

“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我与张宝海相视一笑，都体味到这句话的含义。张宝海说“又翻身了，还不舞欢些”？老人们一个个爬起来也不掸衣裳，说声“加把劲，把三十年的力气都使上”！举彩球的李庆华引龙头，忽儿贴地而行，忽儿俯首直扑，忽而陡昂头，引得围观的群众眼珠不停转动。陡然间，李庆华高喊“翻身了，解放了”！其他老汉也一齐跟着喊“翻身了，解放了”！这是1949年冬天他们齐声呐喊出来的。30年后，他们再次喊了出来。

李寨村的农民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看成是“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是他们对自己生活质朴的感受，也是理性的归纳，更是整个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实况的写照。李寨农民的“第二次翻身”，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证实了农民的预感，并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肯定，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新华社编辑胡颖是专门搞理论的，他写出文章对《十二老汉舞龙灯》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鲁西北摄影报道的“点睛之笔”：

“画面上龙身虚了，有人看了感到遗憾。但这正体现出记者大胆创新的意图，他抓住真情实景的霎那间，大胆构思，敏捷决断，让游动的龙肚处于画面中心，晃动的老人撑于底下，龙身优美的曲线穿过大半个画面后，弯颈又昂起的龙首，穿过龙体，与右侧的火球相照应，这在耍龙灯的照片中可算是别具匠心之作。游动起来的虚影与龙身的曲线使画面生气动人，而舞龙灯的又恰恰是平均年龄63岁的12个老人，欢情快意跃于画面，30年不舞的龙灯又舞起来了，这正是农民第二次翻身喜悦心情的显露，虽不见人面，却也能看到农民内心的兴奋。这幅照片自然、生动的美是对常见的四平八稳构图完整的图片是一个突破，可见李锦创新的愿望与尝试。”

我回到济南与南振中会合后，二人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到菏泽、德州、惠民等地采访，面更宽一点，以掌握足够的发言权。元旦前，两人一起赶赴北京，到新华社六号楼住

下后便直奔《人民日报》农村部送稿。当时新华社分社与《人民日报》记者站是一家，分社记者同时也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稿。我们把农村情况向“李老太”汇报。“李老太”叫李克林，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对农村改革情况很关心，也很支持。我把《十二老汉舞龙灯》等故事一个个讲出来，讲得生动感人，最后南振中再加以归纳。李老太当即决定采用我的一组题为《党的政策好，农村喜洋洋》的四张照片。没想到第二天，照片被撤了下来。我问为什么，对方称“领导不同意”。我急了，问为什么不同意。对方摇了摇头，南振中也立刻中止了我的质问。

后来南振中了解到，原因在于一位副总编说了句“不能给白如冰涂脂抹粉”。白如冰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对农村改革持观望态度，属于思想不够解放的领导。“文革”结束后没有被换掉的省委书记只有他与河北的刘子厚。我一时性子上来，就与李老太说，农村改革是老百姓干出来的，同白如冰没有多大关系呀。李老太笑着说，我与你看法一样呀，小李。当时南振中的心情更沉重，他写的长篇通讯《多年愁容换笑颜》还没有出手，也被压了下来。

到了1月8日，山东分社社长宫敬之传来消息，称中央领导人在进京路上到了山东菏泽，肯定了一年大翻身的变化，对“包产到户”表了态。南振中与我拿着电话记录又跑到了《人民日报》。李老太看后心里有了数，与总编辑沟通一下，当即让南振中代《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振奋人心的消息》。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了南振中的通讯与我拍的照片。自这组报道起，坚冰打破，《人民日报》开始大规模公开报道家庭联产承包了。

三、那个时代的亲民

1981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在冀鲁豫平原农村出现，这就是“鲁棉一号”的出现引发农民学习科学技术热潮的兴起。这是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爆发后，在生产领域的大进军，也是生产关系调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成功杰作。



散发科技传单的荏平县副县长丁诺，被急需科技传单的众多棉农团团围住。可见农村干群关系的新变化以及农业发展的新动向。

一天，我随有“棉花县长”之称的荏平县副县长丁诺，到集市上为群众讲授棉花种植知识。讲完课后，有一个熟悉丁诺的农民说，“你讲的俺听不全，也不会记，小孩他娘也想听你的课，没空子来。你把明白纸给俺带回一张吧。”丁诺从准备发给社员的科技传单中抽出一份递给这位社员。没想到这张传单还没有接过来，半途便被人伸手截走了。丁诺又拿出一张，准备递过去。顿时，几十双手都伸向丁诺，群众喊着“给俺一张”、“丁财神，给俺一张”、“棉花县长，我要一张”，场面极为热烈。我想拍张照片却被要传单的人流挤到一边，正在着急无法拍照时，一个小伙子架着自行车来抢传单，我拉着他的车把说，你别动，一会儿我替你要一张。我迅速爬上自行车后架，连续按下三次快门，接着就被人潮撞了下来。

我采访那么长时间，第一次遇到这么生动的画面。在推敲这幅图片说明时，围绕“棉花县长散传单”这七个字琢磨了很久。

正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劳动中，以“科技传单”为象征的科学技术成为农民最为向往、最为渴求的东西。

农民要传单表达农民正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实质内容，可以感受新的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众星捧月式会聚式的构图，可见农民“抢”的心情与渴求的欲望。反过来进行思考，我们便可以进入另一重境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重要内容便是决定全党工作重点从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转到生产建设中来。

这幅照片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后来还被评为1981年中国好新闻评比获奖作品与首届中国新闻摄影展览获奖作品，入选中国五十年瞬间精华优秀照片。

在全国农业生产体制的大规模变动中，鲁西北地区在1981年仍然一马当先，势如破竹，特别引人注目。这一地区是当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离首都北京最近、最大的一片地区，加上这一年天帮忙，太阳尽照着，没有阴雨天。秋季棉花丰收时间集中，气势大，此时如果加以宣传报道，可能就会形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宣传效果的最佳时节。我决定到自己的采访基地在平县进行报道。

“哎哟，那个棉花啊，像海一样！”多次接待我采访的博平公社秘书杨朝国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了博平棉花收购站的情况。这天上午来到在平县，下午便有13个人到招待所找我，多是报道中接触过的熟人。我提出要拍一张棉花丰收大场面的照片，反映和留下中国80年代初推行“包产到户”的盛况，请朋友们分头替我看现场。最后选定了博平公社收棉站。博平是鲁西一个大集镇，这里收棉站有400多辆交棉的车子，远处还有3华里长的交棉队伍。如此浩浩荡荡的场面不但我从未见过的，也是报纸上未曾出现过的。

1981年11月9日早上，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介绍了这条新闻。同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鲁西北地区棉花大丰收每天收购二十万担》的消息，编辑直接把图片说明改成简短的消息，照片放在头版头条上，加上《棉花县长散传单》一幅，占据了整个版面的四分之一。这天我正在新华社送稿，在院子里见到胡颖，他说蒋老给他打电话了，说这是新闻摄影界的大事，过去都是毛主席会见外宾才上这个位置，现在基层老百姓的新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本身便是新闻。胡颖口中所说的“蒋老”便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他是延安时期新华社的编委，资历很老，水平很高。在我心目中，他就是老舍、闻一多那样的教授，后来他写过多篇文章向报界介绍我的事，是我在新闻摄影界的老师。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评论“赞图片头条新闻”，这件事在新闻界一时成为人人关注的谈资。《人民日报》的这种破格处理，不仅使这一组图片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进入高潮时期的宣传标志而为人们所牢记，而且被视为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标志，在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个版面后来被评为1981年全国好新闻优秀版面奖，这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进行这一奖项的评选。山东省委书记李振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参加50周年座谈会时，盛赞了这幅照片，以此为例说明新华社对山东农村改革宣传的贡献，并向新华社表达致谢之意。

当时任新华社记者的徐光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记者敏锐地抓住了落后的鲁西北地区棉花大丰收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进行报道，用生动的事实来证明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威力。这些照片新闻性之强，说服力之大，不能不令人佩服记者的新闻敏感。”

四、比中央文件早一步

1980年10月，我遇到了一件十分苦恼的事，所有的稿件被编辑部压住不发，长达一个多月。

那时，中央发布了75号文件，文件发布当天，编辑便收到了我的《周村爱国大队社员承包养鹅》的报道。编辑开始很高兴，中央文件一发表，我们的记者便紧跟上了。但转念一想，这个记者也太神了吧，他的文章怎么能比中央文件还快？从济南寄到北京的邮件要在路上走两天，怎么可能与中央文件同一天出现呢？不可能的。于是编辑部议论纷纷，开始对我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有人提议，对这个年轻人的稿子先压一压，等他到北京来谈一谈。这一压，便压了十多篇稿件。

血气方刚的我听到老记者岳国芳带回来的消息，既愤怒又伤心，不禁脱口而出：“我为什么不可以比中央文件早哩，中央文件精神也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呀。”岳国芳连声劝：“小李，你沉住气，编辑是听中央的，这是习惯，你的认识比中央文件早，这个话不能说，是犯忌讳的。他们不了解你研究这么深，也很少有记者研究这么深的，编辑对你爱护的，以后要多沟通。”老岳是解放初的老大学生，学识深，对我一直很爱护。听了他的劝告，我赶赴北京汇报了在基层调研的情况，编辑部由此对我了解更深了，关键时候我听老同志的劝，真管用。

这时候，新华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孙振常夸奖我的报道有深度，找我谈话，让我写文章，他提出标题是“到深水里抓活鱼”。接着，又写了关于深入调研的几篇文章。其实，我之所以能比其他记者抢先一步，甚至比中央精神抢先一步，要得益于我常年在农民中跑，形成独特的新闻调研方法论。早期农村改革报道中，我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新闻报道，开始以更宏观与广阔的眼光看待这场变革，探索改革发生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寻找改革进程中所体现出的种种矛盾。在这场新闻报道中，我总结出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新闻方法论，如“第一个浪头新闻论”、“新闻信息网论”等都开始逐渐酝酿成型，写出理论文章，并逐渐引起新闻界的广泛注意。

在“第一个浪头新闻论”的指引下，我经常能抢占先机，迅速地发现新闻事件。像“第一个兑现承包政策的作业组”、“万元户”、“农民联户买拖拉机”、“科技传单”、“农民购销公司”、“专业村”、“电话村”等信息迅速涌到编辑部，成为新华社摄影报道的“第一个”。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新闻，事情小，切口也小，但反映的主题重要，内容新鲜，常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

第三节 第一个报道万元户

一、算账算出来的“万元户”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第一次发出“万元户”的传真照片。自此，“万元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

中央新闻单位专门核实并拍摄这张照片的就是我。但作出这个报道，并非偶然，是我从大局出发调查出来的。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比它早六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将目光聚焦到按劳分配问题。多数人对后者所知甚少。其实，二者都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理论准备，前者偏重思想理论，后者侧重经济理论。当然，后者的争论规模没有第一个那么大，而且比较顺利地取得了成功。当时一位中央副主席对《红旗》杂志两位交接班的负责人说：“论按劳分配和真理标准这两篇文章，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这句话印证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专门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他认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提法，事先确实存在着一个争论过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把这段话与邓小平重视按劳分配理论争论联系起来，便可以较好地把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理论。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的思想，是对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的一种发挥，是合乎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

身在农村基层的我，与其说是敏锐地捕捉到政治发展趋势，不如说是直接感受到群众的真实需要，过去的种种组织上限制并没有给我报道的充分的自由。从实践上看，农民不敢富，也富不起来。

当时报道什么样的富裕户，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有些经商或搞农副产品加工的人致富较快，在当时还不能予以报道，这些人属于过去的“投机倒把”之列，一时难以为人们的思想接受。如果围绕农业生产找出一个辛勤劳动而富起来的典型来报道，既符合国人当时的心理，也易为读者接受。人们从中甚至可以接受一个真理，这就是邓小平所指引的道路，是让中国人富裕起来的真理。

就在这时，一家种棉户进入了我的视野。

1980年秋，在鲁西北平原，农民交棉逐渐进入高潮，不断传出收入上千元的喜讯。棉花价格上涨到每斤2元7角钱，且种植鲁棉一号良种，产量显著提高。尤其是高唐、夏津、临清三县，为当时山东种植量最大的县份。

临清全县植棉34万亩，单产超过100斤，国家订购任务15万担，这时已交34万担，形势一片大好。县供销社刘主任告诉我，说他听过有一家收入达到8千元的；我说想找找有没有超过1万元的。晚饭后，我到收购站找临时工们聊天。这些临时工都是从各个村子抽调上来的，对村里情况比较熟悉。我不问收入多的人家，只问谁家人口多、劳力多，谁家承包的土地多。交谈中，有个从赵塔头村来的男孩说他们村赵汝兰家有4个儿子、2个姑娘，全家总共10个劳力，包地20多亩，交棉不少。

第二天一早，我便与公社财粮助理员骑车直奔赵塔头村。赵汝兰家住在村子外围，外面种了一片小树林，拴着五六只羊。走进家门一看，满院子的棉花，在阳光照射下，耀得人眼发花。赵汝兰见有客来，迎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上级，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

当我问起收入来，赵汝兰就显得有点吞吞吐吐的，连声说没收几个钱。县委熊宝有干事向他解释：“人家上级不是工商税务来收钱的，是了解政策好不好的，如果好，向中央汇报，明年还使这个政策，如果不对老百姓思想，就换个法子。”一听这话，赵汝兰这才消除了顾虑，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家里的收入情况。

我们算账是从他家承包的土地算起的。赵汝兰家按人口承包了21亩地，自己又开荒9亩，30亩都种了棉花。山东省棉花研究所就设在临清县，他们家用的都是研究所的“鲁棉一号”良种，棉花长得旺，质量也好，衣分高，每亩收获220斤，共收6600斤，多数是超售的，价格每斤卖2.6元，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非常可观。“过万了！”当场激起大家一阵惊喜。“万元户啊！”我脱口而出。我们连算了三遍，第一遍是公社财粮助理用算盘打出来的，纯收入应是13200元；第二遍是我用钢笔在纸上算的，是11239元；第三遍是我们同时算的，又扣去剩下5亩未收而价格可能降为二级的，纯收入为10239元，我们便用了这个数。我的意思是留有余地，只要过万就行。他家通过套种、间种和补种等种了许多花生、芝麻、绿豆、地瓜，随收随吃，我们都未计在收入内。

赵汝兰一家边卖棉花边忙着置办家具，为小儿子结婚买了缝纫机、自行车，还为未过门的儿媳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家里有5辆自行车，3架缝纫机，2块手表，2台收音机。新盖了6间房子，计划再盖9间。赵汝兰说：“过去愁的是人口多，吃不饱，眼下愁的是劳力少。土地归公时，俺说了不算，什么都是队长发话，队长也听上头的。分配一拉平，工分多了也白搭，不值钱。现在终于是熬出头了，怎么种地，是自己的事，分配多少，也是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有权利了。”赵汝兰的话语朴实无华，我却从中体会到更深层次的内容。

赵汝兰的话说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没有经营权与分配权，特别是不能实行按劳分配，只能长期捆在一起受穷。一旦实行三权统一，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富裕便很快成为现实。

回到济南我要求发传真照片，领导很快就同意了。当时，新华社不能发传真，在济南只有电报局能发，发一张24元，相当于半个月工资。我是自己骑自行车送过去，在千佛山医院东边，很远的。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以图片形式报道了我的这次采访，这组照片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转载采用。自1980年秋后，“万元户”新闻在神州大地广为传播。随着秋收后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到1981年1月以后，各家报纸纷纷登出自己的记者宣传万元户的报道。从此，“万元户”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之初的特定象征被载入史册。“万元户”的叫法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万元户的报道，源于对邓小平“让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论断的深入解读，我认为“摄影记者是用照片做时代编年史的，没有什么比纪录时代重大变化而更令人振奋的了”。从一个家庭的变化，折射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这是万元户新闻的价值所在，亦是深入群众抓“活鱼”的价值所在。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对老百姓有用，也是能留在历史上的，心中是有种自豪感的，觉得多搞这样的东西，记者才能当出“味道”来。

二、农民朋友“王三万”

1980年之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效益，同时也为推动党员干部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各级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向保守思想的最后堡垒发起进攻。

正当全国农村改革迅猛发展，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之时，国家农业领导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依旧对“包产到户”持质疑与抵制态度。万里副总理当时就质问农业部的领导：“你到底要做人民的敌人，还是人民的朋友？”我接触到的基层干部，县一级的领导坚决反对者是少数，但在大队与生产队两级中持消极态度的人并不少。我深为这种情况忧虑，脑子里自然就想对这方面有所报道。王本跃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王本跃，人称“王三万”，是高唐县梁村公社王庄大队的一名农民，也是农村承包责任制中先富起来的代表之一。农业学大寨时，王本跃每年出河工总是冲在最前面，是干部们青睐有加的一员虎将。1979年初推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时，他却与全队唱起了反调，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他要求成立集体组与联产到劳的小组对阵，看看到底是集体强，还是个人强。

王本跃组织了6户社员成立起一个集体组，自己担任组长，组员都是叔伯兄弟。刚开始，大伙心还比较齐，后来组员们下地干活开始变得懒散起来。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好亲自押阵带着劳力干活。年底一结算，联产到劳的小组，一个劳力分了好几百元，最多的分了2400元。王本跃的集体组一个劳力全年才分到15元，王本跃夫妻俩苦干一年，只分得30多元。

脾气倔强的王本跃不肯服输，决心在联产到劳上再比一比。1979年拔完棉花柴，他便和妻子一起下了地，借来两辆牛车，干了一个冬春，动了500多方土，硬是把12亩高低不平的碱洼地，整成平坦的丰产田。早春二月，天上还飘着小雪，夫妻俩便把裤脚一挽，开始选墒造地。这年秋天，他承包的23亩棉花，收了8700多斤籽棉。分配加超产奖，共得8100元，一跃成了王庄的“冒尖户”。1981年秋，王本跃交籽棉1万斤，收粮1万斤，收入超万元，人送外号“王三万”。

我第一次采访时，拍了“王三万”耕地的照片，发表后却反响寥寥。

1981年9月5日，我又来到高唐县王庄，这次恰好遇到县委书记翟瑞华带领大队书记们来开现场会。王庄是县委书记翟瑞华的据点，他通过“户学王本跃，队学小王庄”活动，来推动全县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工作。

现场会上，当王本跃说起县委、公社与大队干部对自己的帮助时，讲到动情处，这个1米86的汉子竟伸手擦起了眼泪，说：“党从来没有与农民心贴得这么紧过，干部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翟书记一年就到俺家二十次，帮俺出主意，想办法，从播种到秋收，掰着指头帮俺安排，留多少钱过日子，投多少发展生产，哪像个县太爷样，像个朋友，亲哥哥也不过有这么好哩。”听到王本跃的话，我心头为之一振。

“朋友”，多么真切地道出农民对干部的看法。从县太爷到朋友，党的形象变了。短短两年间，农民从一个真心帮他们落实责任制、脱贫致富的干部身上，重新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重新回到人民心中的党。这是我们做多少工作也得不到的收益。过去我们让农民说党好，农民不说，现在没有叫他们说，农民自己说出来了。联想到几年前一次巧遇挖河队

伍时见到农民反抗的情景，那时到处像铺满干柴，一点就着。仅仅过去几年时间，党群关系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是亲眼看到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心中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散会后，王本跃把翟书记拉到一边说，今年棉花多了，要排队几个小时才收，老百姓有意见。翟瑞华答应马上到棉花收购站解决卖棉难问题。此时王本跃的妻子正好装满一车棉花，随翟书记一起去棉花收购站。翟书记、王本跃二人与我都是老熟人了，收棉站也不远，他们就一路走，一路谈。路很窄，两人并排走也很拥挤。当时翟瑞华书记要王本跃放心，保证棉花能卖出去。看到他们两人表情特别亲切自然，我转身退到棉花地里抓拍了这张照片。

1981年10月9日，这幅照片由徐佑珠、王呈选编发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冒尖户王本跃和他的书记朋友》为题刊发了这条图片新闻。新闻刊出后引起广泛瞩目。穆青当天就提出表扬，新华社也发出通报表扬。短短一个月里，就有50多批人到高唐来参观学习。



图为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冒尖户”王本跃和他的书记朋友。

后来村里有人和王本跃开玩笑，说：“你的照片上了报，当心成为王庄的姜冒富(电影《月亮湾的笑声》中的一个农民形象)，说不定李锦也像那个城里来的记者，到时整你。”王本跃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不会的，老李是个老实人，翟书记是俺的书记朋友，老李是俺的记者朋友，咋会整我喃，俺信得过他。”

从1979年冬天我第一次到王本跃家，到1983年春节，五年间我去高唐王庄13次。每次都到王本跃家去，去时从济南带着点心给王本跃的老母亲，像走亲戚似的，晚上就住在王本跃家。坐在炕上与老大娘从老母鸡到小外孙拉起，一拉半个小时不动身，从老人絮絮叨叨的诉说里，了解农民喜欢什么，反对什么，盼望什么。经过我的多次宣传，王三万成了北京报纸上的名人。当时，“万元户”好像是我的专利，到北京后，老编辑们与我见面拉呱，总是问“万元户”有什么变化。《人民日报》夜班编辑保育钧在正月初一值夜班时，问起王三万家有什么新鲜事，我当场便说出十几件新事。保育钧说：“你写出来吧，写十件新事。”当时刚开始十大新闻，也算赶个时髦，我趴在保育钧的办公桌上当即写出《王三万家的经济与政治》，当即上版，第二天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中心位置。

第四节 市场经济在基层萌芽

一、千里单骑入农家

1981年11月24日，正值寒冷的冬季，我开始了历时一年之久、骑自行车纵贯鲁西北的采访。我在这种下决心深入基层的调研中，发现了市场经济现象在农村的出现。

这次采访源自安徽分社尤淇、徐光春、王礼赋的启发。夏收时节，安徽分社社长尤淇带着记者骑自行车到凤阳县一路采访，此事得到了穆青的表扬。当时重视调查研究的穆青在新华社威信极高，他像一面大旗，指向哪里，新闻队伍便冲向哪里。我当时还不到30岁，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觉得自己比他们年轻，也决意骑车下乡采访，想法得到已经是分社副社长的南振中的支持，他嘱咐我一定要发挥现场调查的优势，多发镜头式的现场新闻。

车骑到高唐，县委书记翟瑞华桌上放着一张《人民日报》，刊登着时任新华社内蒙分社农村记者刘云山写的一篇《夜宿车马店》的文章。翟书记说你们新华社记者真了不得，内蒙记者住在车马店，山东记者骑自行车下乡，新华社这种调研作风，真了不得。

我拿起县委书记桌上的报纸一看，这篇文章不长，却极为生动：

记者在暮色苍茫中来到车马店的时候，老远就听到里面传出庄户人爽朗的笑声和牲口的叫唤声。进店一看，宽敞的院子被进城来卖粮卖油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店堂里灯火通明，满屋子的人拉呱得挺热火。

车马店的老炊事员周二旦一边飞动着菜刀，一边乐呵呵地说：“俺在店里干了十多年，天天跟庄户人打交道。过去庄户人眉头上挽着疙瘩，如今，个个膘得脸上放光。那些年住店的，多数人拿的是红(高粱)黄(玉米)面窝头，舀两碗开水就着吃；现在可不一般了，拿着白面馒头还嫌不顺口，还要到街上买块豆腐割斤肉，打二两白干，人家就图那个美气哩！”

……

这时，来自黄河边上十六股村的青年后生高兴宽接上话茬：“过去队里年年不分红。有次俺爹进城，说要领俺去开开眼。到了街里，一不敢进商店，二不敢进饭馆，兜里空空，怕看了眼馋。这回俺进城，一次就卖了3000多斤油料。”说到这里，高兴宽拍拍自己鼓囊囊的上衣口袋。

看完这篇署着“新华社呼和浩特1981年11月30日电”的报道，一股愧疚涌上来。人家是文字记者，写的多有现场感。自己成天在现场跑，却写得干瘪瘪的。我这个人有个脾气，总是自责，觉得自己该努力的都没有把劲使出来，或者没有使好，心里就难受，为什么人家能做得比我好呢？总是这么要求自己。刘云山做好了，我得跟他学。

1982年1月23日，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陵县。严冬傍晚，天冷得让人说话发颤，进门一烤火，手指钻心地疼。县委招待所的人都回家了，我是第一次到陵县来，办公室的人把我直接带到县委书记高传杰家。县委办公室主任莫振奎从家里端来一大碗面条，上面打了两个荷包蛋。我说吃饭的事不着急，先替我推荐个好的大队党支部，我要看看生产责任制后集体作用是怎么发挥的。莫振奎脱口便说“张西楼”。我又提出，我要住到老百姓家里，看

他怎么过年的。莫振奎听说要住老百姓家，惊讶地说，老百姓家条件差，晚上回县委值班室住吧。我忙说，我们内蒙记者还住在车马店哩，离老百姓越近，越能写出好文章。

这一年1月1日，党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宣告了“双包到户”责任制的合法性，高奏凯歌的同时，文件还不无担忧地指出：“最近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入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在总结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切实解决好。”看到一号文件后，我意识到，党在向我们部署新任务了，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会成为新的经济体制难以顺利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如果这个中间层次立不起来，就不容易形成完整的新体制。我得想办法用事实来破解这个难题。

问题该如何解决？张西楼的见闻恰好提供了这方面的思路。张西楼大队是德州地区脱贫致富的先进单位。这个村与我一路上看到的多数村庄有明显区别，大队部比较气派，村中街道很宽，规划得很好。大队有蔬菜队、食品厂、养牛场与机耕队等，集体实力比较雄厚。陪同的新闻干事杨光来介绍，这个村的特点是“统”得比较好，队里机耕、浇水等实现了五统一。大队书记张万泽不仅有管理水平，也有主张。别人“顶牛”时他不顶，组织好社员承包土地；别人“放羊”他不放，把集体经济抓得紧，公共财产一分钱也不让分。

除夕夜，我在张西楼看到一个极为生动的场面。当地老百姓习惯在晚上烧起几堆大火，燃放鞭炮，驱旧迎新。7点天黑后，5堆篝火便在村中5个路口燃起来，全村500多口人都出来了。爆竹声从全村每个角落响起，几十枚彩炮在空中开花，地上一片红光。一个老汉把4个鞭炮整齐地摆在地上，硬拉几个青年人来点。他们推辞说：“大爷，你高兴就多点几个吧。”老汉急，朝他们说：“给钱给肉，你们都不收，点几个鞭炮也不肯，我没法子报答党员啊！”这几个社员只好与老汉一起点，只见4股青烟冒处，4个“穿天龙”带着呼啸声冲天而起，老汉哈哈地笑得特别开心。

大队书记张万泽告诉我，村里连续三年丰收，全村130户买了很多鞭炮，图个高兴，图个步步高。这个老汉叫张书云，是个68岁的孤寡老人，去年得了场大病，老人急得要掉泪。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长几次请医生上门给老人看病，还安排几个党员帮老人的承包地治虫、锄草。由于大队实现了“五统一”，浇水、配药和换良种，都是大队负责，群众操心少。到年底这位老汉收入2300斤粮食，480块钱，老人一次买了6块钱鞭炮，他说这辈子还没有这么痛快过呢。

在张万泽家，几个饲养员被请来看电视。张万泽说这几个专业户一年下来也够辛苦了，让他们乐一乐。党支部几个人在饲养棚里开了一个小时会，商量春耕为全大队统一换种的事。

我把自己看到的这些场景，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通讯里。一天一夜的见闻，让我感觉这个大队党支部是坚强有力的，是能“统”得起来的。张万泽说，老农民，没有那么大能耐，一时还离不开集体，集体人多，大事好张罗，一家一户闯不过大浪头。他们对机械播种、牲畜饲养等用的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方式，大队重点抓这几个专业的承包，集体这一块便保住了。实行的是集体与家庭两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两相宜。

除夕夜，我一直到天亮也没睡着，和杨光来住在张万泽家，这些活的镜头一个接一个涌到笔下。当晚的电视里，胡耀邦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加强党风建设。农村党风建设不仅牵涉到基层组织坚强，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问题，还关系到统分结合中“统”的一块能否搞好

的问题，意义重大。我把在张西楼的见闻写了出来，一边思考，一边写，直到天亮。5点钟，让杨光来帮我再抄一遍，我便睡一会儿。仿照《夜宿车马店》标题，写了篇《夜宿农家听民声》。

张西楼的见闻也让我产生了深层次的思考。农村这么复杂的问题靠谁来解决，农民那么多困难，靠谁来帮助。改革成功了，最容易产生的是松懈。从深层次看，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能形成体制的，这只能是体制的基础或者说是一端，大队这一级非常重要，是一个中心枢纽，上面联系到社会与市场，三层要素都具备了，才是相对完整的体制，才可能取代人民公社的体制。这一点，以后多少年里，似乎一直未被人们认识。

当时，新华社每年评选一次社级好稿，这是新华社最高水平的象征。农村通讯特写很难入选，一年一篇而已。1981年社级好稿中的农村特写是刘云山的《夜宿车马店》，1982年社级好稿中的农村特写则是我的《新春佳节夸支部》。两篇稿件都是到最基层深入群众中采访出的新闻都是用讲故事，写镜头、说土话的方法，文风生动活泼，反映了群众的心声，以至于有人称之为“姐妹篇”。

新华社农村编辑马成广是有名的编辑，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写了一篇新闻业务文章，发表在刊物上，标题是《充满庄稼味的新闻》，他写道：

春节期间记者深入社员家里采访，写出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改善的新闻不算少，但是写得生动和深刻的并不多见，《新春佳节夸支部》是写得较好的。这篇通讯有三好：

真实地反映出农民心目中党的形象，这是第一好。记者紧紧围绕一个“夸”字，在张西楼大队采访了老饲养员、五保老人等，他们夸赞党支部，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这些人最能分辨生活的苦乐和人世的炎凉。因此通讯的说服力较强。

乡土气息出自天然，这是第二好。记者深入到炕头、槽头和街头，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心对心的采访，不但采访到农民的心声，而且采访到农民的情趣。所以，写出的稿子，自然天成，乡土味浓，没有雕刻的痕迹，使人读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篇幅短小，生动形象，通篇庄稼话，这是第三好。能让读者感到真正是农民在说话，而不是记者自己在代替农民说话。所以，使人更加感到亲切和真实。

这年年底，在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与刘云山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上相遇，刘云山当时作为内蒙的代表，我是作为中直的代表，都当选为团中央委员。我们在一起谈论的共同话题，是穆青社长，是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二、农民抢了政府的“饭碗”

从陵县至宁津，又到乐陵，我骑着自行车，晓行夜宿，走一村，停一村。当时想到河南、河北去，两省边界地带离中心城市远，政府管得松些，特别容易出新闻。可是新华社规定一省一个分社，不能种了人家的地。我在山东省的边境线上跑，有合适的内容便报道，没有就继续朝前走。

1982年11月20日，乐陵陪我的县委干事孙书臣回去了，我从乐陵县杨安公社骑车到商河县境内的赵奎元公社时，被公社派出所扣留了。那天天寒地冻，路上行人稀少，眼看天色渐黑，我见公社就在路边，想进去讨口水喝，如果有地方住，就明天再赶路。没想到，进去便被扣留了。

那时出行流传着“地委书记两头平(轿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北京吉普)、公社书记130(有驾驶室的运输车)、大队书记蹦蹦蹦(手扶拖拉机)”的说法。当时一个县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我下乡时总是租一辆自行车，一天七毛钱，一租便是十多天。我已经习惯了骑自行车采访的生活。尽管我申明自己是新华社记者，公社书记把我的记者证接过去看了又看，问怎么没有公章，我告诉他凹进去的钢印便是公章。公社书记说了声“没有见过”，便拿着记者证出了门。那天因为寒风刺骨，我用围巾裹着头，然而拉下来塞在怀里，一副农村人赶集的样子，任谁也不会相信我是新华社记者。

一会儿派出所所长来了，他盘问了一阵说，现在什么人都有，冒充公家收购羊肉的出来了，收购粮食的也出来了，胆大的，敢冒充记者了。看他了解不少“反面”的典型事例，正是了解新闻线索的极好机会。他不走，“陪”着我聊。他告诉我，张坊的白集人野得很，收羊收到内蒙古了，再跑就出国了，这不成土匪了，还要不要国家？这个村出了百十个万元户，都是赚的国家钱，这是造反呀，农村乱起来，没法管了。

当时一个县城只有两部长途电话，一部是县邮局，一部是县委办公室的。到了晚上八点，他们的电话接通了，县里苏广武主任讲新华社有个叫李锦的，到商河来过，还讲了我的容貌，戴眼镜的，是个蛮子。他们这才放我走，连个馒头也没给。一看，食堂里的门早关了，黑乎乎的，炊事员早回家了。

按说山东人待人是厚道的，尤其是给外乡人吃饭，总显得慷慨，甚至有点穷大方，看来，这个乡的干部真是把我当“坏人”了。我只好饿着肚子摸着黑赶路。天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公路很窄，路上有积肥堆也看不见，好几次骑上去，被甩了下来，眼镜也被摔掉了。当对面有汽车过来，车灯打得睁不开，车一过去，眼前黑咕隆咚，车把一摇晃，险些撞上车后尾。从中午离开到夜里十点，一点饭也没吃，又冷又饿，加上被派出所扣着，心里窝着一肚子火，但是派出所所长讲的“土匪窝”白集村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这里人跑到内蒙古收羊，要冒多大的风险，路上要闯多少红灯？

带着满腹的好奇心，我连夜赶到了白集村。一进村子，一股羊膻味便扑面而来。当时已是夜里十一点，还有咩咩的羊叫声。奔波一天的农民相互打着招呼，互报自己购羊的数量，声音很大，听得出其中洋溢的喜悦。

大队会计白云龙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他问我吃饭了吗？我没吭声。我如果说没吃，人家不怀疑你身份吗，再说大半夜的，还麻烦人家，忍忍吧。知道记者是从大地方来的，白云龙还算客气，他向我介绍了白集村搞起收购的来龙去脉。白集大队是个回民村，1900多人，却只有2400亩耕地，且有一半是盐碱地。在承包土地后，许多剩余劳力无处安

排。这个村家家户户会宰羊，公社书记张士清看到这种情况，便鼓励他们宰羊到集市上去卖。全村只养几百只羊，肉源很快便没有了。有的社员便到附近村子里买羊杀，宰一只羊，能赚两三元，赶一个集便能收入二十来块钱。于是全村很快发展到二百多户收购专业户。

羊收多了，卖肉便成了难题，一开始都是大队出面把肉交售给公社食品收购站。有一次大队会计白云龙到北镇收购站去送羊，碰到北京市食品公司的业务员，从他口中得知公社收的羊肉，要经过县和地区的食品公司，再成批往北京送。两次周转后，自己出手时还是0.65元一斤的羊肉，到北京就变成了1.2元。白云龙想，要是自己直接把肉送到北京，中间这两道关口卡去的钱，不都归自己了么？于是他们马上赶到北镇与那位业务员通融关系，直接挂钩，签订了一年供应100万斤羊肉的合同。

之后，为了适应长途运销需要，白集村分离出33名劳力，专门从事经销。3名大队干部负责总经销业务，包括与北京市食品公司签订合同，结算账目，为社员提供市场信息，派出收购组、交纳税款，并协助解决收购运销中碰到的问题。有一个干部在北京做常驻“大使”，负责办理交货在内的各项事宜。440人的收购队伍，有380人在当地串乡赶集，早出晚归。有30多人自愿结合成若干收购组到外县、外省回民集中聚居的地方设点收购，就地宰杀，直接运送北京。33人组成的运销组，则负责收购本村人交上的净肉，租国营公司的车辆运往北京，运销费用由他们自己承担。

为了解夜间收购实况，我住到了羊油收购站李凤英家，人家男人出去收羊了，就女人在家，我住着也不方便，就是白云龙陪着我过夜。李凤英家收购羊油直到深夜，三点半时熬羊油的声音与膻味不时传到屋内，我在土炕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于是推醒白云龙，在炕上聊起白集农民与商河县商业部门对阵、经历冲破——对阵——进攻过程的情况。

商业局的食品收购站与白集农民对阵时，把每斤羊肉收购价由0.65元提到0.70元的海报贴到白集村口，等于对白集人下了战书。白集人毫不含糊地迎战，跑到公社食品收购站的对面摆个收购点，白集人手拿着大喇叭喊“每斤七角五分”，比公家贵五分。食品站的人气恼了，架起喇叭，进行政治宣传，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支持国家计划收购，还说党的文件规定不让农民经商。同时公布了一条消息，公家每斤羊肉增到七角八分。

白集农民的手提喇叭也响了，“我们八角钱！”

商业局的大喇叭又炸开了，“报告社员一个好消息，公家收购每斤八角一！”仅仅加了一分，看来他们心疼了，加这一分，他们保险会亏本。

白集农民不买帐，在喇叭喊“八角三”！

那边，商业局收购站喊“八角四！”这边马上又迎战上去“八角五”！

收购站长气恼了：“太放肆了。”可是收购站的大喇叭不再响了，每斤上涨一分，全公社收购就要倒赔近万元。

白集人放开了鞭炮，年轻人高喊胜利了。

食品公司找到县长孙贞先告状，商业局长找到县委书记王晓华。这时公社书记张士清出来打抱不平了，也找到县委书记，为白集农民辩护说：“他们一不套购国家统购物资，二不高价牟取暴利，怎么能说投机倒把？”

一场对台戏将县长、书记都引到了白集。经过一番了解，他们认为白集农民的做法胆大了些，但好处不少，便决定让这场对台戏继续唱下去，谁能得到买卖双方拥护，谁就站住脚。

最后，县收购站的领导要求下面职工也像白集人一样，走村串户收购。在一个农民家，收购站的人巧遇白集收羊的姑娘，这位只有十六七岁的姑娘也没带磅秤，用手捏一下羊身子，又提了一下羊后腿，说“16块”。农民找来秤一称，是18斤9两，只差1两。收购站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回去向站长汇报，说公家的人腿没有白集人勤，嘴没有白集人巧，头脑没有白集人灵。气得站长火冒三丈，最后只好来个大撤退，只留下一个人，这个人后来也转行收鸡蛋去了。就这样，在与县收购站的对阵中，白集人大获全胜。

白云龙讲得绘声绘色，我也听得十分着迷。我问白云龙，白集人到内蒙收羊是不是真的。白云龙说，也到内蒙去过，但重点在河北沽源县，那里回民村在大山沟里，白集人大都是在国家购销没有下达计划的地方活动。他还介绍了在山东省临清县设点的事情。临清有不少回民，可是国家给那里下的收购计划很少，羊多了卖不出去，白集人也设了一个收购点，使那里养羊数量翻了一番。现在，白集人已在山东、山西、河北的10多个县30多个村子设立了收购点。

听完白云龙的讲述，食品公司收购站之所以败下阵来的原因也就豁然开朗了：这不能怪他们无能，也不是因为白集人“太狡猾”，而是因为计划经济造就的统购统销制度太“死”了，在这种体制下吃惯大锅饭的职工也不愿意再出那份力了。

流通领域的改革，关键在于竞争。长期以来，我们对市场竞争进行种种限制，流通越搞越死，使国营商业丧失了活力。包购包销，包得“死”；独家经营，“统得死”；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管得死”；环节过多，迂回曲折，“卡得死”；统一物价，“定得死”。这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东西年深日久，已经系统配套，使得国营商业部门形成官商作风，在与农民流通队伍竞争中，一触即败。

李凤英家的夜晚，宰羊的场面闹腾得让人睡不着。听完白云龙的叙述，趁着激情，我当即在炕桌上写出了初稿。在这篇名为《农民走进流通渠道大有可为——山东白集村农民经销羊肉的调查》的稿件中，我对白集村卖羊肉所形成的新的经济体制作了概述，并且总结了这种经营方式的优点：白集农民的做法，使渠道畅通，多方受益。从体制角度来讲，这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组织关系，每一户都是独立经营者，自负盈亏，同时又是合作经营者，相互帮助。显然，在白集农民的实践中，我意外地已经看到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萌芽。

三、胡耀邦认为问题值得思考

调查报告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刊登后，很快引起决策层的重视。12月24日，胡耀邦总书记在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启立同志看后，转万里、润生、刘毅同志。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中央办公厅把这个批示转告山东省委。山东省政府迅速以文件形式，将胡耀邦的批示精神与调查报告转发全省各县，要求各地学习白集农民经销羊肉的经验，引导农民搞好流通，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人民日报》对这个调查也极为重视。农村部编辑肖俊熙特地打电话来，要求我立即写一条消息。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1月20日的第二版头条，很醒目，仅标题便用了61个字，还加了编者按并配了图片。编者按指出：

白集大队一年向市场提供200万斤新鲜羊肉，说明农村有很大的经济活力，只要按照商品生产的规律办事，打开思路，疏通渠道，就可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白集羊肉入城进京，是一个很生动、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值得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导部门认真思考。

《人民日报》记者段存章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赞“庄稼搅买卖”》，在概括地介绍了白集农民的做法后，他写道：

白集大队这种既种田又经商的致富之路用一句老话来说叫“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这句话，当年的“大寨人”也曾经说过，后来被批掉了，现在，白集大队用生动事实证明“庄稼搅买卖”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富了自己，方便了卖羊人与买肉人，何乐而不为呢？不仅仅是白集大队，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大队现在也办起了醋坊、酒坊、酱坊，干起了“庄稼搅买卖”。

我当时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胡耀邦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能对一个大队的材料做出批示，可见农村流通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胡耀邦批给的是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及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他认为这个事例“极生动、极有说服力”，显然是对思想解放与保守教条之间的斗争感兴趣。胡耀邦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这句话十分值得琢磨。

我记得很清楚，分社的老采编主任陈雨明在帮助我编稿时，笑眯眯地说：“有意思，有意思。”当时稿子最后一部分有一个小标题“叫羊肉经销公司好，还是叫商业生产队好”，陈雨明与南振中商量，让小李再去商河县一趟，听听县委意见吧。我再到商河，县委书记王晓华说，把大队叫公司，符合事实，可是性质变了，全国都这么变，就不得了了，这是违背国家体制的呀，要犯大错误的。他说，不提不知道，一提吓一跳，可不能这么写。听了王书记的话，我觉得火候不到，还是暂且把体制变化留一笔。

白集农民集体贩卖羊肉串的做法，确实很有意思，他是集体贩卖，成立了公司，不是个体户或私营公司。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是农民从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伟大创举。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一次变革，那么，农民走进流通渠道不仅是对统购统销制度，也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造反”。白集农民的所作所为，堪称市场经济在基层农村的最早实践，比中央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整整早了10年，它预示着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改革大潮的即将到来。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节 邓小平说，你有发言权

一、庄户人家的好记者

1980年12月，在我采访的根据地茌平，突然传来“李记者犯错误了”的消息。

没过几天，县委新闻科长张宝海来到济南，说县委管春梅书记让来看看你，看身体还好吧。他以朋友的情分向我透露了情况，原来新华社编辑部收到一封加盖公章的调查信，要求县委对我拍摄的“杨成海包地得到奖金”的情况进行调查。县委很紧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上面政策变了，还是我这个人出问题了，只好派人到杨庄搞个调查，把情况如实反馈上去。张宝海说，县委不让说这个事，就是让我来看看你，送10斤乌枣给你尝尝。

为这事，我纳闷了一个多月。按当时的总形势分析，国务院新班子已经调整，万里分管农业，农村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只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是稿件自身问题，编辑总应该先和记者打个招呼，找记者核实一下。可是调查不通过分社组织，也向记者本人封锁消息，实在蹊跷。杨庄农民分配兑现，是县委管春梅书记告诉这个消息并且陪着我一起去的，分配兑现会等我来了才开始的。其中有个叫杨成海的社员在承包土地后得到奖金2206元，开会领奖的气氛比较好，我就发稿了，没想到后来惹出了麻烦。

直到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幅照片是秋收中发稿比较早的一张，图片说明中的一个“包”字，引起了不同意见。短短几天便收到13封读者来信。其中有8封是反对“包产到户”，包括向新华社与记者本人提出责问的；有5封表示赞同，包括3封来信询问杨成海包13亩3分5厘地的办法，以及承包合同的条款细节。

南京军区某部有一封来信，署了11个人的名字，用词严厉，认为报道“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道，牵涉到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记者说杨成海这个人近十年没有从队里分过现金，这是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夜退到解放前……这是有意否定社会主义。

来信特别提出对“包”字的愤慨。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已经是臭不可闻的道路，人民已经适应新社会，而记者提出“包产到户”，是存心把历史往后拉，是充当了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人民解放军绝不答应的。作为国家通讯社，是党的宣传工具，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党中央文件明明讲“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而新华社报道还是强调“包产到户”，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应该得到处理，对记者应该实施制裁。

新华社摄影部的有关编辑在收到来信后，没有正面答复，事实上也回答不了。只能用一个小短函把茌平县委对实际情况的调查附在后面，印了一、二十份，给写信的地方一一寄上。

因为此事，我受到调查与责问。这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我生活在基层，太了解实际情况了，坚信历史会沿着这个趋势走。当时最大的压力并不在社会，而在新闻宣传队伍内部。

当时新华社内部也有一股批判“包产到户”的潮流。南振中与我长年在农村跑，不常在家，分社开会一谈起农村形势，常常变成“包产到户”的“声讨会”。我与南振中像“地下

党”一样，只能私下交换意见。当时，我的稿件一度被限制编发，还成为分社唯一没有涨工资的记者。后来总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孙振听到调查的人介绍情况后生气了，说“第一个涨工资的就应该是李锦”。穆青还专门打电话给分社社长宫敬之，要他支持“包产到户”的调查，支持这样的记者。1981年10月，宫敬之进行了一次鲁西北之行，让南振中和我陪同去了鲁西北农村，去了高唐王三万家，回来后便大力表扬我们。我从乡下调研回来，宫敬之就把全体业务人员集中起来，让我讲乡下新鲜事，活跃报道思想，从而扭转分社内部指责和否定“包产到户”报道的风气。

到1982年1月以后，中央领导对“包产到户”问题多次明确表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舆论上逐渐占据上风。山东省委明确批示要宣传鲁西北棉花丰收与推行责任制的形势，整个局面才由此发生了变化。

形势变化了，在平县杨庄党支部开会研究，觉得我宣传“包产到户”为老百姓着了难，受了罪，于是他们便主动给新华社写材料，称赞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在困难时候为庄户人讲了话。其后，鲁西北地区先后有高唐、茌平、齐河、平原、陵县、乐陵6个县写信给新华社、山东省委和党中央，赞扬我深入农家炕头调查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是我一生中铭记在心的褒奖。

几年间，我在鲁西北、沂蒙山过夜的村庄多达96个。那时村里没有招待所，每到一地，基本上都是与老百姓在一个炕上睡。在陵县义渡公社小高家大队，我与支书裴玉海睡一个炕，老汉68岁了，睡觉时喜欢光着身子睡，我也脱光身子，老百姓怎么睡，我就怎么睡。县委新闻干事杨光来陪着我采访了一路，耳闻目睹我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情况，非常感动，向县委汇报，办公室主任莫振奎便让他写了一篇通讯，发在县委文件上，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学习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

历时一年多的骑自行车采访，好多事情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一次采访中，在离开齐河县前往高唐县时，天气骤变，北风呼啸，飞雪漫天，路上行人稀少，更不用说骑自行车长途跋涉了。县委宣传部长许会三再三挽留我，我说：“天气不好，不影响赶路。明天或许能转晴，我便可以照相。”县委宣传部干事史好全等人只好送我上路，透过茫茫飞雪，看到他们站在那里向我招手。

从齐河骑车5个小时，赶到120里外的高唐时，棉衣已经湿透，裤腿沾满泥浆。我没顾得喝口热茶，只在招待所食堂吃了两个馒头，便径直来到县委宣传部，约了新闻干事田乃仁，直奔30里外的王庄。

由于顶风冒雪骑车赶路 and 连日紧张的工作，到高唐第三天，我就病了，头疼，发烧，吃饭很少，说话非常吃力，田乃仁劝我休息一天。为了赶上拍摄农民入党宣誓的照片，我又骑上车子到离县里40多里的南镇公社于桥大队去采访。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我只得在本子上写给别人看，请别人介绍情况。公社书记把医生找来，医生说我不能再工作了，要休息几天。为了病快好多工作，我把本来应服5片的药一气吃了15片，提起照相机又出了门。老医生看了说：“想不到新华社记者是这样工作的。”在场的干部社员也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拍完照片，天已昏黑，十多名社员推着车子，手拉手地一直把我送到村外，走得很远了，还见社员们站在寒风里向我招手。

我从济南出发经齐河、禹城、高唐、夏津、平原到陵县，骑车采访近千里。所到之县，都提出给我派车。我都推掉了，说战争年代，咱们的老同志采访全凭两条腿，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和他们比起来，我骑车算不了什么；再说，骑车采访便于接近群众，让老

百姓觉得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能从心窝里掏出话来，与你交流，了解真实情况，这对记者是最重要的。

二、让人民来评判

从1979年起，几年间，我32次深入到鲁西北农民中去，每年出差在外都在300天以上。新华社发出我拍摄的照片476幅，文字稿32篇。其中，《人民日报》采用105幅(篇)，总社评好稿95组(篇)，全国性新闻影展入选10幅，新华社年度获奖好新闻照片5幅，获奖好通讯1篇，4幅照片被评为全国好新闻。在5项质量指标中，我在新华社摄影记者中位列第一。《新闻战线》、《新闻业务》、《前进报》等64种报刊和书籍在204篇文章中对我的调查研究活动与稿件进行了报道与评述。

1981年，我的事迹就引起了新华社总社的关注。孙振主任总是拿我说事，不断表扬，也不断向穆青社长报告我的情况。那年年底召开的新华社摄影工作会议上，以爱才著称的社长穆青特意表扬了我。

会议结束时，穆青来了。他坐定后，作了“新闻摄影大有作为”的讲话，讲到一定要深入生活时，突然问“谁是李锦，站起来”。我从第五排站了起来，全场都望着我，穆青同志盯着我看，约有三四秒钟，会场气氛像凝固了，一片静默。短暂的停顿后，他招手让我坐下。穆青说：“李锦同志为我们新华社争了光，带来了荣誉。李锦采访很深入，所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接着又说，“什么是优秀记者，要让人民来说。自己说自己是高级记者、特级记者不行呀，要让人民来评判，‘庄户人家的好记者’，这是谁封的呀？人民封的。”我内心非常激动，穆青讲的什么话，我也记不清了，满脑子只记着两个字：“人民。”

1982年1月7日，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直内部情况》看到高唐县委干部田乃仁写的《千里单骑采访，留下一路新风》的材料，批示给中宣部与新华社领导：“请考察核实后，看是不是能公开表彰和在你们这一行中作为先进工作者典型介绍。”

中央宣传部和新华社领导看到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后非常重视，领导分别作了批示，在1982年春节前派新华社特级记者袁苓和高级记者徐佑珠前往山东。春节后，他们又来到鲁西北的茌平、高唐、平原、陵县等地进行调查核实，到王庄、张西楼村听取农民反映，前后历时一个月，考察证明，这些来信表扬我的情况，符合实际。

1982年4月3日，新华通讯社党组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

三、邓小平说，你有发言权

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掌舵人”总是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他在经济事务上需要有人充当中国的战略家——核查细节、确定问题、提出和评估不同的选择、设计可能的行动路线，因此他极其注重了解来自一线的情况。长期在农民中调查研究的我由此得到了汇报基层情况的机遇。

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我在《西藏日报》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一个人的成长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受很大的误解与委屈，但面对领导与亲人的一句话，会得到莫大的安慰。当想起“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你有发言权”那句话时，我常觉得自豪，更感到有一种义无反顾前进的勇气在血管中激荡。15年来，我一直把小平同志听取我汇报的照片放在记者证里，随身带着，一直在改革第一线做调查，写出不少调查报告，努力探索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规律。

1982年，我正在商河县农村采访，突然接到了新华总社团委书记沈建国的电话，通知我出席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闻讯后我立即赶赴北京。此前，中直团委书记刘胜玉对我的情况进行考察，他向中直机关党委与团中央汇报我“为宣传三中全会立了功”的情况。这个提法最早是穆青讲的“为新华社立了功”，后来刘胜玉用这句话来归纳，并为中直工委和团中央领导所沿用。



1982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取我汇报农村改革情况时说，“你有发

言权”。

12月31日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在那里接见了共青团代表。团中央从中央委员中特地挑选了十多人专门向首长汇报情况，我是其中唯一的一位记者。胡锦涛同志等对挑选出的人比较了解，一一向中央领导介绍这些代表。介绍到我的情况时，胡锦涛同志说：“他是记者的代表，为宣传三中全会立了功。”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听后很高兴，“你是记者的代表，好哇！”

邓小平问我：“现在农民生活怎么样？”

我回答说：“农民差不多天天吃肉，5天赶一次集，每次买个五六斤，用大锅煮好，撒上盐，每天炒一点，下次赶集再去买”。

邓小平又问：“农民住房怎么样？”

我回答说：“现在盖新房的很多，一般是5间房，3间正房，2间偏房。”

邓小平听了这些具体情况后，连声说：“好、好、好。”我用鲁西北农民“粮满仓，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腰包票子鼓囊囊，光棍汉子娶新娘，农村一片喜洋洋”的说法向邓小平汇报。最后，我说：“农村老百姓想念您，都知道好政策是您制定的。他们祝愿您健康长寿，领着农民朝前走。”邓小平一直专注地听着，脸露笑容盯着我说，“你有发言权！”

与邓小平见面那段谈话再普通不过了，但那情景却如闪电般照亮我的心际。后来这一段被记录在大型文献电视片《邓小平》第八集“新的革命”里，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邓小平所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他把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放在农民的温饱问题上，把人民生活的幸福作为衡量工作的基本标准。吃饭、住房都是最简单的事情，他却时刻挂在心上。他以寥寥数语，从最关键的问题了解起，从农民生活变化看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否。

我记起农村改革中的一个背景，1980年2月中央召开会议，当讨论到农村政策问题时，华国锋等领导人坚持农业学大寨的思路，甚至对划小作业单位表达反对的倾向。轮到邓小平讲话时，他说这么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他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仅仅过去三个月，他便对凤阳的做法表态支持。邓小平非常重视来自最基层的第一手材料，对我“你有发言权”的评价，间接表明他对农村改革的看法，意味深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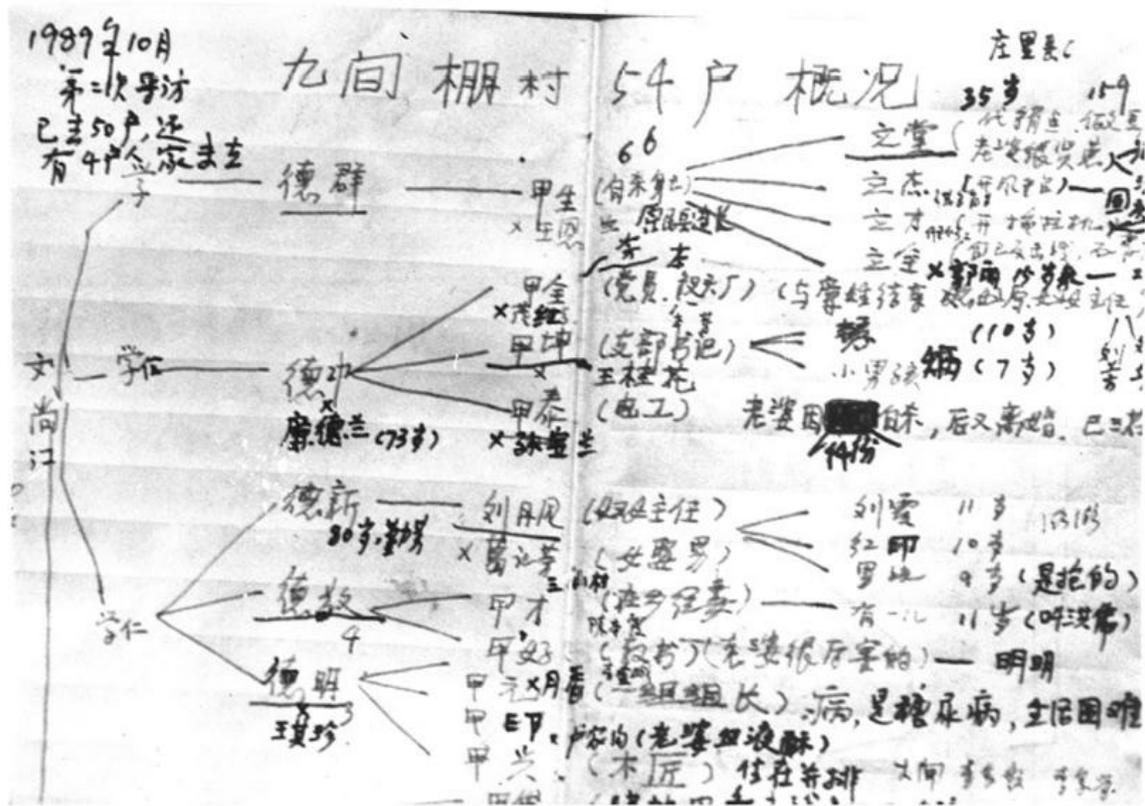
如今，回过头来遥望农村改革那个激荡人心的时代，为何在中国千千万万个新闻记者中，我有幸能够得到邓小平“你有发言权”的评价，能够大放异彩？新华社高级记者陶峻峰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后来则是多年的好友，他在会上发言：“李锦的成就的获得，是因为特别能吃苦，能长期到老百姓中搞调查，一年有300天时间在下面，所以他从生活中得出真知灼见，对国家什么重大问题都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是他进步的关键。”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个伟大的时代给人以勇气，催人奋进。中国正进入历史最重要的转折期之一，改革又从农村开始。我躬逢其时，又处在改革腹地，不断从群众中汲取营养，想法便如江河般挡也挡不住。

1984年，在中宣部与全国记协举行的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我作了“到农民中调查，反映时代变革”的发言：

我常想，在新闻前辈留给我们的许多精神财富中，不息的追求之心是最宝贵的。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毅力就越坚韧，才力也发展得越快，对人民也越有益。因此，我不满足每一次采访仅仅是完成报道任务，而是把它作为深入群众、调查中国国情的机遇。在这种探求中要放弃许多享受，做出许多牺牲。这些年来，从晚上六点到夜间一点，我一般都是在读书生活中度过的，我家里没有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洗衣机，却有一千五百元钱的书籍。要想有所为，就要有所不为，想探索就要吃苦，想有益于历史就要无条件地迈开双腿到人民群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争取更大更多的发言权，做到一辈子不脱离人民群众。

第三章 蹲点：身入基层接地气(1986—1991)



在九间棚村调查时，我把每家人数、姓名都记下来，按辈份和亲戚关系列出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亲戚关系表”，就连每家几头猪、几只羊也记录在案。

然后按经济实力、致富能力、文化追求和邻里关系四项，分上中下三类排队。看看党员干部在哪一类里，发挥作用怎样。这种基本分析使我能准确地作政治与经济分析，并能迅速接触采访对象。

这时，呈现在我面前的九间棚，已不再是一张平面的图表，而是一出充满矛盾甚至带着火药味的戏剧。1989年，我在这个村住了52天。

第一节 在大别山发现“初级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走进多事之秋，改革落入徘徊境地。

1985年以后，中国农村问题日益增多。在深化和拓宽改革领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复杂情况，并引起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如价格放开后出现农副产品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引起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普遍不安，加上卖难买难现象加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一度下滑，粮食购销体制未达到预期目标，又从合同订购退回到实际上的统购；乡镇企业一轰而起，秩序混乱，出现了与城镇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产品等情况；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领域的摩擦加剧；老、少、边、穷、山区贫困现象更为突出等等。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有些人严厉抨击中国社会的落后，甚至揭露报纸在说假话。

一、贫困落后，令人不安

1984年，我连续两次脱产学习，先到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半年，接着又到中国新闻学院学习两年。马克思主义与新闻学的教育，使我得到知识补充。学习结束不久，我接到总社安排前往大别山老区采访的任务，要求以“改革带来新变化”为主题，报道老区形势，以迎接党的十三大的召开。

报道新变化是新华社的一贯要求，可是当时离十三大召开还有半年时间，我对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并不了解，该从何着手呢？

从1987年5月20日至7月18日，带着上级指定的“生机勃勃的大别山区”的主题，我相继来到安徽省的安庆、宿松、太湖、岳西、金寨，湖北省的英山、罗田、红安、黄冈、蕲春、浠水，河南省的新县等地采访。我调查了12个县，看到的却是农民们异常艰苦的生存处境。究竟应该只反映改革的成就，还是应当也反映改革面临的困难；是组织画面表达改革的成就，还是抓取真相，反映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展示改革的客观进程？在反复的考量中，我最终放弃了上级布置的主题，改以“贫穷落后，令人不安”为主题。

这是风险极大的改变，但最后我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5月29日，我来到坐落在大别山南端的宿松县北浴乡滑石村，与我同行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张晓华、南康宁。到村中时，刚刚天黑，有些人家已经入睡。为了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敲开一家一户的门，目睹了山民们贫困而凄凉的生活。

第一户是汪连昌家。他已经59岁了，可是一辈子没有穿过棉袄。床上铺的是草，上面盖的是蓑衣，下面有一床新棉胎。这个村有36人参加红军，都死了，带他们走的队长当了大官，今年拨来一批棉胎。他说小儿子能过上睡棉胎的日子，真是托共产党的福。大儿子是65年生的，22岁了。我说也该说个媳妇了，汪连昌说不是不想，是想不着，这穷日子，哪个媳妇肯进门。说完，用手擦开眼眶，竟哭了。



一辈子没有穿上棉袄的汪连昌为生活的艰难而流下眼泪。第二户是梅银姣家。因为太穷了，借的别人家一间屋住。男伢23岁，女伢14岁，与爹娘合盖一床被。像这样父母与大龄儿女睡一张床的，在滑石村有56户。我们进屋时，男伢伸手挡脸，女伢把头蒙在被子里，做母亲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深夜里，大家默默无语，那一声叹气久久地弥漫在空气里，使人的心觉得沉重。

第三户是汪方宝家.....

这一夜，我走访了21户，其中父母与成年子女同床的有11户，没被子盖的有5户。直到深夜一点，我们才到村部吃饭。村部四壁空空，饭桌是抓计划生育时从超生的一户罚来的。从春节以来，村干部都没有吃过肉，听说北京客人来，他们专门派人出山买了肉，是梅菜烧肉。我们几个一口也吃不下，只吃了几块梅干菜。除了想把肉让给这几位半年没有吃过肉的干部外，此情此景也实在是难以下咽。

6月2日上午，我前往太湖县凉亭水库，途中遇到一位叫吴春香的老太太。老人快80岁了，两天没有吃饭，饿得心慌，没有力气站起来，就坐在地上。眼前晒在石头上的一小片麦子，能打20斤面，是她全家一年的口粮。我记下了老人说的一段话：

我们是单门独户，儿子是个残疾。只有在山上开一片地，就打这么多面，一年尽吃野菜。两年多没吃肉了，闻到肉味就淌口水。养两只鸡，鸡蛋也舍不得吃，油、盐全靠这两只鸡了。我现在巴不得死，死了就什么也不晓得了。可我走了，儿子谁管呀。儿子是老光棍，没人跟他了，我死了放不下心。



幼小的孩子负起生活重担。滑石村的孩子扛着一根毛竹下山去卖。

从安徽到湖北，又到河南，顺着大别山走，我见到了很多贫困村庄，也看到不少像吴春香这样无法活下去的老人。这些令人痛心的现实，让我受到一次次的撞击。农村改革初期，在沂蒙山区目击的种种贫穷景象，曾让我内心久难平息。改革六七年后，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我又目睹了与当年如出一辙的贫苦生活，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我们新闻记者习惯了正面报道，也走惯了干部们指定的采访路线，在大城市和县城附近转悠，画面上总是“莺歌燕舞”的形势。要知道中国地形复杂，在边边角角有多少穷人需要我们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改革确实为农村带来巨大变化，但我们千万不能过于乐观，把形势看得过好。我们做报道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长期以来，每当上面强调一种精神，新闻领域总要刮一阵风。不少人常把理想当作现实，对眼前的真实视而不见，以至于读者的视线里只有光彩的一面。这种风气源于50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并在十年动乱中大刮特刮。然而三中全会毕竟已开过8年了，全党的思想路线已确定为实事求是，再把此风的存在归咎于历史是不公正的。

正是在这种思考之下，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看到的贫穷落后状况以恰当的方法报道出来，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落后，认识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这种想法，违背了上级下达的指示，也违背了当时新闻界宣传的统一口径。

198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拍摄的一组四幅照片，标题是“贫困落后，令人不安”，副题是“大别山区掠影”。当时发这样一组报道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人民日报》农村部编辑黄彩忠、凌志军给予破例处理。这是《人民日报》在建国后第一次刊登直接从正面揭露我国贫穷落后局面的照片。而新华社编辑部对这组照片，则一张也没有发出。

二、与十三大的主题不谋而合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件代表大会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这组以“贫穷落后，令人不安”为主题的大别山报道，揭示了我国改革发展形势中的一些贫困现状，与十三大的主题不谋而合。两个月里，仅我拍摄的新闻照片就被总社采用96幅，全国性报刊采用8个画刊与辟栏，仅《人民日报》就采用26幅(篇)。这不是对旧社会的揭露，也不是对错误路线的批判，而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第一次公开在报纸上正面反映我们贫穷落后真相的形象报道，本身就称得上新闻。

大别山报道的意义，不仅在于用镜头反映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还在于我逐渐形成了又一独具特色的新闻调研方法论——“新闻摄影过程论”。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摄影的改革。在中国，长期以来，摄影记者只是新闻报道的“配角”，并且新闻报道受“新闻即政治”定势思维的禁锢已久，新闻摄影亟待改善地位。80年代后，中国新闻摄影界陆续提出新闻摄影兵种论、主体论等，着重强调摄影的地位。“新闻摄影过程论”是新闻摄影领域思想路线的一场变革。

我把自己关于“新闻摄影过程论”的思考讲给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蒋齐生听，蒋老听后拍案叫好，立刻让我把这些体会写出来，名字就叫《过程论与新闻摄影的新思维》。有意思的是，当时杨超关于过程论的论文集《探索的十年》在王府井书店书架上只有两本，如果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是不会有人买的。没想到我在偌大的王府井书店买走一本，一个月后，另一本被蒋齐生买到了，师徒二人如此心有灵犀。

“新闻摄影过程论”作为一面旗帜打出来，是中国新闻摄影改革进入理论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过程论与摄影记者的新思维》一文受到了新闻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在《经济日报》召开的摄影改革研讨会上，蒋齐生以这个主题把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引入新阶段。当年的新闻摄影学会研讨会主题便是“过程论与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颖主编了这本书。以过程论作为主题，新闻摄影界当时达到的理论层次是不低的。新闻摄影界有蒋齐生这个人，水平便一下子高了起来，这是大家都尊重蒋老的原因之一。

许多年后，我仍然感到惋惜的是，1987年下半年学术界本应该有一场“过程论”的思想理论教育，国家将其作为初级阶段理论的哲学武器，但我们国家失去了那次机会。我觉得，“过程论”与“实践论”、“矛盾论”同样重要，历史迟早是要补上这一课的。

第二节 九柱擎天

一、潜入深山

1989年是个动荡变幻的年份。

在国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政治体系，东欧政局剧烈动荡，横亘在中西方之间的铁幕摇摇欲坠。而在春夏之交的中国，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令全世界为之瞩目。

在经历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去世和北京政治风波后，民众对党的拥护跌至低点，这与5年前因为农村改革带来高涨的民意支持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外国人，很多国人也开始议论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下去。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中国领导层则竭力稳住国内，但媒体向民众所作的正面报道，又时常被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所干扰，一次又一次令人尴尬。与此同时，西方高官停止了访华，并限制对华贸易尤其是军事技术出口，中国的外贸和旅游业都蒙受了损失。

舟至中流，突遇漩涡；改革之路，荆棘丛生。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向军级以上干部发表了讲话。他说：“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在这一年6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被免职，党中央常委会增添了三位新成员：江泽民、宋平、李瑞环。风波刚刚过去，全国上下都在反思，也在翘首以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将以怎样的举动引导中国继续前行，我们党将怎样安全渡过政治危机，走上坦途的问题。

此时的我也走到了人生的低谷。

1988年3月，在北京某家新闻单位中就已出现“要搞新华社就要搞李锦”的说法。我在大别山区搞了一批批评报道，有个新闻单位的同行根据一封匿名信，在报纸上发难，指出某一张照片失实。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前一阶段，舆论界几近失控状态，有些报社的人攻击新华社特别起劲。当时的分社社长刘光辉非常关心记者，关心职工，是我接触的新华社社长中少有的能担当、能真心帮助下级的好领导。为了避开舆论锋芒保护我，刘光辉顶住各种压力，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与单位的同志解释复杂的形势，理解我的处境；一方面被迫暂时停止我的采访与发稿。春夏之交，形势更为明晰。6月初新闻界有人直接把我作为坚持党性原则的典型推上祭台进行批判，公开批判党性原则。形势变化了，似乎什么也挡不住。

当时，不光新闻界，整个国家都在等待新一届领导拿出办法来，到底社会主义的路该怎样走下去？执政党怎样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重新凝聚人心。新闻单位的人都在家学习，也没有什么新的报道精神下来。这时候，刘光辉社长说，你不要总闷在家里，下去转转吧。

那年8月，我带着满腹委屈与疑惑，只身一人来到了山东省临沂地区平邑县九间棚村。下去的时候带着一捆书和一个剪报本，剪报本是4月5日至6月10日的《人民日报》文

章，我把文章中的群众意见梳理一遍，列出了一个调研提纲。我觉得人没有被别人打倒的，只有自己打倒自己才是真的倒了，越是在别人议论纷纷时自己越要挺住。自己的事历史会证明，而国家的事是耽误不得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好友李敬堂诉说。李敬堂说，老战友，你不要为国家的事操心了，你出来散散心，我陪你转转，想看嘛就看嘛，想吃嘛就吃嘛。其他的东西是身外之物，该放下就放下。我说，国家遇到大难，到了需要我出力的时候了，哪能说放得下就放得下呀。李敬堂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直摇头。

李敬堂是临沂地区交通委员会的宣传干事，他带着我看临沂交通情况，到九间棚村看农民修的路。九间棚村坐落在沂蒙山区一个陡峭的山顶之上，四面是悬崖峭壁，位置极为偏僻。这是个只有54户184人的小山村，5年间依靠自己的力量修筑了32华里的盘山公路，因为这个村坐落在四面是悬崖峭壁的山顶上，要凿山填沟，工程异常艰巨。老百姓们靠盐粒为菜，啃煎饼，喝冷水，把路修成了。黄门根悬崖前的路，硬把悬崖削掉6米，再在山谷中填起7米，路基像长城般凌空而起，气势雄壮。不仅使人想象到工程的艰巨，更使人感受到团结与坚强，这石壁里透发出一种与自然的抗争力和社会凝聚力，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

住在山顶的我心绪难平，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感此时更显强烈。北京政治风波已经平息，然而危难并未远去。苏联在动荡，中国处在风雨飘摇中；中华民族急需一种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需要弘扬一种天塌下来撑得起的气概。我隐约从九间棚看到了新闻报道的政治价值。如此坚如磐石的大工程背后，党组织是怎样把大家聚在一起的，能否从中找到解答国家难题的思路？

我决定上山住下来，就将想法与地委宣传部长李祥栋与新闻科长高明说了，李祥栋非常支持这种蹲点的做法。

过去这个不足二百人的小山村，很少有上级来视察，村里也没有任何公用设备。平邑县交通局局长卢传文从县城借来两床被、一顶蚊帐、一把手电筒还有两扎蜡烛。村支书刘嘉坤把我和李敬堂安排在妇女主任刘月凤家吃饭，一天三顿由她做。村里没住处，一间小房是计划生育时为妇女做结扎的，一直闲置着，布满了蜘蛛网，我们便打扫一下，铺上麦秆住了进去。

在九间棚，我白天串门或泡在田地里，有时帮老乡干活，边干边聊天，没用两三天，对村里情况就有了大体了解。

九间棚村是个山顶村，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二百多年前，有一个逃荒人路过这里，看到一个大石棚从山间凹进去，棚外有水，便住了下来。到八路军进来时，这里是九户人家，把龙顶山顶上的石棚分成九间居住，“九间棚”由此得名。

1959年搞运动，山上的人被赶到山下赵庄，后来又搬回去，有的人家在石洞里一直住到1964年。因为山太陡，村里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到公社去过。有个老妈妈一辈子没见过自行车，病重了，硬要儿子把自行车扛到山上让她看一眼。

实行“包产到户”后，很多地方“包产到了户，不用党支部”，党组织瘫痪了，村里的事也没人管。这时，村里出了一个青年党员刘嘉坤，他决心要带领乡亲们闹翻身。乡里当时正好架电线，可九间棚没有钱，刘嘉坤把自己家猪卖了，鸡也卖了，凑起300元，在他的带动下，全村集资把电线杆架上了山。紧接着，刘嘉坤又带着全村54户农民完成修路、引水工程。在5年时间里，投入义务工10万多个，平均每个劳力每年出义务工达310个，动用土石方25000多立方，修建三级扬程269米高的扬水站一座，砌石渠4000多米，连着38个蓄

水渠，实现了“路跟渠、渠带路，田水池满天布，灌溉田园绕果树，自来水送到户”的高山水利化，2000多亩荒山得到了治理。

九间棚村的奋斗事迹让我深为感动。然而衡量它能否有代表性，关键点是它在社会大环境中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1984年后，我国农村问题愈渐增多。北京政治风波前后，有些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一、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使党的威信严重下降；二、党支部书记不合格，以权谋私，党内腐败现象引起群众强烈反感。党员干部形象作风问题影响到组织建设，也危及村庄稳定；三、农业投入下降，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对农业投资逐年下降，山东省90%的水库得不到维修，抗旱能力下降30%以上；四、经济秩序混乱，非法致富现象加重，大家对分配不公问题议论纷纷；五、社会秩序不稳，20世纪80年代末，有上亿农村外流人口，带来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这些是总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我意识到，从上到下都面临着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挑战，群众是不是还信任共产党，是否还愿意跟共产党走。结合到九间棚，这个小山村对于党和国家正面临的凝聚人心、唤起信心来说，是否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呢？

九间棚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他们在自然界生产斗争的事例很多，可在社会思想与精神领域又能够向我们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党的领导及自我建设方面，九间棚有没有斗争，有没有误解，有没有丧失信心的时候，有没有由分散到凝聚的过程，能不能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整个景象？

要搞清这些，没有深入生活的功夫是做不到的，挖不到应有的深度是找不到精准答案的，听来的故事未必可靠。

但这里的人信奉家丑不可外扬。与群众不熟，就没有人肯讲内情。要让群众相信你，你就要到群众中去，让他们觉得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李敬堂住了几天，局里有事被叫回去了。临走前，我们一起拍了一部新闻电视片，叫做九间棚之路，这个电视片的解说词叫九间棚精神。他回去不久就在山东电视台与临沂电视台放了。他回去了，我决定在九间棚蹲下去，我绕开报道话题，与群众东拉西扯，什么也问，什么也谈。

二、惊心动魄的风波

村里最年长的84岁老人刘德顺有2个儿子、6个孙子，可是好几年没有喝过儿孙的酒了。大年三十，我从小卖部刘立海家买来一扎白酒。刘立海心想，李哥在这里没亲没故的，给谁买酒？好奇的他悄悄跟在我后面，看着我拎着白酒进了他爷爷刘德顺的院门。刘立海撒腿就往回跑，当即把家中肉和油带到爷爷家，吆喝着兄弟几个给爷爷送年礼。此事在九间棚村激起一连串涟漪，带动了家家给老人送年礼的风气，都孝敬老人了。

李敬堂记录下了我在九间棚调查研究的情形：

李锦从柴米油盐问起，捡老百姓最关心的问。村里谁有重病，谁家日子过不下去，谁最能吃苦，他总找这些人去交朋友。他不要干部陪同，就一个人走家串户走访。山里常停电，村里一片黑，他就披着黄大衣，打着手电筒，摸着陡峭的山路走访。有时，在老乡家一边吃饭，一边拉呱，一顿饭吃了四个小时。

李锦比支书刘嘉坤大两岁，他就顺着刘嘉坤辈份，称呼山里人“大爷”、“大叔”、“婶子”，人家喊他“大哥”、“大兄弟”，孩子们称他“李大爷”。

怕为村里添麻烦，他说自己爱吃地瓜、小米粥和辣椒咸菜。村里为他做的肉和鸡蛋，他一筷子也不动，只好按他说的办。他连吃三天地瓜，不消化，腹泻不止，一夜出门七、八次，没有力气，就扶着墙走，回到宿舍满身是汗。就是这样，他不让改善生活，每天光喝小米粥，吃咸菜，却一天承担14个小时的采访。

调查核实情况，李锦非常认真，不仅走遍了全村，而且连每个工程险要的地方都亲自看了，村里收入开支及投工情况都是李锦一笔一划算出来的。他爬遍了龙顶山所有山头，连对面天宝山南大顶也爬上去了。走的时候，裤子被划破了，露出皮肉，他自己用白线缝了几针，凑合着穿。皮鞋掉了跟，走起来一高一低。眼镜片被悬崖碰碎了，就用胶布撕成小条条粘起来。”

这段文字后来发表在全国记协的《纪事》刊物上，所描述的其实还并不是最为艰苦的情况。因为气温骤降，我病倒在山顶，腹泻不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整整腹泻8天，最多一天拉肚20次。也不能吃油性东西，天天喝小米稀饭，吃咸菜，身体极度虚弱。有天夜里从厕所里回来，站不住，两眼冒金星，竟晕倒在山坡上。半夜里，被冷风吹醒，站不起来，我就咬紧牙从山坡上一点一点地往回爬，爬回住处，身上衬衣都被汗湿透了，直冒热气。最困难的时候，我拄着一根棍子硬撑着身子，披着黄大衣，在村里转悠，敲开一家家的门。

我终于撑不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大爷大娘们送来花生、鸡蛋、面条与咸菜。有个叫刘德香的老党员看到我来时带着一包书，有《列宁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选》和北京风波前后的报纸剪贴本，摆满了桌子。老人看着这一大堆书说：“你走人吧，俺山里穷，买不起书。”村里人不知道新华社是干什么的，还以为我是新华书店卖书在此落难的人。我忙说，“大爷，村里人嫌弃俺啦？”刘德香说，“哪里的话？俺是心疼你呀。”老人带来大葱、煎饼、花生，走时抹了眼泪。

就这样，我一直蹲在这个村半个月没有动身。

在九间棚村调查时，我把每家人数、姓名都记下来，按辈份和亲戚关系列出了几大

支，画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亲戚关系表”，就连每家几头猪、几只羊也记录在案。然后按经济实力、劳动态度、致富能力和邻里关系四项，分上中下三类排队。村里这几年办了几件大事，爆发什么矛盾，看看党员干部在哪一支里，发挥作用怎样。这种基本分析使我能准确地作政治与经济分析，并能迅速接触采访对象。这时，呈现在我面前的九间棚，已不再是一张平面的图表，而是一出充满矛盾甚至带着火药味的戏剧。

“大洼风波”是村民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这是我与村民张如意、刘加华在一起猜火柴喝酒时听到的线索，我再三追问才知道了前因后果。“大洼风波”的主人公是农民刘加五，住在我隔壁。我找到刘加五，看到自己的底细已经被我摸透，刘加五索性把跟干部斗争的过程竹筒倒豆子般说了出来。我把前后经过完整地写在了调查报告中：

九间棚村的干部和党员也有被群众误解的时候，“大洼风波”就是令人心惊的一幕。这发生在正修建山上输水渠道的1987年夏天。

当时，山上的3个蓄水池都干得底朝天，10万株雪花梨苗被旱死9万株，输水工程急需一台水泵和大口径塑料管，村里派党支部委员和会计赶往淄博市采购。他俩出去十多天，还没有回来，全村人都急坏了。有人怀疑说：“没准在城里吃喝玩乐，把大伙的血汗钱给花了！”不想，这话被一个叫刘加五的青年听到了，他是平时不肯下力气干苦活但敢闯纰漏的人，全村人都叫他“癩五子”。

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上工后，“癩五子”坐在炮眼上，向大家喊开了：“咱们在家拼死干活，党员干部用咱们的血汗钱大吃大喝，这日子还有啥奔头，不如死了痛快！”这时，导火索已被点燃，正嗤嗤冒烟，他坐在炮眼上一动也不动地等死，吓得人们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他从炮眼上拖了下来，按倒在地，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不过，他还爬在地上不起来，一个劲地狂喊哭闹，煽动人们“罢工”、“和干部展开斗争”！这可把大伙的心绪都搞乱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真的不干活了，交头接耳地议论。党支部临时决定把劳力都集中到大洼工地“整顿”。

就在这天夜里，买塑料管的党支部委员和会计回来了，委屈得搂着刘嘉坤的肩头哭出了声。原来，他俩把济南的九家塑料厂都跑遍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现货，急得他们认准塑料一厂苦苦哀求，厂领导得知他们来自革命老区，严重干旱已使群众吃水困难，当即同意给他们现加工，让他们等几天提货。这时，他俩才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小旅社住了下来，每人每天床费为6角钱。而在这之前，他俩一直没有住宿，夜晚都是在火车站的屋檐下度过的。外出的十天里，他们仅买过一块咸萝卜头，啃馒头时就掏出来撕一丁点放在嘴里嚼嚼。提到货后，他俩随即雇了一辆卡车，把水泵也一并装上就匆匆往回赶。这时，口袋里一共只剩下7元2角钱，也分两次买冰糕给司机吃了。当天黑车子开到九间棚山下的一个亲戚家门口把货卸下来后，他俩都昏了过去。这时，司机才知道，这两位被他误认为小气的硬汉子，还是前一天中午啃了点干馒头。

第二天，刘嘉坤在大洼工地上召开的村民大会，把情况如实向大家介绍后，很多群众感动得掉下泪。一些老人指着“癩五子”的鼻子一个劲地教训他，“你看看人家干部和党员……”。

炸药的“检验”，使全村人更坚定了对干部和党员的信赖，大家的心贴得更紧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挺过困难时期，不少人家当晚就派人下山请亲戚上山增援。“癩五子”夫妻俩一夜没合眼，分头从山下亲戚家请来了9位壮劳力。第二天一早，村干部们到工地时大吃一惊，工地上干活的人数已猛增到140多人，比风波前增加了一倍。

惊心动魄！从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极不信任，到党群一心，生死与共，众志成城，一场“大洼风波”反映出九间棚党组织使人心由面临涣散到凝聚的过程，表现出党群关系由水火关系到鱼水关系的转变。一个小山村的惊险一幕，不正是整个中国局势的缩影？北京政治风波中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对共产党队伍腐败现象的意见，那种激烈对抗的场面，千钧一发的瞬间，似乎在九间棚“大洼风波”中都有着折射和反映。

这时候，我不仅感觉已经号准中国政局陷入困境的脉搏，而且已经找到打通脉络的“穴位”。

第三节 九十年代最耀眼的农村典型

一、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

这时我一边在乡下调研，一边关注着天下大势。

1989年9月底到10月初，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入西德避难。社会主义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九间棚的现实，在我看来，就像一根银针，似乎正扎在中国发展的穴位上。面临挫折与巨大风险冲击的中国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这条路，共产党怎样领着大伙走这条路，目前要迈开什么步伐，一系列的问题都急需回答。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大局，也是遁入深山的我最想弄明白的焦点。

在我看来，“大洼风波”昭示出一个真理：共产党人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带领群众前进，关键是要改善自身领导，保持先进性。这是一种“好换好”的关系，首先是党员有先进性，与群众甘苦与共，群众才能跟党走，做到水乳交融。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九间棚形成凝聚力的关键，一个群体、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国家凝聚起来需要一个核心。在九间棚，这核心就是只有九个人的党员队伍。九间棚原来的党组织软弱是长期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而从软弱走向坚强，关键在于刘嘉坤这样的好支书。他无私奉献，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受气，一心一意为大伙儿，正是这种力量对九间棚人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先进的力量最有吸引力，最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九间棚的党支部就是这样一个强大吸引力的凝聚核。正像群众夸赞的那样：九个党员九根擎天柱。

九间棚村共产党员的作为，从一个小山村为中国面临的困局实践了一条有效路径。后来我在第一届“沂蒙精神”讨论会上发言说：“就九间棚调查产生的时代背景看，时代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典型，来振奋全中国的神经。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撑得住，做到‘天欲坠，赖以柱其间’，是摆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道考题。我们提出‘九柱擎天’的精神，是有意用九间棚这根‘银针’，来扎中国社会疾病的‘穴位’，为党和国家献出一道‘药方’。”

寻找到九间棚与全中国这一大局的联系，“天塌下来要擎得起”的报道思想在我头脑中迅速明确起来。等到把“大洼风波”核实清楚，我已经进村14天。这时的我因为爬山皮鞋掉了一只跟，胡子长了一脸，人也瘦了整整一圈。平邑县县委书记綦敦祥听说有个新华社记者住在山上住了十多天，大吃一惊，他带着办公室、宣传部与新闻科全班人马开着三辆车来看望，接我下了山。

下山时，全村的群众停下手中的农活来送行，十几户老乡为我煮鸡蛋、炒花生、装山楂、地瓜和黄梨，送鞋垫，把车都塞满了。有位老大娘抱着我直流泪，连声问“儿哪，啥时回来？”我自己也掉泪，说不出话来。

在山上的十几天里，我记录下了数万字的翔实材料。下山后，我和县委宣传部的甄德生奋战一个星期，完成了调查初稿。在平邑县招待所里写了一封长信，向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汇报了 this 典型，信中我说：

社会主义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应该突出地宣传凝聚力与党的先进性问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党的领导，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九间棚村党支部在人心涣散的关头，把群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使群众维护集体，想着未来，决心跟党走，这种凝聚力的形成过程与方法对基层组织建设乃至形势的稳定与发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正当我对调查报告作深入思考与修改之际，山东省省委常委、副省长高昌礼提出春节找一个有特色的村庄过年、做点调查的想法。我向他推荐了九间棚村。于是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天，我陪同高副省长上了山，再次住进了村中，在村里小学校里铺上麦草秸的地铺，两个人面对面睡着。

当天晚上，我与高副省长促膝长谈，一直从5点谈到10点半。我把自己对九间棚的了解及看法和盘托出，希望山东省委与新华社一起抓好这个典型的宣传。高昌礼副省长对基层情况熟悉，思想理论水平高，听完我的汇报后也很兴奋。他认为，九间棚肯定是一个大典型。现在必须考虑一个信心问题，在国家内部与外部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既需要社会稳定，更需要帮助人们增强信心。九间棚环境这么恶劣，却干得那么出色，让每一个看过的人都觉得是个奇迹，这个典型的意义就在这里。

经过实地调查后，高副省长决定根据确定的思路，与我们联合拿出调查报告。高昌礼向省委报送，我们则向新华社报送，分头进行，争取在多方面开展工作，把这个典型推广出去。

后来还有一段小插曲。宋平同志到山东考察时，我找到省委书记姜春云，希望向宋平同志汇报九间棚情况，认为讲清苏东事变背景对于认识九间棚的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典型意义会更充分些，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典型。宋平非常重视，他安排秘书彭清华在当晚专门听取我的汇报，姜春云的秘书李孝声陪着我一起汇报，彭清华特别对我将共产党员先进性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提出来非常赞赏。

当天晚上，彭清华将我的汇报情况向宋平作了汇报。第二天上午，彭清华向我反馈说，宋平同志对九间棚事迹非常感兴趣，还说新华社记者和群众中调查研究吃了不少苦，以九间棚精神调查九间棚，这个记者的事迹也很感人，要向这个新华社记者为党建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二、历史转折关头的新典型

九间棚调查报告刊发得并不顺利。

起初，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把调查批给编辑部门，编辑却以正面报道为由，不肯发内参。1990年3月，我与记者刘德玉赶赴北京，专程向编辑部汇报九间棚情况，并陈述九间棚的时代意义与推广价值。几经努力，调查最终得以刊发。这组题为《背水决战，穷村巨变》、《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的调查报告虽然长达一万余字，新华社内部刊物破例全文采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领导。

之后，《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半月谈》、《瞭望》等刊物相继刊用报道九间棚的文章与照片，新华社随后又发了题为“九柱擎天”的通讯。这时，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全景把九间棚作为全省党建的先进典型树立起来，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也高度重视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宣传，并在济南召开“沂蒙精神”报告会。省委书记亲自出席，让九间棚党支部书记刘嘉坤第一个发言。

宋平读了九间棚的报道后深受感动，当即写信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他说：

他们在那么穷困落后的地方，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人均收入达到七、八百元的水平，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现在我国类似这样的地方还不少，农村富余劳力很多，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如能有像九间棚这样公而忘私的党员干部带头，党员又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就什么样的困难也能克服，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专门来到九间棚村。他看了引水上山工程、山顶天池、果园和九间棚旧址，对陪同的山东省副省长王乐泉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发扬九间棚精神，那么中国的什么事也办好了！”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也相继来到九间棚。

几乎一夜之间，九间棚的名字传遍神州，到九间棚参观学习的热潮骤然兴起，出现了自“农业学大寨”之后没有过的农村参观潮。

我住在山上，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基层干部。陕西省米脂县有个贫困村，听说了九间棚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很想了解实情，全村凑起300多元钱，让干部专程来九间棚学习。这个小伙子每天只吃一顿饭，赶到九间棚。他从山脚下一直爬到山顶，走一处停一处，到村中一户一户地看过去，了解架电、修路、治水的情况，记了厚厚一大本。

据平邑县委九间棚接待站统计，从1990年到1991年底，全国有186万人到九间棚参观，还有6个国家的客人到九间棚参观。党和国家领导人，有6位到九间棚考察。有30个省市与自治区的110位省部级干部来到九间棚。48所大学的师生到九间棚考察，办调研班，或开展夏令营活动。我和李敬堂拍摄的《九间棚之路》录像卖出上千盘，以我写的文章为主的“九间棚事迹材料汇编”卖出6万本。反映九间棚的电影、电视剧、报告文学、小说接连面世，理论研讨会连续开了三次。

宋平与刘白羽谈起这件事，刘白羽又推荐李存葆与王光明一起写出长篇报告文学《沂

蒙九章》，使得沂蒙精神在全国得到进一步推广。

同时，相关荣誉也接踵而来。九间棚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在中央电视台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刘嘉坤作为特邀嘉宾出现在镜头前，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十四大代表、全国九届人大代表，九间棚党支部成了山东省和全国基层组织先进单位。

九间棚的声名远播，与1990年8月的莱西会议有极大的关系。莱西会议是党建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那次由中组部、民政部、团中央、妇联联合召开的会议上，宋平讲话时一连三次讲到九间棚，说着说着便激动地站了起来。团中央书记刘奇葆主持会议时，正好是村支书刘嘉坤发言。发言结束后，刘奇葆举起胳膊，大声说：“九间棚，了不起！”整个会场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下，浑身的血液似乎沸腾了起来。我把自己了解的信息一封又一封信写出来，寄给临沂地委书记王渭田，鼓励了他们宣传与推广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决心。

从1990年初到1992年前，九间棚成为中国农村影响最大的典型。《临沂大众报》在1989年12月12日刊登九间棚长篇通讯时，临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李祥栋配发一篇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评论，是“沂蒙精神”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因此，人们认为，沂蒙精神源自九间棚精神，是九间棚这个典型的发现与总结揭开了沂蒙精神宣传的序幕。以后，我跟踪、报道和研究沂蒙精神二十多年。

三、胡锦涛说，“你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

1994年9月11日，九间棚典型提出的四年后，我有机会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发生在山东威海飞往济南的飞机上。当时胡锦涛到威海参加全国党校会议后返回济南，我作为随行记者从文登大水泊机场同机返回。我们两人在飞机上谈论了30多分钟，一直谈到济南。谈话的重点内容，是对九间棚典型的认识、宣传和推广到抓典型的一系列问题。

当时胡锦涛独自在前舱，随行的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文全找到我，“你不是十一届团中央委员嘛，陪着老领导说说话吧”。他带着我来到前舱，向胡锦涛介绍：李锦是老团中央委员，新华社名记，搞了不少有影响的报道。胡锦涛笑着说：“知道，是名记。团中央委员中你是宣传战线的。”

李文全书记接着介绍说：“李锦抓了不少典型，万元户是他发现的，九间棚就是他写的。”胡锦涛点了点头：“知道，中央对这个典型很重视。”

我试探地问，“锦涛同志，您知道九间棚？”胡锦涛说：“是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庄，住在山顶上，四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山外相通。”我惊讶万分，这正是自己调查报告开头的一段话。胡锦涛说，“典型事迹要突出，有特点才有吸引力，要用事实讲话，生动形象，让人记得住。九柱擎天，九个党员嘛，还有山洞里九间石棚，就记得住。”

听取了对我对九间棚的汇报后，胡锦涛说：“九间棚这个典型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当时形势动荡，人心涣散，从九间棚这个典型身上反映了一种精神。那么小的一个小山村，在党支书带领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架上电，把路修上去了，把水引上山，事迹很感人。特别是在出现困难时，九个共产党员团结一心，干成那么多事，真是了不起。这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办事的好典型。”

陪同的省委领导告诉胡锦涛，我当时是带着被子、蚊帐和手电筒上的山，独自在村中先后住了52天，也不要人陪，就是一个人挨家逐户地走访，大人、小孩的名字都说得出，病在山上半个月，很艰苦。胡锦涛听后对我说，“你辛苦了”。他沉思良久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条路一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和基本的工作方法。”他说，“提高抓典型水平，关键在人。光靠写不行，要研究。发现和挖掘典型要花很大功夫，是个艰苦劳动。”胡锦涛仍能记起我以前调查研究的事迹，他说：“中央直属机关在1982年号召向你学习，就是因为你深入到农民中调查研究，搞了很多有影响的报道，对中央决策起了参考作用，为宣传三中全会立了功，当时让你当团中央委员，还安排向中央领导汇报。难得的是你这么多年一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了下来。”

讲到这里，胡锦涛问我山东还有什么好典型。我向他介绍了自己所跟踪的滨州“兴福现象”。胡锦涛听后说，观察一段，先放一放。7年后，我写出了反映新阶层可以入党的调查报告，胡锦涛做出长篇批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做结论了”。

当胡锦涛了解到九间棚这一典型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后，他高兴地说：“很好，典型就得在实践中行得通，群众接受，学了有效果”。他继续询问：“这个典型现在怎么样？有什么新发展？党员发挥作用怎么样？”我汇报了九间棚村下山办厂的情况后，他对我说，你熟悉这个典型，要注意跟踪，注意培养，有什么困难也要帮助解决，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进一步宣传。



1994年9月10日，胡锦涛听取我汇报农村党建调查情况时说“深入基层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下去”。

9月12日晚上9点多，在胡锦涛即将离山东之前，我到南郊宾馆送照片并为之送行。胡锦涛说，“你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以后有什么好典型，可以直接向我报告。”说完，又让在场的省委秘书马世忠为我们摄影留念。合影前，胡锦涛看到我的上衣有颗纽扣没有扣好，马上帮我扣好，这一瞬间被抓拍了下来。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深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记者和新闻事业关爱之情。

与胡锦涛在飞机上的谈话，气氛轻松而随意，时间不短，主题也相对集中。正是在这不经意的交谈中，可以窥见胡锦涛对典型的深刻理解，对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虽然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但是我对于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胡锦涛“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继续抓出好的典型，这一点，一辈子不要动摇”的嘱咐，我也一直铭记在心。

在九间棚后，我又挖掘出了“双星道路”、“兴福现象”、“中石化大明集团”、西藏“甲

日经验”、“拉啤模式”等重大典型。其中西藏甲日乡反分裂斗争中基层党建与兴福新阶层入党现象两个典型，胡锦涛分别批示“经验很好”、“值得关注”。两个典型表达的主题对西藏工作与新阶层入党工作的决策，都起到了智囊作用。

四、相信人民相信历史

九间棚调研的成功意义重大。在国家危难之时，它强调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凝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也为我接下来的工作开启了一扇大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出门就很少拿出照相机了。我觉得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复杂性，需要大批有志者投入研究并能够提出新思路，新闻图片常常难以在宏观上担此重任。在九间棚报道之前，我对这一点已有认识，之后，我犹如经历一次蜕变，离摄影愈来愈远，彻底地走向了国家走向现代化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我的新闻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

在到九间棚之前，我对于新闻获奖之类的名誉还是有热心的。而对九间棚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九间棚的推出在民族危难时刻发挥的巨大作用，让我理解了新闻记者的核心价值。从此我认定了一条，那就是新闻要有利于实践，有利于社会发展，不要硬做新闻，更不能追求获奖，要彻底从那个太具行帮特征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要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要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要有谏为苍生的责任感。

九间棚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轰动效应，也让我获得党组织与人民的信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专门接见我，认为“为宣传山东、宣传九间棚做出了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并让他的秘书孙清云记录整理作为文件下发。山东省委副书记高昌礼也亲自宴请我，称赞我说：“你为山东人民立了一大功，山东父老兄弟不会忘记你。”

沂蒙山的百姓向县委、地委请功，县委书记綦敦祥专门向地委书记汇报我的事迹，临沂地委在王渭田书记主持下进行讨论，决定在全区开展“学习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作风”的活动。地委副书记李祥栋给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打了30分钟的长途电话，转达沂蒙山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反应，新华社应该为有这样密切联系群众的记者而骄傲，并介绍临沂地委宣传部发出《向李锦同志学习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情况。

一个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学习外来记者的活动，这在中国新闻界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临沂地委宣传部的文件传至中宣部，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与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分别做出批示，要求开展学习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活动。《新闻出版报》派记者三度到沂蒙山区调查核实我调查研究的事迹，总编辑谢宏写出社论，把我作为新闻界一面旗帜进行宣传。

这时候风言风语出来了，压力转移到临沂地委。李祥栋是沂蒙山区当地人，是搞理论出身的，在宣传部几十年，1989年九间棚典型出来后，《临沂大众报》发表时配了评说。第一次提出“沂蒙精神”这个概念的就是李祥栋。他是个性格直爽的领导，当晚给南振中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李祥栋直言，学习你们的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记者在前方打仗，出生入死，老百姓都说他好，带来了老八路的作风，功劳很大，威信很高，可是有人却压制。异常谨慎的南振中一言不发，他相信沂蒙山区干部的反映，他更了解我。

不管怎样，在九间棚这块偏僻而贫瘠的小山村里，尝尽人情冷暖、世事不平的我付出了最真诚的情感、最艰辛的努力、最美好的时光，历经煎熬与考验，终于淬火重生。

在1990年，我连去九间棚村16次，帮助村里发展经济，排除困难。其后的几十年间，重返九间棚100多次，与九间棚、与沂蒙山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与九间棚的党委书记刘嘉坤亲如兄弟，情逾骨肉。为了九间棚的发展，做到尽心尽力，把自己的能力与真情都倾洒在这块土地之上。

李敬堂的《人民记者的崇高风范——记新华社记者李锦在沂蒙山区》一文记录了我与九间棚难以割舍的情感：

刘嘉坤与廉茂杰出差到了济南，李锦与夫人做了一桌子菜，两口子陪着劝酒劝菜。李锦领着他们到新华分社澡堂洗澡，还帮刘嘉坤擦背，让刘嘉坤很过意不去。

有时，村里人去多了，李锦家一屋子都是九间棚的农民，他们两口子强留着人家吃饭。逢上李锦不在家，他们家也是倒茶削苹果，很热情。

越深入群众，就越了解、越热爱群众，须臾不想分离，离开了则常常念叨。好几次离村时，农民一程一程送，直送出五六里。支书刘嘉坤眼泪盈眶，李锦也说不出话。常常走很远了，群众还站着不动身。而李锦应邀在山东教育学院讲社会主义理论课时，讲群众路线，讲九间棚的党员群众，边讲边流泪，大学生也泪流满面，台上台下情感交融，大学生们说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报告。

每次李锦早上离开济南，下午到县里，晚上就上山住在村子里，他一来，村里就开两委会议，与大伙交谈一两个小时，然后帮助分析，李锦成了不在编的“支委”。县里帮村里搞规划，李锦和大家一条一条研究，一研究就是一下午；村里遇到麻烦事，李锦就找县里领导和各部门谈；他还与山下村庄的干部交谈，帮助九间棚村疏通与周围村的关系。

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真情，让我在此后的岁月里时时都对九间棚心生牵挂。

第四章 觉醒：报道？还是发现？（1992—1995）



1993年，有人告诉我滨州地区的博兴县兴福镇出现了100个百万元户，报纸上还没有报道过。老板们开着小轿车，拿着大哥大，很神气。当时所有制问题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国家还没有肯定非公有制，当地干部称这里是“白区”。

县里胆小的干部都不敢去那里，怕将来解释不清。我一下子在这里住了28天。

第一节 探索双星道路

一、“李锦是来潜水的”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改革卸下计划经济枷锁，翩然前行。

在这历史性的转折年，我的双星调查与报道，成为市场经济初期的开路先锋。

1992年春天，87岁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个“南方谈话”，不但在政治上造成空前震动，也在经济上形成强大号召力。谈话指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上述宣言，自然对僵硬保守思潮是强烈反击。

随着“南方谈话”的传达，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走在市场经济前面的双星集团掌门人汪海。他说：别人是来“游泳”的，而他是“潜水”的，能沉到水底。会散了，记者们潮涌一般地散了，只有李锦老弟一个人在双星住了下来。

然而，对于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仍在争论，市场经济道路该如何走，当时并无先例。当绝大多数人还在围绕“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来到了青岛双星集团蹲点，在双星集团一下子住了42天，寻找破解这个难题的思路。

1992年春天，青岛双星集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企业管理经验。双星集团是一家以闯市场闻名一时的企业，它摒弃计划经济下企业只管生产、不顾销售、不问市场的旧观念，确立了“市场是企业的最高领导”的指导思想。1984年就以企业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和新产品订货会，开始全面进入市场。在双星集团发展史上，总裁汪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志愿军出身的他个性张扬果断，曾亲自背着鞋四处推销。在他的运营下，双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旅游鞋制造商。

新闻发布会当天，来了60多家新闻单位。那时，尽管“南方谈话”已经发表三个多月，但还没有人站出来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真正全党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争论，还是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后才兴起的。当时改革开放仍在姓“社”还是姓“资”之间徘徊，报纸上还没有出现像双星这种闯市场的典型，理论界也只是出现一些探讨性质的文章。

李宁的文章中记录下了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说的情景：

李锦是能为企业出大思路、拿大调查的人，他把双星作为调研基地，来了很多次。1988年优化劳动组合时便来采访，1992年“破三铁”时，他的双星报道在《经济日报》头版连载了6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春天的新闻发布会，来了60多家新闻单位。别人多是来“游泳”的，而他是“潜水”的，能沉到水底。会散了，记者们潮涌一般地散了，只有李锦老弟一个人在双星住了下来。

我此时担任采访室主任已有五年时间，当时分社社长是蔡名照，新华社最年轻的分社社长，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华社调查研究之风盛行时出名记者中算是最年轻的，一到任便从调查研究入手抓队伍建设。他鼓励我拿出打得响的东西，还特意嘱咐副社长杨凤山发挥我的作用。辞行时，蔡名照对我说：“你没有完成发稿任务的问题，有事便让杨凤山通知你，没有事便不要回来，蹲到基层调研去吧，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拿出新思路之时，也是你写大文章的时候。有事组织上自然会考虑你的，你放心。”蔡名照这个人，头脑异常清晰，眼界高，关心和爱护人才，注重发挥干部长处，其爱才之心，令我一直感念不已。

我去的时候带着《剩余价值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研究》等20多本书，还把1987年以来从报刊上剪下的400多篇关于经济体制论争的文章装贴起来，装了整整一箱子。汪海十分爽快，他对我说，双星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不管好的坏的，你都可以写。只要能给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怎么样解剖都行。双星人的热情给我创造了良好的调研条件，一住就是42天。

胡英暖在《发生在中央决定的70天前——记探索市场经济之路的记者李锦》一文记录了我在双星调查研究的情景：

春天，李锦带着一箱子书和材料，来到了双星。不要人陪同，自己在车间找人谈话。他白天搞调查，晚上整理完材料再看书，每天的睡眠也就四五个小时。

他多次参加双星的工作会议，也讲，也听，也记。一个女工提拔了，李锦四次到车间采访她，又跑很远到她的家中和她的婆婆交谈，人家说得落泪，他也跟着落泪。还有一个女工因写错一个字造成责任事故，李锦与她交谈了很久，分别找六七个人谈话，为这事用了整整一个上午。他需要的是生动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见多识广的双星人感到惊讶，一个新华社的大记者为一个小小的细节不厌其烦。在中国，当一个有饭吃的记者不难，但当一个有追求的记者却不易。如今找几份现成的材料带回去编稿的记者已经不算稀罕了，像李锦这样下大功夫做调查研究的反倒少见。双星的总经理汪海在大会上号召双星人学习李锦忘我工作争创一流的精神。

我一向认为，调查与理论研究都必须做到扎得下身子，沉得住气。沉到水底，摸清底细，才可能抓到鲜活的“大鱼”。在发表于《中国记者》的一篇文章里我曾写道：“出水要看两腿泥。深入群众抓第一手材料的能力，不仅影响我们研究成果与现实的距离，决定对实际工作的影响力，还将决定记者及时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记者只有接地气，才有勇气，才有灵气。

对于双星集团的调查研究，我正是采用的这种“笨功夫”的实践。从双星集团闯市场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种自发地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实践。然而当时对于双星集团所走的这条道路，更多的人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去理解，认识偏于狭隘。如何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去认识双星集团的实践，成为我思考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杨振武也留在双星进行调查，那时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已散去，杨振武在双星又住了一周时间，深入思索，反复琢磨，用心之深也是我在朝夕相处时亲眼看到的。当时，我们俩每天一起吃饭，饭后一起在海边散步一个小时。那时海边是一片荒滩，我们走到填海大坝的尽头再走回来，纵谈中国企业发展形势，交换在双星调查的看法。杨振武对我的蹲点调研深为感叹，并请我写出稿件后先给《人民日报》发一份。后来他收到我的稿件便将其发表在头版，看出两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之间同行相惜的情感。

二、总结出市场经济的模型

事实上，市场经济在中国民间早已暗流涌动，并非始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早在1982年，我调查的山东省商河县白集农民卖羊肉的事例，就发现了商品经济的萌芽。胡耀邦总书记还作出批示认为“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胡耀邦的这番话，尽管没有明确指出“许多问题”为何物，但极有可能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之萌动。

80年代中后期，我国曾掀起关于市场经济的论争。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提法，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1985年物价飞涨，通胀明显，中国经济“一放就乱”的老毛病重现。“商品经济”的提法，只能是改革岔道口前的折中选择。“企业主体改革派”的代表厉以宁与“整体协调改革派”的代表吴敬琏意见纷呈。198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一文，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一名词，但也只是学术性质的探讨。第二年消费低迷，企业大面积倒闭，改革路线之争再次跃上前台，“计划派”向商品经济发难。整个80年代后期都在计划与市场的博弈中度过。这些关于经济体制争论的文章，我都一篇篇剪下来，装订成册。我因为了解了市场经济兴起的历史曲折，后来才能更好地从现实中归纳出问题。有些人怀疑你怎么能敢于肯定这些新东西，口气太肯定了。其实我自己哪有这么多先见之明，很多是报纸上已经提出来过，我只不过是心里装这么多东西，平时好剪报而已，关键时刻用上了。

这次到双星，我还带了一本名为《生物全息学》的书，尝试着把双星集团作为经济改革的全息胚来分析，以回答当时争论很激烈的国企理论问题。

“生物全息胚学说”由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创立。这一理论告诉人们，一切动植物都是由全息胚组成的；全息胚都是整体发育的缩影，包含着生物整体的全部信息。

我将这一生物理论运用到典型的调查与研究当中，提出了“新闻全息胚论”。我觉得，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双星集团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全息胚，研究好了双星集团，就能为市场经济的道路开辟提供一个好的思路。把“双星”作为整个中国企业改革的胚胎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属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因素，然后推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内容与框架。在中央没有肯定市场经济、上级没有提出、报刊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我决心靠自己的调查研究完成这个课题，并系统地总结出典型经验，把双星集团作为第一个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模式推出来，以事实来回答当时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青岛双星集团开辟市场，到沂蒙山区的沂源县金星乡办企业，成批的山里妹子成为新一代双星职工。

调研过程中，我探索性地总结出双星集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三个阶段”、“建立产品销售等五大市场体系”、“以竞争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五大机制”和“全面换脑筋的二十项内容”等市场经济特征。双星集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以全员、全面、全过程的三方面转变为标志的。所谓“全员”，即“全员走向市场，人人参与竞争”，双星集团动员所有员工一切向市场看齐，一切围着市场转；全员走向市场，也加速了双星集团“原材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全面建设；而所谓“全过程”，就是从产品的生产、营销到售后服务等所有的企业工作都以市场为导向。

上述围绕市场而展开的工作，还要依赖一定的经营机制。所谓经营机制，是决定企业经营行为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主要指企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我在调查研究及学习理论著作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双星集团“以竞争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五大机制”：

双星集团是从五个方面创新，终而形成了新的经营机制的体系框架。

经营机制的创新。他们通过兼并联立，走上集团化经营之路，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要素配置。特别是销售机制由单向封闭的“计划—开发—生产—销售”机制转换为以市场为龙头，带动了向市场的全面转轨变型。

管理机制的创新。双星集团根据市场经济需要与企业特点，对企业内部配套改革的实

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最终形成“双星九九管理模式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哲学理论”，其基本特征是“借鉴国外的，继承传统的，创造自己的”。

领导机制的形成与创新。双星集团有一个以全国优秀企业家汪海为核心的决策层。他们这里从来没有过“中心”、“核心”的争论，都以市场为中心，形成万众一心奔市场的局面。

竞争激励机制的形成。以破除干部“铁交椅”为突破口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多能少的制度改革，使双星集团及时解决经营机制的核心问题，为其他机制的创新准备了条件。

约束机制的形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做到趋利避害，双星集团注意发挥部门预防风险的功能，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长期见效与短期见效的关系问题上，形成自我约束的能力。

上述内容是我在双星集团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其后20年间中国企业研究一直讲经营机制转换，实质上与我在1992年提出的框架是基本吻合的。

在这组调查稿收尾时，特意加上一句当时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的话，“双星道路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社会主义大有前途”。这个主题有归纳提升的作用。俞正声对调查做了较长批示。

7月25日，在双星调研一个多月后，我返回济南探家。刚刚回去，青岛支社社长张荣大就打来电话，说化工部部长顾秀莲从新华社请来王文杰、杨理科等工业报道名记去双星考察，短短几天内便写出了一组调查。

斜刺里杀出这样一支实力强悍的队伍，我有些措手不及。因为最后发稿都要走新华社内参这一绿色通道，这一行人来自北京，显然处于强势。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全国上下仍在争论不休，我原本还想调查一段时间，但“强者”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担心自己一段时间来的研究成果会付之东流，我被迫转变策略，抓紧赶制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型。

时值夏天，济南天气异常炎热，气温高达39度，坐着不动也会燥热难耐、大汗淋漓。7月26日这天夜里，我一口气写出了《市场经济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长篇访谈录。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依旧夜以继日地写作，连吃饭也顾不得，也没有胃口吃。爱人端来西瓜，我看也不看就往嘴里递，常把牙签吃到嘴里。为了抢时间，急得嘴唇上长满了泡，在高强度的写作状态下，我陆续写出了三万多字的调查报告、通讯特写与访谈录。

三、比十四大提前七十天

稿件完成时已是7月29日。

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三天三夜未合眼，但此时正处于极度亢奋中，毫无睡意。我找到分社副社长杨凤山，说自己要马上到北京去。社长特批让办公室新来的小姑娘党慧给我打字。直到1992年，新华社仍然是记者稿件自己抄写，然后用传真机发到北京，通常只有单位文件或社长写的材料才由打字员打字。

当晚，我便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到了北京，直奔二编室，找到主任张述忱。张述忱看了一下标题，便说，正需要，马上发。

7月31日晚上，发生了一点小摩擦。那天值班编辑在编发我的稿件时，将其中的“市场经济”一词一律改为了“市场竞争”。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体制，市场竞争是经营现象，这一改便把层次降低了，于是跟编辑争执起来。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肯定是市场经济体制。编辑反问，这是谁定的？市场竞争便是市场经济。我着急起来，说市场经济是个大概念，市场竞争是个小概念，二者怎能互换呢？然而无论我怎样解释，这位编辑丝毫不为所动。

一般情况下，记者必须对编辑高度尊重，不能过度坚持自己观点。可是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确实不是一回事。无奈之下，我当晚硬着头皮找到了张述忱家中。张述忱是新华社内参部门负责人，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业务干部，认识问题深刻而敏锐，稳健而厚重。对我的调研从来都是“高看一眼”。每次见面，我汇报不超过10分钟，他便拍板怎样上版面的问题，常常被安排在当天头条。

盛夏天热，人们纷纷在家乘凉，没有串门的，更没有因为工作找到家里的。我敲门，连声向张述忱道歉。看到我一头是汗，张述忱没有责怪。听完我的陈述，张述忱马上拿起电话给值班编辑打了个电话，这才将标题中“市场经济”一词保留下来。

我敢于以“市场经济体制”立意，在于当时自己的政治判断。江泽民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这一说法是取代“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天以后，邓小平表态：“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开始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作为十四大报告的主题。不出意外，果然反响巨大。

就在江泽民“6·9”讲话在社会上层引起关注之时，我的调研文章发表了。

1992年7月31日、8月1日，新华社4期内部报道分别以《背水决战，八年杀出一条生路》、《一切围绕市场转》、《重要的是形成新的机制》、《创新管理是一场革命》为题，系统地介绍了青岛双星集团公司开拓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

我的新闻生涯中最有特色的便是调查报告。通过典型的调研与经营过程，展示出新华社内参记者作为政府智囊的形象。新华社内参多是2200字以下的消息，而我的调研报告多是上下篇或几篇组成一个专题，是新华社当时少有的常发成组调查的记者。这是因为我的

报道总是与中国的一号主题相关，多了便得到编辑部的信任与倚重。

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此时正在大连休假，辽宁省委书记岳岐峰、《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前去看望。万里说，你们看看新华社的双星调查吧。万里认为，双星经验的总结是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说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市场经济中一个好的典型，应好好宣传，使人们增强信心。

范敬宜听后，立即赶赴济南，在南郊宾馆里听了我的汇报。范敬宜是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早期为《辽宁日报》记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农村改革初期，因写作《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引起轰动。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早已经认识。听完汇报后，范敬宜说：“双星是市场经济中最成熟的典型，也是最成功的报道。”《经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调查报告，并连载六天。之后，范敬宜又亲自编发了我的长篇通讯《汪海与双星事业》，在头版头条予以采用。首都新闻界在头条一般不采用新华社地方新闻的通稿，范敬宜的破例处理可见其胸襟与气度。从此，我与范敬宜多次联系，结下深厚友谊。范总去世后，我曾写出四篇文章悼念他，都在博客上发表了。

与此同时，国内诸多新闻媒体也纷纷刊载我的调查报告，如《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共计33家，136篇(次)。《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我的《双星在市场竞争中腾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9天在中午12点的黄金时间分播我的调查。中央电视台以我的调查为脚本，拍摄了6条专题片。连香港《大公报》都以大半个版面来刊登我的双星报道文章。

杨尚昆、李瑞环、朱镕基、姜春云等中央领导以及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等领导相继肯定了报道。朱镕基说，我看到内参上介绍双星经验，有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也认为，现在关键是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问题，怎样发挥好各种生产要素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益，“双星”经验值得推广。化工部部长顾秀莲把我请到自己家中，听取汇报并一再表示感谢。范敬宜甚至说，“搞调查研究，我们报社有个李锦就好了。”

一时间，“双星”似乎照遍中国。学习双星的活动也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山东分社采编室《“双星”道路典型调查在各界引起的强烈反响》一文记载：

辽宁省省长岳岐峰在看到内参后，带人专程来双星考察。他说，双星经验是令人佩服的，看现场后更觉得名不虚传。中国北方的企业都能做到双星这样就大有希望了。他认为辽宁学山东，首先要学双星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回到辽宁后，他数次在大会上介绍双星的经验。辽宁省各地先后有300多个企业来双星参观，不少单位还组织“学双星，找差距”的活动。

双星集团各部门仅向外界发放关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材料就达数万份。专程来双星参观学习的也络绎不绝，开始是化工系统业务部门来得多，现在已发展到由省长、市长和体改委主任带队，企业领导班子一起来。双星集团总经理汪海成了闯市场的英雄，受到很多人的尊崇。在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汪海的发言被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所打断。双星的产品也更加紧俏。尽管各分厂加快生产仍供不应求，春节前在济南和青岛市场买上一双双星高档旅游鞋也变得不是件容易的事。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山东分社的双星报道，先于十四大70天，提出了第一个国有大型企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模式，在全国新闻界第一个总结和推出市场经济典型的系统经验，同时用实践提出与回答了重大理论问题，为推动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鲁采的《显示出调查功夫与研究水平》一文便认为：“这组调查引起反响的主要原因是思想的超前性，较早提出市场经济的体制问题。当理论界仍然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时，而我们却已以第一手材料回答应该和必须‘下海’，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胜之路。理论界据此认为，新闻界为确立市场经济立了功。这充分显示出新闻‘用事实说话’的力量的探索性意义。”

四、调研者的“三重境界”

1994年，我的双星集团调查报告——《开拓市场经济的双星之路》，获第8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山东理论界的最高奖，也是山东省首次把理论界最高奖授予非专业研究人员。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锦良在全省理论界会议上，特地表扬我只身住在基层几十天进行蹲点的经历，并号召全省理论工作者学习这种深入改革一线的踏实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创新道路。

一个奔波在报道一线的记者获得专业性理论大奖，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引起议论。获奖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始终不满足于新闻事实的纯粹报道，总是志于探寻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规律。90年代，我提出新闻记者的“三重境界”说，表明这时我对记者有了新的眼界与诉求。

中国古代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受这种说法的启发，我在1994年完成“双星道路”、“兴福现象”调查后提出了新闻记者的“三重境界”说。我认为当记者有三个层次：刚参加工作时以捕捉与报道新闻信息为主；后来对报道事实力求入其里、求其质，以寻找角度提出观点为要；再后来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探求上，意在报道重要的新思想。当然，这三重境界常常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

新闻报道的目标，在于以新闻渠道传播理论观点，以理论思维提高新闻报道水平，走一条“发现思想，引领社会”的道路。

我还有一个典型调查报道的“五个一”工程理论，也是在双星调查后形成的。即一个典型要有一组探讨发展思路的调查报告、一篇推出人物的通讯、一篇阐释观点的人物访谈、一组表现现场的新闻照片、一篇开拓深度的理论文章。调查报告搭建了骨骼和框架，通讯特写勾勒了血脉与肌肉，人物访谈点击神经敏感部位，新闻照片活跃了眼睛等五官，理论文章亮出了头脑灵魂，这样几个东西都出来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便跳出来了。这一理论意在表达对一个典型要充分开发，调研成果要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挖掘，有个系统的思维。

一个优秀记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应该是“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主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众不同，恰恰是真知灼见，在最恰当的时候传播出去，影响社会、推动历史进步。”这是我在1994年提出的新闻人才的六条标准。这六条要素中，“比别人更早，问题最重要，报道最及时，社会影响最大”是根本性的，也是我个人奋斗目标的定位。

80年代初，我曾在新华社提出“新闻信息网”、“三级朋友网”、“第一个浪头新闻”、“上得天光，下接地气，以总书记的眼光、农民的心来思考”等一系列理论看法。90年代前期，我开始了第二次理论总结。新闻全息胚论、新闻记者的“三重境界”说、“五个一”工程、人才的六条标准论，这些不是教科书上得来的知识，而是在改革与新闻实践中提炼出的人生精华。

很多记者到了36岁便觉得走上顶峰，便无路可走了，发生转型现象，转行当官去了。其实这是个瓶颈阶段。我是从30岁后有一次总结，到了40岁后，确立了一些更高远的标准，只有到了这时候，也才能够提得出来。到了成熟期，再总结一次。我经历了30岁、40

岁、55岁三次大的总结，每次确立新的目标，寻找到新的动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第二节 发现“兴福现象”

一、被跟踪的神秘人

20世纪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解放了体制问题，便轮到所有制了。从1992年起，长期在政策反复间动荡的中国经济经过数年调整，逐渐驶上高速、健康、稳定的“黄金车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所有制问题，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

在中国，“私有”或“私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名词，私营经济也经历了由死到生的过程。1989年至1992年，私有制经济出现较大的回落和滑坡，私营企业大量歇业。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使私有制经济再度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那年秋天召开的十四大也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然而“补充”一词仍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私有制合法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经济前行的核心问题。

1993年，山东滨州市社联《渤海论坛》的编辑吴昀国来济南向我提供了一个新闻线索，说滨州地区的博兴县兴福镇出现了100个百万元户，报纸上还没有报道过。当时所有制问题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这些百万富翁都是个人创业，当地干部称这里是“白区”，“白区”是战争年代人们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称谓。县里胆小的干部都不敢去那里，怕将来解释不清。一个小镇出了100个百万元户，在山东乃至中国北方都是个奇迹。

这一年年底，天气正寒冷，吴昀国领着我到兴福镇转了两天。我觉得，市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能人经济，一个小镇出这么多能人，里面肯定大有文章可做。我决定再冒一次险。

1994年春天，我由济南直奔兴福镇。我是带着两个大问题到兴福镇来的，一个是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一个是所有制改革问题，到底该不该承认私营经济。

来到兴福镇的当晚，我住到了公路边的一家小旅馆，那是一间略显阴暗的简陋小屋，除去一张木架竹子床和一把椅子以外没有任何摆设，每个床位只要20元。在那里，我断断续续地住了48天，最长一次住了28天。这28天里，没有回济南，也没有到县城去过，一直在镇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先画了一张地图，标明每个村庄的具体位置，找准“白区”的中心位置，看哪里出“土匪”多。我找来一辆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逛。逛了没几天，就觉察到有人跟踪。原来我的出现引起了镇上的注意，镇领导特地派来农民通讯员王际灵来探查情况。后来镇委书记张英锋想要陪同我一起采访，我推辞道：“你一陪，我就不自由了，何况我要住几个月，你陪得起吗？”张书记被唬住了，但是他要求小王每天晚上向他汇报一次，以便了解我的行踪。

张书记提出要给我派一辆调研车，我说：“如果坐着小车进村，便听不到真话了。”就这样，我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兴福镇的每个村和每个企业，走访了300多家农户，光采访本就用了10多个。见到老人就喊大爷大娘，棉花怎么管理、小孩是否孝顺、亲家间能否合得来……在洪福园采访，我像村里人一样卷着煎饼大葱啃，大娘说，你可像俺庄户人哩。兴

三村60多岁的农民吉德昌与老伴拌嘴生了气，还从家里拿着花生米来找我唠嗑消气，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这一批70岁左右的老大娘随儿子进城后到镇上的洪福园种花，看护园林。她们说，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城市人。

陪同采访的通讯员王际灵，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他很聪明，学习很用心，耳闻目睹我的调查研究过程，进步很快，成了县委专职新闻干事。在《兴福作证——李锦是怎样开辟民营经济调研基地的》中他记载了我在兴福镇调研的情形：

李锦老师每天早上7点出门，下午6点回宾馆整理采访笔记，晚饭后步行到附近农户家中走访，晚上10点回家。一天工作15个小时，我觉得非常累，通常一觉就睡到天亮。而李老师头脑里装满问题，像不知道累似的。在兴福镇第4天晚上，小旅馆的老板忽然找我，说这位客人不自觉，每晚灯总亮大半夜。我婉转地将宾馆老板的意见转告了李锦老师，得知他每天晚上看《马列选集》和《资本论》，写东西都写到凌晨两点以后。旅馆老板很感动，说为公家的事这么卖命，真少见。

1994年初夏的一天晚上，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李锦老师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李老师爱人出差了，正上小学的女儿，就一个人在家，自己做饭吃。济南正下暴雨，家中窗户被狂风吹开后，女儿不敢关窗户，还说煤气罐漏气，屋里有煤气味，不敢点火做饭。他赶快打电话请邻居郝晓云照顾。接着又打电话给女儿哄着说：“爸爸有急事，过两天就回去。”我发现李老师打电话时眼里噙着泪。从4月28日到5月26日，李老师这次在兴福镇一住就是28天。济南离兴福镇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镇党委多次派车劝他回家看看，而他为了摸清情况，蹲在农村就是不回去。在这28天里，他从没打过一次牌，唱过一次歌，连博兴县城也没去过一次。他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调查研究中来了，心中哪有自己。

通过28天走访调查，我对于兴福镇的总体形势与兴福镇暴发户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

致的了解。

兴福镇位于山东滨州、东营、淄博三地市的交界处，战争年代，这里是国民党军队、日本人、土匪与八路军拉锯的地方，社会关系复杂。长期以来，这里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然而十四大召开一年多后，这个3.3万人的小镇却突然涌现出100多个百万元户，农村经济发展以每年57%的速度急剧上升，农民人均存款达2870元，居山东省乡镇最前列。

这个镇一直到1985年还是一个“鸡鸣听三县”的荒芜之所，不依山傍水，地下没资源优势，地上没有名优特产，不靠大城市，又没有国家的项目、资金启动，为什么比其他地方发展得快？是什么促成了兴福奇迹的产生？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在撞击着自己，一时间又说不出来。

走访过程中我了解到，兴福镇的突破来自闯市场的私营企业主。1983年，只有29岁的赵村农民王志华挑着担子到青岛替人家挨家逐户修蒸笼混饭吃，后来学会做铝笼。1984年秋后，他与王向云、王志水、王志温和王长明等人联合创办了兴福镇第一家蒸箱厂，接着王志华便大胆地与山东工业大学签下了第一份合同，承接了首批加工任务。接着赵马、兴福、南吴、付元、西毛、东秦、西秦也相继办起了蒸箱厂。到了1986年，王志华投入14000元，经半年多技术攻关，试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汽两用蒸箱，刚出手的60台很快销售一空，这项技术革新成果一下子带起50多户；接着他们又搞起电烤箱、冷冻箱……产品覆盖全国三十个省、市、区，并走向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

“一人富，数人跟，一群富，带全村。一业带多业，一村带多村”，正是这种连带效应使兴福镇86%的劳力搞家庭工业，50%的劳力从土地中走出来，专门从事二、三产业。兴福镇经济在发展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规律，即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全国市场为依托，主要原料与产品两头在外，以购销队伍为骨干，以“一户带全村，一村带多村”为形式的发展模式。如今，兴福镇的厨房设备有12大系列184个品种，在全国各城市开设了500多个厨房设备柜台，产量占全国厨房设备的三分之一，而成套厨房设备产量占全国的70%，是全国最大的厨房设备生产基地。

在兴福镇调查一个星期后，听说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在滨州检查春耕，我立即赶赴滨州市区。赵省长开完会，已是晚上10点钟，我向他汇报了半小时，请求他到兴福镇去看一看。当时在场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邵桂芳、副秘书长董昭和。董昭和在平原县王村店当公社书记时，我就曾去采访过。他向省长介绍，说我是山东改革开放的大功臣，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都表扬过。听了我的汇报，赵省长也感到十分惊讶，说从来没听说山东还有私营经济这么兴旺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赵省长就专程赶赴兴福镇。在那里，他走访了五、六户人家，最后在范曰光的展览室里写了“国兴民福”几个字。赵省长是从基层上来的，对下面情况熟，做事也有魄力。临走上车前，他对我说，兴福镇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发展市场经济，很有典型意义。但是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政府在这时干什么，还有个混合所有制问题，到底怎么混合，要回答好。你好好调查，如果确实有推广价值，回去后我们商量一下，看是不是能在全省宣传推广。

二、与市委书记密室长谈

赵志浩省长走后，滨州市委书记王道玉不断向县委打听我的行踪，到了调研的第24天，王书记派秘书小冯将我接到了滨州。晚饭由市委副书记黄学军、滨州市宣传部长贾玉忱、滨州市社联编辑吴昀国作陪。黄学军主抓农村工作，他对我的调研精神很佩服，对“兴福现象”态度也很明朗。晚饭后，王道玉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两个人关起门来谈起了国家的经济制度问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历届重要会议，都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束缚，为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有过一系列的建树，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经济定义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确立了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规划，并对“公有制为主体”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些都已触及到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解。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正面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私营经济问题时，便戛然而止，不再深入了。所有制已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障碍。当时已是十四大召开的一年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立思潮又起，所有制问题已经成为争论焦点。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只有私有化一条出路，只有个人利益最大化才有最大的积极性；反对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已实行市场经济，不能再朝后倒退，迈进私有制这道坎，社会主义就完了。而我则认为争吵无济于事，最要紧的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兴福镇所做的，便是找这样一条路。

调查中我千方百计想要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话题，可是又实在无法逃避。调查愈是深入便愈觉得要坦然地面对这个问题。

兴福镇曾经是私营经济极为发达的地方，或者说兴福的繁荣是建立在私营基础之上的，而兴福农民成功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当需要进行规模经营时，又向集体所有制靠拢。经过一个周期性循环，使他们明白，根子本来就不在所有制上，而是在经营方式上，要求变更所有制或害怕变革所有制，都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

看到了这一点，我对于所有制的思考变得清晰而深入起来。

通过兴福镇的调查，我回答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疑惑：一是提出混合所有制结构，在落后地区可以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私营经济是很有生命力的。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下来；二是提出所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可以找到与市场结合的实现形式，不同所有制可以采取同样的实现形式，同一种所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直接决定所有制的性质；三是可以把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结合起来。最后我得出结论：我们党要承认私有制的地位，在党的报告和宪法上要写出来。

听到这里，王道玉书记十分震惊。王书记是山东鄄城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博兴县湖滨公社，是从基层干起来的领导，很了解实情，为人又厚道，平时很谨慎。可是听过我的这一番分析后，他有点接受不了。他说，老李啊，你为我上了一堂党课。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山东不少领导说你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有大见识。我今天是开了眼了。不过，你研究的问题太大了，我一个小市委书记可担不起啊。

王道玉的话很客气，对我说了不少勉励的话，自然是感谢有加，可是让他承受太大的

政治风险，他实在受不了。滨州市在山东是穷地方，被称为欠发达地区。我的调查报告标题便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我的调查尽是在说民营经济，给人感觉只有民营经济才能发展。文章的结论是说民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王道玉关起门来与我谈话，便是想摸个底，定个调子。因为兴福镇在博兴被人称为“白区”，也叫“小台湾”，王道玉在博兴待了许多年，十分清楚。他见我到白区这么长时间，又是新华社记者，如果捅出娄子，出了大事，弄不好要犯政治错误。但他从内心里也觉得这条路子是对的。我跟王道玉讲，民营经济肯定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前没有这一条，以后肯定会加上，只有公有制是不行的，事实上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是宪法和理论上还没有承认。对于兴福经验，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果重点讲所有制，风险大一点。如果讲市场经济，没风险，但力度小一点。王道玉马上说，那就是市场经济吧。

我们最后商定，还是叫“兴福现象”，不能称“兴福道路”，或者“兴福方向”，那样就太出格了。“现象”这个词是中性的，提出来让上面定。他又提出来可以加“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这句话，把这个意思作为主调。我答应可以加上去，政企分开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与王道玉书记的谈话进行了7个小时，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两点。王书记体恤下属，十一点左右便让秘书小冯与服务员回去了。到深夜两点，钥匙开不了门，两人只好越墙而出。市委书记托着我的腋将我推上去，我再把市委书记拽上来。两个人上来后，同时观望四周，没有人看到，两人相视而笑。这次长谈画好了“兴福现象”系列活动的蓝图。省里由王道玉找省委书记姜春云、省长赵志浩汇报，请他们表态；北京由我发内参；市里则组织完善“兴福现象”经验，让黄学军组织人去北京请专家，组织研讨会，开展学习“兴福现象”活动。

在兴福镇调查期间，傅园管区书记赵秀明还向我介绍了一件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在官厂村，农民出于脱贫致富的愿望，把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建筑公司经理王树学选举为村委主任。因为王树学个人财产有100多万元，镇上不敢答应群众要求。于是40多名农民联名请愿，最后王树学获准任命为村委主任。听罢赵秀明的介绍，我专程赶赴官厂村调查，并写出题为《请市场经济先锋人物上台》的调查报告。我是这么写的：“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一笔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必将在21世纪初发挥巨大作用”。2001年，通过博兴县兴福镇24个私营企业主入党并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报道与分析，我提出“新阶层入党论”，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因此为自己招来一场猛烈的抨击，这便是后话了。

三、十五大报告的新修改

在与王道玉书记彻夜长谈后，我返回兴福镇。经过前后48天的调查采访，我完成了一组五篇共计两万余字的调查报告，以自己亲手调查来的材料为“兴福现象”背后的所有制理论提供了依据。重点稿件《欠发达地区农村改革的新思路》和兴福镇调查(一组三篇)刊出后引起反响。

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在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认为兴福的“真经”是抓住了人的要素，找到了农村发展的突破口，这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典型，是山东农村改革的新鲜经验，应当予以重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也认为这是个好典型，并批示责成省委副书记韩喜凯抓好这个典型的公开报道。1994年8月11日，姜春云在听取我汇报后专程至博兴调查，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个典型不仅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深化改革方面找到新思路，而且在基层党建方面有新的探索。”

刚刚搞完“兴福现象”，回到济南，我便接到省委通知，让我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调研。在飞机上，胡锦涛问我还有什么好典型时，我向他介绍了兴福镇。胡锦涛说：“这可作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典型，有特点。不过先要放一放，过一段再说。”

为了使这项报道形成规模效应，我在访谈录、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又完成包括长篇通讯、消息、评论员文章和一组照片在内的“六个一”工程，不同体裁的文字稿计达4万多字，照片24幅。我带着这一大堆材料，到北京找到南振中、范敬宜、徐光春等老熟人当面汇报。经新华社总社各编辑部发出后，为国内外报纸纷纷采用。

1994年11月7日至9日，一个规模大、层次高的“‘兴福现象’与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研讨会”在博兴召开，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农民日报社及山东省农委的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紧接着，滨州地委、行署又召开一次“滨州现象”研讨会。会议上，王道玉书记介绍了“兴福现象”的调研过程，称赞我为山东省的大手笔，北京的专家学者发言时也纷纷盛赞我在群众中调研的功夫，说了些鼓励的话。

这是滨州在建国后召开的理论层次最高的研讨会，当时市委副书记黄学军安排宣传部副部长庞允悌和研究室李延典到北京请到不少人。玉珏、刘伟、贾春峰、魏杰、范恒山、马建堂、艾云航、范照兵、郑秀满、叶光庆、马传栋等知名学者齐聚一堂，阵势浩大。

“兴福现象”的推出使兴福镇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内参首次推出后，从中央、省、地到县先后有13个部门派出工作组到兴福镇进行调查，从不同角度提交的调查报告就达16份，体改委、建委、农行、工商局等部门纷纷把兴福镇作为全国或全省试点单位。同时，学习兴福镇的活动迅速由滨州地区向山东省乃至全国各地展开。截至1994年11月底，来兴福镇参观取经的已有11个省的3万多人，既有来自政策研究部门的，也有乡镇干部，其中自费来参观的个体户就达4000多人。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将走向何处，人们期待着这次会议能作出明确的答复。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调整，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

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十五大报告还提出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把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从理论上回应了公有制完全可以和市场结合的难题。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五十年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以至于有人将其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我到兴福镇调查研究、总结出“兴福现象”，早于十五大三年。十五大的召开，终于回答了国人对于所有制问题的困惑，随着十五大对姓“公”姓“私”争论的终结，兴福镇再一次成为山东人的朝拜之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姜春云说：抓出好典型，一要靠典型自身硬，二要党委政府抓，三要靠高水平的记者与理论家。只有深入到事物内部才能抓住本质，讲起话来才有说服力。“九间棚沂蒙精神”与“兴福现象”都离不开李锦同志，他肯深入群众，也会深入群众。

实际上，从“兴福现象”开始，我就把兴福镇当作了自己的“思想实验区”，跟踪10年。通过兴福镇的实践，我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新闻记者老路，集政策探索、理论与研究与新闻报道于一身。此时，我已经学会运用献计献策直接参与典型培养、运用内参渠道参与政治、运用新闻媒体推广思想的做法。

1997年10月，十五大一结束，山东省委副书记韩喜凯就带领30多个厅级干部直奔博兴县兴福镇，研究兴福镇民营经济现象，以此作为对十五大精神的响应。此时的我，早已远赴西藏担任分社副社长，然而那次研讨会上，众人还是不由自主地说起我在兴福镇的深度调研，说了不少好话。

第三节 提出资本经营理论

一、国有企业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关键期。

从1984年起，尽管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破三铁”、利改税、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却持续恶化。1988年之前，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一般不超过20%，但是进入90年代初，国有企业出现了盈亏“三三制”，即明亏、虚盈实亏、盈利各占三分之一。随着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国有经济日益窘迫。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户已达40%，经济效益全局性下降，700万人停工，200万人下岗，3000万人成为“富余”职工，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就在这一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南下考察苏、沪、浙三省市，6月又北上考察黑、吉、辽三省。两次紧锣密鼓的出行，阵容庞大，似乎把企业改革推到了改革舞台的中心。然而企业改革到底要走什么路，上面对此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思路。

此时，计划经济思想与社会上“左”的思潮纠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暗流。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会造成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社会主义前途面临安全问题。经济界“左”的思想不像思想理论界那么露骨，但其影响力更大，破坏性更大。刚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市场经济庸俗化的挑战和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强力反扑。我到了总社国内部经济室，编辑吴锦才说，总编室传达下来的口径是“只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其他不要宣传”，命令式的口吻使我的心一下子沉到底，恰恰激起我的一种逆反情绪。我个人感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面临第一场“颠覆”，虽然报端并没有这么讲，但我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收”了。

从宏观上看，中国需要继续回答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怎样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是什么。从微观上看，1995年的形势需要回答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国有资产能不能流动，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实践问题。如果找到突破口，便风流云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晴朗的天；如果找不到突破口，乌云聚集，更多的乌云会翻滚而来。

正在此时，胜利油田大明集团正遍寻调研高手，大明的人通过东营电视台的刘勇请我来调研。

当时，胜利油田管理局对大明集团非常重视，在资源上提供支持，大明成为胜利油田的一面旗帜，在全国石油战线也有点影响。大明集团请我的目的是为上市树立品牌形象。当时对上市公司指标控制十分严格，1995年，山东省只有两个指标，意图上市的企业不下于100家，竞争十分激烈。在全国石油系统还没有一家上市的情形下，大明集团被胜利油田推到了前台，具备了竞争优势。但在山东，名牌企业很多，关系也很多。这种情况下，大明集团上市遇到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需要树立形象，形成优势。

大明集团的前身是以胜利油田待业青年与富余职工为主体组成的劳动服务公司。1993年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后，仅仅经过两年时间，集团利税即达5581万元，税后利润达4111万元，分别相当于两年前的8.9倍和9.8倍，全员人均税后利润是两年前的15倍，净资产增加15倍。在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普遍状况下，堪称一枝独秀，显然具有调研价值。

为摸清企业的情况，在大明集团的几十天里，我调查了17个企业，走访了200多人。企业领导班子的11个人，我一个一个谈过去，每个人单独谈半天，就用了6天。听说有个叫董玲的落聘女工对领导有意见，我也不亮身份，找上门一聊就是半天，采访记录写了几十页。

“观千剑而后识器”，是提出新思想的重要途径。除了调研，我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季明的《一个重大经济理论的发现与提出——记李锦在大明集团提出资本经营理论》一文，记录了我当时学习与研究的状态：

5月31日晚，李锦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查，我与他住在一个房间。到夜间12点我便睡了，他仍在看书。快天亮了，我上卫生间推门一看，李锦正坐在马桶上捧着厚厚的《资本论》在学习。宽大的洗漱台上摊开《管理新潮》、《资本实证论》等几本书，书边沿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他划的标志与批注。

原来，他怕灯亮着影响别人睡眠，便到卫生间看。我看了，感到一种极大的震动。他说：现在企业改革进入深层次，对马克思讲的资本价值要认真领会与研究，不仅要研究原著，还要研究西方现代经济学新著，结合市场经济新实践，解决好企业发展中的难题。他住在企业调查，从济南带来包括《资本论》、《邓小平文选》在内的20多本经济理论书籍，把房间的窗台摆满了。白天搞调查，晚上学习与啃书本。学一会儿，写一会儿，一夜写到天亮。据我所知，油田有三个人与他住过一个房间，都说他一夜学到天亮。

调查中，我两次推翻了自己设定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富余职工的奋起”，反映国有企业的困境，这与传统的新华社口径相吻合；第二个主题是“投资回报率”，反映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这与中石化的口径相吻合。思前想后，我觉得两个主题都不能最恰当地表达出大明集团的特点来。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国家的迫切需要。但集团公司希望能以投资回报率为主题，因为这样更能凸显出企业形象来，为此我与总裁还僵持了一段时间。他请我吃饭，饭桌上说我们请您来，是为我们说话的。我含蓄地与他开玩笑，我得先考虑国家，再考虑你们集团，最后也把我新闻需要考虑进去，你不着急，我们商量着来，最后是三者都满意。我们来个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他也笑了，说我们相信你，这算是沟通吧。

正当我为报道的主题踌躇难定时，大明集团一条花岗岩切割生产线给我带来了灵感。

1993年冬，大明石油新技术开发公司制造出多条花岗石切割生产线。没想到，一部机器的试制成功引发了大明集团的资本经营结构革命。

当时大明集团准备办石材公司，需要花岗石切割生产线，若从国外引进，每条需200万美元，这对大明集团来说，几乎是倾家荡产的一掷。年轻的总工程师张鑫奉命很快拿出制造方案，开支不到400万元，价格仅占引进设备的1/8。

然而，建造这条生产线并没少花功夫，仅图纸就画了2000多张，叠起来有1米高，技术涉及自动化、机械、液压、焊接等多门学科。张鑫请12位教授与高工分头设计，并分别在6处工厂加工，最后借用机修总厂的大车间组装试车，设备材料也多是利用闲置的材料。当决策者们来到近百米长的钢铁长龙面前，很多人不相信这是大明人自己干的。

张鑫干过车工，懂生产流程，知道怎样又省料又快速；干过技术员，上过大学，会搞开发设计；干过总经理，会经营。他把人生经验也当做资本配置到花岗石切割生产流程各个环节，他这个总工程师实际上是资本总配置师。从工程师张鑫的一条生产线的成功中，我确认了资本组合而增值的规律，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意，也破解了资产不能流动的难题，

我高兴地对陪同的大明集团党群部刘彦华说，“找到钥匙了！”这天的午饭吃了四个小时，两人边吃边讨论，在饭桌上把这个主题敲定下来。

由这条生产线反观整个大明集团，资本因合理流动与配置，岂不正是其一枝独秀的原因所在？我顿时豁然开朗。就这样，我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词汇——“资本”狭路相逢了。

二、钻入《资本论》

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这是我在大明集团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

与以往报道不同的是，我的这次调查首先是以理论新发现引起全国关注的。这样总结，首先便遇到一个巨大的拦路虎，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马克思对“资本”所下的经典定义。他把资本家当成一种物化的资本，揭示的是资本的社会属性。在1995年前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我们都找不出“资本”这个词。如果有的话，是作为政治词汇“资本家”、“资本主义”出现的。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经济观》收录了中国最著名的100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论文，这套长达120万字的丛书，有厚厚的五大卷，我一篇一篇读过去，竟找不出一篇与资本相关的论文。所有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回避了“资本”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块基石，没有人敢去碰撞这一官方认可的结论。

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破解马克思的另一些话，对于再生产和总生产进行分析的《资本论》的第二、三卷，马克思不仅承认了资本的社会属性，也承认其自然属性。而我们的习惯思维则过于关注资本的社会属性，忽略其自然属性，甚至用其社会属性取代其自然属性，这就使得资本在我国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资本的社会属性是资本归谁所有的问题，而资本的自然属性则是资本一定要实现价值增值的问题。资本不管归谁所有，在谁手中，就其本质而言，它都要实现其价值的增值，否则它就不成为资本。而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表明，人们之所以要在资本的归属问题上费尽心力，就在于资本是可以带来增值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的社会属性是由资本的自然属性决定的。

基于以上思考，我“胆大妄为”地重新定义了“资本”一词：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也就是说把剩余价值的解释摒弃了。

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小改动，在90年代是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资本虽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这样的改变绝不只是一般的理论是非之争，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创新的核心问题。

通过大明集团资本流动的情况，我想告诉人们：一、资本是一种价值形态，不仅是资金；二、资本能增值；三、资本需要运动。资产是“死”的，死的放在那里就会消失，而资本是“活”的，活的就能增值。四、产权也要流动。有了资本的思想，就得想办法增值，就得突破所有制与产业结构的限制，就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企业改革向最深处推进。

山东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臧旭恒认为：

李锦先生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界定能不能修改？他认为可以把“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改成“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这犹如一声霹雳，令人震惊。对资本的定义来自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马克思在这部鸿篇巨制中对资本作了深刻剖析。资本加上“主义”二字就是资本主义，特指一种社会制度，加上“家”一字就成了资本家，特指一个阶级。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长期回避的概念，提起“资本”一词，大家知道便是“资本金”。

一直到1995年，“资本”仍然是令理论家噤若寒蝉的名词，国家主流大报均延续旧见。我记忆深刻的是《经济日报》头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资本经营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资本便是资本金。我看后，既失望又兴奋。失望的是主流媒体的后知后觉，兴奋的是自己的研究具备开创意义，有种时不我待的兴奋感，下决心以最快速度将理论难题攻克。

在重新定义“资本”一词的基础上，我对“资本经营”的含义作了界定：

资本经营是指围绕资本保值增值进行经营管理，把资本收益作为管理的核心，实现资本盈利能力最大化。通过流动、收购、兼并、战略联盟、股份回购、企业分立、资产剥离、资产重组、破产重组、债转股、租赁经营、托管经营、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等各种途径优化配置，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和效益，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方式。

我以马克思“资本是一种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的思想为起点，对资本经营的特征、内涵、内容、运行特点、基本原则、意义、理论价值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索性地建构起系统的理论体系，并特别强调了资本经营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按照这种理解，资产能否流动起来，是国有企业搞活的根本标志。目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且逐年下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万亿元的存量资产难以流动，滞死在那里。现在国有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如资金不足、三角债、企业开工不足、资源闲置等，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国有资产的流动实质是产权的流动，资本经营思想的确立不仅将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商品市场，还将推动其走向生产要素市场与产权市场，加速产权的流动。企业的资金、资产和资源将被视作能够增值的价值进入流通领域，一个企业可以收买另一个企业，资本在市场上自由出入。资本经营不仅是产权制度的基础环节，也是产权的实现过程与途径，将推动企业彻底走向市场，使得企业经营机制真正地得到转换，使国有经济的活力焕发出来。我的这篇《资本经营试论》，长达一万八千字，最后都收入我的《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一书。

诸多学者、专家也关注并肯定了这个经济学的新思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到山东讲课时，我摸到他房间，向他汇报情况。一开始吴敬琏盯着我看说：“资本就是资本金呀。”

我解释说：“马克思本来就是讲的价值形态，后来才变化的呀。”

吴敬琏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我说道：“资本这个词在1956年之后便没有再碰了，也不能碰了。”

我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我的经济观》中，100位经济学家都没有人碰这个事，实际上是政治上怕出事。”

吴敬琏提醒道：“也是出过事的。”那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吴敬琏因为第二天还要爬泰山，便说，你这个调查与文章我带回去看看吧。

在这之前，我与吴敬琏并没有见过面。当我拿着《资本经营试论》摸到吴敬琏房间时，吴敬琏只是瞥了一眼标题，便说，现在年轻人总是爱提新概念。一下子浇了一盆凉水。晚上十点，当我带着吴敬琏已经出版的三本书又前去拜见时，吴敬琏看到书上划满条条杠杠，也说“我已写了4本书，你买了3本”。大概是出于好感，便认真与我谈了起来，讲起自己当年提出市场经济的过程，一讲便是一个多小时。第二天下午，吴敬琏爬完泰山便从泰安坐车返京。陪同的省体改委的夏季亭把材料带了回来，说吴老在我走后很认真地看了一遍，晚上看到很晚，并说像李锦这样的记者很少看到。吴敬琏在调查上批注，认

为“借鉴意义大，道理也讲得朴实明白”，认为资本经营把重点放在资本运行结构上，把企业当作资本增值的机器来看，这个说法是透彻的。

中国社科院工业所研究员陈乃醒也高度评价了资本经营理论，认为这是经济学研究的成果，突破了资本仅仅为资金的概念，使资本从财务分析现象中走出来，成为新的管理思想，从产品经营到商品经营再到资本经营，是企业管理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资本论》的研究者王珏的观点竟与自己十分相近。我把论文与调查报告寄给他，他在回信中认为是个突破。

分社老记者杨凤山与我一贯谈得来，常在一起交流业务，这时候是分管业务的副社长，他为我出了个主意，你这次调研的课题理论性太强，最好把上述几位的评价整理成文，给新华社编辑部及各级领导附上一份。我照此做了，两篇理论性很强的调查很快被上呈中央。

三、“资本”一词写入十五大报告

调查第56天，我拿出了调查报告《资本经营试论》，在文中我写道：“资本经营的提出是一场思想革命”。

资本经营是我国经济管理思想继产品经营、商品经营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催生的新理论。资本经营也是当代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首要的实践课题。研究这个问题，意义极其重大。

如同卞和献玉般，怀着发现新理论的激动之情，我带着稿件赶赴京城。逐一造访《人民日报》的范敬宜、新华社的南振中、《光明日报》的徐光春与《经济日报》的杨尚德等总编。他们表现出对晚生的热情与关心，然而却委婉地告诉我，国家正规的宣传口径是“只宣传国有资产不流失，不要提新口号”，这是一位副总理说的话。在通常公开发稿的主流渠道，我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同。

我没有让领导与师长们为难，转而投向南方各报。在公开报道中，大明集团的调查报告首先刊登在了南方报刊上。四川当时的《厂长经理日报》以新锐、大胆、敢于揭露矛盾而著称，在中国企业界影响极大。这份报纸以5个头版头条报道了我的调查报告，使资本经营报道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当中国新闻界“只讲管理上堵漏洞”，形成“舆论一律”时，他们借资本经营报道撕开一道缺口，使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质得以弘扬。



这是我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研期间写下的调研日记。我在这个企业记了20万字的笔记。最后稍加整理出版了《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一书。这样的日记，我手中有几百本。

随后，调查报告由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上海、无锡、济南、北京，一路北上，形成连续冲击。16家报刊以24个头版头条转载。其中有《经济参考报》、《社会科学报》、《中国信息报》、《中国经营报》等8家报刊发表我代拟的评论员文章，形成了一定气候。我精心准备的“北伐”策略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各家新闻

单位纷纷向我约稿。同时，我的讲座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照片为海外几十家报纸刊发。《人民日报》也在短期内连续3次刊登大明资本经营的报道，图片由范敬宜总编辑亲自处理，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

资本经营的这种报道规模，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企业调查报告在短期内被媒体采用的最强势头之一，全国范围内也由此掀起了一场资本经营的热潮。如果说双星集团的调查形成气候，有着十四大这个政治背景，是顺势而为；而资本经营的调查则是逆势而为。从此，我的理论勇气便不可遏止地张扬开了。

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在调查上作了批示，又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彼时恰逢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考察山东企业改革情况。吴邦国是分管工业的副总理，他到山东调查就是为了突破目前这一困境。10月12日晚，当赵志浩书记与我一起向他送交调查时，吴邦国称我的调查报告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当赵志浩介绍我为搞调查在企业住50多天时，吴邦国欠身与我握了握手说“你为企业改革与发展下这么大力气，感谢你了。”

1995年9月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响亮地提出了“两个转变”，即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整个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基调，一时间主导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国有资产流失论”、“堵漏洞论”销声匿迹。两年后，十五大第一次把“资本”一词写入党的政治报告。

1997年1月开始，由经济学者阐述资本经营理论的著作接连问世。从1997年至1999年，中国经济书籍中最为热销的便是资本经营。

经济学家赵锋的《资本经营研究“第一人”——评李锦对资本经营理论的探索》一文认为：

当我们翻看这些关于资本经营理论书籍以后，便可以得出结论，李锦是中国提出资本经营理论“第一人”。他创建了这个理论体系，树立了这面旗帜，不仅在时间上、在空间上，而且在社会效果上也都是无人可比的。

在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统的国家，一个记者以斩钉截铁的明确语言，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新见解，解放“资本”这一重要词汇，且成果为理论界逐步接受，引发中国的资本经营理论热潮，使得理论界很多人感到惊诧。这个理论怎么是一个记者提出来的？山东大学教授臧旭恒认为，“李锦有生活，接地气，有底气，了解当前的紧迫需要，他能够把最深奥的东西看得简单，把很强的新闻敏感运用到理论发现中，这恰恰是理论家所缺少的。”实际上，自此开始，“发现思想，引领社会”成为了我的座右铭与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当时分社的年轻记者多是我的崇拜者。我每一篇调查还未出来，他们便要打听有什么新观点。这一次，知道我的做法后，记者王洪峰提醒我，“资本”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词之改，地动山摇，会让“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味道全都发生变化，你要有坐牢的思想准备。我不是不知道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但国家在实践与理论上的迫切需求让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主见。我觉得，每个时代都需要甘为真理献身的勇士。马克思本人也是新闻记者出身，他随着实践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从1844年以后才专注于经济学研究，他的成功在于不断创新与突破。

幸运的是直到最后，这种担忧也没有成为现实。然而，我的理论探索勇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也使得自己的发展常踏入荆棘与陷阱。

第四节 中央领导的调研随行记者

一、乔石的《倾听》

20世纪90年代，我的新闻生命进入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这一阶段，既是由调研记者向学者的过渡阶段，又是由新闻记者向智囊记者的过渡阶段。这两个阶段几乎是重叠的，互相支撑，并行不悖。1989年九间棚典型的推出是转折点，之后我的调研作品接连出来，从双星集团、“兴福现象”到大明集团，影响都比较大，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你笔下的每个典型都能引起轰动？

几年间，我长期蛰伏于民间，深入到乡野基层去做实地考察。长期在外，不回济南，已是常事。我自己还总结了两个“不是”：不是单位开会不回去，不是中央领导来不回去。第二个“不是”，道出了我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作为新华社随行记者陪同中央领导下乡调研。我的调查研究之所以屡屡中的，与我这一时期独特的工作状态大有关联。

1987年4月担任山东分社摄影部主任之后，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中央领导到山东来，基本上随行记者这一角色都为我所担当。中央领导到基层都希望轻车简从，随从人员要少而精。一般一位中央领导到基层，山东方面会派遣三四名随行记者。新华社山东分社派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随同前往。8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从单纯的图片报道转向一手抓文字，一手抓摄影。这一时期，我撰写的《新春佳节夸支部》、《灾区观门联》、《喜听农民夸麦收》等新闻稿件，常常以小见大，注意揭示出小事背后的时代变迁。山东分社领导便让我既负责图片报道，也负责文字报道。这样每次中央领导来山东调研，分社派我一人前往便可，这在山东分社，可以说是首开先例的。

那几年，我随同胡锦涛、朱镕基、彭真、李鹏、宋平、乔石、吴邦国、万里、田纪云、邹家华等众多国家领导人到基层调研。我为乔石拍摄的一幅照片，以及围绕这幅照片所发生的故事，可以看出中央领导的信任与器重。

《倾听》的照片，是1991年1月我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到沂蒙山区调查时拍摄的。当时，乔石到一位年迈的老大娘家里去走访。因为屋子太小，门也太窄，随同人员进不去，只有我一人快步走进屋内。乔石进屋后，大娘只顾得跟领导说话，也没顾得让座。老大娘坐在床头，跟站在一旁的乔石兴致勃勃讲起话来。我迅速按下快门，抓拍下了这一幕。这幅照片，以现场抓取展现出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的亲密情感，是我所拍摄的领导人照片中的得意之作。

图片的前景是农村常用的水瓶和两只碗。乔石与老大娘位于中景，且老大娘位于乔石的前面，突出了群众的主人地位。站着的乔石，头微微向老大娘倾斜，而老大娘则坐在床头，头稍稍仰起，形成呼应关系。照片中乔石所代表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的形象”，而人民群众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基础，领导立于群众之侧，专心倾听群众呼声，构图将党群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人物形象上看，图片中的乔石与老大娘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乔石穿戴整齐，显出倾听状，表情认真而严肃；老大娘穿着棉袄，仰起的脖子与虚化的手将她滔滔不绝的倾诉状态表露出来，无拘无束，生动自然。两人一动一静，一站一坐，对比鲜明又彼此呼应，完成了“倾听”这一主题的表现。从光线上看，整幅图片以暖色调为主，给人以温暖、亲切之感。从细节上看，前景中的水瓶与瓷碗，是农村用来喝水的器具，表现出“到群众中去”的生活现场。尤其注意的是后景中墙上所挂的绘有红色五角星

的喇叭，象征着党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幅图片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与升华。党的声音从哪里来，是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后发出的。

有人问起这幅图片的意境时，我觉得，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起家法宝，也是党中央非常重视的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共产党的认识路线与工作路线。党的干部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声音，按照群众的意愿，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能够永葆生命的保证，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显然，这个典型瞬间的抓取，倾注了我对群众路线的理解。

乔石同志对这幅图片表示满意。1995年8月，他一到山东便要见我，在泰山上，他与夫人郁文说起我拍摄的照片，连声称赞，说我抓拍得好，有思想。那一阶段，乔石到山东5次，都是我随同调研。

2004年，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要为乔石作一幅肖像画，乔石想到了这一幅照片。他特地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请把这一幅图片再寄一份给他。这时距离拍摄这幅照片已经14年，乔石还能清楚地记得这幅照片，可见他对这幅照片的印象是很深的。

二、感受领导的思维

由于从1981年到1996年的十多年间，我经常与处在权力中心的人物接触，得以思考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战略。我发现，领导人总是带着问题下来的，他们在例行公事视察或参加活动后，总是要转一转，想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或者是宏观经济，或者是农村发展，或者是企业改革，或者是党的建设。领导问什么、怎么问、关注什么，我细心地分辨着，也记录着。领导的内部讲话，我总是很快整理出来，通过新华社内部刊物供各级干部参考。

这些领导人中，处事方式上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要数朱镕基了。朱镕基向来以雷厉风行、敢说敢做、个性爱憎分明著称。一次，我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他考察山东棉花种植情况，地方领导在致欢迎词时说了一句“欢迎总理来视察工作”，朱镕基立刻打断讲话，纠正道：“不要叫我总理，我是副总理。”一位县长在汇报工作时，拿着稿件读，刚念了两三句，便被朱镕基打断：“把稿子放下，别说那些虚的，都是废话！”其强悍与严厉可见一斑。

而朱镕基为我修改稿件一事，更让我对其不说虚话、套话，只说实话的性格深有感触。撰写新闻稿时，我按照常规的写作套路写道：“朱镕基同志考察山东时强调指出，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放在突出地位……”，朱镕基大笔一挥，将我的新闻稿里的套话删完，导语里只留下一句话：“朱镕基同志考察山东时强调指出，国家需要棉花，鼓励农民多种棉花。”一句话，简单扼要，实实在在。此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自己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已经是老记者了，对领导的研究这么不到位？心中不安。一人一个面，思维与表达方式也不同，要研究深透，把握精准。

有时领导人到下面考察，极少讲话。有些单位新闻记者写不出新闻稿，回去无法交差，急得要命。我则不慌不忙，总是能在领导离开前拿出报道，领导同志也总是一次通过，在我的稿件上签字同意发表。省里一些领导感到诧异，不知道我是什么时间与领导谈话的。我说，没有谈过话，我知道每个人心里想什么，这时候国家需要他说些什么新话。每位领导人到来前，我总是要把这位领导人的所有讲话找出来研究分析，分析他的思想倾向与讲话风格，并与当前国情和地方的地情结合起来，分析领导人说什么话是最适宜的。时长日久，我的思路总是十拿九稳，得到领导首肯。

为了全面掌握领导人的信息与思想观点，我特地把中央20多位政治局委员的每篇讲话都从报纸上剪下来，一篇也不敢落下。领导讲话精神是40多本，平时无事时，我便一本一本翻开研究，一个字一个字读过去，努力寻找彼此间不同，从中发现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不断做出自己的判断与分析。我整理的历届领导的讲话剪贴有80多本。经济类如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县域经济、金融形势等；政治类如政治文明、组织创新、党建、群众路线、新阶层入党、民主选举、廉政建设等等。自进入新华社工作后，我整理的各种剪贴本达400多本，堆起来能一直到天花板。后来有了电脑，信息搜集容易多了，我把分类整理信息的方法移用到网络搜集上来，这个方法笨一点，但是很管用。那400多本剪贴能占半个屋子，我一直没舍得扔掉。

刚进新华社，老同志们总是说“吃透两头”，经过20多年我觉得这不仅是经验，而且是规律。吃透中间容易，吃透“最上头”与“最下头”，并不是容易的事，只有扑得身子，到老百姓中去，才能接地气，讲话有底气，看事有胆气，写稿有灵气。连续10多年的基层蹲点调研与随同最高层领导调研，这是不可多得的条件，这是老天对我的恩赐。我感谢这个时

代，也感谢新华社为我创造的条件，使我不断走向新的高度、新的深度。

第五章 亢奋：与达赖分裂势力较量的日日夜夜 (1996—2000)



1996年6月，我远赴西藏，担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

一到西藏，我就带着背包铺盖住到甲日村，自己起火做饭，挨家逐户走访，掌握达赖分裂势力在农牧区活动的第一手材料，提出应对策略。时任西藏区党委书记的陈奎元赞许“为区党委理清了思路”。

第一节 感受分裂势力的阴影

一、拉萨的另一面

西藏，在许多人心目中，是神秘、纯净、信仰的代名词。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人潮涌动的八廓街、香火不息的大昭寺、蔚蓝如洗的神湖那木措、磕长头的信徒、迎风摇动的风马旗、纯蓝的天空……让无数人心生向往。

西藏又是一块局势复杂的土地。

长期以来，西藏是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与分化中国的一张王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达赖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披着宗教外衣，不断组织分裂主义力量，阴谋搞乱西藏，分裂祖国。分裂势力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极少数本应是佛教净地的寺院变成了他们的藏污纳垢之所和策划分裂活动的据点。1995年，达赖集团公然反对金瓶掣签，在活佛转世一事上掀起波澜，美丽的雪域高原又一次为世界所瞩目。

风云聚拢，暗潮汹涌，形势波谲云诡。

1996年5月8日，我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座谈会。这一年中央决定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从元月起，山东分社便组织小分队做深度调研，总社让我们来作主题发言。会议期间，总社人事局岳春茂找我谈话说上级要将我派去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副社长时，顿时愣住了。郭超人社长、夏赞忠、南振中副社长分别与我谈话，都称要“选一个有思想，能力强，肯吃苦，去就能打开局面的干部”，夏赞忠对我说：“我们从几个人中选，对你寄予厚望”。

我离家26年，仍然说着一口地道的盐城话。领导们很会找话题，说盐城出了胡乔木、乔冠华，都为新华社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他们是从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干出来的。显然，他们是在不经意的闲谈中以家乡先辈来鼓励和鞭策我。我离开家乡后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不管如何，都没有后退过，没有说半个“不”字，当即向领导表态，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郭超人社长问：“有什么个人要求？”我只说了一句话：“有人告状，你们一定要在我调查后再表态。”对此，我是有过深刻教训的。郭超人盯着我望了一会儿，不解其意，只是说了句“只要你努力干”。

6月7日，我同帮我安排起居的妻子出发了，经成都登上去拉萨的飞机。飞机离开成都不久，便见到一片雪山，一片又一片，连绵不绝。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类型复杂，垂直变化大，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刚一进藏，恶劣的气候条件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第一天，我到半夜也没睡着，翻来覆去，直到天亮。第二天吃饭时，饭菜吃在嘴里味如嚼蜡。当地藏族同事说，在西藏有三个一样，“吃饱 and 没吃饱一个样，睡着 and 没睡着一个样，有病 and 没病一个样”，意思是说，缺氧使人食无滋味，睡无感觉，始终像处于病态。办公室在二楼，爬台阶时，我上了一级，便感觉胸闷、头疼，猛烈地喘着粗气；上了三五个台阶，便停下来，喘着长长的粗气。藏族同事们都上楼，进了办公室，我还没到二楼。进了办公室，坐在桌子前，不一会就头疼欲裂，只好用毛巾把头扎起来。第三、第四天是最难受的时候，我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白天写稿只能一个小时，时间一长头脑

便昏昏沉沉，只好用两个手指不停地按着太阳穴。心想，如果有一根铁条箍着脑袋就好了。猛然间想起西游记中孙悟空，怪不得西天取经要箍个紧箍咒，原来是缺氧。我们500年前的老乡射阳先生吴承恩一定是听从西藏回来的人讲过，他是有生活的。想起来自己暗地一笑。一直到第六天，高原反应才终见好转，晚上才能睡得着。

在拉萨的前五个夜里，我一直没有睡着。没办法，只能在电灯下不停地看书。分社斜对面有个书店，新书来得很快，关于西藏的书很多，里面记有金瓶掣签的事，在连续几天的讨论会上，记者们都在不停地谈到这件事。

1995年5月14日，达赖公然在国外擅自宣布所谓的班禅转世灵童，并以寺庙为大本营，屡掀波澜，以种种手段破坏班禅转世工作，企图造谣惑众、破坏社会安定。这一年11月2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用金瓶掣签认定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真身，那天也宣告达赖妄图操控班禅转世的阴谋破败。

西藏分社社长马宁轩给我送来一本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会议的文件，小册子很薄，我到西藏当天便看了一遍，以后的一个月里，圈圈画画，看了无数遍。老马是克什米尔的回族，在拉萨是回族干部的代表，算是汉文水平最高的干部，为人老实、厚道、心肠好。我来后，他安排得很周到，还把新华社西藏分社的档案打开，让我看到了50年代遗留的文字稿、“文革”期间的一系列文件，还有中央领导来西藏的很多讲话。我如获至宝，一本一本翻过去看，整整看了五天。我有什么不懂的事就问老马，老马便告诉我并提醒我该注意什么。

从胡耀邦时期的西藏政策，到张国华、任荣、伍精华、阴法唐、胡锦涛、陈奎元等人的治理西藏对策，一路研究过来，我心中逐渐明朗起来。一边研究，我就一边觉得时刻有个阴影强烈地压在心上，这就是达赖分裂势力对西藏的影响。在西藏的干部，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有时甚至要承受误解。作为北京方面的一个消息通道，我深感新华社的特殊地位与责任，心理压力很大。

当时拉萨街头上随处可见反分裂的标语，一上街便能感觉到社会氛围的紧张与凝重。组织上还为我配发了一支手枪，这让我有种身临前线的感觉。听说1989年骚乱时西藏分社曾被喇嘛包围，还火烧了牌子，于是我特地找了一根铁棍放在门后，以防万一。我还围着分社的院子转了一圈，考虑遇到敌情从哪里爬出去，与区党委、武警、电力厅取得联系，怎样防止停电，保证与北京的畅通等等。

刚刚过去的灵童转世斗争令我陷入沉思：为何达赖以乌合之众能够在国际斗争中屡起风波？为何陈奎元对寺庙整顿这么重视？想到这里，我内心便陡然升起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伴随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兴奋。我应该帮助中央了解什么，帮助西藏区党委做些什么？

二、到帕拉庄园认识达赖

刚到西藏，我就遇到一件麻烦事。一个从西藏成长起来的记者写了日喀则地方干部对援藏干部不满的内参，认为援藏干部来掌了权，使当地藏族干部无权了。我觉得这件事与中央援藏干部政策是相违背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藏区党委不仅让内地干部带资金来，还让这些援藏干部发挥作用，担任县委书记。当时山东的王书坚、赵文朝、黄希俭、时文进等都是这样走上一线岗位的。后来我见到时任西藏区党委常务副书记郭金龙时，谈到这个情况，郭金龙说：“中央政策是明确的。少数人不干事却找事，这个风气不能长。”我谈起对援藏问题的看法，郭金龙说：“你在政治上过得硬，援藏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好关，从大局上看问题，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郭书记提醒，在西藏问题上，一定要看到达赖分裂主义势力这个背景，看到西藏生产力落后这个背景，千万不能把内地一些做法简单搬到西藏来。

在西藏，宗教问题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在了解西藏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以后，最好通过宗教去接近现代的西藏和西藏人。为了掌握达赖集团渗透农牧区的一手材料，高原反应一好转，我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宗教问题的调查中。



根据我的建议，西藏自治区农牧区基层党建现场会在贡嘎县召开，参观了甲日水库。

1996年6月，我到西藏后的第一次下基层，是到雅鲁藏布江南边的贡嘎县。郭金龙书记在西藏抓了“一江两河”工程，这个工程牵涉到主要农牧区，影响很大，投资三千万兴建的甲日普水库就在贡嘎县。我前去察访，陪同的是两个藏族记者，央珍与索朗罗布。两个年轻人都是日喀则人，都是农奴的后代，他们一边担任我的翻译，一边照顾我的生活。

在贡嘎县的饭桌上，我单刀直入问有没有寺庙与村党支部发生冲突的事。县长索朗旺堆对我讲述了甲日乡甲日村党支书丹增加措被喇嘛殴打的故事，称甲日乡几乎家家都有人当过喇嘛，这立刻激活了我的敏感神经。我从山南回拉萨前决定到甲日乡走一遭。采访过甲日普水库的央珍劝说不能去，这个村子太复杂，不安全。我问不会打死人吧，央珍说那倒不会，索朗说有我们哩，不怕的。我说，那我就更得要去啦。于是我们便直奔甲日村而来。



甲日经验推广，使得甲日乡的群众与党和政府的感情更亲更近。这是甲日村村民欢迎参加现场会的车队。

甲日乡是贡嘎县最穷的一个乡，地处离贡嘎机场很近的甲日沟里。因为严重缺水，土地大片荒芜，被喻为“贡嘎第二飞机场”。一进村落，我就看到了挂着五星红旗的党支部办公室，耀眼的红色，心情一振。紧接着，村里的寺庙又映入眼帘，气势巍然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党支部办公室气派得多。西藏遍布寺庙，前几年就连贡嘎县县委、县政府也住在寺庙里。

那天刚下过雨，村里坑坑洼洼。我们几人来到村里时，看到一堵泥墙把树围起来。索朗说，风太大，飞沙走石，树长不活，要有围墙护着。停下车，与几个干活的群众聊起来。其中有一个手持铁锹的老人，沉默寡言，一语不发。我没有想到他便是自己以后在甲日乡调查的主人公丹增加措。后来，翻看照片，原来我们进村最早见面的人中就有这个翻身农奴。刚下过雨的村庄，坑坑洼洼，走上一段路皮鞋便灌进了泥浆，我们一连走访了七

八户，看看藏民看什么书，家里挂什么。

记者伍皓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主动要求到西藏两年，他陪着我拜会了拉萨市委书记洛桑顿珠。洛桑顿珠在市委书记办公室里讲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则故事。有一次，他乘坐的车子路过甲日乡，一头毛驴横挡在路中间。周围的喇嘛们不赶毛驴，却大声骂道：“你这个蠢驴只知道吃，还不滚回家去。”他们的指桑骂槐，给洛桑顿珠留下了深刻印象。洛桑顿珠走了，专员向巴平措接上，昌都的副专员胡春华到山南当专员。

郭金龙书记也对我讲起“一江两河”在甲日普水库的情况。始于1989年的“一江两河”开发工程是一项耗资巨大、与当地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民生工程。这些年，虽然一直在为工程拨款，但原料总是被偷，致使工程迟迟不能完工。

彼时，恰逢王敏等率山东党政代表团来看望援藏干部，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帕拉庄园。帕拉庄园是西藏大贵族帕拉家族的主庄园，位于江孜县城西南的班觉伦布村，是目前西藏唯一保存完整的旧西藏三大领主贵族庄园。帕拉庄园一行，让我对西藏封建农奴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1959年之前，西藏地区一直处于政教合一体制下的以官家、贵族、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为统治者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构成“三大领主”的农奴主阶级，虽然只占藏族人口的5%，却占有了当时西藏地区所有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而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民众则处于被压迫、剥削与奴役的境地，不仅人身和家庭牢固地束缚于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而且几乎全部精力和体力也都要无偿服务于农奴主。农奴除了终日进行无偿的劳作外，还必须承担名目繁多的差税和费税。旧西藏政权统治的特色就是把封建领主的利益置于宗教皈依的掩盖下，寺庙领主对农奴的剥削被当成了对宗教的供养，掠夺者被打扮为精神领袖，从而以思想麻痹掩护着残酷和野蛮的压榨，使农奴乖乖忍受剥削的痛苦。山南地区贡嘎县一带便是西藏最大的寺庙哲蚌寺的领地。

帕拉庄园陈列馆里陈列的实物带给我内心极大的震撼。人头盖骨做的酒碗、人大腿骨做的艺术品、抽筋、剜眼、断足，一件件惨绝人寰之事令人毛骨悚然。我意识到，达赖集团妄图复辟的，正是这种政教合一的残忍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这成为我认识西藏问题的思想起点。

大道至简，从复杂的局势中抓住一条主线极为重要。从帕拉庄园回来后，我初步理清了农奴制度产生的历史，决心到甲日乡了解寺庙的喇嘛殴打党支部书记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我想起郭书记在西藏问题上，一定要看到达赖分裂主义势力这个背景提醒，我隐隐觉得甲日乡有一篇大文章，也可能挖出达赖分裂势力与寺庙的关系。根本问题，是谁控制政权与人民的问题。陈奎元书记正在抓寺庙整顿，这件事已经铺开了，算是短兵相接。下一步怎么办？我觉得更大的力量要用在农牧区政权建设上，要找出一条新思路。

第二节 甲日道路

一、发现甲日乡的斗争

为了全面掌握寺庙整顿的情况，查清达赖分裂主义势力对农牧区的影响，我带着背包住进了甲日乡甲日村。

20世纪90年代，在西藏农村采访非常艰苦，很多县委没有招待所，到农牧区去，要自己带着铺盖。从拉萨出发时，我同索朗罗布、司机嘎玛一个人出一张“大团结”，买来一箱馒头、一箱啤酒、一箱咸菜、火腿肠与肉，还有油盐酱醋、砧板与刀，什么都是自己带着，自己起火做饭。村里只给了一张睡觉的门板，搬几块石头垫起来便是床。喝水都要到沟渠里舀凉水喝，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早上起来洗脸漱口，水太冷了，牙齿发疼。嘴里抿一小口水，刷一下马上吐出来，牙刷一进水，拿出来便很快结成冰了。

调查中的小细节，使我在甲日村藏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到养猪场采访时，十几只苍蝇叮在我的脸上，尽管瘙痒难忍，但为了尊重藏族人不杀生的习惯，我坚持着没有用手赶。我用眼睛使劲眨，但苍蝇就是赶不走。索朗看到说，老李，没有问题，不要这么认真了。与西藏当地人比较，我们内地人显得白净，坐着小汽车进村，总是到穷人家走一走，一家一家地看。我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从拉萨买了很多小礼品进村，见到小孩就分一支铅笔、几块糖果等小礼物，见到老人就一口一个“阿爸”、“阿妈”，主动打招呼。村里人从没见过这么和蔼的“本部拉”(藏语“大干部”)，再加上我不赶苍蝇的小细节在村里传开了。索朗罗布告诉我，你太和蔼了，村里出现传说，佛祖到民间视察来了。以至于每次我走在村子里，遇到的村民都会低下头，远远地站着不动，直到我走得很远后才抬起头。

在甲日村采访时，一个常在我居所外徘徊的瘦弱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老人一头卷发，不言不语，他的儿子手持木棍，卫兵似的站在身旁。开始我以为是哑巴或闲人，没放在心上。结果老人连吃饭也盯着我看，但就是不吭声，只会说“雪结巴”与“二元钱”两个词，听得我一头雾水。索朗罗布告诉我，这就是索朗县长说过的被喇嘛所打的支部书记丹增加措。丹增加措讲起共产党进西藏的历史，说起自己入党的经历，说现在年轻人不行，对毛主席不忠诚。我隐隐觉得，里面大有文章。

先后6次来到甲日乡，走访了几十户人家，我终于掌握了达赖分裂势力在基层的活动情况。

长期以来，达赖披着宗教的外衣，组织分裂主义力量，阴谋搞乱西藏，分裂祖国。他推行“控制一所寺庙，就是控制共产党的一个地区”的策略，妄图以寺庙为阵地，与我们争夺群众。甲日村的达果扎仓寺便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寺庙的有些喇嘛不务正业，长期与境外分裂主义集团保持联系。他们恢复在旧西藏为地方政府服务的反动组织“雪结巴”，从隐蔽走向公开，与乡政府公开展开斗争。社长马宁轩告诉我，“雪结巴”是寺庙外围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出现，标志着西藏寺庙组织向社会组织的转化，这不是小问题。

在甲日乡，“雪结巴”组织不仅严重干预乡政府的行政事务，还干涉农业生产和农民正常生活。他们暗地阻挠“一江两河”工程在这里的实施，砸钻机、偷工具和材料，使内地来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心吊胆，无法开展工作。他们甚至派人跑到乡政府叫嚷说“甲日乡只有‘雪结巴’组织，乡干部都可以回家了”。并扬言要是有人来干预“雪结巴”组织，替汉人说话，连家属孩子“一锅端”。乡干部有的不吭气，有的干脆就不到乡政府来，使得分裂主义

势力气焰更加嚣张。甲日村党支部书记丹增加措坚决不参加“雪结巴”在寺庙举行的宗教活动，被“雪结巴”罚款。当他拒绝交款时，“雪结巴”竟派打手到他家中对其进行围殴，硬拔去一把头发，其嚣张程度令人发指。

后来丹增加措跑到县政府揭露“雪结巴”组织，县里有关部门派来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把寺庙组织罚款十元擅自改为两元。这个被打的支部书记气愤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寺庙活动，这不是两元钱的事，寺庙的人怎么能罚共产党员的钱？

开始时，丹增加措总是到我住的地方徘徊，只是看着我，什么也不说。我有几分紧张，拿起一块糖，剥了递给他。他吃完糖，还是不吭声，盯着我看。我就让索朗问他什么事，他总是说“不是两元钱的事”。为了了解情况，我一次又一次地摸到丹增加措的家中。这位翻身农奴对我慢慢地亲近了，开始说话了。一次，他嫁到城里的女儿回来，做了一桌饭菜，还特地拉着我去品尝。丹增加措的女儿说起父亲被寺庙欺负的经历，泪流满面。她对我说，叔叔，他们的力量太强大了，阿爸害怕。

在“雪结巴”的横行之下，甲日乡党支部变得十分涣散，几个支委都欠着老百姓的钱。老百姓议论纷纷，认为“雪结巴”的兴起是因为乡党委的风气不正与领导能力不强，无法带领群众前进。这时，县委新派来一位乡党委书记——贡嘎坚参。贡嘎坚参原来是吉雄乡乡长，也是旧社会的农奴。刚上任两天，门被砸了，自行车也被偷走了。但他不顾这些，每天挎包里带着糌粑，走村串户，与群众谈心。怕影响其他群众的休息，他就在牛棚里与农民促膝交谈，酥油灯常常亮到凌晨二、三点。就这样，他连续调查了两个多月，依靠丹增加措等老党员和翻身农奴，利用寺庙不搞宗教仪式便不让收青稞造成损失的事，组织群众与寺庙斗争，使很多群众觉醒。不久后，公安部门取缔了非法的“雪结巴”组织，拘捕了两名反动头目。

贡嘎坚参在组织乡党委迅速稳定局势的同时，一手抓住群众意见最大的干部财务问题进行整顿，搞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手抓住影响经济发展的干旱问题，带领群众改变生存条件。他把水库建设作为乡党委工作的中心，一到任就住到甲日普水库上。寒冬里，跳进水里施工，被人硬拉上来。在他的带动下，党员、团员也都住进了工地。大雪天，没有帐篷，他们就躺在悬崖下。天一亮，抖掉脸上的雪，抓着雪团烧水，一啃完糌粑就开始干活，有时干到深夜11点。

4年来，甲日乡的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全乡粮食由200多万斤增到485万斤，农民人均收入由1993年的298元增加到700元，贫困面由45%下降到18%。当然，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群众心里。“雪结巴”组织刚解散时，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贡嘎县委与乡党委因势利导，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群众觉悟得到明显提高，既认清了分裂主义势力的倒行逆施，也看到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新形象。经过几年努力，甲日乡风气大为好转，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从贡嘎坚参带领甲日乡人民开展反分裂斗争、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基层组织整顿中，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性。过去的调查总结都是从投资建水库角度，我却抓住反分裂斗争这个要害，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了。山南地区的“笔杆子”金书波、段襄征在很长时间总是夸奖我能站得高，抓得准。

在后来为《西藏日报》所写的评论员文章中我写道：

在当前的基层组织整顿中，我们应当从政治上着眼，从根本问题入手，以反分裂问题作为检验基层组织与干部的试金石，抓好以反分裂斗争为中心的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建设一支适应稳定与发展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

就在调查逐渐深入之际，我陷入了绝粮的困境。6天下来，肉吃完了，馒头也吃完了，没有一点油水。看到村里有人家杀羊，我掏出36元买了一只羊腿，熬了一大锅。没想到乡里搞计划生育的、丈量土地的、开拖拉机的这时一下子都冒了出来。十几个人边喝酒边跳舞，一锅羊肉转眼间就吃完了。我吃了一天糌粑，嗓子总是发干，咽不下去。肚里没进食，身体虚弱，加上夜里受凉，接连拉了5天肚子，站都站不住，大便也都是血丝，只能扶着墙走，浑身发冷、直打颤。索朗说不行了，这样要出事的。

到了县城，我与索朗找到县长交流情况。县长说，你们社长像个县级干部，索朗纠正道，“是厅级，与你们山南的向巴平措、胡春华一样大”。县长领着我找到县委书记边巴，说人家是厅级干部，该管一顿饭的。这个县很穷，县里能动用的流动资金只有几万元。县委书记边巴对县长说：“你陪一下，不要超过150元，不要忘记带发票。”他们讲的话都是用藏语交流，我听不懂。最后索朗说，他们管你一顿饭，因为你是厅级。我知道西藏现在还太穷，一点怨意也没有，只是说今天兄弟们能吃到肉了。

甲日乡的反分裂斗争让我十分兴奋，此时我想到的不只是一篇报道，而是要借此组织一场活动。如果在西藏高原掀起一场基层党建的红色风暴，就能够对西藏区党委的寺庙整顿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夜里县委大院里停电，我就点着蜡烛写了起来，落笔先把标题写好——《暴风骤雨——西藏甲日乡反分裂斗争一幕》，接着一气呵成。在文章结尾，我激动地写道：

多难兴邦。对于久经动乱而步履艰难的民族，对于久受挫折而饱受折磨的人民，深知没有什么比稳定更为宝贵的了。不管是达赖分裂主义，还是国内外其他反对中国统一、反对历史进步的丑恶势力，都将在中国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挡的。尽管甲日乡走向富裕还刚刚起步，但是从甲日道路透射出的希望之光，正像雪域高原早晨刚升起的太阳，那么强烈，那么振奋人心。

二、来自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祝贺

我们一行前前后后到甲日乡调查了6次。每次回拉萨，每当过了曲水大桥，顺着拉萨河拐几个弯，远远见到耸立在山上的红色的布达拉宫，索朗便喊“到家了”，而司机嘎玛便唱起“回到拉萨”。从甲日乡回来，身上痒痒的，一摸一个瘙子。脱下衣服来一看，黑黑的三四个瘙子。手指甲一按，噗嗤一声响，很清脆。我只得把所有衣服都脱下来，在锅里煮。

写好调查，我先提供给区党委陈奎元书记。那天，我列席区党委常委会，坐在会场最后一排很不起眼的角落。陈奎元书记并不知道我在场，也不认识我。他介绍说，最近来了位很有水平的新华分社社长，他的长篇调查帮助我们理清了思路，提出带方向性的问题，值得深思，你们可以看一看。

话音刚落，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汉昌便对陈奎元说，李社长就在这里。陈奎元听后，招招手把我请到前面，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几个月了，也不吭声，一来就下乡调查，我也没能见到你。你的调查报告写得很有深度，为我们区党委理清了思路，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要谢谢你。”说罢当场把区党委常委一一介绍给我认识，与热地、郭金龙、巴桑等人一一握手。握手时，陈奎元说：“李锦同志刚来，不熟悉，大家要帮助他”。又对我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说。”

陈书记又吩咐李立国秘书长将我的调查报告复印一下，每个常委发一份。接着，陈奎元再次说：“这个调查写得扎实，很有水平。西藏问题比较复杂，基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党委为什么这么抓，抓得对不对，这个典型回答了问题，想得深透，指导意义很强。也帮我们区党委理清了思路，常委都要学习一遍。”

调查报告以内参形式发往中央高层。胡锦涛曾在西藏执政四年，西藏的政治局势与矛盾冲突，他比其他领导人有更深刻的体会。1994年，胡锦涛同志在飞机上听我汇报九间棚情况时，曾说有什么好典型可以直接寄给他。当时，我从有关渠道了解到胡锦涛同志正在江苏视察，还担心他看不到这份调查报告。

11月13日清晨，尚在睡梦中的我被电话铃声叫醒，拿起话筒，听到的是一个熟悉的德州口音：“李锦吗？我是组织部张全景啊。伙计，一炮打响啊，祝贺你！”中组部长张全景告诉我，胡锦涛同志对于我所写的调查报告作了较长批示。胡锦涛认为：“甲日乡的经验很好，要认真总结推广。如果西藏所有的乡都像甲日乡这样做，反分裂斗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西藏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就会大有希望。”张部长说，中组部下一步也要组织宣传，张全景原是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抓九间棚典型时认识的。他认为甲日乡典型是边疆民族地区的新鲜经验，是九间棚之后党建的好典型。张全景让我回来时找他一下，他会安排组织局局长李景田抓一下此事，随后又嘱托我替他向陈奎元、郭金龙等人问好，并说一定要让他们重视这一典型，做好宣传推广工作。

当天下午，我又接到新华社副社长南振中打来的电话，他也对“甲日道路”的一炮打响表示了祝贺。张全景与南振中两位领导都是从山东走出去的，对我熟悉。现在两位领导都不约而同地用“一炮打响”来形容，让我感到既欣慰又激动。

在胡锦涛同志作出批示之后，我决意把这一成果迅速转化，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给郭金龙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宣传推广甲日乡典型的8条措施。在西藏推行典型有一定难度，主要是人才缺乏，按照我的策划，写材料的任务相当大，但上述建议郭金龙书记最后

竟全部采纳，并责成区党委组织部召开协调会一条条落实。写完这封信后，我随即赶赴甲日乡，想进一步进行调研，加大宣传力度。然而此时索朗旺堆县长却不同意宣传，他认为“一江两河”工程已经开展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做很好总结，为什么这次要从党建角度总结，他感到不理解。

在组织部召开的协调会上，有些人唱起了反调。有人认为其他地方比甲日乡好，甲日乡尽管近几年有发展，但仍旧很穷。把甲日乡树立为典型而大加宣传，是丢人现眼。不断的质疑与诘问使得会议气氛有点紧张。

这次会实际上是落实郭金龙书记提出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是我建议的。主持会议的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昂强巴开始感到会议气氛难以扭转，觉得顶不住了。给我写了一个字条递过来，上面只有三个字：“怎么办？”我心想，讲什么道理也没有用，胡锦涛、陈奎元、郭金龙等领导都有明确态度，这是中央高层批示下来的典型，要按照上层指示办。我于是回了一张字条，上写“按中央领导说的办，这是一个落实的会议”。昂强巴马上扭转主题，说中央与区党委都已经决定了，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落实。昂强巴部长把我推到前台来，我口气似乎很轻松地说出事情该怎么落实。难办的事多是写文章写材料，我总说这个由我们来。大家对我这个北京调来的文人有什么背景也不了解，见我大包大揽，便也不再说什么。会议当即决定，在甲日乡召开西藏农牧区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

随同我调查的央珍与索朗一直在外面等候，看到散会，马上围上来。我只说了一句“胜利了”，便觉头晕，站立不稳。当时天气寒冷，会议又开得紧张，缺氧让我的身体压力剧增。索朗扶住我，连声劝告“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与央珍把我扶上车。

这次会议决定在《西藏日报》公开登载基层党支部与寺庙分裂主义势力的斗争情况，很多内幕一下子被揭开。这是西藏报纸上第一次公开报道分裂势力在基层复辟的活动，而且写得具体，审稿过程复杂而艰难……

1996年12月的一个深夜，在长篇通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发表的晚上，我与索朗、央珍在西藏日报社看完最后一遍校对稿，直到稿件送到印刷厂要开机印刷时，才返回朵森格路西的新华分社。那时已是深夜一点，印刷厂搞校对的汉族老师傅提醒我说，这个稿子不能署真名，他们要暗杀，在西藏这个地方不能太认真。

走在清冷的夜色中，我想着印刷厂师傅说的话，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寒栗。我对两个年轻记者说：“你们得有思想准备，这是第一次公开把基层党组织与寺庙中分裂势力的斗争捅开，会引起社会震动，防止那边派来的人盯梢暗杀，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我是内地人，迟早要走的，你们年轻，是当地人，要注意安全，晚上不要出门了。”

央珍过去说自己是属兔的，素来胆小，此时却说道，“老李，我们不怕。”

索朗也坚定地说：“死了也是烈士。”

久久的沉默之后，索朗又说：“老李，你署上我的名吧，把我的名署在你前面。他们要暗杀，先砍我的头”。

深夜里，这句话是那么清晰，铿锵有力。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月光照在朵森格路的石板上，看到自己长长的身影。这时候已是深夜一点多了，四周一片沉寂，只有我们三人走在青石板上的脚步声，清脆又有几分沉重。我面对两个勇敢的农奴后代，不禁愣住了，一股热浪不由得涌上心头。

三、在高原掀起红色风暴

1996年12月23日，西藏区党委在贡嘎县召开了全区农牧区基层党建工作现场会，组织部门与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

那是个格外寒冷又令人心旌荡漾的清晨。会议一开始，郭金龙书记就介绍了新华社的报道，并当场让我站起来，举着刊登通讯的《西藏日报》，说道：“这个大调查是新华社李锦社长写的，新华社为西藏稳定立了一大功。”会议上，郭金龙书记还指出，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政权建设是西藏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要通过宣传推广甲日乡经验把基层党组织整顿好、建设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山南地委所在地泽当的晚宴上，当郭金龙书记看到我坐在另外一桌上时，马上把我叫到主桌，坐在他旁边的主宾位置上。各地区、各县的书记们和厅局长们来向郭金龙敬酒，郭书记说，“你们想不想抓党建工作？抓好了就有人来总结。要总结，你们就要敬李社长，李社长是个高人”。一场“敬酒风暴”顿时在席间掀起，县委书记们排成队，一杯接一杯地转向我。尽管喝得浑身发烫，心情大好的我总是来者不拒，一饮而尽。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西藏日报》特别开辟了“学甲日经验，抓基层党建”专栏，刊登了16个头版头条，前6个头版头条都是我自己动笔写的。每天下午4点开始写，5点半交给报社，报社总编李而亮把版面留着，我的稿子一到便拼版。一个省级报纸依靠新华社稿件的这种程度，在新华社范围内也是少有的。

随着全区农牧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现场会在甲日乡召开和宣传高潮的形成，甲日道路、甲日经验、甲日样本也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甲日乡的经验，在雪域高原卷起一场红色风暴，成为共产党治藏的一道亮丽风景。从12月到次年2月，整个高原都在说甲日，议甲日。

1997年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这一年，悲伤的云雾笼罩国人，久久不散。我的悲恸难以言表。15年前，邓小平“你有发言权”的褒奖被我视为不断前行的动力，邓小平一手掀起的改革大潮使我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邓小平逝世后，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全国多次播放，作为受到邓小平接见的记者出现在片中，我是整部纪录片中唯一的一位记者，也是当时西藏地区唯一出现在片中的人物，《光明日报》、《西藏日报》与西藏电视台相继对此进行了报道。

甲日乡典型的树立以及电视纪录片《邓小平》的播放，时间挨得这么近，让我在西藏名声大噪，也因此引起了达赖集团的密切关注。由于“甲日经验”与达赖培养的“克西精神”仅一山之隔，美国之音便开始疯狂地攻击“甲日经验”，并对我这个“神秘人物”进行猜测。就在与郭金龙一起参加现场会的当晚，我们从现场回宾馆的路上，听到美国之音的藏语广播，攻击甲日经验，并提及“从北京来的神秘的人”。懂藏语的汉族干部说：“李社长，你在那边出名了。”当时在西藏，中央广播电台与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只在拉萨周围能听到，在远离拉萨的地方听的多是美国之音和欧洲一些藏语台。

当时，还有人从西藏大学回来后告诉我，那边盯上你了，你已经上了他们的暗杀名单。我听了有种不安全感。每天晚上睡觉前，便把枕头下组织配备的手枪拿出来检查一遍。分社后面隔墙是自治区医院，我特地准备了一条长绳子，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便可越墙而出，与自治区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白天待在办公室，天快黑时，才戴上大大的墨镜，穿上风衣，把礼帽压得低低的，带着索朗罗布到街上转一转。

索朗说，老李你太像地下党的书记了。

甲日乡典型的推出，是我在西藏主持的第一场战役。与以往典型调研不同的是，在这次“甲日道路”的发现与培养过程中，我又多了一个新的角色——组织者：不仅是典型的发现者、推广者、思想研究者和培养者，而且也是组织年轻记者进行调研的“导师”。我从以往的单枪匹马作战转换为一个运筹帷幄而又亲临战场的指挥者，转换为传道授业、扶掖后进的师长。这种角色上的转变，对于我来说，更多了一份责任。

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搞好调查研究，是一个分社的立社之本，也是发展之本。为了帮助年轻记者提高调研水平，我把记者们的稿件装订起来，每个记者一本，研究他们的写作，发现每一点优点便在评报栏里贴出来，以教育大家。我所看重的，是薪火的相传，是经验的延续。在新华社《新闻业务》发表的《发展之本——我们是怎样抓调查研究的》一文中，我记下了培养年轻记者的一些心得：

过去，西藏分社记者多数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我们既要提出具体的目标，严格要求，又要循循善诱，耐心帮助，使他们逐步尝到甜头，自觉明确走到这条路上来。这就要求分社领导“靠”上去抓，付出相当大的精力与时间来做这件事。我们比较重视抓好“三前”，即出发前分社开会研究调研的主题，提出调研的目标；调查后，开会研究调查来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发稿前，分社领导提出修改意见并帮助修改，力求调研获得理想的效果。这样一来，调研成果多了，记者也成长起来了。

后来，与我同时在西藏分社的一些年轻记者如多吉占堆、伍皓、罗布次仁、多穷、孕玛多吉、赵承、赵新兵、沈路涛、索朗罗布、白冰、马书平、刘喜梅等人，多数成了新华社有影响的调研记者。

第三节 与美国议员沃尔夫的遭遇战

一、沃尔夫潜入拉萨

因为西藏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新华社西藏分社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以对外报道为主的分社”，一直坚持“内外并重，侧重对外”的报道方针，在国际舆论的引导与斗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7年，我就同美国反华议员沃尔夫展开了一场被国务院外宣办认为是“西藏经验”的国际舆论之战。这是我新闻生涯中参与对外报道最有影响的一仗，也算为我国对外报道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西藏问题一直是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当翻身农奴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西方反动势力就散布“西藏发生了人间悲剧”。40年过去了，这种诬蔑与攻击并没有停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达赖势力的猖獗与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而弗兰克·沃尔夫便是反华势力中较为活跃的一员。

弗兰克·沃尔夫是美国老牌反华议员，长期在所谓的宗教、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以他为代表的反华势力歪曲历史，制造争端，多次在美国国会起事。由于沃尔夫的“成功”表演，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

1997年，在沃尔夫牵头下，美国反华势力纠合100多名发起者向众议院提出1685号议案，即《1997年摆脱宗教迫害法》，将矛头对准中国。为了组织这次活动，沃尔夫搞了一次所谓的“调查研究”。那年8月9日至13日，他以旅游为名潜入拉萨，带着一名藏语翻译与一名助手，找到很多“内线”，掌握了一些所谓西藏问题的材料。当时，拉萨市区危房正在拆迁，有部分居民有意见，有的因犯罪被关在看守所，沃尔夫专门找到这些“不满者”的家属，日夜不停地搜集材料。

回到美国后的8月20日下午，沃尔夫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这次所谓的“地狱旅行”，抓住人权、宗教等问题大做文章，说他“看到了中国正在大规模逮捕与残酷镇压”、“近二十年汉人屠杀了100万藏人”，“被压制的人民在不可言喻的野蛮条件下生活”，“人文方面一点点也没有进展”，“人民在受苦受难，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离开中国”，“西藏正在消失”，煽动西方世界干预，“拯救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文化”。

因为沃尔夫是美国众议院中的反华领袖人物，他的出面具有很大影响力。8月22日，美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法新社发出美国华盛顿的一篇报道《美国议员警告说，中国在“吞并”西藏》，接着路透社从华盛顿播发《美国国务院支持国会议员关于西藏的言论》等报道。一时间，西方舆论界推波助澜，反华恶浪骤起。

8月22日，新华社对外部政治文化编辑室编辑李希光从网上得知美国动态，立即向对外部报告。副社长高秋福、副总编马胜荣同意对外部立即反击的意见，指示由对外部记者在北京采访，同时通知西藏分社在西藏组织采访。

那天晚上10点，我接到对外部副主任李志高的电话后，认为美国国会内反华势力就西藏问题屡屡对我政府发难，作为西藏分社，守土有责。驻藏记者，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应把报道着力点定在事实“揭批”上。我立即组织分社对外采访室、政文采访室两支队伍全力投入战斗。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从“红机子”打电话给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立国，报告情况并提出报道设想，请求协调。李立国说热地书记刚从内地回来，自己正准备去机场接他。我决定兵分三路，马上采访。我与对外采访室主任多穷赶赴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热地家中。

热地刚进家门，连口水也没喝，李立国秘书长与我马上跟进。李立国让我先汇报，我汇报了情况，也表示道歉，热地书记说“特事特办”。这时他还不知道沃尔夫在华盛顿的发难，但是态度非常鲜明，他说西藏人民最有发言权。我把沃尔夫诬蔑西藏的言论简单说了一下，提出几个问题。热地书记说，“这个美国人讲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都是达赖讲的嘛。”

从热地家回来后，我与多穷便迅速投入到写作中。从热地的谈话中抽出“西藏人民最有发言权”几个字为标题，稿件1990字，很快发往北京，编辑部一字未删，全文发出。这篇稿件观点鲜明，把具体事实摆在公众面前。对于“到底谁对西藏问题最有发言权？”“汉人在西藏究竟有多少？他们都在干什么？”“西藏宗教信仰有没有自由？”“西藏文化有没有得到尊重与保护？”等问题都一一作了阐述。

很快，稿件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路透社、法新社都转发了报道。接着美国的《侨报》、《世界日报》、菲律宾的《商报》、香港的《明报》、《商报》以及泰国的《中华日报》都刊登了文章，新华社报道以最快速度与美国的主流舆论交上了锋。美国人没想到，中国人在第二天便发来批驳的稿件。中国人也没想到，美国最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居然刊发中国人写的稿件，实在因为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太出新闻了。

与此同时，我从政治上、内容上、业务技巧上与报道规模上进行分析，开始酝酿一个大的作战计划，决心把这场遭遇战打成一个运动战。

1997年5月，我曾专门去北京向新华社秘书长蔡名照汇报西藏困难，要求重新启动援藏工作。蔡名照对西藏工作非常关心，询问西藏分社还有什么困难，说各部门都会优先考虑。我提出办公楼扩建、职工住宅楼建设与建立林芝记者站的三项工程。蔡名照当场答复都可以办。我把已经写好的报告拿出来，蔡名照一项一项都帮助解决了。新华社的援藏工作停了多年后在蔡名照安排下也重新开始了。于是总社从上海、江苏、浙江与国内部、对外部调来赵承、赵新彬、朱仲良、石永红、潘海平等一批援藏记者。这批人水平整齐，新生力量的加入，使得我雄心大发，决心形成一次对外宣传的“突破”。

我首先从沃尔夫的讲话中对沃尔夫本人做了一个深入了解。在通过特殊渠道以最快速度拿到沃尔夫在美国国会讲话内容后，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在一旁写满了批注。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发给参加报道的每个记者，让大家大体了解这个人的能量、动机、活动方法、思维特征与传播途径，对他的影响圈、议题、发难的时机、目的、阵地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仅用一个小时，便迅速拿出了全面的作战部署，确定了作战思路。

8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沃尔夫所谓的“西藏见闻”发表评论说，沃尔夫众议员戴着有色眼镜，无视西藏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对中国肆意进行诋毁，这种行径是可悲的，也是不会得逞的。紧接着，新华社铺天盖地的发稿便跟了上来。

自此开始，这场国际舆论斗争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从那年8月一直持续到寒冬。

这期间还有个插曲。8月27日，欧洲议会副议长海默夫人来到西藏。我认为这是以西方人之嘴堵西方人之口的最好时机。海默夫人到西藏，提出到西藏监狱去参观，我便与多穷一起去西藏监狱，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海默夫人在访问中说“百闻不如一见”、“这里

的监狱管理科学、合理，看到的与听说的不一样”。我特地问了一下翻译，她是否说了“百闻不如一见”，翻译说是这个意思，这个女议长也朝我点了点头。之后，我在报道中如实写了进去。当晚，我便以此为题发了稿件，新华社当即向全世界转播。

当报道为《欧洲时报》等西方媒体传播后，海默夫人已离开拉萨，到了尼泊尔。面对西方舆论压力，她矢口否认自己说过的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意识到国际斗争的复杂性将使西方政治家可能扮演多变的角色，于是便去找在场向她提出问题并且亲自听到她讲话的监狱长，再次向编辑部提供稿件。后来，我从陈奎元书记那里得知，这位副议长后来又转变了态度，在会上讲“西方最好再也不要干预中国的内政了”。

二、陈奎元说，这一仗打得漂亮

西藏分社揭批美国议员沃尔夫的斗争，是一场国际舆论战，不是普通的对外报道。这场斗争成为中美两国政府的舆论战，在党的十五大上引起很大反响。十五大上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这场报道也得到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与西藏区党委的高度重视。

9月30日晚，陈奎元书记约请我与政文室主任伍皓到住处交谈，一见面，陈奎元就兴奋地对我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沃尔夫刚开始胡说八道，我们就发了报道，交上了锋。他们反击你们的报道，证明你们有战斗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就应该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你们的报道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晚，我们一直谈到深夜两点，才离开陈书记的宿舍。

在我的具体组织指挥下，西藏分社连续组织了五个小战役，改变传统的单篇写作方式，使西藏的对外报道形成气势，如排山倒海般接踵而来，形成了四个阶段、五个浪头的反击。

第一阶段是前三天，围绕西藏监狱与犯人权力问题。人权问题焦点在监狱问题上，沃尔夫也是先从这里做的文章，因此我决定就从监狱开始采访。短时间内采访了政法委书记、司法厅长、监狱管理局长等，组织了5篇稿子。

第二阶段是前十天。在8月23日至9月2日的10天里，所发的11篇直接批驳沃尔夫的稿件为西方主流世界报纸纷纷采用，这段时间的报道有反击战特色。

第三阶段是前一个月，把报道转向主权与人权报道，有歼灭战特色。分社在9月份发对外稿达45篇，例如《西藏自治区监狱文明改造犯人成效显著》、犯人亲属探监与犯人交心的现场特写《铁窗内外的亲情》，以及体现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西藏一批犯人获减刑》等一系列反映监狱人权的报道，从各个侧面对沃尔夫的观点进行批驳。

第四阶段便是后期两个月，对西藏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报道，带有运动战的特色。在三个月里，西藏分社陆续发出监狱、人权、主权、宗教文化、环境、人民生活、民族团结与民主选举等五组系列报道，发稿量达120多篇。这些报道几乎发发中靶，落地生花，为海外报纸广为刊登。

同时在四个阶段中，又形成了五个浪潮的报道攻势。这五个浪潮浪浪相接，蔚然成势。第一个浪潮是以当事人身份的访谈为主，构成对沃尔夫最初的反击。当这个浪潮起来时，以监狱反映人权的报道浪潮随即而起。紧接着是第三个浪潮，反映的是主权、文化与人民生活这三个系列，这是沃尔夫重点攻击的问题，因此发稿量最大。第四个浪潮是西藏的民主选举，因为西藏在青稞收完便开始搞基层选举，是全国搞得最早的。最后一个浪潮是西藏环境保护，这个报道一直发到翌年年初。这五个浪潮因为没有间隔，便形成一个大潮。到1998年元月，援藏记者陆续返回内地过年，这场战役性报道才告一段落。

在揭批沃尔夫的日子里，西藏分社的机房每天都是灯火通明，来自总社、江苏、上海、浙江的对外记者围在我周围，气氛紧张而又融洽。那段时间，他们不仅仅是在写稿，也是在前线作战，在以智慧守卫国土，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兵戎相见”的战斗。这场轰轰烈烈的国际舆论之战历时3个多月，粉碎了沃尔夫妄图利用西藏问题掀起反华浪潮的阴谋，也充分显示了西藏分社的对外报道能力。国务院外宣办高度称赞了这次新闻报道，认为是对外宣传报道的“新鲜经验”，后被称为“西藏经验”。

我们在与沃尔夫的遭遇战中，以密集的火力压倒了他，迅速化解了沃尔夫利用西藏问题反华的攻势，我们搭上他这趟车，使得中国人的声音在西方主流大报上露了脸，使美联、路透、法新等大通讯社都传播了我们的声音，为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留下一笔。

第四节 零下四十一度的严寒

一、杨传堂口中的“大手笔”

1997年，随着十五大的召开，这一年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大年”。十五大报告发表后，西藏上下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development 问题展开了讨论。

西藏是从封建农奴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特别是国有企业普遍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生产成本低、市场生存能力弱，对政府依赖性强。进入90年代后，亏损面不断增加，职工生活无着落，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成为政府抹不去的一块“心病”。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主席杨传堂分管经济工作，他是位能吃苦耐劳又肯学习、善动脑筋的领导。我每次列席自治区会议后给中央写的内参中总会有他的一段谈话，因为他能说出东西来，而且有主见，有分量。在我看来，西藏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最终都要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上来了，西藏人民感到幸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一年，我们在进行对外舆论战国有企业的同时，在杨传堂的支持下又抓出了拉萨啤酒厂这一国有企业典型。

拉啤进入我的视线，最初来自西藏人对啤酒的爱好。西藏人很爱喝啤酒，而且清一色喝的都是拉啤，这种啤酒味道清凉纯正，口感也好，喝起来比青岛啤酒不差在哪儿，是拉萨人的最爱。当时在西藏，买啤酒都要排队，要走后门。拉萨啤酒厂是老牌的国有企业，但多年以来一直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1989年亏损708万元，资产负债率28%。后来，累计亏损达2700万元，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1994年，拉萨啤酒厂被列为全国百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6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5月，拉萨啤酒厂以股票上市标志着他们终于完成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形成以国有资产控股的混合所有制。

拉啤进行企业改革的线索是分社记者马书平在采访中发现的，马书平在文章中回忆：

8月15日，我在经贸体改委采访，了解到拉萨啤酒厂改革方面的一些情况，我及时向分社领导作了汇报。第二天，副社长李锦带着我去请示自治区领导，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自治区领导一致同意把拉萨啤酒厂作为西藏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

听取汇报后，杨传堂书记说，老李你是靠搞典型起家的，我们一起来抓拉啤这个典型吧。我的看法是，典型要有全国意义，才能立得住，但这个典型是否能体现江泽民的“5·29”讲话精神，反映所有制结构调整问题，是否在全国有指导意义，当时并无把握。于是带着马书平一起住到了厂里。在那里，我们先后调查了半个月时间，了解到四川人进藏参股的事情以及企业改革中“姓川姓藏”的争论，这些都形成了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与阻碍。

当时关于所有制问题，全国企业中还没有成熟的典型推出。经过分析与研究，我认为，可以通过这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调查，反映西藏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体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讲话精神，对于封闭的西藏经济改革与发展可望形成冲击。

10月10日，杨传堂在西藏宾馆审阅了拉萨啤酒厂的调查报告后说，我们西藏也出大经验嘛，这个调查在全国也算是有水平的。杨传堂对我和马书平二人的调查报告十分满意，

他说：

李锦同志从山东来，抓过不少大典型，是提出大思路的人，功力深厚。到西藏来，向区党委、政府推荐两个典型，一个是党建的，一个是经济的，还建议在两次全会召开时宣传推广这两个典型，这两个建议都是高招。新华社让李锦同志这样有主见、有思想的社长来西藏工作，是智力支援，这是对西藏工作的重视，我们从内心里感谢你们。小马一到西藏工作就跟着李社长进拉萨啤酒厂搞调查，写出大材料，这个调查研究的路走对了。

西藏经济工作出经验不容易，也很少在全国露脸，为了形成一定影响，我专程到编辑部送稿。10月20日，新华社内参刊发了调查报告《思想解放带来企业改革的新突破》(上)、《新的所有制形式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下)，系统介绍了拉萨啤酒厂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经验。

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汉昌亲自安排《西藏日报》在区党委五届三次会议期间以整版篇幅刊登分社记者写的调查报告全文，在会议上引起较大反响，拉萨啤酒厂成为十五大精神的载体，在会议上被热烈讨论。热地、杨传堂、丹增、李立国、江措、徐明阳、肖怀远、苟天林等都在发言时讲到拉萨啤酒厂的经验，强调解放思想对于西藏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2月4日，区党委五届三次全会结束的第二天，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联合举行拉萨啤酒厂改革成果表彰大会。会议授予拉萨啤酒厂“改革排头兵”的称号。这是继上一年冬天“甲日乡”调查后，西藏分社的调查报告再次在西藏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在拉萨出现了“家家说啤酒，户户话改革”的现象。

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李立国高度评价了西藏分社的工作：

去年贯彻十四届六中全会与今年贯彻十五大精神都是在冬季，区党委都是以分社的典型调查开路，都引起轰动效应，社会效果非常好。在西藏的同志对中央精神正在传达时，你们用自己的调查提出见解和思路。关键时刻新华分社总是起重大作用。近年来，新华社的报道在推动西藏实际工作方面，贡献很大，功劳很大。

自此之后，我宿舍里的红色电话机，成了区党委与新华分社联系的热线。遇到急事，可以随时与李立国秘书长联系，凡是我們提出的，西藏区党委都大力给予支持。

二、吸着氧气到藏北重灾区

1997年9月，横扫全球的“厄尔尼诺”现象降临世界屋脊。到12月中旬，已出现40余次不同程度的降雪，降雪量是历年同期的3倍。这场空前的“白色风暴”使包括那曲、阿里、日喀则3个专区在内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藏北草原变成一片银色世界。藏北草原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雪灾发生了。

12月20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我到会时已经坐满了人。那时雪灾已沿着喜玛拉雅山、冈底斯山与念青唐古拉山向全区蔓延。全藏32个重灾县的1030个村子被大雪包围，40多万平方公里的藏北已成为一片雪海，26万灾民处在危急之中。在杨传堂主持下，区党委作出了把抗雪救灾作为西藏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决定。

实际上，早在12月4日，新华社首播的消息《那曲地区遭受严重雪灾》就已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和美国《世界日报》等6家报纸采用，比其他新闻单位早发稿18天。区党委副书记巴桑诧异地对我说：“你们耳朵真灵呀。”我告诉她，新华社常年有记者在基层调查研究。11月下旬，记者白冰、觉果到藏北了解牧区冬宰情况时，在与群众接触中，得知今年可能发生重大雪灾，而且是毁灭性的，便打电话向我汇报。我当即要求把采访重点由“世界屋脊采风”转向采集雪灾情况。在区党委开会前，分社已经三次开会，研究部署雪灾报道。

当时拉萨也连降大雪，分社没有暖气，夜里常常被冻醒，已经有七八位记者感冒了。在西藏感冒，非常容易引起肺气肿，危及生命，何况要到氧气最少的藏北。这时气温已经低至零下40多度，一位缺乏经验的司机没有戴手套去推车，手碰上去便拿不下来，用力撕扯，最后竟然一整张手掌皮被粘在了冰冻的汽车上，寒冷程度可见一斑。

这时，我决定以重兵投入，采用两线作战，分三个梯队轮流上阵，并挑选身体最壮的罗布、觉果、白冰作为第一梯队，马上奔赴500公里外的藏北重灾区。技术局援藏干部赵建国感冒还没好，也三次找到我，坚决要去。随着灾情发展，元旦这天，分社第二次派出报道组，我特地在分社门口为他们组织壮行送别，讲话，发言，然后把啤酒、馒头与铺盖抬上车。

到灾情最重时，报道上出现了难题。雪灾是否造成死亡，死亡人数具体几何，记者们众说纷纭，做不了主，不断给我打来电话。我此时已经在西藏一年半了，气力明显大不如前，但还是不顾身体孱弱，决定奔赴灾区，参与调查并现场指挥。当时拉萨气压不稳，我因缺氧而难以入睡，已经连续十多天处在眩晕状态，头脑像要崩裂，平时只好用双手紧箍着太阳穴，不敢放松。

出拉萨往北，地势越来越高，气候也越来越冷。千里藏北，雪海茫茫，无法辨认路，我与记者赵承坐的越野车一会儿爬雪山，一会儿在冻结的河面上走。车不时地蹦跳起来，我的头也不停地撞着车顶。到了灾区下车，连站立都极为困难，走一步，脑门疼一下，只得把氧气袋抱在怀中，把氧气管插在鼻孔里，坚持采访。

在《母亲魂兮归来》一文中，我记录下了前往灾区采访的艰难历程：

到那曲，满世界被白色塞满了，眼际尽是厚厚的大雪。车过雪拉山山口时，已是海拔6000米，我在车内闷得喘不过气来。开了车窗门，一阵猛烈的暴风像棍子打过来，硬是把我的脸扳过去，头想转，竟转不过来。一瞬间脸已冻得像冰一样，没有了知觉。肆虐的暴

风雪就像惊涛，一浪一浪冲过来，想掀翻我们乘坐的一叶孤舟似的越野车。世界上只有呜呜的风，震天动地地嘶叫着，其他什么也听不到。车不敢停，也不能开窗，只有缓缓地爬动。在死亡可能出现时，我想起了妈妈，如果我走了，妈妈怎么办？我是母亲的希望与寄托。当时唯一的念头是，一定要活着回去，父母亲在等着我，妻子与女儿在等着我。我不敢打瞌睡，怕自己缺氧时昏死过去，也怕激烈的颠簸会折断脖子。

下山时，找不到路，车就在河道冰面上开。开快了，在那青玉色的冰面上打了一个360度的圈，我意识到要翻车了，不由得喊了一声“妈”，车转危为安，又平静地向前滑行。许是菩萨保佑，许是母子之间心灵的相通吧，我仍然活着。车到大众乡时，我已紧张得不能说话。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脑袋疼得像要爆裂，脖子的筋像被冻住，头也转不过来。看到成群成群的牦牛瘫在地上，多已死了。那死死的白色，使人感受到惊栗与恐慌。

正是死亡线上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让我写出了三千多字的通讯《震撼世界屋脊的壮歌——来自西藏抗雪救灾一线的报告》。这篇通讯由新华社总编辑何平亲自编发。何平打电话给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徐光春又与《人民日报》打好招呼，总编辑范敬宜批示是一篇感人的好文章，安排在全国两会召开前一天发出。通讯为《人民日报》全文刊用，当即在“两会”上引起反响，使得西藏雪灾成为中央领导与北京各新闻单位和西藏领导交谈时的主要话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在北京开会期间专门打电话给分社，赞扬这篇通讯写得好，发得及时，社会影响大，感谢新华社的雪灾报道。《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在报纸上写出评论，认为“写得生动感人”。

在这场报道雪灾的战役中，新华社前后派出6批17人奔赴那曲灾区。技术员卓玛不顾孩子年龄小，也要报名“上前线”，我不同意。卓玛说：“老李，你们抛家舍业，从内地来这里吃苦，还不是为了我们藏族人。你们不怕苦不怕死，我们还怕什么？”说着眼泪往下落。在春节前，伍皓、卓玛等第6批人又进了灾区。区党委副书记丹增开玩笑说：“新华社已搬到灾区来了。”正是在这种直面生死、勇敢无畏精神的感召下，西藏分社出色地完成了藏北特大雪灾的报道任务。

中央领导江泽民、李鹏、罗干、姜春云、邹家华、李贵鲜分别在我们所发的调查上作出批示，促成中央“专门听一次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杨传堂同志对我说：“你们新华社太重要了，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大作用。”

1998年2月12日，新华社社长郭超人签发嘉奖令，嘉奖令里写道：

在这次报道中，分社全体记者、技术后勤人员积极请战，争先恐后，表现出了强烈的工作责任感、拼搏精神和敬业精神。主管业务的副社长李锦吸着氧气赴灾区，指导工作；援藏记者赵新兵、赵承，技术人员赵建国主动要求参加报道组；记者罗布次仁、白冰、驾驶员嘎玛及赵建国都是两次承担任务。分社参加报道的9名记者、2名技术人员和4名驾驶员，不畏海拔五六千米、气温零下三四十度、风雪弥漫的严酷环境，深入现场采访，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除夕夜，当千家万户喜气洋洋吃年夜饭之时，西藏分社第三支报道小分队4位同志却身处藏北部“无人区”的旷野里，因带去的方便食品冻成冰块无法食用，在茫茫雪海中挨冻受饿，表现十分感人。

希望全社同志向西藏分社的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忠于职守、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学习他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们连续作战、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进一步推动“抓作风、改文风”的开展，努力提高新华社宣传报道的整体水平。

郭超人曾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10年，以实地调查，写出很多好文章。他是在值班简报上看到这个信息的，要求发出社长嘉奖令。新华社一年也就是发几次，遇到特殊情况才发嘉奖令，表明他对我们西藏工作的关心与重视。

第五节 提出治藏方略

一、喇嘛叛逃事件

1998年9月，我刚从内地休假回来，刚进门，就看到社长马宁轩一脸焦急地在院子里等候。老马见到我，连忙说道，区党委等着你呢，已经催好多遍了。中央办公厅为这个乡的事情复电，在西藏是首次，中央在等着报告呢。

让老马心急火燎的事情源自一起喇嘛叛逃事件。几个月前，克西乡贡嘎县苏若林寺有11个喇嘛叛逃到了印度，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克西事件”。“克西事件”发生后，“美国之音”用藏语日夜不停地宣扬“克西精神”，欧洲30多家藏语电台也全力配合，一时间，“克西精神”像瘟疫一样，传遍整个藏区，西藏区党委压力重重。

老马告诉我，前一阶段这个喇嘛寺庙的人都跑空了，现在已经挖出经师，这个人与达赖分裂势力有直接联系。热地书记要求派得力人员解剖并总结，把调查拿出来，上报中央。中央办公厅在6月14日有个批复，中央领导等着了解情况。现在一个40多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克西乡了，陈奎元、热地、江村罗布、郭金龙等领导都非常重视。区党委常委会研究，最后决定还是请新华社的李锦社长出面调查。

我一回来，老马就派好车，把馒头、啤酒和氧气袋都装上车，让司机嘎玛把车开到楼下。刚回到拉萨的我还没有适应恶劣天气，但政情如火，进办公室把铺盖卷起来，又下楼带领伍皓、罗布次仁两个记者，沿着拉萨河，过曲水大桥，顺着雅鲁藏布江南行，直奔克西村。

克西乡位于贡嘎县，与甲日乡仅有一山之隔。1993年以来，这里接连发生了25起政治事件。从拉萨到山南，再往境外，便是达赖1959年的外逃之路，一些地方可以感受到达赖势力的影响。我意识到，达赖集团宣扬的“克西精神”是“甲日道路”的一种对立。共产党抓“甲日道路”，达赖那边便抓了一个“克西精神”，显然是一场对垒战。

到克西村的当晚，工作组的德吉、白玛朗杰向我介绍了他们掌握的情况。在苏若林寺调查时，我们一行与经师“老狐狸”展开了交锋。经师“老狐狸”群培是浪卡子县人，已经年过八十。早年他是哲蚌寺的喇嘛，1989年来到苏若林寺当经师。苏若林寺的活佛已经跑到印度，群培现在主持着寺里的工作。

我们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见到群培，他白发盈耳，胡子很长，表面呆若槁木。与他对话，只要谈及达赖，他便沉默以对，无一言外泄。尽管群培异常狡猾，但还是不能掩盖苏若林寺与达赖分裂势力的紧密联系。据群培招供，这20年间最令他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拉萨参加藏传佛教大法会，他们把录相带回来一遍遍看，边看边喝青稞酒庆祝，狂叫“到大干的时候了”。这些调查，让我的思考变得具体而深入。



调查期间，恰好遇到克西乡民主选举，同时又是防水工程的开始。人们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场面很热闹。

揭露了群培与达赖集团的联系，我进而思考，为什么达赖集团没有为群众做好事，却得到一些人的拥护？尽管群众拥护社会主义政权与共产党，但达赖在群众中的宗教和精神领袖地位却是难以撼动的。藏传佛教教义的“政教合一”与达赖地位的“人神合一”，是和内地佛教乃至西方教派不相同的。达赖搞分裂祖国的行为，非常容易煽动和影响群众，影响整个西藏政局的稳定。他的狡诈之处，正在于利用宗教寻找群众基础。调查时，我随身带来两本书，一本是《达赖喇嘛传》，一本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边读书边思考。达赖分裂势力确实是造成西藏不稳定的根源，研究达赖分裂势力与苏若林寺的联系，再调查寺庙与克西村、秀吉村、秀伍村的联系，我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

调查期间，恰好遇到克西乡民主选举，同时又是防水工程的开始。人们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场面很热闹。那一天，群众们特地为工作组唱了许多欢迎的歌曲。我问罗布歌曲唱的是什么意思。罗布告诉我：农村老百姓不会唱新的歌，很多是宗教内容的，有一首歌的大意是祝福达赖万寿无疆。我感到震惊。比政治制度更顽强的是文化信仰，宗教在西藏有深厚的土壤，从文化上去消解与抵制达赖的分裂主义将比投入资金修建大量工程会更为彻底与有效，但也更为艰难。

这件事，因为美国之音反复宣传，给我压力很大，中央要求写出报告。工作组进驻4个月后，陈奎元、热地、江村罗布与郭金龙陆续批示，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拿出大报告向中央汇报。这个汇报，非常重要。区党委决定由我们来写，压力一下子转到我身上来了。经过调查，我住在村里一行查明问题是由西藏主权归属讨论引起的。苏若林寺的喇嘛们拒绝回答西藏主权归属问题，导致扎西旺堆等6名喇嘛离寺，最后共计34人叛离。显然，这是达赖分裂主义势力多年经营的结果。

我前后5次来到克西村，深入调查这34人叛逃的情况，做出判断，使得我对西藏治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领悟。藏族人民是好的，老百姓是可爱甚至可怜的。尤其是分社的藏族人，我视他们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我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从根子上着眼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综合治理。以“克西事件”为切入点，在与甲日乡的对比与分析中，我们充分肯定系长区党委工作组的成绩，并据此提出了西藏长治久安的六项对策：

克西乡分裂主义势力活动逐步升级，是在我们宗教政策过于放宽的背景下出现的，为了扭转局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中央对西藏的正确决策不能动摇，坚决贯彻既定政策，使西藏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对社会主义政权与达赖的双重信仰，是克西乡乃至整个西藏社会出现混乱的思想根源，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是影响西藏稳定的主要根源。因此，必须坚决揭批达赖，使群众充分认清达赖集团的本质及达赖其人的形象，同时要不失时机地着手宗教改革。把“政教合一”、“人神合一”教条从藏传佛教中剔除出去。

克西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是达赖集团煽动群众分裂祖国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把群众主要精力引导到发展经济，创造幸福生活上来。

克西乡的一些人公开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基础。这里的寺庙组织健全，而乡村基层组织极为软弱。因此，一方面要整顿寺庙，动摇达赖集团在农牧区的根基；一方面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反分裂斗争的坚强堡垒。

克西乡政治动乱是与封建农奴制下的宗教文化氛围分不开的，而西方舆论攻势成为思想上的“助推器”。因此，与达赖集团斗争的主战场在思想与精神文化领域，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与农牧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把治穷、治乱与治愚结合起来，使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充分发挥出来。

克西乡分裂主义活动猖狂有着达赖及国际反华势力的指挥和支持，有强有力的国际背景。因此，应当制定综合治理的方针，实施大安全战略，内外统筹，加强边防力量，切断西藏与境外分裂主义势力的联系，并有效地打击境外的分裂主义势力。

后来，我与西藏领导人当面陈述了上述治藏方略，这六项对策明显比甲日经验进了一步，也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调查结束后，我带着伍皓、罗布次仁一起到泽当与山南地区领导交换意见。我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讲完之后，我请书记和专员指点。

向巴平措说，提出一个标准很重要，否则我们坐着嫌矮，站着嫌高，不知怎么办才好，千万不能再有起伏了。他讲了半个小时后，专员胡春华接着说了十分钟。他说区党委请李锦老师来调查，是对我们的帮助。你们调查很有深度，有事实，有数字，有观点，特别是六条方略有很强的规律性，深刻准确，讲到位了，他谦虚地表示一定好好学习理解。他还提出藏传佛教是在封建农奴制下形成的，根子在“政教合一”的制度设计。宗教必经改革，不改革是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寺庙管理问题难度大，问题多，很容易按倒葫芦浮起瓢，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对西藏存在的双重意识形态现状要有清醒的认识，想出破解难题的对策。

胡春华所讲的有些是多数干部没有想到的，足见他的思考深入而有见地，还有点学者的味道。他讲话很谦虚，但是深刻而与众不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到贡嘎县甲日乡、克西乡的两次调查，都是带着被、包住到村里，挨家逐户走访。而当时的山南地委委员、秘书长金书波从1976年参加工作后便在贡嘎县基层干起，对贡嘎县情况很熟悉，是为人诚恳、办事认真的干部。每次我写出调查报告，他都会认真阅读，多次称赞我蹲点调查作风扎实，问题抓得准，是个高人。因此新华社只要有人到山南，金书波总是会安排得很周到。我离开西藏前，金书波还专门为我送行。

二、凌晨的一个电话

在西藏的四年，我不仅要奔波调研，还常常要挑灯夜书。西藏的春节是氧气最少的时候。陈奎元曾对我说过，过一个春节，对身体的损耗相当于一个冬天。他劝我春节还是尽量回内地好。我到西藏整整十个月后才第一次回内地，连续在拉萨过了两个春节，平时也总是到深夜一两点才睡。拼命工作的代价，便是健康状况的每况日下。

1999年1月的一个凌晨，天还未亮，寒冷刺骨。我接到了区党委书记李立国打来的电话，一讲就讲了40分钟。

李立国是个责任心非常强、非常勤勉也非常负责的领导，区党委日常事都是他在操持，分社平时有事也是直接找他。也不知他是一夜未睡，还是起得太早，才8点就打来电话。拉萨与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8点便是内地的6点。室内没有暖气，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度，寒气逼人。接电话时，立国秘书长就稿件谈起看法。我没有料想到会讲这么长时间，也就没有披上衣服。没想到讲到中途，我就被冻得鼻涕流了下来，不得不拖来被子，裹在身上。身着单衣讲得时间太长，我的双腿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天亮后用热水泡了很久，膝头仍是凉凉的，显然寒气已经侵入身体。

早饭后，我身体开始发热，浑身无力，站不住。上午仍然硬撑着身体与记者一个个谈话，处理援藏的稿件。当天下午，我与马书平找到杨传堂采访援藏问题，边谈边擦鼻涕，手帕湿透了，杨传堂就把自己的手帕给我。严重感冒的我被马书平送到了西藏军区总院，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马书平与司机把我架到病床上。一量血压，竟然高达126 / 226，我自己也大吃一惊。在18岁离家参军后的三十多年间，我的血压一直维持在70 / 110左右，刚进藏体检时仍是70/110，不到三年间就蹿升了一倍，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只能住院接受治疗。

住在医院的日子，为了不耽误工作，我把骨干们都叫到病床边，亲自部署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与援藏报道。同时还坚持一手挂着吊瓶，一手写调查报告。因为李立国讲的意见，我得落实好，关键稿件得自己动笔。

在西藏工作始终有个把内地经验简单搬到西藏来的问题，弄不好便会使工作很被动。我多次向分社记者要求，关于反分裂斗争与援藏等重大问题，一定要在政治上与区党委保持一致。总社也规定，所有内参稿件都是由我签发，再传到北京去。没有想到我到内地休假时，有个内地分社的记者到西藏来抓“新闻”，把援藏的基本建设工程写成“面子工程”，认为应把资金用在农牧区民的脱贫上。这种脱离西藏实际的想法，激起西藏区党委与援藏干部的反感。这件事与西藏分社没有关系，但是分社顾全大局，尽力挽回过失，分社记者连写几篇内参，但总社都嫌份量太轻。社长郭超人、总编辑南振中都等着看稿子。无奈之下，已经躺在病床上的我只好一边挂水，一边自己动手写调查，写好一页就让司机送回城内打印。后来新华社内参发出我的稿件，也慢慢消除了误解。住院期间，自治区政府杨晓渡副主席与区党委组织部分管援藏的处长王志明都专门到拉萨北郊的军区总医院看望我，劝我一定不能干得太猛，以免寒气侵入身体，一辈子受累。

刚刚进藏时，我的身体还很壮实，没想到不到三年就垮了下来，一年不如一年。每天早上泡一大缸子水，放上十多根人参，把自己的气提上来。到后期已经很难支撑。几个春节，当多数援藏干部纷纷如候鸟般飞回内地时，我还坚持在西藏进行春节报道。一场大雪灾，几个难熬的严冬，无数个夜不能寐的夜晚，一点点地摧毁着我的身体。为了能多为西藏做点实事，最终却无可奈何又有几分悲怆地败给了恶劣的高原气候。我自己也觉得是拼

得太过了，组织上一遍遍提醒过自己，只能怪自己太要强了。

西藏留给我最刻骨铭心的，或许就是这终生难愈的隐疾。在其后的十几年里，病痛如同梦魇般，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我，如影随形。这是长期高血压带来的后果，而高血压正是那凌晨的一个电话带来的重感冒引发的。这样的结果，有些残酷与无奈。而李立国本人则一直不了解这个情况。

1999年9月，新华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张宝顺搞“三讲”到了西藏，要求当时还在内地的我马上回藏。这时候，张宝顺率领的工作组已经与分社干部职工谈了一圈。一见面，张宝顺便对我说，你在西藏继续干，西藏需要你。又说，大家对你只有一条意见，就是太不顾惜身体了。第二天，在区党委接待室里，张宝顺代表组织与我谈话后，拿出血压计亲自为我量了量，高压216。张宝顺十分震惊，他神情严肃地说：“你必须回去。大家都说你为工作拼命，我们不知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我说：“您昨天不是还让我在这里好好干吗？”

张宝顺情绪有些激动：“西藏需要你，老马也到点了，准备让你当西藏分社社长，但你不能把命丢在西藏！昨天那是我们不知道，今天我知道了，就不能看着你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组织上不能把一个干部的命丢在这里呀。”他劝慰我说，你放心，组织上一定对你负责，不会亏待你的。

这一年，西藏分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有多少人知道，这其中太多成就，是分社各族成员用自己的健康换来的。

三、再三要求回西藏

对于我来说，1999年是一个无限悲恸的年份。

11月18日，我到北京开会，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话，当即从北京直飞盐城，从盐城把车直接开到射阳医院的病房。母亲已处在昏迷状态，姨母们喊：“大儿子回来了！”母亲让人搀坐起来，枯干无神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转脸对弟弟妹妹们埋怨说：“你们哪个叫大哥家来的呀，他肩上担子重呀！”说完母亲又倒下去，很快昏睡过去。我泪如雨下。

2000年9月，我正式向西藏辞行。在西藏连过几个冬天，特别是经历那次大雪灾后的酷寒，寒气侵入骨髓，我的身体一下子衰弱下来，已经不能再承受高原气候的侵害了。我不得不向这块让我为之奋斗了四年的土地告别。

在西藏待了四年，可是很多地方还没有看过。临行前，我特意到天葬台住了一夜，走访一夫多妻婚姻制的家庭，看了珠峰。我第十二次来到甲日村，这个被我搅得风生水起的地方。贡嘎坚参书记走了，寺庙仍然在那里。回想四年前，我一次又一次地到村中调查，甚至冒着被达赖暗杀的危险将甲日经验推广出去，不由地生出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我找到丹增加措，年迈的丹增加措住在果园里，睡着地铺，日子仍然很艰难。我留下300元钱，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也是一种安慰。

我是满怀感激离开西藏的。在西藏有一批长期驻守的汉族干部，对援藏干部给予很多支持与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走时，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杨晓渡还专门送行。这位上海来的干部，对人非常谦和关心，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乃至到苛刻的地步，从大学毕业后他便在缺氧严重的那曲工作，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当财政厅厅长时，邀请我与记者马书平到财政厅去坐一坐。去时是星期天，杨晓渡自己烧水，为我们沏茶。谈完工作，杨晓渡便在家里招待我俩。两室一厅的房子，没有饭桌，就搬一张椅子，一人一个马扎。杨晓渡从厨房跑进跑出，一个肉炒芹菜，一个肉炒菜花，一个豆腐，一个花生米，最后再打开一个沙丁鱼罐头。然后又跑到食堂，以为能带回一个大菜，最后只拿回了三个馒头。吃饭时，我几乎要掉泪，此时已是90年代中期，一个财政厅厅长就是这样在家里招待新华分社社长的。

这位长期在西藏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干部让我从内心里由衷地钦佩。我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时，已经当上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晓渡听说后立即赶去看望，他最初在医院待过，帮助我号脉，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西藏有这样一大批好干部，与这些人相比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我也没有怨言。觉得在西藏虽然只有四年时间，待得却还不够。想起这些人来总有一种美好的情感冲击和洗刷着自己。

我又是带着遗憾离开西藏的。对于西藏纷繁复杂的局势，还有许多想法没有机会实施。如果不是熬那么多夜，如果不是在这里撑过那么多严冬和春节，也许还能多干几年，多写几组调查报告，为党和国家多解答几个大的疑难问题。

我感到遗憾的是，西藏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援藏新机制问题，青藏铁路、川藏铁路问题，拉萨50万人口大城市问题，藏南开发问题，大藏区综合治理问题，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改革问题，必须让西藏人民告别“政教合一”、“人神合一”的教义，需要十到十五年时间研究，把这些研究上升为中央意志，变成一系列新政策。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这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自己也就对得起国家了。

后来我给张宝顺、何平与其他领导都写过信，三次要求回西藏工作，哪怕临时组织的小分队也行，然而他们都认为我精神可嘉，但也仅此而已。

我任职的这四年，西藏区党委是满意的，陈奎元、郭金龙、杨传堂、李立国等领导都一再为我说好话；新华社党组是满意的，张宝顺副社长亲自考察并明确让我担任西藏分社社长。但是因为过于劳累，自己的身体垮在了西藏。我进藏时血压是70/110，出藏时是126/216，几乎翻了一番，我无法再干下去了。我的身体完全是在西藏期间垮下来的，而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也在我援藏期间去世了，我无愧于西藏！无愧于祖国！只是这四年，是在老母亲的思念中度过的，我回来了，母亲却永远走了，我虽移孝为忠，然而对不起生我养我的母亲。

第六章 漩涡：苟利国家，生死以之（2001—2005）



我白天办公，晚上写作，谨防别人告发说是“不务正业”、“干自己的事”，但最后还是病倒了。在病床上，我写完了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课题研究的最后部分。

那时的我自然不会想到，自己在病榻上辛苦完成的写作，会给自己带来多少非议和责难。

第一节 提出“新阶层入党论”

一、百万富翁当支书

2001年，党的政治制度建设成为改革的一大焦点。

仅仅20多年的时间，日新月异，恍若隔世。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令世人惊奇不已。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一个令人血脉贲张的事实。进入新世纪，整个世界都在重新想象中国。而在剑舞笙歌、昂扬抖擞的步伐中，中国、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提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加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包括要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以外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讲话发表后，国内外掀起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走向何方的激烈争论。一时间，许多人对于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是否破坏了党的章程，甚至对于共产党究竟代表谁这种根本性的问题都产生了诸多疑义。

从西藏回来后，领导曾提出过让我到云南分社当社长，可是我觉得自己对山东熟悉，在山东更能拿出成果来。已经50岁的人，也不想再出去了。在山东分社担任党组副书记、副社长行政职务时，我更感兴趣的仍然是党和国家重大难题的研究，看到“七一讲话”后，我敏锐地感觉到党的建设历史上的两个重大突破即将到来：一个是党的群众基础与影响力问题；一个是党的组织建设与创造力问题。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自己一直跟踪调查的兴福镇，心中不由升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感。



图中这位名叫李本庆的老汉，便是在为王树学请愿时，长跪在地的村民。我提出“新阶层入党论”便是从这位老汉的举动开始调查的。

7年前，我曾在调研基地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官厂村发现一条令人振奋的新闻。那里的农民出于脱贫致富的愿望，把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建筑公司经理王树学选举为村委主任。因为王树学个人财产过百万，镇上不敢答应群众的要求。于是40多名农民签名捺印，请愿12次，一个70岁的老汉甚至在党委书记面前长跪不起。最后王树学被获准任命为村委主任。我意识到，这是中国农民继凤阳小岗村要求温饱的契约壮举后在政治领域的又一创举。在这组4篇的调查专题文章中我曾写道，“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一笔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必将在21世纪初发挥巨大作用”。我当面向镇党委书记建议发展王树学入党。后来，我又向滨州市委书记王道玉建议授予王树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我专门找到带头请愿并跪倒在地的老党员李本庆去调查核实，先后到官厂村去了6次，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报告文学《请村长》。

之所以有这样的预测，是因为职业习惯让我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眼前的事。世纪之交，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丢掉政权。这些政党失去执政地位，情况很复杂，原因也很多。从政党与其阶级基础和群众的关系来考察，有的是失去了自己原有阶级和群众基础的支持，有的是在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原有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对于新阶层的认识，与我的一次外访不无关系。两年前的一次俄罗斯之行曾带给我强烈的思想冲击。1988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到俄罗斯访问之前，新华社组织了一个采访组到俄罗斯实地调查，为领导人提供第一手材料。时任西藏分社副社长的我与新华社副总编俱孟军、河南分社社长赵德润、新疆分社社长冯诚、黑龙江分社社长解国记、内蒙古分社

总编辑王增海等人一起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再到鞑靼共和国，接触了从共和国总统、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到贫穷的农民，还有一批被称为新型资本家的前苏共干部。有两个镜头给我强烈的刺激。一个是11月7日的500万人大游行；另一个是苏共干部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过去写着“沿着列宁主义的方向前进”标语的地方，现在赫然写着“向着资本主义奋勇前进”。

回到莫斯科，我们一行采访到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久加诺夫当时正在组织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谁来替代叶利钦来领导俄国，世界瞩目。然而当时俄共经费非常紧张，久加诺夫代表穷人的党的纲领使得路子越来越窄，选票也越来越低。为什么只有穷人拥护共产党，而富人纷纷倒向资本主义？为什么俄共变成穷人的党，而没有适应形势变化，适时吸纳富人入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在俄罗斯的所见所闻，让我陷入思考之中。

由俄共的历史命运，我联想到中国：

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必须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在复杂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与此相联系，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巩固和壮大党的队伍，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保障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我认定，必须要把富裕阶层团结过来，这涉及到对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特征的认识问题。20年前，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特征转变问题，但是没有来得及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特征问题。

找到兴福镇与“七一讲话”的联系，兴奋难抑的我立即打电话给兴福镇的朋友赵秀民，从电话中得知我曾经采访的一批百万元户中已有24人担任党支部书记，我的神经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立刻带着对外采访部主任董学清一起，由当年的通讯员王际灵带领，找到老朋友王树学等一一叙谈。我发现变化已进入深层次，再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这种现象的。兴福镇群众的实践为我提供了思考的机会，也将我推到思想解放的前沿。我意识到，江总书记此时提出的这一重大主题，已被兴福镇人民的实践所回答与证明。市委书记王宗廉、市长孙德汉对我的调研大为支持，县委书记胡秉山与我妻子是党校同学，他安排刚刚上任的县委宣传部长林国华陪同我调研。

近几年来，博兴县委与兴福镇党委提倡“不以财产多少，而以思想好孬”为标准，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得这批百万元户中的24人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们带领群众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促使兴福镇经济收入每年以28%的平均速度持续增长。他们的成功实践，冲破了以财产衡量入党的思想藩篱，摸索出一条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的创造力的道路。

兴福镇有党员1193人，从1990年以来新入党的有270人，其中新入党的党员75%以上是当地被称为大户的富翁。这些人几乎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闯荡市场中迅速致富的。官厂村百万富翁王树学入党当支部书记的消息，如巨石投水，在兴福镇引起了巨大反响。接着，出现了赵村请王志华、西秦村请郑吾昆、东秦村请秦国明、福旺村请李志云回村当党支部书记的事。请百万富翁当村支部书记，成了兴福镇群众自发的请愿潮流。

林国华向我介绍，兴福镇农民请百万富翁回村当支部书记的举动，在当地引发了激烈

的争论。有些老党员写信告到县、地、省，直接质问：让新财主入党、当家，共产党成了富人的天下。无产阶级丧失领导地位，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也有人反驳：有产者为什么不能入党？不少人认为，这些大户是在市场经济中涌现出的新人，懂经营、会管理、办法多、能力强。他们入党会为党带来新鲜血液，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素质，特别是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将为共产党人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县委当时没有表态。一些文件中关于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的提法，阻碍了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然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那就是这些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大户，都以显著的政绩，换得村民们的信任与拥戴。兴福镇在近十年来，社会生产总值由5900万元增加到13.2亿元，财政收入由负债增加到1447万元，利税由980万元增加到1.4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由750元猛增到3688元。所有的重要经济指标都在十年间实现了巨大的跨越。兴福镇的变化离不开这些新党支部书记。相比之下，这些大户担当支书的村庄都比其他村庄经济总量高出数倍。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依靠权力致富，而是靠辛勤劳动致富的。有了权力后，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这是一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我把从群众中调研的结果给新华社常务副总编辑何平写了一封一万八千字的长信。何平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那年我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何平刚当记者便负责采访团中央，我们认识较早。这封信，我结合时代变迁，对兴福镇新阶层入党进行了分析：

“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兴福镇涌现出的新一代青年企业家便是他们中优秀而成熟的代表。这就对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对于这些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动中出现的新变化、形成的新社会阶层，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具体地说，是应该把他们吸引和凝聚在党的周围，还是把他们推到党的对立面？能不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党的发展，对于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实在太大了。”

将新阶层纳入到党组织内，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质疑。有人认为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判断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我简要而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党是根据一定的理论和纲领而奋斗的阶级组织。因此，阶级出身、社会成分应该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标准，一切接受党的理论和纲领，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人，都应该吸收到党内来。”

我的以思想为标准而不是以财富为标准的看法后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思想建党论，遭到猛烈批判。

二、中央派来调查组

兴福镇是我的调研基地，从1993年以来的8年中，我先后15次到这个镇调研，累计达76天，最多的一次住了48天。

为了准确了解民意，我在调查时设计了3张表，设计了类似“在明年的选举中你会不会还投富户支书一票”等100多个问题，请宣传部长林国华安排，让26户富裕家庭与100户普通家庭填写，然后汇集、分析。结果87%的农民表示继续拥护富户支书当选。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调查后，我和董学清拿出了兴福镇新阶层入党的调查报告。这组调查报告，正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肯定农民群众的新实践，并把这一实践创新成果上升到理论创新去认识，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调查报告分《兴福镇24名致富能手当支书》、《“富支书”带来的新气象》两篇在新华社内参刊发后，引起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重视与批示。胡锦涛批示的内容是：兴福镇的情况值得关注，希望中组部调查。了解1990年以来这里发展党员、班子建设情况，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群众是怎么看的，通过这件事了解，看对新阶层入党问题有什么启示。

中央领导没有鲜明褒贬意向的批示，让当地干部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

不久后，中组部派出由两名局级干部、两名处级干部参与的调查组，山东省委组织部则配备了八九个人，由一名副部长带队。8月18日后，中组部与省、地、县联合调查组一行最多时达70多人，浩浩荡荡地进驻博兴，到我采访过的36个村庄进行调查核实。他们明确提出要一个村一个村地排查，绝不漏掉一个。对于我，调查组则采取避而不见的方式。那段时间，“李社长又犯错误”的说法在山东传得沸沸扬扬。

然而我的调查报告建立在长年的调查积累之上，每一个事例都是经过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与反复确认，并无半点虚假。调查组最终认为，兴福镇新阶层调查报告中的情况是属实的，兴福镇的做法是群众实践的创新，不仅回答了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各种成分人员入党的问题，而且对探索新阶层参与执政问题起了“探路”作用，意义很大。

最后，胡锦涛在中央组织部派出的调查组所写调查报告上再次批示：“看来这件事可以做结论了。”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胡锦涛作出批示之后，吴官正、张高丽、赵志浩、吴爱英、王建功、李春亭等省领导相继到兴福镇考察，并作出肯定性评价。2002年3月，山东省社科联、新华社山东分社与滨州市委组织专家学者考察兴福镇基层党建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并做了研讨。

我与董学清的调查报告相继为《山东内参清样》、《山东内参》、《中直党建》、《新华社专供信息》与《党建参考》等刊物转载，并被新华社评为国内优秀新闻作品和2001年新华社优秀内参调研作品。我为兴福镇前后在新华社发出8篇内部调查，一个镇调查刊发8篇，是极为少见的。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对兴福镇党建调查在实践与理论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予以肯定。总编辑室还专门发出通报表扬。我这时已经50岁，这是我自29岁首次被通报表扬以来，新华社与地方党委的第13份学习李锦的文件。

这份题为《高度重视深入基层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文件，在对我与董学清提出通报表扬后写道：

兴福镇调查的成功是记者长期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结果。具体表现在：

建立调研基地，长期跟踪调查。兴福镇是山东分社副社长李锦的调研基地，从1993年以来的8年中，李锦同志先后15次到这个镇调研，累计达76天，最多的一次住了48天。因为根扎得深，对这里情况熟，所以江总书记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影响力及创造力问题后，记者很快就能把调查报告拿出来，这是长期积累的缘故。

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一手材料。在兴福镇调查期间，他不要县镇干部陪同，有时搭车进村，有时与农民通讯员骑自行车串村走户；走访了36个村庄，采访了200多户。在采访官厂村党支部书记王树学被群众拥戴上台的过程时，先后去村庄5次，与他的母亲、妻子、弟兄、邻居、同事等30多人座谈，掌握了大量鲜活的材料。

结交农民朋友，摸准社会动态。记者因为长时间深入农户调查，在兴福镇结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听到了实话。总书记“七一”讲话发表后，为准确地了解民意，了解私营企业主对财产的看法，记者在这次调查时设计了3张表，让26户富裕家庭与100户普通家庭填写，然后汇集、分析，对事实的把握更具体准确，调查切合实际情况而又有新意。

这个文件认为，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以后，“十六”大召开以前，有大量的新情况、新经验需要总结，不走出机关大院，不深入第一线，我们会落伍。要高度重视深入基层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希望总社各编辑部门和国内外各分社的采编人员向这两位记者学习，发扬新华社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将新华社的报道特别是内参调研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这之后，我又赶赴兴福镇调查，把社会新阶层入党引申到参政问题进行调查，写出的《农民为什么拥护致富党员当支书》、《农村致富党员当村支书对党建工作的启示》等调查报告相继为新华社内部报道采用。实际上，我发出这组调查，更重要的是要为中组部调查组提供素材，我分析，中央要就这一重大问题拍板了，这个调查是节骨眼上的一个实证。我对调查颇不放心。因为新阶层入党问题在组织系统是受到强烈抵制的，与党章不符，政治上可能要受到抵触。我不仅害怕调查做出错误的结论，还害怕别人篡改事实，使自己遭受“失实”的指责。

在兴福镇调查时，一件令我十分难堪的事情，几乎使我陷入险境。中组部调查组在核实情况时，秘密逐村走访，分别谈话，使干部摸不清底细。地方上有些干部把私营企业主改为先入党，后致富。把兴福镇的私营企业主一律改为个体工商户，并把雇工人数改为8人以下。我熟知的范曰光，在1993年已雇工30多人，这次也被改成雇工7人。因为他们认为雇7个人不是剥削，雇8个人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例讲过7个人、8个人的事情。据说，工商部门有过对雇工人数的规定，也是根据马克思这句话制定的。我还专门打电话给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冯硕余，他是研究《资本论》的专家，他介绍了工商局在解放初制定8个雇工为剥削的背景。实际上，马克思仅仅是举例而已，并没有就此形成结论。但是有些人把马克思所言当做圣旨，有的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作祟，有的则是害怕在政治上犯错误。当时胡锦涛的第一次批示“兴福镇的现象值得关注”，并没有说“很好”之类的话，就使得地方干部摸不着底，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然而他们这样一改，篡改了事实，自己在政治上万无一失，却很容易把我送上报道失实的审判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吃过亏的。无奈的我甚至发下狠话：如果你们硬要改变事实，我们要上法院。

从此事可见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在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很多干部不是以对历史负

责与对群众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新生事物，而是以“上一级”眼色来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口口声声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然而新生事物出现在眼前，却噤若寒蝉，如临大敌，紧张得很。

当时，中组部调查组回到济南马鞍山路的组织部干部培训中心后，便进入全封闭状态。在三楼楼梯口，有省委组织部的人把守着，我上楼两次均被阻。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我强行甩开阻拦，径直上楼，找到中央调查组的房间。我把《大转折的瞬间》一书送给北京来的4个人，并告诉他们，1994年9月在飞机上我曾向胡锦涛当面汇报过兴福镇党建情况，胡锦涛当时说这个事可以放一放。接着我把个别干部歪曲事实的情况讲了一下，最后说，如果你们提出不方便，就写上新华社记者李锦的看法，他要求把新阶层入党写进十六大报告，写进党章，把党章开头的“无产阶级”一词去掉。调查组的负责人何泽中连连点头，表示可以把我的意思写进去。他是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这时在中组部帮助工作，他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并把我送到门口，给人一种很平等的感觉。

博兴县的这段插曲，让我认识到当下中国思想解放的艰难与必要。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不理解江泽民的“七一讲话”，思想理论上存在很大分歧。随后我将兴福镇的调查上升到理论高度，在150天内完成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课题研究，也正是以我调查的情况为依据的。

第二节 天下焦点

一、躲进卫生间里写作

2002年，我对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波澜，让我一下子成为舆论的焦点。

我的理论研究，表面上似乎事出偶然。

在党中央领导把“三个代表”思想提到新的高度后，我开始转向对整个20世纪的反思。刚刚过去的20世纪，发生了太多的重大事件。经济危机一个接一个，世界大战连着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之后是中国革命，无产阶级要替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阵营要包围社会主义阵营，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贫困的无产阶级与饥饿的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禁锢和公有制的快速过渡，经典神话的破产与现代科技大爆炸……历史走向疯狂又陷入沉思。我在兴福镇路边店里住着，胸中不断翻腾着世界风雷与历史云水。

兴福镇农村社会新阶层出现并且带来党的建设创新，引起了我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的重新审视，并引发了我对毛泽东思想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重新审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读马列运动，对《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等20多本书是读过多遍的。经过30年，再次反思这些著作，有些新的看法。我认为，尽管在实践上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左倾”错误根子在于理论的错误，在于毛泽东错误地判断时代特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作为中国的指南，这表明毛泽东后期思想是列宁时代思想的惯性运动，还停留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而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三个代表”思想为第三代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由此，我不由自主地进入到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重新划分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列宁、毛泽东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邓小平以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为核心，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趋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开辟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做了准备。从整体看，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系统，每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重点。强调另一面的东西多一些，这正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及随着实践而发展的生命力。

这段话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的“纲领”。一次酒宴上，我兴之所至，与包心鉴、李建军等山东政治学专家们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上述见解。包心鉴是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在山东理论界是很有影响的。他与我同为苏北人，相交多年。当时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也在座，他比我还要激动，再三恳求我能将这些观点写出来。

从2001年7月18日至10月28日，我用了100天时间，把初稿写了出来，又用50多天修改。150天，把48万字拿出来了。这段时间里，我白天还要全身心地从事行政事务工作，无休止的会议，无休止的应酬，使我疲于应付。每天到深夜10点才有时间学习和研究理论，而且要关起门来，谨防别人告发说是“不务正业”、“干自己的事”。我这时已年届50岁，每天都是写到凌晨两点，然而进入理论领域似乎是个新生，有种激情不可抑制。这一年中，我有15个夜晚是在办公室的写字台上度过的。写作此书时，血压一度涨至

120/220，头像崩裂一般，被迫住院。在医院我依然一手挂吊瓶，一手修改文稿。有一天甚至一直写到天亮，省立医院值班的护士长孟巧云发现后，像吵架似的阻止我这样拼命。

自此我成了孟护士长的重点监护对象。每到深夜11点，护士长就每隔几分钟过来敲门提醒。我总是央求她再过几分钟，把这段写完就睡。一次凌晨三点，护士长透过监视窗发现床上没人，病房卫生间灯亮着，为了躲避检查，我只得偷偷躲到卫生间里写作。

那时我自然不会预想到，自己在病榻上辛苦完成的写作，会带给我多少非议与责难。

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中，我通过对山东省兴福镇的个例分析，从新阶层入党问题入手，分析新时代的特征，作出三代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我对党的社会基础与影响力、新阶层入党与参政、劳动价值与剥削及民营经济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理论观点的研究有自己的见解，敢言人之未言。

中国政治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山东政治学研究会会长包心鉴为本书作序，他写道：

李锦同志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前瞻性与独立性。在这本书中，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立足于从时代特征与主题转换上提出与回答问题。他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共产党执政与建设时代的转变入手，强调新的时代主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方向。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任务、动力与依靠力量，以批判的眼光论及所有制等敏感问题，提出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见解，敢于怀疑，也敢于直言，以新的观念表达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本书内容不仅涉及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涉及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党建等诸多领域，涉猎面宽，信息量大，且通过个人特立独行的研究，开拓人们新的思考空间。李锦同志这种广读博览态度和严谨治学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可以说，我在有意识地通过这本书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激荡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波澜，尽管它可能置自己于牢狱之灾，灭顶之险。果不其然，这本书出版后在理论界掀起的一场轩然大波，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二、准备坐牢

萧伯纳曾说，许多伟大的真理，开始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亵渎的行为。

2002年5月，《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籍问世后的7月至9月，正是思想界最为活跃，攻击新阶层入党论最为集中之时。这本书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理论界正为“三个代表”是否写进党章争论不休，新阶层入党问题成为议论焦点。而我在书中写的几个观点，是焦点中的焦点。当北京思想界、出版界了解此情的人缄口不言，一片沉寂时，此书的问世就如同一把花椒撒进热油锅，使得理论界顿时沸腾起来。不到三个月，这本书便销售一空。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所的一位研究员，专门写了一封《给中央领导的信》，上书党中央，要求严肃处理李锦。信中写道：这是需要在十六大前后组织全党首先是党建研究会系统和党校系统认真研讨辩论的一个特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要求把我“从领导岗位上调开，清除出党。”

一家理论刊物的原副总编写下洋洋洒洒2万5千字长文，更是“汪洋恣肆”、“气度非凡”。该文诘问盘驳，咄咄逼人。例如“剩余价值学说过时论”一节写道：

此书作者以“捍卫”唯物史观的姿态否定剩余价值学说，其实，他所说的“唯物史观”也是冒牌货色。他向我们宣传，就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其他所有商品一样，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般等价物”。他告诫我们，“特别重要的是不能离开生产力来抽象地讲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他指责，“在干部政策上，有些地方和部门还没有把革命化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这是唯物史观吗？否，这是庸俗生产力论。……此书作者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剩余价值学说，又以庸俗生产力论来冒充唯物史观，这除了暴露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面目以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从网上看完这篇文章，我满头冷汗，连看4遍，一直看到凌晨5点，越看越清楚了。显而易见，这些批评文章是不承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否认生产力的作用。在文风上是抓住一点便无线上纲，尤其对生产力经济学的否定，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到了极其可笑的地步。然而不少文章指向深远，我只不过是一个靶子而已。我知道，“时代性质改变论”的提出是决定中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这是邓小平的观点，在十二大就提出来了，怎么都算成自己的呢？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建设论，追求生产力经济学的建立，立论基础是时代特征转变，仅此而已。随着历史推进，这个特征还会转变。正确结论也可能是发展与竞争时代。然而有些人固守原来领地，坚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这才是国家可悲之处。

山东社科院的研究员董建才为应付上级审查的要求，用钢笔写了3页纸，共计才600字，里面夸奖我的理论勇气。上面不同意，要求打印出来，不少于3页。董建才不予理睬，说我是学者，反正他们也不能撤我的职。他暗地里打电话给我妻子，说李锦了不起，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挺住。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我的理论产生共鸣。我国驻瑞典斯德哥尔摩领事馆总领事陈峰特地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国有我这样的学者，是中国的骄傲。这位在瑞典工作十多年的学者，通过对比分析，认为不需要革命和战争，可以达到社会财产公有与社会保障的目的。我提出的社会主义目的与道路要比瑞典党的纲领更为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走在人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面。《求是》杂志编委阎长贵是山东阳谷人，曾经为江青当过秘书，他

则给包心鉴写了一封长信，认为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

三、党章修改了两处

那段时期，是我极为苦闷的日子。

最可怕的不是理论战线的“左”，而是擅长官场政治的人。有人专门跑到总社作为重大事项报告，幸亏遇到的是南振中值班，南振中又将此事转给何平处理，何平与我交谈时认为学者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应该提倡探索研究的风气。

我到总社找到领导，提出现在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整了人的人，不负什么责任。对这本书，任何一个人如果做出评语，必须署上他的名字，他们必须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南振中问我：“你自己认为有什么错的？”

我说：“有几个错字。但我讲的道理没有错，对国家有用。我的部分观点会吸收进党的十六大党章的。”

我又特意补充一句：“我与北京的政界与理论界的人，一个人也没有联系过，只是我手写我心，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南振中听了不回答，也不表态，只是说：“你从西藏回来，一定要注意身体。”

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修智对我相知甚深，他知道后说：“伙计，你吃了大苦了，这个风险冒大了，不过历史会为你画上一笔的。”

十六大召开前，最高层决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阶层入党的思想写进党章。这场因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划分引起的争论，突然间烟消云散。一些极端的思潮，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看不出曾经有过猛烈批判的迹象。不可否认，对我观点提出批判的很多同志出发点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我的出发点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些分歧被不适当地扩大了。但我主要理论成果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及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划分，并以生产力为主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猜想，则是由于历史条件局限、自身能力的不足，难以承担这个过于重大的任务而致自己步入充满荆棘的领域，受了大难，我相信会有人继续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2002年11月8日到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十六大对党章做了一定的修改，其中有两处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二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改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后来采访我的记者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斗争时，认为我身上有一种极为矛盾的人格：服从上级，然而富有个性；处事谨慎甚至胆小，然而思想大胆甚至激烈；干活全身心投入，然后自己总是所得与努力不符。

我想了想，我在书上是这样写的：

学者应当有“党性”，服从组织的领导，但在人格上一定是要独立的。思考的自由和独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对一个学者尤其重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始终不忘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不渝的初衷，也是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东西。现在流行的“媚上”、“趋俗”、“从众”是影响学者成才的坏风气，从自己内心世界说，还是想得太多，顾虑得太

多。李大钊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学者的骨头应该是最硬的。

当时新华社有领导曾当面批评我不该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回答，领导号召学习马列主义，我响应了，这是我的学习笔记。若干年后，在好苑建国酒店一场觥筹交错的筵席上，《求是》杂志一名主编第一次见到我，连问两声：“你是李锦？你就是李锦？”他当着京城一批学者名流开玩笑说，你们都是传声筒，在座只有李锦老师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人。

第三节 调研花埠圈事件

一、干部被包围在村里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上升，基层稳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摆在全党面前。2003年5月，刚刚担任临沂市委书记不到半年的李群遇到了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2003年5月，刚从市长调任为市委书记没几个月，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就遇上了一个大难题。临沂市罗庄区的花埠圈村，是鲁南地区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一年多时间内，接连发生19起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此事不但在临沂，而且在山东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临沂市面对的难题。

从西藏回到山东后，担任领导职务的我行政事务多，但周末时间几乎都是在调研中度过的。李群是分社对外部主任董学清的山大同学，自80年代末就对我熟知。董学清是南振中、张百新、王进业和我等人之外跑临沂最多的记者，对我非常了解，时常对李群介绍我的调研水平。这一次，李群给我打来电话，说遇到了麻烦事，已经两个多月了，工作组仍在村里，怎么收尾，望李社长出高招。

8月30日，我带着年轻记者宋振远来到临沂。此时董学清已等候多时，并收集了大量基础性材料。李群把政法委书记李洪海、公安局长刘杰找来，说你们现在的头号任务是协助李社长搞好调查研究。当天下午，刘杰局长与政法委副书记陈安信向我介绍了情况，事情是5月17日发生的，已经快100天了。工作组住在村里，现在正准备起诉11名犯罪嫌疑人。刘杰又说，已经等您一个月了。

经过5天调查，我摸清了大体情况。罗庄区花埠圈村回族群众占全市回族人口的七分之一。前几年，因为经济利益驱使，这里出现了一股以沙某为核心的势力，他依靠自己的运输队和本族人马，掀起“打倒村霸”的横幅，打垮了村中的“彭家六虎”，并借机称霸，形成了超越于党支部、村委领导之外的力量。

花埠圈的这股势力在村中站住脚后就很快向社会扩散，周围村的群众备受欺凌。邻村红土屯村有9亩地与花埠圈相邻，被花埠圈的人强占后竟说：“都是共产党的地，占也就占了！”红土屯村群众被迫上访，可区政府慑于花埠圈黑恶势力的淫威，只得责成办事处出钱租地，让花埠圈村人白占。

2002年的“79事件”是花埠圈群体闹事升级的重要转折点。一些村民为达到垄断摊点的目的，以农贸市场内同时存在羊肉和猪肉销售摊点为由，开始滋事。寺管会有人提出“要讨个说法”，公开在村中大喇叭上号召、煽动闹事。500多村民手持木棍、铁棍、铁叉、砍刀、红樱枪等凶器，分乘31辆汽车冲进市场内，掀翻了正在生产经营的64个摊位，并将经营户打伤。砸了工商所与派出所后，这伙人又浩浩荡荡赶到临沂市委门口示威。

刘杰局长向我介绍说，民族村闹事有个特点，即一呼百应，群体出动，聚众作案，动辄上百人，从呼叫到赶至现场有时比110的出警速度还快。市公安局曾收缴过花埠圈村家家户户都有的一种小本子，上面列了53个电话号码，封面上赫然写着：“为了我们的生存环境，要团结起来，铲除一切恶势力。凡本村村民遇事，无论何时何地均可拨打以下任何电话。”

当时，这支“队伍”已经拥有了40多支猎枪和数十辆机动车。有的人还披上了合法的政治外衣，担任了区人大代表。核心人物躲在暗处，经常收集各地回民闹事的信息，研究对付公安部门的办法，甚至派人跟踪执法部门的行动，窥探方向。他常对群众说：“如果让共产党镇住了，就得缴这税那费，我们三辈子就完了，只有闹大才能畅通无阻。”

5月12日，市公安局在村外密捕8名骨干犯罪嫌疑人。与此同时，罗庄区委组织了70多名干部组成第一批工作组进驻花埠圈村，深入群众做工作，并召开村“两委”会和党员会。然而在村委召开的会议上，寺管会有人公开跳出来，要求把罪犯交给寺管会处理，并试图夺过话筒，动员群众闹事。座谈会僵持到天快黑时，一些群众已经聚集包围了村委大院，有人拿来一把铁锁，把工作组人员锁在村委大院内，企图以他们为人质换回被捕的8名犯罪嫌疑人。

当晚，数百名干警紧急救援，但在进村时遭暴力袭击。为避免正面冲突，干警撤出，驻村干部被困一夜。

我从市宗教局局长段胜浩的介绍中得知，如果公安部门从“79事件”时就开始打击花埠圈村黑恶势力，就不会有后来愈演愈烈的局面。一些干部存在“回民特殊”的思想，客观上起到了纵容的作用，还有一些干部认为民族问题政治风险太大，处理不当，可能就栽在一个事件上。这些顾虑使一些干部在处理花埠圈村的问题时“怕”字当头，畏首畏尾，不敢管，也不会管。

这时，刚刚上任市委书记的李群显示出了他的魄力。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明确指出：“花埠圈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民族矛盾，更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极少数坏人打着‘民族问题’的旗号违法犯罪，公开向政府与法律挑战。花埠圈的问题不解决，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共产党就在这里站不住脚！再不敢管，就会失去民心，丧失党在这里的执政地位。”我调查时了解到，李群说的这样一番话，非常振奋人心。李群把民族问题与违法犯罪问题分开来看，又把社会稳定问题与共产党执政地位联系起来看，对我的调研有很大启发。

面对紧张局势，临沂市委作出紧急部署。7月5日，组织工作组进驻全市所有回民村，开展大规模的群众工作，讲清花埠圈村的情况，分清民族问题和违法犯罪的界限。临沂市委还先后三次召开各县区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民族宗教局长和公安局长会议，成立指挥部，要求各县区配合行动，做好当地回民群众的稳控工作。

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高度重视花埠圈事件，多次询问事态情况，并指示保护绝大多数回族群众，依法打击极少数犯罪分子，确保社会稳定。他同时提醒临沂市，要注意探索和总结解决民族村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二、坏事变成好事

形势逐渐稳定。但三年前的“阳信事件”提醒着临沂市委市政府，事件远未结束。

2000年12月8日，山东省阳信县河流镇发生一起违反民族政策、伤害回族群众感情的案件。事件发生后，山东省按有关程序，撤销阳信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一起民族村冲突事件，导致地方领导纷纷落马。前事之鉴，教训严重。此刻临沂市委市政府也正处在类似困境中，面临着执政形象受损，乃至部分地方领导被撤职、降职的可能。当时工作组仍然住在村里，最后怎么向省委汇报、向中央汇报，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事件处理结果怎样，用什么方法处理的，有没有为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执政方面积累一些新的经验。

“阳信事件”发生后民族问题成了一大忌，谁也不敢碰。我在西藏四年，深知民族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法律上着手，才能抓住根本，否则极易造成混乱。在具体处理时又必须把民族问题与刑事问题分开来看，绝不能伤害多数民族群众，要坚信绝大多数民族群众是好的，这点必须坚定不移。

调查第二天上午，我对李群讲了三条意见：一是从政治着眼，不仅要从稳定上着眼；二是从党的领导思路着手，不要从公安经验入手；三是从国内和世界背景来理解，不仅从临沂、罗庄地区来理解。李群听了很高兴，认为调查有了高度，思路也新。李群和我讲，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不管出了什么情况，立场一定要站到群众一边，我们要扭转花埠圈的状况，最终是为老百姓的利益，包括回族群众，打击的只是违反群众利益的少数人。要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取得群众的支持，使党的威信比过去更高。这便是我们的出发点，李群的政治眼光与群众利益立场，对我形成深刻的印象，我也很受教育。

对于花埠圈事件的性质怎么定性，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我经过梳理后认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政法委、公安局为代表，认为法律至上，分清矛盾；一种是以统战部、民宗委为代表，认为是经济与文化问题累积的矛盾。不同于前两者，我是从政治角度，从执政党地位角度来思考的。我与李群、徐景颜、李桂祥、李洪海等临沂市领导一次次分析，从花埠圈的联络电话号码就可以看出，花埠圈事件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对执政党地位提出了挑战。

李群认可了我的分析，认为转化为政治矛盾的苗头已经出现，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但是要从刑事犯罪入手，不要激化矛盾，要能够把已经开始转化的矛盾再转化回来。李群的分析，增强了我的信心。在场其他市委领导也表示赞同，唯有民宗委领导在一旁叽叽咕咕。我解释说，我们在思想上必须要想到这一层，当然在处理时做到掌握好分寸，绝不把矛盾扩大。民宗委领导这才放了心。

之后，我与董学清连续到花埠圈村中多次，一次次与驻村工作组座谈。我们还研究了回族发展史与回族文化特性，在调查报告《民族村长治久安的新经验》中将临沂市委市政府整治花埠圈村的经验提升到新的高度，认为：“从花埠圈村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出国家治理汉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些重大问题，它从整体上构成我们对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村治理的应对方略。”

显然，我是把花埠圈当做一面镜子，从中看到整个中国民族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一组四篇的调查报告在新华社内部报道上刊登，报告呈送省委书记张高丽。当时全省正在开领导干部会议，张高丽在首页写了很长一段批示，认为事情发生是无法改变的，而变坏事为好事是可以做到的。他认为从临沂花埠圈事件可以看出临沂市委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得当的，效果也是好的，关键是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执政党在民族治理问题上积累了经验。

调查报告刊发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有位山东省委领导以反面报道为由，不同意刊发。他认为稿件中写的不都是好事，如果我们自己捅上去，会给山东工作留下阴影。这位领导的表态，让稿子拖了整整两个月。为此，我与董学清专程到北京送稿，汇报情况。我认为，少数人利用民族问题闹事是长期矛盾积累后的爆发，并不是现在的事。问题是作为执政党怎么认识这种现象，如何把社会稳定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临沂市处理花埠圈事件为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积累了成套的经验，为中央领导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结果证明，这份稿件不但没有给临沂市与山东省抹黑，反而使临沂市委市政府从不利局面中走出来，将坏事变成了好事，树立了临沂市委市政府的执政形象，也维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四节 寻找农民走向市场的对策

一、为了总书记的指示



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的我，每到星期天便下农村调研。这是在广饶县贾杨李村群众家中召开座谈会。

我的调研报告有两个规律，大体上是一年搞企业调研，一年搞农村调研，一年搞党建与精神文明调研，五年内完成一个循环，基本与党的中央全会精神相吻合。而在2005年这一年，我便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查研究，分别涉及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村发展。

一个是和谐社会建设。当时，东营市委书记石军邀请我去东营调查东营市与胜利油田的关系。我从“工农关系、油地关系与贫富关系”三方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建设。石军是经济理论基础很扎实、概括能力很强，也常有精辟见解的领导干部，他在省经委当副主任时就负责理论研究工作，90年代总结出“改革、改组、改造”的“三改一加强”的现代企业管理思路，一时风靡全国。他出过书，获得过社会科学研究奖。在调查时，石军提出“用老板的钱发展经济，用政府的钱搞好民生”的口头禅，强调政企分开的思路。我很佩服他的概括能力，据此写出题目为《一个市委书记的“土话”》调查报告，作为内参上送。这一次，我和董学清的和谐社会建设调查报告发到新华总社第三天，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中央党校讲话，专门讲了和谐社会建设。编辑徐江善十分惊讶，开玩笑说：“你老李总是早走一步，总是提前几天稿子来了，然后总书记便讲话了，鼻子太灵了。”那一次，新华社发了4篇内参，回良玉、王乐泉、张高丽等领导对稿件都做了批示。

第二个便是农村合作经济。进行农村合作经济方面的调研，是我在充分学习胡总书记的指示后进行的，这也是我在新华社期间在内部报道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组长篇调查报告，一组四篇，一万两千余字。新华社提倡写短文章，每篇内参稿件不超过2200字。许多记者终其一生也没发过成组的内参调查，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发出一组一万余字的内参调查。这种情况在新华社实属凤毛麟角。

2004年7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白立忱在呈报赴法国、荷兰考察合作社形成的《考察报告》时，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胡锦涛作出批示：“家宝并良玉同志：请予研究、并注意总结国内的经验。”之后，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相继作了重要批示。

胡锦涛批示后，全国供销总社党组书记周声涛想方设法落实总书记的批示，找了许多人研究，但一直没有形成权威的报告。这时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白志刚到总社汇报，说新华分社的李锦是农村问题的调研专家，准备请他调研。周声涛听后很高兴，约我到北京细谈。当时供销社正在装修，机关搬到左家庄，两人虽初次见面，却相谈甚洽。周声涛已经从网上看到了许多我写的调查报告，他说，“这是总书记交下来的任务，要求总结国内经验。我们缺少有水平的调研高手，总书记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得完成啊，压力很大”。

从总体上看，近10年来，农村问题缺乏探索性成果。尽管连续发了几个“一号文件”，但农村问题始终进展甚微。我认为，追根溯源，是过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延缓了“三农”问题解决的脚步。在就这一问题接受采访时，我说：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通盘考虑，统筹兼顾，要找准突破点，找准关键。我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最根本的还是实现农业产业化，让农民自觉地走向市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这是治本之举。

“三农”问题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坚持了这点，才诞生了两个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重要成果，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市场化改革是农村改革的主题、发展的根本，市场化应当是推行各项政策措施的一个总体目标。

我想起17年前的一幕。1987年5月，我途经湖北省大别山区的罗田县白莲河镇。当时我冒雨往武汉方向走，路过镇蚕茧站时看到上百位农民在雨中等待收购。而把关收蚕站大门的镇长不仅不收购，还训斥群众。经过了解，我得知这里的乡镇控制蚕茧收购权，禁止丝绸公司收购的同时也不让蚕茧贩子进入蚕茧收购区。然而当时因为连日阴雨，收购太多，烘干不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为了降低损失，他们就不收农民的蚕茧，把损失转嫁到农民身上。我在现场拍的三张照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批示要求处理好这件事。这件事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市场经济刚刚萌芽之时，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给我的印象仍然很深。

为了落实胡总书记总结“国内经验”的指示，我决定在山东范围内调查一下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状况，为党和国家寻找解决农村的思路。90年代开始，我便注意带年轻人，每次大的调研总是带一两个年轻人，对他们言传身教。这次，我找了山东分社内参编辑部的年轻记者王汝堂做助手。白立忱听说我要搞专题调研，还请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肖万钧专程到山东来协助调研。

在与周声涛书记叙谈时，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供销总社改成中国农村合作总

社，像党的农村工作部一样，提高农村合作组织地位，挽救不死不活的供销社。这个设想，引起了供销总社的极大兴趣。他们也希望我把这件事朝上推一推。

二、莒南经验

其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重点调查了农村合作经济比较突出的临沂、济南、枣庄、潍坊、烟台5市的8县，采访了包括农民、县委书记、供销社主任和专家四个层次的人群，走访了20多个合作社。

调查是第一位的，但“有准备的头脑”很重要。确立了主题后，我便下乡走村串户调查。另一方面，我利用晚上下班的时间，大量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关于合作社的经典论述，当今研究“三农”比较权威的白立忱、肖万钧、郑新立等专家关于农村经济改革思路的书和文章都读了。

调查中发现，山东省各级供销社出人意料地站到前台，不仅在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中发挥了作用，而且遏制了供销社全线崩溃的颓势。在全省比较规范的1.5万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来自供销系统的占到2000多个。例如在临沂市莒南县，供销社形成了“一网两平台”，“一网”指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到农村建设连锁超市，保证优质日用消费品下乡、合格农产品进城。“两平台”，一个是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设置规范的餐饮、娱乐、洗浴、理发、医疗、维修、劳务、技术培训等项目，给农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另一个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莒南县18个乡镇、759个村共开办乡镇连锁超市116处，村级便民店1002处，为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社区服务中心达到48处。

事实让我认识到，由供销社主抓农村合作组织，堪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新思路。人民公社解体已经20多年，一直未能有效地建立起农村经济组织，使得农民难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难以改变其弱势地位。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经济主体缺位问题。对于政府来说，找到了一个领导农村经济工作的“抓手”；对农民来说，找到了走向市场的“平台”。全国供销社有数百万干部职工队伍，有自己的营销网络和经营队伍，如果成功地实行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可望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而农业部门主要承担政府部门的工作，即结构调整、科技推广与农业执法方面的事务。

在给周声涛书记的一封信中，我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我们的改革应该坚持一个基本点，就是要从基层抓起，从终端农村“一家一户”抓起，使农民满意。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是农民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它的存在由农民决定。

我在山东调查，看到山东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很有示范性。他们的五级供销社明确分工，没有政府行政领导职能，也没有政策专营特权，体现组织、指导、服务、协调、管理、经营六项职能，不同层次担当不同职能。层次越高，职能越强。这样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纵向结构，推向全国，就形成了铺排全国的大网。

三个多月的调查后，我写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是组织创新——山东农村合作经济调查(一)》、《供销社应改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山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调查(二)》、《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新体系——山东农村合作经济调查(三)》、《领导重视要从“四个到位”抓起——山东农村合作经济调查(四)》等调查报告。

我一向强调调查报告要在最适当的时间传播出去，影响社会，推动历史进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将在2005年1月29日至31日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中央、国务院也可能会就供销社工作下达新的文件。如果这一组调查出来，可能会对起草文件的领导有所

启发。时间紧迫，时机难得。我专门写了一封一万七千字的长信给新华社副社长、常务总编辑何平。信中对“三农”问题的现状与根本原因、国外发展合作经济的经验、中国应怎样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等问题都作了具体阐释，并希望能作特例处理，把这4篇以最快速度发出来，以期能及时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调查报告发表后，很快便引起中央与省级领导的重视。山东省莒南县所做的成功探索，也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概括为“莒南经验”而为人所知。这一年12月2日至3日，“供销合作社与新农村建设暨莒南经验高层论坛”在临沂市举行。白立忱出席论坛，来自全国政协、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部门的官员与专家学者聚集一堂，热议“莒南经验”，畅谈供销合作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月27日，省委书记张高丽在到革命老区慰问职工和农民群众时，只安排了一个经济考察项目，即莒南县供销合作社农村流通服务体系，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通过这样的网络和体系，使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服务。山东省长韩寓群则让蒿峰秘书长代表他感谢我对农村改革提出好的建议。

按说，农村研究是我的强项，很多人看我重新投入农村研究，充满期待。我自己开始也踌躇满志，意图对农村改革推一把。但是，结果并不算理想，自己的本事也使出来了，积累的资源也用上了，效果却非常有限。看来，天时不利，一个人的努力毕竟是有限的。

第七章 活着：大丈夫当有为于世（2006—2014）



少年时，我比较敬仰屈原那种上下求索的悲壮情怀；稍长，对司马迁坚韧不拔的毅力很钦佩；后来注意到马克思也是记者出身，不断转移研究目标，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常以“致君尧舜上”当作自己的追求。

金融危机的到来，为我再一次提供大机遇，没想到一封信引起大波澜。事后提出

了“对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对国家重大难题的破解力，对社会进步的引领力”的人生价值观。

第一节 社会稳定善治论

一、从“瓮安事件”确定平安协会方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猝然而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国际盛事的相继召开，使得这一年欢快与伤感交错，五味杂陈。颇多起伏的局势中，“维稳”成为一个新鲜而关键的名词。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爆炸性数字的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突发事件易发频发。

2008年下半年，我出乎意料地进入到了社会稳定领域的研究。

泰山以东，有座徂徕山，再向东是莲花山，往东南则是蒙山。这一代是著名的鲁中山地，山东的屋脊。从飞机上看，山山相连，只有群山中的洼地里有一条条大路游走相通。而在群山之中，有个名为“新泰”的县级市。与孔子、伯夷、伊尹一起被孟子称为“四圣”之一的“和圣”柳下惠便生长于此。

到新泰市调研纯粹出于偶然。

我曾在泰安写过一篇公安打黑的调查，得到高层批示。一次酒席上，新泰市政法委书记刘玉得知对面坐的是我后，马上站起来敬酒说，我们遇到真人了。刘玉是很想办事、能力很强的干部，于是把我请到了新泰看看。

新泰市地处四个地级市交界处，人口多，少数民族聚集，很多乡镇位于矿区、库区、山区，各种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社情十分复杂。新泰平安协会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由民营企业家为保卫企业财产、保护经济发展环境自发组织起来的，是一个“看家护院”性质的民间组织。

一到新泰，我便抓住平安协会号脉。社会管理是党的一大主题，平安协会可望成为这方面的典型。但平安协会的独特性在哪里，我频繁地往返于泰安与济南两地，却迟迟找不到好角度。就在这时，“瓮安事件”的发生让我的思路陡然清晰起来。

2008年6月22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女中学生李桂芬溺水身亡，死者家属不服尸检结果，请愿人群于28日下午与警察对峙，现场秩序发生骚乱，冲突升级，持续时间达7个小时以上，最后造成瓮安县委、县政府等单位被烧毁办公室160多间，46台机动车被烧毁，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人员300余人。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被称为“瓮安事件”。

“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新泰调查。每有一点变化，刘玉便从网上下载下来，供我分析。我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在发生两场地震，一是“汶川地震”，一是“瓮安地震”。“瓮安地震”是社会的地震，是群众与政府矛盾碰撞后的大地震，震源在于政府与群众利益的矛盾不平衡。而政府与警察直接参与群体事件的处理，使矛盾加剧。出了事便让警察出面弹压，这种方法太传统了，是一种陈旧的国家治理方式。

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有些地方在总结教训时，多是从“预警不力”等角度去总结。我

觉得这样总结只能朝错误方向引导，最后只能强化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是条绝路，必须换一个思路，提出新的经验来。我对刘玉说，这个新经验我们来创造。

在分析“瓮安事件”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提出一系列建议，推动平安协会加大群众参与社会稳定治理的步伐，逐步走上依托协会、专群结合、预防为主、“德”“法”并重、协调合作的良性之路。平安协会也从成立逐渐走向成熟，各种体制机制开始逐渐健全，职能不断拓展，从最初的看家护院、治安防范发展到矛盾化解、法制宣传等方面，逐渐承担起了政府原先一些做不了、做不好、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之后，平安协会职能发挥又上了一个台阶，由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向推动经济发展、巩固基层政权延伸。

我的对策与建议，被地方政府吸收，很多变成文件精神。我到北京工作后，市政法委副书记张新德和市综治办主任泥德润经常到北京看望我，介绍基层平安协会的发展情况，听取我的意见。

二、把群众路线引入社会稳定

在新泰平安协会，我发现了一个著名的“洪马斗法”案例。

1997年，禹村的农民洪来明、马洪强二人的合伙生意在散伙清算时，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为了5万元，几年中，官司从基层院打到省高院，先后判决6次，马某和洪某互有输赢，并且都被拘留过两次，但矛盾依然没有化解。不仅如此，洪某、马某两个家族也参与进来，斗气斗法，两家筋疲力尽，56岁的马洪强头发全白了。最后双方都落得倾家荡产，靠卖煎饼、借债和捡破烂来筹钱打官司。镇平安协会做了一年多工作，采用民间妥协和解的方法，终于使两人握手言和，签字画押，表示永不再诉。

为了弄清原委，我反复进行过十多次调查，有时到两个当事人家中去聊天，一聊便是一天。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实地调查，走进一个个农户家中去访问。发现我们国家治理落后的原因，很重要的是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国家治理需要现代化，需要动员群众参加治理。我到新泰23次，这种调查方式，在泰安市激起反响。泰安市政法委书记郭德文说，再也找不到像李锦这样搞调查的人了。这显然有过誉之处，我只能感受人家的一片好意。

“瓮安事件”让我看到新时期处理突发事件的不合理处：地方政府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群众成为被管制的对象，而不能积极参与到社会稳定治理工作中，导致干群矛盾、党群矛盾一次次激化。“洪马斗法”则让我看到西方传入的公检法体制在中国水土不服，尤其是“治标”特色太过，依法办事和以法律为唯一准绳往往脱离中国实际，由此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平安协会则已形成政法专业队伍与群众自治组织联动的新型社会稳定管理体制，所代表的民间治本方法是一个补充。由此我提出了一条“人民治安人民办，社会稳定社会管”的善治之路。这两句话，已被平安协会镌刻在协会大门两边，成为协会灵魂。

2008年7月10日，我以内参形式对平安协会进行了报道。在《执政党领导农村基层政法工作的思路创新》、《找到抓社会稳定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一组调查报告中，我对新泰经验作了详细阐述。柏继民、郭兆信、杨鲁豫等诸多领导作出批示。

调研报告发了出去，如何推广平安协会的经验？我想到了老朋友包心鉴。包心鉴从“沂蒙精神”研究开始，就与我有过多次合作。往往是我从基层中抓出典型，包心鉴从理论上写出报告，召开理论研讨会。以至于山东理论界将我们的合作称为“包李模式”。这一次，我又把包心鉴拉到了新泰。之后，包心鉴带着我特地赴京，找到自己的一些朋友，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求是》杂志社总编辑张晓琳、《人民日报》理论部张书林等汇报平安协会情况。

2009年11月28日至29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机制创新暨新泰市平安协会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新泰举行。我作为平安协会的跟踪调查者，做了主题报告。因为中国政治学研究会招牌响亮，一些著名学者如李慎明、房宁、杨海蛟、周光召等都悉数来到山东调研。

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新泰经验引起了我国理论界和政法战线的高度关注。全国有10多个省市的政法部门专程到新泰学习平安协会建设的经验。有30多个部门和单位的专家到新泰市调研。专家们普遍认为，新泰经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领导，群众为主，预防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平安”的社会稳定现代治理新思路。

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我先后23次来到新泰进行实地调查，累计写出3万多字的文章，

相继为《学习时报》、《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选用。我与包心鉴主编的《平安之路》一书，详细总结了新泰市平安协会的经验，也被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9月出版。2010年8月，新泰平安协会的调查获得了山东省第二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当下中国的调查研究，往往事例充分而缺乏理论支撑。于是我更进一步，依据对平安协会的亲身调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对现实社会的体察以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憧憬，从坚持群众路线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稳定善治论”。在《“社会稳定善治论”与未来研究——以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社会稳定治理为例》一文中，对“社会稳定善治论”做了一个定义：

社会稳定善治论，是针对基层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能力、方法上无法跟上时代要求的现实，以实现社会动态稳固为目标，以善治为手段，是动机、手段与结果相统一的理论。具体内涵是：以政府转型为起端，以多元参与为主要内容，以矛盾化解为任务，以“德”“法”并重、协调合作为基本方法，以稳定和发展为统筹，以根本改善社会环境、实现社会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治理活动。

我的“善治”理论强调的是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稳定善治论”就是将西方的公司“善治”引入社会稳定领域，是一种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稳定的合作管理的理论。从实践上看，它是使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我的意图，通过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找到国家现代治理的一条路径。我觉得，从统治到管理，再由治理到善治，是一个转变过程，也是国家由旧式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这也是国家治理转型的任务。在新泰，我把这种看法倾泻到社会稳定问题上了。

然而在哲学方法上，我则坚持中国的“本”的哲学，我在几次研讨会上，都猛烈地抨击西方的公检法理论，认为这是西方“标”的哲学，对西方公检法的理论与方法，要改造，让它适合中国这个“水土”。像梁漱溟的乡村调查一样，我走村串户，树立起一个新典型，表达自己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在平安协会的树立过程中，我不仅去发现，而且去引导、去培育“善治”的新典型。但让我倍感焦虑的是，当下我国政治系统在十八大前的几年对典型的总结与推广，似乎过于迟钝与被动。

三、一年38篇稿件被批示

平安协会的调研与社会稳定善治论的提出，只是我在这一阶段众多调研成果中的一项。这几年，我专注于调查研究与理论探讨，仅2008年，所写调研稿件就有38篇被领导批示。

有人说新闻是年轻人的事业，新华社是个养小不养老的地方。尤其在这个信息量极速膨胀的时代，新闻记者往往到了55岁之后，就会被无情地驱逐出新闻一线，这也是大多数新华社记者晚年的命运。55岁后的我，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被宣布不适宜再聘任为记者，不再考核，写出新闻稿件也不能刊发，实际上已经提前被迫步入了退休赋闲的阶段。

在我看来，有些人以动态性新闻为生，年长了往往不如年轻人如鱼得水。相反，靠思想性新闻吃饭的人，四五十岁正是深度新闻生命的开始。

面对体制的束缚，我做了一番挣扎。

2008年，山东莱州市开展道德建设工程，市委书记林建宁派出数路人马，寻找高人指点，有两路人马都找到了我。我把莱州的公民道德建设经验从孝德、诚德、爱德为主题的“三德”工程总结。稿件在中国新闻社内参刊发，山东省省长姜大明、省委副书记刘伟、省委宣传部长李群批示。我总结的“三德”工程，为十七大道德建设论述的提出作了实践性的探索。

就在此时，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社长王鲁平找到了我。中新社山东分社要建立内参平台，想聘请我为顾问，实际上做的是总编辑工作。

沂水“生物养猪法”总结，是我在中新社发的第一篇调查。

2007年底，山东省政府畜牧办慕永太主任带了一大堆材料到我办公室介绍情况。因为畜牧办要与农业厅合并，他们想让上面领导了解一些成绩。我注意到，材料中有一份讲的是生物养猪，是宋平建议张高丽抓的。生物环保养猪酵母素是从日本洛东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引进的，宋平了解后，认为中国也可以试验。张高丽又把任务交给了慕永太，现在已经初有成效。宋平是我非常尊重的老领导，20年前，他对我的九间棚调查高度重视，曾派秘书彭清华专门听我汇报，并写信给姜春云，要求推广这一典型，使得九间棚影响迅速传播。生物养猪是宋平老人家让做的，我觉得更应该宣传推广好。

“猪病”与“猪肉贵”的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焦点。那时从英国传进来的“蓝耳病”很厉害，一死一大片，许多村民瘫坐在地上哭。猪肉少了，价格于是大涨。那年8月，猪肉由八九块一斤涨到十三四块。猪肉一涨，什么都跟着涨。新任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一上任，就碰上这个棘手事。那年温总理亲自到陕西去调查研究，回良玉副总理跑了几个省，开了几个电话会。国家拿出1000多亿补贴，养每头老母猪补50元，一头小猪补10元，以此刺激农民养猪积极性。我认为，拿钱补贴农民养猪是好事。但从根本上解决生猪发展问题，还需要找出一条路来。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全国人大代表、九间棚村支书刘嘉坤听，希望他在“两会”上讲一讲。刘嘉坤后来在“两会”上发言，胡锦涛总书记听得很认真，停下笔，点头笑了笑。

建议虽然上达天听，但问题远没有解决。听了慕永太对生物养猪的介绍后，我决心亲

眼看一看。我在临沂市副市长刘彦祥的陪同下来到沂水县长安村尹申健的养猪场。当时屋外气温零下5℃，寒风凛冽，一进养猪大棚，眼镜片马上浮起一层雾。大棚里温度高达20℃，很暖和，小猪们撒腿欢跑着。这时沂水县赵县长抓起一把猪粪让我闻，我吓了一跳，一闻，竟然全无气味，只有糠谷的香味。赵县长说，20分钟前还是猪粪，因为生物发酵，猪粪就迅速转化。怪不得一个偌大的可以容纳2000余头的猪场，竟没有一点臭味。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身着白大褂出入，很干净。尹申健告诉我，这叫生物养猪法，把玉米秸秆、稻壳、木屑粉碎，做成猪圈垫料，形成80公分的发酵床，然后在上面拌上微生物菌，使猪尿、粪分解转化，臭味便没了。没有臭味与蚊蝇，猪活得舒服，发病少，用药少，猪肉也达到国家无公害标准，农村也不再为环境污染操心，一举多得。

短短一小时的现场察访，我十分惊喜，闷在家里三天，上网查阅国内外资料，确认这项现代化养猪技术是一大进步。1980年前是既吃猪肉又积肥，到了21世纪，用化肥多了，猪粪不值钱。工厂化养猪多了，水土污染问题又变得很突出。现在解决了养猪生病与污染环境的问题，确实是现代农业的一场革命。我不禁想起邓小平早就做出的预言：“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问题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我认为，这件事应当让总理知道，这是帮助他卸去一块“心病”。于是以“养猪业的一场革命”为标题迅速成文，通过中新社内部信息清样给国务院领导发去。

2008年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回良玉副总理在《山东组织推广环保型养猪新模式》的调查上批示：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山东省沂水县环保型养猪的新模式，以此积极稳妥地推进生猪规模养殖的发展和科学养殖的水平。首先应在全国选择若干地方进行试验示范，并强化技术指导和支撑。接着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副部长张宝文、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姜大明接连批示。

沂水生物养猪法很快在山东省乃至全国形成一定影响。1月22日至24日，根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的安排，农业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司副司长王营带领调研组，到沂水县调研自然养猪法示范推广工作。5月21日又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全国自然养猪法示范推广经验交流会”。后来国家专项拨款几千万元，用于扶持、推广应用生物养猪法。

当时调查出来后，还引起了一些小麻烦。与沂水县相邻的沂南县有意见，说生物养猪是他们先搞起来的，面积也比沂水大。因为省委农村领导小组陈希玉是沂水人，便拉上慕永太和我，于是就有了“沂水经验”。我叮嘱刘彦祥副市长，都是临沂的事，你们要平衡好，否则传到外面不好听。刘市长说，一定，一定。这时与临沂市相邻的枣庄市也有意见了，说临沂人是从枣庄学的，那个尹申健便是到枣庄参观后才搞起来的。我只好劝道，你们先干有功，临沂人创造出经验来也有功，都是山东的事，就不要嚷嚷了。后来，吉林人也有意见，说这种做法虽是从日本传来的，但最早是宋平在长白山看的。

就在2008年，我组织起草了58篇调查报告，其中有48篇为副省级以上领导所批示，包括温家宝、回良玉、张德江、刘延东、孟建柱、王胜俊等中央领导。

从泰安市打击黑社会的做法、新泰市“平安协会”经验、武城县“监督县委一把手”经验、李沧区“网络执政能力”到青岛法院救济人制度，我的调查研究搞得很热闹，搞完一个再搞一个，登门邀请调研的从未间断。山东各地县的学术界、党政界常有人到济南找我，带着材料来请我诊断，听我分析，提出建议。这时候，我已不当社长了，但是仍然是天天有人看望，天天有酒喝。一顿饭吃三四个小时，边吃饭边听情况介绍，别出主意。

看到我搞得有声有色，领导批示不断，其他新闻单位感到了压力，辗转找到山东省委

领导。领导开玩笑，老李你不要干得太猛了，也要让人家有饭吃啊。

如今身在体制之外，我的新闻调研生命重又焕发光彩，这个是我内心值得自豪的。

促使我最终从庙堂走向江湖的是2008年12月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当时媒体正热火朝天地宣传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初期的一些典型案例被翻出来进行重访。中国第一个万元户的照片是我所拍，但是某家新闻单位在网站宣传时却不再署我的名字。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博客文章，激动之下便想自己试一试。于是我把在《新闻业务》上发表过的一篇《万元户的发现》找出来稍加整理发表在人民网上，没想到仅过十分钟便登上首页，接着又被转移到头条专栏，一小时内便有一万多人点击。新华社的大多数稿件也没有这样的传播效果，我异常欣喜，我意识到，互联网已经形成全民参与的新体制，每一个公民，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可以同台竞争，平等参与，这是对传统媒体的致命性冲击。

自此，我又相继在新浪网、理论网、搜狐网开通了个人博客，并成了我的年龄段中少有的对互联网十分钟情的人，基本保持三天一篇博文的写作速度。仅2009年，我便发出博文60余万字。我的博客，更新速度快，内容新鲜，面又宽。国家重大政策出台，我便马上写文章评论，当然这些评论绝不是政治性的表态，也不是理论性的阐述，而是智慧性的分析。写了大概一年时间，中央党校理论网将我的博客作为首席博客来推介，在搜狐网财经博客专栏中，我位列茅于軾、张五常、陈志武、周其仁、许小年之后，在新浪网财经热门博客专栏中，我列于叶檀之后，为第二位。似乎成为拥有众多拥趸的网络意见领袖，这种感觉在以前是找不到的。

我庆幸自己能够转型成功，终于在新华社体制外寻找到一个更加开阔与自由的天地，更有如鱼得水之感。我感谢旧体制对我的“抛弃”，使得我“逼上梁山”，在“江湖上”掀开生命中新的一页。

第二节 上疏温总理 报告信贷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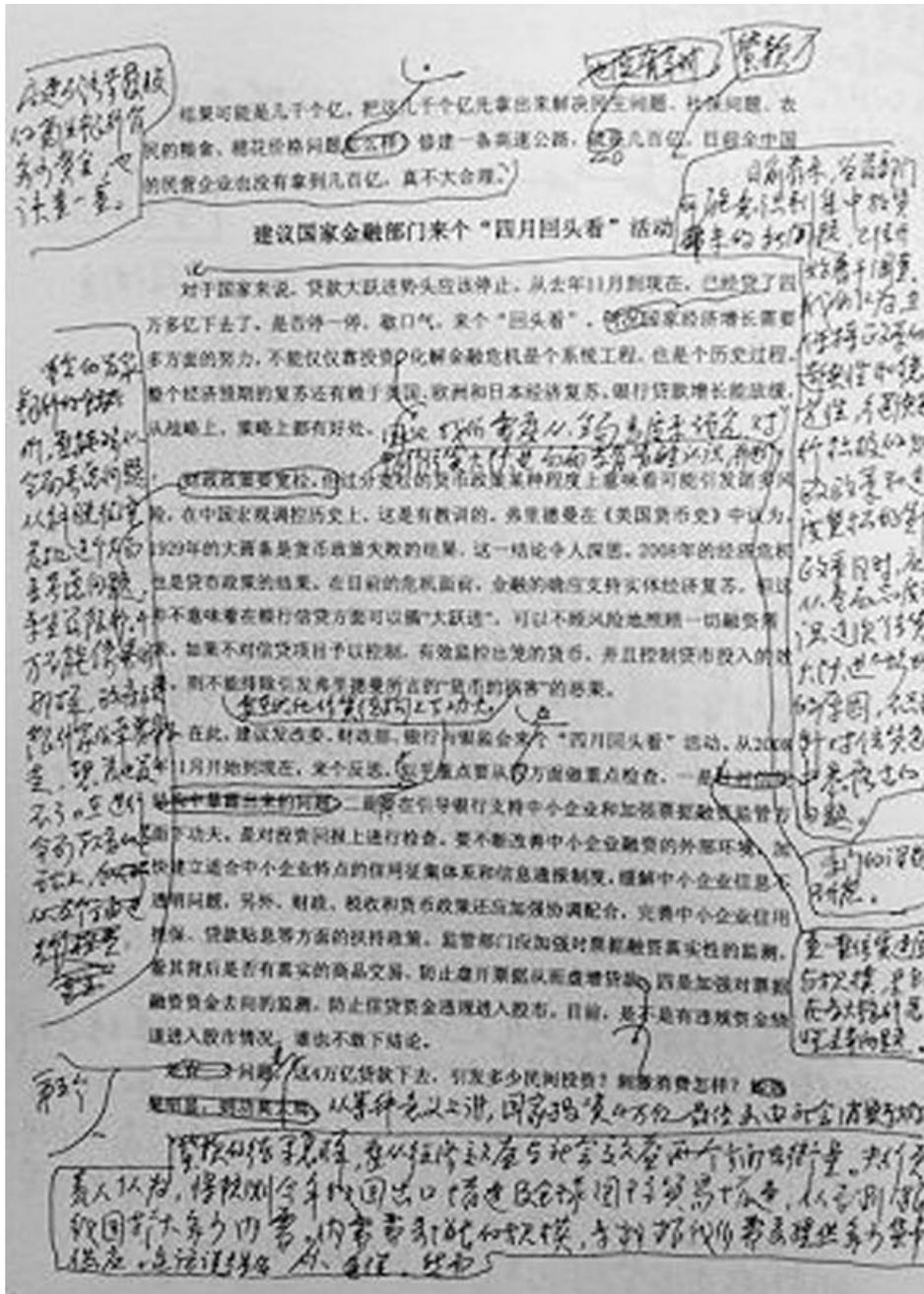
一、倾泻而出的四万亿

没有想到，我闯进网络世界仅仅三个月，便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仗，这是我调研生命史上最值得回味的华丽一章。这便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写给温家宝总理的遏制信贷风险和泡沫经济的建议书，被人称为“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之作。这个评价是过誉了，但我觉得保持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境界，做到“穷也兼济天下”，自己内心得到安慰。

2007年开始，一场大洋彼岸刮起的金融飓风，几乎波及了全球经济的每个角落。2008年下半年，这股冷空气在东南沿海登陆后又以强劲地势头向内陆袭向纵深，让国人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

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灾难，举国上下似乎一下子进入全民抗战阶段，气氛颇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味道。人们不知道这场战火将烧到哪里，将带来多大的损失。后来回望这场灾难时，山东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王光明写道：

中国有几十万新闻记者，几百万理论工作者，在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爆发以来，他们都在表现着、表演着。个中，功劳显著的是李锦先生，他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国家危急时，有大智者在。他做了一件事，写了一封万言信给温家宝总理。温总理认真看了，并做出重要批示，李克强、王岐山等都做了批示。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开会研究，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他提出的问题，这个报告遏制了刚刚出现的信贷风险，可谓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之作。



2009年3月，我写给温家宝总理的9400字的长篇建议书的修改稿。

万言上书温总理，成为我继“马克思主义三阶段论”之后的又一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的举动。

我投入到这场猝不及防的经济战争，是从网络调研开始的。2008年11月上旬，为扭转实体经济颓势，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自计划提出以来，中国贷款便一直迅猛增长。11月份新增贷款4770亿元，12月份新增贷款激增至7720亿元，比2007年12月份增长了14倍。2009年第一季度更是延续了2008年年底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的4个月里，新增信贷投放已超过3.8万亿元，相当于2007全年的信贷增量总

额。从银行方面来说，仅2009年前两个月，四大银行的信贷投放量均已接近或突破全年计划新增贷款额度的60%。

看到这些数据之后，我十分震惊，隐隐觉得信贷增长的速度快得有些不太正常。这些消息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报道中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网上都能找到。我在网上搜索，确信总书记、总理没有就信贷问题讲过话。他们是不是了解真实情况，我也无从得知。

3月8日早上6点多，我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突然发现网上出现了“信贷大跃进”的说法。尽管这一说法是来自银行的基层网友们提供的，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但接连几日对经济发展态势的追踪，让我决意聚焦这个话题。

由国内的信贷问题，我把视野拓展至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兴起，促成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然而对风险的漠视，致使贷款由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演变成拖累美国经济发展的桎梏，并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反观中国：中国是不是出现了信贷“大跃进”局势？这种信贷狂潮是怎么形成的？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信贷引发的，中国目前这种贷款热潮有没有危险？这种增速有没有持续性？新增信贷是投入了实体经济，还是流入了股市？应当怎么认识贷款的规模与流向，保增长与调结构怎样统一？怎样调整贷款结构，金融监管与创新怎样进行？随着思考的深入，一系列的问题接连不断地涌出来。显然，我的研究是从怀疑开始的，抓住要害，不蔓不枝，把思考向纵深推进。

令我十分惊诧的是，当时举国上下对信贷快速增长的现象基本都持乐观态度。实际上，直到4月份，新华社发布的一篇极具代表性的消息还称，多位经济学家指出，信贷高增与此前国家4万亿元投资密切相关，体现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同时，有望为中国经济率先回暖奠定基础。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个量并不过大。”

然而就在中国政府全力以赴阻止经济持续深幅下滑之时，大家都忽视了一场新的信贷热潮正在迅速形成。随着信贷的急速增长，信贷的速度、规模与结构都慢慢趋向失控。经济学在最需要他们讲真话的关键时候几乎集体失语，与上面一个调子，令我忧心如焚。在两会上，国家部门分管的领导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出乎意料”，就更使得我感到紧张了。

我的万言建议书是从3月20日开始写起的。写文章的前半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凌晨5点，我便爬了起来，一口气写到中午12点半，爱人离家上班都没有察觉。爱人中午下班回来，发现早饭仍然摆在饭桌上，我在里屋电脑桌上坐了一上午，一直没有起身。午饭后继续写，一直写到翌日凌晨3点。24个小时里，我在电脑前坐了整整20个小时。时间一长，我就感觉严重缺氧，头痛难忍，但这些问题太重要了，在这严峻的时刻，需要有人站出来讲真话，我就顾不得身体了。

二、平信直寄温总理

2009年初，对于当时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学术界和金融界总体上分为两派，一派推崇继续推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天量贷款有理论”，尽管这种“适度宽松”早已从适度变成了极度；另一派则主张坚持“天量贷款有害论”，认为应当在信贷上收手，以免带来更多的负面效益。这派声音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一派的声音异常强大，是当时的主流派，他们由银行的领导与专家们组成，认为信贷高速增长属于逆周期调控，有一定的合理性，既符合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也是对上一次流动性压抑的释放。

面对“天量贷款有理论”，诸多经济学者们沉默了，本应春风和煦的3月，冷寂得像是冬天。显然，他们在辨别风向。此时我虽然人在体制内，但已经不再担任社长，正是这种“无官一身轻”的状态，让我不卑不亢，更加敢作敢为了。

我先是写的博客文章，一口气写了6篇，用连载的形式发出去。发完后觉得这是给老百姓看的，有什么用？唐山一个叫孙恩荣的博友提醒我，你的文章应该给温家宝寄去呀。于是把文章修改一遍。

在这篇近万字的文章中，我陈述利害，指明原因，提出对策。对信贷狂潮的产生、危害、措施等方面都作了详细探究与说明。信贷热潮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信贷狂潮产生的动力来自银行追求自身的利润率与业绩。

目前，出现在中国信贷的大跃进是谁组织起来的？是中国的银行家们组织起来的。几乎疯狂的贷款热潮，动力来自银行追求自身的利润率与业绩。信贷增长是由于银行为追求业绩，主动放贷造成的。

其次，信贷狂潮的蔓延也与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有莫大的关联。

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央政府税收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更为紧张。地方政府的收入基本是税收、费收与卖土地大概各占三分之一。现在房地产几乎一下子停了下来。而地方政府总要办事，也包括“政绩工程”，钱从哪里来？就是银行贷款。

那么，这些大量的资金最终流向何方？我一路跟踪，最后发现近来的放量信贷资金流向呈现出“两头热一头凉”的局面。“两头热”，一是主要流向政府主导的民生工程、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项目，二是流向国有大企业；“一头凉”是民营企业、小企业融资供给仍不足。

我在文中提供了一个细节：在2009年1、2月份信贷接连创下单月万亿元投放之后，实体经济虽然还未有正面反应，股市却“立竿见影”地一度暴涨600点，泛滥的信贷资金是否流入股市的质疑也随之出现。资金的不良流动，信贷狂潮存在的诸多隐患：

首先，银行存在坏账风险。其次，巨额票据融资存在“次贷”隐患。票据融资规模有虚增现象，票据资产容易产生乘数效应，票据融资的规模很容易“虚增”，但是并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宏观经济的回暖情况。票据现象迅速上涨，是一种“中国式次贷”。第三，有可能造成泡沫经济现象。如果信贷流向中小企业或其他有助于扩大内需的领域，将是非常有益的。但如果流入股市、楼市、车市，风险将会很大。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增长的规模上去

了，然而泡沫成分也随之快速增长，内需并没有扩大多少。这种贷款速度与规模似乎在制造一种新的风险与危机，资本的泛滥与企业的空心化，将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第四，会转移为政府债务负担。第五，加剧了投资依赖型发展模式。第六，垄断企业的规模和集权地位会得到强化，使改革丧失动力。

最后，我建议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与银监会的领导会商一下，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马上采取紧急措施，把“信贷大跃进”停下来。

文章写出来的当天上午，我便将其直接交给了分社社长，谦恭地说，你们公事繁忙，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我为你们提供点参考。他说中国的体制就是这么怪，对有才华的，常常就是坚决不让你发挥；你不在位，或者不再聘任，便把你视若草木。这位负责人瞥了一眼，未予理睬，更未上送。隔了几日，以“你的看法与中央精神不一致”为由，搪塞了事。

其实，在情况最为严重的3、4月，新华社在山东并未发出类似我这般真实而振聋发聩的声音，夜半北望，常常一阵悲情涌上心来。

按照惯常做法，我将调查一份给山东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一份寄给南方的《南方周末》，再就是在博客上发表。然而做完了这些，我总是有些不甘心。我仍然觉得自己苦心孤诣的研究是为国家破解难题。念着杜甫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我猛然想起了博友提的建议：寄到中南海去！

我决定碰碰运气。

3月23日，我来到济南市中区玉函路对面的邮局。早饭没吃，已到中午，我便先来到附近的知味斋粥店，当时口袋里只带了25元钱，买了一个豆角炖肉13元，一个凉菜7元，一碗米饭1元。分社司机小安也在这里吃饭，他还为我买了一杯啤酒。我在邮局摊开信封，上面直接写“北京中南海温家宝 收”，在新华社山东分社的信封下面写上李锦。本来打算用挂号信寄出去，但是邮递员一称，挂号要6元8角，可自己只有4元钱了，邮递员大姐说，平信只要3元8角。

我与邮递员逗趣说：大姐，你看看吧，这是写给总理的，你不能照顾一下吗？

邮递员笑了：你让温总理给俺主任打一个电话，主任一分钱也不会要你的。

我说：打到北京，再由总机转来转去的，这4块钱打电话也不够了。

邮递员说：那就认命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理每天收信要几万封，哪能看到你的信。说完瞥了我一眼，带着几分劝慰。

我只好说：碰碰运气吧，平信就平信吧。

就这样，我把这封信寄往了中南海。对于温总理能否看到，我充满期待，但也不抱过高的期望。

三、中南海的电话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寄出信的十三天后，我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2009年4月7日上午，我接到电话，号码显示是几个零，是保密电话。一听，是中南海打来的。电话中的陌生男子自报家门，说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李锦同志。我称是，对方便说你的来信，总理已经收到了，非常重视。首长让打电话向你表示感谢。对方的口吻很客气，话语也十分干净利落，说以后有什么重要意见可以直接向领导汇报，之后便挂了电话。

接完电话，我感到突然有一种巨大的幸运降临到自己身上，我一下子坐在了沙发上。仿佛黑暗笼罩、漫漫无际的海面上忽然闪现了明亮灯塔。脑子一时空白的我，努力回想着刚才的交谈，翻来覆去地念着那几句话。

从3月23日下午寄出信到4月7日上午接到中南海的来电，中间仅仅间隔了13天时间。类似这种反映非动态性经济主题的文章，在新华社也极少有发得这么快的。平信从济南寄到北京，要在路上走两三天，送到总理手中之前，还要经过层层筛选与批示。这封信能在13天内有了回音，可想而知温总理对这封信的重视，也可见国家信访部门的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国情紧急，刻不容缓。

实际上，早在4月4日，温家宝总理就看到了这封信，并在信上作出批示：“请克强、岐山同志阅示。可请人民银行、银监会、发改委、财政部从全局高度分析下信贷形势，并提供全面情况和政策建议。”

4月10日，一个电话又不期而至。电话是下午三点左右打来的，我拿起听筒，传来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对方开门见山地做了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周学东，受周小川行长委托，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他说，你写的信温总理已经亲自批示了，并把文章一起传达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里上下都很重视，那封信对他们的工作有很大促进，他感谢我在关键时刻反映了情况。他还称，总理是用铅笔划着看的，从头到尾，留下很多杠杠，还有两个错字总理也划了出来。

紧接着，周局长肯定了我所反映的情况符合实际，他们在调研中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比如贷款集中在大项目、大企业，而小企业和农民虽然更困难却贷不到款；再一个问题就是虚开票证，这特别容易造成呆账死账，引发通货膨胀或者紧缩。周局长承认这次放贷量太集中也太多，非常容易造成这种局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外行，在信贷方面的研究不够专业，也不够深入，只是从一个记者的眼光作了些思考。但周局长说我站得很高，把握得也很准确，讲得很透彻，能从全局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值得学习。

谈话结束前，周局长重申，下一步他们将会根据总理的批示精神，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改革措施并付诸实践。最后还十分客气地提到，周小川行长想邀请你来人民银行做客，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到自己写这封信有点告银行状的味道，贸然前去还不知是什么状况，还不知是灾是福哩。再者，得到总理批示已经达到“致君尧舜上”的目的，不必再朝前走了。

4月11日，国家信访局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我得知，这封万言信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办主任王学军看过之后转呈上去的。

几天之内，我接连接到几个重要电话，都是特地向我表达谢意。北京来的几个电话都说当时的经济情报比军事情报还重要，我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直到7月份，中央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出台后，控制信贷速度与规模已逐渐变为事实，我才敢与周围的人说起此事。

温家宝总理批示之后，4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作出批示：“发改委、财政部要按家宝同志批示精神对相关情况从宏观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同志批示：“下周先从金融角度分析研究一次，请尤权同志告人行、银监会就落实家宝总理批示做准备。”4月6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在信上作出批示：“请人民银行、银监会按家宝、克强、岐山同志批示做好准备。”

温总理批示的对象是李克强、王岐山两位副总理，具体来说批给我提出的是我提出的央行、银监会、财政部与发改委四个部门，主题是关于信贷问题，内容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全面反映情况，二是要从全局高度认识问题，最后落脚点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四、监管风暴

温家宝总理对我万言信作出的批示，立刻在高层刮起一阵旋风，引起各部门的重视。

从2009年4月中旬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监管风暴迅速卷起。从4月7日至15日，除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包括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多个国家部委都开会讨论信贷形势问题。

4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信贷形势。

请克强、岐山
同志阅示。可请
人民银行、银监会、
发改委、财政部
从全局高度分析下
信贷形势并提供
全面情况和政策建议
温家宝

我写的9400字长信，温总理认真看了，并做出批示，李克强、王岐山等都做了批示。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开会研究，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我提出的问题。

同一天，银监会开展了对前五个月贷款专项检查活动，同是4月15日，央行向全国人

大财经委员会汇报了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与此同时，银监会打出组合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和措施，集中治理信贷问题。全国银行普遍展开了自查和系统内的检查，专门针对信贷落实问题。据有关媒体报道，“银行一时间人人自危”。

看到这些变化，我很高兴。那些天，我每天坐在电脑桌前，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夜里起来去洗手间也是先打开电脑，看一看新浪与搜狐的财经频道有什么新信息。我的这封万言信以及其他文章也被新闻媒体广为转载。例如《谁制造了信贷井喷》一文，发表当日就被新浪网等网站转载，4月17日为《齐鲁周刊》采用，4月23日又为《南方周末》刊登，之后约有2000余家网站转载。

到了5月，一个重要的统计数据出来了，4月份的新增贷款来了一个大刹车，最终为0.59万亿元，大大低于之前几个月的信贷额度。从2009年7月起，下半年信贷新增额分别为0.4万亿、0.51万亿、0.25万亿、0.29万亿、0.38万亿，较上半年大幅度回落。整个中国经济形势由高烧不退进入了平和稳健状态。

第三节 探寻一条道路：混合经济论

一、“企业报所做的工作很好！”

金融危机中万言建议书的成功，使我运用互联网工具引领舆论的信心大增。卸去行政职务后，出庙堂而游于江湖之上，开了自己的博客，拥有众多拥趸，也产生了不错的社会影响。本想脱离官场，以这样一种江湖方式影响社会，报效国家，没想到59岁的时候，峰回路转，我又重回庙堂，被任命为《中国企业报》总编辑。

《中国企业报》是一张专为中国企业创办的报纸。1988年1月4日，由国家经委主办、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承办的《中国企业报》正式创刊。2010年底，《中国企业报》响应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要求，在行业内率先进行了转企改制，组建成立《中国企业报》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月，我出任报社顾问，到了6月30日，我正式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一职。

同意到《中国企业报》任职，我也有自己的考虑。一直以来，我都将“发现思想，引领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普通人到了退休年龄，多是钓鱼遛鸟，喝茶打牌或写字作画，悠闲自得，我觉得闲不住，我来自齐鲁大地，常常与孔夫子相较。孔子一生颠簸流离，周游列国却备尝艰辛，无所成就，直到68岁无奈归鲁，专注于学术，才成就了其思想的伟大。孔子68岁才专注治学，我尚不到花甲之年，仍有再展雄心的念头。从新华社时居庙堂之高，去职后游走民间，到如今重归庙堂，在我看来，这是我人生的“正反合”，是经历过庙堂与草野两种生存状态后，人生面临的可能又一次飞跃与升华。身体还许可，再干几年也未尝不可。

在《中国企业报》的工作状态一般都是这样的。因为嫌床过于安逸，我基本每晚都睡在沙发上。凌晨一两点时，起床打开电脑，浏览一下最新信息，工作三四个小时之后，回到沙发再休息几个小时。这样的作息习惯，已经保持了很久。如若遇到第二天报纸出版，我要把社论与评论员文章写出来，还要帮记者们修改稿件，常常会熬一整夜。这样的工作，让我的思想始终保持着充盈丰沛的状态，但是自己生活节奏更快了，身体受到伤害。

我到企业报后，发现北京舆论界有一股很不好的风气，否认国企成为一种常态，有一批理论家对国企并不是很熟悉，却一股劲强调私有化，批国进民退。甚至新闻界也有种以否定国企为荣的风气在滋长。而为国企讲话的理论家则是对着干，以一种极端对付另一种极端，缺少智慧含量。于是我决定打一场“舆论战”。

我不怕忙，就怕闲，越忙越有精神头。

2011年6月15日至7月14日间，我策划组织了“国企改革与发展”系列报道，连续10期报纸55个版面，10大篇章，共计30多万字。报道以事实说话，把国企从被舆论妖魔化了的形象中还原，改善了国企的舆论环境。《中国企业报》此举被称为“独此一家的大规模系列报道”、“2011年中国特有的新闻现象”。

为了使系列报道有条不紊地铺展开来，从4月到6月，我用了两个半月时间研究国企问题。我买来几十本书，一本一本看过去，天天上网，做到对基本情况了然于胸。等到把这

些内容大体上消化之后，再对企业做一些调研，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又邀请中央政策研究室、国资委、中国企联、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领导、专家研讨，制定出了分解执行方案。整个方案观点密集，纵横交错，前后呼应，在战略、战术与运行策略上都有具体要求。

这次报道，历时一个月，所发100多篇文章，均被数十家网站转载，一些文章先后得到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等领导的批示，还帮助相关国有企业解决了实际困难。国资委主任王勇对《中国企业报》的报道十分赞赏，批示认为“企业报所做的工作很好”！并要求更好地发挥《中国企业报》的平台作用。后来，王勇还提议将《中国企业报》转为国资委机关报，并派人商谈转报事宜。

中央财经大学新闻系主任、教授谭云明在《思想家办报高端引领——〈中国企业报〉“国企改革与发展”系列报道探析》一文中认为我的评论“有《人民日报》任仲平的历史时空感，也有新华社何平通讯的逻辑严密风格，显得大气磅礴，有很强的冲击力。这些评论本身便是经济理论文章，且有较强的对策研究风格，每篇总拿出一点新东西来，这是属于自己概括发现出来的东西。”

中国企联执行副会长兼理事长李德成在2012年1月的冬训中，对局处级干部讲，《中国企业报》原来是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一年下来，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文章有人看了，既有深度，又有高度，为什么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因为来了一个有水平的总编辑。

二、六小时写出“央企市营六论”

2012年夏，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建材“央企市营模式”的典型宣传中。我把这个典型成为混合经济发展道路的样板来解剖，到了7月份，演变成一个思想体系，8月则引发了企业管理哲学讨论的思潮。

2011年我组织国企系列报道时，基本算是“独唱团”，一年后，已是应者攘攘。《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光明日报》等诸多大报纷纷展开国企系列报道，在此情形下，如若再跟别人发出一样的声音，只能是徒增合唱的音量，却凸显不出自己的独特。于是我决定另辟蹊径，抓住焦点，向深处挖掘。此时，宋志平和他执掌的中国建材集团进入了我的视野。

宋志平是我国第一个同时担任国资委两家中央企业董事长的企业家。2002年受命就任中国新型建筑材料集团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总经理后，中国建材营业收入从20多亿元跃升至2011年近2000亿元。而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自宋志平2009年6月同时担任董事长以来，营业收入由400多亿元跃升至2011年的超过1200亿元。两家央企被誉为国资委系统充分竞争领域中快速成长的企业典范。

然而最吸引我的，并不是两家央企惊人的发展速度，而是中国建材在宋志平管理之下所走过的改革发展道路。

10年前，宋志平调任中国建材前身中国新型建筑材料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时，公司尚是一家银行逾期负债高达30多亿元的困难企业。上任不久，他邀请行业专家集中开了几天会，明确了公司战略：作为一家央企，要做大宗、主流的建材业务。具体做什么？他把目光投向了水泥行业。

2006年8月，中建材以现金人民币9.61亿元，并承诺为徐州海螺水泥的2.3亿元银行借款作担保，收购海螺集团旗下徐州海螺水泥全部股权；2007年9月，又以浙江水泥、三狮水泥、虎山水泥、尖峰水泥为基础，组建南方水泥公司，在浙江、江苏、湖南、江西、广西、福建、上海六省一市跑马圈地，到2010年底，重组了近150家企业。其后，中建材继续举兵西进，联合重组了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三省一市的多家水泥企业，组建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了解中建材的重组之路后，我难掩内心的兴奋。中建材挥师南下，将诸多民营水泥企业纳入麾下，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令人振奋的业绩，其所走过的道路，不恰恰是自己在《坚持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一文中指出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融合方式”吗？

2012年5月21日是星期一，当晚报纸就要印刷。那时已经有一篇关于宋志平的访谈，起床后我把访谈修改了一遍，11点钟，我跟中建材办公室于志平主任说，想要再配一篇评论。没想到一写起来笔意纵横，一下子写出6篇。从11点到下午5点，7个小时内，共计一万两千余字的6篇评论一挥而就。

在5月22日的报纸上，6篇评论员文章一次性见报，形成了一次有规模的思想冲击。文章分别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世界经济发展史、混合经济所有制、央企的功能定位、企业文化、市场竞争等角度，层层深入，对中建材“央企市营”的混合经济实践进行了一次有系统的理论总结。

我后来接受采访时说，6篇评论不只是写的宋志平，或者说宋志平在这里仅是一个符号，我想阐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问题，是针对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组概念而写的。中国需要这么一个典型，来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发展途径。

两个坚持讲来讲去，很多人总是偏执一端，不是返回计划经济的老路，便是迈向私有化的邪路，实际上搞的是一个坚持，在思想上造成更深层次的混乱，势必造成对立，在行动上造成动摇。中国建材的“央企市营”经验，找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找到两者的相通性，真正做到两个坚持不动摇。可以说是一个“走正路”、“走新路”的样本。我找了一年多，终于找到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由此我认定，宋志平与央企市营的意义不仅在企业界，而且在于思想理论界，只有把什么是“走正路”、“走新路”搞清楚，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

我最终的目的，是想通过中国建材“央企市营”的典型，来引领一场思想解放的潮流，推进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三、“李老师相当于一个军”

我为中国建材“央企市营”的6篇评论，很快在中建材乃至国企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中建材董事长宋志平看到“六论”后，第一时间给我发来短信，称这几篇文章思想非常精准，结构非常精确，用词非常精当。第一次与宋志平在一起吃饭时，宋志平不曾注意到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我。而这一次，几篇文章让他对我刮目相看。

但仅靠6篇评论，想要在众多大报进行国企报道的齐声合唱中凸显出来，还远远不够。因此，有过多年典型培养经验的我向宋志平建议，必须进行“两个一工程”：出一本书、开一个理论研讨会。

2012年6月，《央企市营：宋志平的经营之道》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

2012年7月10日，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主办、企业管理出版社承办的“‘央企市营’成长模式座谈暨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等首都新闻界、经济界的诸多大腕们齐聚一堂。

发言行将结束时，宋志平以简短的几句话感谢了几位多年来在新闻报道上给与帮助的一些新闻界朋友。随后，他说道：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中国企业报》的李锦老师。李锦老师为我们总结了经验，让我诚惶诚恐。我看了文章自己很害怕，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么好。李锦老师从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国家宪法等多角度对我进行了解剖，文章很深刻，很有气势，功力很深。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引导我来思考这个问题。正是在他建议下，才有了这本书。是他替我壮了胆，所以我要感谢他。”

宋志平说，我与李锦老师过去并不认识，也不了解。我们的认识只是中国十大新闻人物评比中在会议上握一下手，后来吃一次饭，连电话也没打过一次。宴会时，宋志平向我敬酒，以示感谢。他向别人介绍，“李锦老师相当于一个军！”中央企业界领袖人物对我的判断与称赞，当然这包含着对我的感激与他的爱才之心，我也感谢他的鼓励。

随着《央企市营：宋志平的经营之道》的出版，以及“‘央企市营’成长模式座谈暨新书发布会”的举行，我的名字很快在首都新闻界、经济界尤其是国务院国资委系统流传。

对于我来说，“央企市营”模式的总结与推广，不过是我几十年调查研究经验的一次再运用。此时我更多的是在充当企业的智囊。这种作用不仅在于总结企业发展经验，还在于帮助企业破解难题。帮助中铁建、中铁工解决建设资金便是一例。

2011年，铁道部爆出惊天大案，独立王国的虚弱面一下子暴露在世人面前。铁道建设面临债务严重的困境，一万公里铁路陷入停滞状态，很多项目都处在停工、半停工状态，纠纷剧增，已经严重影响企业和社会的稳定。到2012年5月份，中国中铁的负债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仅在2011年一年就要加大利息支出14亿元左右。

一封报告发送到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李德成的案头。随后，我带领调查组来到了中铁建总部。中国中铁财务部部长杨良、中国中铁经营管理部副部长李夏初、中国铁建经营开发部副部长王旭永，还有多位铁建企业的知情人士与我直陈企业面临的困境。

困难明显摆在那里，更困难的是对策的提出。中铁工、中铁建等部门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的困难，强调借债要还的道理。但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是不可动摇的，也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指望国家再像投资4万亿那样，大规模地投入到铁路建设上来。我说，拿不出破解困难的办法，对领导只是添乱，这样的文章不能写，我们要为中央领导想出办法来。大家一条条提解决的办法，一次次地推翻重来。就在沉闷的调查似乎无法进行下去之时，中国中铁经营管理部副部长李夏初的一句话让我感受到一丝清新的空气。她说，可以用融资的办法解决，不要国家直接拨款，就能解决问题。在她的启发下，我紧紧扣住两条，一条是融资，一条是政府几个部门合力输血的办法。最后调查报告在末尾建议，“铁道建设欠款问题应当引起国家重视，由财政部、央行与铁道部等部门会商，提出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把铁路建设发展与清欠债务统筹考虑，避免铁路建设债务风险加剧。”

《铁建企业被拖欠工程款上千亿元濒临债务风险》的调查在7月初上送后，经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国资委主任王勇、铁道部长盛光祖等领导批示后，国务院组织工作组很快进驻铁道部调研。10月12日，发改委发函给铁道部，铁道部发行的铁路建设债券为政府支持债券。11月2日，铁道部透露消息称将获得超过2000亿元的融资支持以缓解债务状况。财政部、银监会、发改委、银行纷纷解囊，出现抢救铁路建设的联合行动。

四、树起“大企业时代”的理论大旗

2012年9月1日，新华社向世界发布一条电讯，宣告中国已进入大企业时代。简讯是这样说的：

新华社长春9月1日电(记者王晓明)“中国内地企业入围世界500强数量连续第二年净增12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500强第二大来源地。”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1日在长春举行的2012年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上说，中国已经进入“大企业”时代，兼并重组是目前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

每一年，中国都要进行一次中国500强发布会，这是中国企业界的年度重大活动。既然是《中国企业报》，就应引导中国企业界重大活动向纵深发展，使之具备理论的深度，这一年我提出的“大企业时代论”随着新华社的报道广为传播，为600余家网站转载。

每年的世界500强发布，我都在当期报纸上发布《世界500强企业分析报告》，以最快的速度占领网络，以引领舆论。“大企业时代论”是这些报道中占重要地位的指导思想。我分析近来美国政府对待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态度中，发现美国经济霸权主义已经患上中国大企业恐惧症。2012年，中国内地入围企业数量为70家，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这充分证明，中国大企业已经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以往由美日主导的局面正在向中国倾斜，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必须确立大企业发展战略。结合世界经济发展史，我对大企业时代的时代特征作出了分析：

1.大企业时代对工业生产组织形式而言，生产和资本出现了集中的趋势。这些大企业往往控制着一个或多个部门的生产经营，甚至可能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2.向世界市场加快发展，进入国际化竞争时期。国际化竞争就是国家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气、日本的小松机械与美国的卡特彼勒、法国施奈德与瑞士ABB，都是代表国家的大企业之角逐。

3.大企业时代对生产力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引发了经济结构变化。

4.导致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大企业成为社会与经济生活的主体。

5.兼并重组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形式。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中154家大企业共并购重组了1111家企业，并购重组活动持续活跃。

6.大企业时代将催生新的管理思想，形成新的文化体系。

2012年8月，我一下子推出5篇3万余字的“宋志平、稻盛和夫比较论”，在第四篇《东方企业管理哲学的崛起》一文中，我大胆地作出判断：

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是由泰勒完成的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飞跃，从科学管理理论到现代管理理论是由德鲁克完成的第二次飞跃，从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则是由日本稻盛和夫为代表而完成的企业管理的第三次飞跃。当前迅速崛起的社会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第四次飞跃。宋志平的“央企市营，包容和谐”管理理论学习、吸收、发展前三次飞跃的成果，而在

本质上可以纳入第四次飞跃范畴。

至此，从世界到中国，从宏观判断到典型剖析，从企业经济到企业文化，我完成了“大企业时代论”的提出与建构。后来宋志平读到这些文章后，说他很有福气，在需要总结提升时，李锦出现了；我说我也很有福气，在需要实践支持时，宋志平出现了。

第四节 打好一个基础：实体经济基础论

一、快速推出“银行暴利论”

2011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风险与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副面孔。这一年，我提出的“实体经济基础论”，正着眼于解决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用以解决生产力发展基础问题的理论构想。

自从9月底温州高利贷事件爆发后，产业“空心化”问题便迅速暴露出来。这一年11月，在G20法国戛纳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要把财政和货币政策落到实处，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扩大生产”，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必须做到“四个牢牢把握”，其中之一就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显然，发展实体经济已成为国家高层的意志。

有了《中国企业报》这个平台，自己的想法便能很快实现。自2012年1月10日起，我带领属下们开展了“系列评论专题：九十九评发展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展开了有规模的报道，在新闻界、实业界、经济理论界、金融界刮起一阵实体经济舆论旋风，形成了2012年两会报道的新气象。有报纸谈论说，这次系列报道为当下几近干涸的实体经济土地带来了一场及时雨，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与舆论引领。印象中，这是中国新闻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系列评论。

如若评选2012年新流行的经济名词，“银行暴利论”恐怕必在当选之列。“银行暴利”话题的广泛传播，并且为社会所接受，与我们的实体经济评论有直接的关系。

2月6日，中国国际问题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接受访问时，说出了银行利润超过烟草行业的惊人事实。2011年，农行、建行、工行、中行四大行的净利业绩分别是1220亿元、1694亿元、2084亿元、1303亿元，相当于日赚17.26亿元。银行业一举超过房地产业、烟草业，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行业。看到这则消息，我脑海中立刻出现“暴利”两字，不管银行的人自己承认不承认，这已是基本事实。看到消息已是晚上8点，第二天就要出报，我马上安排实习的学生写一篇，自己动手写三篇，一口气写到凌晨4点。8个小时，《企业衰退，银行还会幸存吗？》、《银行业榨取理论的“风景线”》、《银行暴利的三大推手》、《终结银行暴利七策》一下子拿出来了，从现象描述、后果分析、问题发掘到策略阐释，形成了一个小系统。

在其后的实体经济系列报道中，《中国企业报》又先后推出了《企业衰退，银行还会幸免吗？》、《银行正在成为垄断资本阶层》、《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黄世仁”与“杨白劳”》、《实体经济是银行高利润的最大受害者》等15篇关于银行的评论，同时报纸在3月9日一期以整整10个版——“回归实体，银行暴力之弊端”，对银行业发展现状加以报道。通过一连串集中式的轰炸，把实体经济寸步难行与银行业暴利的水火两重天现象描述了出来。

为什么要针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评论，我们在开始设计时也没有这么多内容，只有七八篇。后来在研究时发现这里面东西很多，写着写着，便把银行作为虚拟经济的载体与实体经济的对立面来写，分量一下子便重起来了。从新闻美学来说，对于实体经济这个主题，有了银行暴利这个“阴暗面”，便显出一凸一凹，一明一暗，一正一反，使得整个报道显得深刻了。

不久后，媒体上出现了一篇“李锦PK杨凯生”的文章，银行方面的人坐不住了，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亲自出面驳斥我“不是银行的人”。原本只是从银行方面对实体经济进行评论，现在却演变成一场学者与银行家的思想交锋。

这一年的“两会”上，围绕着银行暴利，专家、学者、官员们展开了激烈论战。很多银行从业者站出来替银行业“辩护”，由此导致论战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表示，“我不同意暴利这样一种说法”，工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其净利润增长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在金融领域中的体现。建行副行长庞秀生认为“银行日赚几个亿，反映的是经营规模，与利润的薄厚没有直接关系”。在这些论战中，我和工行行长的“交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为银行暴利做的辩护与解释，构成了“银行暴利”论争的高潮。

最后温家宝总理为这场纷争下了定论。4月，在到广西、福建等地调研时，温总理就企业融资问题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难。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温总理的讲话实际上间接为“银行暴利论”正了名，银行利润非正常现象的观点于是从支流转变为主流，成为中央政府的看法。自此之后，尽管还有为银行辩护的声音，但已如秋后蝉鸣，几不可闻。我与弟子们很兴奋，有种饮马长江、旗开得胜的感觉。

我到北京后，带了一批研究生弟子，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与传媒大学，我出了标题与观点，让他们写，然后我再改一遍便发表了。他们很有战斗力，热情很高，多数是一挥而就。

二、实体经济99评

实际上，早在2011年9月，《中国企业报》便在我的部署下，开始将报道触角伸向实体经济。从温州高利贷事件到上海砸楼盘、鄂尔多斯楼市现象、淘宝商城，每件事情发生后都及时跟进。例如11月份在鄂尔多斯楼市崩盘的报道中，我便写道：“对于今天的鄂尔多斯来说，房地产是否崩盘已不重要。甚至于，房市泡沫消除也不是坏事，重要的是政府将如何作为：是把巨额资金用来救市，继续看着‘鬼城’复制出现，还是拿出壮士断腕之态，把资金投到实业上来，投到科技创新上来。”

从2012年1月份开始进入实体经济系列报道，是2011年国企系列报道的继续与延伸。不同的是上次战役是为国企讲话，这次战役则重点是为民企讲话。我这样铺排，基于以下考虑：

我们在那次报道中发现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太困难了。这次实体经济报道的主角实际上是中小企业。《中国企业报》作为唯一以企业和企业家为报道内容的全国级报纸，在这个时候就必须站出来，为企业说话，贯彻我们“问题推动，思想引领”的办报思路。让老百姓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听到最真实的声音，引导社会舆论关注实体经济，推动各个机构去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次两会报道前，中宣部、国资委对两会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报道精神，于是我们便确立了“为企业说话，说自己的话”的方针。把这份酝酿已久的计划拿出来了。

就在两会前后，《中国企业报》的实体经济系列报道在新闻界、实业界、经济理论界、金融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实际上，成为中国企业的智库或智囊，正是我对于《中国企业报》的一种定位与期望。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个别媒体总是喜欢揭开伤疤，穷追猛打，但我不喜欢用“骂”的方法去评论，总是尽量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2011年，考虑到国企报道的艰巨性和企业报长期发展的需要专门设立的中国企业研究院，主要负责对企业进行研究服务、舆情监测等。

2012年9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实体经济99评》，编辑推荐语指出：这是一部为实体经济立说之作，这是当代规模宏大的财经系列评论。

2012年11月，经过半年多的舆论战后，十八大报告中最终出现了关于实体经济的两段话：“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是对社会公众殷切期盼的回应，也是对实体经济回归的新的动员。

2012年12月9日，中国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论坛在京举行，这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经济学界、企业界与新闻界的一次响应与跟进，然而我对此并不乐观：

实体经济讨论已经一年半时间了，严重性、必要性、重要性，都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调子高喊了一年多了，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由虚变强的征兆，人们对这种热闹已经有几分倒胃了。多数人开的所谓药方似乎多是“丹参、黄芪”之类，吃了无害也几乎无用。症结是否找到，如何破解这道死穴，从哪里入手，人们期望大智慧的出现。

这名为《实体经济回归需要大智慧》的文章是我写给这次论坛的评论文章的开头，这

次论坛邀集了上百人发言，专家学者们走马灯似的登台，但确如我所言，开出的药方多是“丹参、黄芪之类”。在回顾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的萌发过程基础上，我提出了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弱化的四大原因：

问题似乎越来越清楚，我们对国情、世情与历史发展趋势的情况把握都不够准确。一是错误地判断金融创新的功能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过于强调金融创新，走得太急太快，把经济发展阶段判断错了；二是错误地把握虚拟经济的标准，像天平一头高一头低，衡量金融的标准是什么？是企业起来了，这是第一标准。然而现在金融发展第一标准是银行自己赚钱，标准失误导致杠杆失衡；三是错误地把金融与实业部门分开，两个部门分开管理，使得银行与企业变成“羊与狼”而不是“鱼与水”的关系。与双重体制并存相对应，政策也在两种状态中变动；四是错误地让金融部门牵头搞改革，自己革自己的命，不会成功，只会有一种结果：贻误战机，延长实体经济回归进程。

在文中，我回忆起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利益侵占现象，便以“狼”与“羊”来隐喻当下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该说的废话已说完，留下不少笑话。当前，最大的笑话是让狼出来说不再吃羊。银行赚的钱是从企业身上得来的，要银行不赚钱就像叫狼说不吃羊一样。而目前的中国现状是，从小银行到大银行的行长们都出来表态要支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越是笑眯着双眼说着蜜甜的话，越是让羊们害怕，因为他们总是这么说，而羊们总是少了一只又一只。所以温州金融改革总是改不下去，银行家们的高调仍在唱着，人们希望金融改革能够成功的梦仍在做着。

四大错误是实体经济难以回归的四大穴，最后的死穴便是顶层设计，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攻坚克难”。到这时候人们才明白让“鱼水”变成“狼羊”，是体制设计错误。让银行成为狼，不是狼的错误，因为他们本来便不是狼，也不想做狼，他们赚钱太容易了，连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温州金融改革陷入困境，也不是银行的错误，因为他们本来便不想改变自己命运。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阻挠变革的力量。

文章最后，我从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平衡、发展体制上提出了让实体经济回归的对策。我指出，要让快的慢下来，让重的轻下来，让分的合起来，让不肯改革的站到一边去。谁来办这个事情，便是顶层设计。高层决策层重新设计，这并不是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需要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这篇文章，是我的风格，我追求雄阔大气又一针见血，还有操作性强的对策提出。

就在2012年的实体经济报道中，我的企业理论家名声逐渐在北京传开。两会召开时，《人民政协报》要在两会间出一期国企专版，到国资委宣传局讨要两会报道精神，宣传局干脆利落地回复，你们去找《中国企业报》李老师，他会与你们讲的。财经部主任陈建萍专程到我办公室求救，临走时又恳求我写一篇理论文章。三天后，《人民政协报》推出四版国企报道，在两会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国资委王勇主任看后，认为“很及时、有水平、有深度。”

一个月后，中央宣传部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宣传，诸多新闻媒体纷纷前来约请我做访谈。在40多天里，我以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的身份先后出现在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台、《中国青年报》、《人民论坛》、《了望中国》、《国企》、《北京商报》、《经济导报》等20多家报纸刊物上，以至于同行以“访谈明星”称呼我。上世纪80年代，我曾是以报道“包产到户”上报率最高的新闻明星，50天内100多次在北京大报上出

现。30多年后，我则以新闻解读人的身份出现，我的观点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我紧张而忙碌，似乎重新找到了30年前青春洋溢的感觉。

新闻解读的生活，我坚持了三年。以“次数之多、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引起媒体与社会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郑保卫教授的文章《新媒体背景下李锦在国企解释性新闻中的兴起》中，认为“他的作品主题重大，思想独特，能够起到警醒读者、激扬风气，匡扶正义，乃至影响社会、引领潮流的效果”。“李锦的出现，是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竞争和人才竞争的一种体现。实践证明，高水平的、能够发挥正能量的学者是珍贵的资源，是新闻生产力的代表”。局面打开了，自然引起上面的重视。到了2014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将我作为特聘专家，聘为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研究员，成为国家关于国资政策及央企新闻的重要解读人。我的新闻生命，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整整走过了35年。35年，沐风栉雨，弹指一挥间，时光改天换地的力量令人惊叹。35年一路走来，如今在改革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我仍然在改革第一线厮杀打拼，觉得自己没有被时代脚步落下，一直在生龙活虎地干着，只要可能，自己便一直这样干下去了。

59岁时才独自北上，“骑马客京华”，没有想到，仅仅三年的时间，我便在京城打开一方天地。从“大脑国家理论”、“消费主导型经济论”、“央企市营理论”、“混合经济论”“大企业时代论”、“实体经济基础论”到“国企分类论”，我有幸专注于经济发展战略与企业研究，构成了自成一体的改革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前，我提出生产力改革理论体系，曾遭到生产关系学派的批判。十八大前后，我致力于社会主义生产力改革理论体系的建立。35年的调查研究累积，此刻如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不仅开拓出调研人生的一片新天地，更为十八大之后党的新领导集体的改革献上了一份理论动力。

2010年，在《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一书中，我根据金融建议的智囊实践提出了“三力”观：“一个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应在于其对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对国家重大难题的破解力，对社会进步的引领力。”这是我经过多少次风雨洗礼后逐步明确的目标，也算是我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成为引领我前行的源动力。我知道，实现这种价值的根本路径一是调查，二是研究，别无它路。

谈笑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游走于江湖与庙堂之间，我感觉比过去更忙，更累，然而自由舒畅，心宽体闲。

第八章 恩·长·敬：三人行必有我师



一个清静的夏夜，天很黑。穆青手拉着我的手进了院子，我就像小孩被大人牵着。有蚊子，老人家不时用扇子为我拍打着。穆青61岁，我30岁，感受父亲般慈爱。殷殷之心，如渊如海。

多年后，穆青夸奖我写的《风雪昆仑牦牛情》，说写得很有文采。不愿意回到生活中的塔什库尔干县，既有对动物天性善良的赞美，对弱者的歌颂，提倡一种正直纯洁的东西，世事维艰，我赞叹在大风雪中牦牛相扶相帮的亲情。

小时候，母亲教我要终生尊敬“天、地、国、亲、师”，这些我总难忘。

第一节 我所知道的农村改革元勋胡耀邦

一个人的经历，其实是这个时代历史的浓缩。小时候，还是没有上学的时候，父亲便教育我要懂得感恩，“天地国亲师”，都要崇敬。稍长，我体味到“天时”与“地利”外，决定人命运的离不开国家领导人、亲人与老师。随着时间的洗礼，胡耀邦、穆青、范敬宜，还有父亲、母亲与妻子，像天幕上的星星，日显明亮。我的价值实现，运气全是这个时代的赐予。

我先后四次见过胡耀邦同志，这多是发生在农村改革初期的事情。这些年，纪念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而农村改革这一段还没有见人专门写过。想起胡耀邦大刀阔斧开辟农村改革初期的局面，心情很难平静，他实际上是那场改革直接的指挥者与推动者，冒了极大风险，很多细节人们并不了解。我是当事人，应该记下这些。于众于己，我都该做这件事。

一、掀起农村改革风暴

中国的改革，最初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个是发生在上层，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胡耀邦主持的拨乱反正工作在三个方面铺开，从政治路线上完成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从组织措施上平反冤假错案与老干部复出，从思想战线上展开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推翻左的思想路线统治。这便是后来人们说的胡耀邦的“三把火”。另一个是发生在下层，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前一项工作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基本完成，后一项工作从1979年开始，1982年基本解决问题。这两件事互相穿插，相互关联，前一件事为后一件事展示了方向，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创造了条件，后一件事是党的路线转移在农村实践中的展开。胡耀邦的贡献也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得到体现的。

在我印象中，中国农村改革在领导层事先没有计划，也不是哪一个领导人提出来的，完全是农民的自觉行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深刻改革，后来被中央领导层所了解、所肯定，变为一场上下联动的大革命。

对于“包产到户”，中央高层领导人开始公开支持的比较少。在对“包产到户”激烈争论之时，胡耀邦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了“要吃米，找万里”。

家庭联产承包最初被视作资本主义象征，而受到压制和批判。然而，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新闻界从1980年秋天报纸已开始推开“包产到户”的报道。我们当时发往北京的报道写的是“包产到户”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到编辑手里都改成“农业生产责任制”，把“家庭”与“承包”这两个词都抹掉了。尽管本来应当“合法”的报道被迫以“不合法”的形式进行，“包产到户”犹如地下热火在冲压着，在一线调研的少数新闻记者亦如“地下党”般在冒着危险进行工作。然而这些报道还是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震动。一方面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方面也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反对和指责。我本人就因为报道鲁西北包产到户受到社会指责，被一些人批评是资本主义的吹鼓手。

当时新闻单位负责人胡绩伟、穆青等多次直接向耀邦同志请示，他对新闻界的宣传首先是肯定、是鼓励。他说，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是试行草案，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的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由于受到来自上层的强大压力，《人民日报》在1979年的3月15日刊登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张浩来信”，收到全国各地数千封强烈反对的读者来信，耀邦同志知道了要求赶快补救。于是在这月底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平息了这场风波。

农村改革前两年，不断听到来自北京支持包产到户的声音。一听到胡耀邦、穆青、杜润生的讲话，我们这些记者都要竖起耳朵听，一字一句记下来。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终于见到改革的旗手耀邦同志了。那是1981年5月3日，在济南南郊宾馆俱乐部。这一年4月26日到5月4日，胡耀邦到临沂和泰安地区视察工作。回到济南发表讲话，他强调，搞农业第一要靠政策，第二要靠科学。白如冰、苏毅然在他的两边，耀邦同志说着便站起来了。因为要拍照，当时没有长焦镜头，要靠得很近才能拍特写镜头。我接近胡耀邦后，发现他说话有时有些口吃，但一作报告，那生动活泼的语言，那催人奋进的思想，把所有人都牢牢吸引住。

二、利用新华社内参指导农村改革

在最初的农村改革过程中，耀邦同志是我们听到指示最多的领导人，是对新华社报道批示最多的领导人。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耀邦同志总是思潮如涌，思想是那样新鲜活泼，总是那样敢作敢为而且能站在农村改革的前列、站在农民的一边呢？

追溯历史，胡耀邦同志出身贫苦农家，对农民有深切的了解，直到他去世前，他哥哥仍是普通农民。胡耀邦与农村联系最有影响的是1961年的安徽调查。在连续三年饥荒期间，许多地方出现吃树皮草根，甚至吃“观音土”的情形。发现事态严重后，毛泽东派出工作组到各省访查。胡耀邦去安徽后写了一个报告，承认安徽一地饿死三百万人，这就是有名的“安徽报告”。这个报告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

从指导思想上看，耀邦同志在那一阶段是自觉把农村改革当作中心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谈过，“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我国受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伤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因而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在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全面崩溃百业待兴的时候，首先要抓的就是农业。所以他在解决政治、组织和思想路线以后，一个时期内就集中精力解决农业问题。

从政治实践上看，从1979年到1982年分为两个阶段。胡耀邦是1979年1月担任中央秘书长的，1980年2月担任总书记。1982年6月前，华国锋仍是党中央主席，他对包产到户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就决定胡耀邦前期是以拨乱反正为主要任务，而在后期胡耀邦则是名正言顺地为包产到户“上了户口”。中央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在耀邦主持下制定的，农村改革的所有重大问题几乎都是在耀邦同志指示后源源不断传到我们新闻记者中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两个农业文件、四中全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1980年的75号文件和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制定的，这四个文件像四个里程碑，一个比一个思想解放。



胡耀邦总书记批示肯定了农民买拖拉机的举动。《人民日报》在1981年1月18日的头版就用我的“商河三户社员联合买拖拉机种责任田”的图片新闻。

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多次得到他的批示，就我知道的，家庭联产承包、农民买拖拉机、雇工、专业户、农民长途运销和精神文明这些事都是耀邦同志批示后得到肯定的，而后在全国大规模推广的。后来从耀邦同志对新闻单位负责人谈话中得知，他认为“人们究竟要了解什么问题，要明确什么问题，希望解答什么问题，你们要切中要害地加以反映。……因为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就要加强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干部。前些时候，我对新华社内参清样很注意。”显然，耀邦同志是有意运用新华社内参来指导工作的。当时形势很怪，对农村改革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反对声音。新闻报道从下面发起，从一个一个口子突破，最终形成汹涌澎湃的大潮。耀邦同志始终站在农村改革潮头前面，哪里难点集中就打通哪里。

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这件事便是在耀邦同志批示后得到推动发展起来的。反对农业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有个重要的理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机械化，生产力水平下降，社会主义优越性被破坏乃至被扼杀。

1979年出现个人买拖拉机的，干部们全部持反对态度，认为私人购买大型农具，是违反原则的。贵州、湖南、浙江、福建等省有些部门与地县发了文件命令禁止个人购买拖拉机。我在菏泽县发现不少农民买拖拉机的事，当时县里也不同意报道。我来到黄河北的商河县张坊公社刘安邦大队找到3户社员联合买拖拉机种责任田的线索，开始编辑也不肯发稿。后来见到新华社的内参材料，胡耀邦总书记作了批示，肯定了农民买拖拉机的举动。《人民日报》在1981年1月18日的头版就用“三户社员联合买拖拉机种责任田”的标题，发表了这条图片新闻。这是全国较早反映农民购买拖拉机的公开报道。耀邦同志在内参上一批示，公开报道就发表了。

这些报道，推动农民购买拖拉机形成了热潮。1981年初全国私人拖拉机达3.8万台，1982年达到38.4万台，增长9.1倍。

再一个大问题是农民走进流通领域的问题。当时各级政府对农民走进流通领域普遍持反对态度。采访中，我了解到商河县张坊公社白集大队农民走进流通领域，在市场与农民间搭起桥梁，一年向市场提供100万公斤新鲜羊肉，其中运销北京市的就达75万公斤，闯出一条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

这件事在县里阻力很大，县里不肯评白集大队为先进单位。白集农民心里很有意见，他们向我反映不少问题，希望上面能有个答复。一是发展道路对不对，二是体制对不对，三是经销范围能不能扩大。带着这些问题，我写了调查报告，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发出。胡耀邦同志在12月24日作出批示：“启立同志看后，转万里、润生、刘毅同志。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山东省政府很快以文件形式，将胡耀邦的批示精神与调查报告转发全省各县，要求各地学习白集农民经销羊肉的经验，引导农民搞好流通，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人民日报》农村部编辑肖俊熙很快打电话来，要我立即把调查改写成一条消息。1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用了，很醒目，加了编者按，配了图片，仅仅标题便用了61个字。编者按便是根据耀邦同志批示精神写的。当时，《人民日报》不少编者按便是根据胡耀邦同志批示改写的。

当时，我和南振中等议论这样一个问题，胡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领导人对一个大队的材料作出批示，可见农村流通问题的重要。而且他批给的是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及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使人值得琢磨的是胡耀邦认为“许多问题值得思考”这句话，这个问题便是打破流通体制，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市场经济的边缘。

三、主持制定五个农村“一号文件”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于每年1月1日(或2日)发布、指导农村工作的五个文件，这些文件都是胡耀邦同志主持制定的。

在这五个一号文件中，影响最大的是1982年的“一号文件”。1981年11月离开高唐王庄时，王本跃母亲的一席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拉着我的手问：“你能不能找邓副主席和胡总书记说一说，定个不变的政策。”大娘讲的是实话，使人觉察到农民怕变的心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怕变？恐怕主要是几个原因促成的。

一是农村政策在前二十多年，变来变去，朝令夕改，群众总是被折腾，使他们难以相信。有人说：“问题来了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二是上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同看法，影响形势的稳定。群众议论为“上头神仙吵架，下面凡人遭殃”。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文件认为“在一般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这是一部分人敢于继续公开反对“包产到户”的根本原因。

从1980年秋到1981年底的一年，“双包到户”责任制仍然是在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搞的，在政治上是冒风险的，在实践中是有起伏的，困难仍然不少。我们的一些报道，受到社会的责难与反对，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正在这时候，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表了，党中央站出来正面为“双包到户”落下“户口”，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列入社会主义的正册，为使其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体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来了解到，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是胡耀邦同志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他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干的第一件大事。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主席，新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便开始加紧进行农村改革。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期新华社内参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随后，胡耀邦于8月4日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并要求提交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在1981年10月1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接见代表时指出：有一个问题文件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有“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回去讨论，再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中央政治局于12月21日讨论通过，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通过后，杜润生当场建议将这个文件能够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一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全国重视。他们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这样，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便产生了。

一号文件发表后，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个突出的说法，便是农民吃上“定心丸”了。鲁西北有名的万元户“王三万”王本跃到县城专门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说如今能睡个安稳觉了。

四、新闻工作者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

1981年12月至1982年7月，新华社党组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组织多次座谈会，全国各报刊发表数十篇学习李锦的文章。这场学习活动与耀邦同志的表扬有直接关系。

最早是由鲁西北茌平县博平公社杨庄农民一封表扬信引起的。1980年，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由于新闻舆论上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一局面，理论上也缺深入的总结与引导，思想上比较混乱，不少新闻报道一发出去就在社会上议论纷纷，甚至受到指责。1980年10月，我在茌平县博平公社杨庄了解到农民杨成海承包棉田获得2206元奖金的事。在分配兑现会上，杨成海领奖时情态比较好，我就发稿了。图片说明中有一个“包”字，便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短短几天收到13封读者来信。

南京军区某部有一封来信，署了11个人的名，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信中写到：“我们认为这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道，牵涉到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不能不说话。”茌平县也摸不清底细，非常紧张，做了紧急设防，做好“不认账”的思想准备。我则陷入一种无奈，做好受批判的思想准备。

整个局面发生了变化后，杨庄村党支部觉得我宣传包产到户为老百姓着了难，受了罪，他们给新华社写了材料，称赞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在困难时候为庄户人讲了话。我因为在鲁西北农村报道时间长，发稿量大，在农民群众中留下较好影响。在这阶段，鲁西北地区有5个县写信给新华社、山东省委和党中央，赞扬我深入农村调查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1982年1月7日，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在《中直内部情况》看到高唐县委写的“千里单骑采访，留下一路新风”的材料，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与新华社，“请考察核实后，看是不是能公开表彰和在你们这一行中作为先进工作者典型介绍。”

中宣部和新华社领导作了批示，派了调查组在包产到户的村庄核实。1982年4月3日，新华通讯社党组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新华社藉此掀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高潮。学习活动也在山东省委、中直机关党委和共青团系统展开。

后来得知，就在耀邦同志对我作出批示前三个月在新闻界有一个重要讲话，那是面对社会上对新闻界攻击而讲的。他说，我国新闻工作者，只要合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就有自由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

在1981年10月份，分社传达了讲话。有人说，党中央主席专门批示表扬记者，是党的历史上不多见的，这表明胡耀邦同志对新闻工作的倚重和肯定。耀邦同志在农村改革中，对新华社的工作，对新闻记者是非常重视的，这是大家公认的。我在那时候能够得到表扬，不是自己做得多么好，实在是因为党和国家需要新闻记者为改革事业冲锋陷阵，是对我们那一批新闻工作者的肯定与鞭策。

五、你为农民讲话，农民就会说你好

我永远难以忘记胡耀邦同志接见我的一幕，他的话“你为农民讲话，农民就会表扬你”，永远是对我的勉励。

1982年12月24日，我正在山东商河县农村采访，接到新华社总社电话让我到北京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团代会。在耀邦同志表扬后，我被当作典型宣传，年底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代会结束时，中央领导要接见部分代表。胡锦涛同志召集我们开预备会，说你们是各条战线的优秀代表，一定要向中央领导汇报好。他还特别说，“李锦，你是耀邦同志表扬过的，你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典型，对农村情况熟悉。应该向耀邦同志汇报，耀邦同志很关心农村基层情况。”中直团委书记刘胜玉当晚与我谈话时说，你一定要向耀邦同志问好，听听他的指示，耀邦同志记忆力很强，会记得你的。

在农村改革的日日夜夜，我虽在农村，但遥念北京，按照耀邦同志指示去做，总想着还有什么事应该让耀邦知道，他还想知道什么？在接见时，我向耀邦同志讲起“我是报道包产到户的记者，你表扬过我”。“喔”，耀邦掏出一支烟，一边掏打火机，一边思索，像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他回头对我看了一眼说，“你是骑自行车跑了很多县的那个记者，很能吃苦的，我知道”。

因为在6天前耀邦同志刚刚在我写的调查上作了批示，我就讲起商河农民贩卖羊肉的报道，农村有很多想不到的新事，现在都冒出来了。耀邦同志说：“这是很生动的事例，很说明问题。”他接着说，“新事很多，都发生在下面，记者要到老百姓中蹲点才能发现新鲜生动的材料。你很能联系群众，你为老百姓说了话，老百姓不就表扬你了嘛。”耀邦同志还说：“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是这个说法吧？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很重要，你们从老百姓那里来的，反映了真实情况，很多是中央关注的问题。”

我还汇报聊城、德州一带流传的“粮满仓、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娶新娘，腰包票子鼓囊囊，全村一片喜洋洋”的顺口溜，耀邦同志说：“很有意思。你再说一遍。”当时我还讲了王庄有个“王三万”，要搭伙到北京来看你，那里人都知道好政策是你制定的。耀邦同志忙说：“是小平同志，还有其他领导。”他问：“老百姓关心什么？”我说：“就是一条，政策不能变！”耀邦同志说：“这个知道了。”

后来还发生一件事，我常去的王庄党支部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谈对农村形势看法，里面有我汇报的“粮满仓、油满缸”那段话，耀邦同志批转给《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使得几句顺口溜走向全国。

那次与耀邦同志谈话是短暂的，但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一切从实际出发，关心群众，关心农民，他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生活中发现问题。他关心与表扬记者，不是说我个人做的有多好，而是对新闻界的表扬，是对那一阶段新闻工作的肯定与鼓励，因为记者的调查来自实践，来自群众。在那个时代急中央所急，想中央所想，在历史转折时刻发挥了前哨尖兵的作用。

过了3个月，胡耀邦同志在十三陵参加植树节劳动，我再次见到了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看到我，招了一下手说：“你也来啦。”当时我心里有点紧张，人家称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怎么跑到上边来了。很久，我心里总是不安。

第四次见面是在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专门到会讲了话。他说老汉今

年70岁，“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身体大不如前。那次他强调干部年轻化，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清楚记得在这次讲话中，他深刻分析了当时苏联与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我们知道，在1982年后，他把相当精力投入到党风廉政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他踏进充满荆棘的新领域。

第二节 长者穆青

敬爱的穆青师长去世十年的日子到了，又想起了他老人家。

一、谁是李锦？站起来！

我在新华社36年，算是在浪头上行走的人，经历过大起大落，大苦大难，大喜大悲。想起穆青同志在农村改革初期对我的鼓励，困难时给我的殷切教诲，感念穆青同志对我的栽培养护之恩。心中涌起深深的感激之情，使我无法抑制，无法宁静得下来。

我是1976年10月到新华社的。过去对新华社的所知甚少，知道这是党和政府的舆论机关，作用特殊。但在少时还是知道穆青这个名字的，就像巴金、徐迟、周立波、杜鹏程、华山、杨朔等文化名人一样，穆青是一颗晶亮的星，闪耀在心际蓝色的天幕上。穆青的名字几乎是与新华社、焦裕禄这几个词同时铭记住的。在社教运动初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过广播电台一遍遍朗诵，播音员声调低沉雄壮而又激越。就是那时候，穆青、冯健、周原的名字深深的铭在我们心上了。我当时正在上中学，尚处在对世事似懂非懂的懵懂年龄，但用“咱们村的焦裕禄”为题写过村里一位干部的作文。显然，焦裕禄已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影响我们的成长。

在以后的几年，我们听到穆青的讲话越来越多。一个杜导正，一个孙振，一个国内部，一个摄影部，从这些领导口中，不断听到穆青的声音，他们对于农村改革的大喊大叫，在我们这支队伍中急遽地卷起阵阵狂飙。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总社开了好几次农村记者座谈会，南振中是在农村报道中有影响的记者，常被总社国内部抽去。每次从北京回来，总有穆青讲话要传达。穆青同志讲话的意思是，农村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可能要发生一场激变，旧的一条路走不通，就要寻找新的路。农村记者的责任很重，要了解群众的愿望与呼声，就要深入下去，在田头炕头去听农民啦真心话，发现新事物。领导们的这些话，如一把火烧在心里，直感到发烫，使我们坐不住，觉得人生难得一回搏，要拼搏在时代潮头，生命才有价值。正是穆青这些思想，鼓动我们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义无反顾地投身农村大变革中。从1979年到1982年，我一直在鲁西北采访，去过800多个村庄。仅1981年，我就出发315天，把生命的最好年华献给了农村改革，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

与穆青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81年12月份。此时，我到新华社工作已经5年了。在那前不久，有两次印象较深的记忆，一次是新闻照片《冒尖户王本跃与他的书记朋友》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穆青当天看到报纸便说，县委书记与农民多好，肩并肩，像兄弟俩似的。媳妇坐在棉车上，有生活气息。看这骡子也很精神，耳朵竖着，像也在听。穆青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得到穆青的表扬，摄影部领导孙振也很高兴。后来知道，当时上层对包产到户问题仍有分歧，有的干部“顶牛”很厉害，到底做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已在领导人口中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提出来了。这幅新闻照片发表在关键时刻，报道的主题与领导的讲话相暗合。

还有一件事，是《棉花县长散传单》的照片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山东棉花大丰收的两幅大照片，中央广播电台早晨播了。在编辑部见到蒋齐生，蒋老说，“穆青讲了，李锦要表扬”。作为一个年轻记者，连续听到社长的表扬，心里很高兴。我心里猜想，我啥时候能见到穆青社长哩，到总社来就望着穆青办公的那幢

楼。见到五楼的灯亮着，心里就想，社长不知在关心什么，需要我们去调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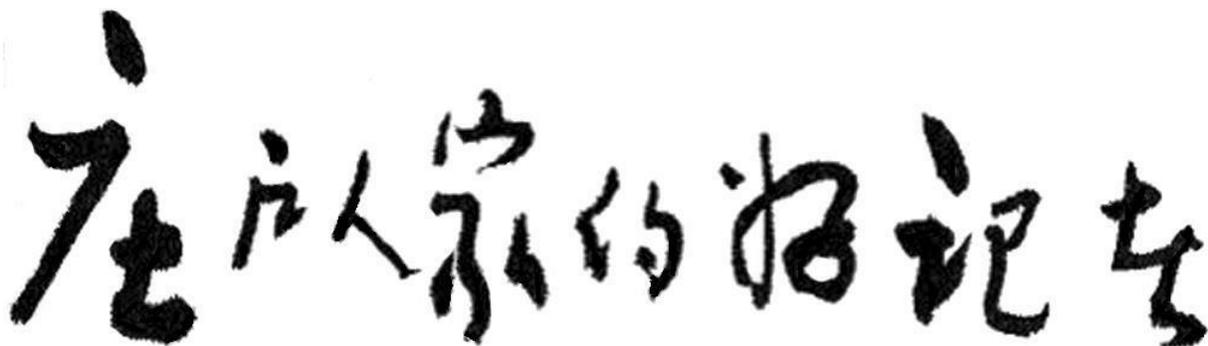
这年年底，新华社摄影工作会召开了，这是十年浩劫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摄影工作会。会上，摄影部主任孙振安排我介绍在鲁西北农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经验，讲了一个上午，会议气氛热烈。有一封信是高唐县委写给穆青同志的，穆青同志让在会上读一下，使得会议气氛热烈起来。

会议结束时，穆青来了。他坐定后，作了“新闻摄影大有作为”的讲话，讲到一定要深入生活时，突然问：“谁是李锦，站起来”。我从第五排站了起来，全场都望着我，穆青同志盯着我看，约有三四秒钟，会场气氛像凝固了，一片静默。在短暂的停顿后，他一招手又让我坐下。

穆青说：“李锦同志为我们新华社争了光，带来了荣誉。李锦采访很深入，所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接着说，什么是优秀记者，要让人民来说。自己说自己是高级记者、特级记者不行呀，要让人民来评判，庄户人家的好记者，这是谁封的呀？人民封的。我内心非常激动，就像见到毛主席那么激动。穆青讲的什么话，我也记不清了，满脑子只记着两个字：“人民”。

二、庄户人家的好记者

“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提法，是经穆青社长的肯定而被传扬开的。



穆青为我写的通讯题写的标题

最早是在平县杨庄党支部在给穆青的信中提到的，其实这涉及到一场政治风险。1980年秋天，我拍了一张农民在政策兑现会上领奖金的照片，农民的情态较好，报道的是杨呈海承包棉田获得奖金2206元的事。2000多元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在这之前，一户农民拼死拼活干一年，也分不到100元。照片说明文字很短，但因为出现一个“包”，触动这根社会上绷得最紧的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仅新华社摄影部就收到13封反对者的来信。对于农村联产承包这件事，开始绝大多数干部是摇头的态度。在新闻单位，在记者中，坚决报道包产到户的人是极少数人，最初是非常孤立的。我们这些人就像地下党似的，在下面激情如火一样燃烧，觉得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而回到济南则顿减其口，用眼色交换看法，不敢敞开来谈联产承包的好处。编辑部的调查，使在平县委很紧张，县委领导派人偷偷地到济南送信，告诉说上面调查您了。县委只说是符合事实，其他什么也没有说。

一年过去了，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被中央认可，这时候，富起来的杨庄村老百姓想起了我，有人提出，去年来的那个记者为庄户人受罪了，挺对不起人家的。村里便以党支部名义写信给新华社编辑部，想为我平反，认为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从这封信开始，便有了庄户人家的好记者的提法。新华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孙振在1981年夏天的郑州会上，讲了这件事。

又是一年过去，又是一封“党的好记者，庄户人家的好朋友”的信寄到新华社，这是高唐县委写来的。反映我深入王庄报道万元户，骑自行车采访的事。这封信，穆青同志看到了。我去的多是熟地方，稿件发得也多。像“万元户入党”、“农民侯俊香不贪份外财”、“新春佳节夸支部”、“白集农民经销羊肉”等稿件，都为《人民日报》采用，有的稿件为中央领导胡耀邦、万里批示，有的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一路骑车采访，一路稿件见报。千里单骑采访，加上又是在风雪严寒的冬天，在鲁西北各县引起很大反响。从齐河、高唐、平原到陵县，出现了一个县又一个县写信给新华社表扬的现象。

1982年1月，当时的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对高唐县委的来信作出批示，建议把我作为先进工作者的典型在宣传战线表彰。总社党组立即派出调查组，在春节前后两次赴鲁西北农村5县，核实我在群众中深入采访的情况。



1984年9月，我在中国新闻学院读书时，兼任中国新闻学院院长穆青勉励我“一手拿相机，一手拿笔，做两翼齐飞的新型记者。”

春节后，穆青同志专门听了调查组的汇报。新华社党组作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这可能是穆青同志担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后发出的第一个决定。据了解，穆青同志是1982年4月6日担任新华社社长的，而这份报纸是当天定稿，隔日发出的。当时前进报刚刚复刊，试刊这一期以四个整版刊登了学习文章。穆青为通讯标题“庄户人家的好记者”题了字，其中有一篇是“穆青要大家向李锦同志学习”的消息。前进报和《新闻业务》陆续发了孙振、蒋齐生、赵奇、徐光春、胡颖等20多位同志的文章。广东分社记者蔡东士等还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报告文学表扬我，一时蔚成风气。

1982年4月，穆青刚当新华社社长的第二天，新华社党组便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庄户人家的好记者”几个字便是穆青题写的。

三、到穆青家串门

穆青同志自己便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他出身在河南农村，在担任新华社社长后，每年都要深入农村，走家串户，了解民间疾苦，倾听人民呼声。他结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在几十年间保持密切联系，通过他们体察民意，确定报道主题。红旗渠的劳模任羊成带着自家种的小米、绿豆到北京来看望穆青。而穆青则买大米、白面让任羊成带回林县红旗渠。穆青社长才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哩，他现在拉扯起我们这个队伍，就是要求我们向群众学习，做庄户人的代表，代表庄户人。他想使自己的队伍都走上这一条路。作为一社之长，他希望自己的队伍朝这样去努力，这是他的天性流露。

穆青把新华社视为人民的队伍，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靠调查研究解决队伍建设问题，因此他特别看重人民的评价，群众的赞颂。由此，反映这位革命家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一种民本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穆青由一个卓越记者变为专职的政治家后，身居高位，不忘黎民，一直保持着平民本色，尤其是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中国人民为什么认可穆青，理解穆青，用今天眼光看，穆青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穆青。如果说，在战争年代范长江、邹韬奋以勇敢与真诚点亮革命火炬，焚烧旧中国的黑暗，给人民展示一种希望。那么，穆青则以新一代共产党人的形象昭示着人民的未来。而穆青报道的人物在树起一面面工农旗帜的同时，穆青社长在新闻界也竖起了自己的旗帜，这就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旗帜。

后来，已当上分社副社长的南振中到北京汇报山东分社开展向李锦学习活动的情况。6月11日，《前进报》在头版头条发出新华社党组进一步开展学习李锦同志活动的通知。南振中带信给我，你到北京去时告诉穆青同志一下，他要见见你。

我难以忘记，这是一个清静的夏夜，天很黑。我来到穆青家中小院，在门卫打过电话后，穆青同志便迎上来了，他手拉着我手进了院子。我手足无措，就像小孩被大人牵着。进了门，他搬出两个小凳，一个递给我，我们对面而坐。院子里有竹子，偶有微风吹来，能听见竹叶飒飒的响。有蚊子，老人家不时用扇子为我拍打着。他问起我的经历，知道是农村苦出身。问起农村改革的情况，他说，一个记者赶上大变革，是种幸运。但机遇属于勤奋刻苦的人。接着穆青讲起自己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是周扬找他谈的话，他想干文学创作，最后服从组织。自己也没干过新闻，但越干越愿干，大半辈子就这么下来了。穆青社长提醒一定要多写。他总觉自己写得太少，也不够勤快，很多该写的而没有写，心中有负疚的感觉。他说，一个人要有长期吃苦的思想，坚定为党和人民奋斗一辈子的信念，心无旁骛。他说，你文字基础好，可以一手搞摄影，一手搞文字。十八般武器都能用上，这是通讯社队伍建设的方向。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既拍照片，又写文章，在当时起的作用特别大。在院子里，一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当时穆青61岁，我30岁，与穆青同志谈话，如沐春风，感受父亲般慈爱。我不过是穆青麾下数千大军中的一个小卒，得到社长如此教诲，可见他对队伍成长关注，殷殷之心，如渊如海。

这件事，带给我的荣誉太多，远远超出我该做出的努力。1982年底，我作为新当选的团中央委员，由团中央负责人胡锦涛推荐给中央领导，见到了邓小平，让我汇报农村发生的种种情况，邓小平知道我去过那么多村庄，了解情况，说“你有发言权”。

四、抬头望见北斗星

少年成名实乃人生之大不幸。特别是某种潮流到来时，我们就像江心的树叶，随着急浪漩涡，一点也由不得自己。1989年春夏之前的一场剧变把我拖入冰窖般的地狱中。正是这场变化，撕开了以往被遮掩得阳光灿烂的一角，让我看到人生残酷乃至惨烈的一面。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到沂蒙山区四面是悬崖峭壁的九间棚村蹲点。

因为天气骤然降温，我在山顶上病倒了，腹泻不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我硬撑着。整整腹泻8天，最多一天拉肚20多次。夜里从厕所里回来，晕倒在山坡上。被寒风吹醒，我抬头望见湛蓝天幕上的北斗星，心中想起“抬头望见北斗星”那首歌。我想，穆青在哪里？他身边的阴霾有没有散去？我相信穆青总会讲话的。我咬紧牙从山坡上一步一步的朝回爬，爬回住处，身上衬衣都被汗湿透了，直冒热气。最困难时候，我躺在床上起不来，大爷大娘们送来花生、鸡蛋、面条与咸菜。有的老人流着泪说：“你走人吧，俺山里穷，买不起书。”他们还以为我是新华书店卖书在此落难的人。夜晚睡不着，有时又想起穆青，心里说：穆青社长，你知道吗？我住在老百姓中哩。我是您表扬过的人，我按您的话去做，要做得更好。

在1989年夏天之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在新华社住了很长时间。穆青同志处境微妙，我不敢找他，怕为他添麻烦。我想，穆青倒了，新华社不知是什么结局哩。我站在新华社九号楼最西北的地方，望着穆青家住的那个小院。我期望看到穆青一眼，听说老人的头上飘的银丝比过去更多了，可是一眼也没看到。

在新闻界，穆青是以爱心而著称的。他以丰富的爱心，爱这个大千世界，爱他手下的将士。人都说穆青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从来不整人。这是新华社人的共识。然而，我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为保护别人而不怕牺牲自己的人才是大丈夫，真男子汉，穆青有这种勇气，也有这种胸怀与胆量。就在我被新闻界一、两个人总是抓住不放时，穆青的《新闻散论》出版了。我急切地翻开1981年12月的讲话，肯定我的话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为新华社立了功，带来了荣誉”。穆青同志一个字也没有删。在这时候，穆青还不知道我在挫折中的表现，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再站起来，可他竟一字未删，可见老人家的胸怀之大与心善之极！我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言表的喜悦，对穆青同志的感激与敬佩是巨大的，如山高海深。因为在前不久，另一位曾经写多篇文章学习我的人态度大变。我是在极度鲜明的对比中，看到人性低凹的渊谷，然后又看到耸立的高峰，反差之大，触目惊人，撼动魂魄！

五、为什么不找我

1993年2月，《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周建英打了一个电话说，穆青让你到北京找他，他要与你谈一下。这时穆青同志当了10年新华社社长，刚刚退下来。

要去见穆青同志，百感交集，更有种负疚和歉然之感袭上心来。已经三四年没有见他老人家了。因为我心气浮躁，作风轻飘，不知利害，不知深浅，以小失而酿大难，以己过而致公害。多少次踟蹰在九号楼面向西北的窗口，多少次梦中盼望见到穆青的面。今天，终于来了，我向穆青负荆请罪来了。到了六楼的穆青办公室，看到穆青的脸庞消瘦了，头发更少了。他一脸严肃，手一指，让我坐下。

我讲起自己的教训，承认自己的不足，我是新华社的人，招致新闻单位同行中有人跳出来藉此攻击新华社，伤害了新华社的形象，辜负了穆青同志与新华社党组对我的栽培。我一口气讲了约十分钟，穆青摆了一下手说“行了”。他打断我的话说，教训应该吸取，也就是这些了。既然谈了，认识可以。他说，你去获什么奖啊，我们一生都应该与名利思想作斗争，千万不能因为取得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为遇到挫折而消沉。要一辈子对得起人民，因为最终结论是由人民做的。

穆青的一番话，天高地阔，使我觉出自己思想的委琐。和穆青不计名利，不较荣辱，鞠躬尽瘁，忠于人民的崇高境界，相差是多么的远。

穆青很快地把话题转向对我的鼓励，他说，你搞的双星集团、九间棚村调查，影响不小，山东省委、临沂地委都表扬了你，我们都知道了。一个地委发出学习的决定，是不会轻易做出的。这比我们做决定重要得多，他们是来自人民的声音。你跌倒了能自己爬起来，很快又站起来，做出成绩，这种锐气很难得。这说明你按党组的要求去做了，更加深入实际，是过得硬的，你感动了人民，人民就会说你好话，人民是最有良心的，民心是秤呀。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你在新疆发的稿子也很好，文章照片都不错，我还以为你调到新疆去呢？到艰苦的地方锻炼，有利于成长。

我说到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苦其心志更重要，孟子是把它排在前面的。穆青接着说，孟子讲的话很有道理，古人的话是经过千百年检验和过滤流传下来的。我也委婉地提出，希望领导要慎重对待批评报道，不能把被批评的人提供的情况当作结论，也应该听一听记者的意见。

穆青问，“他们没有与你核对？”我回答只向我报道中被批评的群众核对。当时向被批评者外调材料还没有与我核对，也没有形成组织结论，就被新华社内部人拿到社会上宣读，有个单位就抢先在报纸上发表了。

穆青愣住了，盯着对面空白的墙，眉头皱着，久久不语。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问，“当时为什么不找我？”

我说：“那时北京很乱，您也很难，我不能为您添乱。他们不是在打倒穆青吗，刊物上也点了你的名字，新华社不能没有您。只要您不倒，新华社就不会乱，您迟早会讲话。”穆青手指着我说，“幼稚，你为什么 not 找我！”我又讲，“因为我确实有错。”

我在这一年里，神经几近紊乱，半身麻木，手握笔总是发抖。要不是分社社长刘光辉与同志们的理解与保护，我也许就见不到穆青了。忍受3年了，屈辱、痛苦与愤懑像憋满

了的水库，一下子冲决而出，一泻千里，四处漫流，我连自己也阻挡不住。

我迎面看了穆青一眼，发现他的眼圈有亮点，穆青泪水出来了，沉默中他用大手自上而下抹了一下脸。他手又指着我说“把泪擦了”，下令似的。我此时已经泪流不止，无法说下去了，几年来，我第一次痛哭出声。自知言重，我对穆青说：“对不起”。

穆青说：“你说”。我无法再说下去了；穆青说“都倒出来”，我不知还说什么。

在长长的寂静之后，穆青讲，社会复杂，人生难呀。年龄大了，经历的事多了，也成熟起来了。我们这支几千人的队伍，就得有种士气，这便是始终坚持联系群众，始终坚持调查研究。树你这个标杆就是想让这个风气传下去。好在你还年轻，四十岁刚过，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还长。沂蒙山区人民对你评价是公正的，最终是人民在评价你，不在乎那些毁誉了。也要学会原谅别人，包括领导的过失。相信人民，相信历史！不管形势多复杂，思想不要退回来，是经验的还是经验，就不会变为教训。当然是教训，也要认账。别人怎么样，不要管他，让他们自己去想。

穆青站起来目送，只是轻轻招一下手，又坐下。

六、拍好照片，也要写出好文章

从穆青那里回来不久，我便到兴福镇蹲点来了。我在这个镇一下子住了48天，我仍然骑着自行车调查，走了18个村。我走上了更加扎实、更加深入具有自己特色的调查研究道路。有人写文章认为这是“李锦现象”，他们哪里知道，这是穆青要我们这样做的，我们能够做得好一点，只是“穆青现象”的扩大而已。

去西藏任职时，穆青不在家。后来，因为母亲病重，我从西藏赶回来，到北京先见穆青。他不在，我留下一盒虫草，知道老人肺不好，虫草对肺、肾都有好处。过了一天，秘书小陈打来电话。说老头抱怨，怎么连面也不见一下就走了，在西藏身体怎样，老头很关心。

穆青对大自然怀着一片真情。退休后，他的足迹遍布五大洲的山山水水。走到哪里，他都把照相机带到哪里，拍到哪里。他拍照片重于选择，画面往往显得气势磅礴，朴实自然，不事雕琢，透射出深厚的美学思想和自己的独特感受。临回西藏，我又去看望老人，与他说话有半个小时。他早就想去西藏拍一些照片，可终未去成。他问我最低的地方从哪里进去。如果不进藏，在附近哪里更有西藏特色。我回答是塔什库尔干，可那里也有海拔3200米。穆青眼神中滑过一丝失望，轻叹一声，“去不了了”。

回到西藏，我写的《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书出来了，这书以图片为骨架，用文字缀连起来，写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更多的是一个记者在第一线调查研究的感受，体现农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书一出来，我首先想到穆青，就像向父母报告一样，先给穆青寄去一本，也算是对尊师的汇报。没有几天，穆青的秘书陈二厚打来电话，让再寄两本。小陈说，老头看了你的书，看得很认真，他和我们说，李锦是苦出身，在他这个年龄算是吃苦多的，经过磨难，一直没有脱离农村一线，底气足，是靠自己干出来的。像他这样文字与摄影都突出的人才，很少。

听说穆青同志得了肺癌，我的心猛地一惊。肺癌发现不易，一旦发现，生命延续期是3个月至1年时间。何况老人家已经82岁了，他能抗得住病魔的肆虐吗？我无论如何要看老人一眼。隔年3月，我去南方分社考察学习，从济南带去几盒阿胶浆。因为我的母亲也是患肺癌去世的，胸腔里血水抽得很多，每次都是半脸盆血水，阿胶有利补血，而切块熬又太麻烦，阿胶浆用起来方便些。

七、我在家里点上香

穆青真的走了，一颗闪亮的大星陨落了，我至亲至敬的老领导，父亲般的尊长终于离我们而去。小时候，我是在父母慈爱的目光下歪歪斜斜地学会走路的，到新华社在穆青慈爱的照护下跌跌撞撞学会做事做人。老人患病晚期，我未能尽一点晚辈、学生的职责和心意，想来更加难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去看看他老人家最后一面。听到分社的人不要到北京来的通知，我便在家里摆上穆青的像，悄悄地祭奠。

在我的一生中，在家中祭奠过三次老人，一次是胡耀邦总书记去世，这不仅是因为他表扬过我，更是因为我觉得农村改革初期耀邦同志的功劳很大很大，品行高洁，内心深为钦佩。一次是母亲的周年，我不能回去。再就是为我终生难忘的穆青社长了。也算不上是灵堂，只是在桌面上放上老人的像，点上三支蜡烛，馨香一柱，放上几个菜，一碗饭，一双筷子，一盅酒。还有老人为我题词的那张报纸。我在三鞠躬后，便坐在旁边，看着柱香袅袅升起又慢慢失去的烟丝，默默地想，默默的流泪，泪流不完，又从眼眶溢出。我的妻子也跟着鞠躬与流泪，把穆青视如自己的老人。

情满天下，泪满天下。半个多世纪来，由穆青亲手培育或领受他恩泽的莘莘学子，何止上百上千。在这些日子，不知有多少人在哀悼穆青，纪念穆青。随着时间积累，我心里所感受的苦痛继续增长着。像穆青这样始终如一地敬重人民，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深情的新闻界领导很难见到了，像穆青这样以父兄之心关心爱护记者的领导也很少见到了。哪怕再见上老人家一面，当面鞠三个躬，也难表达我对于这位领导、长辈、恩师的敬爱与感铭于万一。从穆青第一次当众问“谁是李锦”，已经过去32年了。多年与老人家接触，耳濡目染，我已是很幸运的了。天遂人愿，正好总社让分社干部去北京参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轮训班。早上到了北京，我便赶到穆青灵堂，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看到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李长春、丁关根等领导人献的挽联，挽联如雪，白花花一片。悲情如歌，尽是赞颂的话语。穆青是一座雄伟的高山，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不管人们用多少美好的语言来赞颂，也不为过。我注意到，送花圈的还有焦裕禄、潘从正的后代。党和人民记着穆青，人民的悼念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好纪念。这马上使我想起他的话，最终是由人民做评价的！

我又见到穆青了。在八宝山公墓，他静静地躺在那里，脸态安详，身处永远的静寂。鲜花、松柏与党旗簇拥着老人。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回族老人高高的鼻梁，脸色显得很白。他光辉的一生是新华社的骄傲，也是中华各民族的光荣。

第三节 亦师亦友范敬宜

11月14日，我在杭州出差。手机上出现短讯“叔叔，范敬宜去世，晚报上登了”。是侄女发来的，突然间觉得头脑里是一片空白，这个世界似乎停住了，我的脚步动不了，被后面人推着，发现自己是在走向飞机的通道上。坐到座位上，心神稍定，马上涌到头脑来的便是范敬宜退回西藏两盒虫草的情节。

一、至慈至善

我与老范认识26年了，他是我在新华社外的老师，更多的是记者与编辑的关系，亦师亦友。最初的见面是1984年在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他已经从辽宁调到北京来了，是国家外文局局长，在会上介绍“莫把开头当过头”那篇文章，我则介绍鲁西北采访包产到户的调研情况。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是一个有很强发现力的新闻记者。后来，隔一阶段联系一次，他在经济时报当总编时，把我写的“汪海和双星事业”长篇通讯放在头版头条，在人民日报当总编时，把我的胜利油田大明集团报道用了大半个版，都是他亲自编的。

后来接触多了，愈发觉出，他是一个已经脱俗的大文人，才气横溢，待人真诚之至，半点官架子也没有。每次见面，他总是听我介绍来自基层的情况，常交流一个小时左右。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时，我正在西藏工作，我抽空写了一本书《大转折的瞬间》，想请老范为这本书写个序，我在拉萨给他打电话，老范一口应允。他把序直接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了。他为我写的这篇序，站得高，放得开，又想得深，对晚辈显示出满腔的慈爱，那些激励的话，使我很受教育，受益终生。

我从西藏寄两盒虫草给他，三两一盒，这虫草是我从老乡手里一根一根挑出来的，都很肥硕。老范年纪大了，身体总会有这个那个的毛病，从遥远的西藏寄点虫草，表达我的心意，也是他身体需要的。过了几天，老范打来电话了，说收到一个包裹，问里面是什么，我说是两盒虫草，他说虫草有什么用，我说有病治病，无病养身，对肾与肺都有好处。他说“我不要补养，我只吃米饭米粥，什么营养品也不吃”，我说“不费事的，放在酒瓶里泡着就行”。老范说，“好，我知道了”，并表示感谢。作为他的学生，多次聆听他的教导，作为外单位的记者，他总是虚怀若谷地接待，我从未给他表示过什么，寄上一点虫草，只是聊表自己一点心意。没有想到，几天后，这个包裹原封不动地被退到拉萨。老范连拆也没拆，便在包裹封皮上写上退回地址。我愣住了，在办公桌前坐了半天，心里很难受，您这个老范，这不是打我耳光嘛，我不是您的部下，这不是为领导送礼。您在业务上帮助过我多次，何况您为我的书写序，是用了心思的，这也算是给您的稿费呀。这点心意您也不让我表达，您不是存心让我难受吗？

老范就是这样的人。他做的好事太多太多，而他自己从来不求一点回报。我作为外单位的记者，且是晚辈，他亲自为我编发的稿件不下于10次，每次都是以突出位置采用，我在新华社几十年，也没有人对我的稿件下过这么多功夫的。

我从来没有请过他，就这么表示一次，他也不肯接收，这叫人怎么不感动？

老范走了，想起他不计门户，对外单位记者的热诚与尊重，想起他对晚辈全力扶持而不图一点回报，想起他不怕是非议论，对记者唯才是举，想起老范的种种好处，心里满是尊重与崇敬之情。像老范这样胸怀与品格的长者，在我人生中只有几位，已经远去的穆

青、蒋齐生，再便是范敬宜。从业务成就上看，也是三座高峰。我搞新闻也已经整整40年了，认识局级以上的新闻官员不下于200人，我从内心最拜服的是这几位，再早的我不了解，也不作比较了。

这两天，觉得老范形象越来越高大。老范的慈眉善目是那样动人，简直是一尊活佛，怪不得老范走时，他最后工作的地方清华大学学堂烈火熊熊，这是中国学界在为范敬宜这位新闻界大活佛举行火葬仪式，在为他送行哩。

二、求新求变

范敬宜从1995年到2003年担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的八年间，为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范敬宜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他把新闻摄影提到一个新高度。在主持新闻摄影学会期间，把新闻摄影界的思想理论提到一个新高度。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他极强调新闻摄影过程论的思想，在较突出的版面上，让摄影独立地发布新闻。从对我拍摄的《起起落落话大明》专题的编辑过程，可见范敬宜的这种思想倾向。

范敬宜到《经济日报》后，便十分重视新闻摄影的发展。1992年3月5日，正是“两会”开幕那一天，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撤换其它文字稿，把我的青岛双星集团“破三铁”的图片报道放在头版中心位置，以后连载6天，都放在头版上，形成一个大系列，在“两会”代表中引起较大的关注，使得“破三铁”这件事的宣传更加形象化，也更加具体化了。这件事，在摄影界也引起反响。

胜利油田这个专题报道的采用，有个前奏。在6月12日我曾去报社一趟，向老范汇报企业改革情况，他对胜利油田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这组照片是我在大明集团蹲点调研时拍的。当时正处在党的十四大与十五大的中间，市场经济面临着一种市场经济庸俗化的挑战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强力反扑。我到大明集团就是为了寻找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回答市场经济路该怎么走的问题。这组照片通过对一个企业改革进程的捕捉，反映我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也记录了这段经济转型期的历史。

等到这组拍完，已经是1996年1月的事了。当时我在新华社发稿，巧遇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辑陶源明到新华社选稿，他看到这组稿子，说新华社先不要发通稿，编辑刘东山也答应发专稿。他说，近一阶段人民日报用照片不太景气，老范想扭转这个局面，让照片来唱主角，可是缺乏有份量的稿子，撑不起来。这种考虑，对新华社当然是好事，当天晚上，小陶打电话说，老范看到李锦的照片，很高兴，决定用一个整版来发表，这个稿子反映了改革的过程，而且安排在改版第一期发出来。

当天晚上，我就编写说明。想到老范策划的系列报道《香香臭臭说广东》、《快快慢慢说上海》、《穷穷富富说江西》，我索性使用“起起落落话大明”的标题。

有人担心，照片主人公愁眉苦脸，给人一种压抑感，能放在头条上吗？老范说，这组照片的成功得益于对这些压抑感的抓取。什么叫企业停产，我们拍下来的并不多。改革就是革旧图新，没有新旧对比，就无法凸显改革的艰难。老范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1995年正是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年头，在大明集团采访初期，耳闻目睹了许多面对亏损无奈的人和事，对旧体制给工人和领导带来的束缚和伤害深有感触。我觉得它们是改革的起点，是改革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展示给公众。这便是这个变化“过程”的起点。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谈，老范说，“李锦呀，1992年的‘破三铁’是有点过了，这种改革是在牺牲工人利益的基础上搞的，当时社会福利问题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大批工人下岗了，生活很苦。我想，人民日报以整版采用这个图片专题时，头一张大照片就是工人愁眉苦脸的镜头”，老范是故意为之。

范敬宜与编辑们分析这个稿子时说，做记者的，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见证历史进程也是新闻摄影最重要的功能，能够亲历改革开放的历史瞬间是记者的幸运。这组照片拍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以实实在在的照片留下这段转型期的历史瞬间，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

一个月后，范敬宜和蒋齐生老先生在有60多个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充满热忱地推介了这组报道。我没有参加那次会。那天中午北京有七八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蒋老夸奖了我，老头站起来了，讲得很激动，说有深厚的功底和深入采访的功夫之类的话，特别强调新闻摄影过程论提出对于中国新闻摄影改革不可磨灭的贡献。参加那次会的《中国青年报》的铁矛老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中国摄影报》上用大半个版发表了。

新闻摄影过程论作为一面旗帜是1987年打出来，是中国新闻摄影改革的理论成熟的标志。在《经济日报》召开的摄影改革研讨会上，蒋老以这个主题把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引入新阶段。新闻摄影界当时达到的理论层次，在全国思想学术界里也是不低的。在1995年范敬宜接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他继续高举摄影过程论的旗帜，并且以自己的实践推广这个过程。相当长时间以来，经济摄影采用的一直是“机器+人”的模式，后来又有人提出“人+机器”，其实这都不是经济改革摄影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人物才是报道的主体，机器只是背景。在《起起落落话转变》中我把眼光落在生产线上，但没有去表现机器的功效，而是把立足点放在掌握机器的人身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关于调整生产关系即人的关系的革命，抓住了“人”就抓住了改革的根本。经济改革的报道者应该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生活，投向改革进程的人物命运身上。

我从1988年后，基本上就脱离单纯搞摄影的生活了。到1995年我已脱离了一般新闻采访，进入了理论研究。在搞胜利油田调研时，我主要力量是研究和提出资本经营理论，完成了一组调查报告，一篇评论员文章，一组经济分析报告，拍这组照片是顺手牵羊，是用随身携带的傻瓜相机拍的，结果这“五个一”全部在全国范围内获了奖。

范敬宜当评委会主任的中国新闻摄影优秀记者评比中，我以一篇论文五组照片获得“金眼奖”。范敬宜在分析我的作品时强调要提高理论素养以明确摄影事业方向；增强责任感，以重视国家主流题材；克服单纯摄影观念，以贴近社会。这三句话，里面包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看出范敬宜对新闻摄影方向问题、题材问题与队伍建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老范不管在哪里，在《经济日报》，在《人民日报》，也在主持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期间，都使他所在的地方成为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时期。他愈老愈是追求变化、追求新意，不断突破自己，突破环境的约束，不断开拓新局面。

三、忧国忧民

我和范敬宜1995年7月12日在《人民日报》社有一次长谈。向时任总编辑的范敬宜介绍基层企业改革的情况，可见范敬宜忧国忧民，重视调查研究，倾听来自基层的情况。

那天，空气热得发烫。一大早，走几步汗便出来了。坐车到《人民日报》社，已是九点半了。先见杨振武，他是《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在他办公室里说一会话，到范敬宜总编辑屋中谈有40多分钟，老范又谈了20多分钟，前后达一个小时。

老杨是《人民日报》里工业报道中发过许多大稿的记者。1992年夏天在双星调查时，我们在一起住过几天，每天晚上两个人在海边散步一个多小时，交流甚多。他说，上次在双星住了几十天，这次到胜利油田又住几十天，真下工夫，说了一番勉励的话。他说你的这些想法向老范汇报一下吧。今年是企业改革年，现在上面也拿不出好章程来，只是讲经济效益纵深行，宣传深入不下去，他会听你汇报的。他去老范屋子回来说，老范说你很深入，他在办公室等你。

一会儿，郑剑秘书把我领到老范屋内，听说我已经等了一会儿，老范连声说“你看，你看看”。原来，刚才一位报社的老同志缠着他谈个人的事，又不肯走，耽误时间长了，老范连声道歉。我说不要紧，我是来看看你，闲谈谈，老范说，您李锦可不是闲谈的人，接着便问我又到哪蹲点了。

我向老范汇报我到胜利油田大明集团住了58天，国家朝前走很难，我有一个新思路要汇报，这便是资本经营。我谈了对当前宣传工作的看法，然后便掏出我的思路。我讲了这么几层意思：1、资本经营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思想的深化；2、资本经营是什么；3、资本经营的价值；4、这个企业的经验对国家发展的启示。我认为，以资本为纽带，重新组织大型企业集团可能是方向，该大的大起来，该小的小起来，经济结构才能调整好。现在市场经济朝前走，有走不动的感觉。我的话一停，范敬宜便说，你这个思路可能行得通。现在国家太难，改革走不动，可是国家只能朝前走，不能朝后退，怎么走，总要想出新道路来。

范敬宜说资本经营是个热点，你又走在前面了。产权制度改革似乎碰到难处，是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了，怎么反思，我没有研究。对于资本运营我们喊出了这个词，但是浮在表面，没有回答问题。你把文章做得这么深，这么透，很可贵。现在就缺少像你这样的记者，深入生活非常扎实，思考也非常扎实。范敬宜说资本经营是一个新思想，按你讲，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确实是一篇大文章。

我向老范诉起了对国家的担忧。现在守着国有企业不动，只是让工人下岗，工人很苦，意见也大，这种经济效益纵深行不能宣传。我说起我与胜利油田一个下岗女工的谈话情况，工人太苦了，我提出不能再讲“减人增效”了。到北京几天了，编辑的话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些身居国家发稿重任的编辑说，“除了国有资产不流失，其他不要宣传”，而且说，“上头有精神”。到底是什么精神？老范反问我怎么看这件事的。

我便直言相告，上面人不了解下面情况，对“国有资产流失论”不可信，对“减人增效”不能再宣传了，我们的宣传要利国利民，不能祸国殃民。对工人下岗要同情，不可随便往社会上推。前两年的“破三铁”是有后遗症的。经理市长有政绩了，可是工人怎么办，你总不能把工人消灭，推下大海吧，改革要搞下去，社会保障也要一步步跟上来。国有资产流失到什么程度，流失到谁手里去？对国家影响有多大？现在没人回答，只是说上面有

精神。可这像一道死死的闸门关着，似乎没有空隙，报道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了。

老范说，你的认识是从下面来的，很可贵。中央正在筹备开十四届五中全会，对企业改革得有个说法。让工人下岗，这种减人增效的经济效益纵深行不能再宣传。他说这个他能把住关。他让我把《资本经营试论》留下了，还有调查报告，一篇评论员文章。他说要学习一遍，再让他们搞经济的人看看。他说，国家多难，走上市场经济这条路不易，又有人想倒回去，可是怎么朝前走，又缺少下真功夫的人。需要一批理论和新闻工作者作顽强努力，国家太需要肯调查研究能提出思路的人了。他说，离群众越近，就越接近真理，离基层越近，越能提出思路。

现在我们记者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人蹲不下去，理论水平上不来。不少记者是编报匠，而且已成为普遍现象。有时候，朝深处再想一想，想透了，便可能是创新，就怕深不下去。现在年轻记者不肯沉下去，老同志自己也不能以新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人，说了空话，反而使年轻人有逆反情绪，久而久之，这个问题便没人提了。老范说，听了你刚才的介绍，我很兴奋。你能在一个企业住58天，在九间棚村住52天，双星是50多天，都是这么久的时间，能这样深入，还有什么不能了解，还有什么不熟悉的呢？过去马克思是在对英国工人运动分析的基础上写出《资本论》的，毛主席在井冈山调查也是这样。后来在刚进城时，记者们做得是可以。这几十年，便很少有像你这样长期坚持在基层调研的了。

老范又谈起我报道的九间棚，这个典型是宋平表态的，他对这个典型非常重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典型。这个典型是党的建设的典型，临沂地委发出决定号召向你学习，我们知道这件事，王忍之、吴冷西都批示了，记协刊物上介绍过。人民群众向你学习，这是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你为什么底气比别人足，一个是贴近实践与群众，一个是对马克思基础理论的理解。搞理论的新闻记者不算多，报道新理论的则更少。你提出的资本经营不可能马上解决，中央认识这个问题也有个过程。但做记者的一定要有理论思维，学会理论思维。

范敬宜听取我的调查情况汇报，谈了40分钟，他又穿插谈了20分钟，前后有一个小时，快到十点十五了，他在这个上午便做不成什么事了。

范敬宜还建议，你可以把比翼齐飞的理论写出文章，一个是调查研究，一个是理论学习。现在《新闻战线》也缺少这样的文章。你的实践可以这样概括：一个典型五十天，实践理论双飞翼，干则必成靠毅力，时代风云一高隼。他笑了笑说，你送我一个资本经营思路，我也送你一个思路，照这个写吧。唐代诗僧皎然是吴兴人，他有“气杀高隼击，惜芳步寒林”的名句。高隼飞到其它鸟飞不到地方，你能飞到。

国企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关于调整生产关系即人的关系的革命。改革的报道者应该把目光投向改革进程的人物身上。这个报道为人民日报大篇幅采用。

与老范的谈话，近一个小时，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前一半是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看法，后面一半是关于新闻队伍调查研究问题，是新闻队伍自身建设的问题。因为郑剑秘书进来三次了，外间还有人等着，我提出告辞，而老范一再挽留，还说他们尽是浮在上面，多是个人的事情，你谈的对国家有用，对我们办报的人有用，我愿意听一听来自一线的东西，你不要急，慢慢谈，不要管他们。

范总的话，使人听了有点激动。在我再三提出后，他同意让我走，并且要我一定为新闻战线写点东西。从报社出来，一路上头脑有点发烫，心情平静不下来。想起报社的人还在老范办公室门外排队等着，他让秘书郑剑挡着。范总是一个正部级干部，他用一个小时与一个外单位的记者交谈，这是大文人风度，醉心于官场的人是不会用这么长时间与下面记者谈基层情况的。

他作为长者，对我多鼓励，这是老一辈对我们的要求，但我没有理由飘飘然。《人民日报》很多老记者调查研究是很有功夫的，我是学习他们的作风走过来的。老范本身就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他被打成右派后，在下面待了20多年，什么苦也吃了，什么情况也了解，他才是深入哩，不深入怎么能认得准“开头与过头”呢？我应当向老范学习，把他对我的勉励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

四、夙愿未偿

我和范敬宜最后一次见面，是2005年7月19日，是因为《农村八记》而见面的。当面聆听范敬宜的教诲，清楚地了解他曾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的愿望。

老范到清华大学当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后，很重视学生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他把学生李强写的农村调查直接寄给温家宝总理，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重视。6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突出位置，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这封回信，并分8个部分选登了李强的农村调查报告，这件事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反响很大。我写了一封信给老范，认为这件事值得好好抓一下，在新闻界推一推，并就新闻教育的办学方向提出我的看法。老范很重视，主动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北京去与他聊一聊。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下着大雨。我与胡颖一起到茶馆，老范一会儿便到了，他是步行过来的，在万寿路部长院附近的一个茶馆见面。在交谈中了解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首先声明不吃饭，只喝茶。于是我要个500元一壶的明前茶，老范说：“李锦，你个老土，北京的高价茶多是包装好，里面是一个样的，就是这个”，他点了壶50元的，胡颖劝说，就听老范的。

温总理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宜同志，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强《乡村八记》早已收到，迟复为歉。《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我看过这篇调查报告，因为它出自一个心灵纯洁的学生之手，反映的农村情况是朴素、客观而真实的。但它肯定不会有政研室、研究中心之类的官方机构做的调查系统、周密。是什么东西最有可能打动温总理呢？是这篇调查报告透露出来的这位同学的社会责任心和对农民的同感情心。

我在7月6日写信给老范，强调的是在新闻教育中建立社会主义调查研究体系问题。老范告诉我，你写的这封信已经转给刘云山看过了。在我们喝茶期间，他又当面给刘云山部长打了电话，说起这个典型，把我的意见又讲了讲。刘部长态度很好，说是与你熟悉，农村改革初期你是很有名的。刘部长非常重视新闻宣传的调查研究问题。

然后我们专门就新闻宣传的调查研究问题讲了很久。老实说，对于当代新闻教育，我是不投赞成票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言必称美国，过于强调传播技术，而忽视了对中国民情、国情的研究，忽视了对唯物论反映论的研究，我认为这容易弄错方向，包括对清华大学的新闻教育，我也毫不留情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清华大学应该培养“国”字号的记者，就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包括中央电视台搞深度报道的记者，重点是记者，而不是编辑。这种记者应该有大气魄大责任，很强的研究能力，是属于智囊型记者。首先是会调研，有底气，要“知情”，就是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即“三情”。还有“三心”，这便是良心、同情心、责任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我认为中国新闻界最有活力的是1978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可惜后来这一批人或则年老，或则当官，不能深入基层了。尤其是这一阶段的经验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提升，没有

上升到规律层次确认下来。现在当旺的更多的是1982年后参加工作的，他们没有那一段经历，认识总不够深切，也不到位。再后来从国外回来的博士，一下子钻进方法论、技巧论里去了，对唯物论、反映论不够重视。我们急需建立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研究理论体系，与新闻发现学的理论体系，老范深表赞同，忧戚之心，溢于言表。

范敬宜曾被下放农村20年，在报社又分管农村工作多年，对农业、农村的今昔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同时，他对党的新闻事业又十分执着，对新闻人才总是爱护和鼓励有加。他在《满江红·赠人》一词中写道：“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这种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与茹苦如饴的精神境界在他后来执教清华时，成了一种教育理念，就是加强实践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我在此基础上强调建立清华大学的中国特色理论教育体系，清华大学千万不能成为美国新闻教育在中国的代理。谈话时，我滔滔不绝，而老范也不断插话。

在谈话间，他突然眼睛久久地盯着我看，我刚停下来，他提出“这个任务应该由你来承担”。然后，他端起茶杯抿一口。停一停说，北京有才气的人很多，将来会更多，但是像你这样执着地坚持调查研究的极难找，你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根扎得深，成就非常突出，大家会服气的，理论上又立得起来，在新闻界确实不好找。他直接问，你是否可以到清华大学当教授，只是现在常务副院长的位置还没有空下来，要等一下，没问题的。你来专门研究这个事，我相信你是能办成大事的。再说，你也适应不了官场上那些东西。我听了，感受老范对我的重望，然而我表示出犹豫，我在基层研究国情是我的定位，对策研究是我所长，人过50岁再朝上走，不接地气，便做不出什么了。就像安泰不能离开大地，离开母亲，我不能离开基层，恐怕一辈子便这样了。何况我非科班出身，连汉语也说不好，更遑论英语、法语了。老范打断说，这个不要紧，不是主要的。他说清华大学还要聘他担任一届院长，“你如果去清华大学，在我任内可望一起来实现这个愿望”。老范默默地听着我的解释，看我决心已定，也没有再多说什么，眼中流出些许的失望。他叹气说，恐怕这件事再也无人做了。

我们在茶馆里坐两个小时，外面雨噼噼啪啪地响着，而这屋内只有老范、胡颖兄与我，非常安静。我又啦起孔夫子68岁不再周游列国，赞《周易》，作《春秋》，定心办教育，从此有了《论语》。老范谈笑风生，说不尽的话。我们都是农村改革新闻宣传的过来人，有一种心灵的默契。谈论的话题中心更多的是新闻调查研究的教育理论体系和新闻发现学，决没有个人、家庭与单位的琐事。老范说这个体系建立不起来，是此生的一大憾事。望着窗外的雨，使人想起杜甫的诗：“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

雨尽了，老范驾着自行车，披着雨衣回家去了。他坚持不再吃饭，说茶喝了，话说了，心也到了。他七十四岁高龄仍心系国家新闻教育的未来，关心未来的新闻人，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望着他在雨中独去的身影，想他“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的情怀，眼角有点发湿。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老范走了，我心中很是伤感，曾经关心和帮助自己的人一个接一个走了。而党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也没有人像穆青、范敬宜那样去讲了。其实“农村八记”是老范办学的方向。这便是重视对国情的研究，培养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的记者，而不是技巧型的操作者。然而，老范一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调查的理论体系的夙愿终未能成就，老范死亦有憾。

现在，老范走了，想起这件事，我心中涌起崇敬，更有愧疚不时袭上心来。“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我要与老范说，这个理论体系迟早会建立起来的，您的夙愿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第四节 家是永远的

家是永远的港湾，早年每年300天以上出差记录，让我常年在奔波，没有家人的亲情温暖和支持，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然而，总是离多聚少，难得陪伴他们，报答他们，是我一生的愧疚。而我半生充满大波澜，使亲人们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想起来，心里总是难受。

一、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与妻子在黄沙河边洗衣服。黄沙河从射阳湖出来，流经兴桥镇，沟通运河与黄海。我是在这河边长大的。

母亲去世三年，对母亲的思念不曾中断过。往事无穷无尽，聚拢来又飘散去，对母亲的依恋和缅想随着岁月则更加深刻，特别是母亲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到西藏了吗”，总像一块重铁，沉沉地压在心上。

我当时还在西藏工作，母亲梦中想着远在西藏的儿子，气未咽，而魂灵已追到西藏寻找儿子去了。这句话犹如一块巨石，惊起心底一潭水。母亲一辈子，经历数不清的大灾大难大悲大痛，说不尽的苦辣辛酸、恩恩怨怨，而她竟都没有说，至死也放不下的是对儿子的思念。

母亲咽气是夜里9点10分，我们弟妹六个都在身边。当夜，我跪在母亲遗体前，一直跪到天亮。坚硬的花岗石地板，冰冷冰冷，跪得膝盖很疼，一会儿就变麻木了。表舅把我拉起来，我又跪下。我坚忍着，母亲要永远地走了，陪伴每一分钟都显得弥足珍贵。外面飘着雪，风在呼号，寒气硬硬的，冷透棉衣，想起母亲在寒苦中大半生，想起母亲对我含辛茹苦的哺育，泪不禁又流下来。

母亲出生在苏北建湖县湖垛镇南一个三代私塾教师之家，祖上来自四川眉山堂。外祖父沉疴在身，她还只有十五岁便代父教书。十八岁出嫁，第三年外祖父便去世了，第六年外祖母也追随而去。当时，舅父和几个姨母都没成家，老姨娘才七岁，出嫁的母亲时刻惦记着在故乡的四个年幼弟妹。母亲生育八次，健在的六个儿女和四个弟妹，决定了母亲生命的旅途布满了担忧与思念。

外祖父是私塾教师，旧思想很重，不肯让女儿读书。母亲名字叫苏慧，是聪慧好学的人，她虽没有上过学堂，可是能把《三字经》、《百家姓》和《论语》都背下来。到了六十岁，还能把王勃的《滕王阁序》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过去读书都大声朗读，她是背着妹妹躲在学堂门外墙边，跟人家背诵。没有想到在外祖父病重时，是十五岁的大女儿上课堂替父教书。母亲是双眼皮，眼光平静祥和，面相周正，鼻梁挺拔，眉宇间开阔。曾祖父为孙子即我父亲选媳妇时，请算命先生相面，说我母亲是一脸善相，性格温柔，和顺，贤慧，会持家，相夫教子，能光耀门庭。于是便经媒妁之言选定母亲当孙媳妇。母亲家族的读书重教，特别是两个姨母对文学的偏好，对我少年时期成长是影响巨大的。

我生下来便给母亲带来不幸，躺在母亲怀里整整十三天没睁开眼，使母亲焦虑不安。这是母亲临终前告诉我的。小时的事我多记不清，刻骨铭心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日子，我在《盐阜家谱》一书前面饥饿章节里叙述的都是母亲领着我们与饥饿搏斗的真实往事。

我的祖上对读书人最为看重，祖父母从来不知道孙子叫什么名字，三岁时，他们便直呼我“大学生”，直到辞世。母亲深得家传，也把读书看得高于一切。亲戚来射阳逃荒，要饭时能吃到米饭团。我要跟去，母亲非常吃惊地盯着我看，举起手来又放下去，然后便自己哭起来。母亲抱着我说：“饿死也不能讨饭，只有读书才有出息。”母亲刹那间震惊的表情，是我未见过的，母亲一次也没打过孩子，指头也没戳过，而她扬起的手，给我印象太深。许多年过去了，母亲震惊后扬手的神情就像浮雕感极强的油画深深地刻在我心里，想起来仍感到心的惊栗。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为了让母亲不伤心，就要下死劲读书，饿不死就要读书，这

是穷人家孩子唯一的出路。我是从八岁开始写日记的，有一天写道：“小学读五十，中学读三百，读尽天下书，要做出息人。”能看出小小年纪被苦难逼出的雄心。乡下书少，我多借着看。高缨的小说《山高水远》十七万字，我竟全抄下来了。我记得吃过早饭上学时，母亲总是胃疼，躺在床上。其实，母亲是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在挣扎着。在教室里听课，我想起母亲胃疼时呻吟的样子，读书就格外地专心。每次考试都得一百分，母亲脸上总是浮起微微的笑，这是在那苦难岁月里从母亲脸上偶尔见到的高兴。

十八岁那年，我参军了。正是珍宝岛边境战事不久，气氛紧张。然而“文革”期间当兵毕竟是令人羡慕的事。我是头男长子，艰难岁月里与母亲相依为命，这时个子已蹿起来了，能干重活了，父母舍不得让我走，而祖父母想让我赶快娶妻生子，学手艺撑起门面。然而，不能读书也不能就业的刺痛，深深刺激了我。

几经周折，我终于当兵走了。那时，五个弟妹都在上学，可他们交不起学费。在家里，总是我领着弟妹几个到黄沙河北的荒滩上抹树叶，晒干了卖给公家造纸，学费靠自己挣。可是，人再穷也不能不读书，我只能节省着使用肥皂与牙膏，写信也是在纸正面写完再在反面写，密密麻麻的，努力节省每一分钱。当兵第一年，每月津贴只有六元钱，部队共发了七十二元钱，我给弟妹们寄回五十五元钱，帮他们交上学费。可是父亲一遍一遍写信来，说家里不缺钱，你妈妈就让你多读书，听上级的话，求学上进。

我日日思念在贫困中挣扎的父母亲，可是当兵四年却没有回过家。当时有的老乡提干了，而我仍是老兵。我才二十出头，写的六千字的长篇散文诗已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拍摄的照片为新华社多次采用，在工程兵部队也算是个小名人了。可是我只知道没命地读书，不善与领导接近。从1973年起在济南泉城书店斜对面往西的一个巷子里，有个旧书铺开放了，可以用部队介绍信买“文革”前出的旧书。我就是在这里买到《精校四书补注备旨》、《悲惨世界》、《李白杜甫比较之研究》、《中印战争》、《赫鲁晓夫回忆录》等。我最多一次就买了四十一元钱的书，这是五个月的薪金。

在大城市长大的妻子就是在那时了解我这个农村穷战士的，然而她不知道我曾为读书偷过馒头。没钱买书时，便一天吃一顿饭，到食堂能领回三毛钱。吃饭后乘人不便偷偷地抓两个馒头塞在裤子口袋里，留着当晚饭和隔日的早饭。从十九岁到二十三岁，是我读书最疯狂的日子，也是知识疯长的时光。宣传处老干事郑克礼常说，这个小孩读书太苦了。后来，董文秀处长知道我因为无钱回老家探亲的事，开了一个特殊的党支部会，救济我二十元钱，怕我拿这个钱再买书，处长便派人直接买好去徐州的车票，把我送上车才告诉我这是党组织的救济金。

见到母亲的时候，是一个夜晚。经过途中二十个小时的颠簸，当我扒着门缝喊一声妈妈时，妈妈惊喜得把手中萝筛掉在地上，颤抖得连门栓也拉不开。在煤油灯豆粒大的火苗下，看到母亲膝头上大大的补丁，就像渔船上的要饭花子。而我离家时脱下的那身黄衣服已被染成蓝色又被染成黑色，经三弟、四弟穿过，现在穿在小弟弟身上，也是补丁叠着补丁。人说“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是老三”，而我的一身衣服，穿了弟兄四人。我知道，父母亲与弟妹们仍苦熬在贫寒中。

在这以后，又是五年没有见到母亲。祖父、祖母、伯父与堂姐相继去世，父母都没有告诉我，他们怕我分心。在这期间，我提了干，由连队、团、军到军区，又当上新华社记者，娶了媳妇，直至当上共青团十一届中央委员。这期间中国农村改革狂飚正起，风险甚大，也遇到不少艰难困苦，可我一想起苦难中的父母亲，就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回到身上来，心里想着为像父母亲一样的天下苦难人活着，为的是让妈妈不再叹气。历史总要朝

前走，要让千千万万个母亲脱离苦难的煎熬，我们这代人恐怕要在风险与艰难中度过。

改革开放的春风改变了我们弟妹的命运。我逐渐理解到母亲所承受的痛苦，不是她一个人的痛苦，而是那个时代的痛苦。我后来写《大转折的瞬间》一书，讲到毛泽东后期的错误思想时，母亲以央求似的眼光说：不能说毛主席坏话呀！国家这么大，他有难处呀。这就是我母亲的胸怀，自己吃了苦，受了罪，却一点不埋怨别人。后来母亲回兴桥村时，见到过去整过父亲的人家，总是很远便笑脸打招呼，停下来拉家常。父亲是刚性如火的人，宁折不弯，看到母亲见仇人像亲人似的，自己脸色青青的，常气得在前头大步快走。母亲说，冤仇宜解不宜结，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能让儿孙们再记仇。过了些年，弟妹们当上县里的部长、主任、局长和经理，包括那些有怨恨在内的乡亲见到母亲总是远远地伸出大姆指，夸她是“福奶奶”，村里人说母亲以自己的委屈宽容了别人，“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母亲最盼望的是儿子回家。我在上世纪90年代后，常带着妻儿赶回家过春节。路上很累，但为的是与父母团聚。而父母为了我们，则更累了。进了腊月门，母亲就开始忙年了，擦窗子、晒被子、蒸包子、包粽子、做肉丸……我回来了，一大家二十多口都来了，吃了一桌又一桌，做饭、刷碗、洗衣、扫地，母亲背负着还不完的儿孙债，在命运的羊肠小路上，默默地走着无尽的长途。有一年春节，为腌制我一家爱吃的鱼，一气腌了十多条大鱼。大冷的天，脱掉棉袄擦香料和盐，自己身上直冒热气。结果母亲累病了，躺倒了，挂起吊瓶，可是母亲还是乐呵呵的。临走时，小妹妹说：“大哥回来几天了，还没和妈妈说一句话呢？”我走到母亲眼前，弟妹们围绕着，母亲受不住别人围着她，赶快说一句“明年还回家过年。”

当我四十四岁去西藏时，母亲已明显地老了，白发已爬上耳边，身体显得憔悴。从合德街北走到街南，要歇好几次。母亲听说西藏氧气少，走路像哮喘一样，光喘粗气，到处是冰天雪地，零下四十多度，走路能冻死人。母亲暗地又叹开了气。夜深人静的时候，人都走了，母亲说：“吃苦的事怎么尽是你去哩。”她顿了一下又说，“上级看得起你呀”，“国家培养这么多年，还是去吧”。“不能逞强了，要爱惜身子，早点回来，我们都是七十岁的人了”。父母执意从老家把我送到南京，一直送到车站站台上。列车开动时，我与妻儿站在车窗旁。母亲招手喊着“早家来呀”。母亲的腿跌断过，拖着疲惫的身子，行走很吃力。年迈的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追赶已起动的列车，小步跑着，母亲跑不动，眼光远远地追着车窗，举着的手不时抹着眼泪。我的眼酸了，泪水模糊了眼眶，心里也感受到一阵发酸。

我到西藏，当月，父母就订了一份西藏日报。开始在家门口钉了一个报箱，后来常站到门口张望，接着由父亲到邮局去拿。有时父母吃过早饭，就搀扶着上街去取报，回到家，父亲把《西藏日报》从头到尾看一遍。遇上我写的文章，父母都抢着看。父亲喜欢大声朗读，母亲则安详地坐着听，然后自己再看一遍，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后来，我找不到在西藏的采用稿时，总能在父母那里找到。父母除了看《西藏日报》，便是看电视，一看到有“西藏”两个字。就抢着拿遥控器把声音调大，没有新闻便看天气预报，母亲就是想听到“西藏”两个字。按说，当社长了就不再自己写稿了，可到西藏的第一个春节，我自己动手写了十三篇现场特写，这些稿子多为《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和《西藏日报》采用。像“藏家看肉”、“康巴盛会”、“西藏新年唱新歌”、“哈达献给邓小平”、“拉萨盛行红气球”、“开耕大典”，写的是具体的事，有些段落母亲能背下来。我知道，母亲在想念儿子，在惦记西藏，儿子能把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倾泄在报纸上，让祖国人民了解西藏，让母亲了解儿子，这是做儿子的最幸福不过的事。我在拉萨想起父母，便出去写一篇稿子，第二天父母便能从报纸上找到我的名字，知道儿子在干什么。这时候，我写稿子就是

为了给父母亲看的。我知道年届古稀的母亲已经苍老，如同风中的残烛，与同样苍老的父亲相依为命。他们唯一的企盼是儿子的归来，他们在企盼中晃动着生命最后的光辉。

母亲过了七十一岁生日，癌细胞扩散，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几乎所有亲戚都来为她祝寿，而她默默无语，一桌子的菜，一筷子也不动。面对亲人的祝寿，只是苦苦地笑着。侄女李想还小，不懂事，竟然唱了“思儿歌”，母亲顿时泪如倾盆大雨，一下子倒出来，流个不停，姨母们知道她是在想念远在西藏高原的儿子，不吭声，都陪她掉泪。

听到母亲病危的消息，我乘到北京开会的机会赶回射阳，赶到医院。这时，母亲昏睡不醒。当姨母叫醒扶她坐起来时，她看到儿子突然出现在身边，那干枯无神的眼光从头到脚抚着我，母亲转脸对弟弟埋怨说：“你们哪个叫大哥家来的呀，他肩上担子重呀！”说完母亲又倒下去，很快昏睡过去。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为儿女吃了一辈子苦，毫无怨言，总怕为自己耽误了儿子的工作。心中只有儿女，自己生命早已置之度外，这就是我的母亲。

1999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母亲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熄灭了生命之灯。她后来已经神智不清，连家中人也不认识了，可在昏迷中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到西藏了吗”？她是带着对儿子的担心，是在极大的精神苦难中离开人世的。母亲晚年最大的痛苦，是我给她的。

母亲走了，数百人来送行，里面不少是得过母亲帮助过的人。兴桥的很多邻居都赶来了，亲戚从上海、无锡与南京赶来了。母亲是普通的妇女，却受到那么多人发自内心的敬重。人都说，像我母亲这样吃苦耐劳、谦和俭朴、厚道仁慈的人再也找不到了。我心里说，像母亲这样疼我的人再也没有了。

二、我的父亲

父亲病了，我急急地往回赶。树不管多高，哪怕枝丫长在云端里，命脉也是通过根上传来的，谁能忘记生养自己的父母哩。

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便成了我们弟妹们的心病。母亲在世时，父亲虽不致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人，却是做饭洗衣都不会的，一辈子要人服侍。母亲在世，什么事都是母亲担待着，母亲像一条河流，柔软如水，使父亲更显得雄伟刚直，奇崛无比。自从母亲走了，父亲落单了。一座失去河流的高山，显得多么孤僻，多么荒寂。

我是长子，按习惯父亲应该跟我过日子。我一想起父亲孤身的种种艰难，心中就涌起愧疚。可是父亲决不肯到北方来，嫌干燥，喘不过气来，也不肯住楼房，他的心脏病负重太甚，见到楼梯的台阶就心慌，房颤就要发作。他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席”，人老了，说走就走，再不想出门了。在弟妹们家轮流住总不习惯，想自己单独住。现在父亲住院了，80岁的人了，心脏病说发就发，吉凶难测，想起来心总是沉沉的。

这些年，父亲一会儿在这家，一会儿到那家。小弟到无锡去了，在家的两个弟弟都是单位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县里招商引资任务压得很重，四弟是县招商局长。他们有大半年出差在外，家里只有儿媳一个人，父亲不愿在家里住。两个妹妹都邀父亲去住，父亲总是说女儿是人家的人，不能叫人说闲话。

父亲性情好强，遇事容易着急。我在病房与父亲一句一顿地解释着，人的血管和自来水管一样，用久了，水的杂质就粘在水管壁上，形成水垢，水管本身氧化也有锈斑，管道就变窄了，严重了就堵塞。这样心肌的血流量就会减少，得不到足够的血氧供应，心脏就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一定不能着急，一急了，血管就堵塞或者爆裂。人的心脏就像机器一样，用久了，生锈了，可是零件没办法换了，只能慢慢的用，不能发动太快，一快了就出事。天塌下来也不要着急，有人顶着。我们知道他做不到，他这个机器是快惯了的，停不下来。可我们只能这样提醒他。

父亲在挂着水，听着我的说话，默默无语。

我在离家时是家境陷入低谷的时候。从1963年至1967年，日子好过了几年。而文化革命一开始，便又进入了困难时期，虽不至于像三年饥荒那样靠吃胡萝卜缨子和野菜维持生命，但除了能吃饱饭以外，别的什么都谈不上了。

父亲说着说着便说起1967年被兴桥街上造反派整的事，说起他被人家打成“叛徒”的事。我不愿提起，这又要戳父亲的伤疤了。父亲一辈子有很多光荣的事值得去说，而偏偏总记着这一段暗淡的日子。说到这里时，那一阵乌云便急速地涌过来。云涌风卷，一会儿便黑呼呼一片，暴风雨哗哗的覆盖下来。

我们实在不愿提起那段历史，四十多年都过去了，谁还提它做什么。而父亲不是这样看，他总因为自己使儿女受了很多苦，受了很多难而心怀愧疚。因为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我们弟妹们安排得都不好。第一场打击是我上高中，兴桥街上推荐24个学生上高中，却没有我，这件事是一种试金石，显得父亲在兴桥是不行了。你李某人一辈子风风火火，你的儿子就是上不去高中，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从那以后，弟妹6个打工、下乡、参军，关关节节，没有一个容易的，终于相继离开兴桥街。

我问父亲，当时的公社书记、社长，还有兴桥大队干部的儿女们，父亲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谁下岗了，谁又下岗了，谁又提前退休了，几乎没有混得很好的。我与父亲诚恳地说，按当时的条件，他们子女是安排得好的，可是到终了还不是这样。父母的权势是一时的，儿女努力是长久的。我在写文章时曾说过“艰难困苦是一所学校”，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场灾难，使我们弟妹经受经济上“贫”与政治上“贱”所带来的磨难。在这种磨难中，我们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顽强忍受，学会了坚韧不拔，学会了奋斗，学会了独立自主，那连续不绝的灾难使我们形成了能屈能伸的性格。我们弟妹们没有一个是那种沉睡不醒的人，后来的努力更多的是从这种艰难困苦中寻找到的动力。

说到这时，父亲脸上又露出笑容。人家说李家是干部窝，养一窝干部，父亲笑了。可是，那段苦难像是永远挥之不去，他总觉得是没有尽一个为父亲的责任。父亲是1967年夏天被造反派打成“叛徒”的。那一天，兴桥街一下子出了九个“叛徒、特务”。父亲的名字被打上红红的叉。这是兴桥街一个战斗队贴的。使兴桥人震惊的是，造反派抄写的大字报上公布着县委部长杨某人的证明：“李炳文是叛徒”。这个杨某人是兴桥人，过去在盐东县委社会部里干过。问题是他大权在握，是县革委会成员，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证明犹如在滚烫的油锅里放上一把花椒，霎时爆炸起来，使兴桥人没有想到风光这么久的人成了叛徒。兴桥那些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统购统销中被政府处理的亲属站出来了，把父亲的批斗变成对共产党干部的清算。

父亲被带走了。家中像塌了天，母亲唉声叹气。父亲在兴桥剧场睡了草铺，有个当过国民党中央军的人嘲讽说，你是共产党的红人，怎么也进来了？父亲气得无言以对。父亲经受了最黑暗的日子，弟妹们也走进最黑暗的日子。

当时，兴桥了解情况的人对这件事噤若寒蝉。站出来的是一个农村生产队长，他是盐东县委书记胡特庸的警卫员，是兴桥南边一个村庄的。当时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在黄沙河北的农村。胡特庸到华中工委开会，都在我们家吃饭、住宿。他到兴桥角头街上看到大字报，说了声：“李某人不是叛徒，是地下工作者，我能作证。”这时造反派追着他，要揍他，他边跑边喊：“我了解，他家是盐东县委地下交通站。”

接着，站出来一个彭辉，他是20年前押着父亲到区里去的当事人，他说：“李某人不是叛徒，社会部安排他到上冈去做地下工作的。我能作证。不信，你们去问刘守煦。”他是兴桥工总司的组织部长，此句话自然是起作用的。刘守煦是公社革委副主任。于是，父亲半个月“叛徒”生活结束了，被放回来了。

表弟还说起一件事，这个姓杨的不敢在兴桥街上走，他怕见到彭辉。彭辉参加工作很早，党籍就是那一段他在社会部时卡掉的，他一说起姓杨的来，就恨得把牙齿咬得格崩崩的响。见到他到街上走，就骂“X养的”，吓得他不敢与彭辉对面。对这个姓杨的，我了解不多，但是知道康生在社会部时是整人很凶的。这个姓杨的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反正他是有这个条件的。他很少到兴桥街上来，大概他退休了，没权了，自己也不敢面对过去。

我心里觉得这个人对干部是不负责的，晚年凄凉些。而父亲则神情很淡地说，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过去也就过去了。那种口气，似没有一丝怨艾与瞥恨，宽恕了。

我盯着父亲看，默默无语。我记起15年前的事，小弟当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时曾代表县委去姓杨的家里慰问过，说起“我父亲是李某某”时，这个姓杨的脸色很难看。他在出过证明后曾问过刘守煦“李某人是不是判徒”时，刘讲了实情，这时杨某人不再吭声了。现在他退休了，也没有人再找他写什么证明了，他无法面对过去，自然有心里难过的地方。

生活如戏，起起伏伏，是非功过，辗转相因，威怨纠缠，相煎不已，那昏暗风潮的形成，有历史暗中隐伏的根系。那场灾难，也不能怪一个人。

三、我的妻子

1981年，我结婚了。新婚的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就带着妻子一起下乡采访了。

妻子李海萍，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在军营长大，跟我是一起当兵时认识的。那时我俩同在工程兵济南军区政治部，因为我总是下乡，平时难得见上一次面。礼堂近在咫尺，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却没有进去过一次。老处长看到我整天关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看书写稿，担心累坏了身体，于是趁一次礼堂放电影的机会，向几位女兵下了一通命令：不把李锦拽出来看电影，就不许你们进礼堂。她和同伴们像接受战斗任务似的，推开了我的房门，眼前的情景让她们惊呆了：四周墙壁上，贴满了报纸，屋中间九根绳索纵横交叉，挂着一张张粘着各种报刊剪贴的“纸墙”，好似一道道与外界空间隔绝的屏障。我就沉浸在这片纸墙构筑的迷宫里，像文王演《周易》一样研究国家形势，研究学问。从此她开始关注我这个来自农村、嗜书如命的“怪人”。

1981年1月26日下午，我从在平回到济南，晚上乘晾胶卷的功夫，打扫那积满灰尘的屋子，去岳父家取来为我们准备的被褥和待客的糖果，婚礼的全部准备工作就这样简单而迅速地完成了。单位党支部开了一个会，便算结婚仪式。因为我刚刚接到总社关于农民过春节的报道任务，于是决定和爱人做一次特殊的结婚旅行——一起到商河县农村采访。

27日凌晨6点，我们坐上长途车，过了黄河，来到商河县招待所，整个旅馆里只有我们一对旅客。厨师都回家过年了，妻子就把伙房大师傅的围裙一扎，上灶自己动手做起饭来。

那次采访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一次采访中，夫妻两人来到一个卖鞭炮的集市上，鞭炮集市上有一千多人，我想拍全景，附近没有制高点，也没有梯子，就爬上满载的拖拉机，却滑了下来。这时妻子手扶着拖拉机，把身子一蹲，腿成八步形，指了指自己肩膀，对我说：“上来！”我一脚踏在拖拉机轮子上，一脚支在妻子肩上。看着女解放军肩上站着照相的记者，卖鞭炮的更来劲了，大喊“放啊！”顿时四下里，噼噼啪啪，都冲着镜头爆着火花。下来后，妻子兴奋地说：“谁结婚也没这么多人来放鞭炮。”

1981年冬，我开始骑自行车串村采访时，刚怀孕的妻子正患感冒，可她执意要送行。冒着北风，骑着自行车，穿过济南城，行了二十多里，一直把我送到洛口的黄河渡船上。结婚这一年，我下乡315天，搞了不少在全国有影响的新闻。

三十岁时，有了女儿。妻子提议：“就叫李棉吧。”她说，三中全会后，你的照片和文章先后十多次在新华社和国家获得新闻奖，都是采访棉区。像《棉花姑娘的喜悦》、《银铺鲁西北棉农笑开颜》、《棉花县长散传单》、《八旬棉农中状元》……都少不了一个“棉”字，给女儿取名“棉”，一是为纪念你而立之年的成就，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像棉花一样铺天盖地而又默默无闻的普通乡亲们。

“这个时代我们是要吃苦一辈子了，更艰难的路在后头，我自作自受，心中无怨，就是对不起你和孩子……”，在寄给妻子的信中，我曾这样动情地写道。自己选择的这条新闻记者的道路，是一条终身都不平坦的、荆棘遍布的道路，在一门心思为国家调查研究的同时，不免会忽略家庭。对此，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愧疚。

因为要用更多的时间到老百姓中做调查研究，研究国情，我常年在外，已经过惯把家当作客店的生活。刚结婚，每年出差300天，妻子习惯了；后来每到农历廿九便下农村，

妻子也习惯了，乃至我在农村调研与报道中过了23个春节；再后来，我在一个村或一个企业住50天，蹲点调研，连续8年下来，妻子也习惯了。妻子像孟姜女寻夫一样把衣服与书物送到我调研的村庄。妻子已经习惯了这种长期分离的习惯。不习惯也没办法。难得的是，她对我这种为国调研而舍家的做法，从没抱怨过一句。

44岁那年，到了西藏，一去就是四年。遇到危险的时候，我想起了妻子。唱起“真的好想你”。我自小没有唱过歌，不知自己嗓门吐出的是什么声音，会有多么难听。在西藏，我学会了两首歌，一首是“说句心里话”，一首便是“真的好想你”。最初是孔繁森唱，后来援藏干部几乎都唱了，我看到过从山东来的王书坚、赵文朝、李吉乾、姜必欣、时文进与吴承丙他们都唱过，这些县委书记都是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可是唱起来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我采访时也跟着一起哼，慢慢地也就学会了。听到这首歌，鼻子就有些发酸，眼睛发潮，心里就生出莫名其妙的情绪，闷闷的，胀胀的。谁没有家，谁没有白发亲娘，谁没有妻子儿女，可只有在西藏时才会唱得掉泪。1997年12月西藏发生百年不遇的大雪灾，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报道出了难题，灾情怎样，人员伤亡多少，情况上不来，我决定亲自带队调研。这一次面临生命危险的出发，我独自唱起这首歌。因为第二天凌晨便去藏北唐古拉山一带，那里海拔在五千米左右，已经连续降雪四十多场，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四十一度，严重缺氧与高寒致人当场死亡或终身残废。夜晚，把拉萨的房子收拾干净，并把相关的事拜托朋友马书平。说如果出了事，自己在西藏买的两千多本书就留给他看了，火葬后请把自己的骨灰带回射阳老家。我不敢告诉父母，在电话中给妻子唱了一首歌，先唱“说句心里话”，因为声音太高，缺氧，喘不过气，唱不上去，又唱“真的好想你”。一边唱，一边喘粗气，停一下，再唱。敏感的妻子流泪了，问是不是遇到危险了。我说，天亮便去灾区，有点危险，要有思想准备。过年了，你要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妻子哭泣着答应了。

妻子不仅关心着我，关心父母，还关心我从西藏送来的两个孩子措姆、德吉。她们在济南读书，节假日孩子都要到我家来。海萍总是做一桌子菜让孩子们吃。孩子有病了便到家里来住，两个孩子在作文中写道：“我们有个汉族妈妈。”

其实这种事对豪爽而深明大义的妻子来说算不了啥，最让我担心的是，在我工作上遇到重压甚至打压的时候，海萍同样承受了很多的煎熬，还反过来安慰我，鼓励我。

我这一辈子风风火火，总想为国家做点事，在外面很风光，也经历很多风险。妻子不仅承受着劳累之苦，还承受着政治上的忧患。2002年5月，我研究马克思主义阶段划分成果的书出版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赞之者有之，毁之者有之。面对少数人的批判和“上纲上线”，我常夜间难寐，辗转反侧。妻子从不唱高调，更不会像我这样总是慷慨激昂、充满激情，她只是平和地说你干你愿意干的，穆青讲历史是人民做结论的，不要害怕。我有工作，能养活家。于是我走进一些大学、企业做报告，不断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创新，提出创新的突破点。在山东师范大学为200余名政治学研究生作演讲时，学生们一再鼓掌，我坐不下来，便站着进行。

有学生站起来问我：老师，是否害怕坐牢和杀头。

我说：我已经活了49年，即使现在死了也不算夭折了。哪怕是坐牢去，出来我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寻找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真理。

一位女研究生问了一个令人莞尔的问题：您难道不怕师母与您离婚吗？

我指着台下一侧说，这便是你们的师母，由她回答。

坐在前排一侧的妻子李海萍站起来，平静地回答道，“如果是这样，我今天就不会来了。”台下掌声雷动。

面对妻子的坚定支持，我内心涌起一股热浪。我语气坚定而又有几分悲怆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受的灾难太深重，老百姓太苦了，最缺少的是什么？是新思想的引领。任何一个新思想的提出都是一位思想英雄的碑记，是以思想者殉葬为基础的”。“我讲的社会主义理论肯定是国家最需要的，是中国特色的，有些会在十六大上被接受，有些会在党的十八、十九大上被接受。我的发现会为自己带来痛苦乃至灾难，不是我不知道，而是这么大的民族，需要人讲，需要人做出牺牲。我顶多是坐牢，进去也许出不来了。只是希望你们能记着，能与自己的儿孙说，很多话在二十年前已经有一个叫李锦的人说过，你们曾经听到过。”我说得很动容，惹得台下的研究生也纷纷落泪。后来，我年近六十，又一个人到北京闯，开辟另一天地，夫妻分离，家中自然全扔给妻子了。

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当我写下那些极具风险的词句时，已想到了丢官乃至坐牢，我也想到了年迈的父亲和深明大义的妻子。幸运的是，妻子一直忠于职守，勤奋努力，谨慎做事，官至正厅，为我免除养家糊口之忧，使我在风浪中勇敢直行而少瞻前顾后之态。

附录 李锦调研年表

1968年11月，到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公社诚民大队插队。

1970年12月参军，到济南军区工程兵舟桥团技术连当饲养员。

1971年，当饲养员期间写评论34篇，因《路线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被《前卫报》刊用，4月被调到团报道组，此后便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翌年，被调入济南军区工程兵宣传处。

1972年5月至8月，住在沂蒙山区费县韩家庄调查采访长达三个月，在《解放军画报》发表《劈山开路先锋连》专题。

1976年10月，调入新华社山东分社任记者。采访山东荣成、莱西、安丘、昌邑、昌乐、青州、肥城、平阴等地农业学大寨情况。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在莒县、莒南、费县、掖县、临朐等地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农村集市情况，多次实现国内“第一次”报道。

1979年，全年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与政策落实情况。在章丘采摄的《棉花姑娘的喜悦》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采用，被评为新华社一等图片好稿。

1980年，到菏泽、聊城、德州、惠民等鲁西北地区20多个县调查与采访，最早发现并报道“万元户”等现象。因宣传“杨成海承包”，受到责问与调查。

1981年，继续在鲁西北采访一年，驻基层调研达315天。报道的《鲁西北棉花大丰收》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采用；《棉花县长散传单》、《冒尖户王本跃与他的书记朋友》等形成广泛的社会反响。在平县杨庄大队农民写出《庄户人家好记者》的表扬信。

1981年12月，高唐、茌平、齐河、平原、陵县、宁津等县相继写信给党中央与新华社，赞扬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事迹。

1981年12月底，新华社召开摄影工作会，介绍了李锦深入农民中调查研究的事迹，引起强烈反响。社长穆青在会议上说：“李锦同志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为新华社争了光，立了功。群众认为他是党的好记者、农民的好朋友，这是群众给他封的。深入生活，这条路子一定要坚持，不能动摇。”

1982年1月，在陵县调查期间采写通讯《新春佳节夸支部》，为《人民日报》显著位置采用，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

1982年1月7日，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在《中直内部情况》看到高唐县委干部田乃仁写的“千里单骑采访，留下一路新风”的材料，批示给中宣部与新华社：“请考察核实后，看是不是能公开表彰和在你们这一行中作为先进工作者典型介绍。”

1982年4月3日，新华通讯社党组发出《关于表彰和学习李锦同志的决定》。决定指出：“李锦同志坚持无产阶级新闻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鲁西北农村的‘泥屋土炕’，细心体察群众的思想感情，同基层干部和农民广交朋友，事迹生动感人。”

1982年4月，山东省委宣传部发出开展表彰和学习李锦的活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转发新华社党组的文件与介绍李锦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要求在中直机关开展学习李锦的活动。发表《旗帜鲜明地表彰先进 树立新时期的学习榜样》的评论。

1982年3月至10月，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大众日报》、《济南日报》、《青岛日报》、《烟台日报》、《枣庄日报》等报刊发出文件，开展学习李锦活动。

1982年5月，陵县县委发出通知，刊登通讯，开展学习李锦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的活动。

1982年5月11日至5月20日，新华社举办学习李锦的学习班，把分社记者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京学习、座谈。

1982年12月，在骑自行车调研过程中采写了调查《白集农民走进流通渠道贩卖羊肉》，胡耀邦、万里、胡启立等领导批示。

1982年12月31日，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小平听取汇报调查研究情况时称赞李锦“你有发言权”。

1984年10月，被评为中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作“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反映时代变革”的经验介绍，并当选为全国记协理事。截至此时，稿件为《人民日报》采用99篇，当时是全国被《人民日报》采用量居第一位的新闻记者。

1987年4月，参加新华社大别山小分队。组照《贫穷落后，令人不安》为《人民日报》采用。《过程论与记者新思维》一文被评为新华社新闻论文奖。《卖茧难》被评为全国好新闻奖。

1989年，住到沂蒙山区平邑县天宝乡九间棚村调查52天，提出“九间棚精神”，后发展为“沂蒙精神”。九间棚成为了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之后在全国树立的第一个大典型。

1990年3月，发表长篇调查报告《九个党员，九根擎天柱》，宋平写信给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表扬九间棚的党员与干部。姜春云认为李锦“在关键时刻做出了特殊贡献”。

1991年，临沂地委发出决定，在全地区开展学习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作风的活动。

1992年，在青岛双星集团调查42天，写出《开拓市场经济的双星之路》(4篇)调查报告，得到万里、杨尚昆、俞正声等领导人肯定。调查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3年，随同朱镕基、乔石、万里等下乡调研，所写消息均为《人民日报》刊发。

1994年4月至8月，到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调查48天，写出反映民营经济的“兴福现象”调查，得到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批示。同年底组织“兴福现象”研讨会，作主题发言。

1994年9月11日，随同胡锦涛同志考察期间向其汇报“九间棚与沂蒙精神”调查研究情况，胡锦涛勉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条路一定要坚持下去”。

1995年，到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查58天，提出“资本经营”理论，写出资本经营调查一

组，为24家报纸头版头条采用，受到吴邦国、姜春云等领导的批示与肯定。

1996年1月至5月，与杨凤山、董学清组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研组，发表13篇内部调查。新华社总编室对这次调查发出通报表扬。

1996年6月，到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副社长，主持业务工作。

1996年11月，写出甲日乡反分裂问题调查，胡锦涛、陈奎元、热地、郭金龙、张全景等为此调研报告作了批示。

1997年，住到拉萨啤酒厂调研，发表《拉萨啤酒厂转变增长方式调查》。

1997年，与包心鉴、宋振远等人撰写的临沂市整体脱贫调查为《人民日报》采用，并被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1998年，到西藏克西乡调查，写出治藏方略调查一组，得到江泽民、胡锦涛、罗干等肯定，并得到陈奎元、郭金龙、向巴平措、胡春华等好评。

1998年7月至12月，主持揭批美国议员沃尔夫的报道，中央外宣办表扬“西藏经验”。

1998年11月，到俄罗斯调研采访，写出“药比病还坏”等文章。

1999年，参加藏北雪灾报道，发出多篇内参，调查为江泽民、李鹏、姜春云、李贵鲜等领导批示。

1999年2月，新华社发出社长嘉奖令，通报表扬西藏分社在李锦带领下赶赴灾区、顽强拼搏，完成报道任务的事迹。

2000年6月，回到济南，担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

2001年5月，就兖州矿务局生产与运输的困难写出调查，得到朱镕基总理批示，帮助兖州矿务局解决铁路运输的困难。

2002年5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提出马克思三阶段论与新阶层入党论，引起理论界关注。

2002年7月，写出兴福镇农村新阶层入党调查，得到胡锦涛、曾庆红、吴官正批示。中央派工作组到李锦去过的38个村庄一一核实。

2002年8月，新华社总编室发出通报，表扬李锦深入调查、勇于探索的精神。

2003年，到临沂罗庄区花埠圈调查，写出调查报告4篇，得到回良玉、张高丽批示。

2005年，写出《山东农村合作经济调查》一组4篇，宣传莒南供销社经验，得到温家宝、回良玉、白立忱、张高丽重视与批示。莒县农村调查为回良玉批示，博兴国税调查为吴官正批示。

2005年3月，写出东营和谐社会4篇调查，得到张高丽、王乐泉批示。

2008年，帮助中新社办内参，所写38篇调查得到温家宝、李源潮、回良玉、刘延东、孟建柱、马凯、王胜俊、李建国、孙政才和姜异康等领导批示。其中包括莱州三德建设经验、李沧区网上执政能力调查、武城县监督“一把手”调查、沂水生态养猪经验、青岛法院救助受害人制度、泰安打击黑社会经验、齐鲁文化进北京等调查报告。

2008年12月，黄河出版社出版《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与《过年》两本书，都是根据调研日记与新闻照片整理而成的调研实录。

2009年3月，就金融风险万言上书温家宝总理，得到温家宝、李克强、王岐山等领导批示。温家宝总理批示明确要求财政部、发改委、银行、银监会研究。

2008年至2010年，先后21次到新泰市就平安协会调查，参与中国政治学会的调查与研讨组织，调查为《人民日报》、《求是》等采用。同年，当选为山东省政治学会副会长。

2010年4月至12月，到山东临沂调查58天，提出“临沂模式”。

2010年5月，到杭州汽轮机厂调查，提出“大脑国家理论”，调查为张德江副总理批示，这一年在基层调研时间达到305天。

2011年1月，到《中国企业报》任顾问，任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兼首席研究员。

2011年6月14日至7月15日，组织国企报道战役，发表54万字，报道得到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王忠禹等领导批示，得到国资委主任王勇的表扬。

2011年6月，组织的中铁建债务调查为张德江、王忠禹、王勇、盛光祖、肖亚庆等批示，国务院调查组进驻铁道部调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2011年6月30日，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

2012年1月，对实体经济进行调查研究，组织“银行暴利论”的讨论，9月出版《中国实体经济99评》。

2012年5月22日，投入中国建材的混合所有制研究，发表六篇央企市营评论员文章，推动混合所有制研讨活动。

2012年9月，对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进行研究，写出500强分析报告，提出“大企业时代论”。

2012年11月，对国有企业发展道路进行研究，主编《十八大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

2013年5月，对国有企业功能进行研究，提出国企改革必须从分类开始的重要观点。

2013年12月，根据国有企业分层分类和国企红利提高上缴比例等问题的调查，出版《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与焦点》一书。

2013年至2014年，到神华集团、中国建设集团、华能集团、长安汽车、中粮集团、保利集团等中央企业调研并参与理论研讨活动。

以史为镜 可知兴替
以理性思维 可揭示真相

为什么是中国

任志刚◎著

台海出版社

目录

[前言](#)

[中国学人的历史责任](#)

[第一章 世界的真相](#)

[古希腊文明](#)

[考古学不支撑古希腊文明](#)

[关于“文艺复兴”](#)

[中世纪](#)

[黑死病](#)

[那只看不见的手](#)

[世界总是在互动中](#)

[欧洲中心论](#)

[文明的冲突](#)

[天、地、人与上帝](#)

[第二章 中国的底蕴](#)

[中国曾领先世界上千年](#)

[商鞅变法](#)

[“五胡”十六国](#)

[“人和”是中国的根本](#)

[明清两朝](#)

[近代史与世界市场](#)

[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

[买办化](#)

[中国共产党这九十余年](#)

[中国人用血否定了西方式的两党制](#)

[道路](#)

[制度的反思](#)

[维护历史的严肃性](#)

[多种社会形态可能是并行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摆脱资本主义的语境](#)

[第三章 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之前](#)

[新中国前三十年](#)

[中美博弈](#)

[如何看待这三十多年](#)

[未来的几十年](#)

[任重道远](#)

[城镇化](#)

[两个拳头都要硬](#)

[保守也是一种智慧](#)

[货币问题](#)

[经济学是什么](#)

[第四章 政治的先进](#)

[谁统治着美国](#)
[多元社会结构与妥协传统](#)
[制度](#)
[建立多极世界](#)
[告别革命](#)
[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五章 文化的自信](#)
[百年思潮](#)
[逆反与教训](#)
[前人牺牲与后人逐利](#)
[时代呼唤思想家](#)
[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一个也不饶恕](#)
[民族与国家](#)
[教育问题与高考制度](#)
[科技、人才与国家战略](#)
[信仰是强大的力量](#)
[我们的新文化](#)
[第六章 军事的保障](#)
[耕战是中国数千年之根本](#)
[战争是美国的生存方式](#)
[美国必然为美元而战](#)
[最有价值的牺牲](#)
[后发制人与决策顺序](#)
[软实力与武力](#)
[武器和利益支撑层面持久战](#)
[海洋战略与海军建设](#)
[以戈止武](#)
[后记](#)
[寰球同此凉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什么是中国 / 任志刚著.—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68-0614-2

I. ①为... II. 任...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3480号

为什么是中国

著 者:任志刚

责任编辑:王 艳

装帧设计:张子航 版式设计:红 英

责任校对:史小东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156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印 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0614-2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中国学人的历史责任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在总量指标上，中国处于第一位是正常的，不是第一反而是不正常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处于世界前列的位置上曾长达千年以上。但是在1840年的时候，它被来自西方世界的暴力打倒了，跌落了下来。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受到巨大的伤害，差一点亡国灭种。唯一庆幸的是，这种外来伤害引发了中国内部的巨大反思与反弹，从而导致中国发生了十分彻底的革命。革命运动导致中国逆转了坠落的轨迹，重新步入复兴的轨道。

目前的中国正在复兴路上，这一事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计，从现在起，再过三十年或许更短的时间，中国将全方位重归世界强国行列。从1840年算起到2040年，正好是二百年。这二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衰败、逆转和复兴三个阶段，构成了标准的V型反转。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受到多个工业化国家的侵略、掠夺、屠杀和奴役，这伤痛并不遥远，这伤痕依然历历在目。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入侵的十几年就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最悲惨的时期。那个时期，中国大半个山河沦陷，死亡人数数以千万。数亿中国人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中国这美丽的土地变成了尸山血海的地狱。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屈服于日寇的刺刀，经过十几年的奋战，最终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道获得了抗战的巨大胜利。

这胜利来之不易，这是中国百年以来第一次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在与日寇贴身肉搏的拼杀中，我们的民族勇士和中国共产党功不可没。

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渐长大。由于代表了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由于领袖集团的无私与智慧，由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个党吸引了无数中华最优秀的儿女。他们不惧死亡、善于斗争，诞生于绝望之余，奋起于屠杀之后，成长于“围剿”之中，壮大于日寇占领区，因而拥有了最强悍的生命力。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先锋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核心，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逐渐组织起越来越多的民众。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局外人看来，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表现为暴风骤雨般的迅变。但对参与者而言，这巨变其实是漫长的近三十年艰苦奋斗的历程。更令人庆幸的是中国革命不是来自外力的催生，而是源自内力的积攒。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伐骨洗髓，慢慢磨砺自强，实现了脱胎换骨，完成凤凰涅槃式的再生。

然而，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知道这场革命的意义的人甚少，直到新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沉重打击了西方强盗。这些曾经随意欺凌中国的强梁们才知道中国人不再是绵羊和鸭子了，而是重新成为凛然不可侵犯的雄狮。从那时起，世界才意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已经诞生了。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直接感受到西方的歧视和敌意了。然而多数人并没有明确意识

到，西方的态度是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而不断改变着。这和平来之不易，是先辈们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我们一定要记住1840年之后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的苦难历史。事实上西方的某种敌意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的逆转和复兴充满艰辛、苦难和牺牲。

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牺牲，这也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领域中最重大的课题。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文化上，无论是社会组织结构上还是经济上，无论是科技上还是教育上，我们都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与否定。除了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灾难之外，我们自身内部审视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然而所有这些思考和反省，都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而不是泄气和阻挠我们进步的步伐。

中国复兴过程中所有的牺牲都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进步必须的代价。中国共产党人不同于世界上任何政党和组织，就是因为他们革命胜利之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去享受，而是自觉地牺牲。其他的阶层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做出了牺牲，这所有的牺牲都是中华复兴所必须的成本和代价，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知道，整体而言，中国最低迷的时期是积弱之后引发日寇觊觎，日寇入侵使得中国变成了一片焦土的那些年。抗战胜利之后各种矛盾激化又导致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到中共胜利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是一穷二白了。中国的复兴如果是轻而易举水到渠成的事情，还需要动员千万级别的军队殊死拼杀么？中共胜利是中国人用千百万生命做出的选择，这是真实历史。中国人为什么不要蒋介石了？为什么丝毫没有考虑蒋介石是二战胜利国的领袖？就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不能保障中国人都活下去。多数中国人拥护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有饭吃，是为人民谋福利。可严峻的形势是当时中国产的粮食大约只够养活三亿人的，然而中国已经有五亿人，还有两亿人没有饭吃，怎么办？这个世界级别的难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中国百年积弱的后果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其实时至今日依然显性存在着，中国多数人体质不强就是证明。新中国成立最初的三十年，中国人的生活还非常艰困，我们的领袖集团带头节俭，强制性实施“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我们民族也因此扛过来了。历史将记载这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是我们先辈做出的最不可否定的牺牲。要知道在多数人缺少生活必需品的时代，上层人的奢侈就是对底层人民的屠戮，对少数人的放纵就是对多数人的残忍。这道理不难想通吧，这其实只是个立场问题。

随着社会进步和宽容，对中国复兴路也有各种观点。一些在变革中被动牺牲的人们，展示自己的伤痕，也有的抱怨自家的损失，这并不为过，但也并不高尚。这是因为中上阶层从来不认为自己也应该牺牲的缘故，这是一种自私和卑微。事实上，在逆转的过程中，其他阶层做出的牺牲更多。而这所有的牺牲构建了我们复兴的基础，都是值得后人称颂的。如果我们能跳出自己利益的小圈子，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我们民族的进步需要全体人民的付出，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还有些观点，把中国的落后归于自身文化和什么劣根性。其实这是忽略了我们中国挨打的关键，也就是无组织的农耕社会无法抗衡工业化国家的侵略。有的观点甚至埋怨我们没有更早地开放，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我们大失血之后必须闭门疗伤，要知道向世界特别是向西方开放交流是需要自身强壮这样的条件的。

还有一些观点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质疑。说我们自己误判美国的战略，错误地敌视美国，耽误了发展机遇。但是这里需要我们想想：不认前朝旧账是因为中国残病之躯不能负

重，巨大的债务是套住中国的枷锁和铁链，将压迫我们喘不过气来，重负之下中国不可能快速发展。而当年决策“一边倒”是为了保全国土，是我们无力抗争苏联的不得已。真实的历史是，在弱势状态下，新中国能在美苏两霸之间坚持相对独立的立场，上演一出“三国演义”，这是勇气、胆识和顶级智慧。这种勇敢和智慧甚至让后人难以企及。

我们知道，是新中国成立最初三十年的努力和奋斗为我们后来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先人们不但无可指责，而且是站在了我们后辈很难企及的高地。事实是老一辈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们至今和今后依然享受着。

当我们有资格与世界平等交往的时候，中国逐渐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这是一种完全主动的和自主的行为，这才是起死回生般的正确节奏。因为我们通过全民的节衣缩食已经初步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我们普及了科技教育，有了大量的工业化人口储备，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统一的市场。我们几乎具备了一切条件，有了和西方做买卖的资格，我们才开始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于是有了三十年发展的巨变。

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三十年来，中国对外的指导思想是“韬光养晦”。这是因为我们最需要的是创造和抓住战略机遇期，我们需要的是时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低下头颅和身段的原因。

“韬光养晦”，为我们的发展争取到了时间。为此我们引进西方资本，于是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出现了一段后来人们称之为“中美蜜月期”的时光。只是没有过多久，苏联不再对抗美国，前苏共领导人放弃对抗，在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苏联轰然倒塌。西方忙着肢解苏联，忙活着吞食前苏联的遗产，没有顾上中国。于是我们获得了又一个十年。之后“9·11”事件发生了，美国把战略目标转向阿拉伯世界。林林总总、忍辱负重，中国终于获得了保持持续发展的三十年的时间。

六十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长，但是最近的这六十年，我们中国人却是真正熬过来的。六十年彻底的艰苦奋斗，全民族各个阶层付出无数的甚至是后人不可想象的牺牲，十多亿人辛劳的汗水，这些努力终于凝结成一个完成工业化的蜕变。这蜕变彻底逆转了中国社会的行进轨迹，中国终于获得了与世界其他力量抗衡的资本。中国人走通了一条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和民族都没有走通的道路。为了这个目标中国大多数人都是两代人付出两代人辛苦的奉献者。

六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我们走完了英美几百年积累的行程，终于挤上世界工业化的末班车。中国工业化的规模之大和艰苦卓绝，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奇迹。这将是值得我们中国人世代自豪的空前绝后的奇迹。

六十年来，我们与美国人先大打出手后握手言和；我们与苏联先拥抱后翻脸；我们先是学习计划经济后来又引进市场经济；我们先是强化和纯洁意识形态后又全面释放大众对财富的追求。这天翻地覆的激变令人眼花缭乱，这反反复复的变革使人眩晕，但是主线却是从来没有变过的，那就是“复兴”。这一点不仅是这六十年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其民族复兴的主旨就没有变过。

“复兴”才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信念，这信念甚至构建了我们民族的信仰，其最无私的信徒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今天我们可以坦诚相告于世界，是的，我们的目标是“复兴”。我们追求的是中国的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我们中国人付出了无数生命、鲜血、汗水和

眼泪。代价之大不可思议，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世界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相提并论。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单项指标已经或是正在成为世界第一，人们开始热衷以“崛起”这个词来表述中国的未来。然而，由于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强调韬光养晦，造成了一些误会。长期的落后也造成我们的自信尚未恢复。这些误会和自卑会给我们今后的进步带来迟滞。现在指出我们光明的前景不是为了沉溺和享受，而是为了鼓足我们的勇气，来克服我们今后依然会面临的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的全面复兴，意味着世界更加和平，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全，我们的人民更加安居乐业，我们的人口优势更能展开，我们的政治更加清明，我们的思想环境更加宽容、更为自由，我们的文化更加灿烂辉煌，我们的向心力、凝聚力更加强大，我们的经济红利更显著；最终表现为全体中国民众都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在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继续改革。我们需要厘清自己的文化与思想的根本。

当前中国理论界，很多人热衷于谈论政治改革，但是同一个词汇却表述着截然不同的内容。有人说的“政改”是要加强中共的领导，而另一些人推崇的却是西方政治体制，要搞多党制。那么中西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究竟谁更先进？这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值得优先明确呢？

在经济上，既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引进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如何确定比例和范畴，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之间如何平衡？中国是注重产业立国还是注重金钱利益？未来是继续追求发展速度还是转向追求生活质量？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仍然有待于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断摸索。

在军事上，我们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积极发展？未来是强调和平相处还是强力捍卫核心利益？

在文化领域，到底是我们中国文化先进还是欧美文化先进？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这些问题也多是模模糊糊。目前有声音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不错的，而有人主张西方文化才是最美妙的。而我们就没有人大声地说我们的新文化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化，她是基于传统文化经历了一百多年来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凝聚而成的崭新文化。

我们需要理论的指引，我们也需要理性的宣示，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一定能够全面复兴，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一定能够实现，为什么人类的理想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复兴会大大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些声音能够转化为超大正能量，从而鼓足我们的干劲，激发我们的勇气，能让更多的热爱中国的人们更加自觉地奉献自己的力量，一起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添砖加瓦。这就是我们中国学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让我们一起来做好这个工作吧。

第一章 世界的真相

古希腊文明

毋庸讳言，我们的观点是基于我们是中国人这一立场的。我们也愿意接受基于逻辑的推断，遵循历史的逻辑是我们立论的基础。

我们把眼光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去看一看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事件及其位置和意义，这样才不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目前，科学家推算的地球年龄大约是50亿年，考古学表明人类发明文字大约只有7千年，而近代科学的诞生距今仅有500年，这就是我们已知的世界。今天人类已经能够上天入地，但对过去所知甚少。我们今天所描述的历史只是根据有限的资料拼接而成的不完整的图案，中间有很多断裂带是由后人的解释连接的。这种解释是必要的，有胜于无，因为即使解释错误也能为后人发现真相打下基础。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史其中的一些章节是存在疑问的。这不是我们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无聊之谈，而是为了厘清我们思想领域的混乱。因为史观是我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了解历史主要是为了预测未来。

目前的世界通史中存疑的，主要是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史中的一些重要节点。

最大的疑问是被称为古希腊的文明史。说的是两千多年前，在古代希腊，就有欧洲先民们，穿着优雅的长袍，时不时裸露出健美的身躯，创造出美妙的艺术，有远远领先于其他民族的知识体系，什么哲学、数学、科学都不在话下。相形之下，我们中国人却在三千年里进步甚小，只不过是在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中原地踏步，这种比较的结果让我们很自卑。这种自卑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自卑会大大影响我们未来的工作，所以需要较较真。

我们用理性思维去判断一下，理性思维要比眼睛直接看到的现象更接近真相。我们中国人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看到的也依然有可能是假象。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眼中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这千百年来多数人认定的和接受的事实却有部分是假象。真相是哥白尼和牛顿这样的天才，用理性思维告诉我们，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这个理性判断发生在五百年前，它给人类带来思想的革命。所以理性思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我们用理性思维去审视当下流行的世界史书籍资料，就会发现很多关于古希腊文明的说法的章节既缺乏考古实证，也缺乏可资考证的信史资料支撑。

我们认可历史的记载，必须以文字和载体为存在前提。考古证明，中国的甲骨文出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规范化了。记载载体也是竹木简还有帛书等，这都有出土文物支撑着。公元105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这是人类进步的台阶式的标志物，因为只有纸张才可以大量记载文字，所以，详细的历史书应该是在使用纸张以后产生的。

而纸张传播到欧洲是成吉思汗子孙横扫欧亚大陆之后的事情。西方的科学家都承认纸

张的获得也是引发西方近代巨大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纸张传播到欧洲之前，西方使用的载体是羊皮、纸草。纸草的问题是保存时间不会长久易粉碎，羊皮的问题是记载的内容不可能多，是因为成本太高的缘故。所以西方根本就不具备产生长篇巨著的基本条件。

西方不光是没有载体，也没有统一的文字。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十里不同音”，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字，仅仅靠着语言是很难交流的。欧洲从来没有过统一的文字，谈论欧洲文字的历史会让西方人不好意思，因为拉丁文字(即系统的罗马文字)是在中世纪里才由天主教会逐渐完善的。上面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不是可以质疑那些传说中的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呢？今日西方世界所谓的古希腊文化大厦其材料却没有一个源自古代，不是太奇特了么？这和我们用现代钢筋水泥材料再建一座阿房宫是不是很近呢？世界会承认这新建的城池是文物古迹么？

在人类的历史上，文字和书写在很长时间里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利。所以，现代人将文字、纸张、印刷术、互联网视作人类进步的台阶。在中世纪的欧洲，一部用羊皮书书写的《圣经》的价值超过一座城堡。

今日我们看到的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学巨著和哲学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几十万言，托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甚至超百万言之多。就没有人问上一句，他们是用什么载体传承下来的呢？它们是怎样躲过西方上千年排斥异端思想文化的传统和无数次战乱而没有被毁灭的呢？要知道在现代技术发明之前，历史的记载是一件难事。例如我们中国人的唐诗宋词本来是传唱的歌咏，因为没有记载曲调的方法而失传了，留下的只是可以用纸张记录的歌词文字。

考古学不支撑古希腊文明

从世界地图上看，欧洲整体处于寒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皮肤是白色的缘故，白人肤色浅就是因为缺少阳光。目前人类学上常见的说法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热带，逐渐向北半球迁移。到达温带的成为黄种人，到达寒带的成为白种人，可以想象到达寒带的人们是很晚才过去的。欧洲不光是寒冷，地质结构也是以石质为主，所以过去几千年里一直以畜牧业为主体。畜牧业的居无定所和气候过于寒冷导致欧洲的文明水平较为低下。而且寒带需要更多的肉食品，身上也要有脂肪，也导致他们的卫生水平和生育能力低下。

对比中国就能知道。地理上，欧洲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处于北京以北的纬度，相当于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草原。而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处于温带区域的中原和江南，而不是东北和内蒙古，也能证明寒带产生先进文化之艰难。由此可以推断，苦寒的地理环境导致白人的文明发育最晚。在美洲开发之前，欧洲人主要是游牧渔猎民族，艰苦的生存环境导致欧洲生活水平低下是能成立的。

辉煌的古代文明无一例外产生于较好的自然环境里，这是生命层面的规则；古代四大文明都发源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大河流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类古文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今天人类超越自然环境而存活是基于科技和工业的进步所致，不能倒过来推论。

中国的历史有着相当的可信度，这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的历法相关。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前犹如一团乱麻，别说中国人难以了解，就是西方人自己也说不清楚。连最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年)，在自己的论著中谈到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也仅仅是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的介绍。而且在西方的图书馆中，谈到那段历史的只有阿拉伯文和罗马文的历史残本，再有就是《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其他就是后人杜撰的各种历史文献了，所以，西方早期的历史基本局限在天主教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

12世纪以后，天主教教会在吸取了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后，才意识到统一的历法的作用，1582年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天主教区统一的历法时间。没有统一的历法，发生在古代的大事件就没有顺序，没有顺序又何谈有可信度的历史？

16世纪之前，西方的历史是一个被称作黑暗的时代。表现为一方面是王朝更迭速度极快，另一方面是诸侯林立，语言风俗各异。毁灭前朝或是异族的文化，烧毁前朝的图书馆和杀戮异端是家常便饭。像中国自秦代就建立的“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制度对西方人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于1799年发现了著名的罗塞塔石刻，这个石刻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和印度人通过中国的佛经来推理印度的古代历史是类似的。所以我们质疑西方历史是非常有底气的。

关于“文艺复兴”

如果古希腊文明有置疑，那就意味着我们所学的世界史知识中一部分是有疑问的，这应该是颠覆式的震撼。震惊之余很多人不由得产生疑问，难道欧洲的学人们没有人站出来捍卫他们的历史么？问题恰恰在此。在中世纪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也就是“文艺复兴”(15世纪)前的所谓“黑暗世纪”里，没有一个欧洲人谈论过古希腊文明，也没有人懂古希腊文。

被誉为科学新时代的先驱者培根说过：“智慧与学术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远比权力与统治者更持久。在《荷马史诗》问世以来的25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不曾有诗篇遗失，但却有多少宫殿、庙宇、城堡以及城市荒芜或是被焚毁？”这段名言本来是试图表明欧洲人是非常注重文字记录的。然而，关于古希腊史的事实是，所有描述古希腊历史的西方史料，既不是来自古希腊，也不是第一手的直接史料，甚至多数不是用古希腊文写成的。

这就出现了矛盾。一种可能是古希腊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是欧洲人忙着互相砍杀顾不上讨论一番，一千年里没有只言片语涉及这个古希腊文明，所以培根先生错了，也就是说欧洲人没有记载历史这种传统习惯。还有一种可能是古希腊史只是一个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古希腊文明只是一个“幽灵”。所有的欧洲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东西存在，所以无从谈起。这表明培根先生没有错，一千年里欧洲人之所以不谈古希腊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古希腊文明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人们编造出来的。

这样的表述惊世骇俗，然而却最接近真相。西方所谓的古希腊名著包括荷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没有一个古希腊文的原件。就连古希腊文都已经灭亡了，和现在的希腊文更是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所谓的“古希腊名著和历史”都不是用古希腊文写的。

我们今天知道的西方历史都是经过修饰之后展现的。中国现今流行的教科书上写着在地球的另外一侧，两千多年来一直生活着一群有着更高的哲学、数学、建筑、艺术、政治水准的人们，和古代埃及、古代中东、古代中国一样，欧洲人也创造出璀璨的古代文明，只不过是在随后的一千年中落后了。但是，由于拥有自由精神、冒险精神并尊重法治的基因，还有良好的商业意识并尊重科学技术，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一飞冲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西方历史，这样的辉煌历史曾令很多人羡慕赞叹不已，可是这些都令人质疑其真假。

比如有人会问为什么长期以来西方人不去质疑呢？其实像汤因比和罗素这样的西方智者是承认西方文明的根是源自欧洲蛮族的，这已经是实属不易的了。

严谨一些的西方现代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在描述欧洲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也很少去引证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著”，罗素则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

古埃及等古老文明是由金字塔、法老墓葬、金铜器以及石刻图案和文字支撑；中华古文明由青铜器、甲骨文、竹简支撑；天主教教会可以用羊皮书证明自己两千多年的传承；而所谓的古希腊文明没有任何这类考古学上的支撑，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质疑一下古希腊文明是否存在了呢？要知道，想证明古希腊文明存在比证明它不存在要困难得多。

今日所谓的古希腊文明以及著作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开始出现的。“文艺复兴”是欧洲人思想领域中的革命，当然他们说自己是复兴，用“复兴”一词就是表明自己祖上曾经是很牛的。只是在后来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千年里落后了，所以才有复兴之说。为了证明天主教的反动和腐朽落后，需要一个曾经辉煌的历史，当时的形势和趋势是呼唤和支持这一做法的。因为统治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天主教势力被黑死病动摇了根基，来自东方的科技产品使得欧洲人眼界大开：火药和纸张让欧洲人提升了文明水平，茶叶和调料让欧洲人享受到美食，丝绸和瓷器成为上层社会的象征，东方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欧洲人追求理想的指针。欧洲人通过十字军东征获得阿拉伯世界的大量藏书和经典，从中发现了远古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欧洲的有钱人、有权人、有才华的人们都贡献了力量，都成为作伪的动力和助力，于是一个古希腊文明就这样被制造出来，诸多的努力逐渐拼凑出一个古希腊文明。

古中东的游吟诗人、古波斯人的历史著作、古亚洲人的哲学和古埃及人的几何学这些所有的通过十字军东征掠夺阿拉伯人图书馆获得的知识 and 著作，被糅合成一个古希腊文明。一个虚构出来的盲诗人荷马和来源至今不明的两部“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成为古希腊文明的起点。远在希腊千里之外的土耳其城堡特洛伊以及所谓的特洛伊战争，被视作古希腊历史的起点。

托名古希腊文明的文化其先进性自不待言，整合了世界所有文化成果的新产品自然是很优秀的。但是把时间点安排在两千多年前就是问题了。这和一个成年人写一首打油诗不稀奇，但是托言三岁孩童所写就会产生轰动效应是一样的。

中世纪

这个世界上多数人是信教者，每个人的信仰是外人不可涉足的雷区。我们应该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传统。但是切莫因此认为我们中国人是落后的，全世界真正不受宗教统治的只有中国人，几千年来中国人很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今后会更自由，所以对宗教力量感触不深。

其实老一点的中国人还是知道这种感觉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时期也曾经尝到过思想统一的滋味，这个滋味的酸甜苦辣咸至今依然在评判之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再品尝这种滋味了。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在挣脱思想约束的同时，也扔掉了自家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没有抵抗工业文明的力量早已被抛弃了，这样一来全盘西化就成了最正常的了。在某些人眼中西方文化代表先进和进步！这和白人们推广的欧洲中心论不谋而合，难道不是太诡异了？这般作为其后果令人忧心。

欧洲中心论的主要观点说到底就是欧洲白人自认为优秀，而把有色人种视为天生的劣等。这种东西不光是在欧美有市场，今天还广为流传于世界，成为世界的主流观点。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否认欧美的富有。由于掠夺，由于资本主义的暴发，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由于工业革命硕果累累，西方世界占有了巨量的财富。这财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压力，多数人已经臣服于这种力量。更为高明的是西方金融财团不光集聚了大量财富，同时也早早占据了世界舆论阵地，这两种合力使得这些年全球西化之风强盛。最简单的证明是，当下我们中国人知道的世界名人主要是欧美白人，无论是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都是白人占据绝大多数。更别说西方还高举着“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号称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大旗满世界飞舞，文攻武卫，武攻文卫，双管齐下，攻城掠寨，所向披靡。

在这种风潮中，中国的一切都被质疑和否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是自己在骗自己，地大物博是自我陶醉，万里长城是锁闭国门的象征。而诸侯林立、彼此打得昏天黑地的欧洲却成了某些人心中代表光明和先进的理想国。

西方描述的古希腊文明像维纳斯般美丽，中国漫长的文明却是酱缸般的丑陋，这就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畅销货。谁能否认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真的是昏了头了，丢了魂了呢。如果说当年鲁迅先生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绝望中的呐喊，是为了让中国人涅槃重生，是为了让青年人丢掉幻想彻底革命，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和赞赏的。那么这些年我们在复兴的奋斗途中遇到的大量的全面否定中国的言论，其目的和作用又是什么呢？

既然有人热衷于歌颂西方，把西方世界视作花一般的美妙，那我们就得认真看一看剥掉古希腊文明外衣后西方真正的历史是个什么样子了。

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其人民主要从事渔猎游牧等粗放式营生，生存殊为不易，所以有好武的传统。著名的古罗马文明就是武士构建的社会，也就是今日所说的标准的奴隶社会。

我们在前面说了，古希腊文明疑云重重，欧洲人的真正的远古文明是古罗马文明。那么古罗马文明和现在的欧洲人是个什么关系呢？他们是一体的吗？也不是。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古罗马帝国是“虫子”，欧洲诸族是“草”，现代欧洲诸民族国家是“虫草”。也就是说虫

子死了，草菌占据了虫子肢体，虫子为菌类提供养分成为虫草。在古罗马为更为野蛮的蛮族所灭之后，欧洲就成了四分五裂的诸侯小国。

在极度艰苦的生存环境和非常落后的政治体制双重压迫之下，在公元元年之后，欧洲很多人接受了犹太人耶稣，特别是圣·保罗的传教，逐渐团结在教会的周围，形成了可以抗衡王权和贵族的力量。不过日益扩大的神权并没有给欧洲带来革命，而是很快和世俗权力同流合污了。这样欧洲进入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欧洲人自己把这个时期称作黑暗的中世纪。

我们中国人常常反省历史中文化遭受到的破坏，例如项羽一把火焚毁了阿房宫就让中国人羞愧不已，其实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孰不知欧洲人却是有屠城的记录的。在欧洲，毁坏文化，小规模的一般是彻底破坏一座城市，大规模的则是消灭一个民族的文明！

欧洲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战争不断。他们虽然号称是同一个宗教，但是教派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极大，而且往往把对手的教堂作为摧毁的主要目标。

中华悠久的历史中最令中国人痛恨的是汉奸，汉奸令很多中国人感到汗颜。然而欧洲人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欧洲人根本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为了宗教纠纷，德国人打开国门，让外国人入侵自己。英国国王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请来意大利和德国的雇佣兵。民族英雄被自己的君主杀害一点都不稀奇，著名的圣女贞德就是被自己所保卫的法国国王和贵族们出卖给了英国人。

有人说中国人禁锢思想，摧残文化，其实在欧洲表现的却是另一种文化浩劫。宗教是干什么的？中国人多数没有深切体会。而欧洲的宗教极端统治长达1200年，教会禁锢思想的程度绝不是我们中国人能够想象的。

我们常常痛斥焚书坑儒，却不知中世纪的欧洲近乎荒蛮，只有僧侣识字，甚至相当多的贵族也是不识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欧洲大陆没有纸。欧洲人没有纸张，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本羊皮书，还把握在教会手里。从罗马后期贯穿整个中世纪，欧洲人没有任何能够影响世界的科技发明。实际上，500年前的欧洲只是农奴制社会。

那时，占欧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是在贵族领主的“家法”里生活的。这与中国自皇帝以下均为“编户齐民”和所有穆斯林都按伊斯兰法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中世纪，整个欧洲基本是处于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中，几乎不用货币，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不是市场经济，也没有太多的商业活动，所以市场经济对当时的欧洲人而言是新生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对市场经济很兴奋着迷的缘故，直到今日欧美学者依然将市场经济视作万能的宝贝，是因为历史上他们没有享受过这般美妙的事物。而同一时期，在中国和中东阿拉伯区域，商人和市场一直都很活跃，市场经济是古已有之，所以对中国人而言市场经济一点都不神奇。

在欧洲无论是君主还是教廷，权力、利益的争夺也是残酷不变的事实。哈姆雷特和狮子王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欧美人的关注，是因为在欧洲争权夺利是层出不穷的。

我们得承认欧洲人在建筑上还是很有天赋的，这个能力应该和他们最早接触火山灰有关，也和他们需要抵御严寒的需求有关。但是欧洲却极少有保留数千年的文化古迹。传说中的奇迹建筑最终都消失了。相比较之下非洲的金字塔、亚洲居鲁士陵墓、秦始皇陵、万

里长城、空中花园、吴哥窟、泰姬陵、故宫、孔林，甚至已经消失的美洲玛雅人的金字塔都保存了下来。欧洲人却罕有这类古迹，这也反映出了其在欧洲历史上各族群间的残酷纷争中被毁灭的可能性。

大约在七百年前，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写了一本书《马可·波罗东游记》，引发了到东方淘金的热潮。虽然不断有人质疑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的到达过东方，但是他的书无疑成为西方冒险家的行动指南。在当时还披着毡子整天和牛羊打交道的西方人眼中，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如天堂般不可思议的富有和先进。

五百年前，不用说中国远比欧洲富有，就是中东、北非的穆斯林也比欧洲人日子好过得多。然而五百年后，世界发生了颠覆，西方胜出，东方落后了。什么因素导致的这种巨变呢？这或许应是我们国人深思的一个大课题。

黑死病

公元14世纪中叶，欧洲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有可能是鼠疫的黑死病，这瘟疫肆虐长达一个世纪，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这场灾难。有人说黑死病是中世纪与现代文明的分界线，这一评论显然是准确的。黑死病使得所有的欧洲人直面死亡，信徒们视作神圣的无所不能的教会面对这巨大的灾难束手无策。当时西医治病的方法就是简单地放血，然后祈祷。无数人眼看着自己的亲人慢慢死去，而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明天也要死去，朝不保夕所产生的震撼是没有经历过这种悲惨的人难以想象的，这场瘟疫极大动摇了天主教统治的基础。

大量的人口死亡也导致整个欧洲农牧产业崩溃，因为无人从事生产，所以随之发生巨大粮荒，饥饿又使得人口进一步锐减，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欧洲农奴制的瓦解。传统的欧洲社会出现巨大的裂缝，开始被一种特殊的金融资本势力渗透，经历过黑死病的欧洲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欧洲了。后人常说的资本主义的壮大、市民阶层的兴起、新兴工业开始发展和壮大其实都和这场瘟疫有关。在席卷全欧的大瘟疫中，欧洲传统的等级社会制度崩溃了，神权遭到极大地动摇。金融资本和城市贵族结成了同盟，工商业阶层经济实力大增，封建王权也开始了集权的进程，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更为关键的是，每个人直面亲人的死亡和对自己死亡的恐惧带来欧洲人思想上的大革命。

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黑死病的爆发导致背在欧洲人身上的天主教宗教的桎梏被打碎；而劳动力的短缺，直接引发工业技术的进步；对生命的渴望导致欧洲富有者愿意将金钱投向医学领域，西医也因此出现革命性进步，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构建了西医成为科学的基础。

可以说黑死病就是引发欧洲基因突变的那道闪电，当欧洲人集体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爆发出强烈的反作用力，激发出巨大的潜能，甚至有可能改变了欧洲人的基因。

有人说随后的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航海地理大发现、科技创新、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事件都和黑死病引发的欧洲变化有关。

还有人以生物学的理论推测，黑死病的肆虐导致优胜劣汰，瘟疫中死亡的多数是体质弱的人，能剩下的都是体质强壮的人，这一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美国的黑人多数比非洲的黑人体质要好，原因也是经历了最残酷的奴役和人为淘汰。黑死病的肆虐也极大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观，鼠疫引发的肝坏死使得病人普遍出现黄疸病症，欧洲白人把黄色皮肤视为病态，把黄种人视作灾星可能也来自这里。欧洲的胜出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者居上，才有了如今欧洲领先于世界的局面。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可能是人类文明永恒的法则。欧洲人在承受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的宗教压迫之后，经历了剧烈的悲惨的黑死病的肆虐之后，产生了强力反弹，使得欧洲人普遍拥有不惧死亡向外扩展的张力和欲望。相形之下，我们中国人活得太舒服了。中国人由于早早地解除了瘟疫的威胁，清朝入主中原又解决了北方游牧区域和中南农耕区域的矛盾，长期和平使得人口暴增。当时的中国，汉族在热衷于小脚女人和八股文章，清朝贵族也从骑士变成了提笼架鸟的顽主，这时候的中国人和浴火重生的欧洲人发生碰撞与战争谁赢谁输不就是一目了然了么？

我们必须明白欧洲真正的历史才能知道欧洲人为什么充满扩张力。好武和蛮横并不一定就是缺点，温文尔雅与平和也不一定就是优点，无数优雅的文明被野蛮人灭掉了。这个领域不能用善恶好坏等道德因素来简单化评判。

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修正当下盛行的一种不良倾向，那就是总是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愚昧的。这种决绝在革命之前有着进步的作用，但是在今后复兴的努力之中则会变成阻碍，会妨碍我们自信的重建。

世界的真相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中国人创造出最悠久和最温和的文明。欧洲人是在工业革命的突变性进步中领先了我们，而不是拥有比我们更优秀的文化和制度，更不是比我们人种优秀。

在工业革命之前，先进的农耕文明总是受到野蛮的游牧民族的觊觎。这个方向的掠夺和战争动因十足，反之则不成立。所以在工业文明之前的历史上，挨打的并不一定是落后的，这是我们需要强力修正的一个概念。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了树立法国人的自信曾经说过：我们不必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吃惊，以至于认为其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善的。这就是欧洲人在明确知道自己落后于中国时的态度。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暂时性的一个阶段落后于西方，就苦苦自辱，煞费苦心地去证实自己是劣等民族。

明确欧洲的真实历史，就可以让我们端正态度，真正搞明白西方的文化哪些是要学习的，哪些是不能效仿的。真正的世界史，就是欧洲人从世界各地学习了先进的文化、知识和产品，自我加工和消化之后创造出了科学和工业革命，掌握了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从而掠夺了财富，这是他们先进的和优势的部分。但是领先之后的欧洲却视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欧洲中心论的原因。

那只看不见的手

科学家们曾经设想在生命演变的过程中，尤其是无机到有机、有机物到生命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闪电起到了特殊的激发和突变作用。这说明生命进化过程是存在突变的。西方这几百年来发生的科学与工业革命进步也是人类发展的突变。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我们就要问一句，这种变异和革命是不是其他民族也能复制呢？

今天我们熟知的文艺复兴、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当下的全球金融以及政治一体化进程和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的背后都有国际金融资本的影子。金融资本编造出市场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经济。但是真相却是国际金融资本才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人有动物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动物性表明人有自私趋利的倾向和本能，社会性表明人有利他合作的倾向和智慧。多数人的理想是追求平等，倾向于接纳人的社会性属性。但是善良的人们多数没有意识到，有少数人，甚至是富有才华的人在追求自由主义。他们占据了人类社会的优势资源之后，反而倾向于接纳人的动物性本能，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性是恶的。他们人数虽少，但是力量和影响力极大，而且很难消失，因为它们根植于人的自私本性。

金融财团发起于金钱，最初只是用钱生钱。不过获得经济利益之后导致政治诉求，最终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权力。金钱与政权的结盟又使得金融财团的利益进一步扩大，巨大的利益使得整合更大的资源成为可能，这个过程的世界级别的循环导致了金融财团膨胀出不可思议的雄心或是野心。几百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的愿望已经是实现全球金融以及政治一体化进程，换句话说就是统治全球。如果中国没有完成近代史上的彻底革命，那么西方金融集团还是有可能完成一统江湖的宏愿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和金融上并没有力量与金融财团抗争。然而中国经历了特殊的逆转，将逐渐实现复兴，这天地翻覆式的变革与进步导致金融财团控制世界的美梦破灭了。

世界总是在互动中

真实的世界一直是处于相互交流之中的，远不是我们概念中的互为封闭的几块，只有美洲由于两个大洋的阻隔，是很晚才加入这个交流的。

实际上，几千年来欧亚大陆和非洲一直是处于商品流通和文化交流之中，欧洲人一直在接受着东方的产品和科技，只不过很长时期是经过阿拉伯人的中转，是一种极端的奢侈品而已。中国在清朝中期以前一直是世界商品流通领域最大的集散地，而不是我们理解的闭关锁国，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那个被丘吉尔称作“铁幕”的时期，苏联也一直在向世界出口原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不是人们理解的封闭，一直在通过香港等地和外部世界发生着联系，曾被西方人形象地称作“竹幕”。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和历史。这是因为人类没有哪个统治者能真正阻挡利益的流动，而且多数统治者本身就是最强烈的利益追求者。所以世界一直是流通着的，其规模和力度都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这才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的真相。

商品的流通是无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伏尔泰认为：“东方是所有艺术的发源地，西方从那里获得了一切。”这种表述依然不够，东方不光是为西方提供了艺术，实际上西方的进步就是基于东方哲学思想、管理架构与制度以及科技产品等基础上的再次整合的结果。

欧洲人编写的教科书上写着只是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才打破各主要文明之间隔离的障碍，才有了全球化时代。仔细推敲，这种结论是有疑问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在西方人书写的世界史中，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是第一个绕过了好望角，并且远航到达了东印度的航海家。这其实和尼泊尔向导带着欧洲冒险者攀登珠峰是类似的，当欧洲人写下某位白人是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时候，并没有注明他们是被当地的向导拽上顶峰的。真实的历史是穆斯林、波斯人、爪哇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早就远航到了好望角。事实上欧洲人的航船以及航海技术和技巧，都是从中国或是中东国家学习的，火药及纸张更是由中国发明并传播到欧洲的。

这一千年来，推动西方商业、生产、金融、军事和航海革命以及所谓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的主要技术、思想和制度，都是首先在东方形成和发展，然后才被欧洲引进和吸收的。1700年后，刺激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很多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此外，中国的哲学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考古证明，全球贸易早在1500年前的6世纪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的贸易是由中东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所主导的，和近代欧洲人是不搭界的。

中东的阿拉伯人是靠着骆驼的运输穿越漫长的中亚陆地的。骆驼不需要道路，更容易组织，耐久力更大，成为比牛或马更有价值的运输工具。“沙漠之舟”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使得长途贩运商品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中东伊斯兰帝国的建立，极大促进了世界商品的流通。

公元610年以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统一了中东，伊斯兰教并不是欧洲人形容的那样，是个游牧部落游荡于荒漠的苦思冥想，而是源于一种悠久传统的城市宗教。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搭建了世界商品流通的桥梁，从而使许多东方的特别是印度、中国的产品传播到了西方。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发达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世

界市场。

商品的大规模交换使得工业和农业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中国成为世界商品最大的集散地之前，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帝国已经通过商业把西边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中国联系在一起，而且向南传到了非洲。

而意大利各商业城邦国家是在八九世纪才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的，他们是后来者。所以，真相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全球商贸的主导力量是在伊斯兰教控制的中东和北非，既不是中国更不是欧洲。

伊斯兰世界一系列生产革新和技术进步大大促进了世界商贸的发展。在航海方面，斜挂大三角帆的发明及进一步的发展，使得远洋航海得以实现。阿拉伯人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也有重要突破。穆斯林在铁制品生产方面比欧洲更具优势，而在钢铁生产上他们的优势一直持续到18世纪。埃及的蔗糖生产则是一项全球性的重要产业。

甚至伊斯兰世界的商业思想也极为重要。人类社会的一整套商业制度(关于合伙契约、合同法、银行业、信贷及其他诸多制度)都是由穆斯林创立的，今日全球贸易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些制度之上。

甚至被欧洲人称作“黄祸”的蒙古铁骑带给亚洲的多是灾难，但却偶然间成为带给欧洲人革命性进步的使者。成吉思汗的子孙曾成功地打通了欧亚大陆，由于看不上落后的欧洲，故而在占领了其东部之后(主要是基辅罗斯)，就一窝蜂返回东方，把征服的力量指向富庶的中国，这才让欧洲躲过一难。

作为欧亚大陆的征服者，蒙古人非常热衷于商业，他们为所控制的巨大区域内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安全保障，欧洲人因此幸运地得到了来自中国的火药、纸张以及先进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管理架构。

后来，由于蒙古帝国的崩溃而引发了欧亚大陆长期的战争，战乱导致欧亚大陆北部商路中断了，到14世纪中叶，世界贸易的主路再次回到中东阿拉伯世界主导的路径上来。

威尼斯人长期主导着欧洲贸易体系，但他们一直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由中东穆斯林尤其是北非人所控制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欧洲人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不是世界贸易的主体，主因是他们过于贫困。最初的时候，欧洲主要依赖埃及来进行贸易。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大部分时期，中东仍然是世界商品流通的桥梁，但是全球商贸的集散地已经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并在中国一直保持到19世纪。这才是世界贸易史的真相。可是欧洲人书写的历史书上，在公元1000年之后世界贸易中心先是意大利后是葡萄牙，伪史得以流传是因为后来者居上的缘故。

欧洲中心论

在欧洲人书写的历史书中，这个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没有什么错误，就如同多数国家的地图都是以自己国家为世界中心的一样。问题是在西方人书写的世界史中，这世界只有欧洲人才是文明人，这一定是搞错了。

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史是这样的：两千多年前，西方世界有一个古希腊文明；随后产生了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推导下来，欧洲是自主产生了现代文明，这就是流行甚广的文明谱系图。工业革命连同民主政治以及后来产生的美国等一切文化，都体现了他们的对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

在这种世界史的主导下，东西方被很自然地分成不相干的几个实体，似乎西方人独自缔造了近代世界的一切进步。西方人写到西方的进步是由于一贯的传统的独创的科学理性以及民主或开明的特性，逐渐演变或者进化成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欧洲人向外扩张征服东方和中东，同时给世界带来进步和光明。至于屠杀、掠夺、战争只是进步的代价，这就是“欧洲中心论”的精髓。

然而传说中的古希腊文明实际是吸收亚洲文化和古埃及文化后的整合文化，真相是远比西方先进的东方文明促进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东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通过商业等途径传播到西方，然后被其吸收，和其他的因素结合促发了欧洲产生特异性突变式进步。西方产生革命性突变之后，通过先进的组织结构和使用先进的武器掠夺了东方财富和资源，积累的结果导致西方的崛起。这才是世界真实的历史。

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力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大，我们中国人熟知的各种主义多数都是它的变种。欧洲学人普遍认为，西方的进步是由于悠久的传统，是一种理性，是一种以数学为主干的思维，是哲学这样的与生俱来的优越的禀赋和特性创造了现代西方先进的文明，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基于刚性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自主地发展。如果这些表述有些人不习惯，那我们换个说法大家就很熟悉了，那就是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欧洲中心论认为，在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方一开始只是不相关的旁观者，后来是牺牲品，或者是天然的被奴役和凌辱的对象。因此落后就要挨打，随之东方特别是中国被孤立、被边缘化，都是正常的。

欧洲中心论产生在大约1700年至1850年之间。这个时期，通过掠夺和殖民世界已经富裕起来的欧洲人开始自信心膨胀。他们把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即西方和东方(或是“西方世界和其他”)。西方比东方优越，西方天然的并且独一无二拥有这般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东方则是：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烂、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

而西方人这种优秀的美德还被表述成古已有之，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一贯如此。也就是说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开始，西方就充满了发展的活力，就拥有了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合理的制度。这种优秀的文化基因必然也会产生理性的个体，欣欣向荣的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充满光明和激情的资本主义能够实现必然的突破。

与此相反，东方被说成是容忍专制观念和不合理的制度、黑暗、没有理性个体，充满集体主义的残忍，经济停滞和容忍奴役等等天然缺陷。结论是东方是低等的，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这种表述有着强烈的暗示，于是自然而然，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侵略和统治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合理合法的逻辑。

在西方进步阶段论中，欧洲历史被写成一种发展的时间直线，而东方历史则被表述成在一种落后状态下的循环反复，谁劣谁优，一目了然。

西方中心论根本不承认，在并不遥远的刚刚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东方的技术和产品对西方生活和观念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因为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领先于世界的，并创造了其自身辉煌的发展，和落后的东方一点关系也没有。

西方的进步源于自身卓越的创造性、理性和社会民主特性，近代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发展是西方文明延伸的必然结果。其实这一切都是来自19世纪之后的西方社会学科学者们的想象。

西方主流理论中，其实包含着西方必胜的强烈意识。也就是说西方人书写的传统的世界史是这样的，人类历史肇始于古希腊，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发生农业革命，千年之交意大利主导的商业崛起，欧洲在文艺复兴中重新发现了完美的希腊思想，伴随着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民主精神的兴起，从而将欧洲推向工业化和近代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类社会也将必然走向资本主义。

欧洲学者试图寻找到社会学科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忽视诸多的社会因素，所以他们的著作都有相当的内容。比如他们都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西方诸侯林立直接有关的，也就是说金权之所以能够占据上风，商人能引领向外扩张的方向是由于君权的相对弱化。而东方君主们的权力显然大得多，尤其是中国的集权更是绝对的力量，因此阻止了资本主义运动。这一点没有错吧，这显然是一种现实。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无一例外地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混为一谈，这样他们就把国家政权视作落后和反动的事物，而完全没有意识到政权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是完全能够转变成推动作用的。

欧洲由于诸侯林立，被学者们表述成“多权力主体文明”，东方世界的单一国家体系被表述成“帝国统治”；欧洲诸侯间的战乱不断被认为是极大促进了社会发展，而东方单一国家的帝国不存在太多的战争，所以变成了“东方专制主义”而不利于社会进步；西方神权、君权、金权谁也不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被称作社会力量和不稳定平衡，欧洲的君主们无力实行专制，所以他们就授予资产阶级“权力和自由”；欧洲诸侯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军事竞赛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而东方“单一国家体系”缺乏军事竞争所以不是扶持社会发展而是变成了发展的阻力；这样，在他们的笔下，西方的封建制度比东方的中央集权体制还先进。最后，他们最愿意这样说，就是西方人具有一种“理性的冷静”和具有改造作用的“驾驭世界的准则”，这当然归结为基督教新教的作用，而东方人则在宿命论中挣扎。因此，资本主义的崛起在西方是一种必然，而在东方则是不可能的。一言以蔽之，这种所谓的研究都是从结果中倒着向上推。因为西方人进步了，所以往前找原因，最后找到的就是这些玩意。西方人把它当做宝贝，问题是中国人脑子里也装满这些论点，那么能得出与西方主流观点相反的东西么？

我们不知道面对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这一事实，欧洲的学人们是怎么分析的，是不是除了军事化的组织结构以及骑兵等因素之外还有蒙古人天性中的先进性呢？胜利者是不

受谴责的，胜利者就是优秀者，这种社会进步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东西了。我们该不该接受呢？

站在和欧洲中心论观点相反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会得出相反的答案，那就是欧洲是后发者，是基于其他国家早已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世界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

事实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国家才全面超过了中国。欧洲中心论者认定只有欧洲人才能独自跨越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且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都是西方世界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他们无视欧洲长期掠夺世界的事实，他们早就不承认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人两眼一抹黑的历史了。

欧洲的学者们非常有选择性地在著述中摒弃来自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先进成果。即便是他们知道欧洲人是从东方得到这种成果的，但是由于中国或是阿拉伯世界没有持续进步，所以就不再算是从外部学习来的，就变成欧洲人自己独创的了。欧洲学者把通过中东向欧洲传播的东方思想启示下的西方启蒙运动，把所谓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能够发生的事实归结为自己祖先所谓的古希腊的文明成就。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否认这些东西是抢掠阿拉伯人的，物证就摆在那里无法回避，怎么办呢？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它表述成这些美好的东西本来就是他们祖先的，也不知道怎么会到了阿拉伯人手中，反正是他们用剑又给抢回来了。这般表述之后的结论就是他们的进步和穆斯林们没有任何关系。

欧洲人从来不认为掠夺世界是一种错误，所以强调欧洲的掠夺性不会成为一种谴责，这就如同指责食肉动物不该吃肉一样无力。欧洲处于苦寒之地，这也决定了其人民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也就是说他们骨子里就有海盗的血脉，这是一种强势的内在扩张力。

距今九百年前，罗马教皇乌尔班在号召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除了宣告所有的参与者都将获得宗教赎罪之外，专门指出东方是流着牛奶和蜜的富饶之地，成功地激发了欧洲人狂热的掠夺欲望，战果丰硕。十字军东征抢到了阿拉伯人的图书让欧洲人获得了完整的知识体系。随后的达·伽马和哥伦布领导的“航海大发现”实际上就是第二波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以获得财富为基本导向的。欧洲人掠夺了美洲的金银，屠杀了美洲土著以获得土地，随后奴役黑人集聚了大量的财富。这财富成为促进欧洲科学与工业革命萌生的土壤。

把东方定义成落后、消极和幼稚的种群，把西方定义为先进、富有创造性和成熟的种群，这就为欧洲人对外扩张掠夺杀戮提供了坚强的信念。他们在烧杀抢掠的时候却认为自己在传播文明。当然站在欧洲人的角度看，掠夺世界确实起到了保障和促进英国工业革命的作用。问题在于换个角度看，这种所谓的进步是多少有色人种的血泪和尸骨搭建的，这种文明的进步性何在？

今天很多中国人大概已经不知道被边缘化的意义是什么了吧？我们很难受，因为这种对过去屈辱的忘却是一种背叛性质的愚蠢。我们可以找一个参照系来，那就是黑人被视作奴隶和低等人就是世界历史上忽略非洲的后果。当今世界没有人关心非洲人其实曾经领先于欧洲这一事实，因为忽略非洲的文化和传统就使得黑人被奴役合理化。

文明的冲突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欧洲的中世纪诸侯林立，那时候的贵族可不仅仅是个称号，而是有土地和农奴支撑的。而农奴制下的欧洲市场经济极其微弱。加上基督教是鄙视用钱生息的，所以在教会控制之下的区域里金融业几乎没有发展。欧洲落后既有地理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但是在欧洲贵族的割据缝隙中生存和活跃着一些犹太商人，几千年来他们一直从事商业和金融业，手中有活钱。欧洲人从来是很鄙视犹太人的，规定他们不许拥有土地，只能经商。不过犹太人很精明，慢慢积攒出巨大的财富。欧洲的贵族们往往会从犹太人手里借钱，到了还不了钱的时候，只能把自己的收税权或是铸币权抵给犹太人。

财富的增长助长了犹太人对权力的追求，数千年的颠沛流离使得他们意识到金钱和政权结合的重要性，所以近几百年来他们长期而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端于欧洲的以犹太人为主干的金融资本已经通过控制黄金和各国货币，积累起与国家相抗衡的实力。这一力量在近代世界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时至今日更是膨胀到试图控制世界的程度。可以预测，这一力量在未来也会起着巨大的作用，不可轻视。

金融资本借着科学和工业革命的东风，到今天已经控制了一些国家的货币发行，进而发展成一种相对完备的政治经济制度，成为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模式。欧美一些政府通过向私有银行借贷以维持其财政运作，而将所收税款用来偿还贷款的利息，很多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实际是由私人银行控制。这样一来，国际金融资本如同水蛭一样吸附在各国经济体上，不但掌控了各国财政大权，使政府无独立的财政能力，也合法并吞了政府税收，将税收变为私人的源源不绝的利息收入。这对于想发财的人来说是多么神奇的境界啊。

金融资本不光是发起了一场持续的席卷全球的运动，还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就是资本说了算的社会。谁会高喊钱说了算呢，一定是钱最多的人，谁的钱最多呢，一定是金融资本家。所以很容易推断出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和推动者，他们也是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不就是认可人类社会必然会被金钱所统治了么，这种理论也会成为必然规律么？

我们常常以为资本主义是经历了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进化过程，我们一些人甚至把科学、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西方产生归功于基督教，这都是无知无识的误会。真实的情况是金融资本一开始就主导了这个过程。金融资本抓住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财富急剧膨胀，从而控制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权，成为统治世界的影子帝王。

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只能诞生于犹太教而不可能发源于基督教，看看他们的基本教义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资本主义的内涵恰恰是基督教教义所坚决反对的以钱生息。

伊斯兰教义同样是反对放贷生利的，而且伊斯兰政教合一，力量远远大于金钱势力。中国也是皇权远远大于金钱和宗教势力，所以东方这两种文明都是政权大于金钱的，都不能孕育资本主义。而西方世界政权较弱，在宗教力量被黑死病削弱的情况下，为金钱所

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

欧洲被金钱势力夺舍了，欧洲人不是没有尝试过反抗，事实是反抗异常激烈和漫长。这几百年来多数革命和战争的深层原因都是各民族反对金融资本控制的抗争。实际上欧洲从平民到贵族都尝试过、挣扎过摆脱资本的控制，只不过是所有的反抗最终都失败了。欧洲的贵族最后多数选择了与犹太金融资本合作，以求分得一杯羹。

因为逻辑告诉我们工商业者没有理由去推翻政权，社会大乱对他们只有害处没有益处。而金融资本则完全不同，他们导演了欧洲激烈的社会变革，是为了直接获得巨额的经济利益和实现对政治权力的诉求。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集权国家与金融资本的冲突性，因为集权产生的组织力量是能够与金钱力量抗衡的。所以未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集中在这里。美国学者亨廷顿已经明明白白说出来了，这叫做文明的冲突。

天、地、人与上帝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小看了科技的力量，以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招就可轻松对付西方的革命性进步，轻敌的结果是一败涂地。大败之后甚至失去了学习的资格，被抢劫到打翻在地之后的长时间段里，又被西方世界的快速进步和富有压垮了精神。好在经过百年抗争和三十年的闭关疗伤终于缓了过来。但是改革开放之初贫困依旧，这种假象再次搅乱中国人的心智，让中国人再次集体放大西方的优势。怪异的是西方人也再一次误判中国，这让金融资本放松了对中国的警惕。

只有明了真正的世界史，我们才能解答一个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被殖民或者被灭绝。因为金融资本的缺陷在于没有人，只能雇佣，而集权国家产生的组织力量是可以制约金融资本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历史充满诡异的缘故，战争与动乱的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煽风点火。

我们认识到把人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资本主义很是艰难，最终获得成功更难，因为这对领袖集团的要求太高。既要有极高的权威、智慧，还要无私奉献。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只有中国人在中共的领导下走通了这一条路，中国之所以能重新走上复兴之路，主因是我们有中共第一代领袖团体这一核心，而根本性的原因则是中国人早就具备集体主义的基因。

中国的复兴无疑打破了金融资本统治全球的美梦。我们现在可以明明白白宣示这样的观点了，就是资本主义只是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私人集团推行的一场运动。我们把市场经济、科学和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运动做个切割，就会发现金融资本的力量远不是他们表现出的那么强大。未来的世界主流是各个民族以国家的形式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什么非要走进资本主义社会才算是进步。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金钱不过是人造的流通媒介罢了，人类怎么会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所控制呢？

我们说过，人类通过智力的进化，找到了两种壮大自身的方法：一个是科学技术，为人类制造出改天换地的工具；一个是通过社会组织，人类成为巨人般的整体，两者合体成为接近造物主般的神圣。然而这种进步使得人类变得自大起来。很多人把自然环境的变化归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就是一种。其实在地球几十亿年的历史中，有很多物种占据过生命链条的顶端，但是由于特殊地质变迁或气候的原因最终都灭绝了。地球的一个小小的偏角变化就能给我们带来酷暑严寒的变化，稍大些的变动会是沧海桑田不可思议的颠覆性再造，更大的则是毁灭性的。

人类虽然试图把握自然规律，然而大自然的变化趋势并不是随着人类的意志而变化的。地球是超越人类而存在的，大自然远比我们想象和理解的强大。目前人类号称拥有毁灭地球的能量，其实只是毁灭人类自身的能量而已。

我们中国人面对自然是一种敬畏的态度，天、地、人——我们把自己排在自然之后，西方人则认为有一个上帝造出万物，而他们又是上帝之子，于是在认识世界上他们领先一步。

人类在宇宙面前还是很渺小的。人类的历史上，诸多的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除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等特殊的进步之外，例如瘟疫、气候都会极大地影响人类的发展。至于地壳运动、太阳的喷发则是人类根本无法抵御的巨大力量。所以过度解读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不合适的。

西方数百年的领先只是由于科学和工业化的先行一步，而不是什么文化、制度等全面的先进。而科学和工业化进步又是人类集体智慧的集合产物，只不过是欧洲人机缘凑巧先行了一步。而它们的特性是可以学习的，这就使得全人类都能学习。今日中国的复兴已经迫使西方人正视中国，这说明中国有着西方人不能理解和明了的某种先进性，这是一个世界级别的课题，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讨论。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第二章 中国的底蕴

中国曾领先世界上千年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其他的古代文明由于迄今未知的原因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的地方。

不过中华文明并不是在五千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的。现代的考古学发现，古埃及以及古代中东就有可能比同一时期的古代中国发达。但是有迹象表明自汉朝开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度，并且一直保持到19世纪。

在今日一些中国人的头脑中，一说起我们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落后，说起西方则是什么都先进。这个定式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的。其影响甚广，流毒深远。

很多人认为承认落后才会奋起直追，所以这三十多年来对这类观点听之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以前的跟庄战术已经完成使命了，中国人未来的路需要自己走了。这时候，确定自己的优势会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是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中国人再自卑下去就变成有害的了，因为自卑的民族是无法领先的。

摆脱西方语境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并不是处于西方学者所言的落后的社会阶段，而是远比西方更早地进入市场经济中央集权的一种超前的社会形态。我们的落伍只是在科学和工业化层面的落伍，只要在科技和工业化领域中加大力度奋起直追，我们就能追赶和超越西方。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我们能明确这一点，就不会在市场经济等问题上过度纠缠和纠葛不已，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要远久的存在，而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摸爬滚打了几千年。

面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甚至中国古代的帝王们也没有我们理解的那样，可以动用绝对的权力来随意改变商业的规则。中国私有制确立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得要早得多，劳动力早在周朝以前就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也早已经出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商业就已经很发达了。当年管仲被齐桓公重用，委任以管理齐国，主要的内政就是发展商业，甚至可以说当年的齐国就是以商业立国的。管仲具体的做法有垄断盐铁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的政策来吸引各国商人，从中抽税。某些商品国家垄断，多数商品放开竞争。这些举措使齐国经济大发展，国库充实，最终成为春秋时代五霸之首。

秦朝统一之后，秦始皇最伟大的举措是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和水利建设，这些措施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基础。令人叹息的是秦王朝没有能巩固和消化统一的成果，二世即亡。我们注意的是秦朝虽亡，秦制度却保留了下来。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制度和工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汉朝在最初的时候吸取了秦朝的教训，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而且放任市场行为，不抑制土地兼并，结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人避税能耐大，国家税收就更少了。

皇家不得已，靠卖官爵换钱。到汉武帝时期，是内无粮草外有强寇，逼得汉武帝采取极端措施，动用政权来生抢钱。

中国人早早地上了自由经济这堂课，而且趋利的动力十足，只是没有工业化的助力，商人们从来没有膨胀到可以与皇权竞争的程度而已。而中国早早进入集权时代，皇权极大化，权力才在这场竞争者胜出。中国的统治者一定都明白这个潜在势力的可怕，即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这一点被现代人认为是错误，这恐怕是现代人搞错了。这种错误就是拿现代的技术和产业水平来衡量过去的政策，是一种很浅薄的错误。

事实上，中国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抑商者，主要是抑制农村土地兼并而不是压制商品的流通。这样做是去掉了中间的土地所有制环节，使得土地保持在耕作者的手里。

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叫很多人耿耿于怀。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是我们今天中国学人常见的错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键在于中国的政权势力过大，而不是没有市场经济，相反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存在并且还很发达。

事实上，中国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二三百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这就说明各个王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没有太多错误的。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原因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的多，最有可能是气候、外寇、军费、君王个人等各种因素在综合作用，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这类因素。中国社会在过去两千年里总体呈现螺旋增长，生活用具在进步，衣食住行各种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恶性循环或是原地踏步。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到，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世界上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传播。在炼钢、铸铁、造船、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诸多技术领域，中国领先西方上千年。

中国历史像个博物馆，向我们展示着中国人在吃、穿、住、行领域的不断进步。瓷器、丝绸、茶叶、马车等奢侈品在不断普及。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表现的是一千年前的事物，要知道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身为中国人是一种幸福。

有史书记载的中国历史长达三千年，我们只节选其中几个节点来看看哪些是中国历史的关键点，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下来。这种智慧要比西方短短几百年的亢奋崛起重要得多。

商鞅变法

我们知道，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其实一直是秦制度，而秦制的源头是商鞅变法。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落后于关东六国的，主要原因是贵族的势力大于秦王的势力。所以秦国国力微弱，秦王的地位也就很低，各国都以“夷狄遇之”。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遂下令求贤变法。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使秦国富强，为此不惜裂土封侯。商鞅因为在魏国不受重视，应召入秦，随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仅仅用了十年，商鞅的变法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变法之后秦国经济大发展，军力强盛，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人多知道商鞅变法这一事件，却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的政策。其实商鞅变法的意义远比我们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大，甚至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扁平化结构都和商鞅变法有关联。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商鞅做了哪些变法，看看这样大的变革又是怎么实施和实现的。

商鞅最先是从鼓励开荒做起的，这是任何人不能反对的。国君会大力支持，而贵族无法反对。其中关键点在于开荒的土地归拓荒者自己，这就把佃农和雇农解放出来给自己干。这样给贵族干活的人减少了，但是赋税依然。这一政策导致贵族守不住原来的土地，因为农户跑走给自己干去了。这时候国家再鼓励土地自由买卖，把土地逐渐从贵族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导致贵族无法联合反抗。这一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改变了土地制度，仅此一项变法其实就把秦国的国家性质改变了，就是说在关东六国还是农奴制的时候，秦国已经变成了农民个人所有制为主体的君主集权国家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我们无法不承认商君的伟大，他实在是超越时代太多了。

商鞅变法第二条是废除世袭制，建立军功制，这一点是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实现的。

其他的变法如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分家单过、推广县制、统一度量衡、明法令、刑无等级、迁都咸阳，以及严禁私家请托、禁止游说、禁止私斗，都使得秦国国力大幅增强。

其实商鞅并不是战国时期唯一的变法者，在此前后，关东六国也先后进行过变法。其中魏国李悝、楚国吴起变法比秦国商鞅变法还要早一些。赵、韩、齐、燕等国随后都进行了变法。但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最终的成功，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其他六国的变法是失败的呢？

历史上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多数拘泥于道德层面，得出的结论启示不大。我们认为秦国商鞅变法和关东六国变法的关键性差异在于土地最终所有权归到哪个阶层，这是个所有制变革的大问题。秦国是大力挤压贵族，将战争变成获利的阶梯，胜利的利益归于每个士兵，将土地最终归于农民个人头上。也就是说每个农民直接面对国君纳粮交税，没有太多的中间环节。而关东六国是土地依然归贵族所有，最底层的人没有获得土地。这在税赋上看差异不大，但是在军事和政治上却是天差地别。所以最初的时候六国经过变法之后也出现积极的景象，国君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但是真正打仗，立刻分出高下。秦国战

士为自己而战，六国士兵为他人卖命，绝对是冰火两重天。秦军在军功制度的激励之下如狼似虎，积极备战，一上战场如疯如狂，而六国军队如裹挟之难民，两军相遇往往成了一边倒的屠杀。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当年六国在秦国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经过苏秦的撺掇，联合了起来。最辉煌的时刻是集合百万大军进攻秦国，结果秦国打开函谷关大门，请六国军队进关，六国的百万大军无一人敢进。秦国为什么会有这般底气呢？不就是因为秦国是全体秦国人的国家么？这一时刻令人震撼，深深刻在历史之上。就是从那一时刻起，统一潮流无可阻挡，任何抵抗都不能持久。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大革命。

在秦朝之前，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时间长达五百年，后世称作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被后人赞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穿了就是时间足够长，空间足够大，任何思想、观念、学问、智慧都有机会展示实践。最终在长达五百年的你死我活的厮杀之中，无数思想者用生命和鲜血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误和价值。

中国历史展示的法则是：某种社会变革愈是松缓平和，社会付出的种种代价便愈小，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小也慢；某种社会变革愈是剧烈深彻，社会付出的种种代价便愈大，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大也快。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历史更是如此。人类千百年的变革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战国时代，强则存，弱则亡，战国变法更接近于社会革命。华夏文明在经历了春秋三百年较为温和的整合之后，又历经战国两百余年的血火锤炼，统一的潮流终于汇聚成无可阻挡之力量。最终，这一时代成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源泉。

正是由于商鞅变法和秦国统一六国，中国才变成了中国人的家园。其意义在于中国的土地最终是归中国的劳动者所有的，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这才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分分合合最终总是合在一起的关键。

“五胡”十六国

然而，中国的历史书中依然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存的记录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统一的时间段里了，中国历史总被人为地修饰成泱泱中华、天朝上国。尤其是在今天依然有人以为应该胸怀宽大，让外人一点也无妨。很遗憾，这只是我们历史的一半。

事实上，自从秦始皇统一之后，中国的历史只有一半时间是处于统一状态，另一半时间则处于分裂状态。在分裂状态下，我们民族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我们只有明明白白地撕开这道伤疤，才能真正明白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为什么跪拜皇帝。中国人接受服从与强调秩序不是一些人眼睛中的所谓奴性那样简单，这是中国人血肉和生命堆积起来的祭坛，这是我们民族祈祷统一的仪式。

历史的真相是四方之所以降伏是因为中华的强大。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者往往会受到赞美和歌颂，但是为什么鲜有人赞颂和谈论三国后期最终的胜利者司马懿家族？原因是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之后带给我们民族的是巨大的灾难，他们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被匈奴人灭国。北方和西域各族入侵中原，“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中国史书记载的泱泱中华、天朝上国的无限辉煌，其分量都不如这一句话沉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时期是中国人的千年噩梦。所以不要老盯住曾经的辉煌，那只是我们历史中的一半，而另一半却是深深的伤疤，忘记这灾难意味着背叛。这道伤疤让我们中国人牢牢记住统一是和平的保障。

“人和”是中国的根本

中国唐朝最著名的皇帝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从历史中学习是一种较高的智慧。历史由无数个独立的、特殊的，甚至是偶然的事件构成，但是总体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就是历史的科学性。

中国人早就有这种智慧，所以历朝历代都设置史官，独立地或者是相对独立地记录帝国发生的事件，而历朝历代也都重视编纂史书，来为自己和后代提供指引性帮助。

现在我们知道了要真正从历史中找到规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需要足够的资料积累和特殊的天赋。时至今日无数人在研究历史，但是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多数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中国历史中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名著《三国演义》中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我们要问三国时谁占天时？谁占地利？谁占人和呢？我们知道按照孟子的这一观点谁占人和谁能最终胜利，那么占据人和的是曹魏集团才是。可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搞错了，他把人和错误地按在刘备集团的头上。真实的历史上是曹操一方占据人和，根据是曹操在汉末乱世中把流民集合起来屯田戍兵，故而曹魏政权当时在政治上是最先进的，而刘备和孙权集团依然是靠着联合上层集团得以残喘一时的，故而曹魏最终胜利不是侥幸的，不存在诸葛亮以个人能力和聪明来翻盘的可能性。所以“人和”才是中国文化的根，这是中华文明最高的政治智慧。

明清两朝

明清两代的历史对当今中国更有现实意义，原因是同一时期欧洲开始兴起，明清两朝代错过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机遇，为后人所诟病。

我们会看到，中华文明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并不排斥科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都进行过可贵的探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使得明王朝很注重军队的建设和先进技术的应用，中国统治者没有太多道理和理由去拒绝更为先进的技术和利益。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我们未知的原因导致中国的历史走了弯路。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明朝灭亡的主因是气候原因，这种判断很有道理，因为有资料表明在明朝末期中华大地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寒冷期。是全国范围的近七十年的干旱导致帝国无法支撑庞大的人口，引发内乱，在内乱之中统治者和造反者同归于尽，最终导致满族趁虚而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带回了番薯、玉米等耐旱耐寒的粮食作物，最终没有挽救大明朝，反而成就了清朝。

清朝不是我们这些年电视里演绎的那样先进，满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还是采取了很多限制汉人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转型，错过了工业化的机会。但也不能说清朝政府就是坏得没边，只能说最终不能完成保卫国家的任务导致清朝统治的灭亡。

两千年来，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在向外扩张受到大自然的束缚之后，为了统治的稳固，基本上采用儒家文化治国。这对缓和国内矛盾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会弱化民族的尚武精神，常常表现为对外部侵略无力应付。一旦最高统治者的力量被削弱，大量的无组织的民众并不能形成力量对付外寇，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结构最明显的短板。明清两朝居然都是毁于外敌的入侵，这种耻辱让我们很少以明清两朝为荣。

近代史与世界市场

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是世界上效益最高的产业；商业虽然获利巨大但却是最危险的行当，是拿命换钱的行为；渔猎游牧则是效率相对低下的产业；我们认为效益决定文明成败这一观点是成立的。

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而不是中国，但是农业文明最终在中国结出最灿烂的果实，其主因是地球的气候变化导致东方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中东中央版块荒漠化严重，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犹太人也因此成为商业民族。

中国在11世纪后期，即宋朝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农业社会的巅峰。到了清朝统治的时候，更是实现了全国性的和平。清朝以抑制汉人去草原开荒的政策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族之间的矛盾。再加上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粮食新品种，以及从美洲传到中国的玉米等耐寒耐旱作物，促使中华大地上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

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制造出大量的优质产品，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水准。正是为了保持对华贸易的顺畅进行，中世纪晚期的犹太资本在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支持下，发起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运动。美洲被发现、印度的殖民化，都是以中国为目的地的大航海运动的副产品而已。至少在最近的一千多年的世界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

以这种历史观来看世界就会发现，中华帝国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发生是欧洲与中国贸易相关度极高的事物。

世界的白银与黄金长期以来都控制在欧洲的犹太资本手中，而欧洲需求中国瓷器、茶叶等商品，中国选择了用白银作为货币，这种结合导致了15世纪以来全世界商业市场的极大扩张。新地理发现、宗教改革和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有着强烈的内在的财富利益驱动的，可以说金融资本和欧洲贵族为了发财而形成了合力。这力量引导了近代世界。

实际上全球贸易体系至少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而不是西方人书中写的五百年前，商贸活动几千年来一直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换句话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市场经济古已有之。

从商贸角度讲，直到19世纪欧洲仍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位，而世界经济的中心仍在中国，只是因为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从而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圈的机会，欧洲方有机会以贵金属来弥补对亚洲贸易中的结构性逆差。难以想象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人将拿什么来中国做买卖。

明清时期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到欧洲，换取了大量的白银，以至于中国这个非白银生产大国却用白银当流通货币，可见当时中国赚了多少钱。从宋朝开始到明清几百年间，当中国把世界的白银都赚回来了，有钱的中国反而危险了。原因是中国没有重工业只有手工业，只是一个贸易大国，不是军事大国。没有军事实力，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最终并没有守住自己的金银财宝。

当全世界的白银都到了中国人手里的时候，英法等帝国无法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了。此时，为了消除自家的贸易赤字，英法用在印度种植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物资，以贩毒的方

式掠夺中国的财富。大清帝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伤害，当林则徐烧掉鸦片禁烟的时候，就直接断了西方帝国的贸易财路。所以才导致鸦片战争的发生，导致了英法强盗打进北京城，上演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欧洲最终用枪炮战胜了中国人，用战争又把白银抢了回去。

历史的结果就是这样直白，鸦片战争后大清签署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又输银子又输地，中国进入恶性循环之中。

真正的历史不是我们后来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什么清朝闭关锁国、经济落后，而是由于军事落后。如果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记吃不记打，那我们也只能羞愧地说，最高统治者以为联合了蒙古族就不会再有野蛮人的威胁了。他们无法理解会有更野蛮的人从海上过来，还带着巨大的火炮。因为这不合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世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曾经以为大象是安全的，直到看到两头雄狮合力杀死大象去争夺最后的水源的镜头，才知道我们的世界观是错的。1840年以前的清朝，就是这样一头大象，英法就是杀死大象的两头狮子。

有人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用来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在这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然而享受着富裕生活的中国人没有想到遥远的欧洲却悄然出现变异性进化。工业革命除了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生产力之外，还补足了欧洲社会的短板，就是用社会化大生产把分裂的欧洲联系和组织起来。这使得欧洲不光拥有了锋利的巨剑，还成长为巨人，从而有了横扫世界的实力。大炮打碎了世界上所有没有工业化的民族和国家的门槛。

中国的统治阶层尤其是清朝贵族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应这场革命，最终农耕的手工业的中国无力对抗全面工业化的欧洲。数百年商贸积攒的财富在一百多年里被外寇洗劫一空。在这巨大的外力的压迫之下，中国社会产生反弹，尝试着变法图存。然而清朝贵族最后的一次努力——戊戌变法依然失败了。

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

距今140多年前，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加强了军队建设，逐步积累工业基础，将日本变成了工业化国家。约110多年前，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却失败了，变法失败导致清政府灭亡，把中国变成了军阀混战的半殖民地国家。中日这两次维新变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结果却截然相反，最终给两国带来的命运更是完全不同。

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最大的不同是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世界诸强都处于战争之中，国际环境很宽松。三十年后中国戊戌变法时，世界列强分食殖民地、瓜分世界的争夺已经基本完成，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唯一富源”。列强绝不希望也不接受中国再强大起来。

其次是中国变革势力与日本维新派实力的强弱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天皇与中下层力量合作，挤压推翻幕府旧政权获得政权。而中国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并没有变革的意愿，还是极力在试图维持。想想看，是什么力量导致慈禧宁可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也拒绝变革呢？这只能说明中国变革的力量没有形成，而反对者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最后的差异是中日两国改革的路线不同，日本的变革力量大却依然战战兢兢，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式渐进，中国皇帝没有力量支撑，却大张旗鼓将自己的执政基础推到反对改革的一边。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光绪皇帝应该先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这是多么荒唐。其实光绪帝唯一的机会是潜移默化抓住权力，整顿军备，在对外争斗中逐渐掌握军权，渐进变革。而不是去颁布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变法诏书，这类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的宣言只会引发反对力量的集聚和爆发，而不会得到任何有效的支持。要知道圣旨也得有执行力才能是有效的，皇帝的权威也是建立在武力和金钱的基础上的。

历史无需假如，清朝灭亡的主因就是没有将民间商业利益转化成国家军事力量。清朝贵族早就丢失了祖先金戈铁马的野性，变成了只知道享受者。说什么“洋务新政”，“同光中兴”；讲什么经济构成，工业基础；论什么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架构、法律、制度；谈什么“中体西用”，所谓的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这一切全是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其实落后的中国重中之重是强军，关键点是需要对外战争胜利，是闭门疗伤。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明白得太迟了，真正着手建设新军的时候，已经是大厦将倾，清朝贵族被轰下去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怪圈。异军突起的是买办。

买办化

买办正式登上中国舞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欧洲各帝国的主要利益并不在中国，但是不啃上中国几口又对不住豺狼本性。由于中国存在中央政府，语言完全不同于西方，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欧美财团主要是通过买办来代理自己的业务，同时也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更多的利益。

列强的商品输出需要代理，资本输出需要借方，武力掠夺需要汉奸帮凶，这都需要找到中国人来帮忙，这就催生了买办。买办的利益来自洋人的赏赐，随着中国利益向西方大量输出，买办的势力也大大增强。

清朝的突然垮台，导致中国群龙无首，孙中山匆忙之间赶回国收拾烂摊子，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太多内涵的原因。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就是剪了脑袋上拖了260年的辫子。鲁老爷还是鲁老爷，阿Q依然是阿Q，结果就是革命的果实被手握军权的袁世凯褫夺。

袁世凯试图逼迫中国人接受他当皇帝，他的底气来自中国各种力量不能统一的话一定会天下大乱。短命的袁世凯死后，中国果然陷入军阀混战。各路军阀除了抢劫，就是满世界借钱买枪，借钱要抵押，那就抵押主权和未来税收，各路军阀是毫不吝啬地将中国抵押给了洋人们。

到了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买办的主业变成了金融，通过资助各派军阀，让西方获得了中国矿山的开采权、税收权以及海关关税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权。

由于北洋军政府已经投靠了西方，苏联为了在中国保持影响力，转而帮助国民党。是苏联给的卢布和枪，建设了国民党第一军、黄埔军校，支撑了北伐。

国民党胜利在望，英美财团和中国的江浙财团改变态度，国民党开始摆脱苏联和中共。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作为投靠英美财团的投名状，变容共为“剿共”，变节成了英美财团反共阵营里的小马仔。

1927年崛起的蒋介石政权其基础就是大买办和大地主，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被挤到一边的其他中小买办更干脆，转身投靠日寇，1940年汪伪政权完全彻底是由买办构建的。

买办，是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个新的阶层。客观地说，买办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一定作用。自鸦片战争以来，买办投资新式企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引进了西方科技文化。

但是问题在于，买办不同于普通商人，前者更像是一头怪兽，为了获利，不惜牺牲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具体表现在：对买办而言，任何长期投入都不如短期见效的买卖好，所以买办控制下的中国没有任何重工业的发展。军阀们借到钱就买枪，有了枪就抢地盘，结果就是内战频发。

买办没有祖国，所以对建设没有兴趣，对国防的兴趣远远低于对国内的掠夺，所以才会有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理念。买办最著名的观点是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

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对今日国家民族概念已经根植于心的中国人而言，这种说法是多么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从买办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有大量的难以生存的人群，中国的工人也只是苟延残喘，中国的读书人也是在窒息中积攒愤怒，军队的基层也是一些卖命求活的人，甚至有不少地主，也因为日寇的侵略丢失了土地。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国土……这是国家么？都牺牲了还剩下什么？整个民族都灭亡了，谁还有好日子？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未曾遭遇的，异族屠城亦不过如此的灭顶大灾难。

为了自己的私利敢拿全中国人的利益做牺牲品，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

积弱的中国引发日寇的觊觎就很正常了，中国国土之上建立了伪满洲国，中华民国居然不敢开战，这一点连清朝都不如。清朝好歹也是拼了老命，打了那么几仗，实在打不过，弹尽粮绝，才签下耻辱条约的。

传说中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就是欧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国家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总算是过上了几年好日子。中华民国的历史，提起来满脸都是泪。基本总结就是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司徒雷登曾说过，中华民国足足饿死了两亿国人，还主要发生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代。

等到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两千年里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在二战胜利之后丢失了外蒙，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不是因为战败而丧失的领土。

近二百年的历史证明，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这就是我们无法容忍买办的原因所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买办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这九十余年

我们后来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最初的时候却是苏联在中国的战略使然。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次聚会是以北大旅游团的名义集合的就说明了问题。实际上，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试图为中国寻求出路，而当时的苏联，由于被西方势力围剿，也需要寻求友好的势力相互守望扶助。双方可谓找到了共同点。但是，参加共产党的北大知识分子们最要命的缺陷就是试图把十月革命在中国复制一遍。

华夏中国，几千年里从来没有从海上冒出过英法这样强大的敌人。中国朝野把洋人视作魔鬼，惊呼遇到鬼了。这一百多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天圆地方，我们中国人在大地中央，这样的世界观在炮弹的轰鸣中顷刻间跌得粉碎。真实的世界和我们理解的完全不一样，除了我们，还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存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不是世上唯一的先进文明。这让我们中国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现实血淋淋摆在眼前，过去一切辉煌在巨炮的爆炸中化作青烟。

昨日高高在上视西方诸国如蛮夷，转眼之间匍匐在地祈求苟延残喘，这就是中国的统治阶层的作为。欧洲人手里的枪炮超越了我们的认知。打翻在地的中国人再看洋人，就觉得洋人变得高大无比了，原来的价值观都被颠覆了，大动荡的百年里中国失去的不光是财富，还有自信和尊严，留下的只有失败和屈辱。面对西方人强大武力支撑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中国大众承受的只有流血和死亡。

中国北方的领土丢失得最多，因为清朝的发源地由于满人入关而完全空虚，被俄国人鲸吞了。东部海岸则被列强们瓜分蚕食。列强们早就明白和实施精确打击，他们并没有把目标完全对准普通中国人，而是直接指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先把最高统治者打翻在地，然后逼迫他们签订屈辱的条约，通过中国的统治者间接地剥夺中国底层人民，完全割裂了中华的上下阶层。

中国社会的上层背叛了，中间阶层太弱而且自私，下层人民完全是一盘散沙。洋人们成功地将中国这个大块头放翻在地，然后吸血。到1921年中共成立的时候，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唯一的变化是皇帝没有了，换成了一堆军阀。谁也无法一统天下，于是打作一团。

近百年的屈辱挨打，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强力反弹。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抱团，抱团就需要思想的指引，到哪里去寻求呢？这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纵横家、农家……，我们称之为百家争鸣。民国时期各种思潮其实比诸子时代还多，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村治派、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乡村建设派、玄学派……

各种西方的主义都有中式信徒。军阀们信奉的是实用主义，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主子，他们冷笑地看着这些书生们叫嚷，转脸去寻找自己的洋人靠山，买枪占地盘。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后总结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很多人似乎不以为然。其实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给各派团体都留了空间，各种理论和派别以及组织都有实践的机会。但是在蒋介石取得政权之后，所有温和的变革之路都被堵死了，武装斗争成为唯一选项。

但是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赢。中共从1927年开始土地革命，二十多年后获得全国的胜利堪称奇迹，其中一定包含有真理层面的事物，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们惊讶地发现，共产党能够胜利是由于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尝试着寻找着联合着所有的有利于革命成功的因素和力量，以最为决绝的牺牲和漫长的奋斗最终奇迹般获得政权。

所以，如果认为自从有了共产党就开天辟地，焕然一新，只是一种对历史的误会，没有真正价值。完全无视这场几乎无法完成和实现的革命的残酷性是有害的。中共在解放前的成功是一批特殊的人用生命蹚出的一条血路，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理论来，那也只能叫毛泽东思想。它是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由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牺牲凝结而成，这种胜利有必然的因素。

中国人用血否定了西方式的两党制

中共是从1927年开始走上武装斗争之路的，井冈山就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并经历实践检验的地方。共产党起家遇到的最可笑的事情就是苏联真正支持的是国民党，有人嘲弄地说给共产党的是理论和书，给国民党的是钱和枪。

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国人民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而且中共的胜利意味着中国摆脱了苏联、美国以及所有帝国主义的控制。

1840年之后的一百年里，由于中国巨大的块头，西方列强们不敢惦记着直接殖民中国，总是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是中国百年乱象纷呈的深刻原因，列强们的共同设想就是中国最好产生分裂或者实行多党制。

最热衷这个东西的不是中国人，所有的对头和敌人都给中国推销这个东西，至少是美国最想中国这样。

美国人是真的想让中国变成两党制，国共内战之前一直居间调停。苏联是更进一步，直到解放军过江前夕还指示中共最好划江而治。美苏两家在别的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争个你死我活，在分裂中国的问题上却是空前一致。他们居然都愿意中国出现两个党，最好是分成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中国实行两党制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最想做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怎么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就是必然之路呢？

遥想当年，美国人为了中国能走上两党制的“进步”之路，派已经退了休的大名鼎鼎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将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两党制。鞍马劳累最终无果，这怎么能不叫中国叫嚷着要民主的人痛心疾首、痛哭流涕呢？

这一点都不好笑，相反这段话是我们难以表述的愤怒，试问天下谁能保障中国人在西方式的两党或多党制下能够稳定呢？承认中国的一切进步必须是基于稳定的基础上的，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立场。一切说着漂亮的话语号称是为了中国的进步却罔顾动荡的危机的作为是极端的冷血，中国人的血难道还没有流够么？中国人用血否定了西方式的两党制难道不是历史的真实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难道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吗？

道路

道路选择可不是轻飘飘的话题，而是涉及到利益和生死之争的大事。其实一百多年来我们试过了许多的道路，除了列强给我们设定的殖民地道路之外，自强的道路都被堵死，都走不通，这就是结论。

中国被洋人打翻在地之后怎么都摆脱不了被奴役和被欺凌的境地，几乎是无路可走。为了国运的逆转，清朝的王公贵族们尝试过，北洋军阀们尝试过，孙中山尝试过，蒋介石尝试过，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尝试过。可以说中国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千万级别数量的生命的牺牲换来的。

中国社会从某一天起出现了一种集体右转的趋势，这成了一道奇景，就像被严父压制太久的青年进入叛逆期一般。叛逆的时间还挺长，长达三十多年。不过也意味着中国人在走向成熟，我们社会多了一点理性，也多了一些宽容，也开始能以较为平和的态度看待我们刚刚过去的历史了。

中国社会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拼杀，反映到党内，曾经在一个时期，党内的斗争也异常残酷和激烈。这可能是我们成长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抉择，不仅仅维系一个党的命运，也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故而一路走来，付出的牺牲巨大。我们认为所有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不论是主动牺牲还是被动牺牲都是我们后人的财富。

目前一些人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行径，因为这会割裂我们的意识形态。现在中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是对的，也是必须的。进一步说，其实中共近百年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这里重点讨论一下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问题，这对我们今后的政策选项是有意义的。

首先有人会问，邓小平是不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说是，邓小平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对毛泽东这样熟读历史的人物，接班人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细细品味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实际上小平自1955年之后就是毛泽东亲选的接班人，其他的都不是真正的接班人。这从权力分配和交接上就能看出，全党高级干部也多明白。

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能不能修改路线，答案也是肯定的。过去皇帝子承父业多数都会做出修正，那么到了小平这里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修改又有什么错呢。我们建议理论界达成基本共识，就是不要再把内部路线分歧搞成敌我矛盾。

最后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知不知道小平要走的路线，我们说是知道的。他们的政治路线的分歧是公开的，作为政治家毛邓都是属于阳光型的，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不更改的。

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权力直接交给邓小平，这实际上也产生了一种约束。这种约束在随后三十年中时隐时现，多数时候表现为改革的阻力，这大概就是毛泽东真正的目的。这种约束导致某个时期即使向右的力量再大，也无法放开手脚，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与稳定。

我们需要知道彻底否定毛泽东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他们那一代人不光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更神圣的是一代人吃了两代的苦，他们做的比我们能够想象得还要多。那是

一个给普通人灌输了理想和道德的时代，是难以达到的神迹。

中国共产党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观，这种信念构建了中国的社会正能量。这种信念实际上帮助我们抵抗西方的思潮，保住了我们国家。而且给我们民族争取到了时间，让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看清楚各种道路的后果。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苏联那样被内外合力所摧毁，靠的恰恰是这种力量。这就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袖们的遗产，这遗产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我们认知。最终我们会明白，任何牺牲都是有价值的，巨大的主动的牺牲一定会有积极的成果。

制度的反思

一个制度的建立，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和命运。一个制度好与不好，标准是什么？没有人能真正讲清楚，但绝对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制度也不是衣服，感觉不好就换另一件。制度和很多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甚至骨肉相连，生硬废除会流血的，是要付出太多的生命代价的！真的天下大乱起来，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农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我们敢负责任地说，如果中国今天的制度解体，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等待中国的绝不是富裕与光明，而是经济的非洲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人以群分，世以国分，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出现过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状态下会表现成主要矛盾，但是更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具有普遍性，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道理，这是血的教训。

中国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借鉴和指导，是遵循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教导。也就是说中国的道路是全新的，没有参照系的，需要摸索。我们用一百多年的血、泪、汗水已经证明了的一些正确的东西，也被想全面西化的人们轻易地否定了，而这种否定也引发了大混乱。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混乱也可能是一种必须的混沌。中国人受的苦太多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把这种否定变成否定之否定，由我们后人来完全确立先辈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的真正价值。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度过种种危机而不倒，不是我们有多么聪明，不是我们有多么智慧，而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们在此前三十余年的建设中所打下的基础足够牢固。

君子不立危墙，大国不蹈险途。这是我们中国人用几千年的拼杀得出的智慧，看似保守其实高明之至。

我们知道，金融资本是金钱游戏。其力量源自人类的自私本性，举世无敌，甚至不可战胜。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性之中还有另外的一面。人类真正的智慧除了使用工具还有更大的无尽的力量，那就是人类的组织力。

金融资本最擅长“暗战”，最拿手的武器是“糖衣炮弹”，而且暗处隐身，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以至于无处不在。它们扰乱国家，分化民族，能杀人于无形！我们试图找到中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优势，很多人不接受，认为这是拍马屁，却不知道自信才是我们抗敌的基石。

面对未来，有人认为，目前我们最需要理论的创新，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领会前人的智慧。我们从毛泽东思想里看到的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智慧，得到的是一种从西方人那里不可能得到的指引，甚至于中国的古人也未曾有过的指引。创新的呼唤背后隐藏的很可能是浮躁和不自信，往往是一种看似正确其实是不老实的态度。其实真理距离我们中国人如此之近，而且历史早已证明它的有效性，那就是曾经引领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认为担忧中国未来的人们是有良知的，但是有人提出“中国人要形成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观”则大可不必。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从我们几千年的智慧中和我们党的九十年的历史之中总结出智慧，把农业和国防这两个国之根本牢牢抓住，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局不容外人插手，把党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会稳步达到我们的目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欧洲人的专利。金权的效率低于政权，而且它不易实现集中，容易分散，会随着自然人的死亡发生重大变化。所以金融资本在欧美历经几百年，即使是借着科学与工业革命的东风极大发展但依然没有使欧盟形成统一的力量。

苏联解体之后，很多敌视中国的人兴高采烈，觉得中国也快完蛋了，即使还能坚持几天也已摇摇欲坠了，最终的结局也一定是完蛋。这种观念深入一些人的心里，预测中国崩溃的言论隔三差五就冒出来，每一次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但是没有任何人感到汗颜。为什么他们这么热衷于或是期盼这个国家灭亡呢？因为这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力量令一些人感到不安。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好好想想。

中国人的性格自古以来就是平和的，几千年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与外族和其它国家所发生的战争，多是为了抵御侵略而不是掠夺他人。这就是我们这个温和的民族和国家。我们现在知道了，还真是有这些人对我们这个民族虎视眈眈。当然也不是只有中国人处于企图被灭绝的位置，很多的特别是有色人种都在一些人要灭绝的范围，而中国不过是实现这种妄想最强大的敌人。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阻挡这种势力，所以中国被一些人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就是很正常的了，这种敌意甚至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毫无关系。这些变化都不足以改变中国人，因为你不可能改变基因，而有的人看到黄皮肤就烦，你还能怎么办？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就注定了你是某些人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民族经过近二百年的磨难和拼杀集结而成的领导团体，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亲人是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层，多数人是平民家的后代。共产党依然代表着十几亿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党章宪法、党纪国法都没有改，所有的贪腐者忐忑不安，这就说明国本尚在，一切可为。

维护历史的严肃性

现在网络很发达，谣言很容易传播。本来谣言也很容易戳穿，但是由于很多人掉以轻心不予理会，导致以讹传讹，最终损害的是中共的声誉。我们革命者的后代们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先人荣誉的责任，不能享受着他们的遗产，却令先人们清誉蒙尘，这是不应该的。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少数人是脱离物欲而活着的，他们比追求物欲的人更有精神，更接近永恒。一些了不起的英雄，他们愿意无私奉献从而带领人民不懈努力勇于担当地前进，从而实现追赶，这就比顺风顺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人更值得尊崇。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为的是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正在往好日子上走，但如果认为今日的进步是自己的本事所致，那可就是不客观，不历史地看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脉相承，其目标是极其清晰的，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不难。我们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这是我们的优势而不是丢人的事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作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我们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全面否定前三十年，只歌颂后三十年，这要么是居心叵测要么是缺乏历史观点。但是我们也不赞成那种全盘否定这三十年的观点，新中国的六十多年，和共产党的九十多年是一脉相承的，路线不同，但是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割裂历史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可以从衣食住行等生活水平的角度考虑，但是更应该从农业、工业、国防、科技、教育等大的方面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这六十年来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这一百多年来向前看中国人是一代更比一代苦，往后看是一代更比一代好。前人的苦难牺牲流血流汗都没有白费，都变成了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但无可指责，而且需要后人怀着敬意祭奠。

中国共产党理应有足够的政治自信，没有自觉地维护党的历史是愚蠢的。

目前中国问题多多，民众意见集中在贪官腐败、下岗失业、有毒食品、强拆、飞涨的房价、群体事件上。有人指出中国的资源被宰割了，中国的金融被宰割了，中国市场被宰割了，中国农业被宰割了，中国的精神被宰割了，你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是，今日中国处于什么阶段呢？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爬坡状态，只能鼓劲不能泄气。而且把个人行为等同于全社会的倾向性政策，结果只能是造成混乱。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但是不能全面否定，所以最近中央明确发出声音，反对两种否定的倾向。

解决中国当前诸多问题的指导思想只能由我们自己去摸索。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理论问题，甚至可以说前面没有现成的康庄大道。我们只能走一条新路，这是对的。

当下的表述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全面西化的邪路。

没有人再能否认我们的进步，但是还是有人诋毁，他们说，这是因为靠低劳动力成本、低人权优势，以及付出污染环境的代价所换来的。

有人说我们中国落后的根源就是封建、腐朽、没落的文化，我们要想进步就要先去学习人家所尊崇的最高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这在六十多年前或许还有几分道理，六十多年后怎么还是这个调儿。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是各种力量是怎么作用的，没有什么规定性。

我们在宋朝的时候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富有的生活，最后为蒙古铁骑所征服。我们在明朝的时候有所恢复，又被落后的游牧部落满人侵占。两次换代都没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落后，怎么到了我们已经开始追赶并且已经可以看到希望和曙光的时候还有人嚷嚷我们文化落后啊。

三十多年前，中国走上改革之路的时候，急剧吸收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现在到了该消化鉴别的时候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都将经受我们的鉴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我们经历过军事上的风暴，从被几万洋人践踏金銮殿到打败联合国军；我们经历过经济上的风暴，从富甲天下到全面赤贫，再到重新复兴；我们经历过政治文化风暴，而时间长达近二百年。

我们看待社会还是要从大的方面看，不要简单地盯着具体问题把缺点无限放大。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加强，我们的财富总量增加迅速，因为我们从外部世界得到的资源远远大于我们输出的资源，这都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中国目前虽然人均水平还很低，但是获取外部资源的趋势却在加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通过劳动获得世界的资源为自己所享用，这是工业化国家的最主要特征，这才是引发西方世界不安的主因。而且我们的政治是独立的，军事上也在变强，这是真正的强大。

随着中国追赶速度的明显加快，西方世界开始明白过来，中国存在着某些确定的优势。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指导和管理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都表现出高效和务实。这些现实逼迫西方学者承认“中国目前形成了一种正与西方民主制度竞争的发展模式”。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已经明示我们在根本性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就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明确了我们要走的是追赶之路。我们认为理论自信也不是很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摆在那里，那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需要我们老老实实学习和挖掘。我们的制度自信是刚性的，要知道没有好的制度中国怎么可能逆转和复兴呢。

很多人会惊讶我们不赞成对中国社会全民逐利的批评。很多站在道德高地批评当下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已经组织起来了，其力量之大震撼全球。这种力量，在世界已经进入核武时代之际，通过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逐渐释放出来。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选项，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党和我们国家的领导阶层是不是也去逐利了。未来我们不能对大众在商业社会中的逐利观念有更多要求，但是对我们的领导阶层有很高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党的第二次革命的大好机遇。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在全民趋利上，而是应该怎么实现利益与发展的最佳结合。

多种社会形态可能是并行的

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是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阶段，接受这样的观点导致了理论上的重大混乱。事实上资本主义只是一种运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被资本控制和雇佣，其他的国家多是被金融资本所剥夺和奴役，资本主义所谓的先进性是把金融资本和科学与工业革命混为一谈的结果。这种混合导致全世界思想界的整体混沌，这种混沌堪称是金融财团在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成功洗脑的杰作。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过去是所谓的封建社会，这就把我们钉在政治和社会落后的位置上。可是较一下真就会发现，所谓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要知道欧洲从封建社会之所以转变为今天的社会制度，是金融资本通过引进市场经济、通过商业竞争来实现政治诉求从而形成的，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直接用战争终结了封建社会，所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是落后于欧美，而是超前很多。那么怎么解释我们的挨打呢？我们的观点是，这是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碰撞的结果，是军事失败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落后。

所谓的资本主义阶段还把市场经济视作新生事物，这只是对欧洲适用，而不适用于中东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是市场经济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让资本控制政权而已。我们暂且先脱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传统的套路看看世界，就会发现世界上分成三种社会形态，一种是政教合一，一种是集权政权独大，一种是教权大于政权，后者是最弱的，所以才易为金融资本所控制。人类社会说到底就是金权、神权、大众权力和少数人继承权力这几个主要力量夺取政权之争。神权获得政权叫政教合一，金权获得政权叫资本主义，大众团体获得权力叫社会主义，少数人基于血缘从他的上一代得到权力继承叫封建社会。这就是我们认可的历史力学和社会力学。

我们因此提出一种假设，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社会形态之间并没有先后顺序，更不存在先进落后之分，而是可以相互转化。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支撑政权的是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这些力量与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人口、传统等因素相关。这才能有效解释人类社会的千姿百态，而西方的学者把欧洲走过的路视作人类必然过程，是对非西方民族和国家的漠视，是隐性的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如果这样的设定成立，就意味着被资本奴役欺凌的国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和力量改变政权，例如伊朗就是通过宗教的力量改变国家和社会形态的，有些国家则可能通过军队来夺取政权。这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阶段或顺序。而市场经济占据主导的国家一定会带来两极分化，权力斗争也有集中趋势，再加上内忧外患，也会导致某些工业化国家出现崩溃，最终形成人类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此消彼长或周期性的反复。如果我们认可资本主义只是一场人为的运动，是金权与政权的结合，而非特定阶段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也是一场运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追逐资本利益的阶层，其财富要想达到控制社会的规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金钱相对于武力其力度是不够直接和强悍的，所以导致金权往往较为弱势，多数情况下有钱人都是采取联合的方式与武力相结合。这不是他们自己不喜欢掌权，也不是不愿意掌权，而是政权是拿流血牺牲来换的，而富人们往往缺少这种勇气。换言之，政治对商人而言成本太高，风险过大，赌性太重，所以古今中外的财富多是通过非直接的手段来影响政权的。虽然世界受到金钱的影响和控制，但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军事等领域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军事获利路线远远较金钱获利路径更短，更直接。人世间除了金权的力量还有其他的与金钱并行的力量。

富有的和有显著才华的人们更容易接受自由主义信仰，金钱至上的阶层也是距离自由主义最近的人们，他们的天敌恰恰是国家政权一类的倾向于服从与秩序的组织力量。

我们常常称作资产阶级的那个阶层是非常务实的，他们对权力也很有兴趣，但是获得权力的目的依然是获利。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直接获利，就不愿意再绕圈子，所以他们更愿意采用与政权合作的形式。政治和商业的规则虽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差异还是明显的，商人们搞政治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斤斤计较成本导致商人们缺少应有的果敢和魄力。

今天的美国拥有金权的家族，他们的发家史可以上溯到古代的欧洲，多数时间是在欧洲的权力夹缝中顽强生存发展。所以他们是哪里适合生存、适合发展就流向哪里。先从欧洲其他国家涌向英国，然后又跨越大西洋奔向美国。未来他们依然不会厮守在美国而是洒向全球。

西方学者定义的社会进步阶梯，没有考虑世界其他的民族和国家的进步道路，这其中的缘由令人不解。他们要么是没有顾上，要么根本就没有把其他的族群放在心上。他们应该了解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金权和大众权力这两股力量，还有神权与军权或是少数人的强权，这几种力量都有机会获得政权。有学者对社会发展的动力做出了简单的判断，这种立场显然是偏向资产阶级的。有些学者虽然更注重与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无产者和工人阶级，但是并没有考虑非工业化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之道，故而他们关于社会进步的理论对非西方国家的意义要小得多。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革命不需要组织，不需要长期奋斗，也不需要战略战术，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发运动，是一种多数人顿悟般的进步。这种假设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指向。问题在于多数的落后国家按这个模式就没有任何进步的可能性。

西方的理论体系搬到东方，就会水土不服，按照这种理论的设定，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发生在落后的民族与国家里，即便是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之后还要再补齐资本主义这一课，这就是引发我们理论混乱的原因。实际上，列宁早在1917年所写的《四月提纲》中就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只能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带到俄国的观点。列宁进一步指出：“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按照西方的所谓的历史规律，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遥遥无期，也根本无从解释中国的巨大进步。对西方学者而言，期待着最发达的欧洲和美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会更符合这类的理论。其实只要把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分离开来，明确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伴随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但不是一体的；其他的政治形式和政权也可以搞工业化，人类社会进步

的关键因素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而不是资本主义，能够跨进工业化的门槛就能进步，甚至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优势从而超越资本主义。这样才能从理论上解释世界，特别是解释东方中国的复兴历程。

更大的问题是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生搬硬套成封建社会，就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话，把中国定义成了一个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地方。认可自己是落后的，起到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决绝地奋起，粉碎后重建，先破后立，是绝望后的革命，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消极的作用，这会使得很多人看不到前途和光明，变成了失望和逃避，变成了约束和束缚我们更快进步的精神困扰。

所谓封建社会就是“封国土，建诸侯”，就是诸侯林立的社会。中国西周时期就已经是标准的封建社会了。东周五百年乱世之中，中国人在诸侯林立和大一统之间，用无数次战争当选票，选择了中央集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交通、文字等，中国主体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后世虽然保留了爵位称号，但是只具有象征意义，整个国家是由官僚体系来治理，而不是诸侯、封王。

这是我们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早熟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真实体现。

人类的最高智慧就是组织起来，这是人类战胜其他动物从而占据生命链条高端的关键因素。

人类社会的组织力比我们意识到的更重要。当年成吉思汗以军事化组织整合蒙古民族形成强大的合力，向外扩张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中原的汉族政权。汉族的社会虽然没有实行军事化组织，但是有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世界其他国家多是小国和诸侯国，所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力。对比几百年后美洲的印第安人由于是部落组织，所以连零零散散的拿着火枪的小股白人殖民者都无法抵抗。

欧洲列强面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并没有征服的能力，根源就是在武器存在代差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有较强的组织力量。所以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是无数次中国被分裂之后依然能够复兴的主因，这就是组织力的最佳体现。

欧洲人被金钱推动着实现和完成了废除封建的变革。但是这一过程过于漫长了。直到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才开始试图统一。这几十年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像极了秦国与六国之争。欧洲人到今天也只是达到了苏秦联合六国的初级阶段，所以无法表现出真正的合力，没有力量的欧洲依然要仰仗美国的势力。而美国并没有统一欧洲的力量，于是欧美貌合神离，抱团对外表现出一种合力，但是内部一直存在利益的争夺和争斗。欧美最终将发现这个世界不是仅有欧美人的世界，而是有其他的很多国家组成的世界，特别是还有一个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中国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早已不是封建社会，我们中国人早就进入到了集权社会了，这一点上我们领先于世界数千年。我们的落后只是在工业革命和科学两个领域，这使得我们在武器层面上大大落后了，军事上的落后导致挨打，挨打导致受伤，受伤导致衰弱，成为恶性循环。但是我们中国靠着有效的组织力，获得了再生的机会，就可以补上工业化和科学的课程，就可以复兴，这样的理念才能解释复兴的中国和今后世界的走向。

西方的有产者喜欢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西方的无产者倾向于某种历史阶段论。不管是不是有钱人，欧洲人都是站在欧洲特定的社会与民族的立场。我们中国是在学习先进的

思想、文化、制度等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在全世界都是和个人的立场相关的一种学问，甚至和个人身处的生存环境有关，这种东西我们拿来时也需要客观地选择适当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拿来，完全照搬。

摆脱资本主义的语境

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就是西方学者即便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也认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相对于封建时代的革命性进步。这本身没有什么错。错在他们认定其他落后地区都是封建社会，而无视这种落后只是工业化进程的落伍而非社会形态上的落后。我们如果接受西方的观点，就会掉入一个陷阱，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各个方面比其他的民族和国家都先进。

其他民族由于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就是落后的，所以遭受的奴役掠夺和屠杀就变成了“历史规律”。由于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做支撑，一切努力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不是吗？这种理论导致我们误以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理念不是先进的而是落后的东西。

西方学者所表述的社会更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更能体现弱肉强食的合理性，而家庭、宗教、道德、感情、神圣感，反而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我们中国的统治者对自己和对大众往往是两个价值系统，就是常说的内法外儒。到了资本主义这里就变成了对别人是自由主义，对自己是垄断集中。

在文明的进步上，西方人的理论显然对落后民族没有帮助。蒙古人的弓箭可以穿透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盔甲，但是蒙古人先进么？没有人会这样说。但是为什么欧洲人的火炮击穿世界所有的国家边防就变成了先进呢？所以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学人集体地陷在金融资本设置的语境之中，我们真的不能再从西方的语境之中寻找中国人的解放之路了。

有人质疑西方学者到底在为谁服务？他们的理论到底是哪些人群的指针？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在历史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他们的理论的最终受益者有可能是他们批判的那群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所有的西方学者的理论都是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文明的进步。

不把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分割开来，我们的思想就无法解放，西方学者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将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尤其是把工业革命的荣誉赋予给资产阶级。虽然他们试图推导出人类未来的路径，但是最终结果变成了假设，这一推导却得出拥有资本的阶层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先进性。最终很容易推导出西方中心论这样对其他民族完全不利的结论来。

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必然会产生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运动也不是必然产生工业革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工业革命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当今理论解释的那样是一种自然的进步进程，资本主义运动最主要的因素是追逐财富的扩张性，是一种金钱主导的游戏。

而且西方所有的理论都是只是关注欧洲一隅从而得出的结论。今天我们很多人视作金科玉律的东西，其实是少数人主要是掌握金权的豪富之人为了统治全球、影响大众信仰的表述。这些东西不是科学定律。

其实人类世界的矛盾往往主要是民族矛盾，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民族矛盾，至少不能再认为阶级矛盾是唯一矛盾。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不要说人文学科具有立场性，就

是科学也不再具有普世性。时至今日，科学技术也已经逐渐远离大众变成民族国家一级精英阶层占据人类社会获利阶层的基本手段。

当今世界，个体可能通过偶然的机遇改变命运，但是群体只能依靠本民族的力量。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民族属性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我们需要修正我们的一些基本观念，要抛弃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政治核心是看什么力量占据政权，其并无先进落后之分。

因为按照西方的理论是无从解释中国的社会历程的。中国在漫长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都一直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着的，我们的人口、经济和科技都曾遥遥领先于世界，一部分人也曾拥有巨额资本，然而中国并没有自发生成科学和工业革命。

所谓的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地促进科技进步，固然能解释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这一现象，但是怎么解释工业革命发端于历史上科学技术落后于中国的英国，而不是更为先进的中国呢？

人们常说社会需求更重要，更能推动科技的进步。但是同样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市场远远大于英国的市场。

对这一问题目前的各种解释多多少少都有问题，例如有人注重东西方思维差异，有人注重东西方科学和数学上的差异，有人注重技术与科学的相互影响。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可能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突变，和生命进化中各种生命的演变类似。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也是类似生命由各种基因遗传进化以及突变完成的，欧洲在得到东方的科技之后，在各种力量尤其是对外扩张力量的指引下，由于少数人的特殊贡献而带给了人类革命性的进步。

世界各个民族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导致以不同的模式演进，所以也不存在由低到高的若干历史阶段。

从生物的演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物种也会差异巨大。例如有的蛇向大的方向进化成为蟒，有的蛇则通过进化长出毒牙。虽然无毒蛇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和毒蛇抗争，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毒蛇更先进这样的结论，因为体内产生致命毒素是一种特殊的变异。

西方超越中国是由于工业革命，这个革命性进步导致落后的西方赶上并超过中国，而不是制度上、文化上的先进性。

我们承认西方的进步巨大，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其进步的真正原因。西方的进步伴随着改天换地的工业革命，是一种财富总量上的剧增。这本来是工业革命带给全人类的好处，但是却被误认为是金融资本的贡献，这种混淆让很多人误以为人类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除去工业革命的贡献，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富有首要的依靠依然是军事强盛和掠夺，这和以往的历史完全一致，这一点才是我们需要明了的。西方人可以说他们的制度和文化先进，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理论，而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在追赶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接受这样的理论。特别是我们在没有明确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引之下，我们就不会走得更远。

所以我们试着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四个方面做一些探讨，以唤起我们学人的反

思。

第三章 经济的发展

新中国之前

到1840年的时候，大清帝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但早已不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了。因为同期的大英帝国通过工业化和掠夺世界，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大清帝国了。更重要的是，两国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当时大清只是一个以手工业和农业为主的国家，而英国已经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化国家了。在工业规模上，两个国家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而且英国的财富集中度、财政收入都比大清帝国高许多。英国人的富有是最早进入工业化以及掠夺全世界的结果。

资料表明，中英两国的产业结构在1840年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仅仅做GDP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GDP只有在相同的产业结构下才有可比性。

大清帝国采取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来保证贵族的永久统治，这对缓解国内矛盾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策，但这个政策也导致了清朝政府的财力非常有限。和西方通商，朝廷获益并不大，利益多为买办获得。简单说就是财富分散在了民间，而民间财富对国防的帮助微乎其微。结果就是大清帝国的国防力量在大英帝国的火炮面前不堪一击。

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2.7亿两白银，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仅有4500万两白银。其时英国年度军费预算已经与大清的年度财政收入相当了。当时英国海军的规模和实力是世界其他列强的总和，所以英国殖民全球所依赖的正是其雄厚的建立在重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财力和军力。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大英帝国所伸出的试探性的一爪，中英之间当时的情势类似于中国经典故事《黔之驴》中的老虎和驴子的关系。鸦片战争不光是中国被英国人抓下一块肉来，即割让香港，更为关键的是暴露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导致西方列强像秃鹫一样蜂拥而上攫食中国。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英国本土的煤炭年产量已达到千万吨规模，其生铁年产量已达百万吨规模，钢年产量达到十万吨规模，而中国那时基本上没有重工业。

一个在致力于造枪造炮，一个在讲究穿衣吃饭，这两种产业结构几乎没有可比性。确切地说，英国开始工业化的那一刻，我们就落后了。也就是说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的GDP虽然比英国多，但近代重工业几乎是零。即便是洋务运动之后，和列强相比，中国的重工业仍然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虽然高于日本，但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了。当时的钢铁产量、铁路里程、发电量等指标，即便是比较总量，日本也均高于中国。也就是说，1840年前，清朝贵族不知道西方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1840年挨打之后，也没有下大力气发展重工业，所以历次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在此，最终导致甲午之战大败，彻底动摇了国本，从而导致大清帝国的灭亡。

而到了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执政的时候，中国依然没有建立真正的重工业。1936年是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巅峰。但是蒋介石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基本上没有发展重工业，中国各界主要是搞了见效快的轻工业。

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军工，没有军工就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就导致日寇覬覦，积弱的国防最终导致日寇全面侵华，这就是历史展现给我们的逻辑。中国人抗日所需要的枪炮，要么从其他列强那里借钱买，要么赤手空拳去夺去抢。我们的后代应该牢记共产党人的枪基本上是抢夺来的，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我们的军队就是拿着“万国牌”武器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

所以解放前中国经济领域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没有重工业，中国人又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一盘散沙加上两手空空，导致挨打，这就是解放前的中国不可能建设强大国家的关键。因此谈论经济只谈GDP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国家有没有完整、有效的工业体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再苦再难也要实现工业化的原因，这是我们领袖们高明所在，这也是我们先辈的最大贡献。

新中国前三十年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军队也是拿着“万国牌”武器去抗击联合国军的。苏联人在中国出兵并且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才开始援助中国武器。所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是用血肉之躯来抵抗美国的飞机大炮的。

1840年之后中国没有国防，这导致任何像样的建设几乎都没有可能，期间的个别机会最高统治者也没有抓住，由此中国社会进入恶性循环。近代中国需要工业化尤其是需要重工业，这一点其实是所有领袖都明白的，但就是做不到。新中国成立后，周边环境依然不稳定。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才获得了和平，才获得了建设国家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始工业化建设。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指责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建设成就的观点。很多人以人民生活那么贫困来否定我们先人们的经济成就是错误的，事实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有指责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人都是肚皮经济学者，而不是国民经济学家，因为国民经济学家必然会考虑整体和长远发展。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就是攒本钱。消费要想成为动力，需要生产能力过剩这一先决条件，所以贫困状态下依然重视消费是谈不上正确的。而增加积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事实上清朝皇帝和蒋介石都做不到。增加积累的过程有时候甚至是强制和残酷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优哉游哉地进入工业化的。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能保住自己不挨打就已经是巨大的胜利，只能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攒家当，这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吃苦的真相。

新中国一开始之所以压低全民的消费是因为要积累，是为了攒家当，这是需要中国各个阶层都作出牺牲的。而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的关键，是中共领导阶层自觉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才能引领全国人民没有怨言跟着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牺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空前绝后的。全中国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部用于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我们的先辈们在“吃饭”与“建设”之间艰难权衡，最终他们选择了建设，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这才为后人攒下家当。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这个数字表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父辈的汗水变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其中水利甚至保障了我们几十年的安稳日子，“两弹一星”更是中国的守护神。

我们是坚持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效用缓慢但是持久。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我们的发展速度比不过日本这类的出口替代型国家，甚至连“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都比我们快。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农业和国防这种基础的，诸多方面他们要依赖于别国，他们难以依靠自身保护经济成果，他们的未来缺乏后劲。

高积累是大家都懂但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这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和自觉的牺牲。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实施计划经济，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各阶层都作出牺牲才能产生中国这样的起死回生般的转变。这个奇迹靠的是先辈的血汗和付出。

现在有人用日本在1960—1976年经济数据超过中国来证明中国不如日本，数据只能说明中国和日本走了不同的路。

日本由于有二战前的工业化底子，在美国那里得到了他们的一部分中低端产业，而且是较快见效的产业，使得日本在一段时期里高速发展。很多人认为日本模式世界最好，而中国没有工业化的底子却走上彻底工业化和独立自主的道路，所以中国搞的东西不会快速见效。例如中国集全国之力量搞出的两弹一星，至今护佑着中国，这些东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见效，但是你能说没有意义？

苏联解体之后，被美国人趁机用金融手段洗劫了一把，但俄罗斯再弱，也没有任何国家敢明火执仗去抢劫它。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害怕俄国人手里的武器！这就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用途和利益所在。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历史会清晰地回答这个质疑。

资本主义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在落后的贵族政治压迫之下的选择。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没有哪个私人资本有能力控制全社会的经济，只能通过这种自由市场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来完成原始积累。当某些胜出者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优势后，开始谋求行业的独大，企图垄断一个行业。垄断这一行业的目的恰恰是要对这一行业实行计划，提高效率，获取更大的资本利益和资本实力。金融资本最理想的规划是争取到国家层面来实行资本的垄断，从而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实施有计划的管理。只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市场自由竞争之后，计划经济这个梦想在西方依然没有实现。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全面的工业化。政权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共能集全国之力优先完成最重要的项目。中国人用生命和鲜血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而获得苏联支持，得到了重工业的底子。随后第一代领导人又着重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从而获得了国防保障。而和美国握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其进行化肥工业和军事合作。由此可见什么是重点，我们的领袖们一清二楚。

新中国前三十年最辉煌的成就是全民勒紧腰带，攒下了工业化的基础。由于有了农业、重工业和国防的支撑，所以才能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发展轻工业，随之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屋建瓴来搞经济建设，正可谓“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国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思路就必须采取跃进方式。经济运作模式要跳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跨过资本集中过程的低层次阶段，靠的是国家组织下的计划经济。发展、实行计划经济，使得新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都实现了大资本运作。中央全面统筹，长远规划，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计划，随之全面落实和实施，这是何等的效率？这种效率让西方的金融资本家们羡慕嫉妒恨，是他们梦寐以求但达不到的境界。

金融资本终究要受制于众多其他资本私利的制约，著名的洛克菲勒石油集团被其他资本联手拆散就是证明。在国家层面，他们的国策也是深受各个财团个体利益的掣肘。美国人在肯尼迪时代曾经试图集中全国之力搞科研和经济，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到了里根时代又开始搞自由主义。今天，美国人又开始试图加强国家权力。

中美博弈

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随后的蜜月期很短，因为随着苏联快速疲软，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幅降低。苏联解体后，美国一些势力迫不及待地在中国制造混乱，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坚持从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中国。

而中国为了打破僵局，进一步实行开放，开始积极寻求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举动颇有吸引力，因为巨大的人口和市场使中国成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理想投资市场。于是就形成了当今中国和美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这一博弈的胜负在今天还没有见分晓。

改革开放给了美国某些势力再一次颠覆中国的幻想。但是他们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中国始终有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宗旨、目标都不是金钱。这个党掌握着军队，领导着政府，美国某些势力可以收买个别人，但不可能收买整个党，所以也不可能控制中国。在中国政权大于金权，这让他们无从下手。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人也希望中国走向“自由”经济之路，力促中国政府推行一蹴而就的经济改革，即实施著名的“休克疗法”，由于中国人不理睬而只得作罢。美国又决定先把中国人引到自家的规则圈里再说，于是有条件地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事实上处于类似给西方打工的角色。在美国规划的金字塔式国际结构中，中国居于第三等，既对美国没有威胁，同时又不是没有用处，于是中美经济捆绑在了一起。

中美这次较量是人类历史上最诡异的博弈。美国人想的是将中国引入到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来，一边做生意一边扶持买办进行渗透，从而以较为和平的方式，用较小的代价达到控制中国经济、实现资本在中国予取予求的目标。而中国的打算应该是和世界通商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建设步伐，于是中美经济拥抱在了一起。

中国人表现出的合作意向，导致美国人不能拒绝，中国巨量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曾经激发出美国商人无限的梦想。欧美政客无法阻止中国入世，因为他们不敢挡住金主们的财路，但是依然咬住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松口，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入世之后，按照美国人的设想，是把中国变成世界生产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目的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从汽车到手机等欧美商品的生产成本。中国也认可这样的设计。两大国各怀心思走到了一起。

中国人经过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赶了上来，二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瞠目结舌，经济发展可谓天翻地覆。原本金融资本设定的是中国应该出口原材料，结果却是中国在全世界采购原材料。原本他们设定的是中国的市场上会铺满西方的产品，结果是中国的商品铺满了全世界。

这时候美国人还发现中国的触角已经伸到欧美视作禁裔的地区和领域，原本只被视为沃尔玛等美国跨国公司廉价劳动力来源的中国，在世界眼中似乎变成了一个吞噬巨量原油、铁矿砂、铜等原材料的怪兽，美国人意识到中国的未来无可估量。

有人形容说世界经济发展有两个火车头，美国是在前面拉，中国是在后面推，现在是推的速度大于拉的速度，所以中间的国家受到挤压就会变得很不舒服。美国人的速度慢下

来，美国也会受到挤压，所以美国也变得不舒服了。

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结果是在中国领导人的预料之中的，因为这种智慧的关键是认清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的区别。对犹太人而言黄金和钻石是财富，但对中共而言完整的工业化才是财富。这种智慧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思想家管仲的头脑中就有。欧美财富控制在个人手中，而个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使得我们和西方人做买卖的时候不至于产生颠覆性失误。全世界人都忘了，中国人才是市场经济的老手，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并存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也是最务实的，中国人的勤劳和忍耐的品质里，潜藏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目前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已形成了捆绑之势。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类似于拳击台上处于弱势一方的一种拥抱战术。中国和美国很多领域已经处于同一阵营了，这使得美国打压中国的时候总是有所忌惮。

人类的财富要么靠抢，要么靠生产、贸易，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是靠着冒死的勇敢，开拓美洲是靠着杀人。我们中国没有向外扩张这样的机会和作为，而且在近代被人打败了，想翻身只有自苦一条路，这条路现在已经证明是可以走通的。我们的先辈很对得起我们，留给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国土和强大的组织力，我们需要接过这个担子，为我们的后辈积累更多的财富和希望，在中美博弈中胜出。

如何看待这三十多年

中国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利益驱动和利益分配。

其中关键是党和政府将利益集中到自己手里面，干什么了？如果被一部分人私分，那就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是集中全国之力做个体企业不能实施的建设，那就是正确之举。

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是没有疑问的，第一代领袖们做到的比老百姓期望的还要多。但是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大众没有办法搞清楚这利益到底是怎么分配的，于是倾向于大众公平受益的声音就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往往会引发共鸣。

关于积累还是分配的问题，新中国最著名的案例是勒紧裤腰带也要上“两弹一星”。当年在要不要上这些项目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的，好在我们的领袖们宁可自苦也要上马。最终两弹一星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今天我们都同意当年的决策是英明之举。如果连这一点都要否认，那只能是立场问题了。

很多人把当下官员个人的贪腐与共产党的利益问题混为一谈，质疑中共的领导否定改革，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提请所有的批评者注意我们民族最终的目标，要知道，中国如果没有外敌，那么大众的眼前利益就是最高的，如果强敌环伺，那么长期的胜利就是最重要的，为了最终胜利牺牲当下的利益，就无可指责。

很多人对追逐利益深恶痛绝，这不免失之偏颇了，事实上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世界的主要诉求之一，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只追求精神享受而不在意或者愿意牺牲物质享受，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怀，在多数情况下是属于小众范畴的。支撑我们中国人创业的胆气恰恰源自我们民族的英雄们，构成我们逐利的底气也是源自我们先辈们的英勇牺牲。中国人可能会接受金钱的诱惑和驱使，但是整个民族是不会跪下的，最终我们会发现趋利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应用的好也是能改造世界的。

当下有人指责我们出卖资源、超负荷工作、吃亏上当，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还是没有真正搞明白事理。出卖资源是因为我们没有本钱，超强度的工作是为了摆脱贫困，吃亏上当也是学会与世界特别是与欧美打交道所必需的代价。我们致力于产业经济的发展，这如果导致西方世界的去工业化，那么一切付出都是极具价值的。

我们知道，全球化的规则是欧美设定的，加不加入全球一体化，适应规则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选择加入就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没有任何资本只有出卖劳动力，还有就是资源。出卖资源如同卖血，没有人会不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卖血呢？就是为了资本积累。俄罗斯直到今天还是在卖资源，你以为它愿意啊。全世界工业化道路完全有可能是排他性游戏，赢者为王，属于不想玩也得玩的游戏！

我们用了短短六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显示了中国有着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特殊的优势。西方金融资本有着天生的缺陷，就是它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它只能凭借与政权合作一起分利。私企效率极高，但是整个社会效率低下，这是很多歌颂自由经济的人罔顾的事实。而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体现在整体竞争上，这就是中国能够胜出的关键所在。

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对未来较为悲观的观点，我们对此毫不讳言。当我们试图证明未

来是光明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报喜不报忧。

有人对国家统计局的报喜数据表示怀疑，这是对统计学的误解。事实上，统计数据只能反映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在宏观意义上已经考虑到了多数人能够意识到的问题，最终加权得出有参考意义的情报。

世界上没有只赚不赔的生意，任何改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的党在转化角色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好领头人和管理者的角色变化，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我们存在很多问题，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上处于被动位置，这是不可思议的失误。我们的优势本来是集中，结果一窝蜂各顾各，导致中国商业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是沉重的教训。

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论做买卖我们和西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为了不吃大亏，我们实际上将自己和美国人进行了捆绑，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危险的平衡。我们韬光养晦是为了不被视为敌人，但是有那么一个阶段，军人们也加入赚钱的行列，军工科研一些重要的项目出现了停滞，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差一点自毁长城。

当下最多的指责是说中国人精神价值观丧失和道德水准低下，我们依然不能认同。这种指责背后的心态其实是将崇高视作正常，伟大视作平常的缘故。没错，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是靠着不怕牺牲的强大精神力量战胜敌人的，我们在积重难返的状态下是靠着无私奉献来渡过难关的，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和牺牲才实现了不可思议的逆转。但是前人的牺牲是为了让后人过上好日子，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先烈们的理想所在。和平对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是个奢侈的东西，到今天已经成了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今日正在全面实现工业化，正在壮大，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未来全体人民也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这些进步是需要肯定的。

西方领先于中国的并不是什么道德和精神，而只是科技和工业。中国的国本是众多的工业化人口，是广大的国土，是有效的组织，是军备国防，是西方人有什么中国也会有什么的能力。我们在实体经济的大多数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存在，所以我们无需悲观，不是么？

未来的几十年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韬光养晦之后，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跟庄”，往往会觉得出头不好，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当第一的好处讲出来。要知道第一可不是虚名，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科院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称，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万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

在人类历史上，通常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的货币会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世界头号经济体和产品出口国(虽然只是手工业)，所以当中国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时候，白银就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贵金属中有三分之一都流向了中国的白银，他们是拿白银来换取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药材等产品。后来英国人没钱了，就想出大规模贩卖鸦片的招数，中国政府予以反击，在虎门销烟，断绝了英法贸易的财路就引发了战争，英法用大炮打败了中国，把钱又抢了回去，这就是近代史的真相。

未来可以预计，中国只要不内乱、不分裂、不战败，人民币的地位会逐渐提高，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任重道远

其实在一些产业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消耗了全球铁矿、煤炭、石灰石、铝、铜等主要原料的一半，石油、天然气的四分之一，这是真正的财富标志。中国的GDP在最低的时候只是美国两百分之一，目前已经是美国的一半左右，这样的数据最能说明我们追赶的速度有多快。中国正在稳步地前进，这是多数人都承认的事实，不过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经历了上百年的努力，美国GDP超过日不落的英帝国之后，依然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才真正成为经济霸主。中国现在GDP刚刚达到世界第二，要赶上和超过美国还要很多年，中国要崛起还需走很长的路。

今天中国的重工业几乎占全球的一半，这就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中国国力的真正体现。由于我们的重工业比重最大，所以我们国家的能耗自然最大，于是便有“全球变暖”论。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十多年未呈现变暖趋势了，但媒体的控制者却对公众隐瞒了这一信息，我们不能接受这类观点，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阻断我们的前进脚步。

城镇化

未来十年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似乎是推行城镇化。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指责中国的工业化，批评城镇化。为此我们需要强调，城镇化是个中性的概念，它只是一种较长时间里的趋势而已。

但是城镇化绝对不能人为地加速，不要惦记着试图通过推行城镇化大捞一笔，这种只顾自己个人获利的想法是绝对错误和短视的。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自然的过程，国家的任务是加强规划和管理，让城镇化变成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城镇化就是政府出面帮助农民走向集中，实现规模效益，这样就会产生需求，我们的工业品就会有市场，农民就能更多地享受到工业化的好处。当然城镇化进程切不可揠苗助长。

西方殖民者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靠直接掠夺获得原始的资本，但是也有特殊的不同以往历史的因素，那就是他们同时还实现了工业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从地球上获取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加，全社会总的财富在这几百年里是大大增加了，这是与蒙古铁骑当年掠夺世界不一样的地方。西方通过工业化获得巨量的财富，人类财富总量增加巨大，才支持了欧美国家人民的物质享受。这也是欧美不承认自己的成就来自于掠夺和侵略的主因，他们认为自己给全球带来了科技进步，这个过程是人类财富总量剧增的过程。

中国人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种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过去那种一味依靠欧美市场的发展模式，会引发我们与欧美之间很大的冲突，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的市场就成了最重要的富源。所以我们未来的出路是扩大内需。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民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范畴，无论从市场开拓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应该进行城镇化建设的。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事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很多土地撂荒，这也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想办法解决的。

城镇化建设在我们积累了工业化的资本之后才有能力和可能。我们认为城镇化建设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其中以不能减少耕地和粮食产量为根本性的原则。农村的耕地是我们的国本，是全中国人的饭碗，谁也不可以把我们十几亿人的口粮给弄没了，要知道农业是我们最重要的拳头。

两个拳头都要硬

我们这些年总能听到唱衰中国的声音，“中国崩溃论”就是一首反复唱了十几年的老歌。事实上中国不但不会崩溃，反而会持续稳健地前进，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

唱衰中国的人往往以西方经济学的定理和资本主义的周期律来预言中国，用这样的周期律来判断中国必然不准确。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落后，如果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崩溃。还有一些人是在准备做空中国，为了投机炒作而做出的宣传。

我们未来的问题很多，但是抓住重点我们才能稳步前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抓好农业和国防。

有人说农业比核武器威力还强大，美国掌控世界的武器，根本不是核武器，而是农产品。这个观点很有道理。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仓，美国的农产品是全球成本最低的，所以美国总统可以向全世界推销廉价的农产品。但要是因此认为美国人会永远低价提供这种产品，那可就是太天真了。美国人的办法很简单实用，那就是先以低价占领世界市场，击垮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最终垄断世界粮食市场。要是真让美国人做到了这一点，那一天就是真正的美国说了算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中国人有两个拳头，一个是国防，一个是农业，两手都要硬，这是我们的底线，我国必须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有了这个保障，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这种思路看似保守其实是智慧，中华五千年的智慧告诉我们，在不确定的领域保守一些反而更好。

保守也是一种智慧

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货币经济学，而货币经济学并没有太多的科学性。这些年世界经济最诡异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到底谁赢谁输目前没有定论。最大的可能是美国本来想像对待拉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那样对待中国，也就是先养后杀，只是由于中国政治军事的底气导致美国人宰杀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一定是大大获得了金钱利益，否则，以美国政客、商人的行事方式早就和中国翻脸了。有人说目前中美的状态是恐怖平衡，变成了僵持状态。

在经济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保守也是正确的做法。最成熟的做法是把最坏的情况提前想清楚，并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

谁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掌控经济发展的走向。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彻底搞清楚经济运行的规律。永远不会清楚，这一点反而是真理，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在这个领域，只能说保守的智慧远高于冒险。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超过了自己的前辈们，他们虽然历尽艰辛，但却用汗水夯实了我们民族进步的基石。我们这几十年来没有出大问题，正是由于先人们打下的基础足够牢固，才保障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厦没有倒塌。

目前世界经济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尽管国际市场上金价、银价、铜价、铁价，以及石油、粮食价格都在大涨，美国又加印了那么多新钞票，但美国自家市场上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物价都在大涨，以致有的地方甚至经济濒临破产、政局动荡，而美国却能够风平浪静，这难道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吗？

当年中国和美国在入关问题上就在互相博弈，这是美国非常熟悉的领域。美国先放开一部分市场让中国人赚钱，先给点甜头，但是赚到的钱让你花不出去，因为中国真正想要的东西，如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美国人不卖给中国人。赚到的钱拿在手里又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中国不得已又把钱借给美国。

这一状况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当前最不能掉以轻心的大事。当年蒋介石统治集团迅速垮台，除了军事失败的原因，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彻底丧失民心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治理通货膨胀上有着很好的经验和手段，所以面对未来可能继续发展的通胀形势，国家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对策都应当有所调整。现在就应当研究制订必要的应急应变措施，包括管控物价、统购统销等等措施，以保证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品供应等应急方案，这些方案都有必要制定出具体的预案，以免将来一旦有变时应对不及。我们要居安思危，从最坏处着眼，防患于未然。

中国的手们处心积虑，他们最可能利用物价、腐败等关系到大众生活水平的问题，把矛头指向中国政治体制，煽动变乱，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危险主要在金融领域。国际金融资本主要将在汇率价格的博弈，期货、证券市场的金融衍生品价格博弈，以及误导中国的经济政策等三个方面对中国下手。我们面对的是金融资本这种千年老妖，面对的是大摩、高盛、美林等玩金融的顶级高手。而且他们可以灵活处置，我们则船大难掉头。当我们沾沾自喜于国内GDP的增长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中国

金融有突然崩溃的危险。

通胀对我们绝非好事。我们如此被动，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这就让我们的对手有机可乘。而且通胀使国家难以把资金有计划地投入并加强国家基础工业，难以用于科研创新和加强国防，这都是对我们基础的削弱。

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也要绝对慎重。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是危机当中的防火墙，这堵墙越厚就越能在危机中保护中国的财富不被掠夺。人民币的国际化要等时机，要回避风险，不要急于求成。现在世界的潮流绝不是贸易自由化，而是保护主义急剧抬头，中国在这个危急的时候自我保护很重要。目前中国最危险的和最脆弱的地方就是金融和货币领域。

货币问题

我们需要重点讨论一下货币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采取和美元挂钩的设计，美国人之所以同意，也是基于经济自信。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能够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很高的发展速度，他们总是认为在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中国经济发展会慢下来甚至崩溃，这种期盼和对自家经济的自负，也将导致美国人的误判。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前三十年打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我们的第一代领袖们带领人民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攒下了家当，有了这个本钱才使得我们在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中没有太受伤。

在金融货币这个领域，我们应该保守而不是激进、自作聪明。我们应该逐步恢复到先辈和祖宗的智慧那里，也就是采取以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关系国民经济重大命脉的基础产品为基准的货币形式。

人类发明了货币，但是货币的作用以及管控机理依然不明晰。货币的发行规则依然是件令人不解的事情，这一点甚至连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完全搞明白。目前经济学领域大致上有三大派别：一派是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不应该干涉经济活动；一派是计划经济，认为国家应该完全控制经济活动；一派是国家有限干涉经济。目前中国和美国都是采取国家有限干涉经济的做法。不同的是，美国脱胎于自由经济，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

中国经济超越常规的发展，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少数金主们掠夺世界财富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西方的金融资本人为地制造动乱，未来金融资本集团最有可能在金融领域洗劫中国。这个领域是我们的短板，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经济学是什么

很多天赋很高的人将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却没有注意经济学，经济学只是一种基于特定立场的管理行为和决策。即便是这几十年来，很多人试图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规律，依然由于样本数量的限制而无法准确把握未来的趋势，其中时间样本不够长是主因。因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模式的时间太短，这一点点样本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表现出确定的规律性，更何况经济活动主要是人为操纵。

经济这个游戏往往没有什么绝对的规则和规律，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才是真正的规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生存空间等条件的不同，其发展肯定不能按照一个模式运行。大国和小国不同，大国之间也不尽相同，其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共同点，所以用某个数学模型来表述经济活动是很有局限的。

美国虽然推崇市场经济，但忍不住总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冲动；而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虽起到暂时性亢奋的作用，最终却压制了经济活动的主动性。计划经济良好运转所需的较高条件苏联人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不是拿着枪指着别人的脑袋就能干好的事情。世界大国都在努力摸索出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各种探索都是处于不可预知的路径中。令世人惊异的是，计划经济对中国的正面作用远远大于前苏联，这是由于中国社会和人民本来就充满活力，中国人搞市场经济几千年，保持着原始的获利冲动。只是近代挨打落伍，失去工业化的机会，形成恶性循环。而补齐了工业化这一基本条件之后的中国，以计划经济的高屋建瓴优势重返世界市场的时候，中国巨大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未来中国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简直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我们完全可以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逐渐降低计划经济的比例，但是必须一直保持计划经济的指导地位，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优势。

我们目前是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取巧能够解决的。我们的道路都是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中国除了发展重工业之外没有第二条路能走通。没有前三十年的重工业基础，我们连最初给西方打工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什么跨越式发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全方位的进步，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伟业，过去六十多年的道路证明，这条道路毫无疑问是对的。

北大著名的经济史教授陈岱孙先生认为，真正的经济学是经世济民，而不是西方的货币学。所以在这个最不确定的领域里，我们有这样几个建议：

第一是最好不赌国运，除非迫不得已之时。中国人常说人定胜天，讲究的就是一个定字。无论是国运还是个体的命运，都不能拿来赌博。因为赌博的胜率小于一半，所以久赌是必输的。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赌博输了，美国的历史太短，无法明白这个道理。中国的历史足够长，经历过无数次兴衰，所以知道这一点。对大国而言，不赌反而赢得更多。

第二点是未来中国的经济理论应该跳出西方人设置的语境，多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指引。生产要素由人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等构建而成。人类的生产系统起码应该包含生产组织者、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劳动者四个子系统，我们现在要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整体设计和进步。

第三点，经济学不是科学。面对一次次的金融危机，没有哪一次西方的经济学家发布过准确的预警信号。经济学家们制造出深奥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说他们掌握的是科学，然而

真正面临全球经济危机这滔天洪水的时候，他们集体地漏了馅儿。

经济学不是科学，是因为科学主要应用在没有时间轴的事物上，而在时间起着决定作用的领域，最高的学问依然是哲学，最高的智慧依然是道德。科学的进步起始于物理、化学，随后一些人试图把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测上，但是由于生命和社会发展的不可重复性，导致这些领域处在科学的范畴之外。

商业更多是一种赌博，谁也不能保证经营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盈利的。这一千年来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导致中国的皇帝们从来不鼓励经商，基于保护后代的出发点，他们也不准许皇子们经商。这种智慧西方人并不具备，他们最大的国王也不过是诸侯级别。在欧洲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剧烈的族群竞争之中，没有哪个小贵族能拒绝商业利益和金钱的诱惑。

而中国人是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才得出的诸多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非科学的领域里，中国人的智慧是历史赋予的。中国基因层面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通过胼手胝足的辛苦劳作、补齐工业化的短板之后，通过再次引进市场的力量，就形成了强强互补。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能持续高速发展的秘密所在，巨大的进步和成绩也让我们坚信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之路是没有错的。

第四章 政治的先进

谁统治着美国

如果我们问，中美两国谁的政治制度先进？一些人会立刻血脉贲张起来，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美国政治体制最先进。这种观点被很多人认同，其实这是美国金融资本控制了世界多数媒体的缘故。

美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其民主政治体制，这个制度是由普选而产生的议员，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以及全国选举产生的总统来管理国家。但是，美国政治相对于欧洲贵族政治也只是进步了那么一小点。

熟悉美国的人大概都会承认，整个美国就是一家股份非常分散的大公司，政府是经理班子，是为着掌控这家公司的股东、主要是为大股东们的利益服务的。美国国会的议员，类似于美利坚公司的董事会。美国总统就是这个美利坚公司的总经理。每次大选，实际上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大股东在争夺这个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决定这个公司下一个时间段的走向的投票。然而这一切依然只是表象。

对试图研究欧美政治的学者来说，挖掘出隐藏在美国政府背后并且真正控制着美国的力量才是最让人感兴趣的成果。这个领域的最关键问题，就是谁真正统治着美国？

从选举和罢免的角度看，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就是美国的民主选举游戏中选民只有选举权，没有罢免权，而美国大老板是真正拥有罢免权的人。我们会认可这样的观点，就是谁能罢免美国的总统谁才是美国的统治者，知道谁有罢免总统的权力和能力，才是理解美国政治的关键。

另外，美国有独立于政府的媒体和智库。多数人不知道，这是因为美国媒体和智库不拿政府的钱，而是为出钱的财团服务，就是说媒体和智库是和美国政府一个级别。

有研究表明，美国政治是金融僭主世袭体制，或者说是金融封建制度，美国总统只是些大老板手下的总经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频繁更换总统依然超级稳定的原因所在，因为美国有高于美国政府的某种力量存在。

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可事实上，人的理性是限制在自己明了的事物范畴之内的，人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谈不上理性的。政治家的最主要工作本来是把握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在实际情况中，长期利益的直接反对者恰恰是多数人。把政治变成游戏，失去的恰恰就是长期利益，最终全社会是要吃苦头的。

民主是否可以消除腐败？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小布什、切尼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可以驱使军队和媒体这些国家机器为大公司牟利而不受任何惩罚，算不算是腐败？

关于美国言论自由，其实美国在二战之后从来没有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美国人是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和导向的，这不是人们理解的自信与不自信的问题，而是因为管控意识形态是管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领域放任自流是不负责任的标志而不是先进性，因为大众中的很多人是缺少判断力的，是随着舆论导向来辨别是非的。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中，所有的非西方国家只要采用多党制和选票制度就没有成功的，世界各国引进美式民主这颗种子在非西方的土地上都结出了苦果。这说明西方制度背后所拥有的力量平衡和协调机制是非常特殊的。

美国领先世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达到过美国的一半以上，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日本，在他们最辉煌的时候也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美国已经将产业经济转变成了虚拟经济，当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产业出现空心化趋势。这个趋势导致美国出现危机，面对这个危机美国怎么解决？现在美国还能回到原来的产业经济上吗？这是问题的关键。

美国在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都领先于世界。支撑美国科技领先的是经济，支撑美国经济的是军事领先，支撑美国军事领先的也是经济。当美国的经济不支撑军事，军事的绝对优势就会削弱，军事优势的削弱就意味着红利减少，红利减少就会影响军事和科技的投资，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这个趋势和美国的各种优势无关，要知道美国今日各种优势都是建立在良性循环上的。一旦良性循环变成恶性循环，美国国内矛盾就会激化。过去美国多次用战争将国内矛盾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未来的关键在于这一招还能不能奏效。

人类社会尚未找到一种通用的方式来保障社会的进步，相反所有的努力和尝试都是双刃剑。政治的核心就是财富的分配，经济的核心就是财富的增加，军事的核心就是保护或是掠夺外部的财富，文化的核心就是财富的享用。

美国的问题是财富过度集中，我们知道美国实际上是最早移民美国的数百万地主的国家，这些人是美国的基础和真正的主人。但是这二百年来，美国一直是成长着的，所以后来者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至少美国梦就是表示总会有人能进入富豪的圈子，这种机会和努力使美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美国最具特色的橄榄形社会。但是随着美国的经济逐渐向金融经济转化，财富快速向少数的人手里集中，又一次暴露了美国是少数人的美国。

多元社会结构与妥协传统

西方社会至少可分为五元：有钱人、君王、教会、贵族、市民。他们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所以妥协就成了习惯和必须。

欧美这样一种多元的社会，是西方特有的，与此相匹配的是议会政制。这个传统很久了，至少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多元社会的妥协传统导致多党制得以在欧美实行。

西方政治发明“宪法”和“宪政”，本身就是多元政治势力之间妥协的产物，就需要一个商量和讨论的机制。诸侯林立的西方世界，打来打去，没有一个君王、贵族、教皇或市民能将西方社会统一起来，最后只有大家妥协，要不然这日子没法子过。这也是资金最终能控制社会各方力量，或者叫金主能引导各种力量向着赚钱的方向猛跑的主因。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存在一个超然于政权的金融资本财团，他们搞了一个平衡各种力量，把难以完全控制的各种力量限制在一个确定的框架内的体系。欧美之所以能做到换个总统不影响社会大局，因为有高于总统的力量稳定着局面。而在非欧美的其他的二元社会里，民主选举就变成了权力斗争，很容易演变成动荡和分裂。这道理不难明白，所以我们强调制度不是文字功夫而是各种力量的制衡。

制度

美国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一群相互独立的殖民者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形成的一种较为自觉的组织，这个组织一定设置了较为清晰的利益分配方案。而广袤无垠的美洲大陆给殖民者提供了无限的可以扩展的空间，所以殖民者内部的矛盾从来没有激化过。所以在美洲一开始几乎没有政府，各级政府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主要是起着仲裁者的作用。

美国底气来自美国的富有，但是美国的富有源自美洲辽阔的土地，来自工业和科技进步，来自殖民掠夺和战争。

民主和富裕是不相关的两个系统。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是相同的，例如掠夺、贩奴、贩毒、矿产、石油、商路或航路上的要地等等。

综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民主体制在应付战争、经济、自然灾害的时候问题很多，往往力不从心，而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选票政治之下更是遇到极大阻力。

也许可以这样讲，民主体制只是刹车系统，而不是动力系统。西方民主制度所选举产生的政客需要立刻兑现自己的承诺，所以不可能拥有长期思考、策划和持久地朝着确定方向努力的能力。落后国家的人民要的不是两个坏蛋中选一个不是最坏的政客，而是能够带领人民进步的领袖，这个领袖要能够给人民带来长久的福利，长期的福祉比选票重要。

民主是一种人为设定的理想状态，需要很多条件来支撑。多数人的意志中不可能有长期利益，而人类社会的竞争已经到了国家层面，国家层面的竞争只能是看哪个国家更具有长期战略以及实施长期战略的能力。所以美国在全力向外国推广民主的同时，也致力于加强自己国家的权力。

什么样的制度是一个好制度，让大家都叫好。好制度在哪里呢？英国人是君主立宪制，美国人是两党轮流制，英美都不一样，是不是两个都是好制度呢？

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好制度是怎么来的。我们说人类的一切发展都是各种力量角逐的结果，制度更是如此。制度就像靴子，是不是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常说每个国家的人口、地理、历史都有差异，地球上没有相同的两个国家，更不会有哪个国家的靴子百分之百地适合中国，因为这世界只有我们一个现存的中华文明古国，也没有人有资格规定我们穿什么样的鞋子。穿鞋子是要走路的，走什么样的路对中国这样的块头来说，是生死大事。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属于底线，是不可触碰的。

复兴途中的中国人会逐渐恢复自信，这种自信源自我们的近现代史能够逆转，也源自我们的古老的历史。

从商鞅的分家单过，到汉武帝的推恩令，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谓是历练千年了。什么能凝聚力量，什么会削弱力量，那是了若指掌，中国人两千年里研究的就是这个。西方人对自然的理解比我们强了几百年，但是要论对人性的研究，我们中国人才是最透彻的。

今日中国的政府正起着组织全民族力量的作用，成为经济和工业化进程中落后的中国逆转和复兴事业的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我们应该自信能产生复兴的力量就表明中国有远比欧美先进的政治制度。

西方人的历史太短，所以没有办法沉淀出我们这种制度。在他们的历史上，权力从来是恶势力，所以资本家占据上风之后一直试图限制权力。我们中国人认为权力是为大众利益服务的，甚至连古代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实也受到特殊的约束，这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探索过这个问题，最终用五百年的战争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国政治制度保持了两千多年。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补齐了这个制度的最后一块短板，形成权力与大众之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组织结构。

这三十年来简直就是以否定的方式在验证这个制度，参照系分别是西方制度、苏联解体、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选举实践。世界政治舞台上演了各式各样的戏剧，最终证明了我们现在的“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的先进性。

这种体制的先进性证明案例，是在中共十八大新老交替之际，发生了中日钓鱼岛之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班制度是可以经受突发事件考验的，这种制度是无缝衔接，其政策的连续性并不随着领导人的更替发生重大变化。什么是重点，什么是关键，都是有预案的，这让我们很欣慰。

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在中国早就预演过了。平等的思想早已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心里，自由民主的狂欢之后的一地鸡毛也使得中国人早就逆反了这种无序的游戏。说到人权，什么样的人权比得过生存发展和享受劳动成果更有吸引力呢？

中国梦是靠着鲜血、汗水和眼泪滋养大的，这种艰苦吓坏了很多人，这种艰苦也吓跑了一些人，于是这些人想方设法跑出国。但那些出国去寻找民主自由的人们最终会发现，人家白人的家园怎么会是你的天堂？所以我们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美国人是如此理直气壮地宣称，要让中国人实行民主。那我们就问，是不是美国人感觉我们太落后，所以要帮助我们？那为啥不卖给我们一点先进的技术啊？中国人多，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是移民的大门从来对中国人是关着的。而且，为什么我们花钱从美国买任何好东西都得不到，而美国人却免费甚至自己花钱也要给中国推广所谓的民主呢？

“一个人的美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这个英国谚语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前面说过，欧洲的进步类似于毒蛇进化出毒牙，他们自身有了抗毒的能力，但是美式民主对其他民族却有可能真是毒药。想想看，大约几百万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构成了美国的基本盘，而我们中国是几个亿的没有任何优势的农民构成了我们的基本盘。如何可以相提并论？

我们其实可以设想一下，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这种看上去充满良知与正义的东西，往往导致政治家的短视，而这是致命的。一个国家和民族落后的时候，最需要的是积累和艰苦的劳作。但是这些所谓民选的政治家们能这么做么？他们为了得到选票，只能做一些分配上的调整，迎合一些人的短期利益，这种调整会暂时缓解一下社会矛盾，但是却不可能促进积累。没有积累怎么能让社会财富极大的增加，所以民选这个政治游戏所产生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跨越式进步的。

中国国情完全和美国不同，这一点我们过去说过，但是声音太小。声音太小的原因是我们底气不足，今后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来。而且未来世界不再是美国一家主导的世界，一定会是一个多极的世界。

建立多极世界

中美最大的不同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西方人的历史很短，他们能记住的历史只有几百年。所以西方人认可《圣经》里的“马太效应”，认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中国人见过太多的兴亡交替，知道物壮则老，知道强盛之后就是衰败。所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常常是视自家内部的不利因素为自己的敌人，而美国人总是在外部的世界寻找潜在的敌人。

历史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将美国视作最大的敌人。这是因为中美不接壤，而美国以市场经济立国，没有过多占领土地的欲望，相比其他的帝国主义，美国不是最坏的。而美国人多数时间里也不把一个积弱的中国视作敌人，有时候还扶持中国来抗衡其他列强，所以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这本是中国为了保全领土的不得已措施，却导致美国误判。于是两国在朝鲜半岛上大打出手，从此中国军队成为美国的可怕对手。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中美再次握手，美国的矛头重点指向前苏联，这大概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垮台后美国环视全球，发现中国大概是唯一一个潜在的敌人。

中国真的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的敌人是美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美国以金融和军事手段掠夺世界，导致世界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无助、绝望的情绪弥漫于非西方世界。这几十年美国制造了大量的冲突，所以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仇恨，导致一些人走向极端。

我们会注意到个体抗争资本集团的路途之艰难和微效。不能把人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而是靠个人英雄改变世界的努力总是那么悲怆。但是他们的牺牲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未来的走向。他们的行动证明了手无寸铁的人们并非没有办法抗争。中国人早就说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试图灭绝种族的暗黑势力，灭绝弱者必然会带来同归于尽的结果。

这是一个五彩的世界，但是我们愿意把它归为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激烈竞争，但我们祝愿人类有同一个梦想。中国五千年历史所传承下来的主流价值观是大同，是“和”与“合”，是避免社会分裂，是带领人类走向和谐共生的大同世界。

经历过五千年磨难的中国人早就找到了与其他民族相处的方式，这是我们倡导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让地球多元共存既是真诚的也是明智的。我们中国的平稳也是世界的福音。

告别革命

今日中国人能拿美国作为自己的参照系本身就是我们高速进步的最佳证明。

对生命延续的渴求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主体，然而我们深深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还有一种超越。这种超越在多数时期可能是少数人拥有的，但是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变成了全民族的共识，那就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人民可以付出所有。中华民族复兴路上铺满着先辈们的尸骨，把中国各种力量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是鲜血、眼泪和汗水。任何文字和语言都不能对等地表述这巨大的牺牲。

辛亥革命之后曾经尝试着搞议会，可是军阀们不干；军阀们搞内战，谁也搞不过谁；于是搞新党，两党合作没有几天又分裂了，同志转眼举起屠刀；外寇来了，蒋介石获得了所有的支持还是打不过日寇，靠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才赢得抗战胜利，然而蒋介石集团最终还是被人民抛弃了，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执政不是中国人用选票选出的，而是千万人用鲜血和生命选择的。但是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不再革命，建设中国，实现民族复兴。

不是所有的革命都值得赞美。我们赞美革命是因为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革命，在激烈的斗争中并没有演化成残酷无情的肉体消灭，而是结出了最美好的果实。

当今中国最奇特的怪相，是最先获利的一些人热衷于中国社会变动，而生活在基层的人们反而在主动维护目前这个体制。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中国要想稳步发展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组织起来，靠着全社会的力量方能反抗资本主义势力，才能逆转和复兴，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社会主义就是全社会的集体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有疑问么？这六十多年的正反经验多次表明：中国的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是最漫长的道路，也是最难走的道路。因为它不光是需要集体主义基因，而且对领袖集团要求极高：没有利益作为动力和润滑剂，推动社会前行的就只能是鲜血和汗水，就只能靠着牺牲自我，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结出甜蜜果实的真正原因。因为它要求领袖集团强悍有力而又高尚还要无私。

在人类各种理想中，均贫富是一种最难实现的理想，阶段性的强制性均等也可能对社会活力带来伤害，人类只不过是在压迫和剥削两害间取其轻而已。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走通了最难走通的社会主义道路呢？我们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者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显然所有人都忽视了中国传统中有集体主义基因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伟大的尝试，设计过很多分权的方案，做过共建中国的努力。然而各种力量并不是简单地、无私地扶持就能迅速长大。目前中共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状。很多人指责这种体制，孰不知，这其实是我们拥有的一种巨大的体制优势。

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些年的较量不是实力相近的选手之间的博弈，而是中国在追赶美国。领先者能被追赶者拉近距离，就说明追赶者是有优势的，而且这种优势甚至是领先者所不具备的。这是我们没有必要全面学习美国的原因和底气。丢了自己的根本就是丢弃自己的优势，邯郸学步是永远追不上西方人的。

中国最明显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举国体制，美国政客说服股东们做长期投资是很艰难的事情，而我们只要决议通过就能决策实施。这种效率在追赶的时候是起着绝对作用的。

中国这六十余年来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并非完全是后发优势单独在起作用。美国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领先全球了，可以说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后发者，也没见其他国家可以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追赶美国的。国与国之间真正的较量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的竞争，不是某一个小领域的领先和局部优势决定的。中国能够追赶美国，也不仅全是人口的优势。

西方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中国对西方体制的挑战。中国自2008年以来不但顶住了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还在其他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时候，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种成就只能归因于“体制”，归因于“强大的国家权力”。

西方人发现中国可以通过五年规划由中央权力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西方国家由于体制限制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中国可以谨慎地进行尝试，然后再推广，这让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比西方国家单一的市场经济效率更高。

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政体是我们中国人用三千多年的血泪和牺牲凝聚而成的智慧和

结晶。在政治上，我们比欧美先进而不是落后，我们的大一统甚至比欧美领先两千多年，这是我们应该自信的地方。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我们是不会逆转的，也无法复兴。

第五章 文化的自信

百年思潮

满族入主中原之后，采取了联合蒙古、拉拢汉人士族的政策，所以快速稳固了政权。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国内民族矛盾，清朝时期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增，粮食品种也大大增加，这些因素使得人口暴涨。与西方的通商又使得民间财富大增，所以出现了康乾盛世。优哉游哉神仙般的日子，使得中国从上到下，根本无人去关注外部的世界。而这时，欧洲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形成并快速膨大，像海啸一样席卷全球。在灭顶之灾到来之前，中国社会集体生活在煌煌天朝的梦中。

1840年，洋人的大炮炸晕了统治中国的贵族和士大夫，也炸醒了中国人。一些中国的智者意识到这是千年未遇的大变局。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理解依然不够，大炮其实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革命。在人类的历史中，只有农业革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可是农业革命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的渐变，而工业革命却是人类社会突变性的进步。面对西方钢炮利枪的进攻，中国龙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基于中国传统的抵抗、适应等各种努力基本无效，这就击碎了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美妙的时候，另一些人心理上总是难以认同的原因所在。

大清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被一些人决绝地否定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决绝地否定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曾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中国革命的阻力过大，没有决绝地否定传统或者说中国人不到绝望的地步是难以进行彻底革命的。

这一百多年的落后和屈辱令人痛彻心扉，这铭心之痛使我们民族彻底反思。这反思彻底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彻底否定自己，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程度。一些人认为中国从制度到文化，再到道德都有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就是中国人是劣等的，命该如此。这甚至成为一些人接受的定论。

这种观点在六十多年前被强力终止了。缘由是一个落后的民族拿着简陋的武器，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这胜利足以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这是中国人再次站立起来的标志。在此之后，再次站起来的中国人靠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再造中国。

有一个时期，中国人集体坚信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一定能够赶上欧美。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的父辈们吃苦、受累、流血、流汗，整整一代人勒紧裤腰带，为后人打下了工业化的底子。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全力以赴积累社会财富，以最低的消费艰难度日，全民衣食简陋，忙着攒家当，没有顾上看世界。当我们随后打开国门才知道，西方也在快速进步中。而且西方的奢华超出我们想象，甚至“亚洲四小龙”也比我们的日子好过。这种巨大反差导致中国人样样都不成的观点又一次出现了，而且还获得了一定大范围的认可。

一百多年的落伍，彻底摧毁了一些中国人的信念。有人甚至发狠说，我们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可见我们对自家传统否定到何等程度。前些年，中国甚至流行过学习日本，说是日本人面对西方的优势转弯极快，学习的精神也是极其透彻的，日本人就差把皮肤漂白了，很多人认为这才是学习西方该有的态度。

事实证明，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深刻意义，多数人对这场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更是缺少认识，甚至连一些积极的参与者也无法全部理解和忍受这种艰巨。

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年代。那一代人没有私利，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和后人攒家当。后人需要知道在经历了流血牺牲的二十八年之后，那些打下天下的胜利者居然面临的是另一个流汗甚至屈辱流泪的二十八年。

我们今天依然无法准确表述这一超过半个世纪的神圣故事，只因为它成就巨大，而且距离我们太近，以至于我们当下依然无法看清全貌。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所有的参与者都从青年变成了古稀或耄耋老人。他们多数没有享过什么福，但是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无怨无悔的，因为他们自豪于自己书写和主导了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最重要的那一段历史，他们知道这种青史留名的机缘可遇而不可求。我们的后人们也会承认，中共最初的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神奇事迹，这一神迹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很近的昨天。

我们的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一直有一种速成的倾向，表现为指望引进某种思想或者制度西化就能改变中国。抱住某种主义不放手的人其实和全盘西化的人一样，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而是速成主义者。

中国今后一定是需要理论指引的，这理论或是创新或是在已经被实践证明过的理论中确认。我们欢呼创新，不过我们知道，创新绝不是一件轻飘飘的文字工作。因为中国的进步是基于鲜血、眼泪和汗水的积累，而不仅仅是某种思想意识的传播。人类历史上多数思想家们影响世界靠的不纯粹是思维的力量而是世俗政治力量的推动，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理论界的高度注意。

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社会的精英组成，他们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旧中国的精英完全是两个性质。他们是中国人的儿女，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我们多数人的祖上都是农民一样，当今中国社会的高学历人才多数都是平民的后代。而建成平民化社会恰恰是中国革命的最大成果，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平民也是改变和建设中国的最大力量，这使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社会结构。

1840年之后的苦难和牺牲多数是外寇强加给我们的，只是靠着决绝地自觉地牺牲，我们才得以逆转和复兴，这才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主流文化。

正视自己的缺点与落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动力和知耻而后勇的策略也未尝不可，其实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已经尝试过了所有的制度，最后证明都行不通，难道需要再试一遍么？

我们知道，即使是钢铁也会因反复曲折而疲劳导致最终断裂。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在这一百多年来的反反复复中也产生了巨大的疲劳，这疲劳产生断裂。这断裂使得中国人产生了不同的倾向，我们需要看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逆反与教训

我们的先人们在一百多年里几乎尝试过了所有的道路，可是都失败了，尝试的结果是碰得头破血流。最终一些觉悟者选择了最难走通的路，事实证明也是唯一可行的路，那就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道路。先辈们用无数的生命和鲜血打通这样一条路，实现了民族独立与逆转、复兴。

我们后人还需要按照这条路接着走下去，不要轻易更改。因为任何捷径都行不通。

这三十多年来，说美国好的声音不小，说美国先进的不少。你告诉孩子们说美国的路我们走不通，就会有人说没有试过怎么知道。总而言之，正面的忠告和教育效果寥寥，导致我们的价值观出了大问题。

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西方人的文化渗透已经无孔不入，前途堪忧啊。不过似乎也不用过于紧张，目前我们价值观上的问题相当于我们民族新生之后的青春期逆反症，是我们过去进步太快导致的回潮，这可能是一个必须的过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因为这种逆反和回潮导致崩溃，因为现阶段很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反面的教训。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正面教育往往不如反面教训来得深刻，反面的教训虽然会头破血流，却是记忆最深刻的，这是人性层面的顽疾，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据说美国人试图在生活方式上全面影响中国年轻人，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上学他们就成功了。现在看看，我们和美国在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在表面上几乎没有差异，那么美国成功了么？显然没有。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很奇特的民族，美国人永远也不会懂。

前人牺牲与后人逐利

今天中国人热衷于追逐财富，一些人把金钱看得比天还大。我们知道蔑视财富不受人待见，但还是要老生常谈再谈上几句老调儿：几千年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表明，富有真的算不了什么，除了乞丐会羡慕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富人在历史上留下真正的痕迹。

但是人们去逐利，也不完全就是我们一些人认定的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西方这几百年的领先就是逐利的结果。当下的全民逐利并不代表我们前人的努力和牺牲是白费的，恰恰相反，没有前人的牺牲，后人是没有机会和资格逐利的。今天多数中国人获得了这种资格和机遇，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恰恰是前人牺牲所赐。

未来中国的前景光明，但是并不代表未来的道路是坦途。相反，未来的三十年依然是需要牺牲的年代。这是一句沉重的话，难以继续。只希望我们的后人们在过上好日子之后能够为这二百年的牺牲洒几滴眼泪，先人们的牺牲就不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并不赞成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赞颂前人的奋斗却指责当下的逐利。前人牺牲难道是为了后人继续牺牲么？前人艰苦是为了后人继续艰苦么？前人无私就一定要求后人不能逐利么？不是的啊。我们要的是社会整体进步，我们要的是国家安全，人民生活安定幸福，要的是物质极大丰富，是消除贫困，其他只是支流末节。中国社会不再强迫普通人无私和高尚，这也是一种进步。我们认为，高尚应该是自觉和一种享受。我们现如今有了这样的资本和条件来宽容和舒展地对待逐利，只是要把逐利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这样我们的社会就能更美好。

时代呼唤思想家

有人说中国这些年没有独立的思想家，没有大家，甚至没有思想界，有的只是学舌鹦鹉。这个观点的社会接受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最近的三十余年，中国社会鲜有思想上有分量的人物，这和我们全民逐利有极大关联，主要原因就是部分知识界也被金钱糊住了心智。西方哲人说过，拴上黄金的鸟儿是飞不高的，人类的思想就是如此。我们见到的大思想家都是超越金钱的，几乎没有例外，即使有些大家认可财富作为力量的一种，但是没有任何大家会把财富视作最重要的力量。

思想家最主要的是什么，是个人的特立独行吗？不是的，最主要的是他思想的人民性，是他的思想影响了多少人的价值观，思想家本人会死亡，但是他的思想却可以流传万世，他的思想不是独立于世界，而是化入千千万万人的骨髓。

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试图独立于社会的隐士，然而时间证明这条路几乎是行不通的。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们之所以留下自己的名字，原因皆在于他们和某种力量结合后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即使我们人类享受到思想特殊的贡献，但是多数天才的影响力依然是由人类社会接受的程度决定的。

我们今后的问题也不是只要有了千百个智者就能解决的，复兴大业需要的是方方面面的积累。我们并不缺少思想，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我们需要的也不是什么“文艺复兴”，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早就上演过了，1840年之后一百多年的血泪史和抗争史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新文化，也是人类思想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这都是血与火凝聚而成的结晶，不是聪明人能在书斋里提炼出来的。

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一个也不饶恕

中国的文化中有着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这是我们千百年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是必须捍卫和强化的价值观念。

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岁月中，受到过巨大的屈辱，有过悲惨的遭遇，使得我们对民族内部的叛徒深恶痛绝。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内奸的破坏很少有外寇能够攻陷我们的堡垒。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任何借助外力或引狼入室，或甘做内奸的人都被称作汉奸走狗。对这些为虎作伥的败类，我们常常以最恶毒的语言来诅咒。

中国人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秦桧和岳飞身后的不同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一旦被视作汉奸，前面无论做了什么都失去意义，汪精卫之流就是例子，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

所有为了私利而背叛和伤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人必将受到惩处，否则我们社会的正气就无法得到弘扬。先辈们早就告诉我们不除恶不足以扬善，故而对叛徒我们绝不饶恕。

今日中国居然有人惦记着像苏联那样把国家分裂了，他们认为只要中国消失了，自己贪得的那一点钱就会变得正当，没人会再追究。我们要说，打消这个念头吧。要知道中国的财富是全体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节省出来的，是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它属于全社会。谁要是把它装到自家口袋了，中国人是不会接受的。

我们中国人从来是很宽容的，敌人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会给予生路。但是对于卖国者和内奸，我们是绝不宽容的。我们就是要明确宣告：所有的伤害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人，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无济于事，就是再过二百年也要追究。

民族与国家

关于爱国主义，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我爱这个国家，但是国家爱我么？”这本是美国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却被一些中国人挂在嘴边，作为自己特立独行的标签。我们想说，如果一个民族人人都这么想，那么这个民族就堪忧了。

在日寇的铁蹄和刺刀之下，中国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和个人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了，所以在日寇后方坚持抗战，并能茁壮成长的中国共产党，就自然成为中国人的核心力量。

新中国刚成立，钱学森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就放弃了海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回来报效祖国。中国人在西方世界曾饱尝过歧视和屈辱，在面包、牛奶与尊严之间，很多科学家选择了尊严。多数生活在国外的华人都注意到，朝鲜战争前后，西方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天差地别。这是因为西方人只尊重强者，只有在中国显示出实力之后，中国人才赢得了尊重。

很多人怀疑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思想的作用，常常以为我们做过了头，却不知道那种万众一心的力量才是打破西方封锁的关键。因为敌视一个强大的力量绝对是危险的，这就是美国政治家们解释给美国人为什么要和中国接触的理由。你要是一盘散沙，或是外强中干，哪里会有耐心和你对话？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冰冷而又残酷的，我们在伤痛中知道了团结是唯一的出路，我们服从集体是为了不再受伤，因为国家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我们社会的精英和管理团体要明白：这个国家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所以我们必须承担扶贫的责任和道义；我们鼓励竞争是为了保持对外竞争的活力，但不是为了冷酷而不顾同胞的死活；我们要对弱者伸出手来，保障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这是我们的任务和责任；每个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应该有基本的生存保障，这才是我们发展的意义；我们明了丛林法则是为了对外决不妥协，而不是对内残酷冷漠，这些都是民众对共产党执政的要求和期望。

我们需要明确，爱国主义在某些局部、某些时点，与个人利益相互抵触，但是总体上，爱国主义是有助于个体的利益的。原因是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抱团才能生存、才有力量，团体越小力量就越弱。然而团体真正变大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克服的困难更大更多。

国家和每一个个人都有关系，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说：“一个人能否过上健康和具有高生产力的生活，最大先决因素是这个人的出生国。”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分分合合，特别是经历了近一百多年血与火的磨难，中国人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就是可以庇护我们的大树，这棵大树是由几十亿曾经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用血汗浇灌而成，它属于我们，我们也属于它，我们是一体的。

教育问题与高考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普通的中国人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别管这个通道多么狭窄，依然代表着希望，而人恰恰需要的就是希望，有了它再苦再累也能熬过去。

上大学对当今中国人仍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无数家长唯一的心愿就是孩子能考上好大学，为此自己吃苦受累都不在乎。有人说这是中国人傻，说你看人家欧美就不是这样，说这话的人其实只是看到了表面，这里面深层次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通过读书能不能改变命运的大问题。

西方世界的平民之所以不重视孩子学习和考试，是因为西方财富和地位是世袭的，他们的贵族圈几乎是封闭的，阶层早已固化，平民百姓早已经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欧美最好的大学一开始就是贵族和富人们为了自家孩子的教育而设置的，起点高、财力雄厚，故而无人能够竞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办了无数个大学，但是排在最前面的依然是若干贵族式的私立大学。

英国的贵族是世袭的，美国的财富更是家传的，这才是欧美社会的真相。但是美国金主们编造了一个美国梦，常常拿出单个人发财的案例来证明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巨富，这就足以鼓舞数亿人去心甘情愿为富人打工。这一点其实和中国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是相似的，可见每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都是因为有着相应的激励机制的。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教育其实并不是被指责的那么糟糕。中国教育体制的焦点是全社会教育与个体教育的纠结，家长们望子成龙而社会需要的是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

新中国的大学全是国家创办，举国之力办教育是我们追赶西方的主要倚仗之一。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培育更多的知识分子，一些最重要的领军人物在这种竞争环境中生成，另一些没有脱颖而出的读书人承担起将天才的思想传授给大众的责任，转化成人民大众改造世界的能力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中国目前的高考是只认分数不认人，是当前社会多数人认可的最接近公平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普通家庭的孩子依然有机会上最好的大学。高考凭分数录取可能是目前唯一能被多数人接受的方案。

我们的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并非是人们指责的那样不可接受，当下的某些所谓改革，其方向可能恰恰偏离了多数人的期望，例如自主招生恰恰是给权力和金钱开了一条路子，这和当年推荐上大学殊路同归，即便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结果一定是差的。

我们应该鼓励富有的人们自己投资教育来实现子女成才的意愿，而不是惦记和挖掘公共教育资源。

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中国国立大学的招生改革不可越线，高考制度轻易不可变动。三十年来中国最庞大的举国体制是高考，是唯一落实了全民监管的领域。高考一举一动牵动亿万人的心，再苦再累人们心甘情愿。甚至可以说只要有这个机会人们就不抱怨社会不公，高考制度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

科技、人才与国家战略

1909年，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帮助”中国“兴学”，史称“退款兴学”。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个战略的产物。

美国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他们一直很重视人才的引进。而且从某一天起也开始接纳中国人，不过他们主要接纳中国的精英，高学历和名校学生优先。美国人用高薪和其他软实力吸引了很多人才去为他们工作，结果就是美国人只花费少量的钱就把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了二十多年的优秀人才给挖走了。

单单是从钱的角度考量我们中国也是吃大亏的，因为在名校学生身上国家是花了大钱的。名校依靠国家倾斜政策，占用了巨大的教育资源。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复兴的关键时刻，正需要大量的人才去攻克难关，国家为此花大钱培养人才。这些人本来是民族的精英，却背井离乡去给外国资本家打工，为了多赚几块美元而放弃自己的荣誉、尊严和责任，我们要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和社会精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难道不应该自责和检讨么？

很多人把中国大学生出国热视作我们教育的巨大失败，是有道理的。不过也不用过于沮丧，其实对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顶级人才。因为在学术领域，千百个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只要回来一个有工作经验的博士或者教授，就有极高的价值。中国人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依然要说，几十年来我们在教育科研人才培养上成绩依然是巨大的。我们中国目前只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稍弱，这主要是历史的原因。我们中国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但是我们的人才的比例远高于这个比例，这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多年积累的结果。

很多人因为中国缺少创新而指责中国的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体制，并非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创造性人才的脱颖而出是基于天赋和竞争的结果，需要环境和基础养育而成。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语言文字，它使得后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习前人总结出来的知识，只有在较为雄厚的基础上，人类才能通过新生的天才凝练出更全面的知识体系，这一聚沙成塔的过程构建了人类辉煌的文明。

中国在近代完全是处于追赶和学习西方的进程之中，我们原本是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能追赶就已经需要举全国之力了。得亏我们民族的智商实在不低，也得亏我们先辈用牺牲换来一切条件，才使得我们追赶成为可能，指责我们没有创新的人和期望走路未稳的孩童快跑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大的方向上并没有太多的错误。如果你认可我们的目标是复兴的话，就会发现我们一直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这一点是需要肯定的。

中国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是知识必须与劳动实践相结合。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倾向是试图脱离利益独立于世界，这种自我期许，看上去高傲其实卑微无奈，看上去自得其乐其实是有苦难言，因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放眼历史长河，社会组织恰恰是人类的最重要的力量，个人的才华只有在社会组织提供的大平台上才能得以展示和发挥。

未来中国的人才战略应该是立足自己培养的同时加强对海外人才的吸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才培养与引进一定会进入更好的良性循环的。我们更大的底气来自人类社会最特殊的进步，那就是科学早已从少数天才的实验室游戏转变成了国家战略层面的竞争，也就是说科学已经异化出绝对的国家属性。这就是为什么多数落后的国家没有机会翻身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中国能够复兴的主因。

信仰是强大的力量

我们得承认，我们中国人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对人的兴趣过大了，对自然的关注太少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早早地解决了疆土扩张的问题的缘故。所以在皇帝个人欲望和需求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智者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两个方向：一个是帝国的稳固，试图帮助皇帝把家天下传至万代而不替；另一个就是追求个人的长生不老。前一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对他人极端压制，后一个作为是对自我极度期许和放纵，结果是缘木求鱼，两个方向都出了问题。

近二百年的落后，又导致我们全面转向唯物主义，这是好事情，因为对自然的理解和把握决定了我们人类很大部分的知识体系和正确的世界观。

可是，还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东西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哪怕是比例再小它依然是存在的。我们这样表述，就是试图提醒人们，尤其是最高层面的领导者和思想界，还有一个小比例的但是很重要的事物存在并且影响着我们的思想，那就是信仰这类形而上的东西。

科学进步产生了巨大力量，使得一些人把自然与自然规律神圣化。然而自然是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我们在得到相对宽裕的生活之后，需要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类哲学问题，科学技术无法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

中国人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十分注重道德因素，这是一种大智慧。中国在信仰上没有统一的传统，中国的政治高度集中，信仰相对自由，这一点和西方相反。

我们为什么百毒不侵？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吸收了各种文化，中华民族更是汉、匈奴、契丹、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以及南方各民族混合而成。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在最近这一百多年的艰苦抗争中，真真切切把世界各种文化尝了一个够，才创造出最具先进性的新文化，才打造了金刚不坏之身。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过去所有外来的文化最后都不见了，都融合在中国文化中了。这就说明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融合和同化功能，是最包容的文化。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社会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包容性文化，一种是排他性文化，包容性文化生命力更持久些，排他性文化力量更直接些。

中国人在经历过最严重的伤害之后，终于不再得意于包容性文化，因为包容性文化的基础来自中国是世界中心这一设定。东西文化大碰撞之后的中国人终于意识到每一种宗教都有根植于灵魂深处的最根本的力量。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

我们需要思想的指引，正确的思想指引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没有人可以永生，但是总有些人的思想可以跨越时空而与人类同在。中国有幸孕育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他能够带领我们前进，而且没有人能够替代。毛泽东这个能够代表当今中国的符号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重新接受，这是我们文化的主流，这是一种文化自觉。

人类的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并不是一代更比一代高的，人类的诸多导师们占据了一座座高峰甚至是后人难以超越的，佛陀、老子、孔子、耶稣、穆罕默德、牛顿、爱因斯坦、毛泽东……当然不排除未来人类亿万年中还会出现更了不起的思想家，但是当下我们要做的不是等待新思想家，而是确立我们的信仰，寻找我们的指引。

毛泽东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石。对中国人而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们的影响力更大更持久，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是中国人，离我们更近，最有可能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信仰。

我们的新文化

中国人基于传统的文化自信已经被洋枪洋炮击碎了，试图粘合碎片来重树文化自信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源自这一百多年来的苦难抗争中的胜利成果，今天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苦难和无比辉煌的胜利中，中国已经孕育出了睥睨全球的中华新文化。

所以，盯着我们受伤后伤口上的脓血，定格我们倒地后的惨状，放大我们净化过程的冲突，都是有害的。这一百多年的中国主流文化就是“流血牺牲”，随后就是“流汗苦干”，这就是我们的新文化的精髓。

中华新文化的先进性是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之中的。中国人的历史是世界最辉煌最灿烂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在世界最好的土地上创造我们民族的美好生活。一千多年前，我们就穿丝绸、用瓷器、尝美食、听丝竹、谈古论今了。我们不否认我们存在各种问题，但是我们是曾经多次过上好日子的民族，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优秀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新文化比西方文化更有优势。很多人羡慕西方的强势文化，觉得西方文化比我们的文化好，尊重强者就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我们的民族有天、地、人、和的文化精髓。

我们更懂得苦难，而我们的苦难是亲身感受的，是洋人的炮火和铁蹄，是日寇的刺刀。而且我们的苦难是自己消化的，这种苦难产生的养分更为深沉和持久。

我们更懂得博爱与平等。西方人说平等，但是他们的平等只是局限在共同信仰的圈子里。美国黑奴的解放并没有多长时间，而黑人获得基本人权更是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中华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强制和统一过信仰。

我们更仁义。无论是对日寇的俘虏还是战犯，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给予生路。抗美援朝时期我们优待战俘，战俘们吃的比我们的战士还要好。仁者无敌，这是西方人永远也不能理解的境界。基于慈悲的战无不胜难道不是最强大的力量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这样的一支力量。

我们的财富也是最干净的。中国人无论是精神财富还是物质财富都是干净的，我们没有搞对外侵略、掠夺和屠杀，我们财富是自己勒紧裤腰带苦干节俭出来的。

我们新文化的主干中有鲁迅精神。鲁迅先生将中国人的痛苦视作自己的痛苦，视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和每一个人都和自己相关。我们更有中共第一代领袖们解救人民于苦难之中的积极而又能干的成功实践。中国近一百多年的抗争和革命，把胸怀天下的情怀和理念传播到更多的年轻人的心里，最终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我们有先辈的神圣般的引领。

我们中国人接受的是集体主义精神，而西方世界强调的是个人主义精神。近代中国的复兴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我们的历史悠久，我们的文化中更具备博爱胸怀，我们更具有奉献精神，我们更团结，我们更勇敢、勤劳、智慧、慈悲、善良、仁义；在构成文化的所有要素上我们都有强大的优势。

未来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我们依然需要摸索前进。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将先辈

的智慧扔在一边，去寻找臆想中的所谓更为先进的理论指引。因为在这百年的抗争中已经产生了最先进的新文化。

中国新文化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我们的文化自信有着极大的正能量。

第六章 军事的保障

耕战是中国数千年之根本

说起黄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他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始祖。但要问黄帝的功劳是什么？怕是有些人不能立即回答出来。其实黄帝的最大功劳就是战功，史记中说他“一生征战未尝宁居”。我们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帝即神农氏，是我们的农业之神，黄帝则是我们的战神。炎黄对应的是农耕和国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根。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历史，因为人通过自己的智慧接近了造物主和神圣。这是因为人类掌握了两种力量，一个是科技力，一个是组织力。诸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人类占据了地球生物链条的顶端。

西方文明这五百年的胜出就是靠了科技之力。中国能够逆转和复兴证明中国的组织力是强大的。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展示过并且将再次展现出它蓬勃的力量。

中国统一的力量来自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年的分裂与战争，最终中国人创造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随后的两千多年的分分合合就一直在考验和检验这个制度，最终经受住了蒙古铁骑的锤击而没有被灭族，被西方科技与工业革命的炮火所伤依然挺立，这就证明了我们民族拥有特殊的基因。

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我们的国家政权采用了一种每个人出一个很小份额即积沙成塔，由最高统治者来承担抵御外侮和治理内患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国人早早找到的最舒服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个方式也不是样样都好，这种方式在外寇不怎么强大的时候有效，但是一旦遇到强大的外敌，这个体系的效能就难以抵御和支撑。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缺少了中间环节，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执政者从来没有真正把人民组织起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今天有人说，中国人最发达、过得最舒服的朝代是宋朝，然而中国人却羞于称自己为宋人。两宋持续了300余年，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的巅峰，其很多成就别说是前面的隋唐无法企及，就是后面的明清都没有逾越。

但是只有一样出了问题，宋朝的军力孱弱。宋朝赵家朝廷最特殊的政策就是一直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所以宋朝一直很有钱。整个宋朝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农民起义，就说明国内矛盾从来没有激化过。今人所谓的人文精神，科技发达，早在宋朝我们的老祖宗就做到了，并且遥遥领先于世界。但是一个短板，一个要命的短板就毁灭了这个所谓最优秀的文明，那就是军事短板：先和辽国打仗不胜，后败于北方游牧民族金朝，最后灭亡于蒙古铁骑，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其他国家在蒙古铁骑的扫荡下如秋风下的落叶，而南宋面对外族威胁居然支撑了数十年。

有人不去思索华夏文明为什么无法抵御蒙古铁骑，却在那里哀叹没有市民社会的发育，没有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把中国没有发展归结为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说什么汉人在遭遇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也更残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这种种指责我们无法接受，因为这些说辞根本就没有抓

住核心与重点。

中国这块土地太好了，所以对外扩展缺少直接的利益驱动，导致中国各代政府无法持久整军备战，因为军备需要花钱而无法通过战争回收，这是中国人保守的原因。所以宋代的开国皇帝，有鉴于唐代的军阀分裂所设置的重文轻武国策，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无知，这是对外扩张的利益不支撑前提下的取舍。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原总是需要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侵扰，因为游牧民族正好相反，他们有足够的利益冲动来侵掠中原。

到了明朝，无论我们如何神话明王朝的经济规模，都无法解释明王朝为什么不能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自然灾害说或可解释得更合理一些。明朝军备可能曾经强大但是没有利益支撑故而无法持久。这可能是我们生存空间固有的宿命，有一利就有一弊，人类社会就是在多重力量综合作用下蹒跚前行。

中国每个朝代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拥有最强大的军备的，但是随后由于没有足够的利益支撑军备，中央军事力量就会变弱，最后政权因不能平叛内乱或不能抵御外寇而崩溃，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遭遇的周而复始的怪圈。这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所以不要再把中国历史的反复表述成我们文化的缺陷了，这里面的因素多数不是人为的。

中国的历史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之争，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不是内战就是外战，从来没有消停过。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就有了统一天下的基础，最终由秦始皇实现统一，从此中国成了中央集权国家。中国的历史往好处说就是经历过多次分裂之后依然回归统一，往坏处说，就是一串串血泪史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阴暗一面。

前些年流行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只会用来制造烟花；中国发明了指南针，但只会用来测风水。而西方人把中国这些发明用到军事上，发明了火炮步枪，于是中国到清朝末年军事装备还处于冷兵器时代。

这其实是偏执之言。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先把火药和指南针用到军事上的国家，早在宋朝中期中国军队就有了突火枪，而且有了能发射铁块石块的火炮。明朝就有了火器，当时不仅将火药使用在枪炮上，而且发明了地雷、水雷。

宋朝和明朝末期，中国的汉族之所以打不过蒙古和满族，一个原因就是社会结构的扁平化而不是人身依附的垂直式结构，这样一种非军事化的社会结构是自由的舒适的，但是无法和军事化组织抗衡。

满族入关，是联合蒙古的结果，这一联盟占据了中国的统治阶层，带给中华上百年的和平，中华各民族第一次和平相处。长时间的和平消磨了清朝贵族的斗志，结果遇到了来自另一个大陆的游牧民族，这些人手里的武器远比我们先进，于是中国被欺凌和奴役。

我们无法过多指责清朝，因为清朝疆土最大，人口最多。我们遇到敌人比蒙古铁骑还强大，他们没有起意灭绝中华不是因为他们善良而是我们的块头太大。

中国近代和西方世界通商，获得大量银子之后不能自保，又被西方强盗抢了回去，并且被西方变本加厉吸血不已，这血泪史再次证明没有武备的富有不一定是好事，也可能是灾难。

1840年的时候，中国的财富变成了灾难的引信，会招来强盗。到1949年的时候，一百

年间中国土地上战争不断，美丽的国土被外寇内乱打得只剩下一片焦土。

我们的教科书中曾经说到，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例子就是三元里抗英。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全体起来反抗。他们在冷漠地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因为统治者把国家当做自己民族和阶层以及自家私产，以强权压迫百姓的时候，老百姓会觉得国家和自己没有关系。

老百姓以为打赢了打输了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最多换一个统治者而已。然而事实却残忍残酷地教训了他们，因为没有国家力量，底层人民会遭受更大的灾难。国家越弱越会引发外寇的觊觎，日本人就是因此才起了侵略中国的心思。

我们常想中国是怎么躲过去灭顶之灾的？幸亏有了共产党这一核心，把中国人组织起来了，中国人用了几千万人的血和死亡才关上了自家的大门，才得以疗伤。

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会惊讶地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会有这样多的灾难，常常令人唏嘘不已。

我们常常以为中国人是记吃不记打的，很多人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历史总是在反复呢？真正的原因不是什么文化劣根性，而是军备在多数状态下是恶性循环的，无数的强国都是被这个恶性循环击垮的。没有军备必然灭亡，但是一味强军也会崩溃。

我们如此强调军事的作用，就是试图明了，从一定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战争史。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奖励耕战，两百多年前美国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个世界变化剧烈千姿百态，不变的依然是耕战。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强汉盛唐只是祖先的光荣，大清被列强凌辱，二十世纪被日寇屠戮仍是我们心头没有愈合的伤痛，历史教训不能遗忘。

我们期望着历史能告诉我们未来，那些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公正的人们去看看二战胜利前后美国、苏联和英国是怎样分割世界的；那些按照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人去看看美国和苏联是怎样切割中国的利益的，又是怎样处心积虑地要求中国划江而治的。

我们认可这样的说法，就是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为了利益美国敢黑英国，俄国更是时刻提防中国。只要是弱国就会受到欺辱，这和信仰、旗帜、文化无关。一个强大的中国、统一的中国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西方世界眼睁睁看着中国统一是因为没有力量阻止，是因为我们中国在血与火的拼杀中诞生了最强悍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奋战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铁血精神，其规模无与伦比，其力量无人能及，这是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有人说今天中国人依然没有国家、民族概念，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的人民这一概念远远高于西方公民的概念。新中国全民皆兵、全民劳作，是人类历史上耕战的顶峰，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凝聚的力量震撼全球。

1949年之后，中国土地上就再也没有发生战争，如果考虑到以后也没有人敢轻易对我们中国发动战争，那我们的先辈们的功劳比山高比海大，他们的牺牲崇高而又伟大，不容丝毫亵渎。

中国土地归全民所有这是我们的内力，而拥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是我们的外力，这都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中国的一切进步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根本，不可动摇。有了这样的根基也就保障了我们中国屹立于世界。

战争是美国的生存方式

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耕地，美国本土有着巨量的资源，足够它自己享受并能销往世界。但是占据美洲的白人，除了杀死印第安人掠夺土地之外还掠夺黑人为奴，最终他们选择了掠夺全世界。当今的美国已经把全球视作它的“地盘”，最初的时候，它是将世界视作市场的，但是后来它成了全球最大的市场。

战争伴随美国成长的全过程。美国的独立战争说到底就是抗税的斗争，大英帝国在得不偿失的情况下放弃了，及至后来的美国内战，美国人开始尝到武力开拓市场的好处，欲罢不能了。

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的种子在美洲辽阔的大地上开出了最鲜艳的花朵，十九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二十世纪一百年里，美国发动各种战争获利巨大，其战略战术是很高明的，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反对，因为美国多数是等到世界各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出手。

一战中，美国是1917年才出兵，以所谓的德国“无限制潜艇战”为借口，但德国在1915年就袭击了美国商船，美国等了近两年才开战。

二战中，美国先是给日本提供侵华军事物资，赚取大量金钱，然后再以武力威胁日本，做出随时掐断日本运输线的动作，导致日本袭击珍珠港，这是在欧洲战场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时做出的决策。这后发制人真的高明之极，但是这高明的战略背后其实隐藏着美国人的无奈。

只要美国本土不受到攻击，金融财团是无法调动多数美国人参加对外战争的，这也是美国的软肋和罩门。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最先掀起冷战大潮，用意识形态划分世界，同时用金钱控制自己的附庸。美国人玩的这把戏是一种金融殖民主义，这是一种类似牧羊人的游戏，把羊养肥了再杀了吃肉或者剪羊毛。

二战以后，战争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美国以金融武器洗劫世界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支撑。

美国必然为美元而战

最近40年来，美国向全世界推广全球化运动，由此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金融帝国。美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占据美国顶端的金融资本，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竞争之后，集聚了巨量的财富，影响力日益剧增，并逐渐建立起全球美元结算体系。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之前的帝国获得财富的方式都是占领、掠夺、奴役等经典模式，而美国金融财团热衷于市场开拓。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美国金融财团通过建立全球货币体系，促使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裕、最稳定、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国家，自然，这个阶段美元信誉也是最好的。

不过美国人的好日子还是被战争打没了。他们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做买卖，赢了怎么都好说，输了就乱套，这是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最早的失败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然后是越南战争。

在越南打了将近17年的仗，最后却一无所获！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已经是捉襟见肘，钱不够花了。而那时的美国却不能像今天这样开动印钞机印美元，因为当时美元与黄金挂钩。

1971年8月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在做出这个决策之前，美国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提醒美国政府，美元跟黄金脱钩，在短时间内对美国有好处，美国可以用没有黄金背书的纸币去占全世界的便宜。当然从长期看，这是饮鸩止渴。美国政治家们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报告的前半部分，他们很自信，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把短期利益变成一个长期的好处。美国政府的信心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力，另一个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后来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证明美国政客似乎是对的。半个世纪对个人而言几乎就是一辈子，但是对国家和民族而言却有可能什么都证明不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谁能想到美国的这两个支柱会出问题呢？所以他们集体地忽视了经济学家后面半句的警告。

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很快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挂钩，保障了美元的地位稳如磐石。因为美国人上下其手，用金融和武力控制了石油的价格。随后美国的使命变成了让全世界人使用美元，为此，美国人摒弃了凯恩斯，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美国人操纵石油价格的杠杆就是战争。印刷美元，然后再用国债回笼美元，这便像是陷入自己挖掘出的大坑里。

从这几十年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发动的战争从目标到方式再到结果都很不相同。美国人的战争除了打烂别人的投资环境之外，还有驱赶资本流入美国的作用。

互联网的出现让美国面临危机，一旦危机发生短短几分钟之内资金就会大量出逃。为了应对这种危险，美国需要在最短时间里做出战争反应。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美国人为什么热衷于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了。

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美元上的帝国。要让这个帝国不垮塌，就必须保持美元的霸权，唯一的支撑就是军事手段。美国人明白，中国人也明白，世界人民都知道。

核弹和人民战争暂时终结了热战，但是控制美国的金融财团并没有放弃统治全球的梦想，这个坚持几百年来始终都没有改变过。

这几十年来鼓噪地球资源有限论的声音日益喧嚣，空气、水、能源、土地，这人类赖以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现在已经成为稀缺资源了。争夺生存空间的争斗从来是人类社会的主题，未来这种争斗可能以最激烈的方式展现。

目前世界的和平来自美、俄、中三个主要核大国的核武器一直保持着可以互相毁灭的所谓“恐怖平衡”。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开始打破这种恐怖平衡。核战争的可能性突然增大，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大形势下我们凡事都要从最坏处着想，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中国的崛起是西方进行战争冒险的最大障碍，因为中国是具有健全工业体系、文化体系、国防体系和核武体系的自主性大国。而且也是唯一有能力以国家体系与金融资本从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全面抗衡的大国，因此解体中国成为金融资本集团的首要目标。

毫无疑问，对中华民族来说，未来的发展前景是艰难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都使得我们在战争准备上天然地弱于欧美日等习惯于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国家。这样我们需要做两手准备：一手是非战争方式，我们需要再有持续的和平时间，来实现全面的复兴；另一手就是强化军备。中国的复兴绝对不是回到1840年那样的富而不强，而是与经济匹配的军事上的强大。

最有价值的牺牲

决定去美国生活的人们很少关注过美国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态度。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们对中国人敞开过大门。因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美国人是排斥中国人的。

很多人没有注意过，美国人对华人的态度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目前我们知道的时间点集中在1950年以后或是1964年以后，第一个时间点的标志性事件是朝鲜战争，第二个是中国的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美国很年轻，他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感兴趣；他们很现实，谁有实力他们就看重谁；他们很骄傲，只尊重能打赢他们的对手。不歧视中国人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军队打败过美国军队。

美国人拍过无数的战争电影。即使是他们最终失败的越战，好莱坞也是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客的卑鄙而不是他们的军人，他们很热衷于表扬他们军队的英勇顽强以及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更为惨烈的朝鲜战争却几乎是被遗忘的，多少年没有任何人关注。美国政府直到前几年才建立了朝鲜战争纪念碑，纪念碑上写着“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美国的政客们无法对普通美国人解释那场战争的结果，这口气只能憋在心里，所以多采取回避的态度。直到苏联解体，出于对牺牲者的道义他们才树立了个纪念碑。但是电影依然是几乎没有，因为他们无法表现占据一切优势的美军怎么就是打不赢手拿简陋武器的中国军队。这在逻辑上实在讲不通，即使有无数著名的导演和明星演员却是谁也无法演绎。

美国人最终失败了，但是他们咀嚼苦果的同时，依然惦记着为自家的牺牲者树碑立传。我们胜利了，享受着先烈打出的和平，有人却质疑那些在冰雪与烈火中以血肉之躯和钢铁碰撞的烈士们无畏牺牲和无私奉献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们心灵中不可碰触的禁区，因为这是我们灵魂的寄放之地。

一种观点说朝鲜战争中国没有赢，虽然我们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但我们的战略目标达到了。也有人说美国当时并没有动用全国之力，所以我们的胜利要打折扣。

一种观点是我们的牺牲也太大了，美国只死了几万人。其实这只是美国的计算方式，把美军和韩军的伤亡人数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的阵亡人数。

抗美援朝的意义比我们能理解的都大，其实这场战争也奠定了后来中美关系的基础。当年美国越过三八线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告中国决不坐视。美国人听不懂，或者说根本不听，结果就是被迎头痛击，终于明白中国人所说的“勿谓言之不预也”是什么意思。若干年之后在越南，中国政府宣告美国军队不可以越过北纬17度线，结果美国听到了，并且听进去了，真的没有越线一步。

如果将中国的崛起视作是这三十年的成果，那就太过于短视了。近二百年历史，特别是共产党的历史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世界的范畴看朝鲜战争都是一个最重要的节点。

朝鲜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中国版图破碎。所以有人说，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有人为二战之后中国政府成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沾沾自喜，其实

那只是形象工程，不说也罢。有人认为中国在大清朝的时候疆土最大，当时中国的很多地区与中央政府只是松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中国的一切在朝鲜战争之后彻底变了样，其意义无比深远。

朝鲜战争的胜利意味着我们的海防前进了一大块，有个朝鲜在那里挡着，中国相对要安全得多。朝鲜战争后东北地区有了安全保障，中国工业体系得到了大规模发展。

朝鲜战争改变了世界格局。也就是从那天起，中国在世界上有了发言权，也开始真正影响世界。

最后我们要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逃脱被视作劣等的歧视。黄色的面孔对欧美人而言只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带来的灾难，他们通常称作“黄祸”；一个是带来大面积死亡的肝衰竭黄疸，令他们感到恐惧。

1840年之后，中国被列强轮番痛殴的百年历史强化了这种印痕，在西方眼中并不先进的日军横扫中国加深了这种印痕。这烙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知道这个烙印是怎么抹去的吗？朝鲜战争中血肉之躯与钢铁的较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绝对无法接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质疑和否定。我们要对我们民族的历史作出界定，画出底线。基本底线就是所有为了民族利益作出的牺牲都是不可亵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烈士们的牺牲是当代中国富有价值的牺牲，将成为我们中华万年大业的基石和支柱。

我们后人们就是在这样牢固的基础上来规划未来和做出决策的，先人们的牺牲让我们有资本从容和有序地开展工作。

后发制人与决策顺序

领袖集团最重要的工作是决策。决策大体上可划分成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两种，这两种并没有明显的优劣差异。

先发制人讲究的是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也要直面后继不足的危险。后发制人固然可以获得卞庄刺虎的效果，但也可能演变成绥靖，倒过来伤着自己。先发有优势，无论是葡萄牙领先于各国的航海而得到巨大的好处，还是大英帝国领先于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都证明先发的优势。

中国人更爱后发制人，这一思想多次出现在古代帝王打江山的过程中，从卞庄刺虎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脉相承。美国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后发制人，夺取世界霸主地位并没有太多的人员牺牲，原因就是世界诸强已经打得天昏地暗和两败俱伤之后美国才出手。

决策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但也不是没有基本的规则。先发制人往往是优势一方，这样能发挥优势，后发制人往往是没有绝对优势的一方采取的策略。

决策有时候是取舍问题，有时候是顺序问题。一般而言取舍不及顺序，取舍往往是不得已，而顺序问题往往更全面。我们拿新中国最著名的一个决策：“两弹一星”与飞机项目的顺序来说明一下。

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共同的胜利拉近了中苏关系。其中最大的成果是苏联答应在原子弹、导弹以及空军等方面给予支持。

但是哪个才是最重要的方向呢？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到底应该先搞什么？最初的时候，中央军委的意见是优先发展航空飞机，掌握制空权。

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应首先发展导弹。钱学森解释道：导弹快，导弹远；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没有尖锐的材料问题；而飞机的严重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得靠经验靠积累，几十年难以解决。第一代领袖们听懂了，采纳了钱学森的意见。

我们的力量有限，财力物力人力都是如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首先是不让敌人再起心思侵略我们，最佳方案就是我们也有实力，相当于敌人有精致的宝剑、锋利的长矛和弓箭，我们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下优先发展弓箭，因为弓箭需要的材料最简单，还能有效地杀伤敌人，这样就能威慑敌人，这样我们就有了疗伤和复苏的时间。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看着我们的领袖们在决策时采纳了钱学森先生的意见，这个顺序而不是取舍高明之极。我们在材料领域落后西方不止一百年，我们已经追赶了很多年，也缩短了与最先进的国家的差距，但是依然需要时间。我们的飞机的心脏——发动机依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有了“两弹一星”的护佑，我们就有了时间去逐步解决无数个需要时间积累才能解决的科技问题。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战略问题上我们不是弱势，在这个领域我们恰恰是最有优势的。我们的底蕴来自五千年的传统和共产党近百年的实践，最好的案例就是中美苏“三国演义”。

软实力与武力

我们认为夸大文化在复兴中的作用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元朝比宋朝有文化？还是清朝比明朝有文化？大宋朝吃得最好，穿得最美，宋徽宗、宋钦宗琴棋书画样样精绝，却被金兵掳去，囚在土井里，成为敲诈勒索的筹码，屈辱至死。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仅是靠了软实力崛起的，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找不到一个仅靠文化能强国的例子。

人类历史上很多民族过于追求享受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富有而没有武备的民族会引发豺狼的觊觎。

这个世界上无数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战争失败而消失了，残酷到你甚至都看不到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不仅是文化落后、经济落后，还有军事落后。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铁与血的历史。面对中国的落后，无数人努力着改变。但事实证明，打不赢战争一切努力结果都会大打折扣，最终证明还是得靠枪杆子。毛泽东率领的人民军队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以数以千万计的伤亡代价方获得胜利，胜利之后的中国人才获得追赶西方的资格，须知这一切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秦始皇征伐六国、神州一统；汉武帝大漠远征、金戈铁马；唐太宗战将如云、带兵亲征；成吉思汗大字不识几个，却纵横欧亚所向无敌……

不光是中国的历史如此，世界的历史也是如此。英国不靠海军消灭西班牙舰队，能成为日不落帝国吗？我们中华的软实力曾经最强大，然而，一旦打不过日寇，立刻面临抢掠侮辱屠杀差点亡国灭种。

我们强调武备只是为了警醒人们，战争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较量无时不在，而且是一场基于充足的物质基础上的持久之战。

武器和利益支撑层面持久战

我们提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家没有不明白军事的重要性的，问题在于也不是一味强军就一定会有好结果的。这世界上事情没有这样简单，要这样简单所有的帝国都不会崩溃了。汉唐两朝都是很注重军事的，可中央权力一旦被削弱，就立刻陷入军阀混战的格局，最终导致四分五裂。宋朝就是基于这种教训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重文轻武，又导致面对游牧民族的入侵无力抵挡。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两难之中艰难取舍过了两千年。

强军的关键在于养军千日，用军一时，重点在一个养字上。能不能养得起是关键，怎么养才是重点。中国的政治家为此发明屯田制度，这可能是最先进的养军之法，就在于养军与用军一体化。

很少有人意识到，为什么是在汉武帝时代中国走向了保守呢？这显然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决定的。我们中国人没有动力向东去寻找美洲大陆，我们尝试过下南洋，但依然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人走向保守是种大智慧，这是我们生存几千年而不崩溃的关键指引。这一点欧洲人不懂，俄国人不懂，美国人更不懂。中国的道家、儒家、法家都是在哲学上思考，都是在思索怎么更好地解决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的平衡，这一点上祖先们给予我们的智慧是很高明的。

中国近代失败的原因是更高层面上的问题，那就是西方人用科学技术制造出的利器我们很难抵御，好在科学的属性规定了科技可以学习和追赶。

五百年前开始西方人用大炮掠夺了世界财富，导致世界向西方倾斜。今天的世界发生财富大挪移，这一次财富向东方转移了。未来欧美没有财富的支撑，科技进步和军事装备的进步就少了可能。

人类社会科技门槛越来越高。目前向军事领域的投入，多数国家已经不能负担了。我们的政治家必须时刻警惕，利益平衡是生死大事，不可不察。未来的世界诸国谁能持久，谁就能够最终获胜。

海洋战略与海军建设

有人提出我们在军事上要跨越式发展，这玩意只是说着好听而已，并没有实际可操作性。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是按照自己的条件发展的，不可能搭建空中楼阁。蒙古铁骑源自草原游牧，中国强大的陆军源自中国巨量的人口和殊死拼搏的长期战争，英国、美国、日本等国海军强大源自地理环境。德、法、俄、中无法建设强大的海军是因为陆地之国海洋利益不支撑。成功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是光想着挖渠就能解决的。有人感叹严复与马汉的不同命运，试图由此推断出中国是因为海军建设的落伍而导致的挨打，这观点似是而非。

在历史上，中国可不是人们传说的那样对海洋完全忽视。实际上在14世纪，中国人的造船和海军武器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还发明了磁罗盘。下南洋更是从始至终贯穿明朝历史，只不过这种行动因没有利益支撑而终止。明朝的真正危险依然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向海洋发展搞错了战略力量的方向得不偿失也是明朝崩溃的一个因素。

满族入主中原之后，中国才真正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长期矛盾，随后迎来了人口大发展，谁也没有想到却遇到了来自海洋的更强大的敌人。海洋本来是中国的屏障，结果变成了软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指责大清皇帝没有战略眼光，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海军不发达是因为海外根本没有能够支撑中国发展海军的巨大利益。

1840年，英法巨大的舰炮打碎了清朝的自大，从这时起中国人才开始学习西方。可惜的是又走错了路，当时中国最应该建立以陆地防御为主的国防体系，而不是摆个花架子表明自己也有海军。大清海军出海没有利益支撑，不出海买远洋大舰无用，这一错再错导致大清帝国大厦倾斜最终无法挽救。

我们从来没有打出去的战略，却在自家门口要大船，不断地往里面填银子，而得不到任何效益，最后连训练和维护的费用都短缺了。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海洋优势国家占据上风，主要原因是水运成本远远低于陆地运输成本。英国的主要利益来自海上，所以一开始就将海军放在第一位，这是由岛国环境决定的。美国最先的时候并没有将海军放在首位，只是到了20世纪初，美国国内市场饱和后出现经济危机，才促使美国政府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并由此注重海军建设。

世界大国没有不注重海军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好的结果。一百多年前的德国在发展海军力量的时候，主要目标并不是远洋海军而是近海力量，这表明要把矛头指向英国海军，故而引起英国高度警惕随之引发战争。俄国从来是试图建立强大的海军的，但是没有海洋的商业利益支撑，几百年来是光开花不结果。

新中国建立之后，先注重陆地国防，保障国土安宁。我们最初没有大规模建立海军，这不是我们领导人概念落伍而是非常正确的顺序和节奏，到了海洋利益足以支撑海军的时候再转向海军建设是明智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商路主要是海洋，造船业也成为世界第一。东海、南海的领土之争，“台独”的威胁和挑战，以及美国收缩之后的商业利益的保护都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需求决定供给这一商业规则也是适用于政治军事领域的。

我们今后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巨大的海外利益，这利益是保障海军运行的源头，这是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以戈止武

人类的发展不是永远和全体进步着的，一些文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事实上战争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创造出最辉煌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了，差一点亡国灭种，幸运的是我们靠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又获得了复兴的机遇。本来工业化的大门并没有向中国打开，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用血泪汗水愣愣地挤了进去，这进步是用无数的牺牲换来的。

历史昭示我们，灿烂文化和富裕生活都必须由武力保障才能享受，否则文化优越和积累财富会变得如履薄冰。三百年来西方超越我们，最主要的是他们工业化之后有了明显的军事优势。

对一个民族来说，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智慧之一是军事思想。如果中国人没有抵抗侵略的战争能力，中华文明可能早就不存在了。中国人在血与火的锤炼中凝聚出俾睨世界的战略战术，古代有孙子兵法，当代有毛泽东军事思想，这都是人类军事思想的丰碑。所以我们自豪，因为我们中国有世上最丰富和最高明的军事思想宝库。

我们今天享受着先人们留下的红利，却很少有人提到战略红利，就是没有人敢动我们念头的和平红利。要知道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两弹一星”和全民皆兵、人民战争护佑着我们国家的安全。

我们必须明确军事是生死大事，忘战必危。今后，我们必然会面对战争，而在战争问题上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我们必须明白，世界上的中小国家都是中间势力，他们总是游移于世界大国之间。世界各国只要不是敌视中国的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但是我们绝不再接受某些国家在我们核心利益范畴上下其手。

我们必须明示，东海和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美国若是越过这条红线，我们将有所行动。中国必须有不惜砸烂一切的勇气和果敢，让世界知道中国人的决心。

我们必须知道政治的力量远远大于经济，军事力量是最大的政治力量。我们不必担忧发展军事会拖垮经济，因为我们已经可以保障军事和经济利益的良性循环，我们必须确保国家安全，经济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我们应该自信，因为中国政府具有超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我们都实践过。

世界真正的危机是美国能否阻止衰败，美国安身立命的金融、货币、军事、科技四大优势是否还在。所以我们要防止有人狗急跳墙，我们只能以戈止武。

我们再强调一次，就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真正的财富是由市场和需求产生的，所以中国的最大财富其实就是我们工业化之后的全国大市场，这就是我们的财富之源，这也是世界最大的富源，所以我们需要武力来保护我们的市场和财富。

现在我们要明确，无论政治还是文化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优势领域，经济领域我们正在变强，我们真正的短板在军事上。我们要加强军事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中我们把军事

放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位置的缘故。

最后，我们要说，中国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家，让我们一起来建设它，一起来捍卫它。

后 记

寰球同此凉热！

中国的传统具备了集体主义基因，使得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这也是中国在落后的状态下依然能够逆转、能够复兴的原因。

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百多年的逆转和复兴完全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未来也只有中共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完成复兴大业。所以在中国尚未完成复兴大业的情况下，任何试图削弱中共的领导的企图，要么是无知的要么是敌意的，是不会被大多数希望过上好日子的中国人所接受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我们这个党就拥有无限的底气。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世界最先进的体制，我们用不着顾虑和担忧指责。为了确保中华复兴，在未来我们党的领导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权力是为大众服务的，这种理念古已有之并且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这恰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不断改进：未来中国民众参政的路径和渠道需要设计和不断改进；我们需要在安定和秩序的基础上实现对权力有效的监督；中国全民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可以和网络技术结合，转变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得很多先进的理念和方式都有机会得到检验和落实。各种因素导致这些渐进的进步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计，经历了无数曲折的中国人最终会创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架构。

我们也要明确，中国经济上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在于过去我们实行了计划经济。要知道计划经济是金融资本梦寐以求但是从来没有达成的境界，而在中国却可以靠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实施，这就是我们能够快速逆转和超常规发展的原因。但是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全部以计划的形式管理经济也会减弱社会经济活动的活力，所以中国这三十年来在一些领域引进和恢复了市场因素，这并不是什么错误。事实上，市场经济对中国人而言也是驾轻就熟的，中国社会本来就具有强悍的经济活力，补上了工业化这一课之后，中国社会的各种优势就会发挥出来，所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体制保障。

人类社会的财富是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组成，由人类从地球上获取物质和能量的劳作构建而成。金钱只是人造的润滑剂性质的附件，不能成为社会整体追逐的目标，货币可以是管理社会的有效手段，但不是国家政府施政的最终目的。

要知道我们中国花了二百年的时间，付出无数人的血汗和牺牲才换来工业化的资格和本钱。我们要坚持以社会财富的增加为根本的发展模式，而不能以金钱为第一目标。我们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应该是加强国家在重要产业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全面私有化，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工作的立脚点。

在文化建设上，我们要做的是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而不是继续自卑自虐。我们既不会去翻故纸堆，也不会跑到洋人那里乞讨，而是需要深度挖掘和宣扬我们这百年来创立的新文化。

中华民族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灿烂文化，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现在的中国主流文化是

基于百多年的苦难和抗争凝结而成的中华新文化。新文化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高于传统文化。新文化是由我们民族这近二百年的苦难孕育出的无私奉献、团结奋斗、忘我牺牲、勇敢坚强等一切优秀品质和成果构建而成，故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

我们的新文化比西方文化先进这不是自夸而是事实，因为我们的苦难是发生在当下的，我们的苦难是自身承受的，我们的自我激励是自力更生的，我们是战胜自我，我们是战胜强敌，我们是无私牺牲，中国新文化的先进性最直接的证明来自朝鲜战争的结果，六十多年前在武器大大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和多国联军打成平手，至少说明我们更勇敢。

世界是大国的舞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丛林法则，所以中国的政治家必须继续时刻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古人说“行百里，半九十”。中国目前就处于这个阶段。这是一个依然极其艰巨的阶段，需要我们更加努力。

我们需要谨慎但无需怯懦，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前行。最艰苦的日子先辈们已经为我们扛过去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实现就在前面。五千年列祖列宗的神灵智慧护佑着我们，中华大地锦绣山河的物宝天华滋养着我们，十几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支持着我们，这都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我们一定会实现中国复兴的梦想。而且中国复兴的意义将超越中国本土，它对全人类的进步都有指引意义。

新华门前的横幅上写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个党过去的辉煌成就依然放射着光芒，这光芒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来自先辈们前赴后继的牺牲，光荣源自近百年的奉献，正确是由于不断的胜利。我们这个党现在已经有了八千多万的党员，党员人数甚至超过一些国家的人口数。这样一个大党未来不可能独立于中国而存在，没有也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小集团利益，所以必然也必须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事实上当我们党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合为一体的时候，就和中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我们今后的工作依然伟大，依然光荣。这伟大依然是出于无私，这光荣一定来自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5页）我们的父辈们奉献了无数的生命、鲜血和汗水，我们的母亲们忍受了太多的饥饿、伤痛和眼泪。中华民族复兴就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百死无悔的追求。“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复兴的道路由无数先辈的牺牲铺就，复兴的底蕴源自数十亿人的劳作和奉献，复兴的伟业无上光荣和伟大。这伟大促使我们去私欲，这光荣激励我们超越自我。完成复兴的使命将使我们能够分享先辈的神圣和光荣，中国复兴梦想的实现也使得我们今天的努力镌刻在青史之上。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华民族万岁！

注定不一样的

ZHUDING BUYIYANG DE 李新◎著
ZHONGGUO SILU YUANCHU

中国思路

原初

自一画开天，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道德修养、世界大同。中华文化有自觉“参赞天地之化育”的责任意识。懂她、解她、知她，是智者；不懂、不解、不知，也不为过，因为民日用而不知。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大哉中华](#)

[什么是“中华”](#)

[易经的民族与黄河的儿女](#)

[改变的只是习惯与人性无关](#)

[第二章 定下基调](#)

[一画开天](#)

[从八卦到《周易》](#)

[礼乐文明建制](#)

[为《易经》插上翅膀](#)

[第三章 第一次大纷争](#)

[王纲解纽](#)

[由官学到私学](#)

[“士”之崛起](#)

[谁说的都有理](#)

[第四章 天纵之圣孔子](#)

[素王降世](#)

[删述“六经”](#)

[始于礼归于仁](#)

[治国以礼，为政以德](#)

[人生难得知命](#)

[有教无类](#)

[第五章 通神老子](#)

[老子其人和《道德经》](#)

[老子为什么要出关](#)

[道可道非常道的矛盾心态](#)

[何谓“道”，何谓“德”](#)

[反者道之动与柔弱胜刚强](#)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

[“为道”与“为学”](#)

[合道生活“不失其所”](#)

[第六章 不战而战的兵圣](#)

[将门出虎子](#)

[孙武子《兵法》“十三篇”](#)

[战争到底为的是什么](#)

[不战而屈人之兵](#)

[兵不厌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攻守兼用，避实就虚](#)

[合文齐武](#)

[第七章 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墨子](#)

[出身其实不是问题](#)

[尚利贵义](#)

[交相利与兼相爱](#)

[天志和明鬼](#)

[尚同与极权](#)

[可贵的科学精神](#)

[第八章 儒门护法孟子](#)

[母教与师承](#)

[人之初性本善](#)

[由仁到义](#)

[王道才是正道](#)

[理想的国家](#)

[理想的人格](#)

[第九章 逍遥之祖庄子](#)

[乡野饿夫傲立诸子](#)

[有用与无用](#)

[乘道德而浮游](#)

[自由是因为自足](#)

[宇宙本来无是非](#)

[生死可作如是观](#)

[第十章 百家争鸣的终结者](#)

[从荀子到韩非](#)

[历史正在重新定向](#)

[引法入礼](#)

[人性本恶](#)

[成为中介并非偶然](#)

[韩非的道理](#)

[法家强秦](#)

[主要参考文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注定不一样的中国思路：原初 / 李新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171-1268-6

I. ①注... II. ①李... III. ①先秦哲学—研究 IV.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3567号

责任编辑：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4印张

字 数 151千字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5171-1268-6

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不曾断绝的文明。未断绝未必全是因为坚强，更多的或许还是因为坚而且韧。韧——能屈能伸，因时制宜，这才有利于存亡继绝。而行为又是受思想支配的，中国思想就是支撑中华民族，历经风雨走到今天的精神力量。

中国思想真称得上与时俱进。思想的变迁自然是有原因的，概而言之无非是时代、地域两方面。时代多由主观因素构成，如性格、思想；地域多由客观因素构成，如：地域辽阔且与欧洲及其他文明之间有天然的地理阻隔等。

在原始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本无太大不同，皆因受制于自然而又崇拜自然，遂信神鬼，故而往圣先王以神道设教，不过是因势利导。远古伏羲氏取法自然，初创八卦；经文王更进一步推演遂成周易；周公因之制礼作乐，更有孔子赞以十翼极力阐扬承其一脉。于是，也就将自然规律渐渐转移到人事方面来，定下中华民族重道德伦理的思想基调。

到了东周，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学术下移，士阶层兴起，知识公开，思想解放，出现了“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等家，各有各的理论主张，也各有各的道理，他们之间互相驳诘。

汉代董仲舒给汉武帝提了个建议，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百家”之中选出一家，即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作为国家的官学。

其实，汉唐之间的这数百年，就是各家思想交汇融合与发展的过程，其中更有外来佛家思想的传入及其本土化。在理学兴盛之前，唐宋已经有了许多新思想。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原道》一文中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传的“道”，成为后世理学“道统说”的滥觞。经过唐宋的酝酿，理学在南宋开始兴荣。这一方面，是由于唐末私立学校出现和刻书业的发达，推动了学术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理学也受到了佛家和道家的影响，借鉴吸收了他们的思想。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南宋时已产生影响，明朝中叶以前，思想界是程朱理学的天下。理学家们的共同长处是躬行实践，一丝不苟；短处是谨守古训，拘禁太过。对程朱理学改革最大的便是王守仁。程朱陆王之学虽门户不同，但其空谈心性、不务实际则一致，这是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

不过，明末清初，随着少数民族不断地侵入中原，反空虚主义的新学派自然而然地兴起了。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新学派及他们的后继者，其进步仅局限于学术上，思想上却显得很消沉。

晚清时期，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便是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来进行传教，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心智的提高，眼界的扩大。中外思想的交流，无疑成为中国思想进步的新动力。

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国民深受刺激，渐渐认识到旧法不得不变，国事必须干涉。遂有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而枝节的改动还是行不通，革命的呼声日高，思想也较急激。中国思想的一个升华时期便是新文化运动。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也来到中

国，并且开花结果。

中国思想原本就具有取法自然、兼收并蓄、涵容化成的特质。

第一章 大哉中华

什么是“中华”

大哉，中华！既大且久。

身为中华儿女的一份子，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中华’”，你答得上来吗？是啊，这个作为我们民族的冠名，大家时时提及感觉很熟悉的词儿，要真对此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可能并不是件容易事儿。我们一般都知道中国是“尚中之国”，中国人也曾自认为“地处天下之中”所以叫“中国”，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沐浴在中华文化之中，每一天也都在感受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就是在河洛地区。“洛阳处天下之中”，河南地处中原也号称“天下之中”，省內古都尤多且早。难道就因为这，我们就叫“中国”和“中华”了吗？当然，不能否认有这方面的含义，但又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深意吗？“中庸”之“中”？得，这下可麻烦了。因为我们被一句话给搞晕了，那就是“不偏之谓中”。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全社会都认为不偏之谓中的意思就是走中间路线，做好好先生，以至于人们一提到“中庸”都觉得很丢脸，甚至怀疑我们的老祖宗怎么会提出这个。紧跟着那就是鄙夷了，不单是对“中庸”二字，也是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

实际上，根本不能那样解释。

我们老祖宗讲的话，那是有高度智慧的，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不是他们讲错了，而是我们后世子孙理解错了，也做错了，回过头来还倒打一耙，埋怨起祖宗来。这岂不真成了不孝子孙，惭愧啊惭愧！

其实，“中”应该解释成合理不合理，跟中间不中间没关系！河南人到现在不是还在讲“中不中？”“中！”吗，那就含有合理不合理的意思在内。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就是：只要我应该去做的，那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使有千万人阻挡、抗争、要找我麻烦，我也得往前冲。这还不够极端吗？简直是大无畏，倒像个大侠，哪里有一点儿好好先生的影子呢？

由此看来，中国人所谓的“中”本来很简单明了，那就是：应该极端的，你就走极端；不应该极端的，你就不可以走极端，合理就好。

然而，合理不合理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方位不同，合理不合理的标准恐怕也得调整，这就又提示我们易与不易的经权之道。中国人的学问最懂得与时空挂钩，孔子讲得很清楚——“时也，命也”，就是说：时一变，整个方式就要跟着变。所以，“与时俱进”并不是今天的新创，那是有其渊源的。可做学问一旦和时空挂了钩，那就错综复杂了，所以，中国人大概都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很难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东他偏说西，说到最后还真闹不懂谁对谁错。这就是中国人，不是简单的二分法，我们在“yes”和“no”之间好像总有第三条路。

“中”这个字，其实可以看作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图腾。中国字是象形文字，大家可以想

象看，它像不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太极图(图1-1)。那是我们文化的源头，要还原中华文化的本真，不能不了解《易经》，而它告诉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合在一起想，不能分开来看。这就形成我们“合”的思想，与西方人分的思想大不相同。中间那条线也足够长，可以弯曲达到两极而且确实是弯曲的，那其中也大有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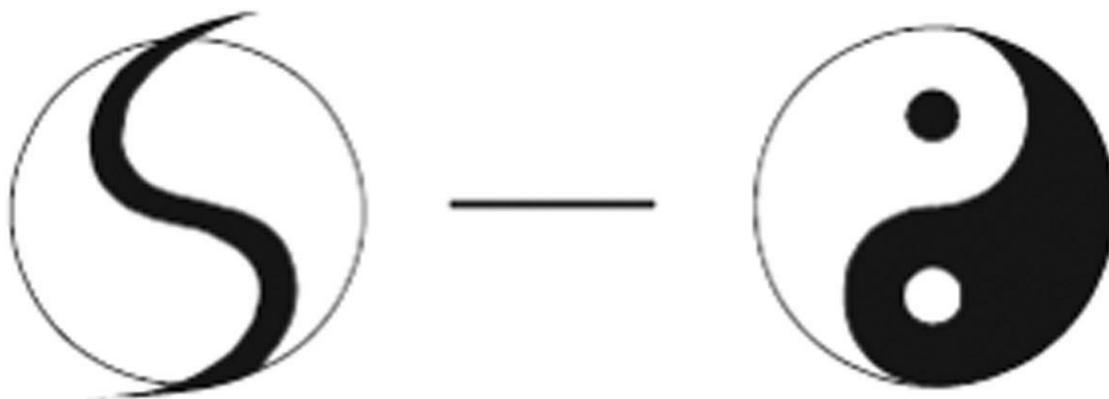


图1-1

中华之“华”，是华丽的意思。《说文》上说：“华，荣也。”《尔雅》上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原来有一种说法：华夏族是华族和夏族合并融合后的统一族称。其实这种说法未必可靠，它并没有文献根据。不妨考虑另一种说法：中原民族古称“华夏”，意即“荣夏”，是“光荣的中国之人”的意思。《说文》谓“夏，中国之人也”。“夏”是族称，是代词，是名词。“华夏”的“华”，是名词作形容词，修饰“夏”。哟，都扯到语法上去了，其实很简单，华就是华丽光彩，做中国人值得自豪。

光是自豪还不行，得知“道”，得知变化之道，“华”应该也有变化的意思。中国字很有趣，除了象形，同音近音的字大概多少也总有些联系。《易经》就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是随着时的变化而改变的，人的态度要随时调整，标准也要随时改变。外国人经常讲：你们中国人没有信用，你们中国人总是变来变去，说话从来不算数……现在，连我们自己人都都这样默认了，不过是这样认为“除我以外”的中国同胞。如果真有人问你：“你说话算数吗？”你一定会很生气：“我讲话不算数？我哪里讲话不算数？”可见我们还是讲信用的，只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越来越看不懂自己了。这也是我们要正本清源，重新好好了解和认识中国思想、中华文化以及我们民族特性的重要原因。

中华是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变化。一个人要不要变？可不可以变？当然要变，也可以变，但是一定要注意怎么变！那就是要有原则地变，不能没原则地乱变，也就是要懂得经权，知道守常，才真懂得变化之道。中华就是有原则地应变，而不可以无原则地乱变。很可惜，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乱变了，因为我们已经不了解什么是中华了。

我们也常说“离谱”“不靠谱”，那个谱就是经。不管怎么变，都不能离谱，不能离经。一旦“离经”，也就“叛道”了。离经叛道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好在，中国人有一点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字——反省。咱们是最会反省的民族，曾子甚至能够“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过一段时间或者做完一件事情，总要反省一下：这样做对不对？哪句话说错了？有没有得罪人？怎样还可以弥补……这就是中华文化，也是我们的民族性。中华文明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断反省，不断调整，不断向前进，但永远不离谱——这是条件。

有人说，中华民族每700年就会大兴盛一次，又一次的大兴盛正迎面而来，预计在21世纪中叶，大家有幸生逢其时。而在大兴盛之间必定有大动荡，也正是我们大反省的时候，大反省之后跟着就是大调整，我们的文化才能够日新又新。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日新不是新旧的新，那是很大的误解；应该是善于反思和改过以求自新之新，说白了，也就是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这正是我们当代人要承担的大责任呢，不然错失良机，真的愧对祖先。我们这个民族，做错了事真的是觉得愧对祖先，不说对不起自己，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原始的基本心态。

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有善于应变的因子，祖先的思想智慧遗传给了我们。虽然几千年来，我们好像扭曲、误解了自己的文化，甚至真的搞到乱七八糟，但是我们的经还在，《易经》就是源头。找到源头也就好办多了，正本清源不是回到从前，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走回头路。我们是要靠开发这个智慧而不是知识，去建立真正的可以在未来得到全世界认同的中华文化！

易经的民族与黄河的儿女

如果说我们中华民族是黄河的儿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把黄河看作我们的母亲河，尽管她并不像慈母那样温和体贴，倒是时不常就泛滥成灾，但我们从未忘记她的哺育之恩。

更深一层思考，我们称黄河为母亲，还不仅仅是因为她为我们提供了生命之水，尤为重要是她以她泛滥的无常和猛烈给了我们民族磨砺的机会。老早老早，谁要是能带领大家把黄河治好，那简直可以给我们做领袖；当然，治不好，也可能丢了脑袋，鲧和大禹这一对父子的起落祸福可不就是这样吗？人常说九曲黄河，黄河是善变的，她常常改道，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有时还没到十年呢，就河了西了。那绝不是因为你人乔迁新居，完全是因为黄河又改了道。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九曲黄河穿行在中华大地上，还真像一条蜿蜒行进的巨龙，而龙的变化又是公认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与黄河神龙斗久了、混久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也就开了，至于意志更顽强了那倒在其次。我们一开始是真的跟她斗，用的是蛮力，后来慢慢学聪明了，我们干脆抱在她身上，随她一起变化，这才发现省劲多了。于是，我们成了龙的传人——懂得变化应对之道。

《易经》就是讲变化应对之道的，由宇宙万象而人生道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夸张地讲，它是解开宇宙人生密码的一部宝典。所有文献都这么记载——“易”是群经之首。为什么说《易经》是群经之首呢？因为，不管是五经或者六经都会把《易经》摆在最前面，所以叫群经之首。实际上，这句话讲得太客气了，《易经》应该是群经之“始”。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发源出来，它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它是诸子百家之前的那个“一”，所以叫作群经之始。

那么，它又是如何完成的呢？要说咱们中国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集体创作，然后找个大家都认同的代表，冠上他的名号，包括中国思想，很难说是哪一个私人把它整个完成的。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汉书·艺文志》上那两句话——“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也就是说，人有三位圣人，其中一个伏羲，然后周文王跟周公他们父子一家人算作一个，这也符合中国人的道理，然后是孔子。伏羲是什么时候？上古。周文王呢？中古。那孔子就是近古，或者叫下古。一部书能流传那么久远，而且经过多位圣人之手几番着力研磨，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人家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

有人说，那是用来算卦的书啊，也对。也确实因为很多人认为《易经》是算卦的书，才使它躲过了“焚书坑儒”那一劫。当然，你可以拿它来卜卦，它也确实能卜卦，然而，那只是它的小用。因为当时民智未开，圣人不得以以神道设教，反正效果好就好了呗，大家遵照执行。

《易经》给予我们的是智慧，是思路，而不是知识。知识过个十几二十年很多都没用了，它的更新换代太快，你拿着几十年前教你怎么修电视的书，对着今天的液晶电视恐怕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呢。而智慧，就不会这样。智慧，它可以遗传，而且还不会过时。

中国思想源自伏羲，伏羲氏所创的八卦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中华文化就是在《易经》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其实也源于《易经》。同一个世界，每个民族又有不同的花样，而这花样又为全民的大多数所认同和接受，这就是文化。而文化的不同，

说到底还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说我们是“易经”或者“太极”的民族绝不过分，这当然也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在内。不要总是以为中国人的言行乱七八糟、模棱两可，如果我们用《易经》的道理来考察的话，你会发现，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有道理。

《易经》的主要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不像西方那样还要另外找个神，来做人的主宰，作天与人之间的中介。《易经》里有一句话，叫作“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它的意思是说，我们人要自己去了解天理，顺应自然，就会得到吉祥，也就不会有不利的后果。这说明：我们所重在人，在自己，也就是以人为本。

《易经》其实就是要把自然规律转移到人事方面来。中国的伦理从哪里来？就是从自然来。那这么有秩序的自然又是谁在管？如果伏羲当年说是神在管，那我们就产生宗教了。可是，他没有！这一点我们真得好好感谢他。他说：这是阴阳的互动，是自然孕育，是两股不同的力量在交互作用，很自然就产生了万物，并且周流不止，并没有别的什么特殊主宰。

你看，我们中国人跟老天格外地亲近，老天就是自然，我们用“老天爷”或“天老爷”来称呼他，既无比尊重又饱含深情，当然，还外加充分信任。老天很公正(平等对待叫公正)，没有任何私心，他不会保佑任何人，绝不会因为你多拜他就保佑你，那样跟贿赂有什么两样？还算什么老天？老天只会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关键是看你怎么做，他就怎么样对待你，一切靠自己，你自己得努力！这才是自然规律。孔子是读懂了《易经》的，他的“尽人事，听天命”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该我做的，我做了，至于结果怎么样，不苛求，那不归咱管。

人和天能亲近到什么程度——天人合一。真正懂得中国文化，就知道，说天是包括地在里面的，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合一。怎么合一？在心里合一，也就是天理跟良心合一。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良心从哪儿来？从天理来，也就是从自然规律来。人存在的价值，说到底就是要有天理良心。“天良”是“天理良心”的缩略，如果一个人被骂“丧尽天良”，那是很严重的，基本等同于“不是人”或者“禽兽不如”。

在中国，“合”的思想那是普遍存在的，不仅仅是天人合。我们分析问题、看事情、做学问都在运用合的思想，不像西方那样分，分科也是他们想出来的。

《易经》还告诉我们阴阳变化之道——所有一切一切的变化，不外乎阴阳的变化，其他也就没什么了。世界上再怎么复杂的事情，易经上四个字就讲完了——错综复杂！还能怎么样吗？所有事情，看了七千年还看不懂吗？历史的积淀和厚重，它的好处就在这里，我们能够非常精准地提炼要点，很短的一句话，甚至三两个字就把事情总结得清清楚楚了。全世界不管什么学问，从过去到现在，以至于还没发生的将来，我们都可以用一句话把它全部说完，就叫作“一阴一阳之谓道”。

那我们现在要问：一阴一阳，到底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凡是回答“是一个东西”，或者“是两个东西”的人，那都没得到真传，还算不得标准的中国人。不是一就是二，那是西方人的二分法。“亦阴亦阳”“一而二，二而一”这才是标准中国人的答案，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看得懂。

阴阳未发动之前叫太极，太极是一切的总根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太极一动就生阴生阳，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一动，变成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太极就叫“一”，“一”就是“中”，未发叫中，已发叫动。这样，已发之后，

上面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就是“华”(图1-2)。“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什么样的动都有，但，那都是太极的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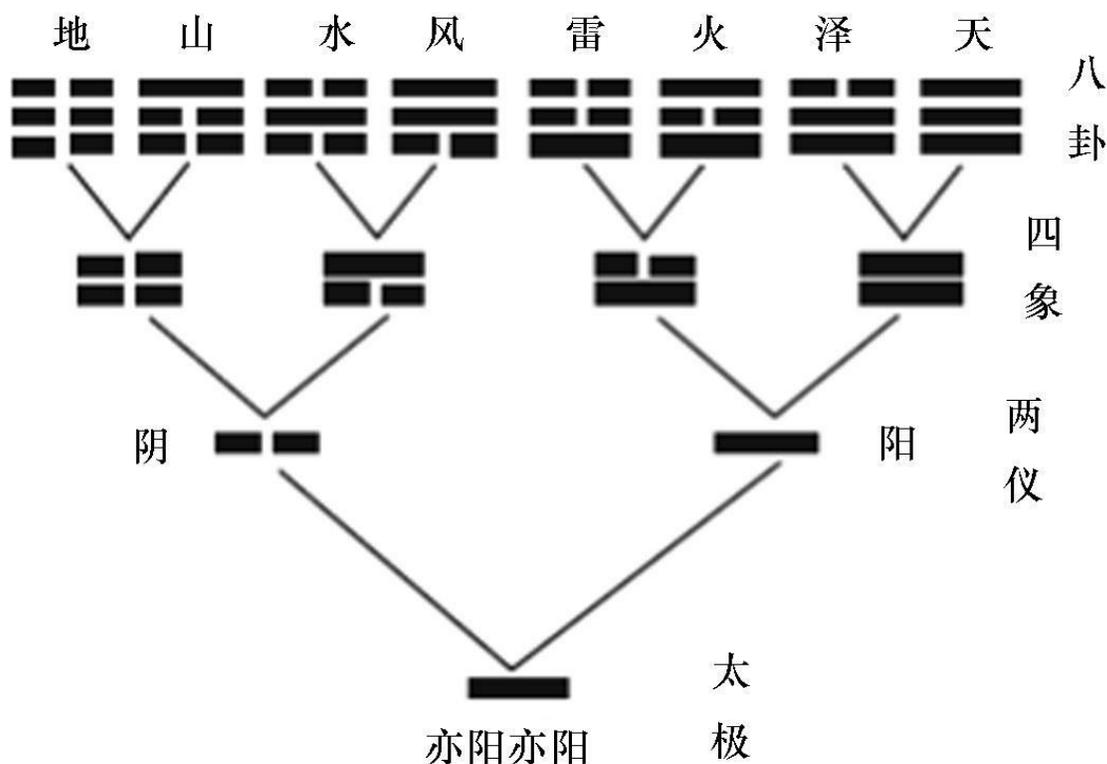


图1-2

所以，了解了《易经》，才能真正体会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宗只有一个，就是太极。也才了解阴阳是不可分的，像白天跟晚上，我们就不好明确划分，它并不像开灯关灯那样，突然亮了突然黑了。现代科学不是也证明：男人身体里有女性荷尔蒙，女人身体里有男性荷尔蒙吗？可见纯阴纯阳很难，如果男人身体里完全是男性荷尔蒙，女人身体里完全是女性荷尔蒙，那么干脆就是男人类、女人类算了。阴阳是一体两面而已，我们细想几乎所有的东西大概都有阴有阳，只有这样才能互动，才动得起来，才能演化，才能周流不止、循环往复。

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人的态度——经常是模棱两可，很少明确表态。不像西方人那样赞成就说赞成，反对就说反对；我们大多时候都是“很难讲”。其实，也是真的很难讲，很多事情对错是不容易分的，我们只赞成它对的部分，反对它错的地方，既不是完全反对也不是完全赞成，本来就是“很难讲”嘛。

中国人想得很周全，本能地奔着阴阳兼顾去走，在阴阳兼顾中、在通盘考虑后，寻求那条最合理的道路。因为阴阳也是合的，太极本来就是一嘛，咱们就是太极的民族。

当今世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激烈冲突。地球村逐渐形成，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挡是挡不住了；同时，大家也看到，很多全球性的活动遇到激烈的抗争，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全球化会引起人们的疑虑，大家很担心，全球化会把本土的文

化整个消灭掉，而又没有哪个地区的文化愿意被消灭掉。当此之时，大家就会了解到只有像《易经》这么广大包容的东西，才能做到“求同存异”。

在中国，一个家庭里可以同时供奉观音菩萨和太上老君，而从来不担心他们会吵架，只是觉得多一个神仙保护有什么不好；不同宗教的信徒也可以做邻居，而且生活的很愉快；甚至和尚和老道都可以同游，还有说有笑不亦乐乎。不像西方那样，为了宗教打得头破血流。

我们能够做到尊重每一个地区的文化，同时，我们又能找出一个最大公约数，把它变成大同的因子，使得各个地区能够愉快和谐地接受。这个只有《易经》做得到，只有秉承易学思想精神的中华文化做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华文化那个“化”的功夫绝对了得，这正是《易经》的精神和太极的功夫。

改变的只是习惯与人性无关

都说中国上下五千年，那是从有史记载开始算的，其实还不止这么长。就像一个老人，饱经风霜，阅历丰富。曾经无比强盛辉煌，备受尊崇；也曾经无奈的颓唐衰落，备受凌辱。而我们现代人是距离那辉煌神气的时代比较远，而距离衰落屈辱的时代却很近。那种衰落屈辱下的矛盾和疑虑心理至今似乎还没有去，对中国民族性的谩骂之声还依然不绝于耳，当然，相反的声音也总是有的。

骂也好、捧也好，中国人几千年来，永远还是中国人！

说中国人改变了，似乎没有。我们不是自己都常常抱怨中国人不改农业社会的习性吗？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有什么办法呢？

说中国人没有改变，似乎也不对。我们有不少国粹主义者时常担心，中国人变了，变得越来越失去中国人的味道了。正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代不同了，中国人也改变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全世界的民族还不都是这样？有不不变的部分，就一定有变迁的部分。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不可能完全稳定下来，维持不变；也不可能变得完全失去了原来的面目，因为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传统文化已经变成了民族的基因。

然而，中国人却又比较特殊。我们有那么悠久的历史，而且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总有它值得引起注意的深层次原因。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功夫，那就是“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又有持续”！

中国人一直在变，却又永远没有变。

所以，实在不必紧张，也不用怀疑“怎么样才算是中国人”。凡是认同中华文化而又正在实践中华文化的，都是中国人，他们都具有中国人的特质。这也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划分你我的标准。

如果不认同中华文化，失去中国人的本性和特质，就算你拥有中国人的血统，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而且面貌就是中国人，恐怕也已经算不得中国人了。

当然，认同与否，一定是出乎自愿，中华文化也从来不强逼谁去认同它。可是，中华文化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只要你进来，就很难不被它吸引，进而化于无形。所以，有人笑称中国越是被侵略地盘儿越大，只要你敢来。

我们中国人是最了解人性的，我们祖先的设计也是按照人性来的，所以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人会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尤其是从容。你看我们文化昌明的时候，那是万国来朝的，很多外国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有的甚至是长期居住下来。感受、学习、研究之下，他们也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好处，随即拿到他们本国去照葫芦画瓢，模仿实践起来，也大都很有效果。

别说公认的优秀特质，即使今天被很多人诽谤中伤的缺点，细想也有它设计之初的深意。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一边矛盾着，还一边习以为常地做得自自然然，很可能还包括那

些诽谤中伤者。

比如，你功课考了第一，别人夸奖你“学习好用功哦”或赞美你“脑筋真好使”，你怎么说？你敢回说：“是啊，确实是这样的。每次我都是课前充分预习，课上认真听讲，课后好好复习，再加上脑筋也不差，所以每次都考得很好”吗？作为中国人，应该没人傻到这么说。我们大概都会说：“没有啦，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刚好老师出的那几道题被我复习到”。同样，某人升了官，别人去道喜：“恭喜啊，高升了！”要是回答说：“是呀，三年前我就开始计划了，精心准备很久了，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那这人就肯定不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会说：“哎，没办法啦，老早就请我，实在推不掉啊”。你看，我们都是“推不掉”才去当的。

你会不会说，哎呀，中国人真虚伪？可是，各位，上面的两种回答，你更喜欢听哪一种？听了哪一种心里更舒服些？不必回答，问问你的内心就好了。你是怎样思考怎样做的呢？做的时候自然吗？

这就是文化，民族的性格早已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它会从人的一言一行中很自然地表现出来，无法掩藏。更不必觉得丢脸，倒是可以深一层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做。原来它自有它的道理。我们说的可能不是实在话，但我们说的是妥当话，是给别人面子，是尊重别人，不把人家惹毛。

伏羲氏老早就会仰观俯察，注意象的变化；孔老夫子更是明确要我们跟人说话一定要看着对方——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不看着人家脸色乱讲话简直就是瞎子。不体察别人的心思自说自话，其实是不顾及别人，是自大的表现，或者直接就叫作“目中无人”。

中国人是最懂人性的，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始终是以人为本的，我们世代一直这么做下来，做得那么的自然，叫作民日用而不知。做得时间太久了，熟练到我们都不要去理论支撑，大家都自觉地、得心应手地在日常运用。而近代百年的屈辱和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使我们开始信心不足，开始自我怀疑了。所以，现在我们有必要整理一下我们的思路，还原到中华文化、中国思想的本真。

的确，论科技，西方这400年来引领世界；若论思想文化，中国却未必输给他们。只是自汉朝以来，我们太重视“道”，而忽略了“器”，偏离了“道器合一”的精神。而西方人在近400年的迅速崛起，恰恰是因为他们专门从“器”上谋发展，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叫作“科技”。西方人正是凭借科技的强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造成我们刻骨铭心的百年屈辱，简直要把中国人的自信心整个压垮。

好在，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永远不服输的精神。你看我们的足球队就好了，明明这次输了，还都说：下次再来！这次是我们远道而来，没休息好，水土也不服，又是客场，拉拉队呼声也不高……总之，我们有一大堆理由，没有谁肯服服帖帖地低头认输！想想我们自己平时是不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也就是靠这股永远不认输的精神，才能在无比艰难困苦，甚至是绝境中一次次地再爬起来！这绝不是简单的所谓阿Q精神。

中国人还是天底下最喜欢自作主张的民族，这一点到现在恐怕也没有变过。在中国，有时候，照着原来的施工图去检修地下管道，很可能找不到。因为，施工的时候不知遇到了什么实际问题，几个施工人员一碰头儿：“这图纸谁设计的？根本不合理嘛，改！”得，临时一商量就改了道儿。

你说，哎，这也太随便了吧，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没错儿，可你看到的只是一方

面，还要考虑另一方面——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尊严，有尊严就是自己可以做决定，也就是要有自主性。如果一个人样样听人家，那不成了人家的奴才了。当然了，我们不是鼓励随便改图纸，但是这种要自主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尤其，在变化越来越快的社会时段里，快速准确的判断和决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按部就班在这时候就有点赶不上节奏了。

有人说，百年的屈辱使我们开眼看世界了，使我们民族觉醒了，也让我们的生活更文明了。我们变化很大呀，你看，我们剪了发辫，我们不随地吐痰了，我们也建起了高楼大厦，我们连衣服都换了西式的，几乎人人都会说英语了……

我们确实变了，而那变得更多的是习惯而不是人性。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对于有形的东西向来是不怎么在乎的。我们好像不太重视什么老房旧屋，对于申遗也不像人家那样的“积极”和“用心”；我们的服装也可以改来改去，到今天连一套自己的衣服都没有；外面的新鲜玩意儿来了，我们学得也很快，生活方式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但是，对于无形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要想改变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改变中国人的性格特质，真的很难很难。

然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生物科学已经证明，多样性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发展。这条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文化也需要多样性，多样就必然各有特点，而特点其实不能说是优点或缺点，它只是特点。有特点才可以互补，所以，要求同存异。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时间不同，总有一种文化当令，在这段时期内，该种文化有它的责任，也应该尽到这种责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会发现，中华文化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科学如果不能导正方向的话，很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只有回归“道”才能拯救人类，而这个“道”恐怕还得到中国来找。当然，“道”是包括“器”在内的，“合”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如今，很多外国人都在学习、研究我们传统的经典——《易经》《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孔子、老子等先贤早就成了全世界的圣人，而不仅是在我们本土。在未来的世界，在快速全球化的21世纪，极具广大包容特性的中华文化正当其时！

第二章 定下基调

一画开天

无疑，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生存的问题，自然也思考、研究着怎样应对这些问题，形而上之那就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大学问。然而，那时还没有文字，发明文字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没有文字，怎么做学问呢？看象，宇宙自然的现象。

在远古时代，人与天地的距离似乎比我们后人更近。没有高楼大厦的阻挡，也没有万头攒动的人潮，俯仰之间目光所及就到了天地的尽头。伏羲氏就是仰观俯察成效最卓著的人，他应该是识破天机的第一人，或者说是破解宇宙人生密码的第一人。

只自己识破了天机，了解了宇宙人生的奥秘，自家独享，秘而不宣，大概我们今天也就不知道有伏羲这么个人了。在中国，能被大众牢记不忘，世代传颂的人，那一定是对人民有大贡献的。西方人要想得永生，那你得求助上帝，所谓“信我者得永生”；中国人要想得永生，那你只要活在大家心里就好了，也就是精神不死。外国人不懂得我们，总认为中国人喜欢拜偶像；我们自己应该清楚，我们还真不是拜偶像。我们只是对那些生前真正为人民提供最好服务，为大众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十分感念，我们拜他是对他表示感谢和纪念的意思，就像我们祭拜自家祖先。可以说，中国人根本不崇拜什么偶像，我们只拜祖先和圣贤，以示我们不忘本的意思。

伏羲氏就是这么个人，一位真正能为人民大众解决实际问题的的人。

各位，那时候人民大众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大家不妨试想，当初，咱们的老祖宗还没进入农业社会呢，那他们靠什么过日子呢？靠打渔、狩猎呗。一个人要出去打渔、狩猎，他最想了解，也最迷茫最担心甚至害怕的是什么？自然环境。既然是去打渔、狩猎，那就不是简单的旅游，疏散了心情就了了事。大家还等米下锅呢。首先，你得弄清方向吧——那时候绝少人文景观，很难找到理想的坐标，走远了很可能就找不着北了，也就找不着家了。其次，不能大老远的跑一趟空手而回吧，你得奔着目标去吧，换句话说，你得确定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猎物。第三，不能半道儿遇着泥石流，白丢了性命吧；第四，还得避免没打着猎物，先让猎物把自己给猎了去吧……

由此可见，远古为了人类自身生存的渔猎活动，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那绝不像今天的骑马、垂钓，专门花钱买票尽是为着娱乐。很有些“人为食亡”的危险成分在里面。

所以，很多人就去问伏羲，说明天我要出去，你帮我看看哪个地方猎物多，天气好不好，千万别赶上狂风暴雨、泥石流什么的。伏羲氏算了算，就告诉他：明天是大太阳，你去好了，而且那里猎物会比较多；明天你如果往东走，有雷，你千万要注意；你往西北走，大雨，最好改期……

伏羲简直神了。刚开始，大家还将信将疑，可是后来实践证明，每次伏羲说得都很对。于是，问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简直应接不暇，怎么办？贴布告——画卦，画好了就挂树上或别的什么显眼的地方。

伏羲的神不是神秘，人家那叫神通，通天地，通宇宙，然后推理。我们说，伏羲氏那是找到了大自然的规律和一种代表自然的力量，把整个宇宙人生的道理都想通了以后，才开始画卦的，而不是着了什么神的道儿，不是迷信，所以我们对他那一画非常的恭敬，把它叫作“一画开天”。他就用简单的一画开天来告诉我们，太极代表了宇宙自然的秩序，它是有规律的。咱们的中国思想、中华文化就是从伏羲这么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画开天来的，那一画开天就是我们的宗。这个宗后来又变成了经，经就是经常要遵守的规则，也就是不能变的那部分。除了不能变的经之外，其他都是可变的。伏羲这“一画开天”着实不简单，他为我们思想文化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首先，地球只有一个。这句话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还差不多都以为这是西方科技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才认识到的事实和真理。其实，你大概不知道，《易经》不但早告诉了这个，除此之外还告诉我们更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共通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是生物还是非生物，这个共通的基础就是太极。当然，太极这个词是后来孔子首创的，伏羲那时候不是还没文字吗。不过，太极也就是那个“一画开天”的“一”，也就是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一”。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个共通的“一”，那么彼此就有关联，就不能完全割裂。求同存异也就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部分，我们要保留；不同的部分，咱们彼此尊重。直到今天，人类依然离不开这条原则，甚至在被科学证实了这确实是真理，而且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它的用场或许还更大呢。

其次，既然世间万物有着共通的东西，那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就得从合的观念出发。这应该也是中国特色吧。你看，中国人做学问，原本是不分科的，后来，引进了西学，也开始分科了。分科分到最后，就有了专业和专家。专家就是那个小小领域内懂得多的人，你讲的我听不懂，我讲的你听不懂。大家都听不懂就是高深吗？恐怕也未必。学问之间应该是互通的，通是宇宙的真理。要想成为大学问家，一定要有“合”的思想观念，才不至于太局限、太狭隘。

第三，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无论是好人坏人；无论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也无论植物动物，或者生物非生物，天地都覆载，可见，天地是公正无私的。天无私，地无私，那人要怎么办？自修，修到和天地一样无私，这就是人的责任，所谓的修养，也不过如此。那这样修养到底是为了什么？想想伏羲一画开天时的自然景象，只有天，只有地，只有人！我们说，三画卦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替人类在天地之间做了很明确的定位——上面为天，下面为地，中间一画就代表人。这样，我们才会了解伏羲氏他的目的，是要人类帮助天地来改善这个世界的，也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这是人生而为人责任。这大概也是老天特别给中国人的很神圣的责任，因为，似乎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意识到了。

第四，阴阳和阴阳之间的关系。伏羲画卦，或者说八卦以至于后来的六十四卦，看似复杂的这些卦象，其实也就是两个符号——阴(☷)、阳(☰)的排列组合。那么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呢？阴阳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大自然包罗万象，而且千奇百怪，要是细分的话，那将是一个看不到头的天文数字，估计要看得我们头大。好在，中国人的学问不这么做！咱们抓根本。《易经》只用了阴阳两个符号，或者叫元素，就把宇宙万物给包含在内了，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要了解自然，了解人类自己，绝对可以从阴阳入手。阴阳的内涵实在是太多，也实在没有办法一两句话说清楚。但可以说清楚的是，阴阳是相对而生的，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而且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样才可以互动，才可以起变化。所以，中国人说“阴阳合一”。而且，无论怎样变化，最终还要“归一”，也就是回归太极，回归原点，再从阴阳重新出发，圆道周流。

那么，在蛮荒的原始时期，伏羲是怎么发现宇宙奥秘，又是怎么画出八卦图来的呢？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伏羲起码用了三种方法，而且，这三种方法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

第一种方法，仰观。大家会说：仰观还不简单，头一抬就看到天上了。可是我们细想就会发现，就是这看似简单的行为却是人类专有的权力，动物根本无权仰观天象！



图2-1

第二种方法，俯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俯察不仅是察外物，还要察自身。一个人就是一个小宇宙，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比如自然界有山，那人也应该有山，那么人的山在哪？就是鼻梁嘛。也就是说，宇宙所有的东西，在你自己的身上统统都能找到对应。这大概也是人类独有的意识吧。

第三种方法，广角。也就是不能光看一个地方，你要多看一点，四面八方都要看一看，要看得很周到，想得很周密，一点都没有遗漏。这样才叫作《周易》，不完全是周朝或周文王的关系；周就是很周密、很周详，而且是周流不停，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

那好，既然这么周密、周详地掌握了自然宇宙的奥秘，怎样把它传播开来，以利民生呢？遥想伏羲当年，那时根本没有文字，靠什么传递这伟大的心得？也只有图画了。伏羲八卦图(又称先天八卦图，如图2-1)，就是我们说的“无字天书”。你看，后来加了文字的《易经》也还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无字天书”，因为它实在是奥妙无穷。

没有文字有没有文字的好处。没有条条框框，更容易融会贯通不受局限，这就是图画的优势。文字，说一大堆，也许还说不清楚，或者说清楚了却不周全；图画简单一画，内容丰富，所谓“尽意莫若象”。其实，我们的文字最初也还是根据图像来的，有的就是根据伏羲八卦造出来的。然而，伏羲氏画卦并不是为了造字。如果伏羲为了造字，他的成就绝没有现在高，最多也就像仓颉。仓颉是把字造出来了，但仓颉的名气要跟伏羲比，那是比不上的。

伏羲知道，整个宇宙自然的系统就体现为象和数。所以，伏羲八卦不仅是图像，还包涵数(当然，象和数的背后还有个理在)。这个数，不是单纯的数学之数。中国的数，那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是变化无穷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说：你心里有数没数？我心里有数。它绝不是简单的数字。伏羲根据人们的需要，慢慢推出不同的卦象，并把这个介绍给

人们。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这是2、1、2(■■■■)，就代表下雨；那是2、2、1(■■■■)

■■■■)，表示打雷.....这就是人类所知道的最早的密码。这简直就像咱们今天的电报码，用几个简单的数字这样打，对方就知道你说什么了。也很像我们今天的电脑，0101就可以构成浩瀚无穷的网际网络，01和12不过是名称不同罢了，其实质都是一阴一阳，产生宇宙万象。所以说，数位化时代其实老早就开始了，我们不过是承接它的路线走下来而已，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

由此可见，宇宙大系统不是单纯文字就能表述的，丰富深奥的、关于宇宙人生奥秘的思想体系，也不会或不能只寄托于单纯文字的表述。也可以说，中国思想，从伏羲的八卦图开始，就包含了现在所谓“自然科学”的成分，象和数本就是科学的。

伏羲的用意是要告诉人们整个宇宙的状况、自然的规律，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改善。可以说，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乃至行为，那都是从效法自然得来的。自然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判断标准。合乎自然的就善，不合自然就是恶；合乎自然就是好，不合自然就是不好；合乎自然就是对的，不合乎自然就是不对的，就算眼前是对的，迟早一定是错的。《易经》里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万事万物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生活和成长，我们人类也应当遵循自然的法则去做人工的事情，包括科学，以期尽可能长久和幸福地生活。

从八卦到《周易》

伏羲氏在还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一画开天、生阴阳、创八卦，希望告诉我们宇宙自然的规律。然而，高深的道理不是人人都看得懂的，伏羲很清楚这一点，那他就深入浅出地指导大家做起来，能真正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也很不错了，这就叫民日用而不知。

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也越来越复杂化，当授道解惑的人渐行渐远，百姓日用间的践行也难免会跑偏。何况，伏羲氏当年画卦的时候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他就有很大的空白性。后来既然有了文字，有智慧的人也还在热心研究伏羲八卦，而且越研究越热心，总想把它用文字注解出来，可这需要大智慧。好在，圣人终于出世了。

周文王，那是一代圣人。

周文王，人家有智慧，能感悟到人类社会的规律与大自然的规律有很多相通之处；人家也有基础，有家学渊源，打小就热衷于伏羲八卦。据说算卦“百算百中”，人家可以画地为牢，根本不用设有形的监狱，犯人也甭想跑，跑哪儿追哪儿，藏不住。姜太公不也是人家算来的吗，当然了，那也是愿者上钩。不管怎么说，反正人家那是神算，所以后来算卦的旗号儿都写着“文王八卦”。

算卦归算卦，可演卦那是需要条件的。光有智慧、有阅历不行，还需要时间，需要静下心来着实钻研。

机会来了——文王拘而演周易。大家都知道，周朝之前是商，也叫殷商，商朝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朝代，但是传到商纣王的时候，就完了。纣王虽然有才能，但是品性太差，暴虐无道，上至诸侯下至百姓都怨声载道。比较起来，当时的老百姓更欢迎周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西伯侯这么得民心，商纣王当然有点紧张，就找个借口把他抓起来关姜(yǒu)里了，而且不说啥时候放。文王不像一般的人，一旦坐了牢就颓丧了。人家心里很平静，不单平静，还得做点儿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除了教化姜里那一片儿的百姓，更大的事业就是推演伏羲八卦，给无字天书加注解了，也就是写《易经》。可能，当醉心于自己热心的事情时，也能减少不少苦闷。总之，他为了顾全大局，要保住性命，没有马上跟纣王对抗，而是忍气吞声，忍辱负重，这才完成了理想，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以利后生。

周文王把自己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亲身体悟，透过六十四卦保存下来。他为六十四卦的每一个卦都写了卦辞，每卦六爻，每一爻也都写了爻辞来说明(也有说爻辞是周公写的)，费尽苦心、字斟句酌，这就是最早的《易经》。文王六十四卦推演下来，居然天衣无缝，既环环相扣又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补。

其实，六十四卦还是八卦，八卦就是六十四卦；《易经》就是八卦，八卦就是《易经》，连起来就叫易经八卦。六十四卦不过是八卦两两相叠，重新排列组合得来的，所以又叫重卦。下面一个叫内卦，上面一个叫外卦，这样一来三画卦就变成了六画卦，也叫六爻卦。之所以这么变，是因为人类社会越发展，人事越复杂，三爻卦已经不够用，而六爻卦就很精细了，也很科学。

至于为什么只用六爻变，起码有这么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子在《系传》里说的：“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也就是天地人“三才”。人文文化中人有男有女，天地也同样有阴有阳，二三得六。这是孔子的心得，几千年来，我们没有脱离他的范围。第二种是

说，“六”代表事物发展的六个阶段。宇宙间的事情物理，都是按照这六个阶段发展的，没有超过六个阶段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六大顺，逢七就变”，第七个变就已经是另外一个新局面的开始了，这也是被现代科学证明了的。

那么，这六个阶段是按怎么个顺序走的，或者说六爻卦亦或三爻卦是从哪里画起？从下面画起，由下而上，由内而外。这也是《易经》给我们的启示，所谓“气由下升”。引申一下就知道，《易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情要发生变动，那都是从下面开始的，也就是从基层变起；或者说宇宙事物的变化，是内在先开始变，比如人的变，就是内在思想先变，别人要想改变你，那是相当难的。中国人说的：“物必自腐，然后虫生”，也就是这个道理。

一卦有六爻，64个卦就有384爻，384个爻的变化那就非常复杂了，叫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单从一个卦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种复杂性，每一个卦起码都可以变出八个卦，八八六十四，这就从八卦变成六十四卦。每一个卦还有错卦和综卦，综卦就是把本卦掉个头，从对面看过来的那个卦，错卦就是位置不变，六个爻阴的变阳、阳的变阴。此外还有交互挂，也就是把本卦的二三四爻配合成一个三画卦(互卦)，三四五爻也配合成一个三画卦(交卦)，然后把交、互两卦上下重叠为一个新卦，就是本卦的交互卦。除此以外，各个变卦分别还有他们自己的综卦、错卦、交互卦。够乱的！没关系，你只要知道这就叫错综复杂就好了。对于一个卦，要上、下、左、右、里、外、前、后多个角度都看到，还要看到这里面的交互变化。对卦是这样，对宇宙自然，对人事百态也得这么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八面玲珑就是这么来的。反正就是要周到，别以偏概全，这就是《周易》也就是《易经》给我们的思想。

《易经》广大悉备，无所不包。六十四卦比八卦更精细，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六十四卦方圆图(见图2-2)对于时空的绝妙把握。这里的方图代表方位、方向，是管空间的；圆图代表时间，代表宇宙的运行法则。图中蕴涵了宇宙人生的奥秘，即便现代科技发达，也还没有达到它的高度，也还不能完全解释它。但是，从中却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的思路那是和时空紧密联系的，完全是取法自然得来的，做人做事是一套东西，而且这套东西直接和宇宙自然声气相通。不像西方那样是分开的，做事的划给科学，做人的划给宗教。

礼乐文明建制

商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时代，当时民智也还没开，要一下子破除迷信，那是相当困难的，几乎不可能。这样，周文王才会用卜筮的词句，用卜筮的形式来写《易经》，用吉、凶、悔、吝、无咎这些话，透过占卜来了解其中的道理。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也是这么个情境。这就给《易经》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以神道设教，其实这是他良苦的用心。

周公和武王大概是文王最贤能的两个儿子，周文王在世的时候，他们就辅助文王，随侍左右，颇受熏陶，他们深深地理解父亲文王是重在教化。所以，当周武王提出“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时，他是有很重很重的使命感在里面的。那意思就是说：既然身为人类，就要觉悟，要拉开跟动物的距离。文王在《易经》里不是说了吗：人是天地之间唯一能够帮助天地来改造这个世界的一种动物，这是我们的责任。其实，这正是《易经》的宗旨，或者说是周文王的宗旨，武王把它明确地提出来，说明他真正理解了先王的意图。

礼乐就是为了教化。在周王朝刚得天下的那段时期，武王继承了父亲设计的礼乐，也因袭了殷礼。一方面，周文王时代就很重视礼乐，而且，经过精心设计和多年实践，颇具规模，颇有成效；另一方面，殷礼也还有可取之处，该继承的也要继承，不能为了创新就完全弃旧，关键是看旧的合不合理。当然，即使因袭，也必有它自己的一番统一性。这里自然有周公的一番心血，尤其在武王克纣六年崩后，周公摄政，再六年，正式制礼作乐，成了系统也成了制度。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周成王的亲叔叔。因早前被封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所以称周公。周公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是能够与孔子并称为圣人的人，而且周、孔并称的时候，恐怕还得周公在前，孔子在后，周公称先圣，孔子称先师，周公称元圣，孔子称至圣，周公被封为文宪王，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如果把我们的上下五千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则可以说，周公是前一阶段礼乐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后一阶段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不管为伏羲八卦做注解也好，还是为万民教化而设礼乐制度也罢，首先，这个设计者要真正悟得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经世事、不经困厄大概是没法悟的，一是没那闲工夫，二是更没那心境。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据说写的是卦辞；周公居东才有的爻辞，也就是说爻辞很可能是周公写的，而且是在“居东”的时候，“居东”也就是周公的困厄。为什么困厄？简单说来就是：武王一死，继位的儿子成王还是个小孩子，所以让周公摄政，武王封在东边儿的另三位弟弟不干了，都想自己揽权当大王，却给周公泼脏水，说周公大概要篡位，我们要清君侧，竟然纠合了纣王的儿子搞叛乱，结果让周公给平了，就此也消除了商的残余势力，征服了东方很多小诸侯国，实际上是为了稳固周的统治基础。周公的行为可没得到侄子的认可和理解，得到的只有误会，人家还小嘛。所以，周公这段时间心里是十分苦闷的。很多明眼人都说：作《易》者大概有忧患吧，那指的就是文王和周公父子。

常言说，日久见人心，加上老天示警的帮衬，最后成王终于理解了周公，认可了人家勤劳王事的甘苦。从此以后，周公得到了成王的完全信任，一切政事全交周公处理，自己心悦诚服、再无怨言。于是，周公得以逐步实行他的政治理想。

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那就是制礼作乐。当然，礼乐是伴着宗法制和封建

制一起施行的，但我们这里暂不去说它，只着重说礼乐。周公的心志和先王是相通的，制礼作乐是为了教化。当然会有人马上站出来说：他那是为了他们的家天下，是为了维护统治。这可能就有点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圣人的名号不是那么容易得的，对几千年来大家公认的事情还是要持尊重的态度。

人家那套制度也是先试点后推行的。新都洛邑就是新礼乐的一个试演场——周公既定乱，以殷民建洛邑，因势利导，遂会诸侯于明堂。明堂者，乃明诸侯尊卑之意。这一次会合诸侯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就是从这一次开始，颁布了朝见的位次。位次的决定，即表示封建制度的完成。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周公建立明堂而朝诸侯于其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既然天下大服，说明当时的人们那是相当认可的，应该是心悦诚服。也只有大家都心悦诚服，才可以传播久远，也就说明它真的合情合理。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说“合情合理”“合理合法”，大概还没有倒着说的，可见在中国人心里，本来就是按照“情、理、法”的顺序依次排列的。这应该也是长期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充分体现着以人为本、道法自然的中国思想精神。“礼”正是从“理”来的，是从“宇宙自然之理”来的。

礼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其范围那就太广大了。举凡政治制度、行政法规、社会规范、宗教仪式、外交礼仪，甚至两国交兵，都有礼的存在。周公制礼，传了三百年到春秋的时代，还能看到此礼的遗迹。那时，列国贤大夫判断人的吉凶皆以礼，无礼必亡身；而外交人员见面也要先赋诗明志——来个咏叹调，用这种方式代替直接的表白，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稳住情绪，避免直接的冲突。这实在是伟大的发明，周公制礼成了大功德，传颂久远，也影响深远。

礼的真义，其实就在以谦让完成事情，也就是以和平的手段求得事情的顺利完成。抓住这一点来看周公的礼，就会更真切。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礼与乐的密不可分。乐有融洽的本质，再配上礼，自然可以促使典礼或事情顺利地进行，并圆满地完成。《诗经》除《国风》为民谣外，《颂》为宗庙之乐，《小雅》为燕飨之乐，《大雅》为朝会之乐，《雅》《颂》多有追叙祖德考烈之作。“追叙祖考之德业，孝也；燕飨劳士，体惜也。孝则民德归厚；体惜则劳而不怨。辞让和平之心因而兴起”，所以，要参透周公之礼乐真义，不可不读《雅》《颂》。

周公之重礼让还可以从他表彰文王受命，不歌颂武王武烈看出。也就是说，周公倡导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文德重于武烈。而且，天下既然一统于周，那么，马上在明堂追祀文王，使配上帝，告诉天下人我周朝是以孝治国的。孝是礼的大关节，没有讲究礼而无视孝的。这种思想无疑影响了中国数千年，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直到今天，我们大概也还不好就否定它。周公制礼作乐大有深意，不可全以私心来揣度他。

礼乐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文化形态，而周公是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创造者。礼乐文明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敬德保民”，也就是德治思想。周公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形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原因也正在于此。周公提出的德治思想，开启了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而且礼乐文化直接孕育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则在西汉武帝时代一跃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就是后来儒家思想的渊源。正如近代学者杨向奎所说：“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番精神状态。”

直到今天，我们可能还会隐约感觉到，自己的基因和血液里好像还有这些思想意识，甚至在行为上都经常体现出来。因为，通过参模宇宙自然规律，来设计人类社会制度，本身这个思路就是正确的，至于具体制度的形式那倒是可以与时俱进。根本思想精神源于自

然，符合自然规律，这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传承久远，虽历劫而长存！也才有十足的魅力，吸引、影响后来者去再挖掘和再发扬。

为《易经》插上翅膀

孔子就是周公的粉丝，更是周公思想的发扬者。可以说，孔子的思想与伏羲、文王、周公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参透宇宙人生之理，并将这深切的认识与体悟记入《易经》的人。如果说《易经》是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那么，他们就是定下这基调的三代圣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先把孔子给《易经》作传的事提前拿到这里来讲，其他则专章另叙。

我们现在说的《周易》其实包括两部分：一是《易经》，一是《易传》。《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序卦传》《说卦传》《杂卦传》，是对《易经》的注释，要想读懂《易经》那你得先读《易传》，没有这十支翅膀，你还真飞不起来。太史公司马迁十分明确地认为，孔子是《易传》的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然而，后世颇多质疑，到了20世纪上半叶，《十翼》非孔子作品反倒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可是，随着帛书《易传》及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最终还是认定《史记》所载不诬。

其实，中国人自古讲究的是成一家之言，很少说个人意见，因为我们深知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讲师承。大家可以有发挥，也可以有修正，但就是不去推翻老师，咱们是去加砖添瓦，不断累积和调整，只是到时候找一个普遍认可的人作为代表，冠上他的大名。试想，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想的难免不周全，有后来者在基本理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补充和调整自然更合理，也更有生命力。所以，没有专利权也未必全是坏事。

大家都知道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那就是看《易经》看的，所以，说孔子最爱看的书是《易经》，估计没人有意见。《易经》在周代上流社会是常见的典籍，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占卜吉凶。没办法，那时候民智还没开，大家都迷信。周文王作《易经》时也不能不考虑这个社会实际情况，所以为了适应当时的情状，就给《易经》批了层神秘的外衣，使它看起来很像算卦的书，而且照此算卦还很灵。没法不灵，因为《易经》是从宇宙自然规律来的，只要你真懂得了宇宙自然规律，由此推理判断，那一定很灵。但你要说我是靠推理判断来的，没人信；你要说，这是算卦算的，这是神明的指点，大家觉得就很可采信。比如，要告诉人们不许对尼姑无礼，大概对坏人还是无效；但是要告诉他遇到尼姑会倒霉，大概人们就很小心，见了尼姑看都不敢看，躲着走，这样尼姑就很安全。咱们得这么想，才觉得神道设教还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民智未开的时候。任何事情用到合理就有价值，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孔子对《易经》的认识，与时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他也用《易经》来占卜，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而且，从没否定过《周易》的占卜功能。不同的，孔子并没有停留在《易经》的卜筮功能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因素，或者说要把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做通盘考虑，要将宇宙自然的规律转移到人类社会，将两者打通。这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也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人类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与自然悖行，必然是自取灭亡。这个工作从伏羲、文王、周公，就一直在做，但是，这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这条路上一旦做出成绩，那无疑就是圣人。“世历三古，人更三圣”表彰的就是他们，孔子便是那离我们最近的一位。

孔子算卦，算到后来得出一句话——不占而已矣。这跟善易者不卜是一个意思，也就是宇宙自然的道理都了然了，也就没必要算了，一想就那么回事。所以孔子说：易，我后

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也就是说我看中的是《易经》里面的道理，占卜那是次要的。又说：君子靠德行求福，不一定祭品摆得很丰盛；靠仁义求吉利，很少去问卜。由此足见，孔圣人那是真正抓住了根本，真正理解了先贤的良苦用心。

孔子对《易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古之遗言”上，关注的也确实是其道德训诫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人伦意义来评价《易传》却是不恰当的。孔子作《易传》别开生面，并非是为了作《易传》而作《易传》，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孔子人家有阐释，有增益，有发挥，还有高度和深度，应该算是三作者之一，而不能仅仅算作译者。而且，人家也没把象、数和理分裂开来，在孔子那里象、数和理那还是一套统一的体系。

从道德的角度阐扬易理，倒未必就是孔子的发明，孔子作《易传》的真正价值也并不在此。谈到孔子作《易传》的价值，章太炎先生的那段话比较恰当：孔子赞《易》之前，人皆以《易》为卜筮之书。卜筮之书，后多有之，如东方朔《灵棋经》之类是。古人之视《周易》，亦如后人之视《灵棋经》耳。赞《易》之后，《易》之范围益大，而价值益高。《系辞》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孔子之言如此。盖发展社会，创造事业，俱为《易》义所包矣。此孔子之独识也。

也就是说，孔子他老人家通过给《易经》加《易传》，把《易经》在当时人和后世人心里的价值地位大大地提升了，甚至可以说使它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是因为圣人慧眼独具，更兼心有灵犀，透过《易经》那层神秘的外衣，看到了它的精神实质，并适时地找一个恰当的角度去阐扬。

孔子找的这个角度就是道德。这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周公所制的礼也崩了、乐也坏了；天子的尊严几乎荡然无存了，各路封建诸侯却张狂得不行。天下乱了，人们困惑了——道德还有什么用？孔子自己就面临这样的尴尬：天天讲仁义道德，而且践行不悖，却处处碰壁，在流亡的路上，在蔡地绝粮最困厄的时候，众弟子产生了困惑和动摇。爽直的子路愠见(孔子)曰：“君子亦有穷乎？”那意思就是说，老师你平素总是教导我们行仁义行仁义，现在到了这步田地，该怎么解释？另一高足子贡也勃然变色，表示困惑，甚至于劝孔子降低追求的标准，以求为世所容。尽管当时孔子处变不惊，但是这种信仰危机必须解决。

《易传》就是孔子周游列国返鲁后作的。《易经》为孔子一贯的道德主张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的依据。孔子一生关注伦理道德，对此，“弥纶天地”“广大悉备”的易道似乎给出了天然的答案：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系辞上》)

可以看出，在“动静有常”“刚柔相摩”的易道演化之中，人类的道德现象只是其中合乎规律的一个环节，是顺应乾坤之道的自然呈现。《易传》又说：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系辞下》)

可见，道德作为人道中事，本身就是易道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正当性依据不在其自

身，而在于更高层次的天地之道——易道。所以“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这就叫述而不作，全都是效法自然，而不是圣人自己立道，这也才称得起圣人。如果是圣人立道，天地则之，则显然荒谬，不能成立。这正充分说明了人的局限性，人并不拥有道德的最终立法权，这个权力只能来自超越人类的易道，也就是来自宇宙自然，所以要“与天地合其德”。

这样的道德是永恒的，永不消失，万古长存。因为易道是大道，天地万物只是它的表现形式，乾坤运行不止，万物生生不息，易道就蕴于其中，除非乾坤运行停止，万物(包括道德)才消失。

合乎宇宙自然规律的道德还是超越吉凶的。这一认识也表现在《序卦传》对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哲理化解释上。《易经》中的吉凶卦象，都是作为易道演化的结果，自然而然生成的，我们细玩经文就会发现，经文中表现的价值观本来就相当中立。可见，在圣人心中吉凶的概念和凡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据说，孙权派吕蒙夺荆州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让善易的谋士给卜了一卦，是节卦。谋士解释说：这次我们必胜，关羽死节，但是甘节。试想，作为一名武将，战死沙场，算得上是死得其所。所谓“不怨天，不尤人”“求仁得仁又何怨焉”。

不怨天，不尤人，尽人事，听天命，尽性知命，这就是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它肯定了道德的绝对高度，提出了道德自身满足的独立价值体系，摆脱了功利效果的对应，既维护了传统的礼乐文明，又回应了来自现实的置疑，以空前的深刻程度为儒家、为后世提供了难以撼动的道德信仰基石。因为，道德实践体现的是宇宙间最高的真理。直到今天，乃至未来，道德依然是最高信仰，也是最有可能被全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信仰。

从伏羲、文王、周公再到孔子，《易经》终于完成了它华丽的转身，也为中国思想、中华文化奠定了基调。

第三章 第一次大纷争

王纲解纽

周朝享国800余年，不能不说是礼乐制度的伟大功效。这种制度主要考虑的，其实就是如何效法自然来安排人事秩序，安排得好那自然也就国运绵长。然而，秩序，难免会面临破坏、修复等一类挑战性的状况，也就是有序会变成失序，朝代也不可能无限期地延展，正所谓“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自然也是合乎历史乃至自然规律的，因为“反者道之动”。

周朝也不例外，一方面原有的王权政治体制一度解散，文化格局面临“礼崩乐坏”；另一方面，既成的体制、格局又需要因时制宜，强烈希望强化自身、修复秩序。这就是西周衰殒后经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六国的一段历史画面。

西周大致经营了350年的稳定，自周幽王被犬戎杀害，平王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算作东周。东周可就没有西周那样祥和太平的氛围和景象了。东周时候，王权几乎就剩了个空架子，几个大诸侯国——齐、晋、楚等的国君继起称霸。他们打的都是“尊王攘夷”的大旗，挟天子以令诸侯，谁实力强谁说了算，没人再讲“礼”了。

天下乱了。君不君，臣也不臣了。按孔子写史时的定义，这就是“春秋”时代(大概历时240年)。之后，以“三家分晋”为标志，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纵横则成“战国”时代，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其间又经历了180余年。这样，终东周一代，中土动荡，合、分、合大约四五百年，也够长的了。

大家不禁会问，为什么西周维系了三百多年的“王纲”会解纽呢？那原因可多了，造成历史变动的因素本来就是多样的嘛，多因素互作，最终形成一种“合力”，造成一种“形势”或“趋势”，那么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从经济上看，西周曾依靠“井田制”来实现农业立国，保障民生安定和贡赋来源，但到了西周末年，“井田”崩溃了。一方面，经过两三百年的太平盛世，人口增加了，从前划定的分配已经不适应实际；另一方面，由于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引起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然而，生产力一提高，经济就开始发达，经济一发达，社会竞争、剥削和压迫也随之而来。土地的私有和兼并动摇了农村经济的基础，破坏了井田制度，而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互相争夺地盘，更推动聚敛夺取变本加厉，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私有欲望不断膨胀，古朴民风渐趋失落。

从社会阶级的分化对立来看，大宗主一方面不愿放弃已有的权利和偃仰享乐的生活，对于“勤民敬德慎行”的传统和方针也不再顾及；另一方面，对于来自民间的反抗又无法阻遏，于是上下之间离心离德。再加上，西周后期屡屡用兵，或征犬戎，或伐楚子，使得王室力量衰颓。

从社会组织方面看，周初立宗法制度，是依血缘系统来安排政治组织的，君权重，诸侯卿大夫依次而轻，所谓“本固枝弱，内重外轻”，但时间长了，血缘纽带逐渐疏松，君权削弱，诸侯涨破了封建均衡的格局。尤其是几个处于外围的诸侯，南方的楚、北方的晋、东方的齐、西方的秦，由于处境较为优越，扩地日广，兼并弱小，分别坐大。在他们的头脑中，关于力量的观念和知识，也逐渐地凌驾于“礼义”之上，事功也就排挤了伦理的价

值。这样，各诸侯可以不臣于天子，各国卿大夫也可以不臣于他们的诸侯。于是，天下乱了。弑父杀君、公子争立、公族互杀之事，在春秋战国之际不可胜数。

随着五霸迭起，吴越代兴，权谋霸术之道成了应世的主要文化智慧。崇武养士蔚然成风，学术开始下移，一个平民精神活跃的历史舞台搭建而成，历史正张开双臂，迎接此一时代的社会精英登台一展风采。

由官学到私学

在今天，大家几乎都上过学，受过教育，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那是相当高了，即便是读大学也不会太难。显然，我们这里说的教育是狭义的，主要指的是学校教育，与家教、礼教、宗教那种教化的“教”，还是有分别的，尽管也有些联系。

与后世不同，在周代，那可是“学在官府”的。学在官府、宗法制度和“土地国有”(也就是周氏族为首的联盟所公有，这里的公不是天下为公之义，乃是公子公孙的氏族贵族之义)是西周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劳动力的形态主要是集团的或公社的，即以被征服的氏族(如殷民六族、七族，怀姓九宗)为单位，进行“千耦其耘”的大规模生产。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所支配着，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也当然不是国民式的，而是君子式的。具体地讲来，意识的生产或者说思想学术，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春秋末期所谓学术下民间的历史，已经是周道衰微的见证了。

我们看到，大部分金文中出现的西周官吏，有这样的名目：卿事寮，大史寮，三左三右(左：大史、大祝、大卜；右：大宰、大宗、大士)，作册，司卜，冢司徒，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走马，左右虎臣等等。其中，大祝、大宗、大卜等官，同时即为宗教的思想家。由此可知，“氏所以别贵贱”，同时派生的东西还有“氏所以别智愚”，在那时，事业家与观念家是“不可分裂的结合”。其实，也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社会分工也不发达的标志。

中国古代，常见的是君子(贵族)与小人(鄙夫)的分类，而没有国民性的智愚分类，其秘密就渊源于此。你看，在古希腊，思想家被称为“智者”，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则被称为“贤人”。

而“人”在卜辞中，还没有和氏族分立，也就是，周时的人指的只是有身份的人，而不是所有的自然人。基本上，它包括这么几个含义：称氏族先王，称王者，称氏族贵族(君子)，称在位的职官。与“人”相对的是“民”，那才是咱普通老百姓的一般代称。

所以，与“人”字连类的就是“圣”，这个字最早就见于西周文献。考“圣”的本义，据说与“哲”可以互训。“圣”“哲”都是指配天的美德，并没有知识教养的意义，而这种美德只是对先公先王所加的专称，从不用以形容普通百姓。很明显，“哲人”这个词儿在咱们中国古代和希腊古代，那是名同而实不同的。

“圣贤”“贤哲”两两连用，那是后来的事。“贤”字，并没有德性的意味，最初是指在“巫术”及“射礼”方面的能手，或用作技能优异者的代称，这里所谓“技能”的领域，也仅限于狩猎。狩猎中的“贤者”也就是“神射手”。

至于“贤”字之获得国民性与道德性，及其成为一般智能的代称，进而与“圣”“哲”相结合，大概是在春秋时代，由搢绅先生创始，到春秋末世及战国初年由孔、墨显学完成。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与智能一体相连的“贤人”晚出，二是晚出的“贤人”又很快失去了“智能”的独立性，而与配天文德的道德概念水乳交融，也就是“智能”被“道德”淹没了。鉴于殷商的灭亡，周朝从一开始就以“天命维新”自警、自勉、自我约束，这也就是道德的起源。

对这两点进行思考，应该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深入理解。

在宗法制度下，社会阶级的贵贱是以血族传统为标准，而不以智能为标准。与此相应，氏族意识也约束着国民意识，于是，国民阶级出现难产，所有的只是服务于氏族贵族的奴隶，社会不变革，他们就永无出头之日。

然而，社会终将变革，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生产力在发展。

铁器被发明和使用，那是在春秋战国时候。铁器的使用较之石器或木器(青铜器主要限于鼎彝，从未普遍用于生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的价值。这就是说，在石器或木器的生产力阶段上，一般地说来，难以冲破氏族制的束缚，因而不可能发生生产资料私有的所有形态，也不可能发生多种阶级关系；只有在铁器的生产力阶段上，才具有改造生产方式所依据的技术条件。

铁器的使用，在农耕文明里，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效益，推动了社会物质乃至精神文明的变革或者说进步。因为铁器的使用，显然改革了农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从而促使土地所有制形式进入了私有化的过程，促使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自然也就不能不通过政治法律的折射，改变了它的面貌。

在春秋的文献，例如《诗·大雅》的“瞻卬”“桑柔”“抑”，《小雅》的“正月”，《曹风》的“候人”，《魏风》的“伐檀”，《北风》的“北门”等篇，以及最古的私学著作《论语》中，才看出了因土地私有，开始发生社会内部的阶级分裂，也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相反，在土地公有的西周文献中，则绝无贫富对立的字句。所以，我们说，周人的“学在官府”是和当时的“土地公有”紧密相关的，当然，这与生产力不发达也脱不了干系。

好了，现在铁器被应用于生产了，生产力算是前进了一大步，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社会关系层面、精神学术层面是必须要跟着调整的。而这一调整又谈何容易，如我们知道的，它用了好几百年。

从春秋开始的氏族组织解体，是一种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的政权逐渐下移的运动。而在这一运动过程中，自然而然也就包括了知识、人才的组织系统，因为官学体制下的教育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为西周宗法制度培养干部的。氏族组织要解体，它就没有理由存在，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旧“官学”统系衰败了，民间“私学”就兴起了。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也就是“百家争鸣”的前奏。所谓礼乐，基本可以看作古代知识、学问的总汇，它就寄托在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既然“礼崩乐坏”，那么，也就是说官学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了。所以，孔子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庄子慨叹“道术将为天下裂”。

春秋中晚期以后，王官权威日益分解离散，各诸侯因为自保或者对外扩张，所以人才缺口比较大；而原来的官学是垄断的，无法实现社会人才和文化上的垂直流动。怎么办？突破垄断，开办私学。也就是打破原来社会等级的固定性，为士、庶人的上升敞开门户。而且，这时候不愁师资。社会上有这么一批人，有知识，无岗位。要是在以前，他们怎么着也有个一官半职，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他们入仕无门。可是他们依然清高，自认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宁可修身志道，不愿仰禄于人，于是不少有学之士投入教育行列，私学遂兴。

私学的兴起，意义主要在于教育的独立和面向全社会，以及知识独立价值的确立。可

以说，私学之兴，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春秋战国间诸子百家学术兴旺的气象，也促进了“知识阶层”的相对独立。由于私学大都由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来主持，所以私学又带有思想中心的性质。而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与办私学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旦思想理论自成体系、独树一帜，那社会影响和传播力就相当可观。

私学的核心之一是师徒关系，以私学为基础，社会上也就出现了以宗师为核心的许多学人集团，如孔子、孟子、荀子等皆有门派，墨子与其弟子的集团几近于“结社”。集团也好，门派也罢，反正不是一个人，这也就是“百家”的渊薮，而这，势必伴随着“士”阶层的扩大、独立和分化。

“士”之崛起

“士”，本来是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人(可能还专指武士)，既然与贵族沾亲，那就有身份，但是身份也不能算太高贵。大约在西周时期，才出现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这应该是周代宗法制度的产物。现代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周代世卿大夫以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诸弟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庶人。

看来，要想永保高贵的身份地位，就得是嫡长子，嫡长子的嫡长子……没办法，资源有限，位置有限，制度只能这么规定。那么，其他儿孙呢？对不起，逐渐下降，直到沦为庶人。事实上，贵族的庶孽正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捭阖的张仪出身于“魏氏余子”，余子也就是支庶。范雎原来也是“梁余子”，商鞅原来是“卫之诸庶孽公子”，韩非则出身于“韩之诸公子”。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而且这类人物的数目还不会很少。举个例子，齐靖郭君田婴一人就有40多个儿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而“士”就是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站。

这些“士”与第一位贵族祖先的血缘已经比较远了，身份地位也大打折扣，流于贵族阶级的最下层，到了上与下的交会处，这着实有点尴尬。不过，他们还是能够享受一项很可宝贵的氏族待遇，那就是上学，或者叫接受教育。因为在那个“学在官府”的时代，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可能享受文化知识的教育。

那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知识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西周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主要是为贵族设的，其中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小学为童蒙之学，学的是书、数一类知识，有点儿像咱们今天的语文和数学，但还不是一码事儿；大学学的主要是礼、乐、射、御等，这些在当时礼乐制度的背景下，可都是安邦治国之术。而且，国学校址一般都设在大都市，执教的老师也都是有一定职守的王官。至于乡学吗，跟国学一比，就显得寒碜了，一般设在小城邑或都邑的近郊，吸收的学生也等而下之，都是些士和比士略微高级点儿的低级贵族。乡学的教学内容，也就是士所接受的文化知识，多为明人伦、知纲纪、定尊卑的礼节修养和从军打仗必备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千万别说“礼、乐、射、御、书、数”比不上“数、理、化”，也不要说人伦、纲纪、礼节修养不算先进知识。要知道，礼乐绝对具有教化的功能，尤其在那个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这是一套很严密的系统，对于人们思想的作用力是不容低估的。有了知识、技能，尤其是思想，那就不同于愚夫愚妇。士就是这样一批人，虽然身份已不再高贵，但是有知识、有技能、有思想，并且可以靠这个入仕，为社会服务。

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也就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远在商周间，巫、史、祝、卜，可以看作是早期社会分工后产生的最早的士，他们是具有文化性的角色，他们服务于王权贵族的统治，也依附于王权贵族的统治。春秋制度沿西周而来，社会地位居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这些士，有的成为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有的成为捍卫社稷的武士，有的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通公务员。

然而，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也面临着解体。战争不断发生，把原有的社会秩序整个打乱，贵族与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了。老规矩谁还讲究，宠辱礼罪的标准完全根据需要来定。社会成员的身份不再是无法改变的宿命，垂直流动成为趋势，而且是势不可挡。于是，士的数量大增，内涵也泛化了。到了战国，士的成分已经五花八门

了，从文到武，从雅到俗，从宫廷到市井，从豪杰到流氓，从积极谋求的智者到恬淡归隐的高士，不一而足。有人还进行了初步分类：①武士，②文士，③吏士，④方术之士，⑤技艺之士，⑥商贾之士，等等。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社会阶级结构和文化格局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春秋战国间，是士阶层发展最充分的时候，也是思想言论最自由的时候，尤其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到前三世纪中叶的“稷下时期”。

“稷下”是个地方，就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是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田齐桓公。齐宣王之时，在稷下扩置学宫，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之学，会集于此，自由讲学、著书论辩。战国中后期各主要学派的重要人物，如：荀子、宋钲、尹文、鲁仲连、田巴、貌说、邹奭，几乎都到过稷下，《史记》描述了当时的盛况：“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邹衍、淳于髡、田骈、接舆、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也就是说，稷下学宫是一种由官方主办、私人主持的办学模式，而且在这里，士人可以“不治而议论”，“不治”，就是“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事，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不治而议论”可以说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无疑体现了稷下学宫鲜明的政治性，但是不问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的学术自由气氛，依然是值得称道的，被公认与同时代雅典的吕克昂学院为东西并尊。

在这样的氛围下，古代士的功能可以说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尽管他们的主要职责还是“议政事”，并且在历史的长河里如昙花一现般短暂，但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到战国末期，这些“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已经逐渐演变为统辖学术的博士了。虽然在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将被动地甚或自觉地接受改造，可是，当时所阐发的思想、提出的观念，尽可以存入我们国家民族的智慧宝库，而那个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自由、开放氛围，更是后世所津津乐道，甚至引发向往和追求的。

谁说的都有理

“百家争鸣”那是学术思想极度自由和繁荣的一个时代，常为后世津津乐道，学术界还将他划入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当然，这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不单是咱们中国自己的事儿。

“轴心时代”是德国的一个哲学家1949年首先提出来的，它不专指哪一个国家，而是指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公元前300年间，北纬30度上下这么一个广泛的区域内，人类文明的发展状况。说是，在这一时段和区域内，人类诸多主要文明的产生以至发达，似乎经历过一个由缓慢渐进突然达成一个快速跃进，以至成熟质变的过程。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则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这种观点是外国人先起的头儿，也是近现代以来人们重新认识了地球，各自发现和了解了地球另一半的同类以后，重新审视全人类走过的道路，才得出的新论断。自然，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黑白的时候，很多学术问题也是涉及全人类的问题，很多学术观点也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以上这个关于“轴心时代”的就是。

共识是共识，可是这个“大多数人”不管怎么说，也都是后人。后人的总结概括得看，可是当世人的见解议论也不能不重视。所谓兼听则明嘛。

外国的，我们且不去管它，中国思想嘛，咱就说中国。

这里放着现成的文献资料呢——庄子的《天下》篇。

庄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春秋战国时期，具体说是战国中期的名人，我们都知道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如果中国有西方所谓哲学的话，我们也认为他是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你可能不知道，庄子还是位哲学史家，《天下》篇就是这位哲学史家的关于哲学史的论文。至于有人说《天下》篇非庄子自作，乃庄子后学所作，这样的笔墨官司咱们不愿意打，本书开篇即言中国讲究成一家之言，这篇文章总没出庄子这一家就是了，而庄子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有人说：《天下》篇是“惟序晚周学术之源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历叙古今道术渊源之所自”(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天下》)，“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序》)

那么，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呢？主要是两块儿：第一，慨叹“道术将为天下裂”；第二，批评诸子学派，这里的“批评”当然不是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诸子百家也不能全提到，着重几家而已。

既然是慨叹“道术将为天下裂”，那就是说，在此之前道术是整全的，庄子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无乎不在”，“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以至于百姓，皆有所宗所本，有所依归。并且，圣人已遵循这整全的道为人们设置了制度(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编著了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只是如今“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了。“后世之学者，不幸不

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彼时，天下多是些得一孔之见就自我欣赏的人，他们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却不能相通；又像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却又都不完备和全面。他们割裂天地的完美，离析万物的道理，把古人完美的道弄得支离破碎，很少再能具备天地的完美了。

其实，诸子百家说的那些道理，古之道术早都涵盖了。比如像墨家提倡的“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暉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宋尹学派倡导的“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彭蒙、田骈、慎到(稷下道家学派)提出的“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关尹、老聃追求的“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等等。

他们说的都有理。毕竟，这些也都是整全的道的一个方面嘛。但是，如果要把这一两个方面单拿出来，还放大，并且在全社会各方面广为推行，恐怕就不妥了，事实上也推行不开。

就说墨子那一套学说吧，本是从效法圣王大禹勤劳天下而来，可是，“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q u è)；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像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公孙龙那样，学富五车，雄辩滔滔，又怎么样呢？“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

所谓“道不远人”，不仅要说得有理，还得做得到，不仅自己能做到，还得化成天下，让大多数人也能做到。这才是中国人的“道”。能做到这样，也才能称得上是“圣人”。而诸子里能称得上圣人的却没有几个。

春秋战国的子学时代，一大特点就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诸子的意识已经“裂”成了多种多样的国民生活的“一察自好”了。“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确实很“不幸”，但也确实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经阶段。

不错，往圣先王依循天道自然之理，为人们设置了制度，编著了经典。但是，在民智未开的漫长岁月里，圣人与凡夫的智慧差距未免太大，像《易经》那样的天书，又有几人能真正看得懂呢？制度也好，经典也罢，说理说得其实还真是不够透彻，提示性的语言多，而掰开揉碎明析道理的语言几乎没有。估计要把“道”掰开揉碎地讲清楚，即使对于圣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圣人们在自己智慧已开、悟性超群的情况下，大概都还是本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一个态度治理天下。当然，我们不是从反面理解这句话，也并没有褒贬的意思。可能，在人类发展的幼年阶段，生产既落后，文字又不成熟，要想开启民智并不容易吧。

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字的成熟和学术的下移，全民的智慧渐开，起码“士”这个阶层的人大为扩充，有知识的人多了。他们慢慢会对既有的礼法、制度、思想乃至自己循此而动的行为产生怀疑，尤其是在天下大乱、社会动荡的时候，而春秋战国就提供了这个条件。

这种怀疑是人类发展所必经的阶段，毕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是一个人或者全

人类成长过程中必然的思想追求。

“道术为天下裂”或者说，正是为了“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人们要把那个囫囵的、混沌一体的“道”扒开来仔细瞧瞧，瞧个清楚。尽管，“道”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解剖成条条块块儿，但人们就是要尝试，即便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也非得这么做不可。也许这就是人性——好奇。

但是，庄子的话也提醒我们，光条分缕析是不行的，那样只看部分不见全貌、只看表象无视本质，会很“不幸”。其实，有这种认识的不仅是庄子，像老子、孔子、荀子，他们都有类似的认识。

好在，我们是上下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文化和血液里依然流淌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合”的精神基因。“合”就是“一”，“一”就是“合”，“一而二，二而一”，“分”是为了“合”才“分”的，不是为“分”而“分”，如果最后搞到“合”不起来，那“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天地之美”也就再难重现！

中国自古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不朽”基本等同于“永生”，想永生吗，那就照这样去做吧，不一定非得去求神。

诸子中，凡是今天还被大多数人熟知的，几乎都有著作留世，也就是著书立说。当然，“立言”也好“立说”也好，总归你得立得住，不然著书也是白著，历史会把它淘汰掉；相反，要是你的“言”能立得住，最好再有德与功相配，即使你自己不动笔，你的后学也会积极地替你著书立说，甚至甘愿冠上你的大名，他们连署名权都不要，他们自觉地认为这书的思想都是宗于你，理所当然就应该这么做。

下面，我们将择要介绍春秋战国间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物和他们的学说。

第四章 天纵之圣孔子

孔子虽为诸子之一，但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自汉之后，更是举国崇奉，并且立庙奉祀，有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称号。宋儒朱熹曾叹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近世国学大师柳翼谋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是故，我们将孔子放在先秦诸子之首来讲。

素王降世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其实人家姓子不姓孔，孔是他的氏。《通志·氏族略》上说：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秦汉以后，姓、氏合一，通称姓，或兼称姓氏。

不错，孔子祖上确实贵过，只是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

孔子的祖先是商朝的宗室，到周朝时被封于宋国(今河南商丘)，所以，可以说他是殷商(华夏族)的贵族后裔。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这位微仲即是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孔父嘉是在政变中和宋殇公一起被叛臣华父督杀害的，而华氏却成了宋国的当政大臣，于是孔氏后人迁居鲁国。孔子就生在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逝后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名丘，字仲尼，“仲”是排序，他在家中兄弟中排行老二。父亲叔梁纥(hé)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孔子是他老人家七十岁上喜得的贵子。据说，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还有说“孔子首形象邱，四方高，中下，故名丘焉”。

孔子相貌确实不俗，除了上面说的“首形象邱”外，身材还很高大，据说身長九尺六寸，折合现代的量度，得有1米9多，被称为“长人”。更有甚者，说孔子生就的帝王相。汉朝人发现，孔子的相貌很像汉朝的第一个皇帝刘邦的相貌，是个皇帝脸：方脸盘儿，鼻如悬胆，两眼外侧微微上吊，状如飞燕。还说古代帝王一定是这个型儿。所以称孔子为素王，素王是虚龙假凤的意思。

民间传说孔子生而不凡，在他降生的当天晚上，有麒麟降临在孔府阙里人家，并吐玉书，上有“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徵在贤明”的字样。既告众人孔子非凡人乃自然造化之子孙，虽未居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堪称“素王”。孔子家人将一彩绣系在麒麟角上，以示谢意。周敬王末年时，有人在曲阜掘土犁田时，竟挖出了那条当初系于麟角的彩绣。以后，人们又引申出玉书三卷，孔子精读后成为圣人。至今，在文庙、学宫中还以《麟吐玉书》为装饰，以示祥瑞降临，圣贤诞生。

可见，称素王绝不仅仅因为相貌，主要还在学问、德性和教化之功。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位，所以称素王。古有“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之说，实际上，素王在思想教化上的作用还远远超越很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帝王。

当然，任何一位伟大人物的产生，都跟他所生的时代密切相关。时代决定着他的思想和言行，而思想言行又反过来决定了他在当时及后世的角色地位。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年，而东周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动荡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实行封建及宗法制度的西周氏族社会崩溃，王事衰微、诸侯争霸、夷狄入侵、战争不断，社会秩序大乱；一方面，中原文化和风俗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积聚和转化，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内容，呈现着复杂的面貌，一般人都有无所适从的感觉。孔子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挺身而出的，他要给迷惑的世人找寻方向。

昔日“郁郁乎文哉”的文明昌盛已然不在，孔子最钦敬的周公也英魂远逝，他所制定

的“礼”“乐”也土崩瓦解。“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他的使命。他一生都在为此努力，明知不可而为之，不为一时，而为万世！

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世人大都认同，孔子修《春秋》是代王者立法，删定“六经”具有继往开来的卓越功勋！

删述“六经”

六经者汉称“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相传由孔子删定。孔子数千年来被尊称为圣人、至圣先师乃至素王，其功绩应该主要在此。

现代人习惯于把孔子定位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献整理家，而且普遍认为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可对古人来说，这依然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可接受的。古人对孔子的定位就是圣人、素王，曲阜孔庙第一道腰门的楹联——“德侔(móu，齐)天地，道冠古今”，可大体代表古人对这位圣人由衷的感佩和赞扬。

圣人、素王不仅仅是用以表彰个人的修养、德性有多么多么的好，那样的话就是“大词小用”了；这至大至伟的两个词儿，是对孔子向万民，而且是历时久远的万民，宣扬天地之大德、古今一贯之常道的褒扬和尊崇。荀子认为圣人乃是制礼作乐的人。在古代，非帝王不制作，所以到了今文公羊学一系的儒家那里，孔子又成了“素王”，即不在其位的帝王，但为后世立法垂制。

孔子为后世“立法垂制”靠的是什么？删述六经。

孔子本来是想通过立功来传名后世的，就像他终生倾慕的周公那样。可是，他奔波一生，直到迟暮之年也没有达成他的理想，于是他知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的遗恨是死后没有名声留传啊)那怎么办？在从政四处碰壁之后，孔子想到了通过立言来实现“不朽”，尤其是阐扬正道。其实，这就是中国人求永生的方式或者说正途。很理性，不求神也不拜佛。

孔子的立言，就是删述“六经”。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六经”都是经孔子之手订的。正是经过他的删订，这积满时光尘土的古典才成为“经”，而为后世不断地研求，并在不断地研求中发出历久弥新的光芒。

孔子删述六经，有“垂宪万世”的功效，而不仅仅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我们要明白，这里虽有孔子对于没世之名的追求，但说到底还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成果。要按孔子的本意，那是能不说就不说的，孔子曾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然而，彼时天下大乱，好文之风日盛，虚文胜而实行衰，道不明于天下。王阳明先生说：“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传习录》)

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有《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于是，孔子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只有这个才是得其宗旨的。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不知有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到这个时候也不可胜数。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余之说就开始渐渐废弛了。像《书》《诗》《礼》《乐》这些，孔子何尝加一语。至于《春秋》，虽都说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鲁史的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是怕繁文扰乱天下。要的就是删繁就简，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

大家都知道“文质彬彬”这个成语吧，这就是从孔子那儿来的，原文是：“质胜文则

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字义：文是文采，质是本质，彬彬是杂半之貌。《论语正义》上说：“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

看来，删述之意，说得再明白点儿就是删去繁文、祖述正道，以求一以贯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正如《论语》季氏篇里所说的那样，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简直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圣人不仅以诗礼传家，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学礼，而且号召所有的学生都好好地去学诗——“小子何莫学夫诗？”

正是由于孔子的大力提倡并亲自删削编定，《诗三百》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诗经》，成为儒学的重要经典之一，也才有了与“子曰”并称的“诗云”这样尊崇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毛诗序》那一段著名的更为热情洋溢的颂词：“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如果有谁还不理解《诗经》凭什么成为“经”，看了孔子的评价和《毛诗序》的赞颂，总应该有点儿理解了罢。

有人这样说：如果说《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那么《尚书》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散文集；如果说《诗经》是民间的，那么《尚书》就是朝廷的。《诗》是民间的情感，《书》是朝廷的意志；《诗》是抒情的，《书》是理智的；《诗》是散漫的，《书》是约束的；《诗》唱个性感受，《书》倡国家价值；《诗》是艺术，《书》是道德；《诗》是大地，是天空，是大地上的野花，是天空中的飞鸟；《书》是庙宇，是碑石，是庙宇中的祖训，是碑石中的箴言……我们民族最古老最本质的东西，都积淀在《诗》《书》之中了。他们都经孔子删订。

《礼》《乐》也是孔子教化的工具。孔子对枯燥乏味的周代官制、礼仪的记录——《仪礼》，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内涵、作用和本质。他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这与我们之前所说的《易经》之“世历三古，人更三圣”的宗旨是一致的，就是要把宇宙自然那个大道，或者说规律，转移到人事方面来，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

《乐》其实也还是取其教化之意，含着哲学和政治教化的作用。《乐记》有言：“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径。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文艺原来不只是文艺，他们肩负的道德教化之功恐怕远远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最后，就要谈到《春秋》了，这是一部使那个时代都因此而得名的著作。

晚年的孔子顾视日影，喟然叹曰：“不行啊不行啊，君子很惧怕死后没有留下名声啊。我的道行不通了，我凭什么在后世传名呢？”他搬来鲁国历代太史记录的史料，开始著作《春秋》。之前，孔子在做官审案时，都是很谦虚地与陪审官商定判辞，而此时，他竟然“专断”起来，“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连插嘴提建议的份儿都没有。

这本以“微言大义”著称的历史著作，孔子是有意把它写成政治学著作，乃至伦理学著

作的。他老人家在这里就是要述正。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人的道德准则，更希望通过它能够再建合理有序的人事秩序。丘吉尔说：影响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写历史，这话用在孔子的作《春秋》上倒挺合适，春秋以后的历史，不都受着《春秋》的影响么？无论从史书还是从历史本身而言，都是如此。孔子一直在参与着历史进程啊！

始于礼归于仁

我们说过，孔子学问的重点是《易经》。孔子对《周易》的研究、诠释是下了大功夫的，他曾为之“韦编三绝”，全面“辩阴阳之理、释八卦之象”，写出《文言》《彖传》《系辞传》等十余篇注释《周易》的文章。对易学产生、发展、易学的内容性质、易学的应用、方法，做了全面的阐述和诠释。

易经八卦是认识自然、社会的一把金钥匙。但易经要怎么讲，这是个关键问题。首先，你得看对象吧。圣人的学问，或者说中国的圣人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他要垂教天下万世。孔子学问的受众，那是人里面的“大多数”。所以，讲得就不能太深奥。于是，孔子和老子就分了工，孔子有《论语》和他的《诗》《书》《礼》《乐》，老子则有玄而又玄之五千言的《道德经》(那针对的是上智之人)。

《论语》也好，《诗》《书》《礼》《乐》以至《春秋》也好，归了包堆儿可以说是由“礼”的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

孔子生在鲁国，而鲁又是周之旧邦，制礼作乐的周公封地，所以对周的礼仪制度保存比较好，孔子少年时即热衷于学礼，世人也都说孔子“博学好礼”。但孔子并不拘泥于礼。“礼”的观念为孔子学说的起点，却非孔子学说的理论中心。可要说孔子学说的理论中心未离于易，虽然不错，恐怕有些失于玄奥，所以，还是具体一些，从众一些，说它是进于“仁”“义”。

要讲述孔子的思想学说，不能不着眼于这一升进过程。此一过程之展示，还得从“礼”的意义谈起。

“礼”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之礼就指仪文，广义之礼则指秩序节度。前者也就是世俗所知的礼，后者是礼的理论意义，这个原非世俗所知。到了孔子这里，才正式阐明了礼的意义。

礼取“秩序”义，主要是指制度而言，这也就和仪文有了本末之分。再进一步，以秩序或制度释“礼”时，那秩序制度的根据何在？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以当时的流俗信仰，那是“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奉礼即是畏天。孔子当然不会反对，但是，要知道，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研究《易经》到最后得出的是一句“不占而已矣”。基于这个根本思想，孔子之发展“礼”的理论，是要把它导向人本位而非神本位，这是伏羲、文王、周公一贯的传统。于是，有了摄“礼”归“义”，更进而摄“礼”归“仁”。

这样，“仁、义、礼”的理论体系建立了，透显着人对自身之肯定，渐渐离开了原始信仰的纠缠。于是，孔子予周文之精神以自觉基础，遂开创出儒学之规模。

“仁、义、礼”之说，依照理论次序讲，摄礼归义算是第一步。

所谓“义”，在《论语》里大都指“正当”或“道理”，即使稍有变化，也是衍生而已，终不离此一意义。比如：“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那么，孔子是如何解说“礼”与“义”之关系的呢？这在《论语》中有显明的解释：

《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二语，即摄礼归义之理论。“质”是“实”或“实质”，“礼”是为“行义”而施行的。换句话说，“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也就是，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其基础。人所以要有生活秩序，所以要有制度仪文，都是因人要求实现“正当”。人之自觉性的地位突显出来，儒学的初步基础也开始建立了。

孔子好礼，但不拘泥于礼，正是因为他真正知道礼之本是什么。奢与俭只是具体设施问题，也就是仪文问题，那不是礼之本，所以，孔子认为仪文细节是可以改变的，但一定要有理据。孔子并不以为“礼”只是风俗，所以在“从众”还是“不从众”的取舍态度上，孔子肯定“礼”是以“道理”或“正当性”为基础的。

由“礼”进至“义”，是孔子思想的进展，但“义”还不是孔子思想的终点，尚需再进一步，那就是“仁”的观念。

“仁”观念是孔子学说的中心。至于这种哲学概念，有学者曾说：哲学家所用的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系统内的约定性”，希图通过字源研究就能完全了解是不大可能的；哲学家不能自创文字，只能选定某些词语表示特殊意义，以显示其理论。那么我们看看“仁”在孔子那里是个什么意思。

《论语·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是对“仁”之本义最为明朗的解释了。“仁”即是视人如己，净除私累的境界。这一境界是一种自觉境界，是不假外求，不受制约的，孔子用此来说明人的自我主宰性。

《论语·述而》：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由上可以看出，“仁”虽是一种超越意义的大公境界，而人之能够去除私念以立公心，则是一种纯粹自觉的活动。正是由这里乃见人之主宰性。盖“义”指“正当性”，而人之所以能求“正当”，则在于人能立“公心”。“公心”不立，则必溺于利欲；“公心”既立，自能循乎理分。立公心是“仁”，循理分是“义”。后来，孟子言“居仁由义”，又以“仁”为“人心”，“义”为“人路”，最能阐发孔子的仁义思想。也就是说：“仁”是自觉的境界，“义”是此自觉的发用；“仁”是“义”的基础，“义”是“仁”的显现，“义”之依于“仁”，犹“礼”之依于“义”。

以上说的是“仁”与“义”“义”与“礼”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还得把“仁”与“礼”的关系理清楚。

《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从以上这段我们大概可以看出“仁”与“礼”的关系。为什么说“克己复礼为仁”呢？盖克己即去私，复礼即循理。这里没提“义”，因为“义”与“礼”就实践而言，能不随私欲而归于礼时，人也就是已经在循理而行了，也就是合了“义”或者说“正当”。能依照“求正当”的意志方向去实际行动，即显“仁心”。

礼以义为其实质，义以仁为其基础。人由守礼而养成“求正当”的意志，又由此一意志唤起“公心”，这是实践程序。从理论程序上讲，“义”的地位很是显明；从实践程序上讲，则“礼”“义”相连，密不可分。孔子他老人家讲究学问是要用来实践的，所以由“仁”而直接说道“礼”。

总之，孔子学说中不仅“摄礼归义”，而且“摄礼归仁”，由具体可行的“礼”开始，渐进至于“义”，终归于形而上的“仁”。“仁”“义”“礼”三观念合成一理论主脉，不仅贯穿孔子之学说，而且成为后世儒学思想的总脉。

治国以礼，为政以德

关于治国理政，孔子不止一次说“政者，正也”：孔子告诫鲁国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告诫鲁哀公，“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礼记·哀公问》)。

孔子可谓是尊君重民的，或者说他是从尊重人的自主性，甚或直接点儿说从尊重人性出发的。他希望君主自身能够自觉克己复礼，对待百姓也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首先，要求统治阶级要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按周礼行事，以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犯上作乱”的事就不会发生。孔子认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上好礼则民莫不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

孔子是很佩服周公的，因为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人事秩序安排得妥妥当当，这令孔子很是着迷，恨不得夜夜梦到周公。身处礼崩乐坏的动荡年代，孔子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或者说是他的天命，那就是要挽救“礼治”，使它不至于断绝。当然，孔子也认为对周礼应该有所损益。

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出现了臣弑君、子弑父、少陵长、庶废嫡等违背伦理的行为，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僭越行为。因此，孔子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认为“正名”是治国大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各人有各人的名分，与此相应，各人也有各人的责任和义务，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在评价子产时说过这样的话：“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四个方面既包含对人己，又包含了对上对下，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和要求。正因如此，子产使郑国兴盛起来，居相位22年，并得到人民拥护，同僚支持，国君的信任。孔子对此大加赞扬，表达了他心目中理想政治家的风范。

孔子重视道德的价值，不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治国理政也主张依据道德行事，进而形成系统的德治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这都是《论语》里记载孔子的名言。

孔子认为用德化来治理社会，人民不但知道廉耻，而且人心也会归服，就像群星环绕拱卫着北极星一样。他反对单纯依靠刑罚治理社会，主张统治者以自己的道德榜样作用来感化人民，曾对季康子这样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很明显，孔子认为对被统治的劳动者要宽惠，即实行德政。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重教化。经济上惠民，使民“足食”，“所重：民、食、丧、祭”。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

政治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认为德化礼教能把犯罪禁止于未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

综上所述，“道之以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治者为人民树立道德榜样，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二是统治者必须推行德治，表现为宽惠使民，轻徭薄赋，省法轻刑。“齐之以礼”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要带头遵守礼的规定，从而感化和影响群众；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用礼来规范自己，用道德约束自己。这样，德化与礼教的结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重教化，轻刑罚，但他并不否认刑罚的强制作用，他视德与刑为政治的两手，两手都要重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家语》)他认为政治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了就要用严厉来纠正；政治严厉百姓就会受伤残，伤残了就要用宽厚的政策补救。

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认为犯罪可以通过德化和礼教来预防，罪犯可以通过仁德和礼义来教化，反对不教而杀，道德教化为消灭犯罪的有效手段。认为审判和刑罚的目的在于消除争讼发生的原因，而不在于残酷的制裁。

为了实行德政，孔子进而提出“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论语·子路》记载：“仲弓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进而孔子把民意也列入了考虑之列。

孔子“治国以礼，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应该说是由其“仁”的核心思想引申而出，是对人自觉性的肯定和尊重。其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

人生难得知命

忠、恕、仁、义是孔子心心念念的学说思想，也一辈子身体力行，奔波劳碌为的就是能把这套东西推出去，更希望有识货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任用他，从而再造盛世。

可是，事实真的令人很沮丧。为此奔波了十几年都没能达成理想，还屡遭困厄，就连孔子的几位得意弟子都有些困惑和动摇了。

公元前489年，孔子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家，为了游说诸侯，推行克己复礼之道，还带领着一帮弟子风尘仆仆地四处奔走。所到之处，遭拒碰壁，现在又被陈、蔡两国的大夫，派人围困在荒野上，动弹不得，粮食也断绝了。孔子不愧是圣人，仍然能够“讲诵弦歌不衰”，可随行弟子已经打不起精神来了，从身体到精神都垮了。于是“子路愠见”，“子贡色作”，这表现的是沮丧、困惑、质疑乃至一股怨气。

孔子当然看出“弟子有愠心”，所以要做一下思想工作。于是，拿出老师惯用的手段，先设问，再诱导，以此平息子路等人的愠怨。孔子向子路、子贡、颜回三弟子，问了同一个问题，“诗云：匪兕(sì)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我不是犀牛老虎那样的野兽，为什么要沦落到在野外游荡的境地？)

结果，三位弟子的回答完全不一样。我们先看子路的回答：“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再听子贡的回答：“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最后听一听颜回的回答：“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

子路那几乎就是一种不自信，一种对自己信仰的质疑与困惑；子贡好像还不甚怀疑自己的信仰，但是认为既然行不通，不如降低标准；唯有颜回，那是坚定的信仰者，而且坚决捍卫自己的信仰，不为求被世所容轻易动摇立场、改变信仰。难怪孔子那么喜欢颜回。

孔子喜欢颜回，是因为遇到了知音。可是，知音能有几人？不以孔子为然的大有人在，《论语》就记载了不少，其中“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就是隐者嘲讽孔子的话。谁知后来，这竟成了一句赞语，常解作“不求结果只求过程，不论结果如何只管自己努力”这么个意思，这大概也是后人对圣人的一种变相肯定。

令人可喜的是，直接听闻这句讽语的子路，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应对：“……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也就是说，我们是做我们该做的，至于不会有结果，这我们是知道的，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与陈地绝粮时的子路简直判若两人，大概已是那次受教后发生的事吧，一个清醒、坚定、不屈不挠的行道者似乎在眼前。孔夫子的教学效果果然没得说啊。

教学效果好，那是夫子言传身教双重作用的结果。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而他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就是在“知天命”之年以后。对于结果，他老人家大概是早就知道的，但是依然不辞劳苦地四处奔波了十几年，直到年近七十才返回鲁国。终不被用。于是，在生命最后的三五年间，孔子专意教学著述。

生在社会、政治大动荡的年代，对于包括社会、政治在内的诸多学问孔子都是有深入思考 and 研究的，“集大成者”的名号绝不是虚的。他也很想力挽狂澜，希望有人任用他，那

样他就有机会实施他的主张，进而也就有可能实现他重造盛世的理想。

只可惜，没人用他。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了，可是他从不气馁。他知道他不会成功，却仍然继续努力。还是张岱《四书遇》中那句话说得好：“不知不可为而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贤人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也。”

孔子自己说得也很清楚：“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命就是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我们的活动要想取得成功，一个在于自身的努力，另外还要有外在条件的配合，而这种配合整个地看起来，又在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也就是说，我们能做的，只有一心一意地、尽最大努力去做我们知道的，所应该做的事，而不计较结果是得还是失，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样做，就是“知命”了。

这样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认识到这一层次，那么外在的成败也就不足萦怀了；当然，如果再能做到知命，那就没有什么失败可言。因为，如果我们尽了我们应尽的义务，这种尽义务的行动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得起天地良心了，可以心安了，至于成败，已不必论。

知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永不患得患失，永远快乐安心。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

知命是一种境界，而且还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宁或说就是圣人的境界。然而，“人皆可为尧舜”，关键看你怎么做。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就得朝这个境界不断努力。

有教无类

孔子是一位老师，而且原本就是一位老师，一位伟大的老师，却又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孔子大概在二十几岁就开始授徒教书了。从鲁昭公二十五年适齐不遇而归之后到鲁定公九年出任鲁司寇之前的十五年间，是孔子教学生涯的黄金时期。子路、曾皙、闵子骞、原思、冉求、颜回、公西华等都是这一时期收的学生。

这段时期，孔子师徒都还没有任事，生活清淡，而又充怀着理想与激情，师生都能够尽情施展和吸收，讲学的乐趣和效果简直好极了。《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篇所反映的就是这段时期师徒相从、快乐而温馨的场景。

当然，后来孔子仕鲁，某些弟子相随出仕；孔子去职，弟子们也和老师共进退；定公十三年，五十几岁的孔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诸多弟子，无论年长还是年轻，纷纷来从。这真是很令人感动。有感于他们师生感情的真挚，可谓患难与共、甘苦同偿；还有感于他们为了共信共守的道，不畏艰辛、不屈不挠，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

难怪孔子师徒给后人留下那么多佳话，也是那共信共守的道渐渐把孔门师徒聚合成一个坚强的团体，以至发扬光大，影响深远。弟子们不仅把孔子之道代代相传下来，也把他始创的私人讲学之风推展开来。《史记·儒林传》上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有人说：这促成了战国布衣卿相之局、百家争鸣之局，远而衍成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优良传统；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伟人，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学术、人生的最高指导者。

孔子在教育方面最伟大的口号就是“有教无类”。这个口号在今天，已经成为教育界永恒的信念。岂不知，这在当时也是个突破，并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前已说过，春秋乱世官师失守、学术外流，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孔子说过“礼失求诸野”。那时，随着周朝的衰落，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逐渐流散在庶民之中；他们丧失了本应有的爵位，但还是熟悉典籍礼法。求诸野，也就是向他们求。大概孔子的学问不少是向他们求来的，加上孔子好学深思，所以他成了文化的集大成者。

我们值得庆幸，这位文化的集大成者打破了传统的阶级观念，一再鼓吹“有教无类”，并且亲自践行。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当然，束脩不过是菲薄的拜师之礼，孔子看中的是学子求学的诚心而不是那几条干肉。现在我们看孔子学生的品类，那真是贵贱老少皆有：就社会地位而言，孟懿子是鲁国贵族，司马牛是鲁国贵族，而颜回是贫士，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子路则是卞之野人；就年龄而言，颜路只比孔子小六岁，子路比孔子也才小九岁，后期弟子则小得多，比如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曾参小孔子四十六岁；还有父子同门的，颜路和颜回是父子，曾皙和曾参也是父子；就国籍而言，鲁国、卫人居多，但齐、楚、陈、蔡等国也有来投奔的，孔子可谓是来者不拒；就资质而言，那更是等类各异，用孔子自己的话说“柴(高柴)也愚，参(曾参)也鲁，师(颛孙师)也辟(偏激)，由(仲由)也喭(yàn, 莽撞)”。(《论语》)

瞧着这良莠杂陈、贵贱共列的清单，难怪东郭子惠要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虽然如此，孔子却能把诸位弟子们调教得个个有专长、个个有成就。这也就是孔子，至圣先师！人家那真是因材施教，绝无弃材。

应该说，因材施教是和有教无类配套进行的。门生既杂，要想教学效果好，对老师的要求就高了，你得先摸准每个弟子的个人情况吧。所以，孔子得机会就观察弟子的言行，或者通过聊天、谈话、提问了解他们的志趣。《论语·公冶长》就有这样的记载：颜渊、季路侍坐，孔子说：“盍各言尔志？”子路答：“愿车马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接着答：“愿无伐善，无施劳。”他们答完了也问老师“您的志向是什么呢？”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类似这样的闲居答问，还很多。尤其是，这样的论谈大都是诚恳而自然的切入。比如，《先进》里记载了孔子这样的开场白：“你们不要因为我年纪大了些，在我面前就拘束，不敢说话。你们总是说没人赏识你们，那么假如有人赏识，你们能有什么表现呢？”几位弟子相继发言，期间还有曾皙在一旁安闲地弹着琴，边谈边听，等到老师点名让他说说看，他才停下来愿做个悠然自适，无所羁绊的人。这是多么轻松而又温馨的局面。从中，孔子固然能了解学生的志趣和才性，学生也能从老师的言论中获得深深的启发。

孔子这位老师的确对弟子们的性情才能了如指掌。有一次，季康子来问，孔子则向他分析了弟子们的长处：子路“果”，勇敢有决断；子贡“达”，明达懂事理；冉有“艺”，多才多艺。甚至于这些弟子能干什么，能担当什么样的职位，孔子都心里有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他欣赏子路，喜欢这个率真爽直的学生，却也担心“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果然，子路后来在卫国之乱中被杀，孔子痛心不已。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不愤(心求通而未得)不启，不悱(口欲言而未能)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要学生自己先有求知的欲望，要自己先行思考研究，当学生到了渴求学问的劲头儿，这时老师只要在这关键时刻提点一下，就如醍醐灌顶一般，学生也就豁然开朗了，而且印象必然深刻。这也是《易经》里说的：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全不似现在这样，对孩子掠夺式的启发、灌输式的教育。

孔子对学生用的也不是一套固定的教案，有时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问，他都有不一样的回答，很是灵活。他也不讲抽象的大道理，也不旁征博引，而是旁敲侧击，近取譬。这还得说孔子有为人师表的丰厚根底，他本身就好学而博学，通达事情，是天人之师。

前面说过，百家之学的兴起，是从私人讲学开始的，而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名学生，其中贤者七十二，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更关键的是，这些学生将孔子的思想学说延续了下来，比如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的《论语》，就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尤其，它还成为四书之首，成为后世读书人必读的经书，其影响可谓深远。

“为万世垂教”，这才是至圣先师孔子的大功德。

第五章 通神老子

如果说孔子是圣人，那老子就是真人，也就是修真得道的人，没准还有得道成仙的意思在内，太上老君不就是以老子为原型的吗？当然了，这里面包涵着人们美好的想象。但是，要说老子是位伟大的哲学家，这应该就是公认的了，而且是世界公认。老子是比孔子还年长的人，据说，孔子还向老子问过礼，回来后评价说老子简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老子的《道德经》玄而又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正所谓“上士闻道”。老子主张“无为无不为”，信奉“柔弱胜刚强”，还认为“反者道之动”。老子不争，不敢为天下先，鉴于他的这一点，也鉴于他的受众“上士”不是大多数，所以我们将他放在孔子之后来讲。

老子其人和《道德经》

老子别说在诸子百家里，就是在整个中国历代思想家中，也算得上是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老聃还是李耳，有说这是一个人的，也有说根本就是两个的；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大年纪，有说他活了一二百岁，也有干脆就说他得道成仙了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后到哪儿去了，只说是出关避世走了，做神仙去了。

不过，再怎么着也得给个粗略的生平简介：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字伯阳，谥号聃(dān)，又称李耳(据说古时“老”和“李”同音，“聃”和“耳”同义)。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人。曾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官”(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

和大部分离我们久远的神圣人物一样，老子的出生也很神。据传，老子是彭祖(据古代典籍记载，彭祖是颛顼的玄孙，相传他历经唐虞夏商等代，活了八百多岁)的后裔，在商朝阳甲年，母亲理氏在村头的河边洗衣服，忽见上游飘下一个黄澄澄的拳头大小的李子，忙用树枝将这个李子捞上来。到了中午，理氏又热又渴，便将这个李子吃了，由此怀了身孕。理氏怀了81年的胎，才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一生下就白眉白发，白白的大胡子。因此，理氏给他取的名字叫“老子”。老子生下来就会说话，他指着院子中的一棵李子树说：“李就是我的姓”。

等到老子十几岁上发蒙求学，他有幸拜得了一位好老师——精通殷商礼乐的商容(亦作“常枞”)老先生。此人通天文地理，博古今礼仪。《慎子·外篇》云：

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不忘故、敬老、守柔、处后——这就是老子从商容老先生那里学到的礼义原则和人生哲理。当然，老子也不是单跟商容老先生一个人学，人家也是“遍访相邑之士，遍读相邑之书，遇暑不知暑，遇寒不知寒”。这和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国人原来不叫知识，都说学问，是学来的问来的。

这样“学问”下来，“相邑”就显得小了点儿，也封闭了点儿。据说，后来，在商容老师的指引和推荐下，老子又入周求学，其实也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深造。因为，老师看出来他这位弟子是个可造之材，应该着意培养；而周都——典籍如海，贤士如云，天下之圣地也，非入其内难以成大器，得让弟子走出去开阔视野。

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三年而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老聃处其中，如蛟龙游入大海，海阔凭龙跃；如雄鹰展翅蓝天，天高任鸟飞。老子如饥似渴，博览泛观，渐臻佳境，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三年后又迁任守藏室史，名闻遐迩，声播海内。孔子还去周向老子问过礼，回来后很感慨地对弟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意思是说老子“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琢磨不透。

也就是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子，给我们留下了玄而又玄的《道德经》。同样的一个麻烦事儿，《道德经》到底是不是老子的大作也有质疑。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古人不大在乎个人的著作权，而愿意成一家之言，更愿意一脉相承。主要思想是谁的，推谁做代表更有利于本家学说的推广流传，那就推谁。本着这个原则和一贯性，我们说《道德经》基本是老子的思想，所以人家一开始不叫《道德经》而叫《老子》。

传说《老子》是老子离官归隐，要出函谷关的时候留下的著作。

函谷关大概原来在今天的河南灵宝县，后来关口移到了今天的河南新安县。这里两山对峙，中间一条小路，因为路在山谷中，又深又险要，好像在函子里一样，所以取名为函谷关。

守关的长官是尹喜，称关令尹喜。尹喜，字公文，相传是西周王朝中的一位贤大夫。他自幼究览古籍，精通历法，善观天文，习占星之术，能知前古而见未来。后来眼见天下将乱，他便辞去大夫之职，请任函谷关令，以藏身下僚，寄迹微职，静心修道。尹喜上任后，在关旁结草为楼，称之为楼观，每天在这里观察天象。有一天夜里，尹喜在楼观上凝视，忽见东方紫云聚集，长达三万里，形状犹如飞龙，由东向西滚滚而来，十分惊喜，知有大圣人将从此经过，他便立刻召见守关兵卒孙景说：“传令下去，九十天内将有圣人路经此关，汝等要时刻留意，如有形容奇特、车服异常者从东而来，要求度关，切勿放行，立即禀报，不得有误。”同时，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尹喜自己也天天沐浴，日日斋戒，净身等待。后来老子果然骑青牛过此，尹喜亲去拜迎。

之后，关令尹喜引老子至官舍，请老子上坐，焚香而行弟子之礼，恳求道：“先生乃当今大圣人也！圣人者，不以一己之智窃为己有，必以天下人智为己任也。今先生将隐居而不仁，求教者必难寻矣！何不将您之圣智著为书？关尹虽浅陋，愿代先生传于后世，流芳千古，造福万代。”于是，有了《老子》这本书的流传。

据说，老子去后，尹喜辞去关令之职，终日在楼观之上修习，初时不甚明了，诵之口熟，渐渐品出其中妙蕴。后终于悟出真谛，修成大道，成为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尹喜在升天之前，来到老子故里，并把自己的躯体留在这里，让自己的忠魂永远守护恩师的家门，以报答五千至言教诲之恩。

《老子》这本书可谓是步步升级。一开始叫《老子》，那是放在诸子之学里面，跟诸子学说齐肩。到了汉初，崇奉黄老之学，文景时期改称《老子》为《道德经》，从“子”到“经”，那地位可就大大地提升了。再到了唐朝，皇帝姓李，就非要跟老子这位姓李的圣人攀扯攀扯，自称是老子后代，到唐玄宗时候，《道德经》又升一格，叫作《真经》。这是四书五经，或者说十三经之外为数寥寥的经书，虽不在科举必考书目之列(这也暗合老子心意)，却似乎一直是读书人自觉必读之书，甭管你是出世还是入世。这也是中国思想、中国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体现吧，得意失意间总得搞个平衡，即便正得意，也得做个失意的思想准备，失意时更得想着“反者道之动”，好存个希望。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修身，这是做人的根本。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五千言的《道德经》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之影响那绝对是深远的。

《易经》《论语》和《道德经》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有人说，《论语》是为中等智慧的人解释“易经”的道理，而《道德经》是为上等才智的人解释“易经”的道理，或许是吧。

《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共五千言。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故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人称为《德经》，合称《道德经》。《道经》言宇宙本根，含天地变化之机，蕴阴阳变幻之妙；下篇《德经》，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

老子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他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而此规律无可名状，姑且名之曰“道”。《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道德经》中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此外，《道德经》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相互对立而相互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主张无为，是因为那个时代太爱作为；老子主张不争，是因为那个时代太好争；老子主张效法自然，是因为那个时代乱了套了，没有秩序可言，没有规矩可讲。总之，老子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是和他那个社会时代息息相关的。

老子为什么要出关

这是一幅《老子传道》图，我们从这幅图里面可以看出很多很多东西来。画这幅画的人，他本身必定也是位道家修养很高的人。他就这么一画，什么都不说，大家自己悟去吧，能悟到多少算多少。

画中的这位老人就是老子，老子为什么要跟老虎坐在一起？他在和老虎说什么？这幅画又有着怎样的寓意呢？

首先，众所周知老虎是凶猛的动物，代表刚。而老子的身体和神态则是柔和的，代表柔。老子的哲学里面，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柔弱胜刚强。老子如果是龙，这幅图也可以说是在讲中国社会，那就是“卧虎藏龙”。老子是龙，这还是孔子说的呢，这个我们前边讲过了，那意思也就是说孔子觉得老子像龙那么神，见首不见尾的，让人看不懂，也琢磨不透。

那么，老子头上的圈圈又代表什么呢？看老子的神情和老虎的样子，他们似乎还在交流，而且还很和谐，根本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这要是跟武松打虎的画儿放在一起看，大概就更有味道了吧。

奇怪，老子跟老虎说什么呢？老虎那么服帖。

这个圈圈就是“道”。也只有讲“道”老虎才听得懂吧。那老子为什么要跟老虎说话呢？这个才是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他告诉我们，《道德经》要讲的是真话，而讲真话是高度危险的，就好比跟老虎讲话一样，老虎它也代表诸子百家，或许还代表那些争霸的强者。老子说，你们都各有一套自己的说辞，诸子百家也都很有学问，但是，各有不同的立场，就那个立场，你们讲出妥当的话，成就一家之言。可是这样一来，也造成很多纷争。大家各说各话，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这也是那个时代发展必然要产生的现象，甭管好不好你也得接受。我们现在看来，那是个思想学术相当繁荣的时代，思想活跃而自由，简直令人向往。这当然是后人公认的好处，也确实对后世中国思想乃至社会发展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然而，在当时人看来那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看到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永远说不清。于是，关心天下兴亡的人都很忧心，认为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是“世衰道微”了。

那个时代的老子也有些着急，他就想要讲真话，可是讲真话在那种时候和情境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就说：那我干脆出关去吧。写下这五千言的《道德经》就莫知其所踪了。

当时的老子其实可以优哉游哉地过生活，他干嘛写完以后，就莫知其所踪了呢？这是玄机。

他提醒我们，人应该说真话，可是你至少得考虑这么三点：第一，你有没有能力说真话；第二，你说了真话人家会不会相信；第三，讲了真话会不会带来不良反应，甚至严重后果。

老子要传道，而且是给“老虎”传道啊，危险大大的。老子跟老虎靠什么沟通呢？靠语言？当然不可能，因为道是不能用来讲的，道用来讲是永远讲不清楚的，永远有偏失的，永远会找麻烦的，道是用来行的。老子和老虎的沟通是靠《易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应”，相应不相应而不是应该不应该，也就是有没有相互感应的意思。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心灵感应很重要，光靠嘴巴，靠言词，说得再多，可能还不如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甚至于无形的管道。这个就叫心连心、心心相应。心跟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说话他都知道。所以，中国人不大相信你说话，他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常说“看他怎么说”，你瞧，是用“看”不是用“听”的，这种用法本没有错，“看”的要比“听”的更丰富，岂止在语言。

这样看来，老子传道是不强求的，他老人家就只留下了五千言就出关去了。“道”说多了没用，你自己感应去吧，你自己悟去吧，悟到多少算多少。

道可道非常道的矛盾心态

《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头一句就把人难住了，单就断句来说，意见就有好几种，这里采用的是常见的一种断法。鲁迅先生在小说《出关》里边写道：老子一开口，就把边关上要他讲课的全部官兵吓住了，因为谁也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如果一开始弄不明白，大部分人就放弃了。

老子开头这句话，其实是摆明了一个作者的矛盾心态。他很谦虚地告诉大家，后面的文字所传达的意义并不是他心中的终极意义，终极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是，如果完全不言传，人们又很难得其门而入。因此，老子很勉强地写下这五千字。这五千字，就相当于“起跳板”，读者是否要完成那个跳跃，就看自己了。

“道可道”，这三个字里，第一个“道”字是名词，指的是世间大道。第三个字也是“道”，却是动词，指的是表述。“名可名”的结构也是这样。这几句话连在一起，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的意思就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也不是永恒的名。

老子的思想是异于常人的。关于“道”，老子认为不管是自然大道、宇宙大道或是人间大道，一旦我们自认为讲明白了，其实就已经偏离了它。因为道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而语言却是有局限的。因此，只要我们把大道付之语言表示，就是对大道的一种损伤，一种切割，一种或多或少的扭曲。

关于“名”，老子是觉得用概念、名号去定义不同的对象，显然也不能十分恰当。有几位西方现代哲学家特别喜欢老子的这个思想。当你试图去定义时，用的是过去产生的类别划分。类别划分本来就是一种最粗浅的概括，已经取消了事物本身的独特本质。名，不过是一时之名，权宜之名，非本性之名，非个体之名。尤其遗憾的是，本来为了方便而叫出来的名，却替代了事物的本性，人们对这个名还认真起来，甚至还特别容易为了名而争斗。在老子看来，这从一开始就搞错了。

总之，不要过于相信已经创造的知识，也不要过于肯定已有的思维方式对存在的认知和解释，认识本质最为重要。而且，不单单是“认识”，还得加上“悟”，认识“道”是需要点儿悟性的。

何谓“道”，何谓“德”

《道德经》的得名，是因其书“言道德之意”。那么什么是“道”，什么又是“德”呢？

作为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老子最早明确提出：宇宙的天地万物，都来源于一个神秘玄奥的母体——“道”。道家的得名，应该也缘于此。老子所说的道，具有自然无为，无形无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又不可言说的特性。它是天地开辟之前，宇宙浑沌混一的原初形态，也是超越一切有形事物的最高自然法则。

大道无形无名，却孕含着一切有形事物生成发展的玄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就是说：从空虚无形的“道”首先生出浑沌混一的“元气”，“元气”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感冲和而化生和气，再由和气派生出世界万物。天地万物皆为阴阳二气冲和而生，所以都包含着阴阳两个方面。这便是道家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基本理论。

与道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就是“德”。老子说：道创生万物，德含有万物，培育万物，成长万物，爱护万物。这样看，道是德的本体，德是道的作用。道和德是体与用的分别，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德是道显现于万物者，也就是说，万物得之于道的便是德。因此，万物在创生之后，仍然秉持道的全性。这不但说明了道生万物，同时也说明了万物必须持续着道所赋予的常性，显现道心，如其不然，想不发生危险是绝无可能的。

老子把“道”看作神秘的世界本源，因此不赞成人们学习庞杂、奇巧、具体的知识，以免被各种纷纭复杂的外部现象所迷惑。他主张人们应该直接去体认事物背后隐藏的道理和法则，虽然现象不断变化，但现象背后的道理和法则是不变的，是“常道”，那才是根本。抓住了根本的道，才不至于被现象迷乱了眼，甚至搞乱了心。

体认的方法是闭目塞听，绝圣弃智，涤除玄览，致虚守静。也就是闭塞感官与外部事物的接触，放弃主观成见，使内心清静无欲，达到与虚静自然之间完全相合的“玄同”境界。这样才能体悟“万物皆根源于道，并最终复归于道”的真理。

在老子的思想中还包含着某些辩证法的因素。他看到美丑、善恶、祸福、有无、难易、高下等矛盾对立方面互相依存的关系，并且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物极必反，矛盾双方互相转化的道理。但是他又认为事物的变化运动，循环往复，最终仍然复归于静止不变的道。所以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

老子这种关于“道”与“德”的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中，部分仁人志士内心的痛苦、郁闷以及深刻地思考。他们希望恢复社会秩序，减少战乱纷争。主张圣人，也就是统治者，治国修身应该效法天地自然，遏贪欲，贵柔守雌，清静无为。反对倡导礼仪、尚贤有为的政治学说，认为这是造成道德沦丧，使人争夺难治的原因所在。

老子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从纷纭复杂的事物背后，发现了某种稳定的，支配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将之命名为“道”，并且以此“常道”，也就是天道自然的观点取代了神的观念。这与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的意旨是一致的。不妨说，是他们共同的努力，使得中国这片土地上此后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再产生神本位。

反者道之动与柔弱胜刚强

《道德经》第40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循环往复，这是道的整体运动规律；柔弱不争，这是道的运行法则。道就是这样四两拨千斤地，不费吹灰之力地推动着事物的转化，何其自然而神妙！

“反”和“弱”共同构成了老子“转化”世界观的基础。在对万物的观察中，老子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依存、转化及其缘故。这是有关道的“转化”法则的提炼概括。

首先，在老子看来，许多事物或现象的关系是既相反又相互依存的。比如，美与丑、有和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等等。世界上之所以有美，是由于存在着丑，如果没有丑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美，其他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在老子看来，对立和相反的事物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对立，他们彼此也有成就对方的作用。再进一步，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往往包容着相反的东西，老子以佯谬的方式揭示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其次，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存在，他们彼此包含着成为对方的可能性，时机得宜就相互转化。如祸福之间的转化，老子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大概就是后人对老子祸福相依、随时转化的一个生动演绎。事物过分的强大，也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用老子的话说就是“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按照老子的看法，事物的转化取决于不同因素的积累，只要事物的相反因素和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转化就会发生。这让我们想到“易道”所讲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转换的道理。他们如出一辙。

再次，在事物的转化中，表面上看起来是柔弱的一方实际上则更具有生命力。在一般的思维中，人们对于有与无、动与静、实与虚、阴与阳、上与下、直与曲等这些正反的两面，往往肯定和偏爱的是前者，但老子更肯定和钟情的却是后者。因为，他在常人认为是消极的、不利的方面看到了力量和意义。这种反向或逆反的思维方式，不仅是非常独特的，也是别具意义的。

最后，在对反面事物的作用及价值的深刻认识中，老子产生了贵柔的思想。老子从生物死后都变得僵硬得出结论说，事物和生命的活力、持续在于它的“柔和性”，在善处卑下和弱势的位置——“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还赞美“水的美德”，也是因为“水”是柔弱和柔和的象征，它不与其他事物争高低，最接近于道的本质。“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水是最柔弱的，但它蕴含着无限的冲击力，能够攻坚克难，充分体现了柔弱胜刚强的“道”性。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

道性还体现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上。而老子讲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光等着“天上掉馅饼”。因为，人家的“无为”后边明显紧跟着一个“无不为”。

老子主张无为，只是说不妄为，并不是说毫不作为。不妄为是顺自然而为，是顺公意而为。如此，其结果就是“无不为”。换句话说，“无为”仅是其手段，“无不为”才是其目的。而老子这套看似矛盾的智慧完全是从效法自然来的。

不信你看：道虽生化万物，覆育万物，却无一点儿私心要主宰他们，占有他们，而完全是自然而然，无心而成化。所以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一本作“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意思是说道和德生长万物，畜养万物，既不占有他们，也不干涉他们，更不自居生养覆育的功劳，完全因任自然，也就是所谓“莫之命而常自然”。正因为“莫之命而常自然”，所以才能收到万物的推崇、尊敬。因此，“自然”二字，就是道创生万物的原则，即“道法自然”。

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无心自化，并不是在道之上还有一个叫作“自然”的东西，而为道所遵从效法。唯其一切都顺乎自然，毫无期图，万物才能遂其所生，而道才能尽其生化万物之功。这就是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其实，老子就是希望将无为的思想运用到治国安邦上。他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后面紧跟着就说“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意思是说：王侯若能遵守“无为而治”的原则，那天下万物就会自然成长，自然成长而至欲望萌发时，那就用道的真朴来教育他们，道的真朴能使他们免除贪欲。

这也是老子“以正治国”思想的根本依据。他主张：治理国家要顺应自然，不能搅扰百姓。天下的禁令越多，人民就越贫困；人民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民思想越乱，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盗贼就会越多。

“无为”，主要是针对并要求统治者限制和约束权力的滥用，反对实行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动辄随意颁布这个法令、那个制度；或朝令夕改，不讲政策的连续性。老子提倡，一切法令、政策的颁布都要“以百姓心为心”“任百姓自化(即自然化成)”。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西汉初期，黄帝、老子的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文景之治”，可以说这是黄老思想治国安邦的一次成功实践。

按照老子的意思，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领，能做到这样，其思想和事业就可以永不磨灭。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政治智慧，与我们今天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不谋而合。

“为道”与“为学”

如果说治国安邦的事儿离我们尚远，那么为学就离我们贴近。关于如何“为学”老子可也给我们深刻的启发。

《道德经》上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般认为“为学”就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而“为道”则是指对自然大道的认识和把握。陈鼓应先生说：“为学是求外在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愈积累愈增多。为道是摒除偏执妄见、开阔心胸视野以把握事物的本根，提升主体的精神境界。”高明先生则说：“为学指钻研学问，因日积月累，知识日益渊博。闻道靠自我修养，要求静观玄览，虚静无为，无知无欲，故以情欲自损，复返纯朴。”

这大概是提醒人们，求学是分层次的，刚开始是“为知”的阶段，知识越多越好，正所谓博学；但是，到了后来，就应该进入“为道”的阶段，跳出纷繁芜杂的具体知识，真正体认本源大道，老子认为这才是根本。

显然，这两个层次的要求或者说也可以说体现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日益”一个是“日损”。其实，老子的目的还是要讲“为道”，为了提示人们如何“为道”，特地把它和“为学”联系起来，好通过他们之间的差别，来更好地理解怎么样“为道”。

好奇求知是人的本性，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总是会对世界万物及其知识产生追问，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人类首先偏爱感觉，因为它能使我们更真切地认知事物，具体区分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接下来就上升到理论知识，但知识还不等于智慧。知识可以爆炸，可以无限的扩张，可以让你终其一生，夜以继日，累得吐血都学不完，可是，也很可能你废了九牛二虎的劲儿，花了几年美好的青春学来了，没过几年它又过时了。知识的更替就是这么快。所以，现代的人们时常感慨信息时代真累人，我们根本赶不上知识更新的速度。

但是，智慧就不一样。智慧正是纷乱后面的那个一，那是一贯的，是常道是本源，惟精惟一。掌握它，你也就能够从容应对了。而且，知识不会遗传，智慧据说还可以遗传呢。有人说，这辈子多读书，多掌握道理，到下辈子还管用。这也许有点玄，姑且存而不论，不过，你懂得了大道，提高了智慧，多少能循此道理去教导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孙子，这不也是一种遗传吗，或者叫传承，再不然就叫影响。

可“为道”之前要不要“为学”呢？或者说“为道”的途径在哪里？

关于这个，老子好像也没明说。“为道日损”就是闭目塞听，什么都不学吗，甚至还得天天“减压”，把有的都扔了？恐怕也不是。我们知道，老子本身就是一个博学的人，人家是图书馆的馆长耶。中国这些往圣先贤，几乎可以说100%都首先是个大学问家。自己学富五车，不让别人学？应该不会，或者说肯定不会，老子、孔子这些圣人都不要固执和偏见，要“日损”的也是这种偏见和固执。只掌握了一部分知识，就固执着这部分知识，或者拿着它当武器攻击别人，这就乱了套了，纷争也就起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都没理，又都有理，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吗，没有全对，也没有全错。争论了半天，最后还得归到背后那个本源大道上。

老子虽然说过：“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愚”在这里的意思是淳朴

和天真，圣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他自己也愚。老子就说：“我愚人之心也哉”，在道家看来，“愚”不是一个缺点，不寒碜。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圣人的“愚”和普通人的“愚”，和孩童的“愚”还是有区别的。

圣人的愚是一个自觉的修养过程的结果。它比知识更高，比知识更多，而不是更少。中国有一句成语：“大智若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圣人的愚是大智，不是孩子和普通人的愚。后一类的愚是自然的产物，而圣人的愚则是精神的创造。二者有极大的不同。

在老子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不识字的人那是绝大多数，写个家书还得找人代笔呢，以至于都有穷困潦倒的读书人专门摆摊儿挂幌儿“代写家书”呢。在那时，不但“愚民”(动词+名词)容易，做“愚民”(形容词+名词)几乎就是绝大多数百姓的宿命。但是，时代不同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如今读书识字的人多了，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加之各种媒体日益发达，民智已开，再想做回原始的“愚”(淳朴和天真)已经并非易事了。

求知为学的人一多，自负自大，甚至盲目自负自大的人也就多了。惟其如此，老子的“为学与为道”之论对我们当下也就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时下，我们大部分人可能还都局限在求知的层面上，所以要特别提醒自己，在求知为学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只是个较低的层次，不要仅停留于此而沾沾自喜，前方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呢，那就是“为道”。“为道”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是天地人互通的境界，是惟精惟一的境界。“为道”也是一个人精神的旅程，是对生命的体认和对宇宙的觉解，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

合道生活“不失其所”

老子还为我们提出了一套“修身养性”和“处世”的精湛人生艺术。无限和伟大的“道”是万物生发的不竭源泉，合乎道而生活或者遵循道的本质而存在，人就能够保持相对长久的生命和快乐的生活。

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不失其所”即“不失去根本的道”，这是生命长久的奥秘。老子这里说到的“寿”，是指一个人死后不被人们所遗忘。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永生”的方式，往圣先哲早就为我们设计好了——求神不如求己，合道而生。

合乎道的生活方式体现为一系列的修身和养生原则。在这些原则中，老子要求人过一种“适度”和“节制”的生活。这就是他提倡的“去甚，去奢，去泰”。老子观察到上层社会生活的丰裕和奢侈并加以批判：“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天下朝政很腐败，农田很荒芜，仓库很空虚，你还穿锦绣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享受精美的大餐，搜刮多余的财货，这叫强盗头子。实在不是遵道而行啊！）

老子提醒说，人的生命机体的可承受性是非常有限的，过度的消费会损害生命的机能和身心的平衡。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t i á n)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在老子看来，合理的养生之道，是避免过度使用有利的事物，那都是直接威胁生命的可怕力量。

而过度的占有源于人们的不知足。老子教导说，要给予，不要索取，他还使用了一个反常的逻辑：“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意思大致相当于“助人者，人恒助之；布施者，会有成倍的回报”。老子规劝人们要知足，是基于人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是相对于未来的希望。它不是鼓励人们懒惰，而是要人们有自我满足和自我肯定的心境。既不执着营求于财富，又使生命处于旺盛和饱满的状态。

老子有一个“啬”的概念，恰当解释应该是“爱惜”和“蓄养”，所谓“治人事天，莫若啬”。珍惜和保存自己的精力是最好的养生方法，珍惜和蓄养天地的资源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样看来，小康生活应该是最理想的，富裕生活则已属于奢侈一类，从人类的长远发展看，还是细水长流的好。

老子的智慧玄妙深奥，却又实在朴实；俗人看来是有些反常，却道出了宇宙和事物的真谛；看似矛盾的，但又融洽无碍。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试图揭示老子思想学说的深刻奥妙，但老子一开始就预测，懂得他的人可能很少。如果有人真正能够遵循他的话而行动，那就更是难能可贵。这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道德经》）

还是那句话，这个要靠悟性。悟道(到)，得道。

第六章 不战而战的兵圣

孙武，被后人尊称为孙子(春秋战国间有两个“孙子”，一前一后相差百余年，前者即孙武，人称“吴孙子”，后者是孙臆，人称“齐孙子”，这主要是根据他们的主要活动地，或者说建功立业之地加以区别，其实他们都是齐国人，而且还是一家人)、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圣。其生年略晚于孔子，而卒年与孔子差不多。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hé lǔ)，受任为将。领兵打仗，战无不胜，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五战五捷，率兵3万打败60万楚国大军，攻入楚国国都郢(yǐng)。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既称兵圣，他就绝不仅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也不仅止于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人这么个位置。孙武子对于战争有一个高远深邃的整体认识，他的《孙子兵法》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异常丰富的哲学道理，以致广为传颂、影响深远，其本人也成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相并列的人物，被并称为那个时期思想界的三颗明星。

将门出虎子

人说齐鲁大地海岱之域出了两位圣人，一文一武，一儒一兵。儒者，鲁国孔子，修《春秋》、传《论语》，汇集诗、书、礼、易之大成；兵者，即齐国孙子，崇太公、承司马，凝炼兵学文化之结晶。

两圣也差不多同时代。大约公元前552年，即孔子出生的前一年，孙武子出生，至于他是出生在齐都临淄之官邸，还是出生在田氏祖上的其他封地(如莒[jǔ]邑或乐安，莒邑在齐国都城临淄以北，今山东广饶县境内，与乐安邑为同一地面)，已无从查考。卒年更是说不清，据说孙武功成身退，隐居去了，连去哪儿了都说不清，有说回齐国的，有说终老吴国姑苏的(今江苏省苏州市所辖之吴县)，反正人家是颐养天年去了，据说和孔子卒年相近。

孙武本不姓孙，往上倒的话，是姓田，再往上倒则姓陈，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妘(guī)姓、陈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代。

陈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领域包括今天河南的东部及安徽的北部，国都在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周武王灭商以后，要追封前代圣王的后人，就找到了舜帝的后裔妘满，并把大女儿元姬嫁给他，封他为陈侯，让他奉守舜帝的宗祀。他的子孙后来也就以国名为姓氏，即姓陈。

公元前707年，陈国发生了内乱，陈桓公的弟弟篡位自立，属于得位不正，史称陈厉公。7年以后，陈桓公的儿子又杀了这位得位不正的叔父而自立。孙武子的先祖陈完(生于公元前705年)就是陈厉公的长公子，家国之内的几起祸乱使他预感到大祸即将殃及自身，于是逃离陈国。

至于去向，陈完是早有打算的——他看中了齐国。齐桓公在争霸中体现的人格魅力吸引了陈完，连与齐桓公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都被任用为相了，这让他看到了一线光明。而且，此时的齐国君臣同心，一幅励精图治的大好图景。于是，陈完毅然来到齐国。

陈完的出身、仪表和才能也让齐桓公很看重，打算聘他为客卿，也就是非齐裔的高级幕僚，但被陈完谦逊地谢绝了。最终，齐桓公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工(全国所有的手工业)的“工正”(官名)。

由于陈完出色的工作和绝佳的人品，齐桓公便赐给他不少田庄。陈完一则为了隐姓避难，二则为了表示对齐桓公赐封田庄的感激，三则当时陈、田二字的读音差不多，故以田为姓，改陈完为田完。

田完后来娶齐大夫懿仲之女为妻，家世逐渐兴旺起来，富贵盈门，成为齐国的望族。田完死后，谥号敬仲。仲生孟夷，田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无宇承田氏家族尚武遗风，以勇武著称，力大无比，受到齐庄公的宠爱和器重，官至大夫，并被封采于齐国的莒邑。

将门出虎子，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与军事结下不解之缘的家族。遗憾的是，从田桓子无宇到孙武子的线索不是很清楚，说法不一。综合《史记》和《世本》看来，田无宇应该有三子：开、乞、书。其中这位田书，就是孙武的祖父。因为他伐莒有功，齐景公特赐

姓孙氏，食采于乐安。按《礼记·礼运》上说：先秦有制度规定“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从此以后，孙书的儿子孙凭和孙子孙武也就都由田氏改为孙氏了。

但改姓不改祖，他们的大家族仍然为田氏所掌，兴衰荣辱总脱不了干系。公元前522年，田完的苗裔田穰苴 (r á n g j ū)被齐相晏婴推荐为将军后，受到齐景公宠爱，在防御晋燕之兵和治军方面很有建树，被尊为大司马。大司马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三军总司令，掌管一国的军事。于是，田氏家族“日益尊于齐”。然而若干年后，鲍、高、国氏三族便联合起来一起对付田氏，在齐景公面前用谗言陷害大司马田穰苴。齐景公偏听偏信，黜退了田穰苴的司马之职，使其暴疾而死。这样田氏“尊于齐”的地位和利益受损相当大，而田氏族也由此痛恨鲍、高、国氏三族。同为田完之裔的孙武，大概是因为这次田、鲍、高、国四族之乱而奔吴。

这一去，就使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吴王阖闾(hé l ú)任他为将，领兵打仗，战无不胜，并且还能以少胜多，为吴军破楚立下赫赫战功，因而声名鹊起，以至于“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

孙武子《兵法》“十三篇”

孙武子奔吴，那应该是在壮年，原本也是隐居，后因友人伍子胥的力荐而出山。伍子胥之所以推荐他，吴王阖闾之所以看重他，就在于孙武的军事才能，他首次见吴王，奉献的就是《兵法》十三篇。

而这《兵法》十三篇，也就是后来《孙子兵法》的雏形，即使不是写于齐国，也应该是孕育于齐国。孙武出生在齐国，也是在齐国长大，计算时间大概有三四十年之久。孔子说“三十而立”，立的未必是事业，立的是思想观念和为人处世的原则。也就是说，处于这个时段上的孙武，其军事思想基本成形了，而这必然与他所居住、生存的环境——齐国和田氏家族息息相关。

齐文化的特点是言兵。自打姜太公封齐后，“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任管仲为相，管仲也为齐国制定了“军政合一的体制”：“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国语·齐语》）进而形成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政治局面。

孙武的家族田氏，前面说了那是将门，早有尚武遗风，田无宇、田穰苴那都是凭借勇武和军功，获得齐王赏识和器重的，尤其田穰苴，还做了齐国的大司马。

孙武出身于将卿之家，司马之族，必然深受齐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也有条件通过其祖传家教和参阅齐国藏存的各种军事文献、聆听齐国大夫们论政谈兵的言论，也就培养了他这方面的志趣爱好，再加上天赋条件和渊博的知识储备，于是造就了孙武在军事兵略方面非同寻常的成就，尤其是《孙子兵法》这部经典的传世。

孙武著《孙子兵法》，除继承和发展了齐国尚武文化的传统外，可能最直接的还是借鉴族人司马穰苴的兵法之道。如《司马法》佚文中的“上谋不斗”；“兵者诡道，故能而示之不能”；“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始如处女”；“围其三面，阙其一面”；“穷寇勿追，归众勿迫”；“新气胜旧气”；“火攻有五”（徐勇主编《先秦兵书佚文辑解》，2003）和“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等等，在《孙子兵法》中得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尤其可贵的是，孙武将这些齐国的兵学文化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并把军事理论归纳和创新为“十三篇”，使之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战争到底为的是什么

《孙子兵法》之所以流传久远，影响巨大，甚至超出军事领域，那是因为它确实有高度，孙武子对于战争有一个高远深邃的整体认识。人家那十三篇兵法，讲的不仅仅是行军打仗的具体方法和措施，还有宏观战略的思考，是一整套系统的思想体系。孙子在其兵法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多方面异常丰富的哲学道理，成就了《孙子兵法》，也确立了他个人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相并列的地位。

作为兵圣，他首先就高屋建瓴地明确了战争的目标或者说目的，也就是到底为什么而战的问题。只有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对战争持个正确的态度。而孙子这个对待兵事的态度，既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特点，也影响了其后的中国人，那就是要做到“知兵而不好战”。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把战争与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联系在一起，不仅指出了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明确了战争的基本性质是确保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安国保民”才是战争最高的价值目标。

战争不是儿戏，动辄就要连带着无数鲜活生命的终结，而且不仅仅是一方，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即使赢了也要承受巨大的开销和损失。所以，战争是一种风险极大、破坏性极强的特殊社会活动。

作为一个身处社会动荡、战争频仍时代的军事家，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和国家社会带来的种种灾祸，他从心底里不希望打仗，但也不像不切实际的和平主义者那样认为可以取消战争，他选择了第三条路——慎重对待战争。

无疑，孙子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圣人。他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存亡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上，立足于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原则，即“利战”“重战”和“慎战”。

“利战”就是立足于国家全局，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而且是分析敌我双方，权衡利弊，从而决定战还是不战，以及如何战。强调一切都要从现实的利害出发，反对任何非理性的因素，如情感、好恶甚至迷信等的干扰。因此，国君不能仅凭一时激愤就兴起战事，将帅也不能因为感情冲动就立马去厮杀，要尽可能地做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个“利”就是保民利主。孙子把它加以提炼概括，称之为“安国全军之道”。

“重战”从字面意思看，是重视战争，其实还包含着不惧怕战争的意思。要想战争来了不害怕，你就得提高警惕，不能疏忽大意，这也就是重战了。具体点儿说，那就是加强戒备、积极训练、积累经济实力，外加密切关注各诸侯国的动向和企图。“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换句话说，不能指望别人不来打你，一定要自己增强实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一旦战争来了，得拿得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力争“自保而全胜”，甚至可以深入敌境，“拔人之城，毁人之国”。

具备了“拔人之城，毁人之国”的实力，也不轻言战争，这就是“慎战”。孙子说：“夫

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穷兵黩武不是什么好事儿，不仅会造成财殫力竭的经济危机，还会造成生灵涂炭、民怨沸腾的政治危机。此外，还得提防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环境太复杂了，各国之间那真是犬牙交错，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呀。

古人说：“盖兵犹火也，不戢(jí，熄灭)，将自焚”。孙子不但认识到了，而且认识地很深很透。他在确定了“安国保民”的总目标后，提出“利战”而不头脑发昏，“重战”而不“好战必亡”，“慎战”而不“忘战必危”。这是在具体谈论兵法之前，先明确一个态度，一个对待战争的态度，一个立足国家人民宏观、整体利益之上的对待战争的态度，具有大视野和大心胸。

不战而屈人之兵

正是因为战争乃国之大事，关系人之生死、国之存亡，所以轻易不要发动战争，不要动不动就想“真刀真枪地练练”。人家兵圣言兵，不讲究好胜斗勇动蛮力，人家讲究“先胜”，讲究“庙算”，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

战争绝对是劳民伤财的事儿，不管你是胜还是败。一旦伤了国家元气，这时如果要有第三方坐收渔人之利，前来攻袭，那就危险大大的了。所以，孙子主张以“未战先胜”的方法，屈服敌国，这样可以保全实力。《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应该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至于在战场上每战必胜的“战胜”，作为兵圣的孙子倒是并不十分欣赏，人家看重的是“先胜”。《孙子兵法》“形”篇里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也就是这个意思。

要做到“先胜”，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它所涉及的绝不仅是军事战争，还牵涉到经济战、外交战、军备战等等诸多方面。只要把这方方面面都做好，敌国先就从意志上屈服了，何待战争？这样一来，不但效果好，而且可以取得效益的最大化。想想看，和实力相当的敌国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即便是赢了，必定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终究比不上“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全”作“保全”解）来得完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孙子的战争观，确实含有悲天悯人的仁者胸襟，很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精神，也富于人道和现代文明精神。

在孙子看来，战争是关乎国家人民整体利益的大事，战争的方式也应该是整体战，举凡政治、经济、外交、军备都要事先充分准备，这样才能获得未战先胜的效果。

首先，政治上要修明。政治修明的重要条目是“道”和“法”。那什么是“道”呢？在《孙子兵法》“计”篇里，孙子自己的解释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也就是老百姓的心意与国君的心意相同。如果能够做到上下同心同德，那么民“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众志成城。军事行动有这样优越的政治基础为后盾，必然能够无往不克。那什么是“法”呢？还是在“计”篇里说：“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里不仅指军法军规，还包括兵役征发、军队动员、士卒训练、组织编制、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与军队相关的各个方面，是一套完善而又切实可行的军事体制。这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要达到让老百姓和君上“同意”，就必须做到“行军”篇所说的“令素行以教其民”，“令素信着，与众相得”，也就是制度缜密、赏罚分明、言而有信的意思。这是战争最重要的任务。

其次，注意开发经济，这是孙子最切要的主张。战争是劳民伤财的事，一开始就得考虑这个问题。《孙子兵法》“计”篇的第二计就是“天”，“天”包括“阴阳、寒暑、时制”。“寒暑”也就是冬夏不兴师，因为有碍农事；“时制”是说军事依农时而变异设施，比如《周礼·夏官》上载的春搜、夏苗、秋猕、冬狩等就是。在古代农业社会，还有什么比不误农时、无碍农事更重要的开发经济的途径呢？所以，绝不能因为打仗而破坏了农业生产，要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现代的话，开发经济除了保证农业生产，恐怕还得加上振兴工商业，时代虽不同，可道理是相通的。

接下来，那就是外交，孙子对于外交战那是相当重视的。《孙子兵法》“谋攻”篇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谋”指战事之前先使用谋略战，而

外交就是谋略战的一种。孙子认为，战争如果真到了武力相接的地步，那胜负双方一定是各有伤亡，还是要尽量避免走到这一步。如果能够不废一兵一卒，就使敌人屈服，那才是上策，孙子把这种情形称为“上兵”。而“上兵”除了“内圣外王”这条路之外，最主要也就是外交战了。实行外交战，有三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孙子在“九变”篇里所讲的“曲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也就是使诸侯们因“利、害”而“避趋之”。说得容易做着难。在这里，你得先对敌我的“利害”关系有个透彻的了解吧，不单细密还得深邃，能说服人，就像“九变”篇说的那样“是故智者之患，并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政治、经济、外交都考虑了，还是不能万事大吉，虽然你做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算，但军备还是要备的，这方面的规划和行动都要有，而且是必须的。“弱国无外交”，这话自古就有，军备充实可以起到武力威慑的作用，往往是外交胜败的关键。中国人讲究个“形势”，所谓形势逼人。你讲求军备，准备充分，即使不用，敌人也会知难而退；可要是你不讲求军备，只来虚的，那么很可能“形”移而“势”转，导致“不可胜”“不败”的优势地位不保。情势一转，不但外交无从做起，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就堪忧了。

总而言之，战争不是什么好事情，为保全国家人民“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策，而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那就得通盘考虑，全局着眼，政治、经济、外交和武力威慑手段等等综合运用，以迫使对方失去作战的条件和意志。

如果真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将产生强烈的现实功用。第一，减少战争对人类生产力的破坏，有利于社会发展；第二，缩短战争进程，避免军队直接交锋，节省战争耗费，符合战场经济学原则；第三，可以避免因相互残杀而激起仇恨，有利于缓和敌对和反抗情绪，这样更易于巩固胜利成果。不费一刀一枪，目的达到了，而且很可能比战争的预后效果还好，还有比这更划算的吗？

兵不厌诈

“不战而屈人之兵”好是好，但很少有人能够这么去操作，要知道，圣人实属稀有，好王道的少，而好霸道的多。作为一个对军事斗争有着深刻理解的战略理论家，孙子当然了解“全胜”理论的局限性。

本来，按照战争效益大小排序，应该是“伐谋”“伐交”“伐兵”“伐城”这么个顺序。“伐谋”“伐交”这属于“先胜”，就是还没有发生实际战争，在庙算和外交上就先胜一筹；“伐兵”“伐城”这属于“战胜”，是通过实战和流血牺牲决定胜负，在孙子看来“战胜”比“先胜”的层次那可就低多了，前者是下策，后者是上策。可是在上策不能达成的时候，迫不得已，你也得退而求其次。

战争是无情的，也是惨烈的，倏忽之间就决定生死存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战场之上还讲“仁义”就显得过于迂腐了，宋襄公就是个例子(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泓水边发生战争，宋襄公就是个以仁义著称的迂腐贵族，死抱着所谓君子“不乘人之危”的教条，拒绝接受正确意见，以致贻误战机，惨遭失败)。战场上奉行“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那是《周礼》上倡导的，可是现在，时代变了，礼崩乐坏了。真正知兵的孙子可不这么迂腐，面对社会巨变和战争的无可回避，他适时地提出“兵不厌诈”，明确指出“兵者，诡道也”。

“兵以诈立”，孙子在他的兵法十三篇之首的《计篇》中，一口气就道出“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这里，孙子阐述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既然兵者诡道，那么就得采取灵活手段，见机行事，善于权变，将无权难以成功，兵无机难以称雄。在战场上两军相对，对敌人不能讲忠厚老实、妇人之仁，还是得使计耍诈，而且得神机妙算，敌人越是猜不透、摸不清才越好呢。只有这样，才能迎来战争的胜利，才符合国家的安全利益。

再说了，神机妙算地使用计谋，相对来说，可以缩短战争的过程，较之旷日持久的战争来说，国家人力财力的消耗自然降低很多。孙子之所以认为“伐城”是最下策，原因也就在这里。你想啊，一旦强攻敌城的话，得先花三个月制造修正攻城的器械吧，还得用三个月来构筑攻城用的土山，这样战争的时日必然也就延长了，金钱耗费那真得“跟流水似的”。而且，一旦将帅开始驱迫士卒像蚂蚁一样强力攻城，那士卒死伤也得三分之一，而城池也未必就攻得下来。这显然违背了孙子“低代价高目标”的战争效益观。

按照孙子的思想，我们不要轻易开战，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万一战争不能避免，一旦被迫开战，那对不起，我可要“兵不厌诈”了。咱们不好战，但不能不知兵，“兵者，诡道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想用计使诈、神机妙算，你得先摸清情况，而且是敌我双方的情况都得摸清。俩眼一抹黑，心里没有数儿，尽想着掐指一算就是妙招儿，那肯定没门儿，咱不是神仙。所以孙子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是《孙子兵法》里那句完整版的原话，前面那八个字更是大家耳熟能详，时常提起的，甚至被认为是孙子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战争制胜的前提，是军事谋略的基础。它反映了古今战争的基本规律，不仅是重要的作战原则，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朽真理。

战争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情况，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处于流变无常之中，再加上敌人的伪装佯动，还需要识别假象，由表及里，捕捉事物的深层本质。一般说来，知己就已经很不容易，要知彼就是难上加难。所以，孙子特别强调料敌、知敌，他说“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这样看来，此一问题显然被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它是战场上正确指挥的根本基础和来源。

“知己知彼”其实还是一个多层次多内涵的认识结构，而且贯穿战争指导的全过程。首先，在战前，这是支撑“庙算”的必要条件，通过掌握、分析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天时地利等各方面状况，比较衡量双方的优势和劣势，进而筹划对策，把握胜负结局。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孙子提出：“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同心同德)者胜，以虞(有准备)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将帅有才能而君主不牵制)者胜”。这是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战争脉搏的。

一旦战争开始，还得关注周围的各种情况，以便及时做出对己方有利的作战布局和军队配置。比如：“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地形者，兵之助也”；“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但要“知战之地”，还要“知战之日”。孙子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战争是一项竞争激烈，甚至惨烈的特殊社会活动，只有掌握先人之机，才能取得主动，以期先发制人。

再具体到临阵料敌，更要注意细致观察，根据各种征候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用孙子的话说那叫“相敌”，给敌人相面。他一连举出“相敌三十二法”，比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来也”；“鸟起者，伏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等等。看来，孙子是教我们要摸透对方的心理，识破对方的假象，透过表象看本质，以发现对手的真实意图，避免上当受骗。

为了做到“知彼”，探知敌情，孙子主张多手段并用。比如，挑动敌军，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侦查一下情况，以了解哪里有利哪里不利；进行一下小战，先摸摸底、打探下虚实强弱；还有就是广开情报来源，使用各种间谍来获得第一手的敌情资料。孙子大概创立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谍报学。敌人的一般情况，可以通过公开的事实进行了解，但那些隐匿于背后的敌人军力配备和分布，军事谋划的具体步骤及决策这些内幕等机密信息，恐怕还真得有赖间谍贡献力量呢。根据《孙子兵法》上的说法，间谍也不是一种，有五种呢，喜欢的可以去细看，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说起来，间谍不光是刺探军情获取秘密情报，还能够离间敌人君臣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的团结，让他们自己内部先掐起来，从而干扰军事判断和决策，敌人乱了营，我方也就得了益。当然了，间谍这活儿不是任谁都能干得的，起码你得聪明有头脑吧，还得不是一般的聪明，得是智慧超群，所谓“上智为间”。

总之，不管使用什么具体方法吧，无非是为了知己知彼，了解情况，摸清敌情，为了打有准备之仗，这样才有取胜的把握。

攻守兼用，避实就虚

进入到实体战争中，攻和守就是作战的两种基本形式。攻是为了消灭敌人，守是为了保存自己，“攻守同归乎胜”，二者都是体现战争目的的作战手段。

在战争中，攻与守在作战双方中，一般是交替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防御的特征是什么？是等待进攻。纯粹的防守，同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那相当于只有一方在进行战争，而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说，进攻是防守的转机，防守是准备进攻的手段，二者那是相辅相成，随时可以转化的。

在中国历史上由弱守转为强攻的战例，那可多了去了。战国末年赵将李牧戍守北方边境，因为兵力不如胡骑，他明示弱暗蓄锐，竟然防守了十年，专心畜养战马，训练骑兵。虽然为此屡被国君诘责，甚至被免职，但就是“死不悔改”，终于坚持到条件成熟，“北逐单于，破东胡，开地千里”。西汉“七国之乱”，大将周亚夫坚壁昌邑，敌人三番五次地挑战，他就是不理你那套，而悄悄地派小股兵力切断敌人的粮道，等到敌人粮草不继，兵疲势弱了，周亚夫才大举进攻，一鼓作气平定叛乱。以上提到的这俩位将领，保不齐就是熟读《孙子兵法》的人，孙子的思想精神，他们吃得挺透。

孙子对攻与守这两种手段都不放弃，主张弱守强攻。他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也就是说，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要看双方的兵力。十倍于敌，那就围而歼之；五倍于敌，那就发起进攻；比敌人多一倍，那就努力战胜它；人数相当，那就想办法分散敌人；兵力明显少于敌人，那就只有固守；太弱了，那就先暂避一时吧。所谓“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说了归齐，弱守还是为了强攻，因为只有进攻才能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也只有进攻才能缩短战争的日程。在作战方针上，孙子也是很强调进攻速胜的，他说：“兵之情主速”；“兵贵胜，不贵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因为战争久拖不决会使兵力疲惫，财政枯竭，没准儿还引起第三方的乘虚而入，所以，有宁肯笨拙的速胜，还没见过巧人儿愿意旷日持久地打仗的。

要进攻，但不能硬拼。要避实就虚。

避实就虚有好处，它可以避免“攻城”。攻城在孙子看来，是最下策，不但伤亡大，还有可能挫伤士气、耗费兵力。孙子主张“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就是攻击敌人戒备松懈，该守没守的软肋。这样可以避实击虚，以众击寡，以至出奇制胜。唐太宗李世民，被毛主席称为中国最能打仗的皇帝（“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而李世民最佩服的则是孙子，他说：“朕观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是深深地悟得了兵法中“虚实”的奥妙。

孙子反对“以少合众”，“以弱击强”，认为善战者，“不责于人”，而是“求之于势”，这个势就是双方一接战，那种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之势。

这个势怎么造呢？还是得靠避实就虚。首先抓住战略重点，“并敌一向”，集中使用兵力，避免四面出击。这样一来，虽然在全局上兵力或许不占优势，但只要做到“我专为

一”，同时又设法调动和分散敌人兵力，使“敌分为十”，就可能形成局部甚至某一点上的“以十攻其一”的优势。

虚和实是《孙子兵法》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它是对战争双方各种力量因素和力量状态进行比较的结果，既含有丰富的具体内容，又是一种总体把握，诸如兵力的强弱、众寡、分合，部队的劳逸、饥饱、治乱、懈备，士气的高低，军心的定散、勇怯，部署的密疏、坚乱，处境的安危、险易，后方的通阻等等，都是构成虚实因素。同时虚实对双方又是相对的，它会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孙子说：“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又说：“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打仗么，没有固定刻板的方式，只要能制胜，尽可以出奇，尽可以根据敌情临机制变、灵活机动。

多么灵活神妙！这不禁又让我们想起“神龙见首不见尾”，想起《易经》，想起《老子》。作为龙的传人，中国人总是能将这套灵活应变的本事运用地挥洒自如，近乎艺术。

合文齐武

军队是由千万个活生生的人组成，要使军队打起仗来“携手若使一人”，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就牵涉到军队的管理问题，管理得好，那就团结一致、士气昂扬，管理得不好，那就一盘散沙、垂头丧气。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要管理成千上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军队，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孙子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也就是说，管理军队要沉着冷静，严正而有条理。对待士卒要恩威并施，要赏罚兼用。

管理军队在古代称为“治兵”。孙子认为，法是治兵的根本。他在兵法十三篇的《计篇》中，提出“五事”和“七法”，主要说的就是“法”，它的内涵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训练教育、军纪军法和装备及军需供应等方面的各种条令。治兵只有“修道而保法”，确保法令制度的合理性和执行力，这对于打不打得赢也是至关重要的。

要想以法治兵，一得严，二得信，赏和罚也是用以贯彻法制的手段。士卒违犯了军规军纪，如不严格按章执行处罚，那就会使之成为骄惰之卒，进而丧失战斗力，此外，也会造成其他士卒的不满，进而轻慢军法，同样也是丧失战斗力。所以，只有执法严明，士卒才能敬畏将领，重视军纪，不敢怠慢，这样才能令行禁止，也就会大大提升战斗力。而要想令行禁止，就得从平时抓起，从小事抓起，所谓“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

贯彻法令，军法不是儿戏，孙子一出山就给人们做出了样子。“吴宫教阵”，指挥一拨儿后宫佳丽小练一下，别人都以为做游戏呢，哪知道孙武子竟动了杀伐，毫不留情面地诛杀了吴王的两名爱姬。这就是军法如山。孙子说了：“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为了保障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不能无法无天，更不能有法不行、执法不严。

责罚是必要的，激励也不可或缺。就像宝剑要经过磨砺一样，军心士气也应该不断激扬。而激扬并不一定是口头的表扬和物质的奖赏，还有发乎内心的关爱。孙子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对士卒有一颗仁爱之心，那么，作战时，士卒才会报答将帅的知遇之恩，宁肯进死，不愿退生，虽赴汤蹈火，也会所向披靡。

如果说关爱士卒还属于小道，那么大道是什么呢？“令民与上同意”。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人类是具有群体意识的，利用这一特点，抓住君主、将帅、士卒、民众共同利益上的需要，比如国家危难、敌人残暴、亲人死别、家园破坏等等来调动军人的战斗情绪，使之在战场上迸发出无畏之火。人人气勇怒盈，个个争先向前，还害怕他们畏首畏尾、退缩不前吗？

孙子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在治兵方面，孙子是主张爱先威后、爱威结合并用的。以怀柔和激赏，使士卒亲附和顺从，从而不怀二心；以威严和刑罚，使士卒畏服，以建立将帅的威信。

孙子把这称之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武兼施，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其实，这还是《易经》上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人都“有两把刷子”，“会两手儿”。

战争是幽灵，孙子把战争的“不可捉摸”变成了“可以认识其规律”。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对战争风云感到恐惧，经常是一筹莫展，认为它神秘莫测、不可预知。在西方，都到工业革命前后了，几乎还没有人认为战争可以被认识。18世纪法国一位元帅曾经这样说：“战争是一种充满阴影的科学”，“它的基础就是惯例和偏见”，甚至声言“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惟战争独无”。就连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都说“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握地预料上帝是怎样安排的”。虽然，这些言论把战争的偶然性和无规律性夸大了，但也足以反映出把握战争规律的难能可贵。

孙子的功绩就在于：他是提出战争计划问题的第一人，他真正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并系统地传之后人。孙子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也就是说，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一不靠祈求鬼神，二不靠推演附会，三不靠星象验度，而只能靠脚踏实地地去分析各种敌情条件(当然也包括自身条件)。这也明朗而又充分地体现了“人本位”，而非“神本位”的精神，这是古圣先贤的精神倡导，也为民族大众普遍认可和响应，或者说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第七章 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墨家是先秦和儒家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称为“孔墨显学”。墨子大概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和重视实践的作风。他有学问，最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礼”之烦琐，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的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儒、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他还有技术，善于制作，几乎谙熟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止楚攻宋时进行的攻防演练中，竟使木匠祖师鲁班对“墨守”感佩不已、知难而退。墨子还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的大好人，他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使命，不辞辛劳，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是战国时代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不但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就连儒家的亚圣孟子，对墨子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也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

出身其实不是问题

墨子的生卒年代和“国籍”被认为是一疑案，连一代史家司马迁都没说清楚，其实这也是乱源。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的，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在这些人物传记里面，司马迁把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自己身处的汉武帝时代，一共三千多年间，他认为杰出的、重要的人物，都一一给予列传。不但有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这些思想家，甚至还包括一些在传统观念里不被看重的人物，如商人、侠客等，司马迁都给他们作了传。偏偏对于墨子，司马迁没有给他单独作传，除了在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叙》里面写到他父亲的《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提到墨家以外，那就只剩下《孟子荀卿列传》末尾附缀的那24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就算是关于墨子的一个交代了，连生卒年代都不清楚，事迹几不可考。这让我们明显地觉得，在汉朝，对于其前代文化传统作继承的时候，对墨子已经很冷淡了。由于司马迁没有对墨子作简单、起码的考证，所以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问题。尤其“墨”这个姓本来就极冷僻，而墨子的名声又大，这就更引起人们的兴趣。

有人推测，大概墨子犯过法，受过刑，做过刑徒或者苦役。为什么呢？因为“墨”是一种刑罚。古代的刑法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大概齐也就分五种：第一个，墨刑，就是在犯人脸上刺字，像《水浒》里的宋江似的；第二个，劓(yì)，就是割鼻子；第三个，劓(fèi)，剁掉小腿；第四个，宫刑，割掉生殖器；第五个，大辟，也就是砍头。墨子可能是受过墨刑，换句话说墨翟的意思也就是刑徒翟，或者说犯人翟，因为他脸上有墨字。

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于是又有人说了，得得得，别闹了，墨就是黑的意思，折腾什么呢？因为《墨子》里边记载墨子皮肤很黑，墨子就是黑子。

此外，还有更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考虑到墨子跟鲁班一样，是个木匠，既然如此，那就得放线，木匠要放线那就离不了绳墨，离不了墨斗，加上本人又长得黑，所以，就得了这么个诨号。

虽然，这些说法好像很吸引人，但是这些都不是可靠的结论。

真正可靠的说法：墨就是一个姓，如此而已，啥也不是，跟别的没有关系。这可能有点儿让大家失望，但是有让大家不失望的。那就是墨子的这个姓从哪儿来？墨这个姓始祖是谁？墨这个姓历史上留下哪些故事？这里面大有学问。

墨这个姓很冷僻，也很古老。它来自于商朝的孤竹君。那孤竹君的封地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秦皇岛，靠近北戴河那边。最早他叫墨骀(tái)氏，后来改称为墨。

那么，墨子的籍贯或者说墨子的出生地又是在哪里呢？就是今天山东滕州的木石镇，为什么我们有把握说墨子是今天山东滕州人呢？因为我们根据史料可以推定，墨子是公子目夷之后，那目夷又是谁？公子目夷(子鱼)，宋襄公之庶兄，也就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记载的著名的子鱼论战故事(宋、楚泓水之战)的主人公。

这个目夷，就是墨子的先祖。目夷是微子的第十七代孙，而微子又是殷商帝乙之子，商纣王的庶兄，诸侯国宋的第一代封君，所以说，墨子是殷商的后裔。前面我们说过孔子

也是殷商的后裔，也就是说，墨子跟孔子是同一个祖先，都是微子传下来的支系。从目夷往下面算，到了大概第七代，就是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了。

目夷就封在目夷这块地方，目夷的后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而目夷在并入周以后，就有了一个新名字，非常著名，这就是小邾娄(z h ū l ó u)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滕州市的木石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春秋战国时候的国家有多大，不少也就相当于一个大镇店。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木石镇就是目夷，就是小邾娄国，是因为在那里出土了一把青铜戈，上面有三个字——目夷戈，如今这件青铜器就像国宝一样保存在博物馆里。另外，这一带还出土了很多精美无比、特色鲜明的小邾娄国的青铜器。

山东滕州是一个什么地方？你也许感到陌生，但若提起铁道游击队、提起微山湖，你也就熟悉了，就在那附近；滕州属于县级市，属地级市枣庄管辖，滕州和徐州接壤，是山东和江苏交界的地方。滕州在历史上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许多重要事件发生在这里。这里是墨子的故乡，是鲁班的故乡，也是最早造车子的奚仲的故乡，滕文公问政于孟子也在这里。

正是小邾娄国文化，也就是泗水河畔的邹鲁文化，孕育了墨子。邹鲁文化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一，邹鲁文化特别地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推崇文明；第二，那就是科学技术水平极高。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科技水平最高的地方就在邹鲁，小邾娄国所在的山东滕州这一片儿，可以说是独步天下，最早的筷子和最早的鞋子都是这一带发明的。所以，有学者说过这样的话“邹鲁地区，其俗喜学术、好技艺，颇似希腊之雅典”。所以墨子、鲁班、奚仲，这些人有个最大的特点——有学问，却不鄙视技术。

当然，这应该与墨子的出身也有关系。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墨子跟孔子一样应该是个没落的贵族，可不一样的是，墨子的没落程度很可能比孔子还惨。

孔子这个家族没落到最后，没落到孔子的父亲这一代，甚至到孔子本人这里，至少还是个“士”。虽说士算不上什么统治阶级，但勉强还属于贵族，起码不是被统治阶级。而墨子就不一样了，墨子已经是一个手工业者了，在《墨子》这本书里，有个叫穆贺的人，曾经当着墨子的面说他是“贱人”，墨子并没有否定。而且墨子自己自我介绍，也说“我是北方的鄙人”。从这里都可以看出来，他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下层人了。而了解这一点，对于了解他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生逢乱世，出身已经不是问题。卑微的出身已经限制不了胸怀大志的豪杰才俊，故乡也限制不住游走天下的脚步。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的墨子“席不暖、衣不黔”，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传布学说，成为孔子之后，一位在当时声名堪比孔子的人。

尚利贵义

儒墨对立，一个基本点就是对义利关系看法的分歧。儒者是喻义不喻利，墨子则明确提出尚利思想，认为利就是义，贵义就是兴天下之利。

在《论语》中，有孔子“罕言利”的评价，也有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记载。后人缘于这两段文字，得出对孔子义利观的认识和评价，就是“重义轻利”。孟子的义利观则是“去利怀义”，孟子认为，“怀利”与“怀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如果以利己作为决定自己行为和处人伦关系的方针，那就必然会废弃仁义，其结果将致于亡国。反之，如果“去利怀义”，以仁义为行为方针，那就会使君臣父子兄弟以仁义相处，即可保社稷而王天下。

显然，孔子、孟子在义利观中所提到的“利”，是指个人私利、私欲。其实，孔子并不去“利”非“利”，只是反对过分的个人私利和私欲，以至给人重义轻利的倾向，甚至有将义、利对立之嫌。

墨子批判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同样贵“义”，也是“义以为上”。《墨子·贵义》里说得很明确：“子墨子言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要，然而为了“义”，人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可见墨子对“义”的看重。

《天志下》也提到：“天欲义而恶其不义者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此外，墨子还提到对“义”的践行和成圣成贤的方法，提出：“必去六辟。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墨子·贵义》）把“从事于义”作为人成圣成贤的途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墨子是提倡人从事“义”的，这一点与儒家特别是孔子是极其相近的。

墨子重义，但却决不轻“利”，他不但不轻“利”，不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反而把“义”直接等同为“利”。墨子认为“义”本身就具有功利性，他提出：“义，利也”，也即是“义”与“利”是统一的。清代孙诒让在《墨子闲诂》中解释这句话说：“易曰：义者利之和。”在《公孟》中墨子还说：“夫义，天下之大器也。”大器就是大工具，是工具就必有其用，有其用就有其“利”。“义”说到底，就是给天下带来利益的工具。为了具体说明“义”的功利性，墨子强调：“所谓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为天下之良宝也’。”“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也就是说“义”能保障“利”、带来“利”、实现“利”。《墨子·经说上》中说：“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利之，不必用。”也就是说，“义”即志在使天下美好，而能善利天下，却又不居功自用。

精研《易经》的孔子说：“利者义之和”，已经精到极了。墨子把利的道理更是发挥尽致，《墨子·经说上》篇直说：“义，利也”，也即利就是义，除了利别无义。王桐龄先生在其《儒墨之异同》中说：“儒家言义，墨家言利；儒家常以仁义并称，墨家常以爱利并称。”

墨子重利，把义等同为利，但他所说的利都是公利而非私利，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而非个人一己私利。

墨子提出“言必立仪”，称“言必有三表”，也就是说衡量人的言论是非有三个标准，而其中第三表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把“百姓人民之利”作为衡量言论行为是非的最高标准。墨子还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也就是说仁人应当以“兴天下之利”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天志下》中系统地表述了墨子的价值标准：“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义也、孝慈也，是故聚敛天下至善名而加之……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之贼。故凡人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孝不慈，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这些主张，归根到底都是力图实现尚利的价值标准。而利天、利鬼，只是借天志、鬼神来论证这个标准的神圣性而已；这里的利人不是利个人而是利万民。

墨子强调义和利的统一，并以万民之利，公利为取向，这是他的重要贡献。方授楚曾经有言：“墨子贱人，亦即小人，故不讳言利。且以利与义调和之，融合之，此墨子与儒家之异也。但墨子之利，非自私自利而为天下之公利，或彼此之互利；故常曰‘下欲中(zhōng)国家百姓之利’。盖墨子所倡导之至德要道曰兼爱，爱而不利，则流为空言，故常以爱与利并言。”

交相利与兼相爱

不错，在墨子这里是“爱与利并言”的，而且还很独特，叫作“兼相爱”与“交相利”。

“兼爱”和“利”是墨子思想两个最基本和最独特的概念，墨子将“兼爱”和“利”联系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兼爱交利观，并成为他立说的核心和济世的方法。“兼相爱”是爱人与爱己的统一体，“交相利”是利人与利己的统一体。爱与利是相互通约的，“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前提，“交相利”是“兼相爱”的保证。

“兼相爱”是无差别的爱，它的本质是要求人们爱人如爱己，即爱所有的人、与一切人都相爱，既有爱人的义务，也有被爱的权利，是一种平等的、普遍的爱。

这显然不同于儒家的“仁爱”。儒家所讲的“仁爱”恰恰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孔子以人的自然亲情和血缘关系为基础，认为“孝悌乃仁之本”，主张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爱他人，爱社会。孔子认为这种亲亲之爱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根本之所在。儒家这种基于血缘亲情关系的仁爱，突出了与被爱之人是有亲疏、厚薄、远近之别的，尊重了人的生理属性和自然差异。

如果说“仁爱”之爱是发自内心，那么“兼爱”之爱就是出于理性。人家墨子即是从不相爱的角度引出“兼爱”概念的，这应该与当时更为动荡的社会大背景有关。墨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大害”“巨害”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造成这种混乱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人们的不相爱：国与国不相爱、家与家不相爱、君与臣不相爱……

墨子注意到：儒家那看似有理的“亲亲”的伦理观一旦放之于社会，就免不了一种狭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家与家、乡与乡和国与国之间的不相爱。在他看来，儒家的道德标准说到底，都是对一种不公道的等级制度服务的落后观念。它应该被一种新的、更公正无私的集体主义的信念取代，这就是“兼爱”。既然要兼爱，那么首先就得打破“亲”与“疏”之间的差别，即要强调二者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兼爱”恰恰体现了整体性与平等性，是一种整体的爱和平等的爱，是一种无差等之爱。而且，墨子的这种无差等之爱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是普遍的平等之爱。

为了增强“兼爱”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墨子还提出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因果律原则。他认为人性是可以感应的，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人，他人就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因此，本着爱的原则去对待他人，他人也一定会本着爱的原则来回报自己，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会因人性的感应而转化为“相爱”。于是，墨子主张要用平等的兼爱来代替有差别的爱，即“兼以易别”。

“兼”，实质就是利人，是在于调和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以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至上，但也并不否认个人合理的利己要求。这种突破了血缘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之分的兼爱，不但凸现了人的平等性地位，还有追求和平的意味。或者说“兼爱”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攻”，为了追求和平，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不错，爱之就要利之，爱而不利，则流为空言。

墨子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物欲的合理性，还把满足万民之物欲作为治国安邦的出发点：他利即是众利，实乃爱人之利也。墨子的“交相利”和“兼相爱”一样，承担着治理社会的责

任，其次才是他人之利和自我之利。

墨子认为“自利”是乱的祸根，对“自利”持批判的态度，或者说，在个人之利和他人之利的相较中，墨子更重视他人之利。但同时要指出的是，墨子并不是一味地否定个人之利，而是肯定个人之利的正当性，只不过这个“个人之利”在墨子看来应该是“赖其力而生”的，用以自足的基本需要，而不是亏天下之利和他人之利而换得的一己私利。

兼相爱与交相利，可以说是墨子济世的核心思想。兼相爱是爱人与爱己的统一体，交相利是利人与利己的统一体。爱与利是相互通约的，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前提，交相利是兼相爱的保证。更进一步说，兼相爱是墨子所要达到的目的，交相利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因此，墨子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当“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从其兼爱思想出发，主张非攻，反对战争。他断定，爱人运行时，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运行时，人亦从而利之。反之亦然。既然如此，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只要相互兼爱，不要发动战争相互攻伐，这样不以兵刃毒药水火相攻伐，就可以共同取利。

不过，墨子的这种思想观点似乎并不被看好。先有庄子发出这样的感慨：“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庄子·天下》）后有李斯更为严苛的批评：“诗经皆物语，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故墨子见歧道而哭之。”（《吕氏春秋·疑似》）那意思，大概就是说：墨子非生而知之，其思想来自孔子《诗经》《十翼》的读后感。可墨子读懂了孔子吗？没有。就连倡导墨学的梁启超也对此表达了不赞同的态度，他说：“（墨子之）兼爱主义……其陈义不可谓不高，然此足以驾儒家之上耶？吾恐不能。”（《先秦政治思想史》）

天志和明鬼

孔子对鬼神的态度，那是“敬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对命运的态度，那是“尽人事，听天命”。可墨子呢，恰恰相反，他搬出了“天志”和“明鬼”。

墨子主张“兼爱”，那么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说服人们兼爱呢？你可以把上面所说的告诉人们，说实行兼爱是利天下的唯一道路，能行兼爱就是仁人。可是人们又要问了：我个人行动为什么要利天下？我为什么必须成为仁人？你可以进一步解释：如果对全天下有利，也就是对天下的每个人都有利。更明白地说，爱别人就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它是会得到偿还的。可大部分人都很近视，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甚至还有一些实例，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

那怎么办？

为了诱导人们实行兼爱，光讲道理好像不大灵，所以墨子又引进了许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几篇就专门讲“天志”和“明鬼”。他说：天帝是存在的，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就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还经常监察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天帝会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也会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一些的鬼神，他们也同天帝一样，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可是，总是有事实证明，这种奖惩也不都应验。墨子就遇上过这样的尴尬。有一次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鬼神何遽(jù)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墨子·公孟》)还得说墨子逻辑学了得，才算应付了过去，墨子那意思是说，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有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墨子不是主张“节用”“节葬”吗，怎么还相信鬼神？

其实这里没有实际的矛盾。因为墨子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乱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也就像咱们今天说，没有信仰容易做坏事儿那意思。《墨子·明鬼下》有这么一句：“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

这么看来，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不实行兼爱则受罚。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应该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他们。

不论墨家、儒家，在对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态度上，都只是表面上的矛盾，而不是真正的矛盾。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同时反对丧葬和祭祀的缛礼；儒家强调丧礼和祭礼，可是并不相信鬼神存在。照儒家的说法，行祭礼的原因已不再是因为相信鬼神的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而只是出于子孙孝敬祖先的那份发自内心的真感情。所以，冯友兰先生说，礼的意义是诗意的，而不是宗教的。

宗教和诗，都是人的幻想的表现，是要把想象和现实融合起来。诗是把它当作假的来说，但宗教是把它当作真的来说。墨家信鬼神的目的在于，用信仰来更好地约束人的行

为，使他们不要为非作歹、好战征伐。

尚同与极权

要人们实行兼爱，除了天志与明鬼这样类似宗教的制裁外，还需要政治的制裁，而尚同正是“为政之本”。

尚同的意思是，上天“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立以为三公、万国诸侯，以至左右将军、大夫和乡里之长，社会成员则自下而上地尚同于天子之“义”。而天子的行为是否合于天下之义，就要看他是否尚同于天。如果未尚同于天，那么天灾就会不断。“故当若夫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之人之不尚同于天者也。”（《尚同》）

这又与儒家不合。孔子不是说了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赞赏的是“和”，而不是“同”。而墨子则认为儒家强调了“别”而忽略了“兼”，注意到了对矛盾的调“和”，而忘记了对利益分配要求上的“同”。

这大概与墨家的组织有关。

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实践家，所以他的学派组织很特别，有点儿像敢死队，而他本人就是这个敢死队的队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淮南子》上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既然是敢死队，就得有纪律，而且是相当严格的纪律；不但有纪律，还得有权威，也就是老大，墨家这个团体组织里的权威就叫巨子，墨子实际上就是墨家的第一位巨子。有纪律就得遵守，有老大就得服从，而且是绝对地遵守、绝对地服从。

这样的话，团体内必须能者为尊、贤者为大，将此规则扩大，也就有了墨家思想的“尚贤”；团体的成员之间必须互敬互爱、不分亲疏，将此规则扩大，遂有墨家思想之“兼爱”；团体内还必须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上下一心，将此规则扩大，故有墨家思想之“尚同”。

《墨子》有《尚同》三篇，阐述“尚同”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照墨子的说法，国君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他更进一步说，国君的主要任务是监察人民的行动，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不实行兼爱的人。但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他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

在建立有组织的国家之前，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在这个时候“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由于个人各持其所义而非他人之义，长此下去人民就会有离散心，最终导致天下乱。“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说来，国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设立的，是为了把他们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同中》）照这个说法，国家和国君又都是通过天帝的意志设立的了。

不论国君是怎样获得权力的，一旦他成为既定的国君，那么天下人都要跟他步调一

致。也就是墨子所说的：“上同而不下比”，即永远同意上边的，切莫依照下边的。因为这个“君”掌握着天下统一之“义”，故百姓都需“上同”于他。《墨子·尚同上》说：天子要“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

这不但与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不合，更是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相左。到墨子这里几乎就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当然，这里的君义必须合乎天志。但是，尽管如此，也不可避免地为独裁和暴政留下了可能。

按照墨子论证，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因为国家的设立，是有明确目的的，那就是结束混乱。而混乱的存在，正是由于“天下之人异义”。因此，国家的根本职能就是“一同国之义”，也即是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义存在，这一义必须是国家自身确定的一义，别的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存在别的义，那除了天下大乱之外，终将一无所有。义，墨子认为就是“交相兼”，不义就是“交相别”，这也是唯一的是非标准。

墨子的这种政治学说，无疑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混乱政治局面，许多人向往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哪怕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也好。

可贵的科学精神

我们说墨子是个思想家，也是个实践家，不仅从事社会实践，还从事科学实践，他几乎是个全能型的人才。

前面说过，是小邾娄国的文化，或者说邹鲁文化哺育了如墨子、鲁班、奚仲等这些工艺、工程大师。邹鲁文化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不鄙视、甚至是重视科学技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般是看不起工匠的——我是士大夫，我是读书人，我怎么能干工匠干的事呢？

但是，邹鲁文化熏陶下的士大夫就不这样。墨子、鲁班本身就都是士大夫，他们自己却都能动手做东西，能动手造云梯，能动手造车子，动手造连珠箭，动手造飞石，动手造撞车。在止楚攻宋时，墨子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体现了二人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所以，他们还真不是纸上谈兵，人家确实能攻能守，并且是亲自动手、身体力行。

墨子简直就是个发明家、科学家。他曾花费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不但运行迅速、省力，而且经久耐用。然而，他的科技素养又不止于机械这一方面。“小孔成像”的故事大家一定听说过吧，那说的就是墨子。墨子对光学很有研究，什么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物影成像，这些他都进行过实验。有一次，墨子进行光学试验，他在堂屋朝阳的墙上开了一个小孔，让一个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在阳光照射下，屋内相对的墙上出现倒立的人影。墨子通过小孔成像的光学实验，阐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即光从上下直射，人的头部与足部成影在下边和上边，构成倒影，这就是摄影技术的原理。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罍(yīng，古代大腹小口的酒器)有放大声音的作用，这个发现后来还真派上了大用场。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墨子教导学生每隔三十尺挖一个井，置大罍于井中，罍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罍上进行侦听，就知道敌方是不是在挖地道，挖的话挖在哪了，这样就可以充分准备打击敌人。

据统计，墨家著作《墨经》中，除了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外，这类牵涉自然科学的内容，那是相当多的，其中物理学的内容超过了二十项。《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及《大经》《小经》六篇，专说名辩和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声学、代数、几何等内容。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而杰出的，其中贯穿着极可宝贵的科学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派别所相对缺乏的，所以称得上是难能可贵。

手工业者出身的墨子，有着“巧传则求其故”的探究意识，也就是从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意识。“巧传”也就是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术；“求”就是去研究、去探索、去揭示；“故”就是本质、原理，或者说规律。比如《墨经》总结桔槔(gāo)所利用的杠杆原理时说：“横木加重焉而不翘，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翘，极不胜重也。”指出桔槔负重后，另一端不翘起来的原因，是由于另一端的力量超过负重端的力量。

春秋战国期间，人们从劳动实践中已然发现，用桔槔机提水浇田可大为提高劳动效率。可是，当时大家对此类工艺技巧的态度就是不一样。信奉道家思想的人，宁肯用“用力甚多而见功寡”的老法子——“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也不要“用力甚寡而见功

多”的桔槔机。理由就是：“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他们瞧不上“奇技淫巧”，故“羞而不为”。

所以，有人说，要是老早就发扬墨家的科学精神，中国应该很早就走向近代科学了。

墨子和墨家确实重视这些“奇技淫巧”，而且重视知识，崇尚理性。墨子提出了一些有深刻理性论意义的认识方法和原则，如“知类”“察类”“明故”“辩故”“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等等。《墨经》还道出了理性认识的本质特点。《经上》曰：“知，明也。”《经说上》曰：“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意思是理性认识相对于感性认识而言，有着更加深刻而明确的特征，是运用认识能力，对事物进行整理、分析、理论化而形成的。《墨经》在理性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感性与理性、经验和理论并重的认识论，表现了对理论、理性与知识的推崇。

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富科学精神的学派，《墨经》集中了墨家学说的精华，其论述包括物理知识在内的许多学科，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科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范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科学与哲学双博士李约瑟这样评论《墨经》：“亚洲的自然科学之主要基本概念……其所描述之要旨正为科学方法之全部理论。”还有人说：《墨经》“巧传则求其故”的理论意识和理性论原则，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科学精神，具有一致性、共同性，值得继承和弘扬，尤其是在科技飞速发展进步的时代里。

不可否认，墨子被冷落了两千多年，墨学也沉睡了两千多年，这应该不是偶然的。这两千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两千年。从晚清以来，墨学受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秦以后两千年的总和。虽然表面上看来，这种关注源自于《墨经》丰富的科学性与逻辑知识(胡适先生就认为：墨学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但平民意识的觉醒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复兴墨学最力者当推梁启超先生。他以其敏锐与广博对墨学进行深入考察，认识到：虽然墨子学说二千年不流行，但其中一些根本理念，已经溶合为中华民族的特性之一。梁启超认为：在现今国际社会，墨子的学说还有极大的生命力——“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

第八章 儒门护法孟子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逝世(前479)大约百年左右，从学问渊源上讲，孟子算得上是孔子的嫡传。他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孟子是那个大时代的大丈夫，在社会更加动荡的战国时代，他也如孔子那样，带领学生游说诸侯推广王道思想；当政治主张不为所用，他也如孔子那样回到家乡讲学著述，留下《孟子》七篇垂教后人；在“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情况下，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他维护了、也振兴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他于儒门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大功勋。亚圣之称当之无愧。

母教与师承

孟子，本为“鲁国三桓”之后，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也就是鲁桓公的庶长子公子庆父这一枝脉。公子庆父之子公孙敖另立一族，为孟孙氏，或称仲孙氏、孟氏。齐宣公四十八年(前408)，齐国攻破了孟孙氏的食邑郕(chéng)城，孟孙氏子孙遂分散开来。孟子的祖先就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于是孟子成了邹国人。

孟子幼承母教。他的母亲教子有方，“迁地教子”“三断机杼”成为千古美谈，就连启蒙课本《三字经》都要记上一笔“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成为母教的典范。孟子的母教对孟子的成长，以及孟子思想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把相关故事稍加介绍。

其一，三迁择邻。孟子家原本居住在邹城北马鞍山下，附近是一片墓地，山麓坟茔处处，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孟子和小伙伴们就经常一起模仿丧葬的程式。孟母发现儿子受到了不良影响的影响，就决定搬家。后来，在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旁边住下来，市场上行商坐贾，拍卖喧闹，孟子又模仿这些商贾的样子学起了做生意那一套。孟母忐忑不安，再次迁居，把家搬到了县城南部的学宫旁。学宫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对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和伙伴们一起，演练学宫中揖让进退的礼仪，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终于感到安慰：“这才是孩子最佳的居住环境啊！”于是，定居于此。

其二，断机喻学。说是孟子读书(诵书)，孟母在一旁织布。孟子这书读得心不在焉，读着读着暂停了，过一会儿又开始有气无力的继续。孟母知道他根本没用心，就是在那儿闹着玩儿呢。于是，得着这机会要教育教育儿子。拿起刀来就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了，对孟子说：“学习就跟织布一个道理，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得坚持下去，半途而废，终将一事无成。”

其三，杀豚不欺子。说孟子小时候，有一次看到邻居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呀！”说完了之后，自觉失言，可孟子十分高兴，还真等着吃肉呢。为了不失信于儿子，为了儿子长大了也能诚实守信，孟母还是拿钱到这个邻居家真的买了一块猪肉来，拿给儿子吃。

其四，劝止孟子出妻。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伸开两腿坐着(也就是“踞”，这在古代是很失礼的，正确的坐法是跪坐)。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太不像话了，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吧。”孟母问：“你倒是说说，因为什么呀？”孟子说：“她竟然踞坐！”孟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孟子理直气壮地说：“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不能怪你媳妇。《礼记》上不是说了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有谁在；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提高嗓音(好让里面的人知道有人来了)；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记》这样讲，为的就是不让里面的人毫无准备。现在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也没个声响，这才让你看到了她两腿伸开坐着的样子。这是你无礼，而不是你的妻子无礼。”孟子听了，只有自责，不敢再说休妻的事了。

以上虽有些民间传说的故事，但至少可以看出，孟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母亲的良好教育，而这种教育对孟子的品格、思想也必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人说，人生的两大幸事，一是有好的父母，二就是有好的老师。孟子的师承说法不一，一般说法就是，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学生。子思也就是孔子的孙子，据说子思的老师是曾子，而曾子对孔子的思想那叫“独得其宗”。尽管对此还有不少质疑，但要说孟子受曾子、子思思想的影响很大，这则是确实的，毫无疑义的。有人还专门做了统计，说是在《孟子》一书中，引曾子、子思言行事迹各有多少多少条，那些思想可以在曾子、子思那里找到原型。

应当承认，曾子、子思在思想上对孟子的影响绝对强有力。可是，依然远远赶不上孔子对于孟子思想的影响。咱也不妨提供个数据在这里：《孟子》中引曾子、子思言行分别是9章和6章，而光是明确引“孔子曰”的就有26条。这就叫用数据说话。

再看孟子自己怎么说的。孟子说自己是“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我虽未能亲受孔子之门，然而心慕其人而以他做榜样，向他学习，间接听闻他的道，学习他的道，可以算是他的私淑弟子。其实，孔子才真可谓是孟子理想的受业之师。孟子对于孔子那是相当敬仰和崇拜的，因为他打心眼里认同孔夫子的思想，佩服孔夫子的人品德行。此后毕生的努力，也就是发扬振兴孔子的学说。

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三字经》开篇的两句话，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这正是孔孟两位圣人关于人性的主张，第一句是孟子的，第二句是孔老夫子的。

孔子关于人性的论述不多，弟子都曾感叹“不可得而闻”。这句大概算是最显明、最具代表性的一句吧。孔子不深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那个时代好像还没人关注这个。到了孟子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各种各样的人性理论纷纷出场。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有世子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还有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

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为了维护儒家的学说理论，为了延续道统，他主张性善论。这样，人性之辩就成了孟子好辩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成为其整个思想大厦的基础。不弄懂性善论，就不能真正懂得孟子。

孟子性善论的基本思路，《孟子·告子上》里的一段说得最清楚：

“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为了便于理解，现将此章试译如下：“就实情来说，人可以为善，这便是我所说的性善。至于有些人为不善，那不是因为没有善的本质和能力。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即是仁，羞恶之心即是义，恭敬之心即是礼，是非之心即是智。仁义礼智不是外边给予我的，是我原本就有的，不过不曾切己反思罢了。所以，你只要真想求得它，便一定会得到；可如果你主动放弃，那也就失掉了。”

这是孟子论性善的一个总纲。在孟子看来，善性是天生的，内在于心，人要成就道德，就要想方设法回到自己的良心本心，发明自己的良心本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身自省、扪心自问、拍拍良心想一想，无愧于心的那个心。外国人讲究法律，只要不违法，什么都可以干；可中国人最讲究天理良心，也许法律上没有规定不许作，但是违背天理良心的事，就是不能做。如果被骂“丧尽天良”，也就是丧失了天理良心，这在中国是相当严重的，简直无以复加，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性善，也就是承认人天生是有良心的，只是需要你去把它发掘出来，把它打磨得越来越明亮，而不要蒙上厚厚的尘土使之埋没。

实际上，孟子坚持人性本善，并不是在坚持科学，而是在坚持价值。他并不是由于先行发现了人性善，而后为了维护科学而与他人辩论；而是他认识到一种价值，一种他认为值得肯定的，也是应该肯定的价值。而肯定这种价值，必须有人性方面的支持，所以才不得不硬着头皮、竭尽全力来证明人性本善。这也就是孟夫子的苦心了。孟子说过这样一句话：“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如果说人性不是善的，那么人要是做了坏事，并安心于做坏事，且声称这是出自人的本性，你拿什么来说服他，又有什么理由来制止他呢？）尤其，指出这是人天生就具有的本性，并非遥不可及，这也是后世盛赞孟子的一个大关键处。

也有人说，提倡和坚持性善论，显出了孟子的天真和幼稚，他竟然想用道德激励的方法来防止罪恶！其实，是我们不理解圣人。中国的圣人是真正倡导，并力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他们认为以人为本才是根本。这是从天道自然来的。他们认识到大道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周行不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在大道里运行，无为，也就是顺其自然不就好了吗，何必施加外力？施加强制手段就是有为，就是自找麻烦，徒惹是非；发挥人的本性，发挥人的自主和能动性，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才是自然的，才是正道。

西方的哲学家黑格尔在说到人性的善恶时，首先承认了无法从事实上证立性善或性恶，所以他认为，说人性善或说人性恶都对，并且讲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当我们说人性善时，我们是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人性恶时，我们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我想，中国的圣哲是不大会讲出这样的话的。

孔老夫子不明言人性善恶，只说“性相近，习相远”，那是因为他深谙易经的道理，懂得一阴一阳之谓道。孟夫子提出一套性善论，是因为现实需要，在更加纷乱动荡的战国时代，又要与百家争鸣，得有一整套较为健全的理论体系，要建立这个理论体系，你得找个理论基础。孟子当然知道人性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如阴阳一样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但是，非要提出一种不可，那就把善提出来，因为这是“阳”的部分，抑恶扬善这也是孔子删述六经、作《春秋》时候的一个宗旨。

孟子大概是真正读懂了孔子的人，不愧为孔子的嫡传，也无愧于亚圣的称号。

有了人性本善这个基础，那后面就好讲了。按照孟子的话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的善，就如同水总是往下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往下流的。)既然这是势所必然，那么个人只要发扬本性，就可以取义成仁；国家君王也不用严刑峻法，只要实行仁政王道就可以垂拱而治了。

由仁到义

孟子以人性善做基础，进一步向前推进，就发展出他对儒家的第二个贡献——由“仁”到“义”。其实，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是侧重点不同，孔子所重在仁，孟子所重在义，也就是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

我们现在一般是仁义并称，把仁和义放一块儿了，也就是说二者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或者说很相近，但其表现的地方还是有区别的。仁主要指人内心的修养，或者说是对人内心的评价；而义更多的是指人的外在行为，或者说是对人行为的评价。当然，孟子也坚决地认为，这外在行为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内心。孟子曰：“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明白些说是：仁就是人的本性，人的仁心；义就是人们行为的途径，也即做事的方式。

说明了仁与义的差别后，他又指出：“仁者，人之安宅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不是一般的路，是正路，是光明大道；安宅，也就是说是你安身立命的一所好宅子。孟子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正道，而且是一条可以切实践行的正道。如此看来，孟子要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是表明他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

仁在内，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不好把握，也不容易控制，这不光是外人看来这样，对本人来说也是如此；而义就不然了，义相比较比仁就具体多了，它可以指所做的事情，适合不适合，该做不该做，正所谓“义者，宜也”。举个例子，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要是用仁来判断，就要追溯到这个人的内心，深入探究一下，看看你的内心动机到底是怎样的，是真心还是假意。从孟子义的角度来讲，不着重追究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只要你做了好事，那就叫义举。

要求一个人从内心里面做到圣人的境界，这不但确实有困难，而且还很玄乎，看不见摸不着，普通大众不大搞得懂怎么样具体实行。但是，可以要求大众在一种道德的约束下，做一些正确的事情，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这就相对容易一些了，努努力还是可以做到的。

这样，孟子由仁发展到义，显然具有道德实践的意义。也就是说，从道德实践意义上说，义比仁具体，可操作性强。这是孟子对于儒家思想的一大贡献。

义具体，但并不等于琐细，义有大义，我们常说“大义凛然”“舍生取义”。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每当危机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有这样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而且是前赴后继。中华民族能够几番于绝境中重新站起身来，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有精神支柱。这是孔孟在思想文化上，为我民族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孟子在他的文章中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我想吃鱼，又想吃熊掌，可是只能二选一，那我选熊掌，因为熊掌更珍贵吗。在这个比喻之后，孟子紧接着讲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我想活着，可是义也是我想要的，要在这两个里面二选一，怎么办？孟子斩钉截铁地说，那就舍生而取义！

看到这里，我们真觉得孔孟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孔子早就说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没有说明是为什么。孟子现在就来给他加以论证。孟子真伟大，这么一个关涉到整个伦理学基础的重大命题，他只用两个设问就解决了，真是四两拨千斤。他讲的是堂堂正正的道理，却又讲得那么富有激情。

实际上，在这里孟子只问了两个问题。其一，活着是不是人最大的愿望？其二，死亡是不是人最大的恐惧？如果认为活着是人类最大的愿望，而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恐惧，那么其结果就是，只要能活着，只要可以避免死亡，那就什么都可以做，也就是可以无恶不作。

可那样，必然会导致人类的堕落，道德的崩溃，更切己的体会则是，人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请问你愿意过没有尊严的日子吗，你愿意过活得没有人样儿的日子吗？如果不同意，那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既然如此，那最大的愿望应该是什么呢？是义。最大的恐惧又是什么呢？是不义。所以，关键时刻就应该舍生取义，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义。

个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也就在于此。我们不是宗教主义国家，而中华民族数千年人格不倒，靠的就是堂堂正正做人，靠的就是这个道德基础。

王道才是正道

以人性善作为理论基础，上升到政治层面，孟子提出了他的仁政王道思想。这是他对儒家学派的又一大贡献。

孔子他老人家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孟子接过手来，把这项工作做完了，而且做得还相当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绎为一整套政治构想，完成了由学术向政治的过渡，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此，“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或者竟可以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孟子这一套政治构想，上有“六经”作依据，下有统治者的扶持，这就为日后儒家思想获得“独尊”的地位创造了可能。鲁迅先生说：“孔夫子是中国的权势者捧起来的。”权势者为什么单单相中孔子，这与其后继者孟子对其思想的大力发扬有密切的关系。

孟子的思路是这样的：人本性是善的，因为有这个善端，那么对其加以发掘扶植，不使其放失，而是让它充分发展，这就是修身。然后，以自身这个光辉形象作样板，对家里人，比如妻子兄弟施以正面影响，带动他们全都积极行善，一团和气，这就是齐家。再推而广之，以仁政治国，那就是行王道了。

孟子不但有思想，也是个能言善辩的大丈夫，他也曾像孔夫子那样周游列国，为的就是推行他这套仁政王道思想。在那个霸道盛行的战国时代，各国诸侯都不以王道为然，而孟子却力倡王道。《孟子·梁惠王上》就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是孟子对齐宣王进行的关于王道的可行性分析。

齐宣王对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您能给我讲讲吗？”齐宣王那意思是想学习齐桓公和晋文公实行霸道。那孟子怎么回答？

“我没听说过！孔圣人的门徒，没有人会提什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所以后世也就没有对于他们事迹的记载。”那潜台词儿其实就是齐桓晋文他们的事业与我们的大道是相违背的，算不了什么，也不值得一提，他们根本上讲就是先王的罪人。“如果一定要谈谈历史，谈谈治国之道，那我们今天就谈谈‘王道’可以吗？”

齐宣王问：“要具备什么样的德行才能称王于天下呢？”

孟子回答：“使人民得到安定，这样称王于天下，是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了。”

齐宣王接着问：“那像我这样的人，能使人民得到安定吗？”其实，齐宣王知道孟子一向认为他道德修养不够，想着孟子肯定会轻蔑地回他一句“不能”呢，那我还照样实行我的霸道，你孟夫子横是没话说了吧，你亲口说的我不能行王道呀。

哪知道，出乎意料，孟子根本不上他的圈套，十分肯定又干脆地回答他两个字：“可以。”估计当时齐宣王也直瞪眼儿，心说，就我这样的也能行王道？倒要听听。“那您说说吧，您是从哪儿知道我可以呢？”

孟子于是提到了一段旧事。说是，有一次，齐宣王坐在堂上，有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齐宣王见了，便问：“这是要把牛牵到哪儿去？”那人回说是要用它献祭。齐宣王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那恐惧发抖的样子，这样毫无罪过地就这么被置于死地。”那人问：“那献祭的事呢，就不办了？”齐宣王说：“怎么可以废除呢？用羊换它嘛！”

孟子问齐宣王：“不知道有这回事吗？”

齐宣王说：“有这么回事。”

孟子说：“凭着这种心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老百姓都以为王是吝啬的，我本来就知道王是不忍心。”

估计齐宣王听到这儿，心里一定是热乎乎的，可找着理解我的人。“孟先生啊，就是这么回事儿，确实是因为不忍心看它那恐惧发抖的样子，这样毫无罪过地被杀，所以用羊去替换它。也真有不少百姓说我吝啬，想我齐国地方虽狭小，可我也还不至于会吝啬一头牛吧？”

于是，孟子开劝：“王也不要因为百姓认为您吝啬，就感到奇怪，也别觉得委屈。用小的换大的，他们怎么知道王真正的想法呢？”劝是为了把话语权往自己这边拉，“可王有没有想过，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一位辩论高手孟夫子。

齐王苦笑：“那我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呢？这到底是怎么码子事呢？(您倒是给分析分析)”

孟子说：“这正是一种行仁的方法。因为您亲眼看到牛惶恐发抖的凄惨，而没亲眼看到羊嘛。君子对于禽兽，看见他们生，就不忍看见他们死；听见他们哀叫的声音，就不忍心吃他们的肉。因此，君子远庖厨。”

齐宣王听得心里敞亮啊，“《诗经》上说，别人有啥心，我能揣摩到，这说的就是孟先生您啊。我这么做了，反过来问问自己，却也说不出个道理。今日听先生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但仅凭我这种心理，就真的能行王道吗？”

孟子借这一问，立马转入主题：“假如有人跟王讲，他的力气足以举起百钧的重量，然而拿不起一根羽毛，他的视力足以看见秋天鸟兽的毫毛，却看不见一大车柴禾，那王您相信吗？”“不信。”“如今，王的恩惠足以推及禽兽，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却是为什么呢？是不肯用力，是不肯施恩。所以，王不能称王于天下，是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

孟子接着说：“用胳膊夹着泰山穿越北海这样的事，对人家说，我不能，这个是真不能；但是，替老人折取树枝之类的事，也对人家说，我不能，这就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而王不能称王于天下，这就属于折取树枝一类的事。”

孟子通过证明王有“不忍之心”，进而证明了实行王道的可能性，最后就看统治者是否愿意这么做了，只要肯做，就一定可以。

理想的国家

王道可行，但要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理想的国家就得照此而行。

既然民为贵，那就得保民。保民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安民，二是养民，三是教民。

安民也就是保护人民免于自然和人为的灾祸。比如，在尧的时候，洪水泛滥，禽兽食人，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尧就选拔舜来治理，赶走了禽兽，接着又让禹疏通江河，人民才得以在中原大地上生息。三王时代就是理想的盛世，重要的一条就是，尧、舜、禹为人民免除了自然灾害。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还有什么比自然灾害对人民生活的影响重大呢？作为君王，这一条你必须考虑。

至于免于人祸，主要也就是反对军事上的穷兵黩武。战争常常会造成人民的不安和苦难。当然，以仁伐不仁，解民于倒悬的战争孟子也是不反对的，因为那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必胜无疑。当然，人祸除了兵乱以外，还有政治上的不当行为，也足以扰民害民。比如遇到灾年，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而政府的粮仓充盈，可就是不肯开仓赈济，这比天灾还可恨。在理想的国家，这些都得杜绝。

养民，就是强调满足人民自然生命的需要。这个想法在孔子那里就有，孟子加以继承发扬，并加以具体化。首先，就是制民之产：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

对百姓而言，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会有稳定的思想，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放荡胡来，无所不为，如果等他们犯了法再来惩罚他们，那就和用网捕猎差不多了，仁君怎么能这么做呢？所以，要让百姓有稳定的思想，就必须让他有一份固定的产业。关于此，孟子一方面倡导井田制，一方面还提出了美好家园的设想，那就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得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主张分给每户居民五亩园宅，宅边种上桑树，妇女养蚕织帛，院子里再养些家畜，也就有肉吃了。在孟子那里，井田保证粮食供应，园宅保证衣帛和肉食，或者也算是家庭副业，真的很美好。

有了这个经济基础，你还得注意“使民以时”和“取民有制”，也就是说，役使百姓的时候要看季节，不要违背农时，以免耽误农业生产，征收赋税的时候，也要合理，不能横征暴敛。这个也做到了，还得加一条，善养孤寡，主要还是孤苦无依的老人。孟子说得很明白：“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连天下的父亲都投奔到你这儿来，那儿子还能跑到哪儿去呢，这才叫天下归心呢，必然能够称王于天下。

民生问题解决了以后，再进一步就要推广教育。以舜为例，他使后稷教人民耕田种

谷，五谷成熟了，人民生存也就有了保障。可是常人的倾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如果不加以教导，那就无礼无义了，和动物差不多了。所以舜又让契做司徒，掌管教育，教百姓做人的道理。

教人耕种，这是谋生的知识技能，虽说也是教育的一个环节，但是，教育的目的主要还不在此。那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什么？是“明人伦”，也就是使百姓知礼义，明白做人的道理，与禽兽拉开距离！

具体说，就是提倡道德伦理，孟子认为，这就是人与禽兽那些微的区别所在。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也就是仁、义、礼、智。因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也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只要想做完全有可能。人伦，概括起来有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四种美德中又以仁、义最为重要，而仁、义的基础是孝、悌，也就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孟子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守本分，各尽职责，那社会也就和谐了，尽可免于内忧与外患。这才是教育的成功，王道的极致。

与民为贵相对，那就是君为轻。在孟子看来，君只是个爵位官阶，即便是原来的周天子也不过如此，何况僭(jiàn)越的诸侯。而班爵定位，本来是为了划分职守，各司其事。卿、大夫不称职，可以罢黜，天子、诸侯为什么独独不可以呢？一样可以的。他曾经就直接逼问过齐宣王：“士师(最高法院院长)不能管束手下的士(法官)，那该怎么办？”“罢了。”王回答。孟子紧跟着问：“国内的政治不上轨道，又该怎么办？”逼得齐宣王只得顾左右而言他了。

轻君，实际上还是为了重民。提高人民的地位，使国君不但不敢忽视他们，而且要尊重民意，为民造福。

社稷代指国家，那是后来的事，在当时，社稷分别指土地之神和五谷之神，也就是国家的保护神。社稷受到危害，国家就会失去保障而灭亡，国家灭亡，则民命难保。理一下顺序就是国君不能危害社稷，社稷不能玩忽职守，一定要对人民尽保护之责，一句话到底，那就是二者全都得以民为本，人民最尊贵。社稷二神不尽职可以废立，国君不称职，那也可以推翻他。

大家想想看，这在君权、神权并盛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理想的人格

孟子有理想，有理想的国家，还有理想的人格。当然，这一点并不算特殊，孔子也曾为久不梦周公而叹息，墨子则一心以形劳天下的大禹为终身学习的榜样。不同的是，孟子开展了深刻的舜(圣王)跖(zhí, 强盗)之辩，从而将他个人这种理想人格思想深深地植入中国人心里，乃至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从孟子那儿来的。孟子说：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

孟子在这里把人格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而六个层次中善是最基本的，圣和神是高层次的。前面四个还容易理解，这后两个得解释一下。“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赵岐《注》)，“此(圣人)谓德业照于四方而能变通之也”(焦循《孟子正义》)。圣与“达则兼济天下”有关，不仅要自己充实表现出光辉，而且其德业还得能够影响、化成天下四方。神则是圣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案，从而达到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境界。神和圣都是人格的一种境界，而并不是神格，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的序列。

尧、舜、禹、汤、文王、孔子，都是孟子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典范。孟子对舜的称道，多与性善有关，其人绝对是性善论的样板人物；称道文王，主要在他的仁政方面，这是王道主义的典型范例；孟子对孔子，那则是把他当作自己绝好的老师一样地称颂和学习。甚至竟可以说，孟子最敬重孔子，简直无以复加。在《孟子》一书中，他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并引述孔子弟子的话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孟子这样盛赞孔子，在于孔子德性、功业都出类拔萃，那就是孟子心中的标杆。他的学说源自孔子，他的力量源自孔子，他的信心源自孔子，他的希望也源自孔子。这也就是说，孟子一生所作所为，全是以孔子为榜样，正如他自己所说“乃所愿，则学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努力构建理想人格。可以说，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在孟子之后才真正丰满起来的。如果非要简单概括一下孟子这种理想人格的话，可以说是“大丈夫精神”。

关于什么人可以称为大丈夫，孟子之时就有讨论。景春，战国时的一位纵横家，他感慨地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瞧瞧人家张仪、公孙衍，那才叫大丈夫呢，他们俩要一旦发怒，诸侯都害怕，他俩要是在家好好休息，天下也就安定了。孟子听了，什么反应？

“什么，这两人算是大丈夫？你没学过礼吧(怎么说出这么没有水平的話)。”“这是必敬必戒，无违丈夫的小媳妇！(我告诉你什么是大丈夫吧)”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夫。”(《孟子·滕文公下》)

这既是对景春的批评，也是孟子的自勉，他自己就是大丈夫精神的最典型代表。与张仪、公孙衍的“妾妇之道”不同，我们看看孟子是怎样对待王侯的吧。

孟子在齐国稷下学宫，不治而议论，享受着大夫的待遇，也就是不用上班，专管提意见发牢骚，还可以领高工资，外加配房配车。连孟子带来的学生都跟着沾光，每人也配一辆车。因为孟子说了，我学生多，我出门他们要跟着，我坐车，一帮学生跟后边儿跑，这不像话，所以，齐宣王说，那就给你的学生也每人配一辆车。要说齐宣王在当时的诸侯王里，那得算相当不错的了，明人李贽就赞他是一代圣主呢。

可就是对这位齐宣王，也没见孟子有一点感激之态。换了别人，早就为这“皇恩浩荡”而感激涕零了，肯定也匍匐在地了。可孟子怎么样呢？他老人家腰板一直挺得直直的：我不欠你什么，你还甭跟我摆大王的架子；我是教你走正道(王道)的老师，年龄比你大，学问比你深，你只不过地位比我高，二比一，我不输给你。

孟子要的就是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他要绰绰有余地，不做诸侯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

有一天，孟子早晨起来，穿戴好了，琢磨着要去见齐宣王，跟他聊一聊(得机会还跟他讲王道)。正要出门，宣王派人来请，说是齐王本来今天想来看您的，可是不巧，他生病了，可他真的很想见您，您能不能屈尊大驾，到齐王这里来相见？

孟子一听这话，毫不迟疑地回复说：“你回去告诉齐王，我今天也生病了。”他老人家本来要去的，这下愣是不去了。我可以自己来，但是不能够你召我来。

第二天，孟子一大早到一个叫东郭先生的人家里去吊丧，孟子的学生公孙丑就提醒老师说：“不行啊！昨天齐王来请，您说病了，今儿一早就去吊丧，传出去就不好了。”孟子说：“我昨天生病，今天好了，难道不可以吗？”他老这儿前脚儿刚出门，那儿齐王就派人来问候孟子了，连御医都带来了。到地方儿一看，人孟子不在家。孟子的一个堂兄弟在家，一看这情况很紧张，只好临时撒个谎：“哦，孟先生昨天确实病了，今早上刚好，已经上朝拜见齐王去了，可能正在路上呢。”这边赶紧派人，到各个路口去堵孟子，见着孟子就告诉他：“赶紧到齐王那儿去，我们已经替你编了个谎，可别穿帮喽。”谁知孟子不买账，“谁让你撒谎来着，你撒谎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他根本不听你那套，齐王那儿才不去呢，也不回家，一拐弯儿到齐王大臣景丑家做客去了。

连景丑都看不惯了，“孟先生呀，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齐王对你够敬重的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啊，可我们从来没看到你是怎么敬重齐王的呀？”孟子说：“你错了，在齐国，也只有我一个人是真正地尊重齐王。”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跟齐王谈仁义道德，你们都谈些乱七八糟。你们不是不知道仁义道德好，你们是觉得不值得跟他谈。”

这就是可敬可爱的孟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他们有他们的财富、爵位，我不要，我有我的仁和义；内心充满了仁义道德，还有什么可自卑的呢，我为什么要敬畏他们呢？他确实做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的理想人格也成为我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

第九章 逍遥之祖庄子

庄子大约与孟子同时，都是战国中期的大思想家。孟子是儒门护法，庄子是道家代表；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庄子与老子并称“老庄”；换句话说，他们分别是儒、道两家的第二号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精髓，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主张返朴归真。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并且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逍遥自得，是绝对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质享受与虚伪的名誉。庄子的思想，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看来，虽不能算是“正统”，但也实在算不得“异端”。上自秦、汉、魏、晋的黄、老与玄学，中至宋、元、明的理学，下至近代的唯心主义都有其血液贯注着。正如宋人叶适所说：“自(庄)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文集》)难怪人称“天仙才子，万古庄周”啊。

乡野饿夫傲立诸子

先秦诸子，除孔子、孟子几人外，后人能确切知道他们生卒年月、出生地，乃至家庭背景的，还真是少之又少。庄子作为一个沉思默想、不求功名的隐士，基本上也不会参加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更难清晰明了地给他做个传。就连最权威的《史记》，也只是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给他234个字的简介，虽然比给墨子的24个字看起来还多了不少，但终归嫌短。所以，我们只能是推测，根据他的生平事迹、交游往来，大致推定。

庄子，姓庄名周，大家一般都这么说，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是这么记载的。可是，也有人认为，庄周这个名字大概是个笔名，庄是康庄大道的意思，周则是周行不殆的意思。当人的思想境界真正和道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人生的道路就是康庄大道，自然也就能够周行不殆，庄子就达到了这种至高的境界，所以叫庄周。

至于庄周的出生地，基本上都认为是宋国蒙人。可是蒙到底在今天的哪个地方，也还是说不清。一种说法，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河南的商丘，也就是说庄子是商丘人；另一种说法，是安徽的蒙城；另外，也有人说，蒙既不在安徽也不在河南，而是在山东。这样看来，名人的老乡还真就是多呢。

庄子是宋国人，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庄子的文章中多有以宋国为背景的传说和寓言，连韩非子引用庄子的话时都说，这是“宋人语”。看来庄子是生长在宋国的，但这也不能说明他和别的国家就没有瓜葛，要知道，那是诸侯国林立的战国时代。起码，大家都感觉到庄子与楚国好像就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不单单是因为楚王曾打算礼聘庄子作国相，主要还是因为，《庄子》一书所反映的风土人情、宫廷传闻，尤其是那浪漫灵动的思想，瑰丽奇伟的文风与楚国文化十分相近，觉得这简直就是另一个版本的《离骚》嘛。

于是，有人认为，庄子与楚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应该藏匿在其已经模糊了的家世之中。庄子很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为了避难，被迫迁移到楚国北地边陲，最后才流落到宋国的。

公元前387年，跻身“战国七雄”的楚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吴起变法。

战国时期，先后出现过魏国的李悝(kūi)、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三大改革家。吴起是一个才高德薄的历史人物，但是，作为一代英杰，他确实为楚国的强盛作出了生命级的贡献。

楚国封国之初，本来还是一片落后的蛮荒之地，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湿，山川秀丽，楚人带着原始的浪漫和热情，很快发展了起来。到吴起变法时，楚国已是公族众多，财政匮乏，“贫国弱兵”，不堪重负，社会矛盾眼看就要激化了。楚悼王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倡导变法，被楚悼王委以重任。他力主“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说白了，就是要“简政”，把那些只领俸禄不干事儿的闲官、散官裁汰一批，对贵族的三代以下闲散子孙统统贬为庶民，让他们自食其力。然后把省下来的钱拿来蓄养精兵，为的是与中原各诸侯国争雄。为了防范和避免被贬贵族后裔联合造反作乱，吴起下令让“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也就是把他们打发到边陲地区，让他们开荒种地，过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

庄氏是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即位，卒于公元前591年)。从楚庄王的时代到吴起变法(前387)的时代已经相距二百余年，即使三十年算为一代，到庄子父祖辈上，也早已过了三代，所以无疑是被贬谪的对象。

可是，吴起也有失势的一天，楚悼王(公元前318年逝世)一死，吴起立即遭到达官贵人的联合追杀。可吴起聪明，临死也得拉上垫背的。他抱住悼王的尸体被乱箭射死，有的箭不可避免地就射到了悼王的身上，而伤害王尸是“夷宗”的大罪，于是，那些参与作乱的显贵们遭了殃，被新继位的楚肃王诛灭“七十余家”，庄子的父祖辈大概就是这时为避“夷宗”之祸而越境迁居宋国蒙地的。

庄子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十二年后出生的，也就是公元前369年。正是这样的出身背景，成就了庄子的人格思想。有人这样说：只有在社会巨变或残酷政争中败落的贵族后代，才会有这样悲观的性格倾向(这让我们想起了曹雪芹，好像是有点儿这意思)。在如此热闹的时代，在士人阶层异常活跃而且情绪激昂的年代，庄子似乎连一点儿进取的努力都不曾做过，也就是不曾主动去谋求做官或者闻达于诸侯。

他只在蒙这个地方做过一段时间不算长的漆园吏，之后就彻底隐居了。庄子也钓鱼、捕鸟、打草鞋，可那是为了谋生，不是娱乐。他经常饿得面黄肌瘦，甚至于向人借贷，可就是不愿意出仕做官。

贫则贫矣，可那不是落魄。有一次庄子去见梁惠王(很可能这是庄子一生中唯一一次去见君王)，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实在没有好衣服穿啊，但是，腰带鞋带儿都系得工工整整的。梁惠王见他穿得这么破，就说：哎呀，庄先生啊，久闻你的大名，没想到，你怎么搞得这么落魄啊——“何先生之惫耶”？庄子立刻纠正：我是贫困，不是落魄——“贫也，非惫也”，我有精神，有人格，有境界，谁说我落魄啊？

接下来，庄子更不客气了：你说我落魄，说我贫穷，我怎么能不这样呢，我处在什么时代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耶？”你梁惠王当国君，让惠子之类人当国相，我能好得了吗，百姓能好得了吗？

是啊，庄子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能力做官，他是打心眼儿里不愿意做官。他看不上那些积极营求的人，也不屑于积极营求，与其沾染浊世，不如自得其乐。

庄子有个老乡，叫曹商，和庄子两个人是互相瞧不上。可是，曹商后来发了。怎么发的？他去游说宋王，宋王一高兴，说：得，我给你几辆马车，你出使一趟秦国吧。于是曹商就带着这几辆马车去了秦国，跟秦王这么一聊，秦王一高兴就给了他一百辆车，这下发了。你庄子不是瞧不起我吗，这回我非得气气你，专门把车带到庄子家门口向他炫耀，还外带着讽刺挖苦的风凉话。

庄子怎么反应？庄子是天才，他不动声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听说秦王发了一个通告，他得了一种怪病，什么病呢？痔疮。谁能治好有奖赏，而且治疗的手段越是下作，奖赏还就越高。用手术刀治好的，给一辆车，用舌头舔的话，给五辆。现在你得了一百辆，请问你是用什么办法给他治的呢？

类似的故事还有呢。庄子有个好朋友叫惠施，也就是惠子，名家的代表人物，在魏国做了相。庄子心想，老朋友做了国相，我去看看他。可他还没到魏都大梁呢，各种谣言就传到惠施耳朵里了。很多人都跟惠子讲：你要小心了，你的老朋友庄子可要来了，他这一来，还不把你给顶了。惠子一听，紧张啊：我好不容易混到这个位置，怎么能让他抢去

呢。绝不能让他去见梁惠王，搜，先关起来再说。于是在大梁城里搜了三天三夜，可愣是没搜着。

第四天，庄子自己找上门来，并且给惠施讲了个故事。他说：南方有一只凤鸟，它非梧桐树不落，非清泉的水不喝，非竹子的果实不吃。这只凤鸟飞向北方时，看到地上有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死老鼠吃。老鹰看到凤鸟飞来，吓得“唉哟”一声，赶快把死老鼠藏在身子底下，生怕被抢走。你现在是不是也想拿你那个相位来恶心我呀？能言善辩的惠子听了，也只有无地自容的份儿。

别说你小小魏国的相位，就是如楚国这样的大国，庄子愿意的话，那相位也是做得的，就有这样的机会。战国时代的风气，政治家普遍重视士人，招揽人才那是富国强兵的急务，急得都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名就行，甚至连无名的鸡鸣狗盗之士都网罗在内。庄子的大名和才华，楚威王早就有耳闻，于是专门派使者来礼聘庄子，请他做国相。可是，竟然遭到庄子的拒绝。

庄子说：楚国国王祭祀祖先和天地的时候，常到田野里去找合规格的乌龟，然后把它好吃好喝地养起来，等到祭祀的那天，就把它杀了献祭。请问您二位，是愿意作水田里的乌龟在烂泥里生活呢，还是愿意到楚国的宫殿里去享福？楚国的两位大夫都说：还是在水田里面好了。庄子说：对喽，你们回去吧，我也愿意在水田里，拖着尾巴在烂泥里自由地生活，不愿意到楚国的宫殿里去，用生命来换取所谓的富贵。

庄子就是这样，不仅不愿意做官，也不愿意当清客被人家养起来。我们说过，战国中期的时候，士人普遍受到重视，可以做官，也可以做官府或者贵族的学者清客。孟子不是就去稷下学宫了吗，好吃好喝好招待，没有具体的差事——“不治而议论”，与政治有关无关的学问都可以谈，还“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配专车送别墅。

稷下学宫当时是最盛之时，连孟子、鲁仲连这类不大愿意曲事权贵的人都去了，何以庄子竟未去，此中原因虽无法说清，但从庄子拒绝官府的清高态度出发，可以推测庄子是不喜欢当时主流知识分子装腔作势的样子，也不喜欢那个积极营求、熙熙攘攘的俗间世。

庄子就是这样一位贫居乡野、一而不群、傲立诸子的散淡高人。

有用与无用

不错，庄子是高人。“高人”也就是“得道高人”的缩略语。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说了“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庄子的学问非常大，知识面很宽，那个时代所有的学问，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了解的，没有他不精通的。所以，在庄子十几万字的著作里，各家各派的思想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庄子·天下》就是专门评价天下各家学派思想观点的好文章。但是，庄子的思想主要还是来自于老子，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扬光大。

老子特别强调“无之用”。一个杯子，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就可以拿来随便装什么东西；一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正好可以在上面随意挥洒。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之用”。

但是，老子这样表达的时候，讲的未免有些抽象。到庄子这里，就把它形象化了。庄子讲道理的时候，往往是用讲故事的方式，随时编造一个寓言故事来阐明道理。而且他的故事往往是即兴的、生动的、有趣的、富有哲理的。

有用的那是才，在人叫人才，在钱叫钱财，在树木就叫木材。关于树木的寓言，《庄子》里面讲的不少。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庄子·人间世》)

山上的木头，就是因为它长成材了，有用，可以盖房造物，可以造船打家具，甚至还可以做棺材，所以被人砍伐。树生下来，本来生命就是他自己的，本来也可以在山上一一直生长下去，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自享它的生命历程。可是，因为它有用，就被砍了，这到底是谁之过？

庄子认为，罪魁祸首就是这棵树自己，所以叫“自寇”。这个“寇”就是砍伐的意思，是它自己招来了别人对它的砍伐。

庄子还讲到一个关于树的故事。说是有一个能工巧匠到齐国去，经过一个叫曲辕的地方，看到一棵很大的栌树。这棵栌树生长在土地庙旁边，非常高大，大到下面可以盖得住数千头牛一起乘凉，数十仞以上才有枝条，看来是棵老栌树，长寿树。

这个工匠从旁经过时，老栌树旁边还围了不少人欣赏，叫作“观者如市”，可是这个匠人根本没驻足，更没上前儿，依旧赶路。他的徒弟奇怪了，实在不忍心就这么走了，不禁问他的师傅：“我们这些人，拿着斧头，跟着您，已经很久了。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今天终于碰到一棵大树，正好可以取材啊，为什么从它旁边经过，都不正眼瞧一下呢？”

师傅怎么回答的？“这棵树根本就是不材之树，不足取材。它的木质太重，用这样的木头造船，船会沉；它虽然重，可又不坚固，用它做棺材，棺材很容易腐烂；做一般的器具，比如家具什么的，那很快就会损坏；用它打门窗吧，则会溢出油脂。所以这棵树看着挺大，可是没什么用，还很容易生虫子。”最后他还总结了一句：

“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庄子·人间世》)

正因为这棵栎树是一棵没有用处的树，是不材之树，“无所可用”，不能做船，不能做家具，不能做棺材，连门窗都做不了，所以它才能像这样长寿。

这个齐国的木匠，回到家以后，晚上睡觉还做了个梦，梦见这个树神来找他了。并对他说：“你白天对弟子的那番议论，我全都听到了。你讲的话真是无知啊。你好像很瞧不起我，说我是棵无用之木。你哪里知道，这恰恰是我多年来所追求的呀。我不断地修养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修养到一个无用的境界啊。”

这其实就是庄子的思想。我们现在所说的“颐养天年”之“天年”，在庄子的著作里，出现的频率也是相当高的。这里的“天”就是自然，“年”就是寿命。庄子用“天年”这个词来说明人和万物的自然寿命。庄子发现，在那个时代和社会里，很少有人能够活到他自己的天年，从普通百姓到上层社会，都是如此，有不得不如此的，也有自作自受的。于是，庄子一再告诫，要好好地珍惜自己，好好地保护自己，让大家不要过于“求用”，不要过于追求成功，要意识到“有用”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和祸患。

这就是老庄和孔孟，道家与儒家的区别。儒家一再要求人们要不断地“琢磨”自己，也就是打磨雕琢自己，目的就是为“有用”，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小后大，步步推进。可庄子呢，按他的思想，也得修身，可是方向是180度的逆转，修炼到无用的境界。如果你是一棵树，那就把自己修养成不是块“好材料”；如果你是人的话，那就把自己修养成不是“人才”的人。庄子还给他们专门起了名字：不材之木叫散木，不才之人叫散人。要不戏里老唱“散淡的人”呢，就是从这儿来的。与散淡、散漫紧跟着的就是自由，叫自由散漫，不为所用，不受限制。有用的木头也有名字，叫文木，其结局就是那个“山木自寇也”，因有用而被用，一旦被用，就不自由，就受限制了。

庄子好像发现了当时非常严酷的一个现实，那就是，人是不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是没有自主选择自己行为自由的，人总是被命运拨弄着，越是有才，越是有用，就越是摆脱不了被使用的悲剧命运。由此，庄子认识到，有用就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戕害。有用只是对他人而言的，是相对于社会而不是对自己而言的，它的标准是外在的，而无用的标准才是内在的。所以，他主张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修养成无用。

可是，庄子马上发现一个问题。有一次，庄子在山中行走，他的几个弟子随行。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像前面说栎树似的，它周围很多树被砍掉，就它还幸存。庄子的弟子都觉得奇怪，就问庄子。这个道理，打从栎树那儿庄子就想明白了，所以就从容地回答说：“这棵树以其不材而终其天年”。

这是白天发生的事儿，可到了晚上，又遇到一个反例。庄子带着弟子们夜晚投宿，来到一个老朋友家里。老朋友见庄子来，很是高兴，要款待宾客，于是对家里人说：“赶紧杀一只鹅来，我要好好招待客人。”可是家人就问了：“家里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呢？”“自然是杀那只不会叫的了”主人回答。

庄子的弟子们听了这个回答，就和白天老师的教导联系起来，于是很上心地记下来，等第二天离开主人家以后，把它拿出来请教老师庄子。“老师啊，昨天那棵树，因为不材而活下来；可是昨晚那只鹅，可是因为不材被杀了呀？！”这问题还真是不好回答，也亏得庄子脑筋快，给了一个很滑头的答复：“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那我就既不做有材，也不做无材，我就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吧。

我们觉着这话多少有点儿像儒家说的“无过与不及”，不知庄子他老人家是怎么拿捏的，也不知他的弟子们听明白没有。这玩意儿说着容易，做着可难啊！

乘道德而浮游

当庄子回答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时，他大概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个权宜之计。因为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多的是个技术问题或者说技巧问题，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人我、主客之间的矛盾，可仍然显得有些勉强，总觉得不彻底。于是，有了下面的话：

“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zǐ)，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故可得而累邪！”

处材与不材之间，未免乎累，而且似是而非；乘道德而浮游，才可以真正达到无累。在庄子那里，“道德”这个词儿，和今天的意思还不一样。在这里道是道，德是德，他们是分开的，各自独立。“道”是指自然万物乃至一切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那个规律性的东西，而且是普适规律；而“德”则是每一个个体独具的特征。所以，庄子说的“乘道德而浮游”，既要乘道又要乘德，是两方面都要照顾到，即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个性特征。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达到了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也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才能够免于社会所施加的种种束缚甚至危险。

要乘道德，首先就得“与道化合”。那怎么样与道化合呢？天地之正，就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六气之辩，则是六气变化的规律，也就是自然万物变化的规律。那么，循天地正道，掌握万物变化的规律，做到“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也就可以“游无穷”了，此正所谓“逍遥游”。

逍遥游是无所恃的游，也就是庄子在《逍遥游》篇里，反复提到的“无所待”。“待”与“恃”两字形相近，形相近则很可能意味着内涵上有相通之处。在这里，“待”可以理解为“恃”，恃就是凭借，有所恃就是有所依赖，如我们常说的“有恃无恐”。庄子讲“有待”和“无待”那可比“有恃无恐”的层次、境界大多了。那几乎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一种物我两忘，与天地合一的境界。

如果说有用是人生的第一境界，也即材的境界；无用是人生的第二境界，也即不材的境界；再高级，处乎有用与无用之间，即材与不材之间的境界，那么，到头了吗？还有更高的境界吗？有。最高的境界就是“乘道德而浮游”。

乘道德而浮游，就是让人摆脱对现实世界中一切有用之物的依赖，也就是达到“无待”的境界。无待就是无所凭借。一般人总觉得还是有所凭借，有所恃的好，那样才叫给力呢。可是，庄子就不这么看，庄子的境界那可真叫大。他认为，有所待依然是有所限，有所待提供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有限的自由；至于绝对的自由，或者说绝对的最高境界，那非得是在无所待的情况下才能达成。

因为，一切能为人所依赖的东西都是有局限性的。而这些事物的局限性，最终会变成所凭借它的人的局限性。我们鼓励人时常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顺着百尺竿往上爬，最高也就是一百尺，更进一步，怎么个进法？所以，要想达到无限的高度，就不能依赖任何有限的东西。要想逍遥，无牵累，无羁绊，就得无所待，只有无所待，才能无物无己，才能忘我，才能与天地道德合一。

有人说，“无待”就是“待无”，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其实也就是“道”。所以，待无的层次肯定比待有的层次高、境界大。境界大了，心就大，就会少烦恼，得逍遥。

得逍遥，是庄子的存身之道。他的存身之道起码包括两层意思，首先就是保证自然的寿命，第二就是保护自己的个性自由。可能在庄子看来，没准保持个性自由更为重要，所以他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出仕。庄子说的很明白：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身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庄子·缮性》)

不是隐士们自己愿意藏在深山里，不愿意出来；也不是他们自己愿意闭上嘴巴不发表见解；更不是他们有智慧不愿意贡献出来，实在是时代不对呀。这就不是一个能做事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个体生命来说太危险，危害人的生命，也危害人的自由。孔子不是就被警告过“当今之世，仅免刑焉”吗？可孔子不信邪，还是出来到处跑，周游列国贩卖他的学说。可结果又怎么样呢？虽然几次遇险都保住了性命，可又有哪个诸侯愿意照他的思想去治国呢？

庄子看透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战国时代，还不如孔子的时代呢，情况更糟糕。所以，他的心冷了，对那些统治者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了，认为他们无可救药了。得，教不了，我放弃。

这条路不走了，我干吗？乘道德而浮游，与天地大道同行那是真逍遥。养生、存身、逍遥自由以尽天年，正是庄子所极力提倡和践行的。他希望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按照自然的生命历程自由充分地发展。这一点似乎与我们当下以至未来所追求的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庄子的思想尚具有现代价值。而且，他告诉我们，有所待的境界还不够大，还有限，它的外面还有一种境界，很高、很大、很远，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大境界。要想得逍遥，你心里得有那个大境界。

自由是因为自足

重视个体个性的自由，提倡个体个性自由，是因为个体自足。这个自足，不是咱们常说的自足常乐的自足；而是说，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有足够的理由，有充分的依据。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那意思。在庄子这里就是：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是合理、合德、合道的，都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所以，谁也无权抹杀任何个体的存在，谁也无权否定任何个体的存在，甚至无权改变其他个体的现状。

庄子在《齐物论》篇里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

翻译过来倒是不算难，可理解起来还真不容易：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比秋毫之末更大了，而泰山是小的；没有什么比一生长下来就夭折的孩子更长寿了，而那个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却是夭折的。

众所周知，泰山很大，可庄子偏说他很小，甚至没有什么东西比泰山更小了，泰山要是和秋毫比呀，那泰山是小的，秋毫是大的。那殇子和彭祖，一个是夭折的孩子，一个是八百岁的老翁，按常理，不用讨论，大伙儿准一致说彭祖长寿，可庄子偏说是夭折的孩子长寿，彭祖那才是夭折呢。费解，太费解了。看来，要理解这句话，光靠语言文字功夫是不行的，还得有点儿抽象的哲学思维才行。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不是一类的东西不要搁一块儿比较，因为他们没有可比性，比较他们是不公平的。可是庄子比我们更进了一步，那就是，即使是同类的事物，不同的个体，也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他们的贵贱大小。细想起来，这应该是很伟大的一步，迈出了这一步也就是承认了个体的价值。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必要拿此者的缺点与彼者的优点比。这其实也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道”是世界万物共同的规律，无影无形，不具体，一旦形成具体的东西，那“道”在这个具体东西上的体现就是“德”，也就是个体的个性。反过来说，每一个个体都是有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都有他自身独特的本质特点。其实，德就是个体的道，显然德和道是相通的，这就是哲学里所说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每一个个体都合德合道，这就为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既然个体有存在的依据，既然个体自足，那你就得尊重个体，注重个性。既然尊重个体，注重个性，那通过什么来体现？毫无疑问，就是宽容和自由。

宽容，你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歧视其他人和物，你与他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轻重贵贱之分，你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人家也有。自由，就是“由自”“不由他”，根据就是“个体自足”。一个人怎么想，怎么做，都由自己来决定，而不是为外力所强迫。当然，这个自己的自由是建立在他人自由的前提之下的，也即维护自己的自由之前，承认他人的自由。

如果说孟子为道德找到了人性论的基础，那么，庄子就为人类的“自由”找到了认识论上的依据。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人性是自足的，所以要做一个自由的人。道德和自由，这人类存在的两大基石，恰好被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两位大思想

家论证得如此完美。

儒家思想一再要人们为社会多做贡献，而庄子一再维护个体的自由。他在《齐物论》里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也就是，所有的物，所有的个体，都有他之所以这样的理由，都有他可以这样的理由，应该肯定，也应该尊重。为这庄子还举了“莛与楹”(也就是小草和柱子)“厉与西施”(也就是丑女与西施)的例子，说他们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

可是呢，“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也就是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那就只有自己贵，互相都看不起对方。这就容易造成歧视，有歧视就有麻烦，就有迫害，希特勒不是狂杀过犹太人吗，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

可见，庄子齐物论，无贵无贱、个体自足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可贵和高尚的。

宇宙本来无是非

在庄子看来，或者说从道的角度看，宇宙间不光没贵贱，也没是非。可是，人生在这世间怎么能没有是非呢？没是非，那不是老好人吗？所以，庄子这里所讲的是非，不是简单的用道德的评判标准来看的，不是伦理学的角度，而是认识论的角度。

“齐物论”可以说是齐物之论，也可以理解为齐“物论”，就是把关于事物的议论都等齐起来，公平起来。比如庄子讲到：人如果长期地待在潮湿的地方，后果比较严重，会生病，会偏瘫，会得关节炎，可是，泥鳅会这样吗？不会，泥鳅偏偏就是愿意待在泥巴里；人如果晚上睡在树枝上，一定会非常害怕，可是，猴子会这样吗？也不会。人要睡在床上，泥鳅偏要睡在烂泥里，猴子则喜欢睡在树上，你说哪个对呢？

很难回答。如果说像人那样睡床好，那让泥鳅和猴子也睡床上，他们还真享受不了；如果说睡烂泥里好，那让人也睡烂泥里试试，人也受不了。所以庄子说，天下没有所谓的“正处”。处，就是环境，正处，就是适合的、对的环境或地方。

不单没有“正处”，也没有“正味”，也就是没有共同的口味。人喜欢吃牲口，喜欢吃猪马牛羊。可麋鹿喜欢吃什么呢？羊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什么呢？蜈蚣喜欢吃蛇的头脑。而猫头鹰喜欢吃的竟然是死老鼠。可见，天下没有大家一致认为好吃的东西。

天下还没有“正色”，也就是大家一致认为好看的美色。庄子说，猿和猴之间是要配对的，猿要找对象的话那就找猴子；麋要找配偶的话，那必定找鹿；鱼要找伴侣，那就找泥鳅，反之亦然。可人要找对象呢？找美女呗。可是，尽管人见了美女就喜欢，鸟兽鱼虾见了又会怎么样呢？躲呗。用庄子的原话就是：

“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兽见之远遁。”（《庄子·齐物论》）

于是，庄子得出一个结论：天下没有正处，没有正味，也没有正色，每一个不同的类，都有其不同的爱好，这也可以推广到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所以不能以自己的立场和喜好去决定别人的喜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立，反过来，己所欲施于人就不成立。

这也是合道的，想想看，大家若都一样，若都喜欢一种东西，那还不抢疯了？必然引起某些东西的绝灭和某些东西的泛滥，进而就是所有东西的毁灭，因为它破坏了世界的多样性，而单一是不能生生不息的，是必定要绝灭的。

每一个事物本身都存在着与它相对立的一面，就像今天哲学里所讲的，所有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而且这个矛盾双方的关系又是互相依存的。每一个事物都有是和是非，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它的矛盾性，因此就不能以一得之见来判断世界。在《天下》篇里，庄子曾感慨地说：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那么多的学问，儒家也好，兵家也好，墨家也好，法家也好，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看到的部分真理，然后就把他们自己看到的那部分真理理解为是全部的世界，理解为全部的真理。互相之间却不能承认。所以，庄子说他们是“一曲之士”，

也就是得到部分真理，又拘泥于这部分真理，而认识不到真理的全部，认识不到世界的丰富性和宇宙的无穷性。就好比一个人的眼耳口鼻等感官，各自都很灵，可就是不能互通消息。

这让我们联想起盲人摸象的故事。一群盲人，都不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各自过去摸一摸。摸到大腿的，就说大象像柱子；摸到鼻子的，就说大象像弯弯的管子；摸到尾巴的，就说大象像个细细的棍子；摸到身体的，就说大象像一堵墙。那么，到底听谁的？

这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稍微前进一步，就是我们经常面临的非常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试想，如果摸着大象身体的人掌握了大权，而他又坚持说大象像墙，其他人的说法全都是错误的，并且所有人都得承认我的，我说的才是真理，不承认不服从的一律治罪，这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吗？

可见，认识论的问题最后会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庄子就是意识到世界的无限性和自身的局限性，知道真理并不一定在自己这一边，知道自己并不掌握全部的真理，承认别人也可能有真理的一部分，懂得给异端思想和持异端思想的人以宽容和尊敬。而这即使是在今天，公认为较比古代社会文明进步了许多的新时代新社会里，仍然是很多人无法达到的境界。

生死可作如是观

能够无贵贱，无是非，已经很难了，人都说生死事大，可到了庄子这里，还可以“无生死”或者说“齐生死”。大家应该都听过庄子那句话：“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与佛家说的“死即是生，生即是死”意思好像差不多，难怪到后来常用庄子思想来消化佛学理论，容易沟通。

一句话，在庄子看来，生死都不算什么，正所谓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首先，庄子能客观地面对死亡。我们知道，庄子一生物质生活都是不宽裕的，老伴儿自然也是跟着他过了一辈子苦日子，也算得上是患难夫妻了。可是，当他的老妻死去的时候，庄子怎么样呢？他“箕踞”，就是两腿叉开，平坐地上，这在古代是极其无礼的坐姿。普通人家里要是遇上这样的事儿，起码应该是垂头跪坐，即便不流涕也应该神情哀婉吧。庄子不但箕坐，不但不哀婉，还鼓盆而歌，就是手里拿着个破瓦罐，一边伴奏一边唱。

这让前来吊唁的好友惠施都看不下去了，实在气不过，说“庄先生啊，你这也忒不像话了。你的老妻跟着你苦了大半辈子，还给你生儿育女，容易吗？如今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算了，干嘛还要唱起来，太过分了吧？”

庄子听了，说：“你批评的也是有道理的。你以为我真的不难过吗？我也是人，怎么会没有人之常情呢？刚开始，我也哭。可是哭了几声我就不哭了，因为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想我的妻子在没有成为人之前，她是什么？”

诸位，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庄子想的是：“人在没有成人之前，她肯定是没有生命的，不光没有生命，连形体都没有。不光没有形体，连元气都没有。气原来是混杂在冥冥之中的，变化后成为气，然后才成形，然后才转化为生命。现在她又由生转化到死，这不是和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一样吗？她的尸体现在还躺在天地之间，我却哇哇叫地在她身边痛哭流涕，自以为这是没有真正理解生命现象，所以就停下来不哭了。”

在庄子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人也不例外，“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可以说，庄子在宗教之外，给我们找到了一种生死之道。参透生死是人生的大课题，把这个参透了，人一辈子也就算是明白了。

庄子是真看透生死了，当他自己将死之时，又是怎么表现的呢？正因为他执著于这样一种“通下一气”的观念，自然就对死亡抱着一种十分浪漫达观的态度。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准备厚葬自己的老师。庄子知道后用幽默的口气说：“我死了以后，大地就是我的棺椁，日月就是我的连璧，星辰就是我的珠宝玉器，天地万物都是我的陪葬品，我的葬具难道还不丰厚么？你们还能再增加点什么呢？”学生们哭笑不得地说：“老师呀，我们还不是怕乌鸦老鹰把老师吃了么？”庄子说：“扔在野地里你们怕乌鸦老鹰吃了我，那埋在地下就不怕蚂蚁吃了我么？你们把我从乌鸦老鹰嘴里抢走送给蚂蚁，为什么那么偏心呢？”

一个人对死亡能有这样通达的态度，真的是可爱可敬。

庄子不但能客观地面对生死，也敢于谈论生死。孔子就不愿意谈死亡的问题，叫“子

不语怪力乱神”，对于死亡，孔子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要把生死的问题紧紧地捂住不说，唯恐出问题。因为，没有宗教的民族，老是谈死亡，容易使人产生幻灭感。死了以后，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既然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那活着的时候为什么非要做一个好人呢？所以，基于道德的考虑，孔子要回避这个问题。可庄子不在道德的角度来谈问题，他超越了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谈，而且是痛痛快快地谈。

就有一个讲死亡的故事。说庄子到楚国去，在野外看见了一具骷髅，庄子非但不惧怕，还走上前去，用马鞭敲打着骷髅的脑袋，说：你是因为违背自然规律而死的么？是国破家亡，遭到刀斧之刑而死的么？是自己干了罪恶的勾当，有愧于父母妻子而死的么？你是因贫穷冻饿而死，还是寿终正寝自然死亡的呢？”问完了话，庄子就枕着髑(dú，头骨)髅睡觉。

半夜，髑髅在梦中对庄子说：“听你说话像是能言善辩的人，不过，你说的都是活着的人的忧患，死了之后便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你想听听死人的道理么？”庄子说：“可以。”“死了以后，上无君下无臣，也没有为生活奔忙的四时之事，轻轻松松地以天地为春秋，其快乐程度即使你们南面为王的君主怕也比不上呢！”庄子不相信，就说：“我让掌管生死的鬼神恢复你的形貌，归还你的肌肉骨骼，送还你的父母妻子和朋友乡亲，你愿意么？”髑髅一听很不高兴，紧锁眉头说：“我怎么会放弃比南面称王还快乐的事，去到人间受那些烦心劳体的罪呢？”

这里，庄子把死亡描绘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安乐之事。既然死比生还要快乐，关于死亡的恐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说法固然不能证实，但也没人能够证伪。但是，庄子的基本思想并不是以死为乐，而是“齐一生死”。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死亡是最可怕的了，可经庄子这么一说，死亡也就不算什么了。生死存亡，可作如是观：“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大块就是大地，大地对众生是什么样呢？大块承载着众生的形体，用生来让人们劳作，用老来让人们休息，用死亡来让人们得到最终的安息。死亡，不是惩罚，而是对人们的体谅，甚至是奖赏，辛苦了一辈子，好好的休息吧。

这是庄子浪漫达观的生死观，也是对天地自然所唱的赞歌。

第十章 百家争鸣的终结者

从荀子到韩非

荀子与韩非，他们都生活在战国末年，荀子还是韩非子的老师。荀子是儒家的三位杰出代表之一，而从学于儒门的韩非，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这乍看起来显得有点儿不可思议，而实际上却是顺理成章。这还源于那个纷乱既久的时代。战国末期，诸子各派的思想学说均已出现，而且各择其主，纷纷涉足政治大舞台，对各家诸侯乃至社会施加影响。这使得本就注重实际，深怀乱世之忧而又博学深思的荀子，不仅能采纳诸子思想，又可以进行比较和批判。他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在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本恶”是个核心，基于人性恶，荀子又突出强调了“礼”的行为规范作用。而他的这个“礼”更近于“礼法”而不是“礼义”。荀子还主张重法尊君、法后王，这无异于给暴君松绑。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并非完全偶然。从这里也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精神，那是一个人们迫切渴望政治统一以结束动乱的时代。

历史正在重新定向

荀子、韩非，他们都生活在战国末期。从周平王元年(前770)算春秋战国时代的开始，到此时已经差不多500年了。在四五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始终缺少足够的力量来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社会仍然在寻找，同时也一直在孕育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以使自己由战乱无序走向和谐统一。

说到底，发生在春秋战国的这场沧桑巨变，根源还是在于基于生产发展的人们能力普遍地发展和提高，打破了原先的平衡，这就使得人们开始对自身利益普遍地觉醒和重视，他们要求进行一次利益的大调整，要来一个符合现实的重新分配。

诸侯不再甘心做周朝的藩属，而是要各自为政、自做君主；卿大夫和士也不再甘心于隶属他人，看人脸色、仰人所赐地过生活，而是要积极谋求更大的权利；地主和商人则不仅对土地和财务感兴趣，而且还要寻找政治上的代理人或自己跻身于统治阶级；连奴隶都开始起义、逃亡，很多人有了自由民的身份。

乱则乱矣，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沧桑之变正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社会进步的一条重要表现，那就是社会利益的一定程度的普泛化。从历史上看，人们利益的较为普遍的获取，往往就是通过化原来的“公利”为个人的“私利”而实现的。这就必然导致原有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破坏，社会失范在所难免。

然而，大多数个人应时、合理的“私利”也就成了“公利”，而“公利”一旦只为少数人享有时，那也就成了“私利”。春秋战国，正是已经变得虚假的“公利”被人们抛弃，而实在的私利被无数个人所力争的时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丧失了生命力的旧的经济、政治、文化类型行将就木，与此同时，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类型也正在孕育发展，即将取而代之。

于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变法”也就是改革成为潮流。齐国管仲的改革，将齐桓公推上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其后，但凡实行变法改革的国家，多能由弱转强，甚至称霸诸侯。人们看到了改革变法的好处，也看到了作为人才的士阶层的重要作用。诸侯们甚至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招揽任用“天下之士”(贾谊语)。

身价倍增的士人，获得了从政参政的大好机会和一试身手的社会政治大舞台。他们可以选择为本国服务，也可以为他国效力，何去何从全看未来的发展机会和所受待遇，“楚才晋用”的成语，就是当时人才流动、大争夺的真实写照。这真可说是士人的黄金时代。

招揽人才、变法革新，无非是为富国强兵、称雄天下。诸子百家的士人弟子也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力图用自家学说说服或影响君主权臣施政。可以说，人们从道德仁义及先公后私的思想束缚中相对地挣脱出来，以个人私欲为基础形成了尚利尚力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是社会发展巨变的精神条件，而社会的变革发展反过来又强化和推进了这种意识。

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统治更多的民众，乃至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各国诸侯都有兼并别国的强烈争霸意图，只要一有条件 and 机会，他们就会展开攻城掠地、杀人灭国的战争。战争，这种本属特殊，而在当时又频繁发生的社会交往形式，自然地指向天下统一，因为，它是天下统一最有威力、最有成效的形式。

当然，单纯的战争并不能实现天下统一。与战并重的就是“耕”，凡有头脑的统治者，总是“耕”“战”兼顾。一方面，他们不能绝不考虑人民厌战思安的情绪，在战争的间隙想办法让他们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为了战争本身，也必须靠生产积累财力物力。所以，此时的变法不可不在耕与战两方面做文章。

客观地说，正是在这个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重视，铁制农具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生产技术也取得很大进步。同时，工业商业也空前地活跃起来，多方面地满足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需要。

也正是当时的经济，也就是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为统一提供了深厚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上的发展，导致了互通有无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大都市的形成，冲击了各诸侯国间的壁垒关卡，将不同区域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感觉。这就促成并强化了天下安定就要统一、统一才能安定的思想观念。

到荀子之时，建立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大一统帝国，已经成为最显明的时务、最重大的事功。问题仅在于根据何种原则、采取何种方法、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个统一。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关于荀子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相当简略，生卒也不详，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和其他资料推测，其政治、学术活动大致在公元前298年(周赧王十七年)到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之间。

荀子密切关注着现实世界的变化，深切地感受着时代的巨变，也清醒地意识到，虽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还在持续，但历史正在重新定向——从混乱到安定，从冲突到和谐，从分裂到统一。

如果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么荀子应该是“知其可而为之”，他进取有为的人生态度和理智客观的思想方式，或许就来自于此。他也和孔子、孟子一样，曾为推行其学说而周游列国，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虽然，他的许多见解受到各国当政者的称赞，但均未给予重用。

尽管如此，荀子依然矢志不移，年事已高犹自著书立说，一心施展自己的抱负，推行自己的主张。他凭借的已不单是孔孟那样的对理想的持守，他知道他的理想是很现实的，是必定要实现的，也就是说荀子的理想取向和现实取向是统一的。

为了这种统一，荀子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本，博取百家、兼采众长，结合社会现实，加入新的社会内涵或者说时代特征，对既有思想进行了再造与重构。

引法入礼

荀子对于既有学说思想的再造和重构，虽说以儒家为本，但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损益。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于“礼”的改造。

礼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深入地探讨了礼的起源问题。关于礼的起源，他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也就是说，礼的起源是为了节制人的欲望，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争夺。这里荀子首先承认了人生而有欲望的要求，欲望要求无度量分界就会发生争夺，因此要用礼加以节制。但是，礼主要还是为了使欲望得到合理地解决，而不是为了完全压制人的欲望。所以说礼乃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求和财物保持平衡，即两者相持而长，这就是礼的起源。

然而，除了满足人类这些基本的生存之养外，礼还有他另外的重要内容，那就是“别”。别什么？荀子说：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何)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王制》）

这样看来，别就是贵贱长幼贫富之别，包含人之伦理和等级这两种差别。其实，具体点儿说，就是君臣、父子、君民等上下秩序，以及社会人群占有财富多寡的差别。例如，天子最贵，其所得之“养”(供给)就“礼”所应该为最高，诸侯、大夫以至庶民则等而下之，这就是礼之“分”与“别”。

之所以要按礼分配，而不实行平均分配，那是因为物资匮乏，供不应求。而且，荀子还说：

“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

给人分等级，这在荀子看来，是礼的一大功能。人的地位不能完全一样，众人也不能完全平等，为什么呢？因为，那样一来，就谁也支使不动谁了，还怎么做事情呢？简直就是取乱之道。这是天数必然。先王厌恶混乱没有秩序的状态，所以制定了礼来为人们分出贫富贵贱来，然后让他们相互制约，保证天下的人都能得到那基本的生存之养。

其实，说白了就是，要保证使人群中一小部分人过得好，大多数人饿不死，而且还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并承认这个现实，各守其礼，各安本分，不闹事儿，大家和和气气过日子，落得个天下太平。看来，礼还就是最便捷的手段。所以，在荀子这里，礼先是个政治现象，然后才是文化现象。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看礼在孔子、孟子那里是什么样的。在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之初的春秋时代，孔子讲的礼，还是对一种古老政治秩序的回忆与怀念，也是对一种古老文化景象的回忆与怀念。他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礼，要“我从周”，希望通过努力，保存

和发扬古老的道德传统，更希望这套文化传统能够继续发挥它的社会整合作用。

孟子则从辞让之心出发来谈礼。他天真热情，对人类抱着善良的信心，认为礼产生于人本性中的善，是一种先验的存在。也就是说，礼首先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是源于自然，然后才表现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即所谓“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礼是由天生的辞让之心自然而然产生的。

不难看出，在孔孟那里，“君子国”的理想还在，孔孟的礼，都更主要地属于上层贵族政治生活的规矩，以及私人生活中的礼让揖节。或者说，孔孟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了，对他们也使用原本专对贵族使用的规范标准。

荀子的礼，从争夺之心谈起，也就缺乏了人主观上自发的揖让成分，而主要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约束。可以说，孟子的从辞让之心谈礼，属于道德的范畴，其对象是人的道德自觉自律，它最终产生的是义务思想；而荀子从争夺之心谈礼，则属于法的范畴，其对象是“度量分界”，它最终导致的则是权利思想。

显然，就礼之产生及其作用而言，荀子的分析更为现实和理性，显得也很科学，而孟子的分析就理想得多感性得多，但也正是这种“往好了想”的天真、理想，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温暖与美好，获得一份人之为人的自信与自尊，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发现，按荀子的那种解释，礼的运用已然具有了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使得他的礼与孔孟的礼有了很大的分别。孔孟的“礼”近于“义”，所以常常“礼义”并称，荀子的“礼”则近于“法”，所以“礼法”合一。这样，荀子算是完成了他对于礼的改造。应该指出，荀子还是坚持礼的，尽管他这个礼已经与其弟子韩非的法仅有一步之遥，但也就是这体现出了老师思虑的周全和伟大。

人性本恶

上面说过，荀子谈礼，出发点在承认人天生就有欲望需求，虽然荀子并不否定人基本的自然生理需求，但他也看出人生而有的这个“欲”，显然很容易超过其基本的自然生理需求，这就源自于人性恶。荀子提出人性恶，这也是他独具特色的思想。

荀子主张的人性本恶和孟子主张的人性本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能够成为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说：“涂之人可以为禹”，那意思都差不多，也就是凡人也可以做圣贤。可是，这种一致还不足以掩盖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

按孟子的说法，仁、义、礼、智的“四端”是天生的，只要充分发展这四端，人就能够成为圣人。荀子对此那是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是孟子不了解人的本性，尤其是不了解人的本性和人后天作为之间的区别，才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

荀子呢，他可是把先天本性和后天作为明确区别开了。何为人性？人性就是人的本性。而且这个本性是天生的、自然的，不是学习得到的，也不是人为而成的。

人性如此，物性也是如此。人有耳朵就可以听，有眼睛就可以看，人的听觉和视觉不是学来的，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因此，凡是不学而会，不为而成，自然生就的性质，就称之为本性。凡是要通过学习才会，经过人为才成，靠人后天努力才具有的能力和本领，那就称之为“伪”，伪就是人为的意思。也就是荀子在《性恶》篇里说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人的感官只要一接触到外界，就自然产生的感觉，不必等待后天努力就有的性情，这就是出于人的本性；相反，人的感官接触外界，并不自然产生，而一定要通过后天努力才能获得的认知，那就是出于人为。

在荀子看来，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性，关键在于区分天生和人为。在这一点上，孟子显然犯了错误，他把后天人为习得的东西，当作人的本性了。如果说人性本来是善的，那人就应当一出生就知道礼义、谦让，就像事物固有的素质就是美的，材料固有的品质就是好的，或者就像有目能看、有耳能听一样。但是，人生下来并不知礼义和谦让啊。

我们看到的是：人性就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逸。至于自己虽然挨饿，仍然紧着长辈先吃；自己虽然劳累，仍然替长辈劳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违背人的本性，背离人的情欲的。而之所以还能这样，那是后天学习并遵循礼义的结果。

接下来又有个问题。既然人性和物性一样，是源自天生与自然，那么，是不是就非善非恶了呢？

否。人性是恶的。荀子指出：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人生下来没有不贪图私利的，如果顺着这种本性，就会出现争夺而看不到彼此的谦让；人生下来没有不嫉妒别人的，倘若顺着这种本性，就会出现互相伤害而看不到诚实守信；人生下来就有各种欲望，喜好美色乐声，如果顺着这种本性，就会滋生淫乱而看不到礼义秩序。人生下来就目好五色，耳好五音，口好五味，身好安逸，心好追求占有，难道不是这样吗？只要放纵人的本性，势必造成争夺，出现违反名分等级，破坏社会秩序的混乱局面，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那怎么办？用礼义制度来约束。圣人熟知人事，深谙大道，集思广益，制定礼乐，确定法度，以此来维护人类社会秩序，这就是圣人人为的努力。他还有个专门的词儿，就叫作“化性起伪”。也就是，圣人变化改造人性之恶，兴起造就人为之善的意思。

就人的本性而言，圣人与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那完全在于圣人后天人为的努力，也就是能够化性起伪。常人如果也接受圣人的教化，不断积累文化知识，遵行礼义制度，并且不断磨练积累，也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可要是放纵性情，任意妄为，违背礼义，那就只能为小人了。

显然，荀子主张人性恶，区别性伪之分，主要还是为了强调礼义教化的重要性，为推行礼义教化奠定理论基础。然而，不可否认，这种过于理性的分析，多了几分冷漠少了几分温情。

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说他混淆了本性与人为的区别，而荀子自己也混淆了一对范畴，那就是自然范畴和伦理范畴。人性属于自然的范畴，而善恶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自然范畴内不存在道德内涵，到自然现象中去寻找道德意义，这恐怕是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我们说，人的正常欲求既可以是恶的萌蘖(niè)地，也可以是善的源泉，或者说是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荀子把人的欲望之作用几乎完全想成负面的了，他固执地认定人性的自由发展只能产生恶，那就极其容易走到压制人欲的道路上去。这不但影响了他的弟子韩非，甚至波及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反人性的思想主张，在那里达到了顶峰。这或者可以说是荀子人性恶的严重后果，即便替他解脱，也不能排除二者之间确有联系。

成为中介并非偶然

荀子是法家代表韩非、李斯的老师，而这两位徒弟，一个是秦统一天下的理论指导者，一个是辅助秦始皇剪灭群雄的得力干将。尤其李斯，在秦之加强君主专制及焚书坑儒过程中，还起了关键的作用。因此，这两位“高足”也就成为后人诟病荀子的由头。

宋代大文豪苏轼就说：“昔者尝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c h i)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彼李斯者，又悖甚者耳。今夫小人之不为善，犹必有所顾忌。……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独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东坡全集》第四十三)

这种观点，已为不少人接受。虽说韩非和李斯在思想上并未完全继承老师荀子，甚至多有相异甚或相悖，但是，客观地讲，荀子对于李斯和韩非思想的形成，还是有相当影响的。

有这么一点值得重视，荀子对于天下统一有着积极的追求，由于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而使得这种追求尤为迫切。为此，他也在调整他的思想和身份意识或者说定位。

我们可以略作比较，孔子的一生似乎一直保持着贵族的气质，那是一种高贵的近乎淳朴的品性，有着贵族的爱好与教养，他精神世界的高贵典雅与他物质世界的低贱贫乏所形成的巨大落差，正是他精神势能形成的原因，他的克己复礼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情结，一种回归往昔“郁郁乎文哉”社会的精神情结。

到了战国中期的时候，我们看孟子和庄子，他们也是破落贵族出身，但流浪既久，皈依的情怀早已消磨殆尽，他们对祖先昔日的堂皇早已没了兴趣，他们独往独来，天马行空，追求的就是精神的自由，要的就是那自由自在的感觉。他们只依天，不依人，对于统治者，庄子是绝不合作，孟子是只做王者师，不做王者臣。

到荀子这里，就变了，由特立独行的大丈夫，一变而为端庄明慧的淑女、循规蹈矩的君子。端庄明慧的淑女是做妻妾的好人选，循规蹈矩的君子是做臣下的好材料。孔子的典雅高贵和孟子的铮铮傲骨，到荀子这里似乎都不见了。好在，荀子尚处于战国末世，那昂扬的士人精神还没有完全崩溃，在荀子身上还有一股不屈不挠之气时时流露，但这就不一定能在其后世弟子身上找到了。

荀子是要和统治者合作，希图在体制内为士人找到位置，找到一个好归宿。他也不要独立，相反，他要找到组织，找到同志，找到领导，因为他看到天下即将一统的暗流正在涌动，他要抓住机会干事业。

要做事，就得“能群”，这是荀子早就看明白的理儿。可要能群首先就得先摆正各人的位置。荀子说了：

“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君下爱民。”

“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荀子·成相》)

也就是，要明于君臣之分，要尊君，要谨守臣道。臣道是什么？就是区分贵贱上下，以“礼”的秩序安顿天下，自己上尊君，下爱民，做一个忠心耿耿、恭谨勤劳、忠于职守的臣僚。这也是他给所有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他说：

“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事业听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职，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唯)印(仰)上，莫得擅与孰私得？”(《荀子·成相》)

你看，我们的荀子他不要士人流浪了，也不要士人游荡了，他要他们干事业，什么事？听“上”的安排，仰“上”的照拂，生活上不要“游食”，精神上忠于主上，一切生活来源也仰仗主上的供给。这样，守其职，也就可以丰衣足食了，不需要也不允许擅自谋求私利，取你自己那份就好了。

如果从对己的角度来看，这是自愿去做人家的笼中之鸟、池中之鱼，这种人格与孟子、庄子的差别已经很大了；如果从对别人的角度看，那荀子就是鼓动从剥夺经济独立权着手，来剥夺士人的思想独立与行为自由，以便使士人阶层成为统治者的附庸。他甚至还兜售“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

“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僇；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广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荀子·仲尼》)

主子尊重我使我富贵呢，就要恭敬逊退；主子信任宠爱我呢，就要懂得谨慎和谦让；主子专任我呢，就要拘谨而周详；主子接近我呢，就要恭敬顺从而不邪妄……不一一翻译了，反正宗旨已经说明了“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这大概是孟子、庄子所不屑的吧。

荀子的这个态度和主张，首先就在他的弟子那里付诸实践了。李斯努力使自己成为秦始皇的“贤臣”，成为有用之人，韩非则用他的帝王术教导秦始皇如何统御这些士人。荀子这个中介作用不可谓不大呀，也绝非偶然。从他们那里，我们悲哀地看到，先秦诸子可贵的独立性，包括人格独立和学术思想的独立，都被卖与帝王家了。

韩非的道理

要论理论水平，那在荀子的弟子中顶数韩非最棒，这是他那著名的同学李斯亲口承认的。《史记》说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是韩国公子、王室贵族，生卒年不详，反正和李斯同时就是了。虽说是贵族，却不被重视也不受重用，但从韩非的悲喜人生看，这种身份和名分还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影响似乎只是负担和拖累。

他不如同学李斯自由，对待价而沽的李斯来说，那就是哪儿最有机会就上哪儿去，哪儿最有前途就上哪儿去。李斯只是楚国的布衣，当看到连贵族身份的屈原在本国都无用武之地时，他可以了无挂碍地投奔最有指望的秦国。

韩非就不行了，他有点儿像是定向生。虽然定向，可又算不上是韩国委培的，韩国并不需要他，治国理政根本轮不到他，还不能自找下处。这就把天纵聪明的韩非活活给束缚住了。英雄无用武之地，韩非只好闭门做他的学问，继续深入地进行他的理论研究。

韩非从学于荀子，而很多人认为荀子之学不醇(纯)，在这一点上，韩非倒是像极了他的老师，韩非之学也不纯。但是，于不纯之中又各有所本，如果说荀子还主要是宗于儒家，那么韩非毫无疑问乃法家的集大成者。

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就显得狭隘了。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与方法，要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帝王之术。帝王内心里大都比较喜欢法家，因为法家说了，做帝王不一定非得是圣人才能做得，中等资质的人就可以，而且他们还给你准备了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和手段。

在韩非以前，法家已经有三派：一派以慎到(与孟子同时)为首，以“势”为政治和统治术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派以申不害(死于公元前337年)为首，申不害强调“术”；再一派以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为首，商鞅又称商君，最重视“法”。“势”，指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

韩非在他们之后，且集他们之大成，认为这三者都是不可或缺。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韩非子·八经》）明主像天，因为他依法行事，公正无私；明主又像鬼，因为他有用人之术，用了人，人还不知道是怎么被用的，这便是术的妙用；他还有权威、权力以加强他的命令的力量，这是势的作用。这三者缺一不可，帝王都应该具备。

此外，大概是吸收了老师荀子的厚今薄古说，韩非子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历史观。我们看，孔子、孟子，甚至墨子，他们动辄就把往圣先王抬出来，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更具权威性，他们抬出的圣人一个比一个早，孔子举周文王、周公，墨子就举大禹王，孟子为了要抗拒墨家，就举出比大禹还久远的尧舜。

到韩非这里，变了。韩非不往后看，人家向前看。如上述这些往后看的，认为古代制度好，要求复古的，这在韩非看来，都属于守株待兔一类。因为时代变了，新问题出现了，“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即主张与时俱进，只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决新的问题。

不法先王法谁？法后王呗。也就是说，大家实际一点儿吧，尧舜那样的圣王几千年才出一个，就别老指望他了，踏踏实实辅佐现在的君王吧。

那既非圣王的，现在这个中等资质的君王自己又该怎么做呢？韩非早就给他想好辙了，照着干就是了。在这里，韩非借用了道家老子的“无为无不为”思想，稍加改造就可以为自己的这套理论服务了。

照韩非所说，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立法。通过这些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

当然，这个具体审查的人不会是君王自己，按照职责找官员做就是了。然后，君王只管理这些官员。管官员也不必那么费心，还是用赏罚就行了。按照“循名而责实”的原则，也就是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完成分内的事。完成得好就赏，完成得不好就罚，而他们的职责法律早就规定好了，对照执行就可以了。

这种用法用势治民的思想，一方面降低了对君王才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君王的道德负担，他们不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非得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进行统治。这对君王真是一种大大的解脱，难怪后来那些想搞集权的君主内心里老是暗暗地喜欢法家。

法家强秦

这不，秦始皇头一个就喜欢上了韩非，而且在他那个时候也不用偷偷摸摸，大大方方地喜欢就行。

秦始皇是因为看到了韩非的著作，立马喜欢上韩非的，他甚至脱口说出：“寡人得见此入，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大概不会想到，在本国不得志的他，在秦国却意外地遇到了知音，而且这个知音竟然就是秦王嬴政。这是韩非之幸，也是韩非的大不幸。

当同学李斯告诉秦王政：大王您赏识的那位韩非我认识，他是我的同学，身为韩国公子，现就在韩国。秦王一听，马上出兵韩国，目的就一个——要韩非。韩国本来就没把韩非看得有多重要，秦王既然要他，乐得顺水推舟，派韩非为特使出使秦国。

秦王政与韩非一席长谈之后，大为满意。可是，满意归满意，疑心还是大大的。他一方面对韩非的理论倍加欣赏，另一方面却未必相信韩非会忠于他，毕竟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加之同学李斯的嫉妒加陷害，韩非最终被逼死于秦国的监狱。

韩非生前没有得到秦王的重用，但他的著作却成为秦王朝的指导思想。

应该说，自秦孝公开始任用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思想便成为秦国治国的指导思想。再加上秦王政有兼并六国的雄心壮志，这样，他接受起韩非的法家思想来，就十分顺遂。秦王政在看到韩非的著作以前，大概只对商鞅的“法”最为熟悉，对于“势”和“术”的意义还不不清楚。但是，自从他读了韩非集法家之大成的著作以后，对于人君的南面之术的运用便表现得十分热心。

别忘了，韩非的同学李斯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果说韩非对于秦始皇的指导，还只是理论上的，那么，李斯则是帮助秦始皇以法家理论兼并天下、统一天下的实践者。

我们可以褒贬李斯的为人，但不能否认他的能力和抱负。他来秦国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助秦王的军队、财富、权势等，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的。而这与同样怀揣梦想，野心勃勃的秦王政一拍即合。李斯在与年轻的秦王政谈论时，有一次提到了“时”，跟他说，当前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统一”的“万世之一时”，比千年一遇还难得，而且稍纵即逝。等山东的诸侯醒过神儿来，再次联合，即使黄帝重生也无法统一天下了。

真是天佑大秦！在天才商人吕不韦进入垂暮之年，进取锐气消失之时，老天给秦国送来了一个精通“帝王之术”的李斯，又把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著作赠给了秦王政，并使他爱不释手。这无疑于在秦国的肌体上，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而这血液竟又是如此地活跃。

主要参考文献

- [1]鲍鹏飞.先秦诸子十二讲 [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 [2]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 [5]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6]孔繁.荀子评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7]匡亚明.孔子评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8]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 [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0]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 [11]钱穆.中国思想史 [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12]施觉怀.韩非评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3]吴方.中国文化史图鉴 [M]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 [14]邢兆良.墨子评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5]杨善群.孙子评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6]颜世安.庄子评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7]杨泽波.孟子评传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8]曾仕强.中华文化的特质 [M] .济南：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
- [19]曾仕强.易经的奥秘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